

动乱年代

——基辛格回忆录



75

前 乱 年 代

一九三〇—一九四九



Henry Kissinger

YEARS OF UPHEAVAL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Limited, 1982

根据利特尔、布朗出版公司一九八二年版译出

封面设计：孙 政

动 乱 年 代

——基辛格回忆录

〔美〕亨利·基辛格 著

刘丽媛 过家鼎 杨静予 刘觉伟

吴继淦 尤 颀 张志 等译

* * *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北京外交部街甲31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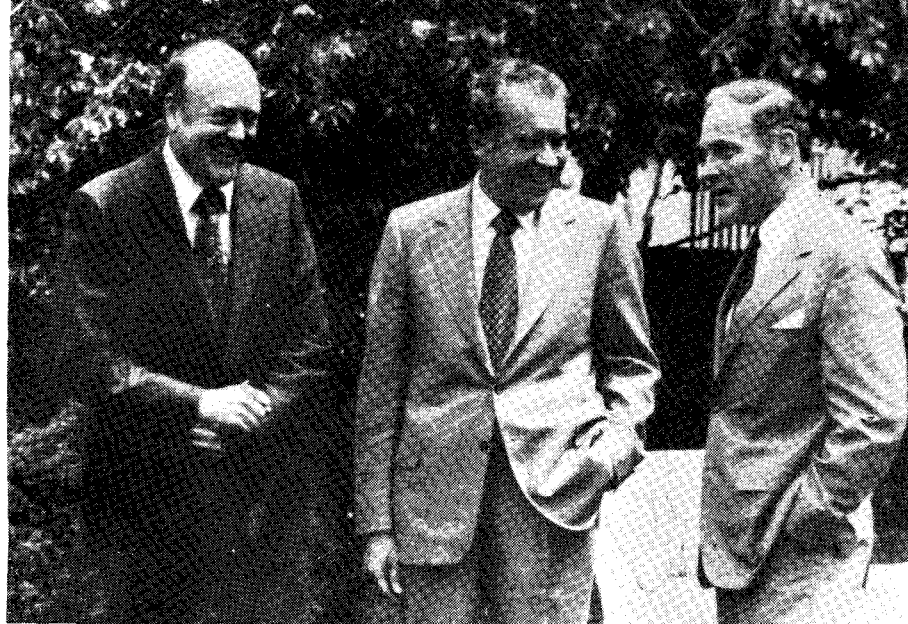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 印张：51 插页：9 字数：1,223,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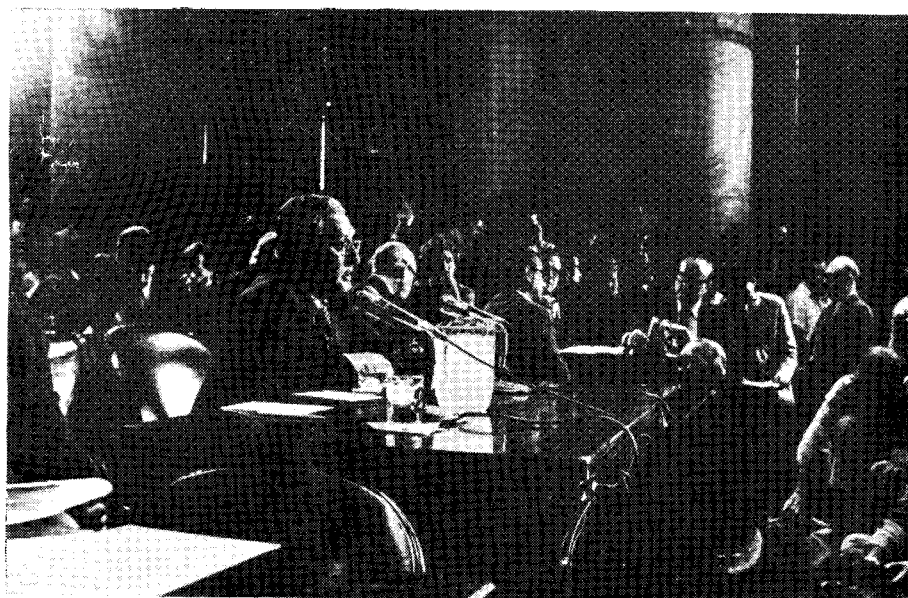
1983年7月第1版 1983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1,000

书号：3003·1651 定价：(共三册)9.65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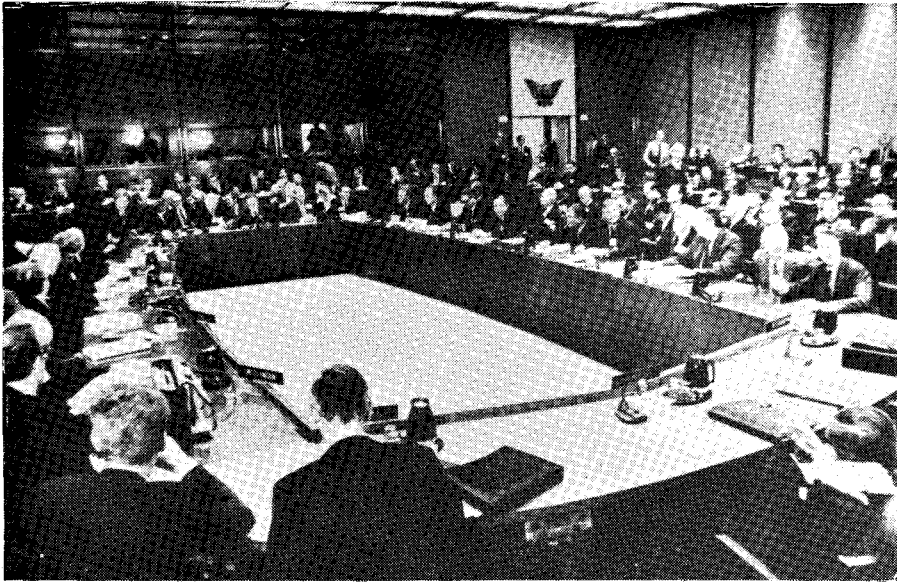
一九七三年六月的白宫新班子：莱尔德、尼克松总统、黑格。



一九七三年九月以国务卿身份在国会作证。



一九七三年五月勃列日涅夫、基辛格身穿狩猎服在扎维多沃。



一九七四年二月十一日华盛顿能源会议开幕。

分析形势 介绍知识
提供背景 解答问题 的通俗刊物

世界知识 半月刊

本杂志创刊于1934年，历史悠久，国内外享有声誉。每期载有分析和论述当前国际重大事件的文章，设有纵横谈、列国志、新闻人物、通讯、游记、国际书窗、外国文摘、科学与文化、世界经济点滴、世界拾零、天南地北、事实与数字、大事记等专栏，配有图解、插图、漫画。封面彩色凹印，每期刊载新闻图片。它是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国际问题爱好者，以及外事工作者的参考读物。

全国各地邮局发行（刊号2—80），国外发行由中国国际书店经办（刊号SM20）。读者如在当地订购有困难，请直接汇款世界知识出版社发行科邮购，免收邮费。本刊每月1日、16日出版，每册定价0.20元。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辑、出版

全国各地邮局预订和零售 国外发行：中国国际书店

欢迎订阅 欢迎邮购

集图片之精粹

收世界于眼底

世界知识 画报

欢迎
订阅

《世界知识画报》是介绍世界情况、传播国际知识的画报。

《画报》彩色精印，新颖生动、丰富多采。内容有：世界见闻、重大动向、各国风光、民族习俗、名胜古迹、文化艺术、经济科学、体育活动、人物介绍、历史地理、珍禽异兽，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连载。

《画报》是一本雅俗共赏、老少咸宜之读物，工余披览足能赏心悦目，一册在手环球可以卧游。若积册为卷，则可汇成世界画史，尤有保存价值。

《画报》为月刊，16开本，7月份出版创刊号，共36面（含封面），定价0.60元，敞开发行。请到当地邮电局订购，刊号2—149。国外发行由中国国际书店经办，刊号M666。也可直接汇款到世界知识出版社发行科订购。

目 录

| | | |
|-------|---------------------------------|-----|
| 第十九章 | 能源危机..... | 1 |
| 第二十章 | 能源与民主国家..... | 56 |
| 第二十一章 | 通向大马士革的道路：一次探索性的 穿梭外交活动..... | 107 |
| 第二十二章 | 缓和衰落：一个转折点..... | 166 |
| 第二十三章 | 为叙利亚问题进行穿梭外交..... | 238 |
| 第二十四章 | 最后的骚动..... | 349 |
| 第二十五章 | 尼克松政府的终结..... | 442 |

第十九章

能源危机

自鸣得意的年代

我兴高采烈地回到华盛顿。但是危机很少会发生戏剧性的变化。变化通常都隐藏在平凡的事物后面，不是突然爆发，而是以一系列技术性决策的形式出现。我们现在面临的能源危机就是这种情况。

一九七三年的能源危机开始时倒是颇富戏剧性的。它无可挽回地改变了战后形成的世界局势。表面上以不可阻挡之势扶摇而上的繁荣局面现在急转直下。与此同时，通货膨胀象森林大火一样席卷工业化国家，经济衰退使数以百万计的人失去了工作。比较穷困的缺油国家陷入了更严重的经济萧条，欠下无法偿还的债务，而石油生产国突然拥有了用不完的财富。他们出于经济或政治考虑使自己结余的为数巨大的游资在各国首都之间转移，给各国货币造成了灾难。比这种经济变化更为严重的是，石油开始作为政治讹诈武器出现。工业民主国家眼睁睁看着自己不仅被迫经受经济动乱，而且他们的社会团结和政治生活也不得不发生根本变化。

但是，纠正这种局面的措施不是短期可以奏效的；震动造成的影响直到今天还存在。我们的经济体制还没有复元；政治和社会后果尚未消失。

影响如此深远的变化怎么会如此突然地降临到我们头上呢？

事后回顾，许多情况就比较清楚了。产生戏剧性变化的种子和信号当时已经存在。石油革命和历史上的许多革命属于同一类型。这些革命都是必然发生的，但其必然性只是事后才能看清。历史学家几乎无法理解，为什么在历史上某些伟大革命发生以前人们往往根本没有想到即将出现变化。即将受难的人们为假象所迷惑，以为世界是永恒不变的；他们把后人视为十分明显的警告当作很快就会消逝的偏差。因此，本来可以通过加固而扼制洪水的堤坝却无人置理，直到它们突然决口，滚滚洪流把那些根本没有想到会出现危险的人吞噬掉了。

理查德·尼克松上台时的世界经济形势是：人们把廉价石油看成是理所当然的，认为主要的经济问题是生产能力过剩。如果我们在政治方面有过任何烦恼的话，考虑的也是如何满足石油生产国不断提出的要求。这些国家当时争先恐后地想进入我们的市场；作为交换，他们愿意在外交政策上使我们得到好处。六十年代结束时，美国需要的石油只有百分之二十左右依靠进口。我们认为国内拥有大量尚未开发的储量，因此感觉飘飘然。阿拉斯加北坡新发现的油田有可能提供大量石油。我们还拥有丰富的油页岩，并且认为在供应缺乏造成价格上涨时就可迅速加以开发。^{*}美国的生产水平是由所谓得克萨斯铁路委员会确定的。当时它决定的产量远远低于生产能力，目的是把国内价格保持在三点三美元一桶——每桶比世界价格高一美元多——借以鼓励国内勘测和钻探。一九五九年艾森豪威尔总统建立了控制石油进口的制度，对进口限额有严格规定。

因此，美国对世界石油价格具有决定性影响。如果外国石油涨价超过我们认为适当的程度，我们可以增加产量，限制进口，迫

^{*} 当石油价格为三美元一桶时，人们认为页岩油五美元一桶就算经济合理的了。但是在这个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它一直超过世界石油价格。

使我们的外国供应者到世界市场上去找买主。如果我们真想坚持自己的意见，还可以生产更多的美国石油，拿到国外去卖，从而促使中东石油生产国保持低廉的价格。我们并没有把一九六〇年建立的石油输出国组织*看成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卡特尔组织。按照通常的看法，石油生产国无法用限制产量的办法硬性抬高价格，因为他们要这么做就必须使产量猛然下降，以致在工业民主国家受到影响之前这些生产国自己就会破产。一九六七年阿拉伯石油禁运惨遭失败似乎就是证明。那次禁运是由于伊朗继续生产、美国提高产量以及西半球其他国家保持生产而垮台的。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五日尼克松建立了一个负责控制石油进口的内阁特别小组，来重新审查限额制度。当时他最想不到的是会出现能源危机。特别小组由劳工部长乔治·P·舒尔茨主持，成员包括国务卿、国防部长、财政部长、内务部长、商务部长、紧急战备局局长，还有其他官员列席。白宫方面由总统助理、财政专家彼得·M·弗拉尼根负责。我的办公室没有承担具体任务，最多只是看看简报，注意是否可能出现任何有关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当时认为出现这种问题是不大可能的。

特别小组讨论了一年，听取的证词长达一万页。一九七〇年二月，它提出一份长达四百页的报告，主要建议用关税制度取代进口限额。外国生产者只要交纳关税就可以在我国的市场上自由竞争。通过市场的作用，这种制度可以施加一些压力，使国内石油价格有所降低；政府也可以摆脱分配进口限额的工作。在进口过多时，随时都可以提高关税。当时认为进口的数量基本上是由美国

* 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成员是：沙特阿拉伯、伊拉克、科威特、伊朗、委内瑞拉、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卡塔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尼日利亚、加蓬、印度尼西亚和厄瓜多尔。（这个组织成立时只有前面五个成员国。其他国家是后来陆续参加的。——译者）

国内决定的，而我们在这方面有很大的伸缩余地。

报告估计，即使按照当时的价格，到一九八〇年美国需要的石油也只有百分之二十七依靠进口，而且预计世界价格在未来十年中不会上涨很多。^①这说明一九七〇年国家的决策是多么不切实际。（事实上，到七十年代后期，我们的石油将近一半是进口的，世界价格则增加了十倍以上。）特别小组对国家安全的考虑只是要求继续对西半球生产的石油给予优惠待遇，以便把我们依赖中东供应的石油数量限制在我们全部进口的百分之十。（到一九七九年，事实上已经超过百分之四十。）

我们政府中负责制订石油政策的一些国内机构反对增加外来竞争。内务部长、商务部长和联邦动力委员会主席提出一份代表少数意见的报告，认为特别小组建议的关税制度会迫使国内石油价格降低到每桶二点五美元左右，不足以刺激国内生产，因此会在十年内造成一种不适当地依赖进口石油的局面。（少数派报告还否定了保持紧急储备的想法，认为这种想法“从经济上说是没有意义的”。）后来，尼克松——出于政治考虑——支持了少数派，保持了石油进口限额制度，从而选择了减少进口、略微提高价格的道路。经过某些调整的限额制度继续实行了三年。当时人们还不断辩论。现在看来，这些辩论已经像恐龙一样过时了。

我的办公室没有参加辩论。关键性决定既没有同我们商量，甚至也没有通知我们。我并不是说，如果有我参加，这些决定就会比较高明；我对这个问题缺乏专门知识。我谈到这个事实只是为了说明人们在多大程度上把能源看成只是国内问题而不是外交问题。尼克松政府最初几年围绕石油问题进行的外交政策争论仅涉及在美国进口最高限额之内的分配问题。当时，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成员国玩弄各种手段想在我们的市场上取得优惠地位；处于祈求地位的是生产国，而不是消费国。我们同伊朗的关系是一个恰

当的例证。后来,有的时候有人说我们想要增加伊朗国王的收入,使他可以购买更多重武器,认为这种考虑影响了尼克松政府对伊朗国王的政策。事实完全相反。伊朗国王多年来抱怨我们对伊朗石油买得不够。一九六九年三月他到华盛顿来参加艾森豪威尔总统的葬礼时,我曾去伊朗大使馆对他进行礼节性拜会。他乘机表示愿意帮助我们建立石油储备,使我们采完盐矿留下的矿穴里装满石油,以免在发生大战时石油供应中断。为此目的,他愿以每桶一美元的惊人低廉的价格每天卖给我们一百万桶石油,一连卖十年。

我把伊朗国王的建议转给了美国政府的石油专家。他们立即拒绝了这个建议。只有减少沙特阿拉伯和波斯湾其他友好国家的限额才可能增加伊朗的限额。还有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是:美国政府除满足军事需要外是不购买石油的,而军事需要中很大一部分来自沙特阿拉伯。其余石油均由私营公司承购;政府必须进行强有力的干预才能使他们改变传统供应来源。这些公司必须减少从其他方面进货才能满足伊朗国王的要求——除非我们准备用提高进口总额的办法来增加从伊朗的进口,从而冒降低石油价格的风险。我被选派去把这个坏消息转达给伊朗国王陛下。(后来在石油价格猛涨、需求似乎无限制地增加时,以不受宗教影响的统治者著称的伊朗国王一定会感谢苍天使我们拒绝了对我们如此惊人地有利的安排。)

一九六九年十月,伊朗国王再次来到美国,这次是进行正式访问。他直接同尼克松讨论了美国购买石油问题。伊朗国王认为他的发展计划还缺一亿五千五百万美元——石油生产国现在会认为这个数目小得不值一提。尼克松答应尽力增加购自伊朗的石油。这件事唯一的作用是给尼克松上了一课,使他懂得美国总统对石油进口配额的影响是多么微不足道。虽然进口限额是美国政府确

定的，到什么地方去购买和生产等基本问题却取决于七家最大的石油公司——所谓石油巨头——组成的财团。限额规定了最高数量，但不要求真正达到这个数量；具体交易要由每个国家同这些巨头进行。

这些公司在各生产国按照特许权进行活动。它们拥有生产设施和炼油厂，并根据协议每桶石油向所在国交付一定数额的款项。价格、产量和销售等基本问题都由石油巨头而不是各国政府决定。它们为五十年代后期发现石油的利比亚在市场寻找新的立足地已伤透了脑筋，如果增加伊朗的份额就会使问题更加复杂。^{*}石油财团的美国成员收到尼克松的要求时都拒绝合作，甚至把国防部一部分采购转给伊朗也不干，因为美国在伊朗石油产量中占的份额远远低于在沙特阿拉伯等国产量中的份额。弗拉尼根在一九七〇年一月十日给我的备忘录中指出：“如果买伊朗石油，由此而来的利润很大一部分将流入非美国公司的腰包。”一九七〇年七月三十日——即答应在采购石油方面给予帮助的九个月以后——尼克松不得不写信给伊朗国王，实际上表示他无法履行诺言。

在出现巨大动荡之前人们的认识可以错误到何等程度，下列事实是最好的证明。各工业民主国家、各个公司和生产国都被令人眼花缭乱的假象蒙住了眼睛。他们以为美国生产能力过剩，担心石油充斥市场会使价格大幅度下降，只看到各生产国表面上急于增加产量，以为任何时候总会有个别生产国愿意牺牲其他生产国的利益，削减价格，从而增加自己的收入——这些想法都同逐渐

* 关于他们进退两难的处境，一位美国学者是这样描写的：

随着利比亚产量不断增加，石油巨头越来越担心波斯湾国家是否会容忍对他们的产量和收入进行相应的、必要的削减。由于石油巨头在中东的产量大约等于他们在利比亚的产量的二十倍，他们在中东可能遭受的损失远远超过他们在利比亚可能得到的任何好处。但是，如果他们停止在利比亚生产，利比亚很可能把授予他们的特许权转给独立经营者，而这些经营者只会增加不受控制的石油产量……^②

显示出来的现实完全背道而驰。由于各石油公司在超过一代人的时间里曾经有效地控制了一切有关价格和销售的决策，由于美国政府对表面上效率很高而且符合我们长远利益的市场经营状况有一种习惯性的不愿干预的情绪，人们暂时还看不清这种现实的全部影响。

临近的风暴：一九七〇年至一九七三年

在新的十年开始时，所有这一切都开始发生变化。世界供求状况出现了无情的、不利于消费国的转变。需求增加了，其中美国的需求增加得最多。我们很快就不再拥有过剩的生产能力。一九七二年初，得克萨斯铁路委员会破天荒第一次取消了对美国产量的全部限制；同年年底，美国已开足马力生产——已经不再有根据需要自行决定增产的余地。这是事态发展的一个重大转折。当全球经济长达三十年的、几乎毫不间断的繁荣趋于结束时，国内的需求和全世界的需求还在继续增加。对于美国来说，进口石油已经不是为了方便，而是出于必需；进口在美国石油消费量中占的比重一九四七年仅为百分之八点一；一九七三年则为百分之三十六点一。^③ 我们已经无法用进一步促进国内生产的办法来抑制世界价格，甚至无法保护自己不受切断供应的威胁，因此我们很快就丧失了影响局势的能力。左右能源形势的力量正在从得克萨斯湾向波斯湾转移。参加石油输出国组织的生产国正在取得驾驭局势的地位。它们利用这种地位只是时间问题。

变化的程度当时还不明显，因为价格暂时还是通过私营石油公司和所在国谈判确定的，人们仍然存在幻想，似乎眼前出现的只是商业性的讨价还价，而不是一种革命性的变化。此外，当时各种症状（七十年代初期价格上涨的幅度）都极为轻微，似乎根本不涉

及国内经济政策问题——更不用说国家安全问题了。

一九六九年九月，利比亚思想激进的穆阿迈尔·卡扎菲上校推翻了亲西方的伊德里斯国王。这是造成变化的近因。（必须强调指出：价格爆炸并不是个人的决定；市场状况迟早总是会引起爆炸的。）在那以前，在石油生产国当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一些基本上属于保守派的政府。他们依靠工业民主国家的保护来对付外来（甚至还有内部的）威胁。这种依赖对他们增加石油收入的兴趣起了制约作用。卡扎菲则不受这种约束。作为一个旗帜鲜明的激进派，他致力于根绝西方影响，根本不在乎这样做是否会削弱全球的经济。我们政府的工作机构、特别是国务院搞实际工作的人有一种浪漫的想法，似乎第三世界的激进主义实际上是西方自由主义受到挫折后的表现。他们认为第三世界的领导人之所以成为极端分子是因为西方支持保守政权，因为我们不理解他们要求改革的愿望，因为他们的社会处于落后状态并急于变革^④——事实上，各种原因都考虑了，就是没想到最可能的原因：他们在思想意识上逐步接受了坚决反对西方的理论。

由于前面已经解释过的原因，我在尼克松第一届任期内并没有在中东政策方面提出什么创议。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曾经断断续续讨论过如何对待利比亚新政权的问题。在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的一次会议上，我曾提出是否让“四十号”委员会研究采取秘密行动的可能性。当时准备了一份研究报告，说明可以在哪些方面对利比亚施加经济和政治压力。但是各个单位对此并不热心。一切要求采取行动的方案都遭到拒绝，使我不得不大声叫嚷，指出我不愿向总统提交一份只能说明我们无计可施的文件。尽管我不乐意，我并不能改变大家完全按照他们所说的那些方针达成的一致意见。根据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看法，我们反对卡扎菲，就有使人们激进化的真正危险。他们认为卡扎菲要求我们撤出的巨大

的惠勒斯空军基地并没有多大意义，认为我们必须分别对待石油利益和军事问题才最有助于保护这些利益。各部门联合为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会议准备的文件认为，只有在我们采取敌视利比亚新的革命政权的某种行动时才会危及能源供应：

我们认为这些(石油)利益目前并未受到威胁，虽然在该政权受到威胁或日益不稳的情况下，在惠勒斯基地问题引起真正对抗或中东重新爆发敌对行动的情况下，可能会造成威胁。

根据官僚机构的一致意见，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唯一的办法是努力同卡扎菲搞好关系：

我们现在的战略是努力同新政权建立令人满意的关系。我们的主要兴趣在于恢复收支平衡和保证美国石油投资的安全。我们要设法保住我们的军事设施，但不能以危害我们的经济收益为代价。我们还希望保护依赖利比亚石油的欧洲；从质量和地理位置来看，利比亚石油是世界上唯一名副其实地“不可取代的”石油。

当美国决定消极等待时，西欧采取了积极讨好利比亚激进统治者的态度。当然，欧洲已使自己远比美国更为依赖进口石油，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利比亚石油。一九五〇年，煤炭满足了欧洲四分之三的能源需要。到一九七〇年，由于相信永远会有廉价而充分的石油供应，再加上政府鼓励，他们转而从石油满足百分之六十的能源需要，而几乎全部石油都靠进口。而且欧洲所需能源的百分之二十五都来自利比亚。结果，卡扎菲上台不到四个月，法国就通过谈判向利比亚出售了一百架先进的喷气式飞机。为了减轻自己良心的痛苦，它使利比亚作出一个本来就很荒谬、而且无法履行

的诺言，即不得把这些飞机转让给同以色列接壤的国家。由于利比亚缺乏训练有素的喷气式飞机驾驶员，它购买飞机的唯一可能的目的就是以某种方式使它的阿拉伯兄弟国家获得这些飞机。其他欧洲国家也采取了同样的安抚政策；利比亚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也建立了特别友好的关系。

就像经常出现的情况一样，当时看来是慎重而克制的决定在后人眼里却显得鲁莽而轻率。西方出于短期经济考虑接受了卡扎菲的革命——后来证明，这必然会影响西方同保守的石油生产国的政治关系。利比亚使这些统治者得到一个严重教训：工业民主国家不会保护对他们友好的政府，只要继这些政府上台的、持公开敌对态度的激进派不对民主国家的石油供应提出挑战就行。因此，在石油价格方面保持克制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购买西方的善意是毫无意义的。这种看法在开始一两年还没有机会付诸实践。但是随着市场条件的变化，它甚至对温和派政府的态度也产生了微妙的影响。

正如市场条件正在改变经济均势一样，政治均势也出现了变化。从激进的利比亚开始，各东道国政府逐渐发现他们拥有左右世界石油市场的力量，并开始运用这种力量。即将发生的革命有三个明显阶段：第一，价格缓慢上涨；其次，东道国政府事实上逐步接收了石油公司的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最后，生产国政府从而获得了使石油销售同政治条件、特别是同阿以冲突联系起来的能力。

一九七〇年初，利比亚要求在它的土地上开采石油的公司为它提供更多的收入。它有一个特别有利的讨价还价条件，就是石油巨头不能像控制波斯湾石油一样控制利比亚的生产。由于利比亚进入石油生产国的行列较晚，而石油巨头又不乐意抛开传统供应国转而购买利比亚石油，因此各“独立公司”在利比亚拥有特别

突出的地位。它们远比那些较大的竞争者更容易受到伤害。它们不能用增加波斯湾生产的办法来代替利比亚石油产量的削减，也无法抗拒利比亚关闭它们的设施的威胁。一九七〇年一月二十九日，利比亚政府要求给每桶利比亚石油提价四十美分——即百分之二十，从而使情况严重起来。虽然同以后的石油提价比较，这次提价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在石油谈判史上它却是幅度最大的一次提价。石油公司一开始还抗拒，结果利比亚人就采取了空前的恐吓手段。

利比亚挑选链条中最薄弱的一环——独立经营的西方石油公司——作为进攻目标，迫使这家公司对产量进行比它的竞争者更急骤的削减。一九七〇年六月十二日，西方石油公司的日产量从八十万桶降到五十万桶，八月十九日又降到四十四万桶，共减少百分之四十五。这是石油生产国第一次实行性质等于禁运的措施。石油巨头则显示了自己目光的短浅，让一个碍事的竞争对手——用后来流行的话来说——慢慢地被绞死。他们拒绝采取任何支援措施来弥补西方石油公司因减产遭受的损失。一九七〇年九月四日，处于孤立无援、风雨飘摇境地的西方石油公司终于屈服于利比亚的讹诈，同意每桶石油立即提价三十美分，并于五年内使提价幅度达到四十美分。其他公司很快也照办了。^⑤

当时这些解决办法的经济影响还不像它们的政治含义那么重要。石油公司过去是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讨价还价的，因此可以硬性规定统一的价格。现在他们的统一战线已经陷于分裂，已经不能在生产国和消费国之间起缓冲作用了。结果地中海供应国和波斯湾供应国之间出现了一种“蛙跳”制度。利比亚认为本国石油比波斯湾石油运价低、质量好，而且它是在同独立的公司打交道，因此可以规定较高的价格。波斯湾生产国则不接受这种理论，让一个竞争者获得更多收入，因此坚持要相应增加自己的收入。他们一

一旦成功，利比亚就会以差额消失为借口提出新的要求，从而使波斯湾国家也提出额外要求，如此循环往复，实际上永无宁日。已经存在了一代之久的国际石油市场结构正在走向崩溃。

这是一个明显的警告，说明出了某种毛病。但是当时人们没有这么看。提价的比例虽然很大，起点却很低。每桶石油价格还不到三美元，仍然低于美国国内价格。提价似乎并没有影响作为工业民主国家经济基础的廉价而充分的石油供应这个根本前提。因此西方政府对生产国政府和石油公司之间蛙跳式的谈判仍采取置身事外的态度。一九七〇年十月三日，尼克松在访问欧洲的过程中到达契克斯。英国外交大臣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爵士告诉威廉·罗杰斯国务卿：英国已经通知它在利比亚的公司，要他们按照“自己商业上的判断”行事——换句话说，既然不涉及安全利益，这些公司得自己想办法。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石油输出国组织在加拉加斯开会。它们仿照利比亚的先例，正式要求石油巨头和全体石油输出国进行新的价格谈判。产油国实际上已开始全面控制本国的石油。各石油公司则动手太晚。一九七一年一月，它们达成了四个月前未能达成的协议：集体参加谈判，用分享石油的办法抵制有选择的讹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了防止蛙跳战术，他们还要求石油输出国组织作为一个整体参加谈判。后来，石油输出国组织不但接受了这个建议，还组成了一个卓有成效的卡特尔。几乎同它的所有成员国的历史实践相反，它愿意削减生产。

在石油公司的敦促下，美国政府终于开始对此感到兴趣。按照长期的传统，这些公司只是在最后一分钟、就某一特定问题——而不是作为一种长远的战略——要求政府帮助，因为他们担心导致政府的控制。他们要求并得到了司法部的特许，使他们可以组成统一战线而不会被认为违犯了反托拉斯法。在这些公司的迫切要

求下，副国务卿约翰·N·欧文第二奉命于一九七一年一月十六日前往中东去呼吁产油国采取温和态度。

不幸的是，我国政府自己也不清楚它所说的“温和态度”是什么意思。为了按照石油输出国组织为新的谈判规定的限期办事这种技术上的需要，人们忽视了进行更根本的研究的必要性。一月十四日，我的工作班子里两位能干的成员、负责收集瞬息万变的公司谈判消息的C·弗雷德·伯格斯顿和哈罗德·桑德斯建议我们比较认真地研究一下美国政府参与此事的利弊。他们提出了几条赞成不参与产油国和石油公司之间的争执的理由：能源提价主要影响欧洲和日本，而且很可能改善美国的竞争地位；如果坚持对抗，我们就得准备在国内实行石油配给以支持欧洲经济——在经受越南问题折磨的国家，这可是一个困难任务；为了改善自己同产油国讨价还价的地位，石油公司可能对政府施加压力，要政府干预阿以冲突，这又会同我们想要证明苏联影响有限的战略发生矛盾。他们还指出：对抗可能削弱美国同阿拉伯世界的关系。

我的工作人员也提出了赞成政府更深入地参与其事的理由，其中一条并非毫不重要的理由是：需要防止产油国循环往复地不断加码，以致逐渐影响到政治领域。供应也有中断的危险。这将严重影响我们盟国的安全和我们自己的安全。虽然我倾向于使政府更积极地发挥作用的想法，最后还是认为自己无权提出建议，因此采取了当官的人惯于采取的下台阶的办法：一九七一年一月十五日，我下令就这个问题对国家安全的影响进行研究。

早在这项研究真正着手进行以前，主张不参与的看法已经占了上风。这是符合早已确定的国家政策的。美国政府一般不卷入商业争执。我们只有在没收美国公司而不给予合理补偿的情况下才插手进行抵抗；就我所知，在这以前我们从来没有参加过价格谈判。

一月十八日，欧文还在中东，我给尼克松送去一份（在伯格斯顿和桑德斯协助下起草的）备忘录，概括了石油输出国组织和石油公司进行谈判的情况。我指出：如果我们打算鼓励各公司勇敢地面对产油国，就必须回答六个问题：

各公司是否能保持团结并顶住利比亚的要求？……利比亚是否会坚持极端要求？如果这些要求得不到满足，它是否会停止石油生产？……那时其他阿拉伯国家是否会坚决同利比亚站在一起、也停止本国的生产？……欧洲各国政府是否会被石油短缺的可能性搞得惊惶失措，从而企图绕过石油公司而同利比亚进行政府间的交易？……欧洲人是否会联合起来，坚决抗拒阿拉伯人？……我们那时是否愿意在国内实行石油配给制度，以便帮助欧洲人顶住阿拉伯人，而且（或者）准备对以色列施加新的压力、对阿拉伯人实行政治赎买？

最后，我在备忘录中提出警告：“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的全部活动完全是策略性的、被动的。因此我已要求就我们在这种局势中追求的基本目标迅速进行研究，并对我们在试图帮助解决问题时应起什么作用作出分析。”

在这些问题能够得到回答、这种研究能够完成以前，谈判已经按照自己的规律展开了。欧文是在尼克松同威廉·罗杰斯国务卿谈话后奉命出发的。我没有参加这次谈话，不知道他是否得到了任何具体指示；很可能只有一般性的指示。在没有得到强行摊牌的政治指示的情况下，美国谈判代表的第一个本能的反应就是让谈判对手对我们的意图感到放心。他们的理论是：表现善意会改善总的气氛。毫不奇怪，欧文于一月二十五日自豪地向总统报告说，在他访问的三个国家（伊朗、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他强调我们将奉行不卷入商务谈判细节的传统方针——干净利落地消除了唯一可能使产油国缓和与自己要求的一种担心，即美国政府可能进行干预。如果我们决心避免对抗，如果我国政府不愿卷入细节的

讨论，结果即已注定：石油公司必须让步。

在这种情况下，各国领导人在接待欧文时就反守为攻了。他们争论说，坚持石油输出国组织全体参加谈判是石油公司耍的花招，目的是在产油国当中挑拨离间。同前一个时期的全部经验相反，他们认为由波斯湾产油国和地中海产油国分别进行谈判是促使各国采取温和态度的最有效的途径。他们说，波斯湾产油国希望单独谈判，因为他们如果和利比亚人共同组织代表团，卡扎菲就会否决他们的建议。他们（完全正确地）指出：五年来石油的实际价格——即减去通货膨胀因素以后的价格——已经下跌，而他们进口货物的费用却上涨了。

属于石油输出国组织的任何集团参加谈判，都要把石油涨价的责任推卸给别人——这种谈判策略经过十年精雕细刻已经变成一种艺术。沙特阿拉伯通过各种精心构思的理论把整个责任都推到伊朗国王身上，伊朗也用一套同样复杂的理由证明是阿拉伯湾产油国、特别是沙特阿拉伯在推动涨价。人们不禁奇怪，怎么可能有这样的领导人，他们的行动造成的结果居然同他们公开声明的愿望如此背道而驰。当然，事实是全体产油国都赞成提高价格；谁也不准备拆散这个卡特尔。他们实际上全都支持这样一种战略，其唯一后果是使价格连续十年急骤上涨。

欧文的结论是：各石油公司必须自行设法争取尽可能好的条件。他在给总统的报告中说：

他们（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成员国）强调说，他们准备在谈判中同石油公司对抗，甚至不惜削减或停止生产。因此，尽管我认为这次访问赢得了一点点时间，使三国政府获得他们过去所没有的某种看问题的观点，我对他们最后将采取什么行动并不乐观，除非各个公司的谈判代表能使产油国相信，他们是在石油输出国组织加拉加斯决议规定的条件和时间范围内认真地进行谈判。

我们的不干涉政策决定了他们的命运；石油公司屈服了。他

们同意“分别”但是“同时”进行谈判——这是同意产油国蛙跳战术的一种漂亮说法。结果产生了一九七一年二月十四日的德黑兰协定和四月二日的黎波里协定。前者等于把每桶波斯湾石油价格提高约四十美分，后者则把利比亚石油价格象预料那样提得更高。两个产油国集团都同意使价格维持五年不变——这个庄严的诺言在遭到破坏的规模和速度方面一定创造了世界纪录。

有几个月，石油市场似乎恢复了稳定。一九七一年五月费萨尔国王访问华盛顿时，似乎不曾提到石油问题。中东石油涨价对工业民主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经济还没有产生任何严重影响。因此，当尼克松一九七一年六月四日向国会提出咨文、要求增加代用能源时，他是本能地感到了即将出现的问题，并试图影响事态的发展。尼克松在口头介绍情况时自豪地强调说：“总统致国会的咨文全面论述能源问题，这还是第一次。”这份咨文是主管国内事务的机构准备的，与我无关。当时不存在任何紧迫感，更没有感到会出现国际危机。人们仍然认为石油供应长期中断是不可思议的，认为尼克松的方案是要解决一个属于比较遥远的未来的问题。

石油输出国组织各国政府取得控制权

所谓未来，事实上已经到来。石油输出国组织重新提出争论的速度和顽强性都着重说明双方讨价还价的地位已经发生根本变化。原应使价格稳定五年的一九七一年二月和四月的协定签字后不过数月，石油输出国组织同年九月在贝鲁特开会时又提出了新的要求。会议并没有直接要求涨价，但是要求补偿夏天美元贬值造成的损失。结果油价又提高近百分之九，可能还要按季度进行调整。更重要的是，石油输出国组织还要在石油公司中“参加股份”——等于要求逐步实行国有化，其实际效果当然是进一步增加

东道国的收入。石油公司如果不提高价格，就得承担由于政府拥有部分所有权给公司收入带来的损失。

一九七二年三月，各公司和以沙特阿拉伯的舍赫·艾哈迈德·扎基·亚马尼为首的石油输出国组织谈判小组开始就“参加”问题进行谈判。^{*}输出国起初要求百分之二十的股权，各公司在沙特阿拉伯沉重的压力下同意了这个要求。但是条件立刻又提高了。沙特阿拉伯人接受百分之二十作为起点，但是（和激进国家一样、或许还是在这些国家的推动下）要求在一定时间以后使股权达到百分之五十一。如此迅速的国有化将使各大石油公司降为销售和管理机构；在这种情况下，石油价格将由产油国政府决定而不再需要谈判。

股权谈判很快就走上了价格谈判的老路。开始让步的结果不是导致协议，而是导致更高的要求。从市场情况看，产油国似乎可以无止境地进行勒索。

一九七二年夏天，亚马尼和石油公司之间的谈判在输出国组织要采取单方面行动的威胁声中，由于向公司提供财政补偿问题而陷入僵局。沙特阿拉伯人第一次感到自己的地位强大得足以用费萨尔和尼克松的友谊为由要求美国政府直接进行干预来反对石油公司。这些公司也向白宫发出呼吁，指出在发生没收财产而无适当补偿的情况时，按照既定原则政府应给予帮助。事实上，沙特阿拉伯提出的补偿建议严重低估了财产的价值。

一九七二年八月初，当时担任沙特阿拉伯石油副大臣的沙特·费萨尔亲王碰巧正在华盛顿访问。我没有参加谈判，但是在各个公司的请求下同他进行了一次长谈（弗拉尼根和国务院高级

* 石油输出国组织方面实际上就是沙特阿拉伯和较小的海湾国家。伊朗自称本国石油工业结构不适合当时讨论的入股方案，没有参加；利比亚自行其是；伊拉克和阿尔及利亚也是如此，只是程度不同。

官员也分别同他长谈过)。我更关心的是接管原则而不是补偿水平。沙特阿拉伯人的要求有使美国公司成为外国工具、使每次分歧都上升为政府间对抗的危险。我同沙特谈话的方针是：虽然我们的政策是不干预私营公司的谈判，但是在目前情况下，提出的补偿水平之低和股权要求之高使人感到有点没收财产的味道。我们同沙特阿拉伯的关系并不是建立在单纯商业考虑的基础上的。但如果在经济问题上逼得我们走投无路，也会影响政治关系。

沙特是一个十分精明的人，他毕恭毕敬地、满怀同情地听取了我的意见。他说：沙特阿拉伯不想同美国发生冲突。它将尽力争取公平合理的解决，在补偿问题上毫无成见，也有兴趣听取我们对股权问题的看法。如果在这两个问题上我能谈谈美国政府认为公平的条件，使他们有所遵循，沙特阿拉伯人将表示感谢。

我以为我们已经快要达成妥协了。但是当我把沙特的反应报告石油公司时，一件意外的事却等待着我。这些公司很想利用美国政府来施加一般的压力，但是不愿我们代表他们进行谈判。他们拒绝让我向生产国转达得到政府同意的有关公平补偿和股权的建议。他们对增加补偿的兴趣显然大大超过他们对减少沙特阿拉伯股权的兴趣。补偿会反映在帐面上；而减少沙特阿拉伯股权，照他们看来，只是推迟已经注定的命运。他们有过欧文出使的经验，或许现在还心有余悸。起初对他们有利的政府压力到一定时候说不定会转而有利于对方——他们对此毫无把握。

结果，在后来几个月当中，沙特阿拉伯在补偿问题上倒是很乐于帮忙。石油公司则同意沙特阿拉伯分享股权——从百分之二十五开始，一九八二年增加到百分之五十一。美国政府这次调停增加了石油公司的短期财政收入。但是各个公司——至少从国家观点来看，我认为是目光短浅地——在后来证明是带关键性的问题上做了让步。当产油国拥有百分之五十一的股权时，石油公司将

成为同我们自己的利益不一定并行不悖的某些国家的工具。

在供应充分、成本较低条件下，这些公司曾经卓有成效地完成了勘探、发展技术和销售的任务，在几代人的时间里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了燃料。但是他们的组织机构和经营思想完全不能适应日益昂贵、其价格和产量都由各国政府组成的卡特尔控制的石油带来的问题。石油公司唯恐同产油国发生对抗，因为他们——从他们的观点看是完全正确地——相信他们在任何摊牌中可能得到的好处都会使他们相应地失去产油国的善意。他们善于同这个地区的各个国家搞好关系，对遭受围困缺乏感情上的准备。石油的供应和价格不再需要同石油公司谈判、而由产油国政府单方面决定的日子正在迅速到来。

但是原有的各种成见是不易消失的。一九七二年五月尼克松访问伊朗时，美国的态度就反映了这种情况。当时人们提出的建议是要维护现行政策，根本不是设法使伊朗成为一个可供选择的主要供应来源，以便防止石油输出国组织的阿拉伯成员国提出过分要求。彼得·弗拉尼根在给总统的备忘录中保持了正统的观点。从我为尼克松做的摘要来看，备忘录要求：

你（指尼克松——译者）在德黑兰举行会谈时不要鼓励伊朗国王为伊朗石油寻求美国市场。他（弗拉尼根）的论点是：提供市场会给我们同波斯湾其他国家以及委内瑞拉的关系带来极大的困难，使安排指令性石油进口计划这个已经很困难的任务无法完成。

在向尼克松转达弗拉尼根的看法时，我指出，就短期效果而言我同意他的看法，但是使我感到关切的是长远问题，即如何使我国的进口计划不那么依赖有可能对我们抱敌视态度的供应国。我说：

但是，这种情况使我思想上产生了一个带普遍意义的问题：在未来十年

中，随着我国对进口能源的需要的增长，我们应当按照什么标准来确定从哪些国家进口石油和其他能源产品。举例来说，我们可以建立这样的标准，使我们能够选择友好国家并从他们那里进口能源，而不从那些不那么友好的国家进口。

尼克松没有理睬我的分析。他和伊朗国王几乎没有讨论石油问题。国王发表了简短的、富有先见之明的意见：由于工业国家越来越依靠进口来满足他们的能源需要，中东的战略地位也日益重要。但是两国领导人没有探讨他们的理论会造成什么实际后果。

尼克松访问后，隔了几个星期，伊朗国王就采取行动，把他日益有利的谈判地位化为逐步增多的收入。前面已经谈到，伊朗由于石油工业结构不同于波斯湾的阿拉伯国家，所以没有参加股权谈判。现在他却坚持他两年前提出的建议。他强迫石油财团采取各种措施，既要提高伊朗石油产量、增加伊朗总的石油收入，又要使伊朗能够更多地直接参加石油的经营。作为报偿，他准备把石油公司在伊朗的经营期限从一九七九年再延长十五年。我国政府还没有充分研究产油国的蛙跳战术，以为可以孤立地看待这个协议。因此，在有关机构建议下，尼克松给伊朗国王发了一份电报，对他保持克制表示祝贺。

这份电报发得太早。石油谈判似乎注定是永远无法保持平静的。在石油公司同意让出百分之五十一的股权以后不久，沙特阿拉伯就开始把它的石油政策明确地同解决阿以冲突问题的进程联系起来。伊朗国王在获悉沙特阿拉伯获得多少股权之后，立刻改变了主意，不想履行他前不久建议的十五年协议。他认为自己在国内的地位不容许他在谈判方面落后于亚马尼。一九七三年初，他重新提出要求，实际上抛弃了一九七二年达成的协议。他的方案使石油输出国组织参加谈判的寓义暴露无遗。它实际上是坚持

要把石油公司变成伊朗的经销商。这个方案对石油价格的影响当时还微不足道，但同亚马尼的方案一样包含着一场革命，即让输出国政府单方面决定价格。

到一九七二年下半年，价格和股权谈判的情况使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从长远来看，进口石油猛增会使美国处于易受伤害的地位。国会山举行了听证会，美国政府也建立了形形色色的考虑能源问题的委员会。一九七三年初，尼克松要求（即将离开政坛的）约翰·埃利希曼同乔治·舒尔茨和我研究能源政策同外交问题以及安全问题的关系。研究还没有完成，事态的发展就提供了答案。

产油国不断升级的要求使我日益警觉起来。我认为单靠美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同其他消费国合作。一九七三年一月十六日，我同英国内阁秘书伯克·特伦德爵士谈到这种想法：

我认为石油供应是有可能中断的。如果消费国仍然像现在这样处于分裂状态，则肯定会中断。我们应当讨论如何全面看待能源问题……首先要明确我们希望达到的目标；需要什么，来源何在，以及如何防止产油国在消费国之间制造矛盾。这件事应当怎么办？是为某些国家寻找其他供应来源还是采取统一的态势，或者二者并行？

三月八日，我通知各个单位：总统“指示要就世界能源供应和分配对国家安全的影响问题进行研究”。一九七三年四月十八日，尼克松向国会提出了一项重要的能源建议，要求节约能源、增加国内生产并改组政府，以便对付这个问题。它要求用一种比较简单的许可证制度（进口许可证收费高于一九七三年水平）代替限额制度，但决定不实行定量分配。咨文坦率地承认，在采用这些办法的同时，“我们还必须增加燃料的进口”。六月二十九日，尼克松又提出了一份能源咨文，其中包括进一步改组等措施。科罗拉多州州长

约翰·A·洛夫被任命为经过扩充的总统直属机构能源政策局的主任。

四月十九日，我在给伯克·特伦德的信中列举了美国所作的努力，再次呼吁消费国合作。我说：

如果所有石油消费国都想坐视其他国家失败，以便乘机增加自己的储备，迟早就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使工业国家一切现存体系遭到破坏。我们需要想办法合作，避免这种危险。我们是准备合作的。

四月二十三日，我在欧洲年讲话中敦促工业民主国家对日益严重的能源问题做出一致的反应。后来在夏天举行的一次讨论对利比亚的政策跨部门会议上，我再次强调了消费国合作的必要性：

我知道有一种神话，认为任何消费国合作都会导致同产油国对抗。这是一种习惯说法；我们应当考虑它是否真正符合实际。

还有一派意见认为消费国团结并非迫切问题，认为石油问题基本上是我们同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双边问题，因此我们应当加强我们同沙特阿拉伯王国的政治关系和防务纽带。国防部副部长威廉·克莱门茨敦促我们加强防务合作；（即将被提名为联邦能源局局长的）财政部副部长威廉·西蒙则要求我们同沙特阿拉伯建立经济上的伙伴关系。越来越多的专家争辩说，我们对以色列的态度将严重影响沙特阿拉伯的石油生产水平。^⑥

我很赞成扩大我们同沙特阿拉伯的双边关系；那一年，我们已经朝着克莱门茨和西蒙鼓吹的方向取得重大进展。至于使石油政策和阿以冲突挂钩问题，我认为这样做对我们来说是不明智的，对

沙特阿拉伯来说则是危险的。如果沙特阿拉伯王国不得不为阿以谈判承担责任,它已经很微妙的地位就会更加复杂化,就有同阿拉伯激进派发生对抗的危险。另一方面,如果它支持激进派,就有同我们发生冲突、并且证明它无法取得进展的危险。因为在总统的地位已经削弱的情况下,我们即使愿意也不可能像人们通常说的那样“满足沙特阿拉伯人的一切需要”。

这些策略上的分歧迅即落后于事态的发展。三年来,产油国已经利用消费国的软弱和犹豫不决建立了一种新的基本体系。消费国政府、特别是美国由于迷信自由市场的神话而拒绝参加谈判,使石油公司处于毫无防御的地位。政治要求同经济纠缠在一起。当西半球生产的石油已无法取代来自阿拉伯世界的进口石油时,石油输出国组织中断生产的威胁突然成为一件关键性武器。十月战争为这一体系筑了一座凯旋门。令人惊讶的是:直到战争爆发,人们还没有充分领悟这件事的含义。即使领悟到了,结果很可能也是一样,我们可能还是不团结,还是下不了决心,以致无法坚持地缘政治要求我们采取的方针。

十月战争和能源问题:第一次石油冲击

战争开始时,美国政府内部曾经隐隐约约地谈到石油禁运的可能性。一九六七年的经验记忆犹新,因此几乎没有什么人认为禁运会造成任何长期影响。但是早在十月六日上午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助理国务卿帮办罗伊·艾瑟顿就预料会出现禁运,副国务卿肯尼思·拉什也曾为我们缺乏对付禁运的应急计划感到忧虑。因此,从那天晚上开始,我在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举行的每一次会议上都要求制订应急计划,但我自己也不清楚究竟要搞个什么样的计划。比尔·西蒙、洛夫州长和(总统能

源顾问) 查尔斯·迪博纳都很帮忙。但事态发展的速度超过了我们制订计划的能力。我们曾经讨论汽油配给问题, 可是各部门都认为时机还不成熟。我鼓吹建立消费国共同阵线, 包括制订应急计划, 以便在出现禁运时分享石油。而我们所有的盟国甚至连讨论这种计划也不愿意。

到十月十一日法国外交部长米歇尔·若贝尔首次拜会我这位新任国务卿时, 情况就明朗了。若贝尔警告说, 产油国即将把石油价格提高一倍。我们愿意接受吗? 当然无法接受, 但是美国单独抵抗是不起作用的, 而若贝尔又反对消费国团结。我对若贝尔说: 价格上的压力主要不是战争造成的; 十月八日在维也纳开幕的石油输出国组织会议早在敌对行动爆发以前就决定召开了。对付石油涨价, 存在两个问题。在此以前, 谈判是由石油公司进行的, 把各国政府排除在外; 它们把价格上涨的后果又转嫁给消费者。如果各国政府现在企图打破价格的螺旋形上升, 所有消费国必须合作。我说:

我们缺乏战略……确实存在一种疯狂状态。你们在阿尔及利亚碰到国有化问题, 我们的公司就乘虚而入。我们可能在其他什么地方碰到国有化问题, 别人又会取代我们的地位。所有这一切我们都应当同消费国进行讨论……

如果认为战争一旦结束石油就会不成问题, 那是幻想。现在这种处理问题的办法等于自杀。首先我们必须整顿内部。我们准备在高度保密的基础上同你们讨论这个问题。如果你们愿意派什么人来见我们, 我们将表示欢迎。

若贝尔没有接受秘密会谈的建议; 他对消费国合作仍持冷淡态度。美国曾经建议消费国制订共同战略。从六个月前我发表欧

洲年讲话以来，这个建议一直是有效的，后来又一再得到重申。但是这个建议遭到忽视，因为法国特别希望在能源问题上保持行动自由，想利用这次危机同产油国达成有利的双边交易。

十月十六日，石油输出国组织放弃了使油价缓步上升的方针，转而使价格猛涨。六个海湾国家没有同消费国进行任何讨论就采取了空前的、令人目瞪口呆的行动，单方面把石油标价提高百分之七十——从三点〇一美元增加到五点一二美元。第二天，输出国组织的阿拉伯成员国在科威特开会，一致同意把他们的石油产量削减百分之五，以后还要逐月减少百分之五，直至使以色列撤出它占领的全部阿拉伯领土为止。十月十八日，沙特阿拉伯宣布，在阿拉伯国家关于中东问题的条件得到满足以前，它要把产量削减百分之十，超过一致协议的幅度。无论减产是出于什么政治考虑，它们事实上助长了价格的上涨，并为更富戏剧性的提价奠定了基础。

情况急骤恶化。十月十九日，尼克松要求国会拨款二十二亿美元作为给以色列的一揽子援助，使它可以为空运去的军事装备付款。要求是作为一个例行的、主要属于预算性质的决定提出来的。现有拨款都不能用于对以色列的紧急空运。国防部担心它必须减少其他项目才能腾出这笔钱来。立法专家则认为，战争时期比战后更容易获得补充拨款。因此这个要求是出于技术考虑提出的。从纪录上看，谁也没有就阿拉伯反应问题提出警告。开始空运以前，人们确实担心过这种反应。现在，过了将近一个星期，他们认为最糟糕的局面已经过去。

要求提供援助的时机是再坏不过了。到那时为止，我们一直设法使空运看上去像是对苏联集结兵力的反应，也是对我们的停火建议失败的反应。我们在联合国顶住了各种提案，以免被迫行使否决权，触怒阿拉伯人。但是现在，在战争的最后一个周末，在

埃及军队处于困境而以色列部队已经逼近大马士革的时候，宣布我们二十二亿美元的一揽子援助计划就为阿拉伯人日益增长的失意情绪提供了发泄的目标。如果我们等到双方同意停火以后再正式提出要求，情况会好得多。那时可以把援助说成是我们为促进停火而作的贡献。

阿拉伯人迅即作出反应。我们宣布援助计划的第二天——也就是我启程去莫斯科谈判停火的当天——沙特阿拉伯宣布对美国实行全面石油禁运。后来，石油输出国组织的阿拉伯成员国把禁运范围扩大到荷兰，因为它是欧洲各国政府中最支持美国政策的。十月十六日石油输出国组织关于价格的决议、十月十七日要求阿拉伯国家削减产量的科威特决议和十月二十日的阿拉伯石油禁运加在一起，使世界石油市场发生了革命性变化。

人们对石油市场结构几乎毫无所知，因此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禁运问题上。在后来五个月当中，他们几乎象着了迷似地不断讨论解除禁运问题。一部分原因是尼克松认为它有助于造成一种引人注目的事态，使人忘掉水门事件。事实上，阿拉伯禁运只是一个象征性姿态，实际影响有限。沙特阿拉伯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石油确实是不运往美国了。但是，由于各石油公司是联号，它们轻而易举就用不受禁运影响的非阿拉伯国家石油代替了禁运的阿拉伯石油，并对其他分配渠道进行了相应的调整。禁运的真正影响是心理上的。由于担心禁运可能延长，担心阿拉伯产量可能进一步削减，欧洲和日本掀起了一股抢购浪潮，从而造成供应紧张，使价格继续上升。

事实上，真正造成市场变化的是产量的削减。减产使供求不平衡状态严重恶化，也表现了产油国拥有的巨大力量。消费国踌躇不决的反应加剧了困难。他们不愿意合作，结果使他们永远处于易受伤害的地位，等于保证危机将永远存在下去。

十月十八日，我在国务院工作人员会议上驳斥了所谓石油公司只有同意新的涨价而别无他策的说法：

我们想干什么？……明年他们把价格提高到十美元，石油公司也非接受不可吗？……然后他们又会要二十美元。要涨到什么程度各个公司才非反抗不可呢？……我本能的感觉是：既然局势还会恶化，迟对抗不如早对抗。

我提到那些数字是带挖苦性的，是为了说明消费国消极等待会使石油市场出现何等荒谬的状况。不到六个星期，这些数字就开始变成现实。我的看法是正确的，但是负责经济事务的副国务卿威廉·J·凯西的反驳也是对的。他说：“对抗究竟意味着什么？政府里谁也没有提出任何对付这些要求的办法。”主要消费国必须团结一致。这是实行一项明智的石油战略的起码要求。涨价、减产和禁运造成的惊惶情绪进一步加剧了半年来大西洋两岸的紧张关系，妨碍了团结。欧洲各国政府谁也不理会我们提出的就能源合作问题私下交换意见的建议。正如我在第十六章描述的那样，他们抓住一切机会表示他们同我们的中东外交没有关系。这些欧洲国家甚至拒绝同他们遭到禁运打击的伙伴荷兰分享石油，因为他们担心产油国报复，把禁运扩大到自己身上。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不得不单独执行自己的战略，其中包括三个组成部分：为了使世界能源市场恢复某种平衡而制订一项全国能源计划；无论如何痛苦，坚决拒绝让盟国或产油国的压力影响我们的中东外交方针；在确定这两个前提以后，重新努力使消费国团结起来。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七日，尼克松宣布了“独立计划”，要求通过节约和发展代用能源使美国到一九八〇年无需再进口能源。这有点自吹自擂，因为一切迹象表明，到一九八〇年我们对石油进口

的依赖可能增加,而不是减少。另一方面,尽管尼克松过低估计了完成这项任务所需要的时间,他给国家指出的方向还是对的。尼克松在碰到国际问题时,总是设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不是掩盖问题。美国必须减少能源浪费,必须在发展代用能源方面表现更大的创造性和决心。如果我们能减少对进口石油的依赖,就会大大加强全体消费国讨价还价的地位。后来证明,实际情况正是如此,只是时间比尼克松预料的要长些。

当然,长远的战略并没有解决我们和盟国之间的政策分歧这个眼前问题。

“独立计划”要求我们证明,任何压力都不能影响我们外交的步调或内容。尽管有许多盟国想要迎合产油国的政治要求,对他们进行安抚,并因此对我们施加压力,我们仍然坚持我们在战争初期制订的外交方针。虽然我们感到很痛苦,但我们认为强调盟国不能影响我们的决策是为盟国服务的最好的办法,因为这样做可以减少促使产油国对他们施加压力的因素。

这种战略很久以后才产生效果,而且——特别是在盟国关系方面——付出了代价。并非由我们发动的疏远过程一旦开始,就造成恶性循环。对于一些直到最近还在中东占统治地位的、自豪的国家来说,明显地成为中东和平外交的局外人是非常令人屈辱的。他们抓住一切机会使问题更加激化。一九七三年十二月,我们听说有些盟国以拒绝为我们的政策承担责任为由,要求阿拉伯人优待他们。据说他们认为,即使我们的外交取得进展,也不应使我们得到报酬,而应对我们继续实行几个月禁运,否则欧洲和日本同我们的政策保持距离就会显得毫无意义。这些传说都无法证实,但是谣诼纷纭总不会完全事出无因。这段时间并不是盟国关系中比较美好的时刻之一。

至于产油国施加的压力,我们认为,保护产油国当中的温和

派、不让他们为必然很复杂而激烈的阿以和谈承担责任，最符合他们的利益。按照我们的看法，使沙特阿拉伯卷入谈判的细节问题会使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朋友从各方面受到不必要的压力。阿拉伯产油国里的温和派面临的局面已经够复杂的了。他们由于一时感情冲动拿起了石油武器，现在有点骑虎难下。阿拉伯团结的需要实际上使激进派拥有了否决权。

萨达特对促使各国在战争期间利用石油武器是起了作用的。当我们开始同他接触时，他的说法同他的阿拉伯兄弟一样，认为禁运是各国共同决定的，只有各国采取一致行动才能撤销。因此，必须使他能够告诉其他国家，和谈已取得某些进展，他才能建议减少石油压力。只要他不勉强我们超过禁运前我们已经决定采取的——以及为迅速防止再出现一场爆炸而必须采取的——措施，我们准备默然同意。但是我们一直坚持：如果不解除禁运，我们的外交活动就进行到埃及部队脱离接触为止，不再继续——实际上是把石油武器转用来对付产油国。萨达特认识到这一点，因此他从十一月底开始就要求在实行第一个脱离接触协议的同时，逐步解除禁令。但是，即使对萨达特来说，放下石油武器也不象挥舞石油武器那么容易。

费萨尔国王对我说，他不能自行结束禁运；即使萨达特这样的阿拉伯领导人单独建议也不行。我相信他讲的是实话。没有阿拉伯国家的一致同意，解除禁运会造成对他不利的反应；来自阿拉伯激进派的威胁会抵销他同美国关系的缓和。事实证明，如果不在叙利亚战线取得某些进展，费萨尔就不愿冒此风险。但是要在叙利亚战线脱离接触，需要很长时间。我们不能等那么久。此外，如果容许产油国制造一道又一道障碍，我们就只能没完没了地跑下去。每跨越一道障碍，只能促使他们要求我们在外交上再努一把力；石油压力将永远保持下去。另一方面，由于产油国急于在叙利

亚战线脱离接触（他们多数有此愿望），我们拒绝前进就会使石油武器成为包袱，给他们造成一个如何放下包袱、避免自食其果的问题。

在石油外交方面，西方最熟悉的阿拉伯领导人是沙特阿拉伯石油大臣舍赫·艾哈迈德·扎基·亚马尼。发生危机以前，我曾同他会晤过几次。危机使他成为一个令人敬畏的人物；当他在世界各地旅行时，到处都有虔诚的支持者和新闻记者巴结他，恭恭敬敬地倾听他说的每一个字。我发现他是一个聪明绝顶、学识渊博的人，能够就社会学、心理学以及其他许多问题发表精辟的见解。他那充满警觉的目光和一小撮山羊胡子使他看上去象一位自命不凡的年轻绅士。他似乎把石油政策当作游戏，他带来的孕育着风暴的信息似乎并非他的真意。由于这种信息是以一种同他的行动不相称的温和口吻和谦卑的微笑表达出来的，更使人得到这种印象。

换一个社会或者换一个时代，亚马尼可能成为一位学者或者是一个中间偏右或偏左的小政党的领袖（这一类政党之所以有影响并不是因为它们党员多，而是因为它们的党员很有智慧——例如用党员少说明对党员要求严格、并以此自豪的意大利共和党）。但是在当时的沙特阿拉伯，亚马尼的出身使他不能跻身于只有亲王才能担任的政治领导，而他的才智又使他不可能默默无闻地生活下去；他终于获得使他可以在沙特阿拉伯王国掌握实权的必不可少的地位，但仅处于权力的边沿。在沙特阿拉伯经济（归根结底也是世界经济）的一种关键性工业中，他成了一名几乎不可缺少的、出类拔萃的技术专家。没有他，什么事都办不成；但最后决策是其他人根据各种估计、在各种压力的影响下作出的。他对这些估计做过技术性贡献，对压力则无法施加影响（或许曾经以他自己的方式作出评价）。

因此，亚马尼在世界上的影响和他在沙特阿拉伯内部的影响

必然存在差距。在世界范围内，亚马尼是一位很有名望的、常常为人畏惧的人物。他似乎是沙特阿拉伯王国、有时甚至是阿拉伯世界真正的发言人。但是在沙特阿拉伯内部，他的地位则远非如此明确。他出身既非王室，也非贵族，他是以非凡的才能在一个讲究传统的社会里为自己开辟了道路的。但是他离权力核心还很远。他很少参加同那些重要亲王举行的会晤，即使参加也只能按礼宾次序同次要官员坐在一起，并且从来不发言。我常常怀疑，亚马尼偶尔发表一些刺耳的声明是否反映了他的这种考虑，即他在本国政治等级制度中感到不安全、需要在阿拉伯世界的一些关键集团眼中确立自己的地位，而不是沙特阿拉伯王国经过深思熟虑的意见。

从这个意义上说，亚马尼体现了他的专长给他的国家造成的各种令人困惑的矛盾。从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总要造成创伤。沙特阿拉伯的难题在于：石油收入虽然使它在世界经济中取得举足轻重的地位，但也会以处于类似政治转变状态中的任何社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促进它内部的现代化。沙特阿拉伯领导人对这样快速的现代化一定怀有复杂的感情。封建社会是通过传统的、主要是个人相互承担责任的方式运转的。现代国家则要求通过法律或官方制订的准则使一切按预定方式运转。封建国家重视地位；现代国家重视成就。亚马尼代表了知识界的精华，其影响将随着他带来的石油收入增加而迅速增长。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对传统方式和传统的权力源泉是一种挑战；现代化使数以千计的人去国外接受训练，给他们灌输了各种价值观念，而这些价值观念同以贝都印人的忠诚为基础的、内向的专制国家的价值观念是难以调和的。一个亚马尼是无价之宝。但如果有一万个亚马尼，会出现什么情况？这些集团获得新的地位之后，同世袭统治阶级的要求如何调和呢？过去和未来怎么才能很好地揉在一起呢？

前面我已经描绘过沙特阿拉伯那些外观精致的城市。它们是从贝都印生活方式向新的生活方式过渡的象征。生活在这些城市里的不仅将有新的高级知识阶层，而且会有一个脱离部族影响、也不受个人因素左右的无产阶级。这个无产阶级并不贫困，无需每天为糊口挣扎，因此更不安定。美国同沙特阿拉伯的关系，总的说来就是同那些亲王的关系；他们是美国的挚友；我认为如果沙特阿拉伯由任何其他入统治，我们的处境都会变得更糟。他们的石油决策加快了变化的进程，使他们更迅速地走向难以预料的未来。这些决策给他们带来新的挑战。我谨祝他们在努力适应这些挑战的过程中一帆风顺。

亚马尼从来不谈这些矛盾，甚至毫无暗示；他可能根本不承认存在矛盾，但他自己就是这些矛盾的化身。亚马尼非常出色地执行了自己的任务。然而历史可能证明：他在促使世界经济发生革命性变化时，也使本国发生了政治演变，从而对沙特阿拉伯社会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禁运的直接后果是使沙特阿拉伯处于最不愉快的境地。由于感情上和实际上的理由，它珍惜同美国的友谊。激进主义的浪潮使它害怕。但是阿拉伯团结符合它的道德信念，也符合王国的安全需要。在阿拉伯世界陷入孤立是它吃不消的；它怕别人排斥它、骂它是反动派或指责它对阿拉伯事业不够忠诚。石油武器加剧了它的困难。

结果，沙特阿拉伯发出了一系列内容似乎相互矛盾的信息，说明它在感情上受到了各种不同的影响。十一月十一日，亚马尼给我发来一封显然是为了避免承担责任而标明“非官方性质”的信。（实际上，沙特阿拉伯的大臣们除非相信自己已得到授权，否则是不会给一位美国国务卿发出私函的。）来信说，对于禁运可以采取“某种行动”，但美国必须就“执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二四二号决

议、具体地说就是撤出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问题”发表“声明”。亚马尼是要求我们承担把以色列赶回一九六七年边界的义务；但美国无法承担这种义务。十一月十二日，在北京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到提供保证的问题，我给了一个非常一般的（也是标准的）答复，既接受撤退原则，又把最后界限留待谈判解决。我说：

到现在为止，我们并没有作出任何具体保证。但是我设想，和平谈判如果成功，那么特别是对以色列就会提出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在最后边界肯定不同于停火线的条件下，在涉及安理会第二四二号决议规定的撤军时，如何才能保证它的安全……

我在答复亚马尼时就用这些不得不讲的话装潢门面，冠冕堂皇地请他注意以上意见。

十一月十七日，我听到一种略有不同的分析：据说费萨尔国王不愿仅仅为了西奈沙漠几英里土地就解除禁运。他坚决要求把否认以色列对耶路撒冷的主权作为解除禁运的条件之一。此外，对禁运做任何修改都必须得到叙利亚、科威特、埃及和阿尔及利亚的同意。与此同时，我们听说亚马尼正奉令前往其他阿拉伯国家首都进行试探，虽然他并没有告诉我们目的何在。

第二天，一位高级亲王的助手又带来一个略有不同的有关沙特阿拉伯意图的信息。他告诉我们：当费萨尔坚持以色列必须撤回到一九六七年边界线时，他谈的是沙特阿拉伯的最终目标，而不是它决定石油政策的必要条件。只要采取“有效的、显而易见的”通向和平的行动——例如以色列开始撤离现有接触线——就可以修改禁运措施。这位助手没有具体说明他指的是埃及和叙利亚战线，还是仅仅指埃及战线。

同日（十一月十八日），聚会在维也纳的阿拉伯各国石油部长再一次把石油问题和中东外交联系起来。为了对欧洲共同体在中东问题上采取的态势表示“欣赏”，他们宣布取消原定十二月实行的减产百分之五的决定。这说明，阿拉伯部长们给予欧洲共同体的“报酬”不过是保持极为困难的现状；他们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缓和造成当前严重危机的前两次减产的影响。他们还继续对荷兰实行禁运——更耐人寻味的是，其他国家居然也接受了。

十一月十九日，亚马尼把阿拉伯国家协商的结果通知我们。他回到原来的强硬立场，把结束禁运和以色列同意为撤出“一切”被占领土制订“时间表”联系在一起。亚马尼很乐于把这项决定提交给我们，似乎这是对美国的一种照顾，可以使我们用“更强硬的口吻”同以色列打交道，使它较快地同意举行和平会议并同意撤军。我们根本不能接受这个决定。我们对沙特阿拉伯朋友的困难深表同情。但是，一旦我们为获得石油而同意把别人规定的政治条件强加于以色列，就会出现一发而不可收拾的局面。沙特阿拉伯也不可能就此高枕无忧。激进国家会对它施加压力，要它提出更高的要求。我们迟早得划一条界限。沙特阿拉伯王国想减轻来自对立双方的压力（激进派的压力和美国的抵抗），最后却会夹在两种压力当中，无法脱身。我们最好在事态失去控制以前就奋起抵抗。十一月二十一日我为邀请法赫德亲王访问华盛顿而给他写信时，实际上表达了这些意见。我警告说：“面临继续石油禁运的威胁，我们将十分难于在未来的谈判中起我们所希望起的协助作用。”继续禁运不是一种“友好行动”；它可能导致对抗，而这种对抗同“我们为使谈判有任何成功机会而必须采取的姿态”是无法调和的。

在考验谁的神经更坚强时，有时公开采取不丧失威信就无法退却的立场有助于使对方深信自己的决心。因此，我在同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重复了过去仅对产油国私下讲过的话：

对美国施加经济压力的那些国家应当想一想，当人们正在准备和谈、甚至正在进行谈判时采取这种步骤是否恰当。我愿代表美国政府声明：我们的方针不会受这种压力的影响；我们已经宣布了自己的政策，说明了我们承担的责任，并将信守不渝；任何压力都不可能使我们越过这个界限……

此外，美国不会只是消极地忍受讹诈，到一定时候可能进行报复。我说：

如果继续毫无道理地、无穷无尽地施加压力，美国显然必须考虑它可能不得不采取什么反措施。我们非常不愿意这样做，现在仍然希望事态不会发展到这种地步。

这不是虚声恫吓。我曾指示一些关键部门研究在继续禁运的情况下对石油输出国组织的阿拉伯成员国采取什么反措施的问题。十一月底，已经有几种应急的研究材料准备就绪。

亚马尼立即作出反应，表示自己受了骗。十一月二十二日他在哥本哈根接见电视台记者时发表了一篇异乎寻常的激烈讲话。他威胁说：如果美国、欧洲或日本进行报复，就要把石油产量削减百分之八十。他警告说：美国采取任何军事行动都等于“自杀”，因为阿拉伯人将炸毁油田。他知道美国不那么依赖阿拉伯石油，所以警告欧洲人不要同美国一起采取任何报复政策，因为那样做“肯定会使你们（欧洲）的整个经济毁于一旦。”^① 亚马尼以及同他一起出访的阿尔及利亚石油部长贝莱德·阿卜杜萨拉姆按照这个调子在欧洲到处游说。他们继续让人们看到这样一种可能性：如果欧洲（荷兰除外）和日本脱离美国而奉行有利于阿拉伯事业的政策，它们就会受到优待。

同日，我们的新任大使、石油专家詹姆斯·艾金斯在利雅得会

见外交国务大臣奥马尔·萨卡夫，提出了解除禁运的要求。萨卡夫重申亚马尼原来的方针，声称减少石油生产和禁运实际上是为了加强美国的地位，使它可以敦促以色列让步，因此是对我们的一种照顾。艾金斯提出，如果恢复美国第六舰队的石油供应并放弃使石油产量再削减百分之五的计划，我们将感到慰藉。我通过电报提醒艾金斯注意，我们的石油战略的基本目的并不是“寻求局部缓和”。我说：

我们的战略是使阿拉伯人明白，如果他们要我们也来为争取和平解决而努力，他们必须首先取消他们强加的限制，而不是等到这种努力取得进展才取消限制。我们要求不再干扰我们舰队的石油供应。不仅如此，我们还要求恢复减产和禁运以前的状况，而不仅是暂时停止实行进一步减产和限制。

十一月二十五日，尼克松又发表了一次重要演说，提出了节约能源的详细方案。同时，我通过黑格了解到，他还倾向于派遣一名私人代表到利雅得去要求他们解除禁运，并就我们在即将召开的日内瓦会议上的态度向他们作出保证。我强烈反对这个意见，一部分原因大概属于谈判代表在他认为是自己的职责范围受到侵犯时的正常反应。但是这个意见也同我们的战略发生冲突。我们的政策要获得成功，就必须不受压力影响。而派遣特使，以在日内瓦做出让步作为条件换取石油，很难说是对压力表示无动于衷的最好办法。那样做会使我们象是在哀求他们，同时也使沙特阿拉伯有可能掉进阿以谈判的各种陷阱。我设法劝阻了总统。十一月二十九日，我对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里的同事讲了我的理由：

如果我们屈服于禁运，同沙特阿拉伯人就举行会议的具体条件讨价还价，我们就会使自己处于毫无希望的境地。这样做需要的时间太长。它将使

沙特阿拉伯人对一切事情负责，他们就会受阿拉伯激进派的驱使。这样做会鼓励英国人和法国人采取蛙跳方针……他们可能在石油方面处于垄断地位，但是要取得政治进展，只有靠我们。

使我国政府内部接受这种说法就已经够困难的了；而我们的盟国则根本听不进去。他们继续奉行同我们疏远的方针。十一月二十二日，日本采取了和欧洲十一月六日宣布的立场类似的方针。作为报偿，十一月二十八日在阿尔及尔召开的阿拉伯首脑会议把十一月十八日对欧洲共同体的让步（取消进一步减产的决定）扩大到日本。根据报纸消息，亚马尼在伦敦向英国保证（言外之意也是向其他国家保证）：采取亲阿拉伯态度会使它的石油供应保持战前水平。

在此期间，我们还在小心翼翼地同沙特阿拉伯进行周旋。沙特阿拉伯既想放松禁运，又想得到激进派同意。虽然这不是一时能做到的事，它还是力图把互不相容的东西加以调和。这个过程虽然有时使我们非常恼火，事实上却进行得十分巧妙。沙特阿拉伯使船只通过险滩而没有发生灾难，终于在并未引起剧烈动荡的情况下解除了禁运。

为了准备条件，它力图争取时间。十二月三日，我们得悉法赫德亲王接受了访问华盛顿的邀请。他的目标是要就解除禁运和恢复已经削减的生产的方式取得协议，以便在十二月十四日我按照预定日程访问利雅得时予以宣布。仅有的条件是：事前必须得到萨达特、阿萨德和布迈丁的同意，而且必须在日内瓦会议开幕以前执行十一月的六点协议。（后面这个条件已经在付诸实施。）同日，我致电法赫德说：我认为肯定有可能得出某种成果。尼克松也给费萨尔国王写了一封友好的信，强调了我们的两个根本主题：如果不中止禁运和减产，美国舆论

将不容许我们象我们双方同意的那样起我们有责任起的持久的作用……日益增加的对抗气氛只会对我们双方都不利，而有利于那些希望保持现状的人。

尼克松还亲笔加了一段话，保证他个人将全心全意地致力于充分执行安全理事会第二四二号和第三三八号决议。

但是第二天，十二月四日，沙特阿拉伯大臣会议推翻了二十四小时前才通知我们的决定。法赫德不来美国了；这个王国不愿使结束禁运以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双边决定的形式出现。他们再次肯定了十二月三日的方案，但认为实施这个方案的天然场所将是十二月八日在科威特举行的阿拉伯石油部长会议。法赫德亲王留在中东，努力使禁运和减产按照已经同意的方式结束，将更符合共同利益。

十二月五日又出现了阿拉伯立场趋于强硬的新迹象。风尘仆仆的沙特阿拉伯和阿尔及利亚石油大臣亚马尼和阿卜杜萨拉姆在周游世界工业化国家途中来华盛顿拜会我。亚马尼重新采取强硬路线。他说，只能“按照同以色列撤军日程相应的时间表”来解除禁运并使生产恢复到战前水平。换句话说，十二月三日的暗示——禁运将随日内瓦会议的召开而结束——已经不适用了。我拒绝这种改变。我说：

这是一个原则问题。我们已经就我们的意图向你们的国王和其他阿拉伯领导人做了保证。现在，当我们诚心诚意地努力满足阿拉伯人的愿望时，难道应当对我们进行讹诈吗？

一天以后，亚马尼使局势更加混乱。他摆脱那位激进的阿尔及利亚人而单独会见我时表示，表面的立场将在实践中予以非常灵活的解释。如果我们按计划在一月实现埃以脱离接触，禁运就会解

除。

他们把关于石油问题的决定时而同以色列保证全部撤退联系起来，时而又同完成脱离接触的某一阶段、同遵守六点计划、或者同叙利亚战线脱离接触联系起来。各种多如牛毛的声明随着十二月八日阿拉伯石油部长会议在科威特开幕而宣告结束。会议公报证明谁也不愿同激进派较量。这些部长把解除禁运同以色列接受全面撤退（包括从耶路撒冷撤退）的“时间安排”并开始真正放弃领土挂上了钩。他们知道，这显然不能作为谈判的起点。他们还增加了一个讹诈项目：对于“不能为友好态度提供具体证明、例如表明自己正在对美国或以色列施加压力”的国家，将重新实行十二月推迟的百分之五减产。

在和平谈判甚至尚未开始的时候就对谈判提出具体条件，这是我们坚决拒绝接受的。否则如果我们不能尽快满足他们的要求，阿拉伯人就可以合法地继续进行勒索。阿拉伯产油国没有提出其他可供选择的方案。到十二月中旬，我们正走向僵局。

第二次石油冲击：德黑兰和科威特

阿拉伯石油部长精明地选择了自己的立足点。他们把重点放在最可能加剧我们和盟国之间的分歧的外交政策问题上。我们坚持按照我们认为可能的、不至引起危机的速度前进。我们的盟国对经济持续增长的依赖性已经大到了不愿冒险的程度，而且他们是按照阿拉伯激进派的好战言论对风险作出估计的。尽管如此，无论我们对盟国如何失望，我们仍然认为，制订长远战略的关键在于石油消费国的团结。只有这种团结才能提供改变市场条件、恢复经济均势的希望。同时，我们认为，正在受到经济和社会危机折磨的民主国家必须重新控制自己的命运才能保持他们政治上的健

康。

但是，欧洲共同体利用十二月十四日至十五日在哥本哈根举行首脑会议的机会重申而且强化了它十一月六日关于中东政策的声明——这一次是公开反对我们外交的主要目的。会议还决定探讨定期举行“欧洲—阿拉伯对话”的可能性，这种对话的实际结果只能使大西洋分歧固定下来。后来几个月的特点是：我们的盟国在同我们合作还是同我们分离两者之间摇摆不定；他们同时奉行这两种方针，企图避免作出抉择。

我们只有强调自己对压力无动于衷的态度，才能减缓欧洲急于迁就阿拉伯人的步伐。我在十二月前往中东为日内瓦会议进行准备（见第十七章）的途中，曾经尽我所能地去造成这种印象。我一路强调，不能容许对唯一能够促进和平、而且正为此作出重大努力的国家继续进行石油讹诈。我警告我的东道国不要指望我们会受欧洲祈求的支配。阿尔及利亚总统布迈丁对任何具有自尊心的国家都不能容许别人对它施加压力这个论点表示同情。他说，阿尔及利亚需要外汇，因此他无论如何是赞成全面恢复石油生产的。萨达特答应，只要埃及战线达成脱离接触协议，他就立刻为解除石油禁运而努力。十二月十四日我访问利雅得时，费萨尔国王似乎同意萨达特的方案，并且暗示在解除禁运的同时要取消对生产的限制。

沙特阿拉伯再次发出了积极的讯号。十二月十九日，萨卡夫向艾金斯大使保证：现在阿拉伯人已经证明了自己的论点；石油禁运一定要取消。费萨尔的看法将转达给定于十二月二十五日（即日内瓦会议以后不久）举行的阿拉伯石油部长会议。据说亚马尼也表示了类似的意见。

在整个这段时间里，能源危机的经济后果日益严重。欧洲对阿拉伯人的迁就和我的四处奔走都未能减轻削减生产的经济影响

或禁运造成的心理冲击。接着，就在充满希望的利雅得会晤的几天之后，发生了一件出乎意料的破坏性事件：石油价格又上涨一倍。

产油国预定召开两次重要会议：一是十二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三日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波斯湾成员国准备在德黑兰开会考虑油价问题；一是输出国组织的阿拉伯成员国准备在十二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五日在科威特开会讨论禁运和限制产量问题。十二月二十一日，亚马尼在即将启程前往德黑兰时对艾金斯说，费萨尔及其大臣重新估计了形势。他们最近积极得过了头。完全结束禁运有招致所有阿拉伯激进派、甚至萨达特反对的危险。因此，沙特阿拉伯只能争取放松禁运和有限度地恢复生产。

更令人惊讶的是亚马尼突然——在德黑兰会议前一天——提出石油再次涨价的前景，虽然他说沙特阿拉伯并不赞成涨价。过去谁也不曾提到过这种前景；一个星期以前我访问利雅得时，我们的全部讨论都集中于解除禁运。亚马尼声称沙特阿拉伯是一个无辜的旁观者，罪魁祸首是伊朗国王。艾金斯要求我们对输出国组织的全体成员国施加影响，请他们采取克制态度。我是十二月二十一日在日内瓦收到艾金斯用电报发来的报告的。第二天我就向伊朗和石油输出国组织所有其他成员国政府发去电报，为反对石油再次涨价提出强烈警告。此外，我还向西方所有工业国家和日本的政府发出呼吁，要求他们对石油输出国组织施加影响，反对涨价。没有任何纪录说明这些国家曾经这样做了；可以肯定的是谁也没有努力去做。

我们的努力没有起任何作用，如果说在这么晚的阶段还可能起任何作用的话。十二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三日，石油输出国组织的部长们在德黑兰把每桶石油的价格从五点一二美元提高到十一元六五美元——上涨百分之一百二十八，加上十月份提价百分之七十，等于两个月内使石油价格增加了百分之三百八十七。

今天可以明显看出，这个决定是二十世纪历史上的关键性事件之一。单看统计数字就足以令人惊愕不已。四十八小时之内就使美国、加拿大、西欧和日本每年的石油支出增加了四百亿美元，对这些国家的收支平衡、经济发展、就业状况、物价稳定以及社会团结的打击极为沉重。德黑兰决定使发展中国家付出的代价也超过工业民主国家对他们的全部援助，使外援本应解决的悲惨绝望的状况重新出现。但是长远的影响更为严重。一切有关国家，甚至包括产油国在内，都在国内结构方面面临翻天覆地的变化。

二十年来几乎毫不停顿的发展给工业民主国家培育了比较好的国内政治气氛。稳步增长的国民生产总值为福利计划提供了资金。当时已经有可能使一个集团受益而无需剥夺另一个集团；例如美国的民权革命既反映了一九四五年以来美国黑人经济实力的不断增长，也进一步促进了这种增长。一切社会集团都可以同时而且无限制地获益的如意念头得到了发展。这种想法基本上也是符合实际的。当然，六十年代几乎所有工业国家都经历过的学生骚乱是一个警告，说明仅仅注意物质利益并不足以维持一个社会，经济增长不会自然而然地为寻求更深刻的生活意义的新一代提供感情上的满足。但是当时有理由希望：对这些问题一旦认识之后就会找到解决办法。

七十年代开始——八十年代还在继续发展——的经济危机摧毁了这样的前景。各国内部以及各国之间的冲突增加了，而团结则没有加强。石油价格方面的勒索抬高了物价，但降低了需求。石油价格爆炸震动了各国经济，工人们力图增加工资以赶上物价上涨的步伐。各国政府试图克服通货膨胀，但他们无法代替以石油输出国组织尚未使用的数以十亿计的美元为代表的游离于世界经济之外的购买力。限制货币和保护贸易政策蔚然成风——现在仍然如此。中产阶级的积蓄曾经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他们的克制

为政治和解奠定了基础。但是现在他们却到处一再受到挤压。七十年代中期和后期某些欧洲国家——英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法国、甚至还有西德——激烈的社会冲突是石油价格爆炸造成的后遗症。

甚至现在，爆炸造成的国内政治影响还在继续发挥作用。民主政治的难题在于，解决当代经济问题需要的时间远远超过了选举周期，而领导人的表现是通过投票来给予评价的。有多少政客敢于拿自己的乌纱帽冒险、宣布美好的时代已经过去？谁愿告诉自己的选民，指出实行明智的政策将使生活水平至少暂时下降？当青年男女迈出中学和大学校门就发现自己毫无用武之地、只能参加到石油危机以来被赶下工作岗位的数以百万计的失业大军中去的时候，在这个不可避免的幻灭时期会出现什么情况？通向蛊惑宣传、政治上各走极端以及通向暴力的道路已经敞开。

至于发展中国家，如果说必须对他们实行经济援助才能防止我们的星球分裂为少数富人和多数穷人这种思想还有点道理，如果说为了维护和平我们就必须努力消除这种差距，石油涨价则在破坏这些目标方面起了惊人的作用。多数发展中国家完全依靠进口石油来发展工业或农业；所有发展中国家都依靠日益增长的世界贸易和投资，也依靠发展援助。石油价格爆炸粉碎了他们获得进展的希望。他们进入了一个新的负债累累、一贫如洗的黑暗时代——这种情况还提出一种更可怕的前景：由于他们无力还债，甚至会使几十年来一直给他们提供信贷的先进国家银行体系遭到破坏。他们默不作声地接受了产油国的勒索，转过头来却咒骂和他们同时遭殃的西方，使人们既感到可怜又难以忍受。这反映了一种无可奈何的状态或者是陈腐的思想意识。事实上，正如一九七五年九月我在联合国讲话时指出的那样，“十年来对经济发展最具有破坏性的打击并非来自‘帝国主义掠夺’，而是来自石油输出

国卡特尔专横的、垄断性的提价。”尽管如此，那些穷国不时还要对激进派产油国追求的目标发出同情的噪音。这种奴颜婢膝的做法当然也没有给他们带来多少好处，只有零零星星的残羹剩饭以及虽然答应却很少兑现的援助基金。

有史以来还从来没有一个由比较弱小的国家组成的集团能够迫使占人类绝大多数的其他国家的人民如此戏剧性地改变生活方式，而遭到的抗议却如此之少。如果说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的话，可以说产油国的“成就”正在威胁这些国家自身的安定——这种状况可能正在逐渐为人所认识。很少政治体制能够承受住财富如此大量转移所造成的加速度发展。必然会出现甚至比较巩固的政治制度和传统也难于处理的混乱状态。而多数产油国的制度并不属于比较巩固的范畴。

七十年代后期伊朗的动乱既是这种状态的畸形表现，也是一个警告。涨价带来的过分急促的经济发展引起了一种原始的反应，使促进迅速发展的、只注意物质因素的价值观念遭到否定；结果这个国家反倒逐渐走向贫困，这是具有讽刺意味的。内部动荡也不是产油国面临的唯一威胁。工业民主国家经济遭到削弱还可能使产油国很大一部分物质收益化为泡影，因为西方的金融危机也会破坏产油国在这些国家的投资。此外，如果由于经济上的原因使西方无力承担波斯湾军事保护者的角色——或者是对保护这些有系统地破坏世界经济的国家失去兴趣——的话，许多产油国就可能成为外国掠夺者唾手可得的牺牲品。

因此，产油国的困难处境有点象历史对试图迫使它加快步伐的人开的一个玩笑。如果这些国家把他们勒索来的钱花得太快，就有造成国内动乱的危险；如果他们把钱储存起来，又会过分削弱国际经济体系，从而使他们自己也倒霉。

石油危机使一切都吃了亏。具有如此巨大历史意义的事情

值得更加认真地进行分析，而不能象某些产油国那样为自己辩解或者象其他国家那样蛊惑人心地去寻找替罪羊。最荒谬的例子可能是这样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似乎我们曾经一再得到警告，知道有涨价的危险却置之不理，因为华盛顿欢迎石油涨价使伊朗有钱重整军备。^⑧我在这里简单谈到的事实毫无疑问地证明：我们以及我们的工业化盟国都是在价格猛涨即将临头、要施加影响已经太晚的时候才获悉涨价计划的，而且当时我们进行了强有力的抵抗。美国一贯认为这几次涨价完全是一种灾难；从来没有人把涨价看成是资助伊朗购买军事物资或满足任何其他目的的手段而加以欢迎。关于这个谣言的详细情况，纪录是清楚的。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我以尼克松的名义致电伊朗国王，提出最强烈的抗议。电报说：

总统十分担心，德黑兰会议同意提高波斯湾原油价格将对世界经济的稳定产生破坏性影响，并可能对国际货币体系造成灾难性问题。其结果不仅将提高制成品价格，而且将对石油消费国的经济起严重的抑制作用，可能引起世界性衰退，最后对包括石油输出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都不利。

我们认为，这次大幅度提价发生在人为地限制石油供应的时候，是特别没有道理的……我们强烈要求：（一）重新考虑德黑兰最近的决议；（二）采取步骤进行我们相信大多数消费国和生产国都会同意的那种协商；（三）产油国认真考虑涨价对自由世界几乎所有国家的收支平衡状况的有害影响以及从而产生的对世界贸易、特别是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影响。

所谓华盛顿鼓励提价或者串通其他国家提价的说法是一种蛊惑人心的无知的表现。但是，要明确指出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成员中谁应对提价负责却不那么容易。三年来，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敲榨勒索从逐步升级转为迅速升级；他们把相互间推卸责任变成了

一种艺术。都想在波斯湾取得突出地位的两大对手——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特别擅长这一套。无论我们找其中哪一个国家，它都能提出令人信服的理由来说明另一个国家是罪魁祸首。如果听信我们对方的谈话，就会感到莫名其妙，不知道在大家都不愿提价的情况下价格怎么可能提高。事实上，石油输出国组织的重要成员国全部支持涨价。伊朗国王拥有比较严密的官僚机构和工作班子，能够制订一套复杂的、西方式的理论，把石油价格和代用燃料的边际成本联系起来。但是，他从来不用减产的办法来影响市场，原因之一是伊朗生产能力太小而国内需求又太大，所以无法使产量降低到影响世界石油价格的程度。

提出复杂的理论不是沙特阿拉伯的作风。它只是宣布对价格有重大影响的生产决定，让别人去说明这些决定的意义。究竟是不付诸行动的理论、还是没有理论的行动影响更大？搞形而上学的人可以永远争论不休。对于后来的事态发展来说，二者都是必要的条件。

严肃的分析家一致认为伊朗支持十二月提价并不是为了同美国发生冲突，而是因为十二月中旬伊朗石油在所谓现货市场、即自由市场上拍卖时，买方曾经出到每桶十六至十七美元这种空前未有的高价。^⑨ 伊朗国王得出结论，认为这证明官方标价——当时是每桶五点一二美元——太低了。他建议石油输出国组织把价格提高到十一点六五美元——他在这个组织中的全体伙伴都欣然同意。伊朗国王突如其来的积极性本身就令人惊讶；他过去从来不曾确定价格方面起过带头作用。^⑩ 他的产量确实也不足以使他起这样的作用。伊朗既没有参加阿拉伯禁运，也没有参加真正引起涨价的十月减产。当阿拉伯人硬行采取这些措施时，伊朗国王事实上曾经强调伊朗正开足马力生产石油以缓和供应短缺状况。他这样做并不是为了帮我们的忙，而是为了增加他自己的收入。尽

管如此，它的影响仍然有助于稳定市场。伊朗国王肯定力图最大限度地增加收入；他毫不留情地探索这种交易所能容忍的程度。但是他所利用的条件并不是他创造的，而是世界需求增加、美国过剩生产能力消失以及阿拉伯国家削减产量造成的。

伊朗国王最后成为这场戏里的坏蛋，部分原因是他在宣布涨价方面处于突出地位，虽然事实上涨价是石油输出国组织的一致决定。个人因素肯定是有的。由于从技术上说他是德黑兰会议的东道主，他可能情不自禁地成了带头羊。他或许是想获得国内民族主义者的赞赏。在中东战争期间，他曾向以色列供应石油，为我们的舰队提供燃料，迟至德黑兰会议开幕的前一天还在谴责禁运和减产，因此疏远了周围的阿拉伯国家。如果有机会表示他和阿拉伯邻国的团结，对他来说很可能是求之不得的。不管他出于什么动机，伊朗国王后来不得不为此蒙受耻辱，因为公众认为是他造成了石油价格爆炸，从而改变了经济和政治的历史——虽然他在创造石油涨价的条件方面起的作用比其他许多国家要小，也没有任何证据说明他的任何同事曾经认真反对过涨价（除了对受害者私下表示以外）。伊朗国王想显赫一时的虚荣心使他付出了很高的代价。

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所有成员国迅即表明，他们已经学会如何利用工业民主国家的政治分歧。为了阻止消费国形成统一阵线，也是为了报答那些同美国分道扬镳的国家，阿拉伯各国石油部长十二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五日在科威特开会考虑禁运和减产问题。人们曾经使我们产生期望，但这次会议的结果同我们的期望截然不同。对美国的禁运既未解除，也未缓和。形成对比的是：对欧洲（荷兰除外）和日本的石油限制放松了；原订一月实行的减产百分之五的决定取消了，代之以增产百分之十。这个决定是亚马尼宣布的。他说歧视美国是因为“站在阿拉伯人一边的国家同站在敌

人一边或保持中立的国家存在非常明显的区别”。虽然部长们注意到美国的立场“逐渐发生变化”，他们仍然决定对美国继续实行禁运，直到——用亚马尼的话来说——取得更大“成果”为止。

我们对这些决议的反应缺乏教科书上所说的政治家应有的克制和理性。我们感到几个星期来同阿拉伯各国领导人交换意见时受了欺骗。更使我们痛苦的是：这次大幅度提价完全出乎预料，而且在提价的同时还重申对美国的歧视性做法。

事实上，思想敏锐的亚马尼和他那机构复杂的政府并不像他们的言论所表示的那样毫不帮忙。扩大石油生产表面上仅使世界其他地方得益，实际上增加了世界市场的总供应量。负责在消费国之间分配石油的公司共同掌握的石油增加了；供应短缺状况得到缓和。在这种情况下，继续禁运只能引起不便，只能造成一种侮辱，并不能使我们受到很大伤害。但是当时看上去并不是这样。对负责争取和平的国家继续实行歧视，其象征意义是令人难以容忍的。此外，也没有任何条件可以减轻提价给经济造成的破坏性影响。

不出所料，亚马尼在同艾金斯谈话时，把造成这次灾祸的责任推给了科威特、阿布扎比和伊拉克，就像他上次把责任推给伊朗一样。但是结果毫无不同。十二月二十八日，尼克松给费萨尔写了一封态度非常生硬的信，警告说这些行动可能危及他们同美国的整个关系。尼克松说：

你知道我十分重视美国同阿拉伯世界、特别是同沙特阿拉伯的密切关系。但是，产油国采取的具有明显歧视性的行动可能一笔勾销美国决心在未来的日子里作出的有效贡献。因此我必须坦率地告诉你，立即终止针对美国的石油禁运和限产措施是绝对必要的。

同日，我用同样语气写信给萨卡夫，也对德黑兰宣布的“毫无道理的大幅度涨价”提出抗议：“我希望贵国政府了解，涨价对自由世界经济和货币体系的稳定造成的可以预料的灾难性影响同我们具有最深切的关系。”我们对埃及也采取了双管齐下的方针。十二月二十八日，尼克松和我都写信给萨达特，强调美国坚决要求“立即”结束禁运和限产，警告他说，在实行禁运的情况下美国将拒绝继续承担它的和平使命。前面我已经引用了我十二月二十九日写给伊朗国王的、强烈抗议涨价的信件。

价格爆炸进一步证明消费国的分歧使我们大家都处于易受伤害的境地。消费国必须团结一致。十二月二十九日，我向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爵士发出呼吁：

当然，决议是单方面做出的，根本没有同国际公司或消费国进行任何即使是装样子的谈判。此外，除非我们立即采取行动使整个过程纳入比较合理的轨道，否则明年春天看来很有可能进一步大幅度提高价格。

正是因为当时很有可能发生现在正在出现的事态，所以我曾建议成立能源行动小组。我们正为建立这样一个小组考虑可供讨论的方案，但是在回头同你讨论计划以前，我想对产油国最近的行动表示严重关切。消费国对这种局势束手无策似乎是不可思议的。

但是，欧洲的反应恰恰是束手无策。霍姆在答复中原则上同意消费国应当合作，但是怀疑是否需要为此建立常设机构。有些盟国认为科威特决议证明他们的方针是正确的；疏远美国使他们得到了明显的优惠待遇。

结束禁运

因此，在这一年年底，美国实际上是单枪匹马地在要求立即解除禁运。埃及和沙特阿拉伯都避免做出明确的答复，都说只要阿拉伯国家达成协议就立刻取消禁运。萨卡夫在十二月二十九日对我们反应的激烈程度表示惊异。萨达特则答应在西奈脱离接触后立刻到利雅得去亲自敦促产油国取消禁运。萨卡夫在十二月三十一日、后来又在一九七四年一月三日答应在埃及脱离接触后结束禁运，但是他暗示可能会提出其他条件。

我们明确表示我们并不是在祈求。我在一九七四年一月二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坚持说，继续实行禁运越来越不合适了。当记者问我美国可能采取什么反措施时，我仅仅指出，“目前”还没有打算采取“具体措施”——这是一种略带威胁性的说法。一月七日，国防部长施莱辛格公开提出可能对产油国实行报复的警告，在阿拉伯世界引起轩然大波，因为有些阿拉伯人似乎相信这样一种理论，即美国（和其他工业民主国家）在别人从经济上卡他们的脖子时只能忍气吞声，消极对待。我事前并不知道施莱辛格的讲话；他和我经常一起讨论战略问题，但是这次并没有事前协调我们的策略。尽管如此，他的讲话是有益的。因此我在一月十日招待记者时让这个威胁继续存在，虽然我表示希望情况不致使它有付诸实施的必要。我说：

哦，按照我的理解，施莱辛格部长是说明如果压力超过一定程度理论上可能出现的情况。假如我理解得不错的话，他也指出了现在还不到这种程度。

一月十一日午夜过后，我动身去进行穿梭外交——这次外交终于导致了埃以脱离接触协议。在那以后的几天和几个星期里，我们收到一连串令人莫名其妙的信息。一月十三日，我在谈判中途得到不祥的讯号。沙特阿拉伯最新的意见是：仅仅在西奈脱离接触是不够的。这样做会使以色列和阿拉伯部队之间出现一个非军事地带，事实上会加强以色列的军事地位。需要有“明确的证据”说明以色列将保证“毫不拖延地”作进一步的、大幅度的撤退，说明解决办法考虑到了巴勒斯坦人的权利。这个报道说明沙特阿拉伯人受到沉重的压力，此外还有什么含义就无法肯定了。因为萨达特仍然保持乐观。一月十四日，他在阿斯旺重申了他在西奈一旦脱离接触就去访问利雅得的诺言。他深信，他可以不晚于一月二十八日使禁运宣告结束。我警告他说：除非解除禁运，否则任何脱离接触协议也不会付诸实施。

在此期间，白宫也为埃以脱离接触问题取得迅速进展而十分兴奋。我在每天发给尼克松的报告中提到萨达特答应促使禁运早日结束，结果尼克松力图由白宫迅速宣布此事。因此，斯考克罗夫特一月十九日打电报警告我说，尼克松想在一月三十日电视转播他向国会发表国情咨文讲话时亲自在华盛顿宣布禁运结束。当沙特阿拉伯在激进派压力面前已经明显要变卦的时候，利雅得不大可能容许由美国来宣布它一直坚持必须由阿拉伯人来作出的决定。一月二十日，我从叙利亚给斯考克罗夫特发了一份措词激烈的电报：

根本不可能把解除石油禁运一事安排得使总统可以予以宣布。我们是在同十个阿拉伯国家打交道，其中六个属于激进派。这不应使任何人感到惊奇。

但是，我们采取各种手段希望促其实现的事态并没有像预料的那样迅速出现。费萨尔实际上使那些要求尚未得到满足、因此对帮助美国毫无兴趣的国家得到了否决权。叙利亚就是其中之一。一月二十一日，哈菲兹·阿萨德要求像为埃及那样为他使用石油武器；至少在叙利亚完成脱离接触以前应当保持禁运。

沙特阿拉伯不愿同美国对立；但是它的处境易受伤害，所以不敢冒险使自己在阿拉伯世界中陷入孤立。因此它摇摆的周期越来越短。举例来说，萨卡夫一月二十日通知艾金斯说：无论其他产油国采取什么行动，沙特阿拉伯都要解除禁运；这个决定将在一月二十二日阿拉伯石油部长在开罗举行会议以后随即宣布。然而在一月二十三日，费萨尔国王亲自告诉艾金斯，他还在设法使阿拉伯国家达成一致意见。在此期间，萨达特在周游阿拉伯世界后给我来了一封情绪低沉的信。尽管开罗非常卖力，他的“弟兄们”显然越来越把解除禁运同叙利亚战线脱离接触取得明确结果联系起来。沙特阿拉伯人继续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一月二十七日，萨卡夫还表示希望在尼克松发表国情咨文讲话以前能提供有利的答复。

但是，一月三十日来到了又过去了。美国报界关于尼克松将在国情咨文讲话中做出明确宣布的暗示没有成为事实。尼克松在电视中所能说的只是，据他了解，阿拉伯人即将开会“讨论”解除禁运问题——不一定就会解除。到二月三日，费萨尔承认失败；阿拉伯国家似乎一致认为，在叙利亚战线取得进展是结束禁运的条件之一。我们获悉布迈丁倾向于结束禁运，但阿萨德仍持顽固态度。

我们决心立即停止这种游戏，否则会危及我们的信誉。我们坚决要求履行已经作出的诺言，并且十分明确地转达了这个决定。

尼克松给费萨尔去了一封措辞尖锐的信，实际上是说我们受骗了。我们不会接受强加于我们的新条件；如果禁运继续生效，我们就不再为叙利亚脱离接触而努力。我们甚至暗示我们可能公布

沙特阿拉伯原来的诺言。对这个暗示，萨卡夫的反应是冷静的（也是正确的）：在那种情况下，他将透露我们在提出要求时考虑的经常是尼克松的国内需要，而不止是美国的国家利益。这件事突出地说明水门事件已经使我们处于何等屈辱的地位。

我给萨达特、阿萨德和布迈丁都发去了措词严厉的信。如果阿拉伯产油国认真对待我们，如果他们相信他们自己所说的话，即为了使以色列撤退就不能没有美国，那么现在责任就在另一方了；必须设法结束禁运的是他们，而不是我们。

我们的信件很快就使阿拉伯发出的信息产生了微妙的变化。几个月来，阿拉伯产油国一直在开会，提出越来越蛮不讲理的条件，一心认为他们是不会受到惩罚的。但是当美国感情激动起来时，他们就改变了主意，不再谈进一步削减产量的问题——直到不久以前这还是他们反复提出的威胁。如果石油产量保持稳定，禁运的影响是可以估量的，其主要意义只是说明他们能够单方面施加压力。我们则决定抵制这种压力。从这时起，他们没有再提新的重要政治条件。来自阿拉伯的信件现在几乎全部谈的是解除禁运的策略问题。

二月六日，费萨尔再次对艾金斯说，他正在设法使阿拉伯国家（实际上是指叙利亚）同意结束禁运。第二天，萨卡夫奉命前往叙利亚，建议于二月十二日至十三日在阿斯旺召开有费萨尔、萨达特、布迈丁和阿萨德参加的阿拉伯小型首脑会议。阿萨德勉强同意开会，但是拒绝去埃及。无论会议地点何在，他对于等待着他的情况几乎不可能存在怀疑。他的兄弟们会敦促他默然同意解除禁运；他可以拖延时间，但不可能无限期地坚持下去。叙利亚在谈判脱离接触问题时，用不上石油武器了。

二月九日，阿萨德在给我复信时含糊其词地说石油问题具有泛阿拉伯性质。他抱怨说，叙利亚尚未取得任何实际成果使它可

以改变态度。这似乎是要求——几乎是恳求——我们使叙利亚参加谈判过程，为它提供改变立场的某种借口。我们也有许多理由要这样做。阿拉伯世界的天平开始微妙地偏向采取温和态度的方向。

二月十一日，萨达特建议把小型首脑会议的地点改在阿尔及尔。这是一个精明的建议。正在同美国恢复关系的布迈丁在自己的首都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少可能坚持继续禁运。他作为叙利亚的“激进派”伙伴，也是叙利亚最亲密的支持者。二月十二日，布迈丁写信给我证实了这种判断：他将为解除禁运而努力；他希望美国避免采取可能破坏气氛的任何行动或发表任何这种声明。

阿拉伯小型首脑会议提出了一个保全面子的方案：我应当在二月份对该地区进行探索性访问，为叙利亚脱离接触铺平道路。这是容易同意的。一个月后，石油禁运就宣告结束。（这次访问的情况将在第二十一章加以叙述。）

我们渡过了一个困难时期，并没有屈服于压力。由于禁运结束在望，我们已经证明，我们是能够顶住被人们吹得天花乱坠的石油武器的。我们盟国的惊惶失措情绪现在可以有所缓和了。

但是我们不能产生幻想；成就只是暂时的，胜利主要是策略性的。基本市场条件依然如故。民主国家的经济危机还仅仅是开始。政治和社会后果还只是略现端倪。我们仍然面临工业民主国家是否能够以及如何重新掌握自己的共同命运的问题。我们转过来就要解决这个问题。

① 美国负责进口控制的内阁特别小组：《石油进口问题：关于石油进口与国家安全关系的报告》，一九七〇年二月，第一二四——一二五页。

② 约翰·M·布莱尔：《控制石油》（纽约：最佳图书公司，一九七八年版），第二一五页。

③ 克劳弗德·D·古德温编：《能源政策展望：今天的问题与昨天的解决办法》（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布鲁金斯学会，一九八一年版），表 A-4，第六九四页。

④ 见戴维·D·纽塞姆：《我们的军火库必须包括我们的价值观念》，载《华盛顿明星报》，一九八一年四月二日，并见其他材料。在卡扎菲接管时，纽塞姆是负责与利比亚关系的助理国务卿。

⑤ 布莱尔：《控制石油》，第二二一页开始。

⑥ 例如白宫能源专家、后来担任驻沙特阿拉伯大使的詹姆斯·E·艾金斯在一九七三年至少两次（其中一次是十月战争期间）劝各石油公司敦促沙特阿拉伯把石油政策同“令人满意地”改变美国对阿以争端政策挂上钩。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多国石油公司与美国外交政策——多国公司小组委员会的报告》，第九十三届国会第二次会议，一九七五年一月二日，第一四三页。

⑦ 见《纽约时报》，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⑧ 这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新闻节目《六十分钟》一九八〇年五月四日播出的一个片断——《基辛格与伊朗国王的联系》——以及杰克·安德森在《华盛顿邮报》大量发表的专栏文章（例如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五日、十日和二十六日的文章）提出的幼稚而浅薄的论断。另见让-雅克·塞尔文-施赖伯：《世界性挑战》（纽约：西蒙-舒斯特联合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第五十一——五十六页和第六十五——七十页所做的甚至更虚伪的叙述。

⑨ 美国参议院：《多国石油公司与美国外交政策》，第一五〇页；伊迪斯·彭罗斯：《危机的发展》，见雷蒙德·弗农等著《石油危机展望》，《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刊》，第一〇四卷，第四期（一九七五年秋季出版），第五十一页。另见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对历史负责》（纽约：斯坦-戴伊出版公司，一九八〇年版），第九十七页。

⑩ 布莱尔：《控制石油》，第二六四页。

第二十章

能源与民主国家

能源战略

制定长远的能源战略首先需要工业民主国家建立统一阵线。我们知道我们的盟国不愿采取对付产油国的共同谈判立场。尽管如此，即使只是加强消费国之间可以做到的努力也会大大改善他们讨价还价的地位。在节约能源、发展代用能源以及在紧急状态下分享石油等方面进行合作就会改变市场条件，从而改变谈判中的力量对比。

在所有民主国家中，美国对进口石油的依赖最小，而经济实力最强。因此，我们认为自己最有条件起带头作用，提出符合共同利益的建议。我们希望这次危机的现实使我们可以不至于碰到在欧洲年那种比较抽象的活动中出现的种种模棱两可、支吾推诿的情况。

尽管过去的努力碰了钉子，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我在伦敦移民协会发表演说时（见第十六章）又做了一次尝试。我说，实行能源合作并不是要盟国帮我们的忙；在工业民主国家当中，美国最有条件单独干。但是，由一个国家单枪匹马地干必然是自取失败。因此，我建议工业民主国家成立能源行动小组——实际上就是建立消费国集团来促进代用能源的发展，促进节约能源，并同产油国进行谈判。我说：

我们必须记住造成能源危机的更深一层的原因：危机不仅是阿以战争的产物；它是世界需求出现爆炸性增长超过了促进供应的刺激因素的必然后果。中东战争使慢性危机尖锐化了，但是危机总是要发生的。即使恢复到战前生产水平，也还有使世界石油生产水平赶上消费水平的问题。

从长远来说，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是做出巨大努力使产油国有增加供应的积极性，鼓励消费国更合理地使用现有能源，并且发展代用能源。

这是美国非常难以单独对付、而欧洲则根本无法单独对付的挑战。我们强烈希望大家共同努力——欧洲也有此需要。

为此目的，美国建议欧洲各国、北美和日本建立一个由有声望的高级人士组成的能源行动小组，授权它在三个月之内制定一个初步行动纲领，目的是在涉及能源问题的一切领域内实行合作。至于九国集团是否宁愿作为欧洲共同体参加，将由它的成员国自行决定。

欧洲的反应是矛盾的。报界对讲话的评价大部分是好的。但是各国政府随即发出了种种不协调的声音，都不那么赞成采取行动。因为大多数国家只是在有限的技术意义上相信能源合作：利用美国技术发展代用能源，在紧急状态下分享我们越来越紧张的供应。但是他们并不想采取一致的外交行动，认为力图联合就会“激使”产油国进行报复。这种情况最突出地说明，民主国家的士气已经涣散到了束手待毙的程度。他们认为产油国组织卡特尔是可以接受的，而消费国组织起来则太危险。经济落后、人口加起来也不过五千万左右的产油国现在实际上是在讹诈共有十亿人口的先进工业社会，不仅专横地决定贸易条件，而且强行规定政治关系的轮廓。

十二月二十日，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在巴黎明确地表示了这样的意见。他对我说，法国丝毫也不想冒切断石油供应的风险；它不会参加任何可能造成对抗的集团或政策：

如果我们谈的是消费国和生产国之间的对话，我们可以讨论这种对话的

方式而不致引起任何问题。但是，如果要建立试图把解决办法强加于生产国的消费国集团，我则无法同意。你们只靠阿拉伯人提供你们消费量的十分之一左右，我们则完全依靠他们。如果要我们在长达三、四年的烦恼和痛苦中等待阿拉伯人理解这个问题，这是我们无法忍受的。在任何条件下我都无法接受使我们不得不放弃阿拉伯石油的状况，即使只放弃一年也不行。

但是，如果参加谈判的一方不能冒谈判失败——一种最温和的对抗形式——的风险，那就只能在各种不同的迁就方式中进行选择了。从根本上说，我们的多数盟国都深信迁就阿拉伯人的政治要求比建立统一阵线来抵抗压力更能保证他们的石油供应。

他们采取的唯一具体行动不是对我在移民协会的讲话作出反应，而是再次设法博得产油国的好感。十二月十四日至十五日欧洲共同体在哥本哈根举行首脑会议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怪事：一批阿拉伯外交部长据说是“出乎意料地”出现在那里进行游说，要求对以色列施加压力。如果向我们提供的说法是可信的话，那一定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一个由外交部长组成的代表团不经邀请就出席另一大陆的首脑会议。我们不了解这次“意外的”访问是谁策划的；我们怀疑是若贝尔，但是如果他没有得到大多数同事的默许，这件事显然也不可能发生。

我们一提出能源合作的建议就碰到了障碍，和过去曾经使我们争取欧洲团结的努力遭受挫折的障碍基本相同。若贝尔——很可能还有蓬皮杜——根本不愿参加美国可能在其中发挥决定性影响、其目的是阻止单独提出创议的任何集团。这既是一种信念，也是一种权术。我们的一些盟国利用禁运同产油国搞双边交易——大部分是用武器换石油。其中法国起了带头作用。在所谓欧洲—阿拉伯对话中，法国也是急先锋。欧洲想用这种对话代替我们的中东外交，其理论基础虽然从来没有明确说明，但只能是和

美国脱离关系。

十二月十七日石油输出国组织作出决定以后，若贝尔在十二月二十八日给我写信，接受了消费国合作的原则，但是他的解释使各国根本不能在讨价还价时保持一致。这也毫不奇怪，因为他当时正在积极促使法国和中东产油国进行双边石油交易。他把我称为“国务卿先生和亲爱的朋友”，开玩笑地要去掉我这篇移民协会演说的锋芒。他说，他的建议或许会使我制定的计划复杂化，但是他相信这些建议可能有助于计划的实现。“复杂化”这个词用得~~不~~当；“破坏”一词则比较合适。

若贝尔提出了一个多层次方案。欧洲、美国、加拿大和日本应当独立自主地制定各自的能源政策，分别处理他们同产油国的关系。其次，他们可以在深海钻探、煤的气化等等需要高级技术的计划方面进行合作。第三，所有工业民主国家都可以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从马歇尔计划组织演变而来、由主要工业国家组成的一个松散的、并非以采取决定性行动或迅速行动闻名的集团——的范围内就节约能源以及类似问题合作。最后，消费国要同生产国举行专门讨论能源问题的世界会议，为举行更广泛地讨论原料问题的会议进行准备，而在会议上消费国不是作为一个整体、而是基本上在双边基础上同生产国打交道。

若贝尔方案的用意虽然巧妙，但是过分明显。他既想得到美国的先进技术，又把其他一切问题推给一个难以运转的讲坛，使每一个消费国都可以有自行其是的自由——而且不得不自行其是。此外，无组织的消费国面临的对象不是个别生产国，而是石油输出国组织。照我们看来，法国的建议将使工业民主国家的弱点通过条文固定下来，而不是克服这种弱点。

法国人和赞成欧洲—阿拉伯对话的其他领导人极力否认他们有任何政治目的或排他性动机。但是他们在准备提出建议时讳莫

如深，而且拒绝向我们通报建议的内容，都说明情况同他们讲的并不一样。当然，我们逐渐也获悉了建议的范围和含义——通常是友好国家的外交官背着其他盟国、有时还背着他们自己的上级告诉我们的。举例来说，一月十日至十一日欧洲共同体的政治司长（各国外交部的高级官员）在波恩开会时，法国建议欧洲—阿拉伯对话从专家级开始，以外长会议结束。这个建议本身就证明他们的目的不可能像他们对我们宣传的那样仅限于技术和文化交流。一月三十日，我下令向我国驻欧使团发出指示，着重指出：

协商是有来有往的。在成员国就中东问题发起重大倡议之前，我们期望他们会尽力作出安排，使我们事前进行协商，避免出现政策分歧的可能性……

二月一日，欧洲共同体的中东问题专家举行会议。当有人提出向美国通报情况的问题时，主持会议的西德代表说已经把总的建议和原则告诉了美国。非官方透露的消息已经引起我们注意，从这个意义上说，他这种说法是对的；这些透露很难说为严肃的讨论提供了基础，这种做法也是令人感到屈辱的。

二月六日至七日，政治司长又举行会议，基本上通过了法国的建议，即欧洲—阿拉伯对话将导致外长会议。从来没有人把这个决定正式通知我们；事实上，当有人建议德国外交部长沃尔特·谢尔以部长理事会主席身分向我通报情况时，这个建议由于法国阻挠而未获通过。

我们并不反对欧洲—阿拉伯对话；对话本身是自然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使我们感觉不舒服的既有程序方面的问题，也有实质性问题。我们的盟国毫不犹豫地利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协商程序来了解美国的政策；与此同时，在共同体做出不可改变的决议之前，他们却避免同我们讨论这些决定，办法是把它们纳入需要全体

盟国事前同意的曲折复杂的新程序中去。这个过程虽然令人恼火，但如果仅用来处理大西洋关系，造成的损失不过是使我们无法获得新的起点。但是，在中东处于沸腾状态时，欧洲关于举行外长会议的倡议就有破坏我们精心制定的战略的危险。我们正在一步一步前进；欧洲共同体却公开要求全面解决。我们同中东各主要方面是分别打交道的；欧洲人的目标却是举行把所有阿拉伯国家包罗在内的秘密会议——我深信这种会议将使激进派得到支配地位。正如我二月初对英国外交大臣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爵士所说的：

我只是希望你了解，一旦所有阿拉伯国家——包括温和派和激进派——聚在一起，就会产生最不幸的后果。这种聚会必然促使激进派发表极端的声明，而温和派很难加以抗拒，从而立刻对欧洲领导人产生压力，要他们同意阿拉伯激进派方案中的每一项要求。其次，他们会把所有问题都纠缠在一起，这必然对我们的政治谈判产生消极影响。萨达特曾经告诉我们，对付这种局面的唯一办法是一个一个问题地解决……如果你们按照欧洲共同体这个倡议干，必然会把事情搞乱，那时我们将不得不插手进来，收拾残局。

此外，法国鼓吹同阿拉伯人对话显然是为了取代消费国一致对付产油国的建议。甚至那些对我们的方针并不像法国人那样持敌视态度的欧洲领导人也想把双方的立场各采纳一部分，借以减轻来自对立双方的压力。结果他们只好一直保持矛盾的态度。欧洲几乎没有什么国家完全同意法国的意见，但是——同欧洲年的情况一样——谁也不愿意发生对抗。另一方面，也没有任何国家想引起我们的恶感。因此，大多数国家原则上都承认消费国应当合作，但又试图加以解释，使它不至排除法国主张的独立自主方针。朝一端每走一步就要扭过头来朝另一端走一步，以作为补偿。

一月初，许多欧洲领导人——虽然不包括法国——开始向某种能源合作靠拢。与此同时，欧洲委员会又告诫人们，在处理能源问题时不得削弱“共同体为证明其存在和意义而希望显示的政治团结”——明显地是捅我们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面前隐约出现了曾使欧洲年受挫的那种无穷无尽的、梦魇式的程序问题，而这次涉及的问题不仅会把我们的前途当作抵押品，而且威胁到当前的局面。由于这个理由，我们决定把矛盾揭开，因此在一九七四年一月九日正式以总统名义邀请各国于二月初到华盛顿参加能源会议。联邦能源署署长威廉·西蒙和我在一月十日联合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要开能源会议，着重指出消费国迫切需要对形势作出共同分析并制定共同战略。我说：

就消费国而言，能源形势和它预示的前景将考验我们二十五年来对待发展中国家……对待国际体系的整个态度……

人们认为今天的世界确实是相互依赖的；孤立和采取自私自利的态度必然会给一切有关国家带来毁灭性后果。这种论点也将受到考验。

为了防止在谁代表欧洲发言这个问题上无休止地玩弄程序性花招，我们对民主世界的主要能源消费国是分别发出邀请的——首先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能源委员会的成员。我们也请欧洲共同体另派代表参加并自行决定它将在什么水平上参加会议。*这样一来我们就可看出我们是否会再次面临坚持欧洲各国只能通过一名接受指示的代表同我们谈话的局面，看出这次会议主题的重

* 受到邀请的国家是：加拿大、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意大利、日本、荷兰、挪威和联合王国。给欧洲共同体的邀请信寄给了当时按照顺序充当共同体主席的西德总理维利·勃兰特。我们也邀请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秘书长乔恩基尔·埃米尔·范伦内普。

要性是否会导致比较自然的磋商方式。

我们的盟国都不大想开消费国会议，态度从无可奈何到表示勉强，不一而足。但是，通过明知不会产生多大影响的声明在中东外交上同我们分道扬镳是一回事，在能源问题上公开宣扬同美国这样一个伙伴脱离关系则是另一回事了。因为如果这个伙伴要搞双边交易，它讨价还价的地位比他们要强得多；如果出现大规模切断供应的情况，他们在无可奈何时还需要这个伙伴提供石油。正如一月八日我在国务院工作人员会议上所说：

欧洲人必须了解：我们认为使任何集团或地区都无法获得特殊利益的多边解决办法符合共同的利益，因为我们认为，使你的邻居沦为乞丐会使我们大家都受到伤害。因此，我们准备按照一个真正合作的方案同他们一道工作，尽管为了世界的安定我们很可能要比他们做更多的贡献。但是他们还得了解，我们在任何情况下也不会使他们有自由进行双边交易的余地。如果他们不愿在多边基础上工作，我们就自己搞双边谈判，借以对他们施加压力。如果我们搞双边活动，我想在多数领域中我们都能够走在他们前面。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在双边活动中输给他们。

在整个一月份，我们都在对付来自英国、联邦共和国和一些比较小的国家的使者。这些使者试图做一些无法做到的事：他们既想在足够的程度上使我们得到我们所建议的东西、借以维护大西洋团结，又想满足一心要明确欧洲特性的法国的要求，还想同我们疏远、借以博取产油国的欢心，以免能源供应中断。日本人也明显表现出左右为难的情绪——一方面承认消费国需要进行有效的合作，另一方面又害怕同产油国对抗。日本和英国的首相以及西德总理都在一周内复信接受尼克松的邀请。他们对建立永久性的消费国集团表示十分勉强，认为这种集团是“挑衅性的”——尽管产

油国在成立石油输出国组织时从来也没有同消费国商量，而且以作为一个集团采取行动而感到自豪。每个领导人都明确表示希望早日想出办法使产油国参加消费国会议的工作——这几乎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说法。人们要尽了各种花招，都是为了规避唯一比较有意义的解决办法，即建立表现消费国团结的永久性组织。带头同我们合作的英国人也不过建议由各国驻华盛顿大使成立“联系小组”，以协调在现有体制下进行的工作。其他任何盟国都不敢说到如此具体的程度。但是大使小组只能起麻痹作用，不能解决问题。大使们每次开会都需要得到指示，也缺乏认真进行工作的班子。这种机构开过几次会以后就会被抛到一边去。二月十一日，我对亚历克·霍姆说，这个问题既涉及道义，也涉及政治。我说：

我们应当建立某种机构，使我们可以为消费国制定共同方针。我们有此需要。其次，拥有三千万人口的生产国似乎已聚在一起，确立了他们自己的立场。他们成立了卡特尔。为什么他们竟能对拥有八亿人口的消费国发号施令呢？为什么我们竟认为消费国就不应当会谈呢？这个地区占重要地位的国家是伊朗和沙特阿拉伯。这两个国家都完全依靠美国的政治支持。为什么欧洲竟不愿在能源领域中利用美国这种政治力量呢？我们现在有机会从道义上证明西方如果愿意团结就可以做到什么事情，证明西方是不可能任人摆布的。我们必须认识这是共同的问题，我们必须努力求得共同的解决。

就能源问题而言，欧洲各国这时并不想把自己的前途托付给一名代表统一的欧洲的指派代表。欧洲共同体将以某种形式参加会议，但是接到邀请的各国自己的外交部长也要出席。共同体里面没有得到邀请的四个缺乏能源的国家也坚持要派自己的外交部长来。*总之，能源问题不同于大西洋联盟问题，它使我们能够在同

* 最后参加会议的十三个国家是：比利时、加拿大、丹麦、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爱尔兰、意大利、日本、卢森堡、荷兰、挪威、联合王国以及美国。

一讲坛上既同各盟国政府、又和共同体打交道。

只有一个盟国不曾感到左右为难。一月十八日，米歇尔·若贝尔又给我写了一封用“亲爱的朋友”开头的信。他反对在华盛顿开会，反对由外交部长开会，反对消费国坐在一起，反对邀请日本，也反对向欧洲共同体发出邀请的方式。从统计数字上看，一个严肃认真的政府发出的一份文件出现象他指摘我们的邀请信那样多的错误是不大可能的。尽管如此，他还是惠然提出了一个替代性建议：法国希望尽快召开联合国能源会议，其理论是这种会议可能使生产国、消费国和发展中国家的立场有所软化。若贝尔避而不谈的是：在有一百五十个国家出席的联合国会议上，石油输出国组织将采取团结一致的立场，消费国则四分五裂。发展中国家或者受到价格让步和经济援助等含糊其词的诺言收买，或者是出于对“第三世界”的坚定不移的忠诚，无疑会站在生产国一边。共产主义国家将兴高采烈地观看西方狼狈不堪的处境并予以利用。美国将陷入孤立。若贝尔在信件结尾又采用了他那自相矛盾的方式：要我既相信法国对能源问题感到关切，又相信他对我们关于二月会议的邀请感到意外，“最重要的”是还要相信他“坚贞不渝的友谊”。

一月二十一日，我国驻巴黎大使馆报告说，法国对我们要求召开能源会议的建议“缺乏热情到了接近敌视的程度”。一月二十四日，蓬皮杜宣称：

我们必须交谈；生产国和消费国必须相互了解。因此，他们必须会晤。我们愿意进行双边会晤，例如在欧洲范围内同阿拉伯生产国集团会晤，在世界范围内举行富有的消费国和贫穷的消费国之间的会晤——因为有些重要的消费国是穷国，他们已经由于当前形势而遭受严重打击……①

总之，法国愿意同任何国家会谈，就是不愿同美国在有盟国参加的任何讲坛上会谈。尽管如此，我们的盟国一个个都接受了尼克松的邀请。法国的答复是派若贝尔前往叙利亚、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伊拉克，对美国的政策发动直接挑战。他在那里试图在国家对国家的基础上用货物换取石油，从而默认了价格方面的敲榨。他还怂恿阿拉伯激进派反对美国调解。在巴格达，他告诫人们不要搞“临时解决办法”——言外之意也就是反对刚刚达成的埃以脱离接触协议。“掌握着钥匙的手为什么转动得如此之慢呢？”他嘲弄美国政策说。同时，他还谴责华盛顿能源会议是对阿拉伯人玩弄“政治”手腕；他说，它不会是另一次维也纳会议*——这既挖苦了我的学术著作，又暗示华盛顿能源会议不会有什么持久的成果（在造成这种结果方面，若贝尔处于很有利的地位）。当他还在巴格达时，他又对一名叙利亚记者谈到这个问题，并对叙利亚人“巩固前线的军事地位以应付任何不测事件”的手腕表示赞扬——当我们开始为戈兰高地脱离接触而努力时，这很难说是在劝叙利亚采取温和态度。如果我们认为这种策略不仅会损害我们自己的利益，而且从长远看还会损害其他工业民主国家的利益，人们可能不会责备我们——因为如果阿拉伯世界认真看待这种策略，就可能使中东陷入一场法国无法控制的危机。

直到会议开幕的五天前，法国一直保持沉默。然后，在法国内阁二月六日开会以后，一位发言人宣布若贝尔将参加会议。他说：

* 这里指的是拿破仑垮台后反法联盟主要国家在维也纳召开的会议，其目的是重新分割欧洲领土和掠夺殖民地。恩格斯在《德国状况》一文中曾称之为“分配赃物和奖金”的大会。会议于一八一四年十月一日开始，次年六月九日结束。不久以后，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又缔结“神圣同盟”。基辛格写的《重建的世界——拿破仑之后的欧洲：革命时代中的保守主义政治》一书就是研究这个时期的历史。他特别崇拜当时在维也纳会议和“神圣同盟”中起主要作用的奥地利外交大臣（后任宰相）的梅特涅，特别是他的“均势”思想。——译者

除了礼貌考虑以外，我国参加这次会议是为了满足使欧洲可以采取共同立场的愿望。法国虽然愿意就能源问题的各个不同方面同其他国家交换意见，但它将无法赞成建立一个独立于其他消费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以及生产国之外的、由消费石油的工业国家单独组成的机构。

蓬皮杜是在内阁决定已经公开宣布以后才通过一份简短的电报把这个决定正式通知白宫的。这种程序是史无前例的，对一个亲密的盟国则是一种特殊的侮辱。法国总统在电报中没有做任何个人的解释。

使人惊奇的不仅是程序。法国的声明还明确反对举行这次会议的基本概念。按照声明的说法，他们派若贝尔来开会是由于“礼貌”；若贝尔无权同意建立任何消费国组织；他唯一的权力是就“能源问题的各个不同方面”交换意见——似乎这次会议是一次科学讨论会，是不能做出决定的。法国明确宣布参加会议的目的不是为了达到任何具体目标，而是“使欧洲可以采取共同立场”——按照法国观点，这就是说，巴黎打算在欧洲共同体内部、从而也对会议的结果行使否决权。

从欧洲共同体部长理事会二月五日——即法国内阁决议的前一天（或许是作为若贝尔参加的条件）——在布鲁塞尔做出的决定中可以看出，法国究竟想把自己的欧洲伙伴推向何方，法国观点在多大程度上开始占上风。九国外长指定部长理事会主席、西德外长沃尔特·谢尔和共同体委员会主席弗朗索瓦·泽维尔·奥托利担任共同体的代表。他们的指示是：绝对避免同产油国对抗；反对建立新的消费国常设机构；鼓励立即同生产国对话；把有关能源的全部工作交给现存国际组织去做。

这并不是我们设想的会议目的。各种迹象都难以令人感到鼓舞。

部长的会晤

华盛顿能源会议开得稀奇古怪。它是盟国之间的会议，但有点鸿门宴的味道。会议的目的是促进消费国的团结，但拐来拐去却走上了曾经使大西洋对话拖延一年之久的讲究仪式的羊肠小道。我们发现自己再次被迫卷入并不是我们挑起的对抗中去。我们本来万分愿意以互让的精神同一个统一的欧洲打交道；保留分歧的余地肯定是有的。然而若贝尔提出的挑战远不止此。他想利用能源问题——就象利用欧洲年问题一样——为一个由法国领导、并且同美国对立的欧洲确立自己的特性。法国人说我们的倡议是企图利用能源危机来扩大我们在大西洋地区的影响，并以此为理由同我们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他们还奇怪地声称从我们邀请日本一事中看到了证据。照他们看来，这似乎是重新提出他们曾经进行激烈的后卫战来抵制的大西洋宣言的概念。

工业民主国家面临着某些共同问题——这无疑是我们两次倡议的基本前提。但是欧洲年的目的是重申道义原则，以便正视尚未发生的问题，而能源会议的目的却是克服迫在眉睫的显而易见的危险。讨论抽象的宣言时就进行磋商的方法发生争论是一回事；担心使大西洋团结制度化会淹没欧洲特性也还有某些道理——尽管如此，若贝尔也是把一个正当的理论观点夸大到了异乎寻常的程度。但是能源危机是不分地域的。通过消费国团结来对付能源危机并不是理论上喜欢不喜欢的问题，而是恢复世界能源市场平衡的唯一可行的办法，对欧洲（以及法国）的真正利益很可能甚至比对我们的利益更为重要。

二月六日，我在华盛顿的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俱乐部讲话时再次阐述了我们的目标：

我们认为，占世界能源消费量和进口量百分之八十五的国家必须首先会晤，因为他们面临巨大的共同问题，只有和衷共济才能加以解决；如果企图单方面解决则必然导致共同毁灭……

如果每一个国家都采取以邻为壑的方针，世界经济必然陷入崩溃，战后发展起来的整个世界合作体制将处于危险境地。

从二月九日那个周末开始，参加能源会议的各国外长陆续到达。我们同他们谈的也是这个问题。我在结束埃及方面的穿梭外交以后用了将近三周的时间同一个核心小组一起不停地做准备。参加小组的同事有财政部长乔治·P·舒尔茨、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阿瑟·伯恩斯、联邦能源署署长威廉·西蒙以及负责安全援助的副国务卿威廉·唐纳森。*我们拟定了一个能源合作方案，其中列举了七项任务：节约能源；代用能源；研究与发展；紧急状态时分享能源；国际财政合作；帮助较穷的发展中国家；消费国与生产国的关系。我们想为消费国提供一个完整的、考虑周到的战略提纲，使他们深信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就可以掌握自己的前途。我在一月份举行的一次计划会议上说：

我们需要驱散能源问题上的迷雾。这就是说，我们必须把事实告诉欧洲人和日本人。如果我们能够让他们看到形势并不是一团糟、而是可以驾驭的，他们无需争先恐后地去搞双边交易，我们的合作方针符合他们最大的利益，那么我们这次努力就会得到成功。

* 会议期间，戴维·布鲁斯大使也参加了核心小组。还有一个以赫尔穆特·索南费尔特和温斯顿·洛德为首的工作小组准备工作文件，草拟讲话初稿，并为会议服务。工作小组成员包括比尔·唐纳森、阿瑟·哈特曼（负责欧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班子的代表查尔斯·库珀。

由唐纳森率领的一个代表团会前到各国首都去讨论过这个提纲；二月十日，星期天，我们又同主要的部长举行了一系列双边会议，向他们提供了一个经过充实的蓝本。

那天一开始，我就同以西德外长和欧洲共同体部长理事会主席双重身分参加会议的沃尔特·谢尔共进早餐。我告诉他：对于我们来说，这次会议将考验我们是否可能建立合作的世界秩序。我们不愿参与制造混乱，用漂亮的词藻掩盖失败。我们宁愿公开分歧并承担政治后果——几乎是不加掩饰地威胁——也要指出这一次可不能肆意坚持己见了。谢尔并不企图为布鲁塞尔外长会议决议的实质进行辩解。他把责任完全推到若贝尔身上，认为必须给法国“某种甜头”才能使它留在共同体内。他说：

我们观察欧洲的形势，发现自己处境困难。法国人似乎总是从最不符合他们利益的立场出发。他们曾经孤立于各国之外，独自漂泊，现在又想独自捞取经济利益。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例子。我们知道这种做法最后会导致混乱，而这正是我们力图防止的。我们各国政府里都有些政客急于防止法国人脱离共同体。

谢尔想知道我们是否可以使会议暂不做出决定，等欧洲各国外长几天以后再次开会。那时他们可以采取一致同意的立场，看上去好象是欧洲在采取主动；这将维持法国人的威信。我说，如果充分保证共同体一定会采纳会议的一致意见，这个办法是可以接受的。谢尔悲哀地承认，他无法作出这种保证。在这种情况下，我无法同意推迟做出决定的时间。

下一个问题是消费国应否建立常设能源机构。谢尔警告说，任何这样的企图都会遭到法国的激烈反对。我回答说，我并不在乎消费国用什么名义进行合作；会议产生的任何委员会究竟是叫

临时委员会还是叫常设委员会，我们不会加以争论；我们概括的七项任务中，有的任务可以交给现有的机构去办。例如国际财政合作以及较穷的发展中国家问题肯定属于这种情况。其他是新问题，需要专门的工作小组和某种协调机构；如果这种做法有助于维护法国的荣誉，我们可以把这些小组置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主持之下（法国已经是这个组织的成员），虽然他和我都了解这不会产生实质性变化。谢尔给我的印象是：如果我把这整个计划置诸脑后，他离开华盛顿时也不会感到伤心。同时，几乎毫无疑问的是，他即使没有看出我们的论据是如何有力，至少也看到了现实的局面。欧洲根本无法拒绝消费国团结，否则再出现紧急状况时它就会处于毫无保护的地位。归根结底，德国不敢创立在危机中孤立行动的先例；因此它会同我们站在一起。这次谈话的意义首先在于：它说明几天以前在法国影响下在布鲁塞尔达成的协议在能源会议上并没有得到其他欧洲人的热烈支持。欧洲共同体部长理事会的这位主席透露，他的同事们想对他们得到的指示做不同于字面的解释；然后他们将想办法退却，并为他们所做的正确的事情对法国给以补偿。

继谢尔之后，我又会见了加拿大外交部长米切尔·夏普，与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共进午餐，同欧洲委员会主席奥托利会谈，第二天早晨又同亚历克·霍姆共进早餐。他们都证实了我的判断，即我们处于安全可靠的位置；如果摊牌，遭到孤立的不会是我们。当然，合作精神远远没有达到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度。同我会谈的每一个部长对于可能和生产国发生对抗仍然怕得要命。从他们谈话的语气中，根本看不出生产国刚把石油价格提高了三倍、大大削减了生产、并且作为政治武器强行实施了有选择的禁运。如果这不是硬要同我们对抗，我们的字典就需要修改了。

在我们建议的实际措施中，至少有些措施——紧急状况下分

享石油、节约能源、联合发展代用能源——是没有风险的；无论消费国对生产国采取什么态度，是胆小如鼠还是勇敢顽强，这些措施都会加强他们讨价还价的地位。人们承认我们并不是在捍卫任何狭隘意义上的美国利益；这是若贝尔致命的弱点。在参加会议的所有国家当中，我们最有力量单干。但是，如果一切有关国家都不得不拾人牙慧或乞哀告怜，这样的世界不符合我们关于进步或正义的概念。

在二月十一日上午会议正式开幕以前还有两次关键性谈话。第一次是二月十日，星期日，晚上七点左右同我喜欢的老朋友、当时担任德国财政部长的赫尔穆特·施密特的谈话。二十年前我访问联邦共和国时就曾会见过他。人们是把他作为一个富有前途的青年介绍给我的。当时，他给我的印象是为人傲慢、坚强而又很有才智。后来我们一直保持接触。我逐渐了解那种有点盛气凌人的态度是一位文雅、甚至多情善感的人保护自己的手法；他不得不突出自己的理解和分析能力，以免感情失去控制。我们的友谊很快就超越了命运强加于我们的任务。我们两人都明白，为自己的国家服务不是要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而是寻求符合双方信念的解决办法。我对于施密特作为总理的评价将另行说明。那天晚上，当华盛顿暮霭四合时，我们在国务院我那间可以望见林肯纪念碑的洞穴似的办公室里反复思考。我对施密特说，我担心美国的权力危机可能暴露无遗，以至任何外交技巧都无法使我们免于灾难。如果我们冒险放弃自己扮演的角色，我也不认为其他国家有能力来填补空缺。西方现在开始像古希腊的城邦那样行事，由于过分任性而失去了灵感。即将开幕的会议将成为我们衰亡的象征，幸运的话也可能成为转折点。

施密特在国内有他自己的政治危机，因为维利·勃兰特总理对事态开始失去控制。但是施密特根本没有提起此事。他说他对

政治感到厌倦。他已经战斗了二十年，其中五年处于领导岗位。他认为再斗下去已经毫无意义。那年再过些时候他很可能退休。我过去曾经听他谈过类似的想法；这位和蔼而又好斗的人似乎只有定期宣布他将放弃他真正感兴趣的唯一职业才能继续干下去。我用我知道是施密特最珍视的论点、即人的可靠性来说服他。我说：高级职务带来的折磨何时达到不能忍受的程度要由每个人自行判断。我只希望他了解，西方世界有这样一位绝对可靠的人担任高级职务是令人十分慰藉的。

施密特没有就此展开争论。他说，由于他对去留问题无所萦怀，所以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输掉的。他同意我们对能源危机的总的估计，也认为我们提出的那种方针是必要的。他将尽力为此进行斗争。由于谢尔外长必须充当欧洲共同体部长理事会主席，德国的观点实际上将由施密特提出来。在一个只有共同努力才能解决的问题上，他不会合谋使欧洲反对美国。他将支持同我们平行的方针。

由于德国、日本和英国基本上都支持我们的态度，我们在会议上就掌握了优势。但是我宁愿设法使若贝尔同意大家的意见，而不是通过投票来击败他。他是二月十日傍晚几乎直接从中东到达华盛顿的。他到达以后不久，大约是晚上九点半钟，我就去法国大使馆拜会他。他是不曾请到我办公室来的唯一的外交部长（我如果去拜会每一位外长，我的工作日程就无法安排了）。这是一种表示善意的姿态。尽管若贝尔最近访问中东时采取了嬉笑怒骂的态度，我因为一心致力于法美友谊而不愿挑起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的冲突。而且我个人也很喜欢若贝尔。我曾经尖锐地批评过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力图同法国摊牌、以致使欧洲政治各走极端。我深信这种竞争是不会有胜利者的；因此我希望为解决问题做最后一次努力，如果失败也可以证明冲突确实无法避免。

若贝尔后来对这次会晤作了戏剧性的描绘。据他说，我曾经暴跳如雷，试图吓唬其他欧洲人。他警告我不要对他使用这种策略，从而使我驯服下来；据说这曾使我无言以对，两个人半天都没有开口，直到心情平静下来。^② 这个故事符合若贝尔的浪漫气质。关于一次没有证明人参加的会晤，事后要想客观地确定历史真象也许是不可能的。哲学家也许会说：真象是形形色色的；它们仅仅存在于参与者的感觉之中，就像日本电影《罗生门》所描写的那样。

尽管如此，我对这次会晤的回忆是完全不同的。我问若贝尔这次能源会议究竟有什么东西使他感到苦恼。他的回答很简单：“美国领导权”。我呼吁他不要走上一条将给所有自由人民带来灾难的、导致冲突的道路。我说，美国召集这次会议不是为了在大西洋共同体中取得统治地位，而是世界石油危机使我们别无他途可循。如果争论的只是形式问题，我将尽力把事情办得使法国感到心情舒畅。例如，像我对谢尔说的那样，我愿意让能源行动小组置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主持之下，如果这样做能够使法国不再反对建立新机构的话。但是建议的实质是正确的；如果每一个消费国都只顾自己，我们大家全都会完蛋。

据我回忆，若贝尔当时采取了冷嘲的态度。他很乐意支持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来处理能源问题，但只能由现有委员会来办（他明知这些委员会不能承担我们提出的全部任务）。法国欢迎把华盛顿会议搬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巴黎总部去继续开，但不愿事前保证取得一致同意的结果（意即保留使用否决的权利）。换句话说，若贝尔使我有机会取消我们的能源计划，为此他愿意提供合作。如果华盛顿达不成协议就休会，即使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真的在巴黎开会讨论这个问题也肯定会失败。若贝尔一边叹气，一边再次暗示自己的日子是如何艰难：会议的实际状况和来自他那位患病的总统的压力使他受到夹攻。他并非完全同意他的总统

的意见。为此我可以对若贝尔表示同情。但是我不能用牺牲会议目标为代价帮助他解决他自己国内的政治难题。因此，我们至少对这次会晤的结果可以达成一致意见：摊牌现已无法避免。

华盛顿能源会议

美国在战术上处于优越地位；主要与会国不会支持法国的顽固态度。但是他们是否会一致支持一个有意义的、积极的计划则尚不清楚；我们面临的危险不是失败，而是采取折衷办法。二月十一日会议开幕以后，我对亚历山大·黑格说：

法国人处境孤立，但我们也得不到应有的成果：以统一行动作出响应。他们还不了解自己究竟想得到什么，但都在想办法同阿拉伯产油国会谈。他们不愿接受（关于消费国团结的）基本理论。我们将得到足够的东西，使会议看起来还像个样子。会议缺乏战略概念。

这些部长和代表聚集在国务院大楼底层现在称为洛伊·亨德森会议室的一间非常宽敞的大厅里。那里布置了一张很大的长方桌。代表们按照国名的字母次序围桌而坐。部长们靠着桌边就座，助手则紧贴在他们身后。第三层还有一两排座位是给有关方面的。美国出席的队伍照例特别庞大——一切有关的联邦机构都坚持以某种方式出席会议，除美国邮政管理局以外，几乎想不出有任何机构不自称这次会议涉及他们的利益。我作为主人同沃尔特·谢尔一同坐在桌首。每个国家至少有两个部长出席——通常是外交部长和财政部长（日本派来的是外务大臣和科学技术厅长官）。只有若贝尔是独自一人。蓬皮杜不让财政部长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参加；他想尽可能地降低会议的规格，而且向来都

对他那位出色的财政部长很刻薄——或许是因为他们两个都是同一领域中的专家，而吉斯卡尔业已表明他希望接替正在患病的首长的职务。

会议开幕时，我阐述了能源问题，其内容早已被我的同事零星透露出去。我引用我的伟大的前任迪安·艾奇逊的话指出，“用不彻底的、缩手缩脚的、目光狭隘的措施来对付巨大而危险的、难于解决的问题”往往会导致失败。我说，美国在大家的立场确定以前召集这次会议，其中心目的是：

采取紧急行动，在所有国家合作的基础上解决能源问题。不这样做，世界就有陷入三十年代曾经导致世界秩序崩溃的那种相互竞争、相互封锁、相互倾轧和经济萧条的恶性循环中去的危险。幸好问题还可以通过多边方式予以解决：各国的政策还在演变，从技术上说还有可能使能源问题得到切合实际的解决，从政治上说我们同生产国进行合作的门还是敞开的。

然后我就提出了前面简单谈到的实行消费国合作的七点计划。我迁就了我的所有同事都鼓吹的同生产国对话的要求，但是强调指出：照我们看来，这种对话必须以消费国团结为前提，而不能代替消费国的团结。我说：

如果生产国和消费国的会议经过周密的酝酿，如果消费国无论是作为一个集团还是作为单独的国家都不在会上谋取一己的私利，这种会议决不会导致对抗。相反地，它可以为建立新的合作关系奠定基础。但是只有经过充分准备，只有在消费国之间首先建立巩固的合作基础的条件下，它才能起这种作用。

我的讲话得到“能源沙皇”*威廉·西蒙发言的支持。西蒙分

* 威廉·西蒙当时是美国联邦能源署署长，权力很大，所以人们把他称为“能源沙皇”。参见《尼克松回忆录》，商务印书馆一九七九年版，下册，第二九四页。——译者

析了能源危机的起因和解决办法，力图消除人们心中的恐惧。他表明形势虽然严重，但只要消费国在互通情报、发展新能源以及节约能源方面携手合作，经过一段时间就可以加以控制。西蒙极力鼓吹他心爱的论点，指出把石油价格从每桶超过十一美元的现有水平降下来甚至对产油国也是有利的——这个论点对任何听众总不像对他自己那么有说服力。财政部长乔治·舒尔茨建议采取联合行动来克服油价高昂造成的财政混乱。总之，美国的基调是乐观的：受到危机打击的消费国仍然掌握着自己的命运。能源灾难并不是魔鬼带来的，而是可以纠正的条件造成的。对付这种状况的办法不是俯首听从产油国的命令，而是纠正引起危机的经济条件。

如果说在座的部长们同意这种观点，未免言过其实。整个说来，他们肯定宁愿不开什么会议；如果非开不可，就想方设法使它既不做决定、又不发生爆炸。但是面临一个具体计划，他们不表明立场也不行。沃尔特·谢尔代表欧洲共同体发言。他的发言照例是很有文采的，但绝不是要求人们行动起来响亮号召。共同体的指示似乎禁止使消费国的合作制度化的任何做法，但是到华盛顿来开会的大多数部长实际上都同意我们的方针，不想在美国首都反对美国建议。谢尔因此感到左右为难。他个人的意见同其他外交部长是一致的，所以他接受了我在私下谈话时所做的暗示，即我们应当避免讨论可能产生的任何新机构是否常设机构的问题。既然能源问题是一个新问题，就需要建立临时小组予以处理；至于这些小组活动多长的时间取决于是否还需要，而不是取决于规章制度。无论谢尔把这个意见冲淡到什么程度，他的发言等于接受了我们对消费国团结的基本态度。代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发言的赫尔穆特·施密特把谢尔的暗示明确说出来了，并且给他的外长的含义赋予了具体内容。

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爵士最接近于全力支持我们。大平正芳语焉不详，但赞成消费国合作和举行消费国和生产国的会议。他按照典型的日本方式转弯抹角地表达自己的意见，所以我给西蒙偷偷塞了一张条子，向他提出一个问题：“比尔*：你了解大平的主要论点吗？”第一次作为主要代表之一参加国际会议的西蒙也草草地写了几句话作为答复：“没有把握。我对此缺乏经验，感到在合作问题上他的意见是很积极的、令人鼓舞的，但是他们还打算大力搞双边交易。”

对美国的立场支持到这种程度已足以使火药发生爆炸了。外交上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要求把个人关系同官方分歧区别开来。按照设想，外交官应当反映本国的利益，而不是个人的偏爱；他吵架也不是个人的选择，而是出于国家的考虑。当然，这种说法过于绝对化。实际上，主观因素不那么容易消除。尽管如此，那种神话还是有用的。它使人们甚至在争吵时也能保持礼貌，可以做出妥协、甚至让步而不涉及个人的面子，因此比较容易求得解决。但是若贝尔不懂得这种区别。他有时非常可爱，讨人喜欢；他那辛辣的机智既反映了深刻的洞察力，也使人愉快。但是一旦卷入争论——特别是有听众在场时——他似乎就无法控制自己。他讥讽地指责谢尔违犯了共同体的指示，因此讲的话是没有权威的。他还影射地指责施密特犯有背叛罪——大概是背叛了欧洲——成了美国的传声筒。若贝尔说，他来参加会议是为了挽救欧洲团结，因为他的同事没有向法国打招呼就接受了邀请。他把自己当作共同体指令的监护人。他说，促使他到华盛顿来的那种担心已经证明是有道理的。

若贝尔对美国也毫不客气。他指责我们召集了一次缺乏准

* 威廉的昵称，指威廉·西蒙。——译者

备、考虑不周的会议，目的是建立美国的统治、而不是解决能源问题。他引用了民主党参议员埃德蒙·马斯基批评政府政策的话。他没有提出任何建议来代替或补充我们的建议。他反对任何形式的共同能源政策。他已经动手破坏会议。法国显然想进行一次赌博，想通过双边交易来满足自己的能源需要；它想以政治上支持激进派政权、特别是支持伊拉克的办法来取得优惠地位。它将试图利用欧洲—阿拉伯对话拉着欧洲跟它走。

他在会议桌畔的同事都默不做声，因此若贝尔应当清楚，他这一次过高估计了自己手上的牌。

会议总是在全体会议结束后才真正开始工作，通常是围绕一份试图反映一致意见的文件草案进行的。几乎每次都会出现反映意见分歧、使相互冲突的立场受到考验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将确定会议的进程；然后其他问题一般就会迎刃而解。这次出现的问题是要不要在会后建立某种机构（名称无足轻重）来承担我们列举的各项任务。

在这个问题有可能进入对抗阶段以前，欧洲共同体必须整顿内部。它必须确定是坚持若贝尔对指示的解释，还是坚持谢尔的解释。这些部长还有一种选择，就是根本不作为共同体采取行动，而是作为单独的主权国家各自做出决定。这个过程要占用二月十二日，星期二，即会议预定闭幕的那一天的大部分时间，因此大家同意使会议延长一天——尽管这给英国代表团造成了某些困难，因为他们急于回国去参加只有两个星期就要举行的大选。

在这种讨论开始以前，东道国的国家元首（这一次是尼克松）还得设宴招待。折磨人的年代已经造成损失。水门事件使尼克松精疲力竭。在他举行的大部分记者招待会上，人们总是就新揭露的某件事情进行无情的追问。一月三十日，离能源会议开幕还不到两个星期的时候，尼克松在国情咨文讲话的结尾有一段似乎是临

时想起的——实际上几乎肯定是经过仔细准备的——插话，要求迅速解决对他进行弹劾的诉讼问题，使政府可以恢复正常的工作。这是一个从程序上看无法实现的空想，也不符合他的许多敌手想使他长期处于屈辱地位的心理需要。最后，由于他无法对组成水门事件主要内容的各种沸沸扬扬的事件做一次本来可能使他不再遭受折磨的权威性揭露，这个要求终于化为泡影。

在正常情况下本来会使尼克松兴高采烈的能源会议，现在只能使他感到厌烦。我每天把会议情况向他汇报两次。他的评语富有洞察力；他支持我们采取的战略，但是表现了一种不符合他的性格的超然态度，简直像他已经成为总统职务的旁观者一样。在这种气氛中，想到要举行国宴就令人意气消沉。尼克松想逃避宴会；最低限度他希望不要勉强去发表那种不得不发表的祝酒词。直到下午五点半钟，即宴会开始的两小时前，我还在说服尼克松、黑格和斯考克罗夫特，要求总统讲几句话。

实际上，如果尼克松一言不发，这次宴会就毫无意义了。国际会议参加者的社交活动往往索然寡味。同样是那些人，白天不断使对方厌烦或相互争辩，晚上又按照同样的礼宾次序坐在一起。如果他们有什么新鲜意见要发表，那倒是令人惊讶的。这种聚会主要是东道国表示敬意的一种姿态，此外主人可能希望向客人转达什么信息。尼克松最后终于同意讲几句话，但是坚持不以祝酒作为结束——他提出的理由是：在座的外交部长中他只喜欢亚历克·霍姆；如果礼宾规格使他不能向霍姆祝酒，他就不向任何人祝酒。我劝他把谢尔作为欧洲理事会主席看待，但他没有表态。当尼克松站起来讲话时，我根本不知道他会说些什么，最后如何结束讲话。

结果，尼克松在宴会上勉为其难地发表的即席演说给会议带来了最大的震动。若贝尔——事实上还有其他许多部长——深信

这是精心策划的施加压力的把戏之一。只有我们少数人知道他们这种看法是荒谬的。其实，这是一篇发自内心的、典型的尼克松式的讲话，由于尼克松确实是它的唯一作者而更值得注意。我对讲话的唯一贡献是告诫尼克松不要采取对抗态度；我认为战术形势对我们的方针有利，如果我们能够避免使人得到美国施加压力的印象，我们就算成功了。尼克松表示同意。但是他也喜欢冒险。他曾坚持要求为每一次会晤准备的简报都必须包括“注意避免事项”，但即使在他的鼎盛时期，他也以表现自己能够多么接近违反这些事项而洋洋自得。他一再非常靠近地从我认为危险的悬崖边沿擦身而过，以致很难说给他提供的简报对他究竟是一种警告还是一种挑战。从尼克松的性格来看，很可能是两者兼而有之。

尼克松这天晚上恢复了自己的本色。他没有发出威胁；相反地，他明确地否认他要进行威胁。他天真地说，他从来没有考虑过把能源和安全问题联系起来。当他描绘国会如何施加压力、要他从包括欧洲在内的世界各地撤出军队的时候，他只是说明事实。这不是他的过错。他说：

近年来，孤立主义情绪日益增长——我们在越南的十分困难的经验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加快了它的增长速度。不仅在安全问题上存在孤立主义情绪——例如有些人认为美国应当单方面从欧洲、以至从全世界撤回自己的军队——使我们对远东和欧洲各国承担的条约义务失去任何意义；贸易方面也存在孤立主义情绪。有些人完全反对我们在贸易领域中采取的主动行动，甚至反对在诸位都很熟悉的国际货币领域中采取的某些主动行动。

尼克松当然保证要尽可能抵制孤立主义的诱惑，但是他得感谢他的贵宾们使他有机会提醒他们，美国这些势力可能由于欧洲在能源方面搞单干而得到加强，因而仍然有可能使他抵挡不住。他

说：

因此，这种做法从短期来说可能是良好的策略，而从长远来说却是糟糕透顶的政治家手腕。因为如果每个国家实际上都自行其是，或者——像我曾说过的那样——谋求私利，其结果必然是迫使能源价格上升，迫使我们各国的经济下降，并且迫使我们大家散伙……

我认为，比较符合每一个国家的——让我这么说吧——“开明的自我利益”的办法是在安全方面进行合作，在贸易方面进行合作，在发展我们的能源以及获得我们所需要的能源方面进行合作，使自由世界的庞大的工业复合体能够不断前进，攀登一个又一个高峰。

最后，尼克松——以一种“见鬼去吧”的情绪——肯定了他刚刚否认的东西，说明他终归还是把安全问题同能源政策挂起钩来。他说：“安全和经济方面的考虑有它们必然的联系，能源问题也同这些考虑无法分割开来。”为了消除我内心的悬念，尼克松确实像我建议的那样向沃尔特·谢尔祝了酒——但是绕了个弯子。他说他曾考虑向担任过首相的外交部长们祝酒（这是向他的朋友亚历克·霍姆鞠躬致敬），但是最后还是把最荣誉的地位留给同时拥有（共同体部长理事会）主席*头衔的唯一的的外交部长。对于善于领会尼克松微妙之处的人来说，这种办法干净利落地表明，祝酒并不是对德国外交部长个人优点的任何表彰。

这篇演说是一个卓越的表现。它造成了希望得到的效果。新闻界全都报道了尼克松既否定又肯定的那种联系。有些新闻机构——特别是英国新闻机构——以赞赏的态度作了报道；其他一些新闻机构——几乎完全在法国——则以此为例说明美国希望取

* 在英语中，这里的“主席”和“总统”是同一个词。——译者

得支配地位，必须予以抵制。这篇演说使与会者都清楚地了解到：我们在会议上提出的是美国总统深思熟虑的意见，而不是他的助手个人的特殊见解。

甚至到这个时候，若贝尔如果想妥协也还是容易办到的，而且妥协可能比顽固坚持更能有效地破坏我们的战略。如果有任何保全面子的方案，大多数外交部长都会立刻抓住不放，即使这样做可能使会议完全失去实际意义也在所不惜。但是若贝尔宁愿战斗到底。他拒绝任何消费国组织。（几个星期以后，他的真正意图就暴露出来了。当时他建议——但没有成功——成立欧洲能源集团。在他的心目中，这个集团的主要优点必然是把我们排除在外。）他顽固地拒绝在华盛顿能源会议闭幕以后以任何形式采取任何后续行动。

二月十二日星期二，即会议的第二天，从而变成了摊牌的一天。全体会议多次中断，以便进行协商。最重要的磋商是在欧洲共同体成员国的秘密会议上进行的。美国采取了低姿态；我们竭尽全力防止挑起法国和美国的决斗，因为这种决斗可能使若贝尔以欧洲团结的名义把他的同事聚集在自己一边。

上午十一点三刻，霍姆到我的办公室来宣布欧洲考虑的初步结果。他们八个国家将抵制法国为阻止成立消费国机构而做的努力。他们最担心的是，在他们采取坚定立场的时候我们却去同法国搞双边的妥协。这种担心是过去一个时期具有讽刺意味的遗产——那时若贝尔曾经就大西洋对话问题巧妙地引诱我们进行双边会谈，把欧洲共同体排除在外。我向霍姆保证我们并没有同法国会谈；如果我们进行任何试探，都会通知他；不得到支持我们的盟国的同意，我们不会达成任何协议。我还建议，如果僵局持续到最后一次全体会议，最理想的程序可能是由日本提出建立后续机构的建议。如果遭到巴黎反对的、或者从美国建议演变而来的计划不

是由欧洲人自己提出的，法国就不会那么感到自己面临一场挑战，而且更符合欧洲共同体团结的要求。霍姆说他愿意同大平谈谈。

下午一点，我举行午宴招待全体外交部长。为了表示和解，我使若贝尔不按礼宾次序坐在我的右边。这个姿态只得到部分成功。若贝尔迟到了，来了以后就建议同我私下会谈——这个建议即使我的同事中只有几个人听到（他是故意要使人听到的）也会象野火一样在其他人当中传播开来。若贝尔显然希望扰乱欧洲人的各种考虑。我同霍姆简单地谈了一下，告诉他我们的谅解仍然有效。他通知我，大平愿意提出要求建立后续机构的提案。

下午四点，若贝尔和我会晤了四十分钟。同过去经常出现的情况一样，他说他希望我了解他是按照指示办事才采取好战态度的；他声称自己的看法是比较灵活的。他同意我的意见，即公开破裂会使每个人都受到伤害。他愿意根据我们上星期日晚上的谈话向蓬皮杜提出折衷建议。我把若贝尔的提议向尼克松报告如下：

他们不愿意这次会议建立半永久性的机构，因为他们不想使华盛顿为此得到荣誉……他们现在向我建议，一个月内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主持在巴黎召开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将建立机构。在此期间，他们也愿意成立少数临时性机构。

这个建议的含义是：法国将不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行使否决权，而是设法支持建立后续机构；为了表示诚意，它甚至赞成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召开会议之前就成立某种临时机构。

这是一个诱人的建议，但也可能使人上当。首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是一个难以控制的机构。如果法国人要捣乱，他们可以运用这个组织对我们的建议展开游击战。临时措施可能自行消失。在一个月的时间里，人们可能改变主意，使现在（除法国以外）

的意见一致化为乌有。关键在于法国和我们在实质问题上是否一致。其他时候我们可能试一试,但我们已经完全丧失信心;我们过去毕竟走过这条道路。如果我们现在同法国直接做出决定,就可能再也无法使其他欧洲国家保持坚定。

我对若贝尔说,我必须就他的建议征求尼克松和其他与会者的意见。只有在他赞成按照会议显然一致支持的路线成立临时机构、在蓬皮杜答应法国在会议上投赞成票的情况下——总之是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巴黎会议主要是批准和充实华盛顿会议决议的情况下——我们才能考虑他的建议。

使我感到惊愕的是,若贝尔说他将把这些意见转告蓬皮杜。我则把谈话内容通知了霍姆,并重申我的诺言:我不会单独同若贝尔采取未经欧洲共同体其他成员国事前同意的任何步骤(这就使有关大西洋宣言的程序完全颠倒过来了)。

下午五点又举行了一次时间很短的全体会议。会上,大家都踏步不前,等待若贝尔。

下午六点半左右,我去参加为艾丽丝·罗斯福·朗沃思夫人九十寿辰举行的私人招待会。朗沃思夫人是西奥多·罗斯福的女儿,她的寿命跨越了我们这个世纪。尼克松也参加了招待会。他很崇拜这位态度严厉、性格暴躁而又具有强烈幽默感的夫人。在他进入白宫后的第一个星期里,他曾在一次小型家庭晚宴上把她作为我的“约会对象”介绍给我。那时我在白宫工作班子里还是一个无名之辈,而且刚刚离开学院生涯,由于接近权力而有点茫然不知所措,根本不敢说自己会有什么遭遇。“你会取得辉煌的胜利,”她当时说。“你的眼睛闪耀着胜利的光辉。”

朗沃思夫人是老的东部权势集团中使尼克松既不感到威胁又不感到有失身分的少有的几个成员之一。她现在已经超脱于野心之外,人也聪明。在她记忆中的华盛顿,总统可以每天下午去石头

沟公园骑马，而且可以到奥伊斯特湾去一连住几个月。她非常熟悉人类的弱点和华盛顿的阴谋诡计，所以自命不凡的人不可能使她产生什么印象。她曾经体会过易逝的名声，也懂得性格的意义。当我处于权力高峰时，她有一次曾经对我说，总有一天我必然要下台，那时候我如何看待我的继任者——不是公开的、而是在我的灵魂深处——将是对我的考验。对他们遭受的挫折我是感到怜悯、还是暗中幸灾乐祸呢？她承认在塔夫脱总统执政时期，她和她的父亲在这种考验中都遭到惨败。

我经常在各种友人家里见到艾丽丝·朗沃思；有一两次她曾请我去吃晚餐。她现在是在马萨诸塞大街那栋古老得发霉的住宅里接待宾客。这位身体纤弱、头发雪白而稀疏的老太太却比白天刚同我一起消磨了许多时光的大多数同事更现代化也更适应潮流。我们大家都口若悬河地大谈革命性变化和需要挺身而出对付挑战。但是当我想到当前领导人时，我看谁到了暮年也不会有艾丽丝·朗沃思那样优雅的风度。他们缺乏内心的信念，因此害怕担风险。世界上有多少领导人除了他们掌握的权力以外能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呢？有多少人能够经受失败和下台的打击而不丧失自信呢？如果他们害怕失败，他们又怎么能够取得胜利呢？当他们在感情上墨守成规时，他们怎么敢于象真正对付革命性事件所必需的那样超越常规呢？

我回到办公室不过几分钟就重新陷入平凡的事务。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爵士——品质上最象艾丽丝·朗沃思的一位部长——前来报告欧洲人举行秘密会议的结果。他说，所有的欧洲人对法国人的态度都十分坚定，认为这次会议以后一定还得继续开会。他们根本无法容忍失败。若贝尔对建立任何后续机构都拼命反对，但是他的同事愿意在全体大会上径直宣布他们都同意派官员参加后续会议；法国可以参加，也可以保留自己的立场。

霍姆还说若贝尔已电请巴黎给予指示。他警告说，我们决不能搞一种“空洞无物的办法、一种掩盖分歧的东西”作为了结。他了解我有些戴高乐派的倾向，要求我对若贝尔保持坚定的态度。我再次重申我不会超过大家同意的立场，做任何事都会事前同他商量。

霍姆既担心又希望的情况根本没有出现。若贝尔的指示重新得到肯定——至少他是这样告诉我们的。蓬皮杜拒绝了若贝尔和我讨论过的妥协方案。他不许若贝尔附和欧洲人提出的建立后续机构的建议。现在，除了在全体大会上打破僵局以外就无计可施了。

消费国团结起来

二月十三日，星期三，上午九点半，会议重新开始。由工作小组准备的公报草案指出，能源危机是任何国家也无法不受影响的全球性问题。草案肯定，“需要制定全面行动计划，以便通过合作措施处理涉及世界能源形势的一切方面的问题”。然后，它列举了我在开幕词中概括的七个需要特别注意的领域。为此，它确定建立一个以高级官员为首并配备专职工作班子的小组以协调执行工作。

我决定在上午举行两次全体会议。第一次会议讨论作为公报依据的原则，第二次会议则通过实际文本。这种程序将避免使人感觉美国是在强加于人，也防止有人就公报的措词争论不休，实行拖延战术。此外，如果出现某种新的、出乎意料的阻力，也有机会在第二次会议上进行调整。

按照我的安排，公报的概念部分将由多年来得到人们信任的老朋友、挪威外交大臣克努特·弗吕登伦提出，好处在于他所代表

的国家不是欧洲共同体的成员，因此就绕开了共同体的指示问题。日本的大平正芳已经同意由他提出有关建立后续机构的建议。为了进一步减少冲突，所有的外交部长都将得到发言机会——虽然他们全都了解主要讲话的内容。我请坐在我左边的人首先发言，然后沿着座位轮流过来。这样做的好处是使若贝尔只有在弗吕登伦和大平讲完话以后才能发言。得到除一人以外的所有部长支持的主席是可以使用这种“主持会议技巧”的。

开始的时候，会议按计划进行。弗吕登伦稳重而和蔼的外表掩盖了他明快而敏锐的头脑，其讲话之有力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直到大平讲话时，情况才开始失去控制。这位日本外相发表了一篇冗长的演说。唯一的毛病在于它的含义令人无法捉摸。他那过于优雅的日本方式使他无法在对抗的形势下表示鲜明的意见；相反地，他按照日本方式表达自己的看法，概括了双方的观点，只是略微偏向我们赞成的方向。其讲话之微妙是出类拔萃的，但用于摊牌却不合适，因为不了解内情的人听起来似乎法国的论点同我们的论点都有很多长处。从这么转弯抹角的发言中很难提炼出可以交付投票的提案。在座的人、特别是那些有理由期待出现一次突破的人感到迷惑不解的表情就反映了这个事实。

亚历克·霍姆挽救了局势。大平刚刚讲完，他就以只有经过贵族家庭世代熏陶才能养成的高雅而傲慢的风度接着发言。“如果我对尊贵的日本外交大臣的理解是正确的话，”霍姆用这句话作为开端，接着就归纳了大家原来同意的观点，其内容使人模模糊糊地回想起大平含蓄地讲过的某些意思，但完全想不起他具体讲了些什么。大平由于这群笨头笨脑的野蛮人当中有一位受过文明洗礼的同事而笑逐颜开，宣布他的讲话确实得到了明确的理解。大平可以感到满意的是：他以巧妙的日本方式发表的讲话毕竟起了打破僵局的作用。

会议还得忍受若贝尔又一次尖刻的攻击。他既攻击他的欧洲伙伴、特别是施密特，也攻击美国。到上午十一点四十分，原则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

第二次全体会议下午十二点三十六分开始，讨论公报问题，并按照起草的稿本通过了公报；只有法国对概括消费国合作的具体任务和建立后续机构等属于具体工作的部分表示异议。

我们达到了我们希望达到的相当大的一部分目标。消费国组织现在已经确定要建立了。诚然，会议并未赋予它什么英雄使命；在节约能源、紧急时期分享能源、发展新能源等不涉及对抗危险的问题上，建立合作关系要容易得多。但是这些努力总的效果将加强消费国对生产国的讨价还价地位。某些与会者将否认并在当时那种害怕心理中甚至不相信这是建立消费国组织的目的。但是无论人们怎么说，现实终归是现实；后来被称为国际能源机构的组织（会后当年就正式建立起来）的实际作用是促进了工业民主国家在能源方面的团结，从而对改进消费国的谈判地位做出了重大贡献。

我兴高采烈地召集美国代表团全体成员，对他们的贡献表示感谢。他们精心的准备和有条不紊的执行工作简直同教科书上讲的一样。由舒尔茨、伯恩斯、西蒙、布鲁斯和我组成的指导委员会摆脱了官僚机构通常那种背后使坏的做法。这个小组为会议确定了基本概念，几乎每天都在琢磨策略问题。前面提到的工作小组则做具体起草工作。这些具有献身精神的官员使美国方面的准备远远超过其他国家，使会议——同若贝尔怒气冲冲的评价相反——成为我记忆中最有成果、作用最大的一次会议。

一个世纪以前，事情到此就算了结了。但是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国际事务中，还有一位裁判要给人颁发胜利勋章；新闻界要按照自己的需要办事，对会议成果的意义发表意见。他们认为外交官有偏见；新闻界作为法官和陪审团要决定公众应当听到或读到什

么。从性质上说，新闻界更适应当前的戏剧，而对未来的发展倾向则持怀疑、甚至玩世不恭的态度，不予重视。换句话说，在新闻界进行解释以前，任何国际会议都没有真正完事。因此，华盛顿会议的每一个主要角色都不得不登上舞台，把他那一部分戏演到底，既宣传自己的观点，又力图通过对当前事务的解释影响未来事态的发展。因此必须把若贝尔和我在那天下午分别召开的记者招待会看成是华盛顿会议的最后阶段。（当然，其他代表团也向本国报界通报了情况，但是没有得到也不想得到重视，因为掩盖争论、两头下注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

我让若贝尔先开记者招待会不仅是出于礼貌，而是使我自己可以按照他的发言调整我的讲话内容。据我判断，他会强调当时的斗争；这只会增加我提出的必须合作的论点的份量。若贝尔完全了解我的意图，但事实上也别无选择余地，因为欧洲时间比华盛顿时间早六个钟头，他必须迅速阐明自己的理由，否则就根本说不成了。若贝尔把他最尖刻的话都搬出来了。他否认华盛顿能源会议取得了任何重大成就，认为这次会议完全是美国为了统治欧洲而巧妙地安排的诡计。他说：

我认为报纸对这件事使用过分突出的大字标题是完全错误的。按照我们的观点，这次会议毕竟是一件小事。它的准备工作有点草率，甚至酝酿的过程也有点草率，因为直到会议开幕一切重要方针都还不清楚。大量文件都是后来才收到的……（这次会议似乎是）一次略带政治性的行动，很可能是为了美国的利益——我不了解这是出于有意还是出于无意——而……能源问题主要是一个借口。

他再次使用了他在巴格达说的俏皮话：华盛顿会议不同于维也纳会议；换句话说，它注定不会留下任何永久性的标记。他再次指

出，首先他从来就不想来开会；他是怀着对欧洲伙伴（意思是说，并不是对美国）的善意勉强顺从了他们的恳求；他是在过去一致协议的立场的基础上来参加会议的。若贝尔说：

但是，既然他们是在了解法国政府反对这次会议的情况下要求我同他们一起来的，所以当他们在慷慨地同我签订一项显然使大家都满意的协议以后我就立刻同意陪他们来了。

这等于用并不十分含蓄的方式断言他的欧洲同事违反了共同体的指令，因而是对他的背叛。他并未说明，既然人们以八票对一票反对他，这一投票结果怎么可能违反欧洲共同体的意图。他也不认为投票就是最后的决定。他说：“有些人是凭感情而不是凭理性发言的。也许一旦回到国内他们就会看到感情和理性的区别。”

若贝尔要赫尔穆特·施密特个人对此负责，谴责他宁愿选择美国而不要欧洲——似乎这是本质上对立的两个概念。他在进行人身攻击时，还给我个人当头一棒。由于我们两人都出生于国外——他生于摩洛哥——而且都是少年时期来到我们现在所代表的国家，有一篇报纸文章就拿我们的生活历程进行了类比。若贝尔反对这篇文章，拒绝接受这种比较；他是法国人，而我则不完全是美国人：“你们了解美国人是怎么看问题的。我想我们的听众完全了解，我事实上生于摩洛哥，而且我从来就是法国人。”

在通常情况下，保持克制并不是我的长处。但是这一次如果稍微缺乏克制就会破坏我们的目标。我们已经取得的成果必须长期保持合作精神才能落实，而且我们希望有一天把法国也包括进去。若贝尔的利益要求贬低会议的意义，而我们的利益要求贬低争论的意义。他的战略需要强调当前状况；我们的战略需要坚定不移地着眼于未来。因此，我举行记者招待会时一开始就用和解

的口吻说：

这次会议……是根据世界正面临着一个——至少从我们看到的方面来说——多少有些出乎意料的问题这种设想、根据我们的这种信念召开的。在表面上供应短缺的情况下，部分地是出于情况不明，人们在做出反应时有一种惊惶失措的倾向，这感到我们也许已经失去了对自己命运的控制。

除供应短缺以外，十二月底又出现了价格迅速上涨的严重问题。

美国认为：需求至少暂时超过了供应以及价格迅速上涨，这两种现象造成的问题只有在全球范围内通过多边行动才能解决。

我们持这种观点并不是为了维护有关如何组织世界的任何特定理论。我们并不是为了建立机构而提倡建立机构。我们过去相信、现在也仍然相信这是一个不可能孤立地解决的全球性问题，而且确实是一个说明整体利益和个体利益完全一致的极好的例证。

我拒绝上若贝尔的钩。同法国的分歧是暂时的；大西洋团结并没有出现危险。我说：

美国认为大西洋关系是它外交政策的中心。一年来我们所作的努力都是为了加强这种关系。

我们同法国在应当如何加强大西洋关系方面存在某些分歧。这个事实不应使人无视我们赋予这一关系的极大重要性，以及我们承认同包括法国在内的一切欧洲国家的友谊对大西洋联盟全体成员国的安全是必要的。

照我看来，如果工业民主国家采取的行动不能使各国公众认为它们正在战胜新的经济挑战，那它们甚至连国内团结都将无法维持，更不用说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了。如果玩弄手腕谋求本国的利益，冀图用这种办法安度当前的危机，这种政策必然会失败，必然会削弱人们对民主制度的信心，破坏各国政府的斗志并损害西方

安全赖以保持的政治纽带。同这种危险比较，法国同美国的争执是一件小事，确实无足挂齿。而且我认为我们有责任尽快结束争吵。

华盛顿能源会议有助于我们达到最终目的。当我同大平开始谈话时，日本大使安川壮说，会议如果不以失败告终，就应当认为是一个胜利。我不同意他的看法。我说：如果会议不取得胜利，就应当认为是失败。同许多文字游戏一样，它反映了一种态度。失败容易确定；胜利则必然是不牢靠的。从策略上看，我们干得不错。我们使有十三个国家参加的会议得出了其他与会国起初由于担心得罪产油国而不敢贸然接受的结论。各个民主国家在以后几年里有条不紊地把我们建议的战略的关键部分付诸实施，包括节约能源、财政安全网、技术合作、紧急时期分享能源计划以及帮助发展中国家。尽管人们顾虑重重，会议还是创立了消费国团结组织，使它担负起迟早必然会加强消费国地位的各种任务。国际能源机构欣欣向荣，直到我执笔时仍然是使工业民主国家在能源问题上保持一致的主要工具。

在后来的年代里，能源形势得到显著改善，其中一部分原因就是消费国加强了团结。世界石油市场稳定了。在一九七三年的冲击以后的五年里，再也没有出现石油价格戏剧性上升的情况。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八年底，涨价的幅度低于世界通货膨胀的幅度；事实上，在这个时期里，石油的实际价格下降了百分之二十五左右。^⑤直到一九七八年和一九七九年伊朗的动乱使该国石油日产量减少四百万桶，价格才再次出现螺旋形上升。到作者执笔时为止，部分地是由于人们加紧实施我们一九七四年提出的节约能源和发展代用能源等措施，这种上升似乎已经被制止了。

另一次爆发

但是，这次会议的直接后果主要还不是使人觉得有了方向，而是使人感到刚刚克服的争端造成的影响。我们在达到目的以前，还不得不忍受我们在华盛顿曾经避免的爆炸。在正常情况下，偶尔失意是外交官意料之中的事；他懂得，如果一方在任何问题上都要不顾一切地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那么一切信任都会荡然无存。若贝尔则不接受这种约束。他一定要阻止美国作为工业民主国家的领袖而出现——这正是戴高乐主义者恐惧的事。他无法推翻能源会议的决定，但是他能够在欧洲共同体内部施加压力，要求通过他明知会同美国发生冲突的决定。而他的同事们可能会情不自禁地迁就他，以弥补他们在能源会议上一反常态、采取坚决态度造成的罪孽。

因此，若贝尔在能源会议以后的几个星期里不断发动进攻。二月二十一日，他在向法国国民议会外交委员会汇报情况时为自己的行为辩解，说他虽然受到侮辱和野蛮对待，却从未提高嗓门。他还在其他场合抱怨美国坚持认为法国无权同阿拉伯产油国做出任何双边安排。（事实上，我们只是一般地强调双边交易是自找失败。）同日，法国外交部一个很有地位的官员对我国大使馆说，法国当前对欧美关系的分析的核心是美国企图“在大西洋事务中重新获得指挥权”。他嘲笑我打算在伦敦停留、向英国人通报我在中东的外交活动。他说这样做使我的主人感到“尴尬”。（实际上我是这些主人专门请去访问的。）

把大西洋关系想象为美国和法国不断为争夺联盟统治权而斗争，这同我们的看法相距十万八千里，同我们的行动相距甚至更远。实际上，我们的最大错误在于一九七三年过分急于同法国合

作,以至疏远了其他欧洲国家、特别是共同体的较小的成员国。当若贝尔向有影响的法国《问题》周刊做长篇背景介绍时,他心头郁积的情绪和对事情的歪曲交织在一起,都达到了顶点。若贝尔提出三个论点:第一,美苏关于防止核战争协定是一个分水岭,使超级大国结成一种等于实行共同统治的特殊关系;第二,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六日是又一个分水岭,因为欧洲在自行制定中东政策时发表了某种脱离美国的独立宣言;第三,若贝尔终于认识到我并不真正赞成欧洲团结,据说我不断建议只同欧洲三个主要国家打交道就是证明。

在这些论点中,第二点是真的,也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其余两点则是假的,是蛊惑人心的。欧洲不得不用阻挠当时中东出现的唯一和平进程的办法来证明自己的独立,这真是一种可悲的局面。无论人们认为关于防止核战争协定是否明智(我并不认为它是我们最伟大的胜利),若贝尔完全了解——我们对他说过多次——我们签订这个协定是为了冻结苏联提出的一个令人为难的建议,并为防止苏联进攻中国建立法律障碍,而不是政策方向的变化。至于说我们宁愿仅同欧洲主要国家谈判则完全违反事实;这种说法表现了一种惊人的玩世不恭的态度。要求我们只同主要国家谈判、而且只进行双边谈判,并以此作为在欧洲问题上合作的条件的正是若贝尔。法国反对我们的方针是可以理解的;激烈攻击则是危险的,只能用美国的保护无需任何互惠的理论才能予以解释。

若贝尔的攻击也不限于欧洲。二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我在墨西哥城参加了西半球各国外交部长举行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的目的是使美国和它的邻国重新开始对话。人们想不出它同法国有任何直接关系。但是,至少在一个主要南美国家的首都,在该国外长启程前往墨西哥城的前一天,法国大使给他留下了一份关于防止核战争协定,并要他警惕美苏共同统治世界。(这是那位部长

告诉我的。) 不断有人传说, 法国驻中东的某些外交官员谈话的方式使他们容易激动的主人认为是劝他们不要匆匆忙忙解除对美国的石油禁运。^④ 这些传说过于频繁, 使人无法不予理会。

不仅如此, 若贝尔还处心积虑地以一种同美国的和平外交对抗的方式追求欧洲—阿拉伯政治对话。无论用意是多么善良, 让所有阿拉伯国家的外交部长共聚一堂必然会使温和派受到激进派的压力, 欧洲人最后将同意一项我们认为不现实的、带有激进倾向的方案。我在华盛顿能源会议期间曾经向包括霍姆和谢尔在内的好几位盟国外交部长着重指出这一点。二月二十六日, 我在伦敦又向霍姆重申这个意见。当时我正途经伦敦前往中东, 以便开始就叙利亚战线脱离接触问题进行试探性会谈。我在下一章将谈到这次外交活动, 以及它和解除石油禁运的关系。现在只需要指出当时形势仍很微妙就够了。

按照日程, 我回国途中要在三月三日, 星期天, 到波恩过夜。因为赫尔穆特·施密特在华盛顿的时候曾经告诉我, 由于我似乎只利用巴黎或伦敦作为过夜地点, 这有伤于德国领导人的自尊心。其实, 至少作为有意识的行动来说, 我那么做是为了飞行调度员的方便。但一旦了解波恩给这种停留赋予的象征意义, 我就决定下一次前往中东时一定在德国首都停留。同时, 为了表示我们对大西洋关系的支持, 我预定第二天下午去布鲁塞尔向北大西洋理事会通报情况。

这两次访问结果证明, 人的预见性是容易发生错误的。因为访问的效果同我们的目的正好相反; 它为一次最后起了发泄积郁作用的爆炸准备了条件。

三月四日上午, 共同体各国外交部长正在布鲁塞尔开会。当美国国务卿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总部向盟国大使通报情况时, 住在同一座城市里、距离只有约十五分钟路程的七个国家的外交部

长却由于害怕得罪法国而不敢来听我汇报，这种情况是可悲的。可是情况就是如此，我决定不把它当作一回事。我甚至向作为部长理事会主席的谢尔表示我可以推迟访问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免看上去似乎想要对欧洲人施加影响。他认为这样谨小慎微是没有道理的。实际上，那样做会意味着北约组织和欧洲共同体有点互不相容。

我三月三日和谢尔共进晚餐时谈得极为融洽。他对我的中东之行表示赞赏。他谈到大西洋的紧张关系，似乎这是一种法国传染病，而联邦共和国对此却具有免疫力。他说他不理解法国的政策；若贝尔有变态心理，态度不合逻辑。“因此我们永远无法了解法国人目的何在。”

我们会晤的地点是一座名叫“平舍”的住宅，它位于十九世纪的绍姆堡宫的花园里，是专为德国总理建造的。当波恩成为西德的新首都时，康拉德·阿登纳把总理办公室搬到这座宫里。（阿登纳选择波恩是因为它距离他在勒恩多夫村的住宅只有约十英里地。据说在有人对此选择表示不满时，他曾经问道：“你希望我怎么做？要我选择勒恩多夫吗？”）他的后任路德维希·艾哈德因为附近没有祖传房屋，感觉需要盖一座官邸。从来没有人解释究竟是什么想法缠住了这位典型的中产阶级巴伐利亚人，使他把这么现代派建筑物盖在富有传统风格的环境里。这座建筑虽然一面全是玻璃，但仍显得庄严肃穆；虽然只有一层，看上去却很壮观。对于这么精心建筑的一座大厦来说，办公室过分宽敞，家庭住室却惊人地拥挤。一切设计似乎都是为了使住在里面的人感到自己只是短暂的过客，没有任何温暖、个性或特殊风格。维利·勃兰特所做的从未引起我争论的决定之一就是拒绝住在那幢建筑里。

关于建筑风格的思索并未妨碍那天晚上的愉快。谢尔把他对

若贝尔态度的看法摆出来了，似乎这是一个德国和美国的共同问题，要解决它需要耐心和一定的时间。在华盛顿能源会议留下的温暖气氛中，我没有什么具体的需要抱怨的问题；各种大西洋宣言的起草工作进行缓慢是令人恼火的，但是基本上无伤大局，因为到那时为止这些宣言实际上已经失去很大一部分意义了。谢尔宣布，再过一星期共同体新的宣言草案就会准备就绪。我们开始为尼克松前来访问、签署宣言制定计划；四月最后一个星期似乎是最合适的时间。

谈话结束时，谢尔顺便提到第二天共同体外交部长讨论欧洲—阿拉伯对话问题（像报纸一直暗示的那样）的时候，他们很可能同意在卫生、科学等技术性领域中进行某些交流。我认为这不会产生什么问题，很快就转到其他话题上去了。

第二天上午，我到波恩郊外的维纳斯山拜会勃兰特总理。勃兰特在六十年代后期担任外交部长，那里原来是外长官邸。他升任总理以后仍然住在俯瞰波恩的山上这座比较富于人情味的房屋里。再过两个月，勃兰特就被迫辞职了。他有一种我从尼克松身上已经非常熟悉的愁惨而恍惚的神情，似乎预示即将失去某种心爱的东西。我们的谈话有时陷入停顿状态，但毫不紧张。我谈到头天晚上同谢尔讨论过的许多问题。我再次说明欧洲和阿拉伯各国外长的任何会议都有加强阿拉伯激进派的危险；我多次见到这样的情况，当各个阿拉伯部长单独和我在一起时态度是温和的，当他们同阿拉伯兄弟扯在一起时则被迫采取比较极端的立场。我对勃兰特说：无论若贝尔如何含沙射影，我们并不反对欧洲团结。“同我们磋商共同关心的问题同欧洲特性并不矛盾。”勃兰特当时并没有暗示布鲁塞尔即将发生任何异乎寻常的事情。

离开勃兰特住处以后，我乘直升飞机到机场，并于下午两点左右到达布鲁塞尔。当我到达北约总部时，看到谢尔给我留下一封

信，说如果我在北约总部办完事以后到位于布鲁塞尔繁华地区的德国大使馆去看他，他将表示感谢。他想向我通报共同体各国部长那天上午开会的情况。欧洲共同体在心理上显然已经和北约组织分隔到如此程度，以至它的部长理事会主席已经不能到保证共同防御的总部来回欧洲的主要盟国会谈——尽管他知道北约总部紧靠飞机场，而我还要作横跨大西洋的长途飞行。

我向驻北约总部的各国大使说明了我们总的中东战略方针以及我们打算在未来几个月中展开的外交活动——内容比较一般，但也包括足够的具体事实，以便在通报内容像我敢肯定的那样传回中东有关各方耳中去时，他们可以看出，我谈的大体上符合已经取得的协议。后来，北约组织秘书长约瑟夫·伦斯和我在充满乐观的气氛中会见报界。我向他们谈了我的印象：

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理事会桌旁就座的人对目标的想法表现了很大程度的一致，对使用的方法也很理解。我不记得有任何相反意见。我这样说不公平吗，秘书长先生？

伦斯满腔热情地强调指出我讲得过分谦虚。大家不仅是意见一致：

参加联盟的所有国家都非常赞赏以国务卿为代表的美国从去年十一月开始第一次会谈以来在中东所做的努力。向符合全体成员国利益的和平方向逐步前进的前景使我们大家都有点感到鼓舞。

一声晴天霹雳驱散了欢快的气氛。一位记者想了解我是否知道欧洲共同体九国部长刚刚通过沃尔特·谢尔宣布他们决定在许多领域开始欧洲—阿拉伯对话并最后将举行外长会议？我僵硬地

回答说：评论我尚未得到正式通知的事是不合适的。我期待同谢尔在德国大使馆会晤。

实际情况是几乎无可怀疑的。尽管英国外交大臣缺席——爱德华·希思刚在大选中失败了——若贝尔仍然强行通过决议；他的同事未能顶住压力，也可能是因为在华盛顿能源会议上抛弃了他而对他作出补偿。几个月来，我一直警告共同体：像他们现在显然已经通过的那种决议将使我们公开同他们分道扬镳。现在，特别是在我们的中东政策岌岌可危的时候，我不准备退缩。

由于事前没有提出警告就公开使我面对既成事实，这件事造成的冲击把我同谢尔的会晤变得冷冰冰的了，尽管不到二十四小时前我们还共同度过了一个极为愉快的夜晚。谢尔现在提出的程序从来没有同我们进行过任何讨论。它是法国为欧洲—阿拉伯对话制定的计划。谢尔当然了解我们对此绝不会感到高兴。他试图平息我们的怒气，答应在两周内搞出一个新的欧洲共同体宣言草案（见第十六章），似乎对大西洋团结的口头肯定是对我们的特殊照顾，因此我们就会接受使团结落空的单方面行动。他还表示愿意作出安排，邀请尼克松四月下半月前来访问——似乎欧洲之行使尼克松在国内得到的好处就会使他把任何条件都咽下去。我尖锐地回答说：

我注意到：这个决定是在我已经从报纸上读到以后、也是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过我以后，现在才通知我的，因此这突出地说明，我们应当对不通知我们就进行准备、不同我们商量就作出决定表示关切。

其次，共同体无意破坏和平努力这个事实基本上是没有意义的。共同体无法保证这种情况绝对不会发生。

第三，关于用这种方式把阿拉伯人搞在一起，我已经对你谈过我们的强烈反应。

第四，美国保留采取我们认为符合自己国家利益的类似步骤、并于事后通知共同体的行动自由。

第五，我十分严肃地指出：从长远观点来看，美国接受这种程序就会严重影响我们之间的关系。

谢尔一直保持冷静，显得泰然自若，语言明晰而精确。他争辩说，这完全是一种程序性错误。共同体不过是执行它十二月在哥本哈根早就作出的决定。他将发表公开声明，说明共同体已经把有关欧洲—阿拉伯对话的事通知了我；他表示欧洲人随时准备邀请尼克松来完成各种宣言。但是，盟国为了讨价还价的目的而把邀请我们的总统作为引诱我们的手段这种令人屈辱的做法已使我忍无可忍。我说：

如果有关总统访问的第二部分内容不公开发表，我将表示感谢。我将同总统讨论此事，并把他关于签订宣言的看法告诉你。我将让你知道为政治司长开会确定的新的日期是否可以接受，以及总统可能访问欧洲的时间……

至于哥本哈根，我觉得难以再谈那次会议，因为没有人把那次会议的情况告诉我们，或向我们说明阿拉伯人是怎么跑到那里去的。哥本哈根会议带来了一些工作，现在又带来一次会议，都没有通知我们，我们也无所闻。我必须十分正式地指出：这种程序是无法持久的。

我们决心划一道界限。欧洲和美国进行“磋商”的新办法已经超出了发表宣言这种基本上属于理论性的范畴。现在的政策分歧涉及我们认为生命攸关的领域。在我离开欧洲回国的途中，我飞机上那位即将为人熟悉的“高级官员”向报界谈到，现在这种程序是无法接受的，也谈到我们对欧洲—阿拉伯对话的反应。三月六日我回到国内的时候，尼克松给作为欧洲共同体主席的勃兰特写

了一封措词尖锐的信。尼克松对程序问题和实质问题都重申了大家熟悉的反对意见，决定在回顾形势以前美国暂时不再同欧洲共同体一起参加宣言起草工作。这个决定的实际后果是他推迟访问欧洲。

勃兰特很快就在三月八日作出了答复，要求继续起草宣言，认为它将“对欧美关系的讨论起缓和作用”。他希望尼克松能够在四月下半月去布鲁塞尔。至少我们已经避免在使大西洋关系获得生气的计划中处于类似恳求者的屈辱地位。但是勃兰特仍为欧洲人决定同阿拉伯人会晤辩解，认为这是一种起支持作用的行动，根本不是为了同我们竞争。

三月十一日，我无意中为保持高度紧张的气氛作出了贡献。当我向一批国会议员的夫人发表讲话时，我说欧洲始终没有从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精疲力竭的心理状态中恢复过来。我以为这是一次背景介绍会。这句话是想说明，核战争为什么会给一切方面都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害；第一次世界大战表明，伤亡超过一定限度就会使各国社会陷入分裂。虽然这句话是在谈美苏关系时说的，它却在欧洲一些地方引起了愤怒的反应。我自己的愤怒也少不了多少，虽然对象是我那倒霉的工作班子，因为他们没有通知我这个会是允许记者参加的。

同后来演出的戏剧比较起来，我的发言无论怎么说也是次要的。三月十五日，尼克松给勃兰特写了回信，拒绝为起草美国和欧洲共同体的宣言做进一步努力，把请他去签署宣言一事暂时搁置起来。这清楚地说明，尼克松把国家利益置于水门事件给他带来的问题之上；他不会不惜任何代价到欧洲去。他说：

我们认为，真正的协商关系是美国和九国之间在大西洋范围内存在已久的伙伴关系最自然、最正常的表现。但是，几个月来的经验似乎说明九国对

此尚有保留意见；因此，努力进行我们认为必要的系统阐述必然会导致继续争论以至争吵。另一方面，用折衷的语言掩饰明显的意见分歧将使我们认为带根本性的、大西洋两岸迟早必须正视的一个问题变得模糊不清，甚至可能使我们之间的关系陷入我们不希望出现的格局。因此，我的结论是：宁可等待形势进一步成熟，希望未来事态的发展将证明，作出更有组织的协商安排会给我们大家都带来好处。在这种情况下，来函中承蒙提及的我可能参加签署宣言一事当然应予推迟。

尼克松的信大部分由我的工作班子和我起草。但他一旦卷入战斗，就会不顾一切地、以他特有的击中要害的本能斗下去。他三月十五日在芝加哥经理俱乐部回答问题时相当明确地表明他的忍耐已经到了尽头。他说：

欧洲人想要左右逢源是办不到的。他们不可能在安全方面要美国参加和合作，而在经济和政治方面却要分庭抗礼甚至剑拔弩张。在欧洲人愿意坐下来在经济和政治方面和在安全方面一样进行合作以前，不应安排政府首脑会议。

三月十九日，尼克松在休斯敦全国播音员协会回答问题时又谈到同样的主题。当时已经有新的因素在起作用。

我们在中东的紧张外交活动开始取得成果。三月十八日，阿拉伯石油部长无条件地解除了禁运，但决定六月一日再行审查——结果根本没有进行。一天以后，沙特阿拉伯宣布它将把每天的石油产量增加一百万桶，以利于价格的稳定。欧洲的惊惶感立即减退，态度开始发生变化。我们坚定的反应起了某种挑破脓疮的作用。既然我们不再极力要求制定大西洋宣言或要求尼克松出访欧洲，欧洲人就不能继续幻想他们对我们有什么施加影响的力量了。危机并不是由于实质性分歧造成的。我们赞成欧洲团

结；我们只要求它不要以敌视美国作为组织原则。在磋商方面，我们只要求共同体象对世界其他一切地区那样对待我们。这次爆发是各种人和事的因素异乎寻常地搀杂在一起造成的。尼克松为水门事件遭受折磨，希思和勃兰特政府的地位都日益虚弱，蓬皮杜又患了致命的病，从而使大西洋政策陷入不必要的混乱。

其他事态也开始给政治局面带来变化。到发生爆炸的时候，几乎是绝对不愿意同法国分道扬镳的爱德华·希思已经在二月二十八日的选举中被击败。继任的工党政府在哈罗德·威尔逊领导下对欧洲团结的需要看法比较微妙。当我一个月后经过伦敦时，新任外交大臣詹姆斯·卡拉汉当着我的面告诉他的僚属，他希望停止相互刺激。三月十六日，德国驻华盛顿大使伯恩特·冯·斯塔登提出建立新的协商体制的想法：共同体不再把磋商推迟到各国外长已经就各种计划作出无法更改的决定之后进行。如果在政治司长已经取得一致意见、但尚未把问题提交外交部长的時候进行磋商，我以为如何？我告诉冯·斯塔登，这个办法很可能解决程序问题。

三月二十四日，我在前往莫斯科途中应谢尔要求在波恩停留。勃兰特也意外地参加了会晤。这两位德国领导人把冯·斯塔登的想法变成了正式建议。我事前同尼克松讨论过此事，所以当场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在讨论过程中，我们还回顾了联盟面临的一大串问题，取得了共同的意见。当时不再有任何暗示说共同体的程序不允许这么做。

一个多星期之后，乔治·蓬皮杜逝世，若贝尔的任期也随之结束。四月初，我同谢尔以及加斯东·托恩举行了充满和解气氛的会晤。托恩当时是卢森堡外交大臣；他的经历说明，即使在一个很小的国家，正直、聪明和善意也可能成为多么重要的、有时是决定性的因素。英国人接管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宣言的起草工作。这

个草案把建议中的美国—欧洲共同体宣言的要点包括进去，其他内容就舍弃了。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领导下的法国新政府由让·索瓦尼亚格担任外交部长，以一种新的精神同我们打交道。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六月份在渥太华举行下一次会议时，当前危机已经过去。那时候，勃兰特也已经被赫尔穆特·施密特取而代之。施密特早在能源会议期间就表明了他优先考虑的事项。渥太华会议只产生了一个首先是由我们建议的大西洋宣言。

我们力图通过正式宣言建立的密切关系实际上是通过共同需要、具体安排以及恢复人们的互相信任取得的。关键问题突然迎刃而解；磋商也密切了、经常化了。一九七四年年中迎来了大西洋几十年来的关系中合作得最好的时期之一。

然而自由世界的问题比人的问题更为深刻，也比能源问题更为广泛。我今天仍然深信，现代民主的生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众对于民主世界掌握自己命运的能力具有信心。当经济困难侵蚀工业国家的士气、乐观情绪和社会安定时，我认为，着重显示我们能够作出有效的集体反应，从政治上和精神上来说都具有深刻的意义。我们的分歧只能加剧西方已经普遍存在的无能为力、俯仰由人和风雨飘摇的情绪，对于世界上那些认为西方已经腐朽而且注定要完蛋的势力则是一种鼓励。挑战仍然存在。如果我们真正珍视我们的文明，就要维护使这种文明具有意义和力量的团结和共同目标。

① 转引自丹尼尔·科拉德：《从能源危机到“南北”对话》，《外交研究》（布鲁塞尔）第二十八期（一九七五年），第六四七页；理查德·P·斯特宾斯与伊莱恩·P·亚当合编：《一九七四年的美国外交关系：文献记录》（纽约：纽约大学出版社代外交关系理事会出版，一九七七年版），第三十四页。

② 米歇尔·若贝尔：《论未来》（巴黎：伯纳德·格拉塞出版社，一九七四年版），

第二八七页；米歇尔·若贝尔：《另一方面》（巴黎：伯纳德·格拉塞出版社，一九七六年版），第三七九页。

③ 威廉·M·布朗与赫尔曼·卡恩：《石油输出国组织为何易受伤害》，载《幸福》月刊，一九八〇年七月十四日。该文指出：下降幅度按美元计算为百分之二十五；按西德马克计算，石油实际价格下降百分之四十；按日元计算则下降百分之五十。“此外，在这五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石油输出国组织几乎每一个成员国都给官方价格打了很大折扣，以便增加本国出口。”

④ 例如：罗兰·伊万斯与罗伯特·诺瓦克专栏文章，《华盛顿邮报》，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三日。法国大使在致该报编者的信中否认了这个指责，见《华盛顿邮报》，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六日。

第二十一章

通向大马士革的道路：一次探索性的 穿梭外交活动

在开过能源会议之后，一直到我们和盟国发生争吵之前，我又飞往中东进行另一次穿梭式的访问。这次访问的成果虽不如四个多星期之前关于西奈的谈判那样富有戏剧性，但其影响却几乎是同等重要的。

一九七四年二月，我们制订在中东的外交战略是以在两个势不两立的仇敌以色列和叙利亚之间进行调解为中心的。一切取决于我们有无能力在这两个国家之间进行折冲，使戈兰高地的双方武装力量脱离接触。只要阿拉伯各国领导人认为美国，而且只有美国，能做到这一点，我们所持的立场就会得到尊重，即：除非解除石油禁运，否则我们就不进行调解。把这两点联系在一起是一种大胆的做法，因为我们本身也需要进行这场谈判，以继续主宰中东的外交事务和避免造成萨达特的孤立地位。但是运用石油这个武器来对付石油生产国不仅仅是一种策略。我们政策的核心就是要把那些石油消费国组织起来，它们由于担心得不到石油供应而有可能屈从于政治讹诈。在华盛顿能源会议上，我们不得不虚张声势地告诉他们，我们将不依靠任何人的帮助而独自去粉碎禁运。

很难想象会有哪两个国家象以色列和叙利亚这样难以调解的了。他们之间历来互不信任，都自称是这同一块土地上的唯一的国家，而且有一代人的时间是互怀敌意地度过的，仇恨已经成为两

国灵魂中不可泯灭的因素。叙利亚认为巴勒斯坦是“大叙利亚”的一部分，而且犹太国是实现阿拉伯统一的障碍。以色列认识到，在它的近邻之中，叙利亚是最好战和最不肯妥协的。在内心深处，埃及没有巴勒斯坦人的禀性；它必须克服民族主义情绪才能献身于巴勒斯坦的事业。埃及为了一项感情上与它这样遥远的事业，这样长期地付出这样大的牺牲，确实应该归功于阿拉伯意识的威力。黎巴嫩渴望和平，但自身离心离德，力不从心，不能在中东外交事务中起积极作用。它主张建立巴勒斯坦家园，但其出发点是消极的，即：解决在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难民问题，这些难民有破坏黎巴嫩国家结构的危险，而且后来确实这样做了。哈希姆约旦王国几乎时时刻刻都准备谈判。只有叙利亚是以不妥协为国策的。它坚定不移地拒绝承认以色列，拒绝在任何会议上和以色列交谈，拒绝接受以以色列有生存权利这一原则为基础而进行的任何调解。

在以色列人看来，叙利亚对本国犹太人进行的迫害以及它由来已久的敌对态度 and 不安情绪，不仅是难以理解的，而且也是令人生畏的。但是，令人奇怪的是（叙利亚人和以色列人对于我这种说法都感到不高兴），他们的态度和行为却是很相似的，虽然他们和埃及在这方面是完全不同的。埃及领导人举止文雅，态度温和，放眼世界。叙利亚领导人却是脾气很大，为人高傲，出言不逊。埃及习惯于它在中东的盟主地位，行为庄重而富于自信。叙利亚处处要人们承认它的功绩，它的力量都花在避免被人看不起上面。以色列有许多特性是和叙利亚一样的。

埃及总统相信自己的权威。他不需要为他所采取的每项行动争取多数支持。即使他需要这样做时，他也能把争取多数的过程掩饰得天衣无缝。自从一九七一年以来，萨达特就一直在进行这样或那样的谈判；哈菲兹·阿萨德却是首次参加谈判。他和以色列的谈判是一项众说纷纭的行动，他每天甚至每时每刻都需要争

取多数。即使他想仿效萨达特的壮举，为了长远利益而牺牲眼前利益，他也无法办到。如果叙利亚总统想要维持自己的权威，就必须寸步不让。只有在压倒优势面前，他才会屈服。以色列领导人的处境也是如此，尽管是出于完全不同的原因。

但是，如果双方都能够了解对方的内部困难（不幸的是，它们对此毫无所知），事情就会好办得多。一副窘态在镜子里照出来的形象仍然是一副窘态。双方谁也摆脱不了谁。连在双方之间开创谈判的局面都是一场斗争。

首先，以色列内阁并未作出决定要和叙利亚就脱离接触问题进行谈判。就某种意义来说，确实不存在什么以色列内阁。在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举行的没有结果的大选之后，一直在进行关于组成新政府的讨论。小小的议会一共只有一百二十个议席，而只有靠许多派别联合起来，才能组成一支联合力量，因此，执政的工党失去的七个席位是能够决定命运的。以梅纳海姆·贝京为首的利库德反对派没有能力接管政府。但是，用达扬的话来说，工党如果不“向一些小党派作出重大让步以争取它们加入联盟，”^①单纯依靠自己的力量是组成不了新政府的。果尔达·梅厄对选举的结果有如下的描述：

整个右翼现在已经结成自己的集团。必须再次组成联合力量，而要做到这一点显然是要下一番苦功的，因为我们的传统伙伴宗教集团，在谁来领导以及在这极为艰难的时刻应该采取什么政策的问题上，本身存在着深刻的分歧。^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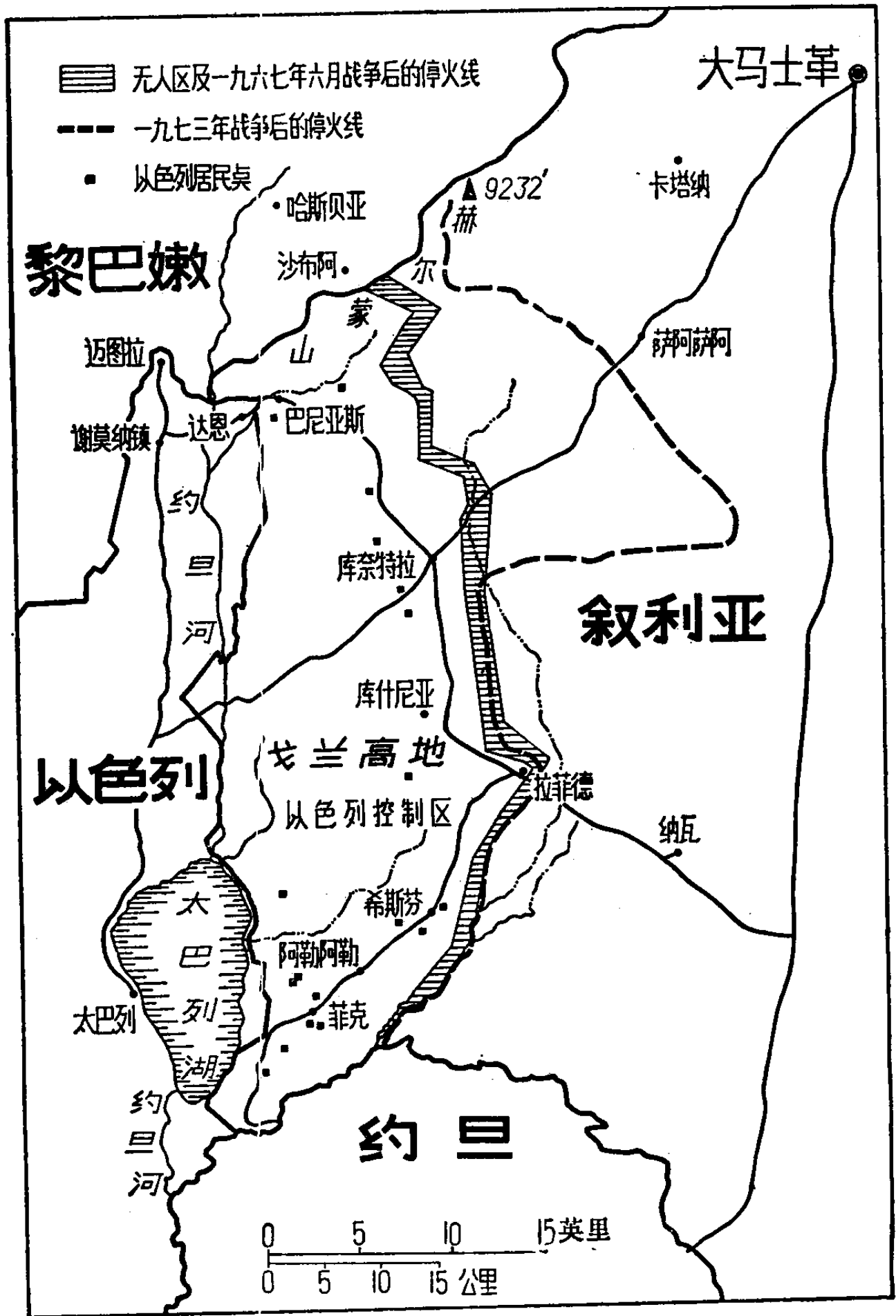
与此同时，旧的内阁部长们还都被冻结在自己的职位上，因为以色列法律有一条古怪的规定，临时政府的成员是不准辞职的。过渡政府比任何其他以色列内阁都更为稳定，但是它深知自身寿

命不长，不得不在充满危险、诱惑和压力的情况下设法周旋。它完全了解，如果不在戈兰高地采取相应行动，和埃及达成的脱离接触协议可能会逐渐失去意义，而且人们也就会责怪是以色列使石油禁运持续下去。但是，它也了解，以色列的公众情绪认为与叙利亚缔结和约是一种幻想。在这段时期里，戈兰高地上的叙利亚和以色列部队之间的零星炮战一直连绵不断。

此外，戈兰高地并非西奈半岛。苏伊士运河离以色列的一九六七年边界线有二百多公里之遥，中间是毫无价值和渺无人烟的沙漠。在一九六七年战争之后，以色列在戈兰高地推进了二十五公里；在一九七三年战争之后，以色列又向大马士革挺进了大致相同的距离。戈兰高地的情况从各方面说都比西奈半岛复杂得多。可以进行讨价还价的土地要少得多；几乎每块土地都具有战略意义。在西奈半岛，以色列的定居点不多，而且主要都靠近以色列边界。但是以色列在拥挤的戈兰高地上却建立了二十多个定居点，其中许多定居点距离一九六七年停火线（见图）只有几公里。由于以色列有史以来还从未放弃过一个定居点，它当然不会为了一项区区的脱离接触协议而这样做，为了达成撤军协议而进行妥协的余地就很小了。而且，据估计，叙利亚一定会重新往这个地区的城乡移民，使成千上万的老百姓涌进这个地区，使以色列的安全问题以及监督限制军备协议的实施问题都变得很复杂。最后，叙利亚有些邻国，具体地说象激进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统治下的伊拉克，是反对和以色列进行任何谈判的，而且和在大马士革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是死对头。

由于以上情况，双方各不相让，提出各种蛮横无理的要求来对待和平进程。但是，值得称颂的是，以色列内阁和叙利亚总统都克制住了自己的疑虑。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日星期日，我们开始对显然是无法调解



戈兰前线十月战争后的停火线

的双方进行调解工作。埃以脱离接触协议签署之后，在归国途中，我在大马士革作了停留，以显示我们关注叙利亚前线的进展。阿萨德向我倾吐了他对脱离接触的设想。这些设想并不是谦让的。他显然缺乏谈判经验。他就以色列撤军问题提出三个可供选择的方案，并肯定地说，只有最有利于以色列的那个方案才会得到考虑。但是并没有得到多少考虑。连他那最低限度的方案也要求以色列放弃在一九七三年战争中占领的全部叙利亚领土，以及一九六七年所占领的戈兰高地的一半，而以色列所得到的只不过是停火和双方武装力量脱离接触。但是，叙利亚具有谈判的愿望这一点，比起它所持的强硬路线来说，要更有意义。这标志着叙利亚态度的显著改变。为了给人以取得进展的印象，我在当天晚上抵达特拉维夫，向以色列谈判代表团转达了阿萨德的设想，以色列代表团很勉强地听取了我的转达，连讨价还价的兴趣都没有。

我回到华盛顿之后，在一月二十八日接到梅厄夫人的正式答复。为了避免把问题提交给她的过渡内阁，她提出了一个条件：在没有迹象表明叙利亚将遣返它所扣押的以色列战俘之前，不能进行谈判。作为最低要求，以色列要求得到战俘名单，并由红十字会进行探视以核证战俘所受到的待遇。这时，我对于应该如何解释以色列的方案已经变得比较有经验了。我向以色列大使西姆查·迪尼茨指出，梅厄夫人有意避免表示，如果这些条件实现了，她就接受谈判。迪尼茨承认情况确实如此，因为内阁没有作出决定，所以只好这样做。但是他认为只要叙利亚接受这些条件，很可能开始谈判。

我决定根据这一假设采取行动。一月二十九日，我通知阿萨德（和萨达特）说，如果叙利亚提供战俘名单并允许红十字会进行探视，很可能以色列就会提出关于脱离接触问题的反建议。一月三十日，迪尼茨确认了这一点。在这以后的几天中，我在华盛顿拟定

了一个一揽子交易的方案和时间表，并在二月五日送交阿萨德。

方案共分五步。第一步，我们把叙利亚扣押战俘的人数通知以色列。第二步，叙利亚把这些以色列战俘的名单送交它在华盛顿的照管利益办事处。第三步，要求以色列提出一项关于脱离接触的建议，送交给我以换取战俘名单。第四步，在红十字会官员对在叙利亚的以色列战俘进行探视之后，我再把以色列关于脱离接触的建议送交阿萨德，并同时要求以色列派出一名高级官员到华盛顿商谈可能需要作出的修改。第五步，开始谈判的进程，谈判的机构就是现有的设在日内瓦的以色列—埃及军事工作小组。

我强调指出，在解除石油禁运之前，我不着手进行谈判。我指出：“只有在解除石油禁运之后，我才能够和以色列开始努力实现叙—以脱离接触这一紧迫问题。”二月六日，我指示驻开罗的赫尔曼·艾尔茨把上述建议通知埃及外长伊斯梅尔·法赫米，并强调指出，石油禁运应“立即”解除。

阿萨德只用了四十八小时就完成了我所提出的第一步。二月七日，我们得到通知说，在叙利亚的以色列战俘共有六十五人。这个数字超过了以色列的预料，而且让以色列有了底牌。他们知道，作为脱离接触协议的一部分，叙利亚遣返的人数不会少于这个数字。

苏联的窘境

与此同时，另一位来访者却增加了我们的困难。苏联外长安德烈·葛罗米柯在陪同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访问了哈瓦那之后，于二月四日至五日在华盛顿作了停留，责怪我们在中东采取了“单方面”行动。在他会见尼克松之前，我给尼克松写了一份备忘录，其中综述苏联的中东政策所带来的问题：

苏联人对于美国和以色列以及和阿拉伯国家的谈判的进展速度感到意外,并为自己实际被排除在外而恼火。至少在初期,他们怒形于色,特别是对埃及人。但是近来,正如勃列日涅夫在古巴发表的谈话所表明的那样,苏联人似乎转而使自己适应脱离接触的概念以及零敲碎打地达成临时解决办法的做法……他们正在运用他们在大马士革的一切影响,鼓励叙利亚人进行自己的关于脱离接触问题的谈判,但条件是必须牢牢地和日内瓦谈判挂钩,而且苏联人要在其中起作用。

最大的未知数是,在下一阶段中,苏联人是否会变成一支破坏性的力量。他们是否会……阻挡任何认真的谈判或使谈判复杂化,例如采取压巴勒斯坦人参加日内瓦谈判的办法。总之,他们可以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法,确保在比较带根本性的问题上僵局不被打破。莫斯科所冒的风险在于,谈判将成为一场对抗,而且带有新的战争风险。由于这个原因,苏联人可能会支持脱离接触,因为这会使双方都难以诉诸武力,但又能使基本问题悬而不决,使苏联人可以从操纵。

葛罗米柯在二月四日下午四时半会见尼克松时情绪特别阴郁。总统和这位怒容满面的苏联外交家分别坐在椭圆形办公室壁炉前的两把直背安乐椅上。国务院参赞赫尔穆特·索南费尔特、沃尔特·斯图塞尔大使和我并排坐在尼克松椅旁的沙发上。我们对面的沙发上坐着苏联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和翻译维克托·苏科德烈夫。葛罗米柯指责美国全面破坏协议。这指的是几个月前我在十月份访问苏联时所达成的协议,其中规定,中东谈判将在美苏联合“主持”下进行。他声称,苏联也拥有自己的力量,可以在中东采取单方面行动。如果苏联决定要使这种行动具有破坏性,它是办得到的;但它迄今为止并没有这样做。他补充说,如果我们联合起来行动,早就会取得更大的进展了。

葛罗米柯关于美苏“主持”的说法是希奇古怪的。我们在莫斯科同意联合主持,是为了使得阿拉伯国家更容易接受和以色列直

接进行谈判的做法。即使在当时，我们也把美苏的参与局限于开始阶段以及其他“关键”时刻。谁也没有想到会把这种“主持”强加于可能愿意采取不同做法的另一方，谁也没有想到会援引这项协议来制止正在取得进展的谈判。当时，我们完全没有想到，我们认为苏联盟国的那些国家会终于想摆脱苏联而单独进行谈判。但是事实确实是这样。

葛罗米柯声称，苏联的参加将会推动事态的发展，这恰好和我们的估计相反。如果葛罗米柯从头到尾参加谈判，他一定会遵循老一套的苏联谈判方法。他将提出一项详细的全面和平计划，从一般原则到具体的细节。然后他就会按照这个议程强行干下去，会议疲塌地不断开下去，每开一次会，僵局也加深一次。这种战术用来拖垮西方热爱和平的中产阶级社会是有效的，但是在爆炸性的中东，这种战术将会使紧张局势加剧到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此外，苏联的政策是墨守它对阿拉伯立场的片面理解，只会使进程僵硬，而不是灵活。即使人们假设苏联人具有谈判诚意，其谈判方法也是不得力的。如果连诚意也没有，所有的危险趋势将会加剧。萨达特也同意这种看法，更不用说以色列了。自从莫斯科在一九六七年断绝和以色列的外交关系以来，以色列对于苏联参加谈判一事毫无兴趣。

葛罗米柯还威胁说，莫斯科有能力纠合别的阿拉伯国家来反对和平进程，我们认为这是夸大其词，至少在谈判初期是如此。阿尔及利亚总统胡阿里·布迈丁曾对我说，他赞成我们采取的战略。莫斯科的盟国叙利亚坚持要美国扮演象在西奈半岛那样的角色，也就是说，撇开苏联。这就使苏联的伙伴只剩下伊拉克和利比亚了，这样的基础是不足以挫败我们的努力的，特别是由于伊朗是我们的盟国，它把伊拉克武装力量牵制在它的东部边界远离叙利亚的地方。

因此，我们不准备改变战略，但也不愿意得罪苏联。它捣乱的能量是很大的。苏联如果对我们的政策进行全面抨击，会使我们的努力更难成功。当时正在闹水门事件，我们没有把握会得到国内的支持。我们想冷静地处理这件事情，从容对付这次葛罗米柯的访问。

椭圆形办公室的会谈充分表现出尼克松搅浑水的本领。他善于说一些空洞的哲理，但却能制造出他信任对话者的假象。尼克松轻松愉快地表示，他对外交上取得的进展是满意的。美国之所以表现得活跃是因为当事双方要求它这样。没有纪录表明，我们曾经反对过这种现象，但是尼克松照样声明他是主张和苏联共同作出努力的。另一方面，超级大国的具体处境各有不同。“有些地方我们进得去而你们不行。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一点。”换句话说，尼克松主张超级大国去中东进行合作，只有那些不能实现他的目标的地方除外。尼克松认为，合作的方面和方法，是应该由葛罗米柯和我来解决的策略问题，这就使他自己处于超脱的地位。尼克松说话时带着他那种乡村少年的稚气，就好象在一个他没有过问的小问题上发生了什么了不起的误会一样。他是竭力主张美苏在中东和别的地方进行合作的，但是不能指望他去过问细节。尼克松高高兴兴地结束了这场谈话，他表示相信葛罗米柯和我们会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葛罗米柯也不是个傻子。他完全懂得，尼克松没有给他什么实实在在的东西。实际上，在他结束和总统的谈话时，他又回到了他开始谈话的地方。另一方面，尼克松作出许多诱人的暗示，诱使象葛罗米柯这样的老手去向我要具体答案。葛罗米柯果真在二月五日一次私下会晤中这样做了。我的搪塞功夫一般地说的不如尼克松的。而且，葛罗米柯也不允许我做到象国家元首从礼仪上讲可以做到的那种空泛程度。葛罗米柯采取的办法是一口咬定尼克

松已经原则同意，除非苏美取得协议，否则就不在中东采取行动。当然，我比他更了解我的这位诡计多端的领导人，而且我也怀疑葛罗米柯真的这样看。这个主张之所以这样极端化，仅仅是为了掩饰苏联的窘境。葛罗米柯别无他途。他要参加的是一场他作不出什么贡献的外交行动，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争取扮演的角色是连他的阿拉伯被保护者都不支持的角色。

我们的目的不在于使苏联难堪，而在于取得行动自由。如果莫斯科对于中东的稳定真感兴趣，我们在谈判中所起的这种核心作用将只是刺伤它的虚荣心，而不会有损于它的利益。为了除掉中东局势中的导火线并打开实现和平的局面，叙利亚和以色列脱离接触是必要的。我们从中调停给我们带来的长远利益不会多。一般的国家很少为已经取得的好处付出代价。我们在中东的长期影响将取决于我们以后能够作出什么贡献。但是葛罗米柯还是检验了一下我的本事。我提出一项含糊的保证，美国原则同意和苏联互通情况，而且在合适的情况下协同行动。他要求我谈得具体些。我只好拿当事双方作为挡箭牌。我回答说，老实说，我们必须征求他们的意见。问题的要害当然不仅在于莫斯科和耶路撒冷之间没有外交关系，而且在于苏联单方面对阿拉伯国家提出的、经过实践证明为不可能实现的纲领承担了义务。正是由于看到苏联人不会取得进展，才使得苏联人在中东的最亲密的盟友，例如叙利亚倒向我们，就像萨达特已经改变了方针那样。

在葛罗米柯方面，他设法判定在联合行动问题上我们究竟愿意走多远，而在我这方面，我也想设法了解究竟苏联能够促使阿拉伯采取多大的灵活性。事情很快就弄清楚了。苏联人认为他们对谈判能够作出的主要贡献在于美苏“保证”和平协议不至于遭到破坏。照葛罗米柯的说法，这就使超级大国有权在观察到出现破坏协议的情况时进行干预，如果我们同意就联合进行，否则就单方面

进行，就像在十月战争处在即将爆发状态时莫斯科曾经打算做的那样。对这样的协议我们当然不感兴趣。我试探他的具体想法。是否必须得到中东各方的同意，或请求？他究竟有什么想法？如果中东各方提出请求，我们并不排除参与保证，但是我们不愿参与一项强加于中东各方的协议。葛罗米柯讥讽地说，他看出我们“缺乏热情”。实际上他和我都是角逐的老手，对于我们的行动的含义不抱任何幻想，但又对美苏关系负有重大义务，不愿引起公开破裂。

我们的战略是要削弱苏联在中东的作用，因为我们和苏联在这个地区的利益（以及我们两国不同的外交风格）是不可调和的，至少在苏联坚持推行一项最高限度的阿拉伯纲领而且不肯劝说它的被保护者作出让步的情况下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美苏外交最多只能做到使美苏关系的其他方面让苏联保持足够的利害关系，以冲淡我们两国中东政策互相冲突的影响。我们做到了这一点。苏联人不敢在美苏关系的其他方面冒关系恶化的风险。因此，就这点意义而言，是缓和使美国能够在中东进行一场外交革命。在同苏联公开对抗的时期，我们是不会有这种通行无阻的可能的。中东局势有力地驳斥了那种把缓和说成是“单行道”的风凉话。

我遵守我向葛罗米柯许下的诺言，就苏联的建议征求中东各方的意见。我在二月六日给叙利亚人的信中说：

将来，所有我们在中东的外交活动应在美苏联合的基础上进行。方式应是联合的。他们还要求一切活动都在日内瓦进行，而且由美苏参加在日内瓦举行的有关各方的一切谈判。

我们不得不征求大马士革的意见还有一层原因。几乎可以肯定葛罗米柯会向阿萨德通报他在华盛顿会谈的情况，因此，如果我们向叙利亚人转达什么情况，克里姆林宫很可能会从叙利亚人那里了

解到。以色列的反应是可以料想得到的。它绝不会同意苏联拥有否决权，或苏联参加一切谈判。

叙利亚人的反应比较有意思，而且是模棱两可的。他们提出两个问题。一、我们是否告诉过莫斯科我们正在征求阿萨德的意见？二、我们是否向莫斯科透露过我和阿萨德交换意见的内容，包括我们二月五日提出的开始谈判的计划？这就意味着莫斯科和大马士革之间的联系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密切，具体地说，我们据以行事的这项计划，叙利亚的盟友似乎并不了解。叙利亚人显然由于莫斯科可能从我们这里了解到他们没有通报的情况而感到紧张。他们提出的问题展现出一幅引人入胜的前景，他们可能要不顾盟约把苏联人排除在外，而且正在掂量这样做会有多大风险。事实上，问题本身就说明了答案，因为如果叙利亚坚持要苏联参加，它就会欢迎我们告诉莫斯科我们正在征求它的意见。二月八日，我们小心翼翼地答复叙利亚人说，我们只告诉葛罗米柯，我们将征求叙利亚人的意见，但没有说明在什么具体的级别上进行。我们并没有把二月五日计划的细节告诉苏联人。

阿萨德立即根据我们提供的情况采取了行动。二月九日，我们收到阿萨德直接发来的极为谨慎而巧妙的正式答复。叙利亚总统感谢我向他提供美苏关于中东问题会谈的情况。他说，叙利亚不反对美苏协同行动，但是由于了解情况不够充分，难以提出实现这一点的具体计划。如果这项答复具有什么含义的话，那就是，叙利亚将对美苏联合进行调解一事给予默认，如果我们希望它这样做的话；而且叙利亚不会冒损害它同莫斯科的关系的风险去反对这种调解，但也不会作出努力去推动这件事。

显然，阿萨德对于苏联的参加是不太乐意的。他特别强调指出，莫斯科在大马士革并不享有优先的谘询地位。对于我向他转达的苏联提出的协同行动计划，他甚至不加评论。就在这封信里，

阿萨德接受了我们在二月五日提出的计划中所建议的程序。该程序排除了莫斯科，由美国充当调解人。这时，我们剩下的疑团也消失了。

这一过程戏剧性地说明，自从埃及签署脱离接触协议以来的三个星期里，叙利亚迈出了多大的一步。它透露了在押战俘的人数；它答应向我们提供战俘名单，并允许红十字会进行探视；而且它接受了美国从中调解的程序。作为回答，我们现在必须交给叙利亚一份以色列对于阿萨德关于在戈兰高地脱离接触的设想的答复。但是，首先我们必须表明，关于戈兰高地的谈判将不孤立地进行。因此，第二天，我对阿萨德的积极态度表示赞赏，但是明确表示，如果石油禁运不解除，谈判就不会开始。

正如国务卿在二月五日的信中向阿萨德总统表明的那样，一旦石油禁运问题得到解决，他将同以色列人一起开始采取我们在关于程序的建议中所列举的各项步骤……我们的进一步的步骤必须有待禁运问题的解决。

同时我们也向萨达特、布迈丁和费萨尔发出了同样内容的信件。从二月十二日起，他们和阿萨德一起，将在阿尔及尔举行小型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在华盛顿能源会议期间，我们一直在等待这次阿拉伯会议的结果。

法赫米和萨卡夫访问华盛顿

在华盛顿能源会议期间，有一句流行的话，那就是：必须避免和石油生产国进行对抗。人们谈论到消费国和生产国进行对话的必要性时，用词近乎做礼拜那样一本正经。广为流行的看法是，怀疑美国是否以同样的热情对待这些目标。但是阿拉伯石油生产国

并没有向作为会议组织者的我们发出怨言。在阿尔及尔举行的阿拉伯首脑会议并没有特别地去注意这次华盛顿的秘密会议。我们扬言要退出谈判，却并没有导致再次挥舞石油武器，而是引起人们再次向美国呼吁，要美国参加关于叙利亚问题的谈判。

这一点并不是马上就能看清楚的，因为主要领导人的真正意愿被阿拉伯舆论的呼声所淹没，而这种呼声又是为激进派所左右的。这时我已深信，参加阿尔及尔会议的领导人，包括萨达特、布迈丁、费萨尔，甚至阿萨德，都认为禁运是个累赘。但是他们又都不想冒被人指责为立场不够坚定的风险。人人都乐于接受别的兄弟国家作出的决定，但除了萨达特以外，谁也不愿被人们当成主谋者。这对沙特阿拉伯来说特别是个问题，它主张照顾阿拉伯整体利益的立场是和它的信仰相一致的，也增强了它抵御贪婪的激进派邻国的力量。从一系列令人费解的事态发展中可以看到这种矛盾心理。

按原定计划，在阿尔及尔会议之后，应该于二月十四日在利比亚的黎波里召开阿拉伯各国石油部长会议，考虑解除禁运问题。最初从阿尔及尔传来的消息说，的黎波里会议被取消了，这意味着小型首脑会议的四名领导人对于阿拉伯世界其他国家的支持到底有多大，心中还没有把握。然后又发表了公报，“完全一致”地重申，要求以色列全部撤军，并“保证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在自己的领土和国家中所享有的权利。”

据解释说，这种强硬的反应是对以色列毫不退让的态度的答复。果尔达·梅厄总理确实在二月九日对戈兰高地的一群以色列定居者发表了一通极为欠妥和不明智的谈话。她为人聪明，不致于不懂得其中的外交风险，但是她正在受到反对党领袖梅纳海姆·贝京的攻击，指责她退让过多，对谈判对手态度软弱，而且一些可能和她在政治上结成联盟的宗教政党也要求她采取强硬态度。她

声称,她认为戈兰高地及其定居点是以色列不可分割的部分,因而不能想象从一九六七年和叙利亚划定的停火线上撤退,也不能撤出库奈特拉城。二月十一日我告知迪尼茨,果尔达的谈话发表得太不是时候了。二月十四日,我们告知大马士革,我们已经“通过外交途径和以色列人就梅厄夫人关于戈兰高地的谈话进行了磋商。”

但是,后来的事实表明,阿尔及尔公报只不过是一种障眼法。在激进派的注意力被公报的强硬词句吸引住的时候,沙特阿拉伯外长奥马尔·萨卡夫和埃及外长伊斯梅尔·法赫米被派到华盛顿来,把会议的“秘密”决定通知我们。没有人事先向我们预告他们的到来,当时我刚到比斯坎岛,准备和总统一起在那里度过一个安静的周末,却不得不马上赶回华盛顿。

与此同时,我收到了参加阿尔及尔会议的各国人士分别发来的报告。布迈丁的首席助理告诉我们说,将在石油部长会议上解除石油禁运;叙利亚人不久即将向我们提供以色列战俘名单,以履行我在二月五日提出的程序;四位领导人认为,我应该立即奔赴中东,以使谈判进程得以开始。但是,不久我们又得到沙特石油部长亚马尼的报告,他对詹姆斯·艾金斯大使说,小型首脑会议失败了。阿萨德态度“强硬”。在西奈半岛实现脱离接触只让以色列得到了好处。这次我们必须使以色列先从戈兰高地初步撤军,然后才能解除禁运。亚马尼向我们通报的情况究竟是一般传闻还是内部消息?艾金斯后来报来了他和费萨尔国王会见的情况,国王的说法和往常一样是模棱两可的,即:如果不在叙利亚问题上取得某些进展,解除禁运将是难以实现的。国王认为我应该亲自奔赴中东,以示诚意。

二月十六日,叙利亚官员告知我们驻大马士革代办托马斯·斯科特(他十分精明强干,是一位年轻的乔·西斯科)说,决定分阶

段解除禁运。在下一一次石油部长会议上部分解除禁运，然后在戈兰高地实现脱离接触时再完全解除禁运。他说，采取这种有意刁难的程序是由于果尔达·梅厄最近发表的谈话。据说，在叙利亚政府内部，阿萨德连提出讨论脱离接触问题都遇到强烈反对；如果他想继续推动这一进程，就不得不首先证明他是有勇气的。换句话说，为了使和解的立场成为可能，必须先作出强硬的表现。这就是中东。

这些既有矛盾又有一致地方的消息说明，他们采取了某种连环套式的决定。将随着我们在戈兰高地取得的进展相应地解除禁运。但是，虽然阿尔及尔会议的决定可能是结束禁运的一种保全面子的办法，它却必然会把我们引进一种要价越来越高的圈套，对这种要价我们除了拒绝，没有别的办法。叙利亚提供战俘名单的打算（尚未正式提交给我们）是有希望的征兆。但是，它也可能是一种策略，如果叙利亚诱使以色列提出的脱离接触建议是不能接受的，或者是条件苛刻的，叙利亚就可以继续坚持禁运。而根据以色列的谈判作风和果尔达的国内困难来看，这种前景是很可能出现的。如果叙利亚的领导人所见到的只是一纸计划而没有人为他们说明情况的话，那末我亲自去中东一趟，可能有助于缓和一下他们必然会作出的那种尖锐反应。另一方面，如果我在中东期间谈判破裂，我们就再也没有其他办法可用了。不论禁运解除与否，人们都可以用我在这场作为挡箭牌。

我倾向于全力以赴，在完全解除禁运之前，拒绝采取任何进一步的行动。这一次，尼克松却不愿意强行摊牌。他处于逆境已有十个月之久，但这时他仍抱有希望，想在他亲自领导下一举解除禁运，以此作为治愈他的水门病症的灵丹妙药。在这个问题上，他失去了通常是正确的政治判断力。他懂得加油站前的长龙意味着政治灾难。但他却不能使自己正视这样一点，即：结束这种排队现象

并不保证能拯救他的政治生命。即使是最辉煌的成就也不能制止那台正在无情地折磨着他的沉重的末日机器的转动。因此，每隔几周，总统就提出一项新的计划，派遣特使去向费萨尔国王递交一份从个人友谊出发的呼吁书。我一贯反对这种低三下四的做法，因为它只会增加新的压力而不会消除压力。但因为我都是从尼克松把想法告诉他们的那些人那里得知的，我没有机会（这本来就是尼克松的打算）直接表示反对。

二月七日，就在我们为了无条件地结束禁运而施加压力达到高峰的时候，尼克松又发动了一次这样的攻势。他利用我对巴拿马进行一天访问不在华盛顿的机会，通过沙特大使发出了个人呼吁。尼克松在地图室会见了她，以强调会见的特殊性质，还叫来了摄影师。然后总统实际上提出了个人保证，结束禁运不仅会使戈兰高地问题得到解决，而且会实现永久和平。他谨慎地避而不谈最后的边界线，但是他毫不含糊地表明了他的倾向：“我们将尽快达成一项永久性的解决办法。我任期内的全部声望有系于此。你们应该懂得，这意味着我要从我国的某些集团手里夺回声望。”尼克松表示，他有兴趣亲自访问中东，就在这年春天成行。

我事先毫无所知。由于在过去三周里我一直坚持要无条件地结束禁运，当我得知这次突如其来的会见时，心里当然是不高兴的。因此，我和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照例交换了意见。我得知消息后，立即从前往巴拿马的飞机上给他拍了一份电报说，我认为这次会见是“危险的”，而且是“破坏性的”。斯考克罗夫特答复说，召见大使要比其他方式——例如把总统特使派往沙特阿拉伯等好。这是斯考克罗夫特的典型的陈词滥调，这肯定既是为了平息我的不满，又想加深我的不安。结果是，召见大使这件事并没有产生可以看得见的这种或那种影响。

这时阿尔及尔会议已经开过，我敦促总统利用法赫米和萨卡

夫访问强行摊牌。我建议通知两位外长，除非他们准备作出关于无条件地结束石油禁运的承诺，否则尼克松将不接见他们。不论发生什么事情，我将前往中东履行二月五日对阿萨德所作的安排，即听取以色列关于脱离接触的计划，作为对叙利亚提供扣押在叙利亚的以色列战俘名单的报答。但是，我们应当表明，进一步的进展将取决于阿拉伯的石油政策。我们不会在压力下行事。尼克松持怀疑态度：

我唯一感兴趣的是禁运。这是全国唯一感兴趣的问题。他们才不管叙利亚怎么样了呢！我们的问题就在这里。我认为我们应该见见他们。但是，我还没有认识到我们要制造这样一种印象，即：如果这件事不能和禁运联系在一起，你还得到中东去。瞧，问题就在这里。

我答复说：“总统先生，这不能和禁运联系起来。我认为，我们越是突出禁运，解除禁运的可能性就越小。”

每逢在政治考虑和外交政策的实质这二者之间进行选择时，尼克松几乎总是最终服从战略需要的，这次他也这样做了。他同意，我们不再进一步商谈禁运问题。我们反对挂钩。或者更精确地说，我们要利用这个问题来打击石油生产国。除非对方承诺无条件地结束禁运，否则他将不接见两位使者。因此，二月十六日，我向我们驻开罗、吉达、科威特、阿尔及尔以及大马士革的外交使团发出新的训令：

作为未来我们的总立场的一个内容，我们准备不再提禁运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已经一再表明过我们的立场。我们不准备再私下或正式地提出什么请求了。因此，驻外机构不应再作公开或私下的表态。在这个问题上，如果还有什么话要说，应该由华盛顿来说。

伊斯梅尔·法赫米和奥马尔·萨卡夫在二月十六日深夜抵达华盛顿，打断了我两个月来第一个安静的周末。他们显得有点狼狈，因为路上飞机上的一台碾咖啡的机器爆炸了，这件事使萨卡夫认为他们已成了犹太复国主义阴谋活动的对象。人们很快就平静了下来，并恢复了常态。他们向我作了一场阿拉伯世界团结和个性之间的矛盾的典型表演。

萨卡夫和法赫米是阿拉伯兄弟，但他们又是争雄的对手。从许多小地方可以看出这一点。我去机场把他们接了回来，安顿在肖拉姆饭店，给了他们每人一个套间。我们在萨卡夫的套间里举行会晤，因为从工作年限来说，在这两位特使中，他的资历较高。这对法赫米来说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因为法赫米的职衔是外交部长，而他的沙特同僚虽然干着同样的事，却只拥有国务部长的头衔。把他们安顿好了之后，我告诉他们，我准备到中东去，把叙利亚提供的战俘名单提交给以色列，以换取以色列就戈兰高地脱离接触问题提出具体建议。我对他们说，我的估计是，以色列初次提出的这个建议必然是叙利亚所不能接受的。这项建议的主要价值在于它象征着谈判的开始。但是，美国不同意把以色列的表现和继续石油禁运这两件事联系起来。如果他们想见尼克松总统，就必须首先承诺，不论我此行成败如何，一定要解除石油禁运。

法赫米和萨卡夫都是有经验的外交家。他们懂得，如果没有受到总统接见而离开华盛顿，对他们来说面子上是过不去的，也会使他们两国各自的政策受到旁人的怀疑。他们立即理解到，筵席已经散场，现在得作出决定了。作为职业外交家，他们并没有争辩或责骂，而是寻求解决办法。他们将立即请示国内；四十八小时内可以作出答复。

于是就产生了在这期间应该怎么办的问题。当我陪同法赫米到他住的套间去时，他提议在两位特使一起转达统一的口信之前，

由他单独会见总统，这样他就可以向总统通报阿尔及尔会议的“实情”了。当然，会见应该是秘密的。我告辞时，他坚持送我到旅馆门口，而不只是送到他住的套间门口。这样做，部分原因是出于传奇式的埃及礼仪。同时，我也产生了一种说不出口的想法，他是在用一种干净利落的办法不让我单独会见萨卡夫。

我决定不使沙特人感到不高兴。我坐上高级轿车，吩咐司机把车子绕过一条街开到旅馆的另一个门口。幸运的是，肖拉姆饭店面积很大，有周旋的余地。我又进入旅馆，拜访了萨卡夫。我马上发现，就处处想胜人一筹这一点来说，阿拉伯人的想法是相似的。他也提出，希望在转达统一的意向之前，单独地秘密会见尼克松。他认为，他能够对于总统理解他们口信的真正含义提供重要的帮助。

我对这两位朋友太了解了，因此对这种会见能否保守秘密不抱希望。他们要求举行这种会见，有一半的兴趣就在于可以向全世界表明，他们和美国保持着特殊关系。我来了个折衷，在二月十七日星期日分别会见了萨卡夫和法赫米，对形势进行了多次回顾。我还同西姆查·迪尼茨共进早餐，说明我们的战略。与此同时，以色列内阁又做了一件使问题复杂化的事。它通知我们说，它拒绝在日内瓦的埃以军事委员会里讨论和叙利亚脱离接触的问题。这原本是二月五日五点计划中的一项步骤。（幸运的是，如果我们按照既定程序由我进行穿梭访问，这件事就会变得无关紧要了。）

我还需要听取关于阿尔及尔会议的阿拉伯国家的正式意见。当时已经听到的说法只不过是笼统地提到要把解除禁运和叙—以脱离接触问题联系起来。

在两位特使抵达华盛顿的三十六小时之后，二月十八日星期一上午十一时三十五分，他们终于接到国内新的指示，前来国务院见我。他们说，可以使解除禁运和叙—以脱离接触问题脱钩。我们

的策略奏效了。以色列战俘名单正在送往华盛顿的途中，将在我即将动身前往中东之前递交给我，以便转交给耶路撒冷。这个问题解决之后，萨卡夫说得很有道理：“亨利，我不明白现在我们还有什么要谈的。你见到了我，你也见到了我的朋友。我看不出还有什么问题了。”但是我还是要把情况确实弄清楚：

基辛格：我理解你的意思是说，已经原则上决定要解除禁运。

萨卡夫：在三月一日。

基辛格：在下一次石油部长会议上。

萨卡夫：在两周或十天之内。

基辛格：这实质上是无条件的。已经作出决定。其次，你要求我们竭尽全力促成叙一以脱离接触。第三，四位政府首脑认为，如果我前往中东，将对事态有所帮助。你建议我在伊斯兰国家会议（二月二十二至二十四日在拉合尔召开）之前前往中东。

萨卡夫：在你去墨西哥之前。

基辛格：（笑）好，要我去墨西哥之前去中东做不到，但在去墨西哥之后我会马上去的。上面说的和你的理解一样吗？……

萨卡夫：是的。

基辛格：我现在就向总统全面报告此事。

下一个问题是，应该怎样处理即将送来华盛顿的战俘名单。如果把它留在叙利亚驻华盛顿代表机构，一直到一个多月之后我即将动身前往中东之前才交给我，就会有点讹诈的味道。而且，叙利亚领导人可能改变主意。如果我们现在就把它转交给耶路撒冷，当时以色列内阁正处于要它成立联合政府的压力之下，我到达那里时又会提出新的条件。更重要的是，如果以色列提出的戈兰高地方案确实态度强硬得和我所预料的那样，大马士革会由于这项方案是经过十天的准备方始出笼这一点而感到更加恼火。

我们最后决定采取一种折衷方案，其曲折程度很符合阿拉伯人的复杂头脑(更不用说我的了)的要求。法赫米和萨卡夫将要求叙利亚驻华盛顿代表把战俘名单装在密封的信封里交给我。我将把它保存在保险柜里一直到离开的那一天。我在中东停留的第一站是大马士革。我把信封从美国带去，又从叙利亚带往以色列，作为交换，以色列将交给我一份关于在戈兰高地脱离接触的方案。这样，双方的面子都可以保全。叙利亚不会过早地付出代价；以色列的目的也达到了。我们又可以说，由于时间仓促，未能提出一项可供谈判的方案。这是一种巧妙的典型中东式的做法，应归功于这两位特使。

二月二十日，在华盛顿向我递交了一份装在密封的信封里的战俘名单。我把它放在我的保险柜里。我对原来的行动计划作了一点修改。为了平息果尔达的怒气，我通过迪尼茨极其机密地告诉她，名单已到我手，我将在二月二十七日从大马士革到达以色列时交给她。果尔达向我证明，以色列政府如果愿意，是可以予以保守秘密的(也许她根本就没有告诉别人)。我事先向她透露的消息一点也没有泄漏出去。*

最后，在两位特使抵达华盛顿三天之后的二月十九日，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会见了他们。尼克松经过在佛罗里达州的四天休息之后，精神焕发。萨卡夫、法赫米和我对过去三天中反复争辩的论点加以仔细的描述；如何避免这种实际上存在而在外交上又不能允许的挂钩。尼克松要求我加以归纳。我重复了上次会议的主要论点，强调指出，解除石油禁运是无条件的，阿拉伯国家的部长们要求我们做的只不过是“尽量施加影响”，以实现叙一以脱离接触。法赫米自始至终十分帮忙，这时他肯定地表明，我的归纳是正确

* 在我把名单交给以色列之后，我告诉随行记者，实际上我在去大马士革之前就已经拿到名单了。

的。萨卡夫懂得他的国家应该保持微妙的平衡，他婉转地表示异议，他对“无条件”一词作了新的说明：“关于解除禁运，的确不存在条件，但是你们应该记住，不会无代价地解除禁运……不会在不发生某些别的事情的情况下解除禁运。”

我表示强烈反对。尼克松就我们在中东问题上反对挂钩的立场（虽然我们在东西方关系问题上主张挂钩）作了独到的、天才的阐述。我们要求把解除石油禁运作为一个单独的问题来解决，以便更好地帮助阿拉伯国家。

我们将为实现和平而努力，并提供你们要求的帮助，包括给予援助。如果解除了禁运，你们就会对加速达成协议起决定性的作用；否则，你们就会使我们更难起有益的作用。关键的问题是：你们是否要我们起主要作用，使以色列变得通情达理，以实现合理的和平。你们会得到的是我们在经济、工业和文化上的帮助。重要的不是禁运或有关条件，而是在中东进行建设的机会。

法赫米表示，他刚才所听到的这一番话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在这个基础上，“将解除禁运，不挂钩”。尼克松回答说，他答应将把关于脱离接触的谈判推向前进，以便成功地解决问题。虽然四个星期以来我一直在说同样的话，但是萨卡夫却宁愿把尼克松的话当作一项新的重大让步：“这正是我们的想法。我们不要求你承担义务，总统先生，但是这正是我们希望听到的话。”

然后，我们全都参加会见报界。尼克松宣布，他将派我再赴中东，以实现叙一以脱离接触。他保证将努力实现“永久性”和平。萨卡夫称尼克松为“我的朋友”，表示他感到十分轻松，并预料不久就会发生某种“对美国、中东以及全世界都有利的”事情。法赫米说明，两位特使转达了四国首脑在阿尔及尔作出的重要决定，并对

尼克松关于实现永久性和平的主张和我即将访问中东一事表示欢迎。

我一反常态，默不作声。这种无条件的条件和不挂钩的挂钩引起我思潮起伏。我在思考我即将对中东的访问。这将是一次奇特的旅行。我被派往叙利亚去领取一张我已经得到的战俘名单，然后再去向以色列领取一项肯定不会被接受的谈判方案。所有的主要演员都明白这一点。但是，在中东问题上，诗意和现实是交织在一起的。所有主要演员又都同意，只有把这个剧本演完，才能解除禁运和结束戈兰高地的战争。而且，如同许多中东神话一样，字谜逐步被事实所揭开，在我出访过程中，人们认识到这次访问的必要性；但是剧本突然改变了。我的任务与其说是为谈判取得进展，不如说是为突破僵局寻求心理依据。

对大马士革的一次重要访问

我对中东的第四次访问还有过一场序幕。二月十九日，我曾对葛罗米柯说，他可以在报上读到下列消息，即：我将在几天之内应沙特阿拉伯和埃及的邀请再访中东，“筹建一个能够被各方面所接受的合适的谈判格局”。我没有得到反应。但是，二月二十四日，叙利亚外长阿卜杜勒·哈利姆·哈达姆从拉合尔给我发来电报，当时他正陪同阿萨德在拉合尔参加伊斯兰国家首脑会议。电报说，葛罗米柯突然声称他即将访问大马士革，以便和我进行关于脱离接触问题的谈判。哈达姆要求我马上答复，是否美苏已事先达成协议，由葛罗米柯在叙利亚首都和我会见。

莫斯科企图挤进这场外交角逐，是既笨拙，又软弱的一种表现。而且，令人吃惊的是，叙利亚的反应表明，只有美国坚持，阿萨德才会同意葛罗米柯的访问。我决心验证一下这种说法，就对葛

罗米柯访问大马士革是否合适一事没有表态，只是把实际情况通知了哈达姆：“美国事先未同苏联达成协议，而且我们对这件事毫无所知。”

事实表明，当我在二月二十六日星期二晚上九点三十五分从伦敦抵达大马士革时，葛罗米柯还没有到达那里。哈达姆热烈地欢迎我，和往常一样的戒备森严的车队经过阴森森的巴勒斯坦难民营进入市中心。大马士革的东面是一望无际的平原，西面是赫尔蒙山脉。我访问大马士革多次，每次总看到山顶覆盖着雪。我访问大马士革已不下三十次，但是我见到的只是从机场到国宾馆的马路，以及从国宾馆到街角总统府的这段路。我曾经一度试图要参观一下这座古城，却由于安全方面的考虑而未能如愿。后面我要谈到这一点。我的车队经过的这部分市区呈现出法国风貌，街道宽阔，路旁栽种着树木，街两边的房屋显然都是过去富庶人家所盖。要形容普通叙利亚人的态度，最合适的词莫过于“漠不关心”了。在那里，看不到开罗的那种欢欣鼓舞的景象，也感觉不到耶路撒冷的那种企望和平而又害怕被人出卖的复杂心理。叙利亚人过于自傲，因而没有显露出对一位美国特使的兴趣，但他又过于尊重阿拉伯人好客的传统，因而不愿效法通常充斥叙利亚极端的那种反美宣传的榜样。

尽管叙利亚人有令人望而生畏的声誉，他们却总是无可指摘的主人。他们的礼遇弥补了宾馆简朴的居住条件。尽管时间已晚，哈达姆仍坚持要和我共进晚餐。照管权益办事处主任托姆·斯科特曾经告诉过我，一顿夜宵正在等待着我。我后来向阿萨德抱怨说：“夜宵这个词在阿拉伯文里是找不到的。”丰富的晚餐和哈达姆不比寻常的亲切态度表明，戈兰高地的脱离接触问题对叙利亚关系重大。他告诉我，叙利亚对我所作的努力非常感激。这是出自这位复兴社会党的强硬政策的典型人物的前所未闻的一句赞

语。他对华盛顿能源会议也抱有恶感。他对油价过高这一点并无异议，但是他把油价飞涨归罪于以色列。他坚持说，如果不是因为战争，石油生产国不会如此戏剧性地利用市场条件。他没有放过机会指出，从历史上讲，巴勒斯坦曾经是叙利亚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因为现在的叙利亚只是自一九二〇年以来才存在的（虽然作为奥托曼帝国的一部分，卫星国叙利亚王国曾经存在过，其幅员包括土耳其和埃及之间的全部领土）。但是哈达姆也尽力指出，叙利亚不会感情用事。这是一个有希望的暗示，表明如果以色列的第一个方案不能令人满意，叙利亚也不会中断谈判。这正是我所一直预料的。

这一切实际上只不过是填补一段时间，因为当时阿萨德总统正在举行国宴，招待正在访问的罗马尼亚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午夜，我被召去和阿萨德会见了三个半小时以上。和往常一样，我们在总统府楼上葫芦形的会客室里低垂的丝绒帷幕后面举行了会见。阿萨德和我在高背椅上就座，我们的顾问坐在沙发上。叙利亚代表团仍然坐在那张引人深思的油画下面，油画的内容是伊斯兰国家的军队在摧毁十字军的最后据点。

阿萨德在谈话开始时强调指出，他依靠我们的积极作用：

阿萨德：某些新闻机构和你的某些声明给人的印象是，你只不过是一个单纯的东奔西跑的传信人。

基辛格：这是公众的印象。

阿萨德：这太单纯了。即使我们希望如此，你也做不到。

基辛格：你不认为我是单纯的吗？还是你不希望我是单纯的呢？

阿萨德：“单纯”一词可以有多种含义。需要造成的印象可能是，基辛格博士只不过把一方的观点传达给另一方。这样做的缺点是没有劲头，给人的印象是，你没有在做什么有效的东西。这可以称为单纯的作用，但是不适用于基辛格博士。

应该在这里提一下为我在大马士革和利雅得的会见担任翻译的一位杰出人物。所有的阿拉伯人都称颂他阿拉伯文译文准确（当然他们中并非所有的人都有足够的判断力），而且用辞优美（这一点确实是如此）。他原籍是巴勒斯坦，名字叫伊萨·萨巴巴夫；他头发花白，蓄着一把山羊胡子，加上那翩翩的风度，使人感到他是出身于本世纪初的某个没落门第的退休学者。他多年来为英国广播公司和美国之音担任播音员，在阿拉伯世界中声誉卓著。我从未了解到，萨巴巴夫是由于什么样的命运转折而成为美国公民和外交机构的台柱的（当时他的主要工作是美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的特别助理）。他的历史背景反映出中东的悲剧和激情，我能和他共事，真是十分幸运。我深信萨巴巴夫的心是向着巴勒斯坦人的；但是他为我做的工作却是为一项不太重视巴勒斯坦问题的政策服务的。他的行为自始至终都是无可指摘的，就好象凭借办事严格认真和表现突出，他就可以最有效地实现他的民族希望一样。

当我们谈到向梅厄夫人提供以色列战俘名单的程序时，阿萨德同意我的行动计划中的下一个关键步骤，即：红十字会可以立即进行探视，而且阿萨德为了表示善意，提议第二天或者尽快地开始这种探视。他又用另一个他自称从报上看到的消息来强调他愿意合作的态度。他说，他看到一些新闻报道，说我认为，由于国内压力，阿萨德的灵活性要比萨达特有限。（这确实是我的看法，但是我不记得有关于我持这种看法的报道。）他说，这并非事实。不存在敌视他的派系；他和任何别的阿拉伯领导人一样地“灵活”。我懂得他的意思，用最能迎合他那可怕的自尊心的方式回答说：

我想我懂得你的意思。你的处境更为复杂，你离巴勒斯坦更近些，你所谈判的问题不是一片沙漠，而且涉及的领土不大。你的情况不象西奈半岛，而且在整个过程中你都在担受风险。这是我的看法。（阿萨德点头称是。）你

的邻国比埃及多。

事实也正是如此。阿萨德的立场转向温和不仅会在国内受到攻击，而且也会受到激进的邻国伊拉克的攻击。我的归纳只不过是对这种情况改换了个说法，并未否认这种情况。

我很快就发现，阿萨德对于我提出的谈判程序顾虑重重。他想造成一种印象，即：他的犹豫不决是一种信念的表现，而并非示弱。我在二月五日曾经提议，叙利亚和以色列军官在埃及以色列的军事工作小组里会晤。这个工作小组虽然自一月初以来就没有开过会，但是从法律意义上说，它仍然在日内瓦履行职责。这原是萨达特出的主意。他认为，这样做既可以使阿萨德免除由于单独进行叙以谈判而引起的窘迫，而且顺便还可以保证叙利亚“表现良好”的名声。但是这个主意也带来风险。由于葛罗米柯坚持要参加，恐怕很难把苏联人排除在日内瓦会议之外；但是，在别的地方安排叙以直接谈判，又容易很快导致危险的僵局。

阿萨德比我更早看到这一点。他主张在原则上达成协议之后再举行叙以军官的日内瓦会议。换句话说，阿萨德显然希望由我来处理主要的谈判，如同我为埃及所做的那样。

当你所说的这一切都已经实现之后，我们可以加以讨论。但是名单和红十字会的探视……刚刚过后……当人们还在众说纷纭的时候，就派军官（去日内瓦），这太过分了。

他也不想让苏联人参加进来；他骄傲地而且详尽地告诉我，他怎样挡住了葛罗米柯，不让他在我访问大马士革期间到这里来。苏联外长预计在我离开后才到达，而且在我于三月一日重返大马士革的那天早晨离开。对于叙利亚的主要军火供应国来说，这并不

是什么光彩的待遇。

他们有意要我参加叙利亚谈判的全过程，这可把我吓住了。我说：“那我就得把全部时间花在这里了。”当时我并未意识到我这样说是很有预见性的。事实上也没有别的办法。而且这也使我能够避免前进途中可以料想到的最险恶的事件。如果阿萨德拒绝了以色列的第一个方案——这是我答应在四十八小时后重返大马士革时给他带来的——我们就会在关于脱离接触的谈判和为解除禁运而作出的努力这两个方面都陷入困境（尽管我们声称两者之间没有联系）。我理解到，我应该做的事情是，不要造成决裂，平安度过今后这几天。在情况日趋恶化时，我就要中断我的活动，等待解除禁运，并期待政治和经济的压力使禁运不致于恢复。

因此，我重弹了过去几周的老调。考虑到以色列当时正在组织联合政府，我重返大马士革时将带回的以色列方案很可能是叙利亚所不能接受的。阿萨德已经告诉我说，他不能同意只恢复到一九七三年十月六日以前的边界线为止。他要求以色列再多撤出些地方，否则叙利亚的六千人就白白牺牲了。我可以肯定，以色列的方案连十月六日边界线都不会达到。因此，我向阿萨德强调指出，不论我在两天之后带回的以色列方案内容如何，其主要意义在于，让以色列进入关于戈兰高地的谈判。不论方案内容如何，我将要求梅厄夫人在几周之内派一名高级官员到华盛顿来就第一个方案进行进一步的讨论和作可能的修改。在此之后，叙利亚应派一名高级官员来华盛顿继续进行谈判。一旦分歧缩小到足够的程度，我将重返中东，完成谈判。两国官员分别到华盛顿来，将是代替日内瓦军事工作小组的一种办法。

阿萨德接受了这一建议。这是一个最好的证明，表明他赞同脱离接触的进程。因为他所同意的这项程序是很笼统和含糊的，但是这项程序却可以保证我们在即将举行的石油部长会议期间不

出问题。

虽然这时已经是星期三凌晨接近三点，而且我从伦敦开始工作一直到这时还没有休息，但是就象我和阿萨德的几乎所有的会谈一样，最后结束时还进行了一小时的一般性谈话。阿萨德希望知道我们是什么时候得知埃叙十月六日的进攻计划的。他听到我说，我们只是前几个小时才得知的，他感到非常高兴。我们追忆了一九七〇年的约旦危机，就象两名老战士一样，命运把我们安排在这些几乎已经被人遗忘的战斗中的敌对双方，但是战斗中的交手却使我们之间建立了牢固的联系，这是和那些从未感受过斗争激情的人所不同的。我们同意上午再次会晤。实际上只不过是几小时之后的事情。这主要是因为我可以会议尚未结束作为借口来避免向报界介绍情况。我不希望仅有的一点消息在我到达以色列之前就让以色列知道。

凌晨四点，我蹒跚地上床，想睡几小时，在当时疲乏情况下，我把自已看成是叙利亚心理战的典型的受害者之一。我住的国宾馆的隔壁就是一座清真寺。从凌晨四点半开始，阿訇便召唤信徒们去做祷告，而且还使用了电子扩音器，这架扩音器似乎就放在我卧室窗子的旁边。我请求我的助理拉里·伊格尔伯格设法制止这种声音。面对着一位心烦得要发狂的国务卿，他采取了一名外交官应采取的非正式行动。对我来说幸运的是，他还比较理智，没有去设法干预神圣的宗教仪式。

二月二十七日星期三上午九点四十分，阿萨德和我再次会晤。虽然这次会晤的原计划只是走走形式，但还是进行了三小时。阿萨德要求，出于技术原因，把红十字会开始探视以色列战俘的时间推迟一天。我们回顾了已经达成协议的程序。阿萨德又一次试图要我保证，最终的脱离接触线将表明，他从十月战争中得到了领土（这是一个连最温和的以色列人也不能同意的目标）。他不再作一

次这样的努力,是不会放我走的。他虚张声势地说,如果结束战争意味着以色列只放弃新占领的领土,他宁愿保持现状不变。

我们不用在今天就取得我们的权利;我们可以等到明天。但是,把这场战争的结局变成向以色列乞求,那办不到。我作为一个人,是不会接受的。不会的。说了以上这番话之后,我想指出,我们将不遗余力地去争取和平。但是和平和投降是有区别的。

他的言词是激烈的,但是他的行动却表明他愿意让步。他先是告诉我们以色列战俘的人数;然后又提供名单;他同意红十字会进行探视;他还接受一项明知可能主要是为了消磨时间而设置的程序。以色列的最强悍的邻国的领袖把他的全部筹码都放在美国身上了。按照叙利亚的情况来看,这是一项可以和几周之前萨达特改变方针相比的果敢行动。但是阿萨德和他的埃及同事不同,他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他采取初步行动之后,就装得好象现在应该由美国来实现他的目标和解除他的困境一样。他认为没有必要,也许由于没有机会采取宽宏大量的行动。而埃及总统正是由于采取这种行动,从心理上形成一种格局,除了实现和平,没有别的解决办法。

但是,在二月二十七日开始了谈判的进程,我们就认为这已经是很大的成就了。上午的会议开得太长,以致无法按原计划参观奥马叶得清真寺。这所清真寺是一幢富丽堂皇的建筑物,一度曾经是拜占庭的教堂,寺前就是熙熙攘攘的大马士革市场。推迟参观倒可能救了我的命。第二天我们得知,有人在通往清真寺的路上埋了地雷,要炸我的汽车。这件事一直到布雷的巴勒斯坦恐怖分子请示他们的上级时发现,因为我要在四十八小时后重返大马士革,他们问要不要再试一下?对于他们的上级如何答复,我们不

存侥幸心理。

后来的保安措施更加严密了。我们在大马士革的行车路线经常变换。有一次我们甚至用假车队迷惑敌人，而我却乘车行驶在另一个车队里。这样做是否象迷惑我一样把恐怖主义者也迷惑住了，我不敢说。后来我们得到报告说，他们总能知道我在哪个车队里。叙利亚感到非常窘迫（而且对巴勒斯坦突击队感到生气），但是恐怖主义者似乎再也没有组织过别的行动。而我也没有能再去参观奥马叶得清真寺。

当我离开大马士革时，我对上述情况一点也不知道。我启程前往以色列，希望帮助这场谈判通过第一阶段。

以色列这场戏

在叙利亚和以色列之间折冲樽俎的令人泄气之处在于，一方认为是重大让步的事情，在另一方看来却是理所当然的。对阿萨德来说，提供以色列战俘名单和同意红十字会的探视乃是重大姿态和政治风险。他本来宁愿按北越人的办法来对待战俘，既不公布他们的名单，也不公布有关他们状况的消息，实际上把他们当作人质看待。但是对以色列来说，自从停火以来它就准备交换战俘*，名单是微不足道的最低限度的事情，而不是一种需要回报的让步。同样对叙利亚来说，任何谈判如果仅仅恢复十月六日边界线，只归还以色列在一九七三年战争中占领的突出部分，就会引起一个为什么要打这场战争的问题，从而削弱阿萨德在国内的地位。任何其他类似的新分界线也有各自的问题，因为它意味着叙利亚对于以色列占领戈兰高地的其余地区表示默认。但是以色列意识

* 以色列扣押了三百八十名叙利亚战俘；在叙利亚前线，有一百四十名以色列士兵在战斗中失踪，其中有六十五名幸存者被列在叙利亚提供的战俘名单里。

到，从它的军事利益出发，最好是什么事情也不用做，它的武装力量距离大马士革只有三十五公里，这条战线比别的战线都要容易防守些。总之，在二月底的时候，我已经把这两匹最倔强的马带到几乎是起跑门的地方；我现在的问题就是让它们跑起来。

以色列的看守内阁不是这种谈判的理想对手。它是由工党（果尔达的党）和全国宗教党联合组成的。但是宗教党以种种借口拒绝继续和果尔达联合，其主要原因也许是因为果尔达的声望由于十月战争的结果而猛然下降。攻击的重点之一是摩西·达扬，他作为国防部长由于以色列对于十月战争毫无准备而成了批评的对象。他每次在公众场合出面都引起示威游行。使以色列在一九五六年和一九六七年取得军事胜利的这位元勋常常被人喊成“杀人犯”。但是达扬控制着工党内重要的拉菲派，如果他辞职，会使果尔达组阁更为困难，实际上达到无法实现的程度。

但是，达扬正是这样做的。就在我动身进行穿梭外交之前，他戏剧性地宣布，他将不参加果尔达的新内阁。甚至有谣言说，他将不会见我，他届时不在国内。这对关于叙利亚的谈判可能产生灾难性的影响。阿拉伯世界对于达扬又是怨恨又是钦佩，公认他是富有想象力和灵活性的人。据说，由于达扬在一月访问了华盛顿，才实现了埃以脱离接触的最后阶段。人们普遍认为，以色列内阁的立场是由达扬制订的。我曾经向阿萨德炫耀说，达扬可能访问华盛顿，这象征着进展。就在我快要前来寻求以色列关于脱离接触的方案的时候，他拒绝入阁会引起人们的普遍误解，包括我的误解。我发出强烈呼吁，要求达扬重新考虑。最后，果尔达说服了他，他同意再次入阁。但是，在我到达时，这场风波的余震仍然可以感觉得到。我们见到达扬时，他情绪不高——用阴郁和怨恨来形容要更为恰当些。

事实上，我到达以色列的时机是最不合适的了。新政府还有

待组成，而果尔达和她的看守内阁最不希望看到的是再出现一个带有分裂性的问题。在戈兰高地划定新的分界线，不论划在什么地方，一定是更加逼近以色列定居点的。果尔达招架现有的反对力量已经没有余力了。以色列的主要倾向是拖延时间。在前往中东途中，我得到消息说，以色列将要求先行释放战俘作为关于脱离接触谈判的第一项议题。当然，这是一项新的条件。肯定会造成僵局。我尖锐地答复说，我将坚持严格遵守二月五日的程序，其中只坚持要战俘名单和红十字会的探视。果尔达通过迪尼茨转达了一项答复，认为不妨可以试试。她说，她被误解了，她要求把释放俘虏列为一项议题。当然，这是用不着说的事情。

我对耶路撒冷的访问是以一个动人场面开始的，这种场面使担任公职的人们感到自己职责的崇高。二月二十七日下午四点半，我来到耶路撒冷西郊总理府的沙石办公大楼拜访果尔达，从这幢大楼可以远眺耶路撒冷西郊。经过一阵通常的摄影人员的忙乱之后，她把我带到一间简朴的小私人办公室里。大家围着咖啡桌坐下。陪同她的有西姆查·迪尼茨，陪同我的是彼德·罗德曼。在以色列，人命是最宝贵的。美国最近感受到人们由于在印度支那的战俘或在战斗中失踪人员的问题而激起的愤慨。但是以色列是个小国，实际上是由一个大家庭组成的（只有一家人才能经受得起这样厉害的争吵）。每个人的心灵上都生动地铭刻着几个世纪以来备受迫害和灭族威胁的记忆，因此，牺牲一个人都会引起人们对于灾难的预感。以色列人和许多重感情的民族一样，有时在表面上是平平淡淡的。这是因为他们不敢流露他们的感情，以免被人视为软弱或不能自制。

对于果尔达来说，幸存的以色列战俘的名单不是谈判桌上的筹码，也不是一次政治性的行动。这是她的家人的生死纪录，纪录本上有名的年轻人会为他们亲爱的家人带来欢乐，本上无名又

会使另一些家庭感到绝望。她的神态和满面愁容表明了她的期待和看到名单后松了一口气的心情。但是她还是打起精神，在当时的交接仪式上讲了几句话：

基辛格：我首先谈谈最紧迫的问题。名单在这里。是阿拉伯文的。（我交给了她，她全神贯注地看着。）

梅厄：有六十五人？

基辛格：是的。

梅厄：他们都活着吗？

基辛格：是的。保证他们都活着。今天上午红十字会就开始进行探视。（是三月一日开始的。）明天他们就会和我们联系。

梅厄：（焦虑不安地）我们一刻也不能迟延。前天晚上我会见了家属们。我已做好一切准备，就等基辛格博士带来这张名单了。我们把它送到特拉维夫去翻译去，两小时以内所有的父母就都知道了。

基辛格：叙利亚人不希望以色列独家宣布这张名单。

梅厄：由你来宣布吗？

基辛格：不，你可以宣布，但是他们不希望你独家宣布。这是我们要宣布的内容。

我交给她一份简短的美国方面宣布这件事的文稿，其中对双方商定的程序归纳如下：

国务卿基辛格向总统报告如下：

（一）叙利亚政府授权国务卿向以色列政府转交叙利亚政府目前扣押的以色列战俘的全部名单。名单上有六十五人的姓名。

（二）叙利亚政府同意，从三月一日上午开始，红十字会将探视在押的以色列战俘。

（三）以色列政府将在三月一日把它对叙以双方武装力量脱离接触问题

的设想告知国务卿，以转达给叙利亚政府。国务卿将亲自把这些设想带往大马士革。

我接着说：

基辛格：你不受这些话的约束。但是你应该以某种方式说出第三条的内容。

你什么时候发表讲话？

梅厄：要等到我们得知所有家属都被通知到了的时候。我现在可以让伊拉扎来拿走这张名单吗？

基辛格：可以。

我告诉果尔达，我将等到她宣布之后再发表公告。迪尼茨站起身来去叫参谋长，他在门口站住，转过身来对我低声说道：“国务卿先生，这真令人激动。”

参谋长戴维·伊拉扎是我见过的一位真正风格高尚的人物。这时他已深知他将成为以色列在十月战争中受挫的蒙受冤屈的替罪羊。但是他沉默而尊严地忍受着命运的安排。他走进房间，从总理手中接过名单，看了一遍，把身子转了过去，免得让我看到他在哭泣。然后他对着我，用沙哑的声音说：“基辛格博士，我们感激不尽。”果尔达和我谈论了通知家属的问题，并商定了宣布消息的时间，而且由我作好安排，在果尔达发表谈话之后不久，由白宫宣布消息加以确认。然后伊拉扎赶忙出去把名单送交特拉维夫的国防部。

我们马上转入讨论当前的问题。我的主要任务是要使果尔达理解阿萨德已经表示同意的这项新程序。我告诉她，阿萨德说过，如果以色列只是同意退回到十月六日的分界线，叙利亚就退出谈

判。我预料以色列的方案不会比这更好（这是非常乐观的估计）。我说，问题在于，争取时间，使整个谈判不要在这个敏感的时刻破裂。“我们不能在蓬皮杜到俄国去之前……在葛罗米柯还在中东的时候让谈判破裂。这样，人人就都会来插一手，这些人现在都在热衷于抢功。”而且在下次访问以色列之后，我还将去见费萨尔。最好的解决办法是，使谈判不间断地进行。我希望能够向阿萨德确认，不论他对以色列提出的脱离接触方案有何看法，达扬将在两周之内到华盛顿去作进一步商谈。

果尔达的固执简直到了令人恼火的程度，但是，当有人把一个可以拖延时间使她安然渡过组阁期的机会放在银盘里送给她的時候，她就变得不固执了。她欣然接受了我的提议。她将派达扬或者是别的新任国防部长去华盛顿。

最后，下午六点，我们和全体谈判人员一起开会。这些人都是埃以脱离接触谈判中的老手。这场谈判结束时大家非常融洽，使人们几乎忘掉了以前多次唇枪舌剑的交锋。但也并不完全如此。看到他们的在场，我心情的沉重几乎就和我对他们的个人感情一样深刻。果尔达首先当她同事的面感谢我带来了战俘名单。她语调生硬而用词微妙地对我备加赞颂，说我这样做是出于人道主义的原因，而不是出于国家利益的需要。

我认为，不用说，国务卿一定理解他所做的事情的含义，也一定理解获得这张名单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在有些国家，人们可能不会为了六十个名字或六十五个名字感到激动，但是你们都懂得，对于我们来说，这件事的含义是难以用言词来表达的。我们不想说“谢谢你”，因为我知道你这样做是因为你理解这件事的含义，但是我希望你知道我们的人民是怎样感觉的。我相信，在大街上，随便在哪里，你都会感觉到的。你做了一件伟大的事情。

开场的气氛是热烈的，但这并不能软化以色列的基本立场。这种立场很快就变得很明显了。达扬是以色列的发言人，他归纳以色列的主张是：在叙利亚战线上实现脱离接触是以色列单方面的让步。这和在西奈半岛的脱离接触不一样，它没有为以色列带来相应的好处。达扬说，“我们绝对得不到什么东西。”他原是西奈半岛脱离接触方案的倡议人，在一九六七年曾经反对占领戈兰高地，但是这时从心理上说，他已经不处于执政地位而处于反对党地位。这是一种强硬的谈判手法。如果一开始你就反对谈判的基本概念，你就可以避免在实质内容上受到压力。在这之后的任何一个小小的行动（包括提出一项方案）都具有一种象征性的意义，也就可以要求对方付出代价。但是，同时这也反映出以色列对所有从叙利亚来的事物所持的一种原始的恐惧和憎恨。我在叙利亚方面也发现同样的情况。

不知道是有意安排的还是出自本能，实际情况是，我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不是在讨论作为我此行目的的以色列关于脱离接触的方案，而是在讨论为什么要举行这次谈判。我认为这个问题在几个星期之前就解决了。我作了长篇答辩，说明在戈兰高地实现脱离接触是政治上必不可少的。这是要在整个中东地区实现温和的政治演变的关键：

以色列可以从和叙利亚的谈判中得到的东西是，一个激进的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签署了一项文件。这可以消除埃及所受到的压力，实际上只有叙利亚才能施加这种压力……这可以使温和的阿拉伯人……有机会使他们的方针有理有据。从此，同叙利亚人进行的每一项争论将不是原则问题，而是策略问题。而且，由于叙利亚已经被卷入这场谈判，苏联人竭力想插手的企图至少可以暂时被挫败。因为我们现在正处在危机之中，能争取到六个月的时间也是宝贵的。

我进一步指出，另外一个好处是，这样做可以防止苏联、欧洲和日本联合起来施加压力。但是，主要的原因是积极的。这是最有效的、也许是唯一的通向和平的道路。

我要老实告诉你们，我的看法是，埃及真正愿意和以色列媾和，这一点我还没有谈过。我完全可以设想，只要可以避开主权问题，萨达特对于全面解决办法的态度将和他对脱离接触协议的态度一样是通情达理的……

我的以色列对话者从未见过萨达特或阿萨德，认为这些话离题太远了。对于萨达特他们怀疑他要花招，而对于阿萨德他们肯定他要花招。果尔达接受了我的其余论点，比起战争开始后不久和埃及谈判的最初阶段来，她的态度要温和得多了。这并不意味着她愿意现在就达成协议。在另一方面，和她的内阁相反，她愿意开始谈判的进程。因此，她乐于向她的同事们进行一次地缘政治的分析，以消除他们对开始谈判所持的反对态度。不幸的是，这次分析的说服力还不够强，不足以促使我的以色列对话者提出一项可供调和折衷的最起码的方案来。达扬和伊拉扎介绍了情况；他们提出的不是一项正式的脱离接触方案，而是一项“纲要”。这是一种隐晦的办法，意味着尚未经内阁全体通过，因此万一阿萨德出乎意料地接受了它，仍可以有退路。

这项“纲要”基本上和 101 公里谈判因之而失败的那些复杂的计划或“典型”相类似。它主张建立数公里宽的联合国缓冲区；在这个缓冲区的两侧各建立十公里宽的兵力限制区（未具体规定数字）；然后是二十公里宽的无炮兵区；然后又是三十至四十公里宽的无地对空导弹区。这就需要一位数学家来计算了。戈兰高地一共只有二十五公里宽，在这块拥挤不堪的地面上要摆上七个区，简直要延伸到大马士革后面去了。但是，只要以色列最后撤至的分

界线对阿萨德有一定的吸引力，设立这些区也还是办得到的，或者是可以在谈判中加以简化的。

但是，分界线问题恰恰成为最大的障碍。我已经说过，阿萨德告诉过我，他将不在以色列只撤退到十月六日（战争）之前的分界线的基础上进行谈判。他必须收复一些领土，一些以色列在一九六七年占领的领土，否则他无法在国内为谈判找到充足的理由。“纲要”连这点也谈不上。“纲要”把原来的以色列分界线还推进了一步。它只具体涉及以色列在十月战争中新占领的突出部分，共分为三区：东区实际上是大马士革的郊区，将归还叙利亚；中区将成为联合国区；西区仍归以色列占领；这就把以色列的分界线从十月六日分界线往东向叙利亚永久性地推进了一步。由于兵力限制区是从叙利亚军事部署线算起的，实际的后果将是把叙利亚的空防推到大马士革的后面，连炮兵也推到首都的市郊。

没有必要探讨这些主张。提出这些主张时没有带上通常的那种以色列式的威胁，甚至还有点胆怯的口吻。这些主张反映出以色列当时还没有一个政府，更不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而采取的立场。“纲要”的内容十分荒诞，使人无法相信它的实际意义。我能够肯定，在新政府成立之后它就站不住脚。因此，就没有进行激烈的辩论。我简单地表示，照我的估计，最后的脱离接触线必然要涉及从战前分界线往西后撤二至四公里，也必然要把（一九六七年以来以色列一直占领着的）库奈特拉归还给叙利亚。在通常情况下，我至少要经过一个回合才提出自己的看法。但是以色列的方案是完全行不通的，所以我认为最好还是劝我的以色列朋友们面对现实。我没有进一步强调我的论点，他们也没有争论，这基本上是个有希望的迹象。

我的严重得多的困难在于，我在三月一日把这个著名的、盼望已久的以色列方案带回大马士革时会发生什么事情。为了这个方

案，我们曾远隔重洋交换过许多次书信。阿萨德曾经答应过我，他将在几周之内派出特使到华盛顿来进行进一步谈判。但是那是在他还不知道以色列方案是多么荒诞无稽的时候。如果他说的他将即刻拒绝战前分界线方案的话是当真的，那他见到这个方案肯定会叫我卷铺盖了。这样，我们的中东调解活动就会在最不利的时刻失败。在这个时刻，葛罗米柯还在中东，蓬皮杜正在前往莫斯科途中，我们的盟国即将开始欧洲—阿拉伯对话，而且阿拉伯国家的石油部长即将举行会议讨论禁运问题。

因此，我决定照顾这一意外情况，把剧本修改一下。当务之急是要避免暴露失败的情况，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在这次去大马士革时不让阿萨德知道这个以色列方案，尽管曾经答应过他要提交这个方案，这才能诱使他公布战俘名单。我将申辩说，在这个阶段，我宁可只谈一般概念，而不是方案。最好等叙利亚和以色列的特使来华盛顿时再讨论细节。我对以色列谈判小组说：

我将（对阿萨德）采取以下立场：我们讨论了方案；由于这是你们第一次和我谈这个问题，由于你们过去还没有拿到过名单，讨论中出现了许多复杂情况，使我感觉到，我不能交出这个方案，而在另一方面又表达了你们的善意。你们愿意在两周内派一名高级部长到华盛顿去。我深信我可以得到萨达特的支持，支持我这样做，因为萨达特不可能愿意看到这次使命失败。任何别的办法都太冒险。

以色列谈判组由于没有被指责为破坏谈判而松了口气，而且在新政府组成之前也不可能采取正式立场，就欣然接受了我的建议。它一反常态，连一点反对意见也没有提出。我可以按剧本行事，访问开罗，重返耶路撒冷以索取并不存在的方案，然后希望在大马士革平安度过一个晚上，而不致于拆穿西洋镜。

重返开罗

我相信，萨达特会支持我拖延时间的做法。他和我们一样，都希望避免谈判破裂，因为谈判破裂会迫使他采取和他的总战略相违背的强硬态度，并将使石油禁运延续下去，他懂得这会使美国国内的反阿拉伯情绪高涨，使他付出高昂的代价。我认为他也不至于对我谨慎的行动计划感到不耐烦。因为如果叙以脱离接触轻而易举地实现了，他就冒有风险。人们会对他说，他本来应该把关于西奈的谈判拖延一下以达成叙埃联合协议；或者说，他在谈判上花费了过多的时间。如果他下意识地希望阿萨德的成就比他自己略逊一筹，这也是人之常情。

除了这些策略上的考虑，萨达特和我对于应该如何开展外交活动也持有类似看法。我们都认为，消极被动是最不利的态势。另一方就必然会插手进来对职权范围加以规定，人们的精力就只得倾注在对人们没有思想准备的倡议作出反应上面。人们逐渐失去左右形势的能力。逐渐地，人们会失去对方向的辨别力，会把躲过一场灾难称为成就。按照人们自己的议程进行谈判会有利得多，或者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应该实行一项人们能够最大限度地掌握局势的程序。

我带着这些想法，在二月二十八日星期四的上午抵达埃及，在吉萨的总统休养地会见了萨达特。永恒的金字塔随着光线的变换而奇妙地改变着它的轮廓，使人紧张的神经为之松弛。我向萨达特说明了以色列国内复杂的情况，以色列的方案过于极端，因此不可能是当真的，并且还向他说明我所建议的新程序。他脑子里已经记不清戈兰高地的精确地理情况，他请他的参谋长贾马斯将军拿来一幅大地图，地图就象一块七巧板一样，得放在地板上拼

起来看。我注意到上面表现出阿萨德在一月二十日向我提出的脱离接触线，显然他同时也告诉了开罗。萨达特善于利用舆论，他把摄影师叫了进来，拍了一张一群高级顾问认真研究形势地图的照片，以便确实地证明正在进行严肃的工作。我对这一计谋本来感到高兴，但是却由于担心而不敢外露，怕的是叙利亚提出的分界线在照片上登出来会引起以色列强烈反对。

当我们再度单独开会时，萨达特命令贾马斯将军立即前往大马士革。萨达特两眼闪闪发光地说，他是以阿拉伯武装力量统一司令部总司令的身份派贾马斯去的，根据我对叙利亚看法的了解，这无异是往伤口上搽盐。由于贾马斯有参加101公里谈判的经验，他的任务是使阿萨德了解以色列的谈判策略，并使叙利亚领导人相信，即使不存在以色列的正式方案，我提出的程序仍然是最有可能获得成功的程序。

然后萨达特和我共进午餐。就象过去我们在阿斯旺进行会谈时那样，他又要求我对形势作出实事求是的估价。我也象过去一样，对他谈了我的估价。我告诉他说，在以色列组成内阁之后，也许有可能经过极大的努力使以色列同意撤退到十月六日分界线，但阿萨德已经表示这样做是不够的。再经过一番努力，也可能会再沿这条线让出几公里的地方，作为联合国控制区，而其民事则由叙利亚管理。要实现这些目标，需要好几个星期的时间。叙利亚谈判的策略是一种对抗的策略，是不可能单独取得什么成就的。很难想象会有谁比这两家更难直接达成协议的了，尽管他们都需要这项协议。

萨达特同意我的分析。但是他提出两点考虑，表明了埃及外交的两个矛盾的方面。他决心以加快的步伐走向和平和摆脱苏联。但是，从信义上说他对叙利亚负有义务，至少在叙利亚恢复战前分界线之前情况是如此。如果以色列不把新占领的土地全部归

还而叙利亚奋起作战，他会支持他的盟国，尽管这会破坏他的整个政策设想。如果阿萨德能使以色列完全撤退到战前的分界线，萨达特准备告诉其他的阿拉伯国家，这是一项重大的成就。即使谈判的全部成果不过如此，他也要赞颂美国作出的努力，他不能责怪阿萨德拒绝接受这一成果的行动。他必须支持阿萨德这样做。但是，如果以色列愿意从十月六日分界线再往西后撤几公里，阿萨德的成就在某种意义上就和他自己在西奈半岛的成就相等。如果叙利亚连这个方案也拒绝了，萨达特准备公开责备阿萨德破坏谈判。而且如果叙利亚为这个问题而作战，他是不会参加进去的。

不幸的是，在这次谈判中，萨达特不是我的阿拉伯对话者。他不能以果敢的行动推动戈兰高地事态的发展。他能够做到的全部事情不过是用他的声望来支持我的努力，以劝阻叙利亚可能作出的破坏谈判的行为。在我介绍情况之后把贾马斯明显地派去大马士革一事表明，萨达特听取到的情况足以使他相信，戈兰高地的和平进程应该继续下去。必然的推理是，即使我没有带去我所允诺的以色列方案，如果在我下次访问大马士革之后阿萨德中断了谈判，那就是他的过错。午餐之后，萨达特又抢先采取了另一支持行动。在我离开开罗之前，他就把他的观点公布于众。萨达特在阳台上接见了报界，他要报界注意他身穿便服，这说明他相信新的和平时代已经到来。此外，他公开对我所作的努力表示赞赏。有人问他，他想给阿萨德提点什么意见，他说：“要相信基辛格。”

除此之外，萨达特还进一步公开对我们的战略表示赞许。他说，叙利亚必须经历一些类似他为了达成西奈协议所经历过的阶段。为了使第二天下午即将到达的葛罗米柯不至于过分坚持，萨达特巧妙地使苏联也同迅速完成叙以脱离接触谈判发生了利害关系。萨达特总统宣布，必须首先完成叙以脱离接触，日内瓦会议的第二阶段才能开始。这就使即将到达的葛罗米柯懂得，干扰脱离

接触的进程将意味着日内瓦会议的失败，而日内瓦会议正是苏联参加中东外交的主要的（也是唯一的）舞台。

那天晚上十点钟，法赫米把我们一行人带到谢拉顿饭店吃晚饭，更主要的目的是去观看著名的肚皮舞演员纳格瓦·富阿德的表演。她看上去很象丽塔·海沃思，但比丽塔年轻，有点早熟。她的表演令人目瞪口呆，无愧于她的中东最优秀舞蹈演员的声誉。尽管时间已晚，我的工作人曾经一再叫累，但是他们仍然精力充沛，不顾一切地全神贯注于观看表演，而且一直挤到了舞池边上。随行记者第一次找到了使他们在学识和文化方面感兴趣的话题。全国广播公司的理查德·瓦莱里亚尼写了一篇详细的联合报道，以丰富而生动的词藻描写了富阿德小姐的动作，以及我的工作人神经紧张而又不失尊严的反应。^③

对于我们的主人来说，除了使客人得到娱乐这个简单的目的之外，还有几方面的目的。埃及外长出现在夜总会就意味着不存在危机，和平的进程是正常的。更有趣味的是，它也是对葛罗米柯的嘲弄。他很不知趣，竟在事先要求和我享受同等待遇。因此，不久他就会被邀请到尼罗河畔的谢拉顿饭店的顶层，去欣赏象波浪那样起伏的富阿德小姐的肚皮舞。对于这样的活动，这位埃及外长在他那清教徒式的首都应作何解释；对阿拉伯世界的一些持同样清教徒态度的激进派朋友又应作何解释；那就是他的事情了。（我不知道他究竟去了没有。）

三月一日星期五，也就是第二天的早晨，埃及主人为即将到达的苏联外交家准备了一场政治示威活动，再次表明埃及的重点转移了。萨达特认为，在这一天宣布全面恢复和美国的外交关系是最合适的了。他十分高兴，比事先约定的宣布时间提前了两个小时。

这并不是什么震撼世界的事件，因为从实际上说，自从我在十

一月首次访问开罗以来，我们两国一直保持着正常的关系，而且还是非常亲切和富有建设性的外交关系。从法律上说，赫尔曼·艾尔茨在开罗领导着一个附设在西班牙大使馆里的照管美国权益办事处。同样地，在华盛顿，和他对口的是阿什拉夫·戈尔巴尔。但是，这一事件的象征性意义是很大的。星期五上午，当星条旗近七年来首次在我国大使馆门口徐徐升起的时候，我和我的同事们都深受感动。在升旗仪式上，法赫米和我都发表了简短而友好的讲话，埃及新闻界报道了这些讲话，使葛罗米柯到达的消息相形逊色。萨达特已经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他的新方针。

人们差不多都对葛罗米柯这次出访有一种不胜今昔之感。他仆仆风尘于这几国的首都之间，而在短短几个月之前，这些地方还都是苏联势力的堡垒。他在大马士革到处遭到白眼。现在在开罗又受到事先安排好的冷遇。这些都是阿拉伯国家的决定，而不是美国的决定。星期五下午，我在特拉维夫附近的宾馆作六小时的停留，向果尔达和她的同事们介绍了我访问开罗的情况，我对果尔达说，“冷落葛罗米柯不符合我们的利益。”情况确实如此。我们试图削弱苏联在中东的战略地位，但是我们并不想把它的无能公诸于众。在外交事务中，人们往往必须在姿态和政策之间进行选择。人们的实际地位越强大，就越没有必要去反复讲对方的失败。在对方的失败上面火上加油往往是不明智的。外交手腕的一个重要方面就在于，做必须做的事情，而不节外生枝地去激发对方进行报复的念头，留有余地使双方今后能在其他问题上进行合作。

以色列谈判组对于这些哲理性的问题并不关心。它仍然全神贯注于组阁问题。果尔达希望能够在三天之内让她的新政府和议会见面。如果有必要，她将组织一个由在议会占有少数议席的政党组成的政府。与此同时，以色列谈判者祝我一路平安前往大马士革。我的任务是：在不存在可供谈判的以色列方案的情况下使

谈判继续下去。

重返大马士革：阿萨德保持冷静

星期五傍晚，在前往大马士革途中，我得到消息说，水门事件象一场雪崩一样，势不可挡。斯考克罗夫特给我拍来了急电，报告说联邦大陪审团对尼克松政府的官员提出起诉，其中有：H.R.霍尔德曼、约翰·埃利希曼、约翰·米歇尔、查理·柯尔森、罗伯特·马迪安、戈登·斯特罗恩以及华盛顿法官肯尼思·帕金森。我从来不太同情柯尔森。我不太认识马迪安，也记不清是否见过斯特罗恩和帕金森。但是我对于霍尔德曼、埃利希曼和米歇尔受此大难，感到十分难过。他们都是共渡难关的同事，为了他们所信任的这个政府的成功以及为了国家的利益，有时互相竞争，但更经常地是进行合作。我当时并不认为他们是罪犯，现在也不认为他们由于水门事件就成了罪犯，但是我并不怀疑，在白宫，无疑地有一股卑鄙的势力把他们吞噬掉了。我也认识他们的家人，我无法同意当时人们对他们的指责，有时我简直觉得这些指责是伪善的。

他们的悲剧有力地说明了这一事实，即：政府实际上已经受不起在国内的失败之外再加上一场外交挫折。这并不是因为它会进一步削弱尼克松，当时我已看出他已不能恢复威信了。相反地，一旦我们外交政策的声誉被毁坏，他在国内没有威信的情况下赖以在国际上维持威信的薄纱似的幻象就会完全破灭，造成的困难和危机将是我们难以克服的。

因此，三月一日晚我和哈菲兹·阿萨德的会见即使获得成功，也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如果失败，就会造成很大危害。成功的定义就是避免了失败。这是一张谈判的入场券，这场谈判肯定是费时间和伤脑筋的。晚上七点三十分，我和阿萨德两人坐在

他的帷幕深垂的会客室里。这次我们都只由一名助理陪同（我的助理是罗伊·艾瑟顿，伊萨·萨巴巴夫和往常一样担任翻译）。我们的会见历时四小时，其形式几乎和固定的仪式一样。尽管事关重大，我们通常把第一个小时用来讨论和主题无关的事情，但这有助于我们互相估量对方当时的情绪。我们先开了一会儿玩笑，然后谈到我的工作如何辛苦；事先准备好的发言和即兴发言比较，哪一种更为有效；以及哪些论点会受到群众的欢迎，哪些论点可以构成一个有力地代表国家的文件，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我们从这一点又谈到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外交政策。我阐明我的观点，我认为罗斯福是一位伟大的领袖，但是他对地缘政治现实的了解，没有他对美国理想的准则的感受那样确切。我说，罗斯福并不懂得，他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指挥一场战争，以取得后来对苏联讨价还价的最有利的地位。阿萨德问，我是否在通过我们的中东外交活动纠正这一错误。我回避了这一问题。我说，我们在中东并不反苏（我知道他一定会把某些情况报告给他的盟国）；我们并不寻找被保护国（我想缓和他和布迈丁对美“帝国主义”的顾虑）；我们希望阿拉伯国家会奉行独立于苏联的政策（当然，就叙利亚而言，这是向我们靠拢一大步）。阿萨德说，这也是他的目标。在改善和美国关系的问题上不存在障碍，除非美国坚决支持以色列占领叙利亚领土。

谈了一个小时，才第一次提到脱离接触的问题。阿萨德说，“当签订了脱离接触协议的时候，我们可以提高我们代表机构的等级……”人们不能不注意到，他说的是“当……时候”，而不是“如果”。

这时，叙利亚总统仍不急于进入实质性问题。他谈到了葛罗米柯。他说，葛罗米柯来到叙利亚首都将近二十四小时之后，阿萨德才接见了她。（我等得最长的一次也只有几个小时，而那只是因

为阿萨德正在出席一次国宴。)在外交政策问题上,小小的姿态往往很说明优先地位。

如果阿萨德关于这次会见的叙述是准确的,葛罗米柯可真在这次访问中遭到冷遇了。阿萨德没有告诉葛罗米柯多少报纸上看不到的消息。他对葛罗米柯一字不提脱离接触线的问题,因为他不愿意在苏联人眼里看起来是采取了可能使谈判破裂的毫不妥协的姿态。后来在谈话中他要求我保证不告诉苏联人我对这个微妙的问题的看法。显然,他不想过早地招致压力。我问他,当葛罗米柯像刚宣布过的那样在从开罗返回的途中再次来到大马士革时,会怎么样。阿萨德认为不会有问题。他和葛罗米柯也讨论过双边问题,包括经济关系。当葛罗米柯返回时,他会和其他叙利亚官员讨论这些问题。阿萨德也向我保证,他会设法不让葛罗米柯在我返回大马士革进行最后阶段谈判时出现在这里。

只有在进行穿梭外交的外交家掌握着一件各方都需要的东西,而没有他又得不着的时候,穿梭外交才能奏效。葛罗米柯远远不具备这一地位。阿拉伯盟国梦寐以求的东西,他却不能助一臂之力。他访问的目的是提高苏联的威信和满足苏联的虚荣。这在国际事务中算不上是谈判的资本。这是苏联不安全感的征兆,而不是有能力把握形势的表现。

苏联由于自己手段的笨拙,才处在这种没有出路的地位。自一九六七年以来,苏联在主要的阿拉伯国家中是支配一切的。甚至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它对被保护国有一种不可一世的特殊影响,并在如像一九七〇年危机和十月战争这种关键时刻有求于它。这样明显地被打入冷宫,对于葛罗米柯来说,一定是一种伤心的事情,但是他采取的补救措施却使他的处境更加不利。因为如果苏联愿意为实现一项解决办法作出贡献,或者如果苏联对于表面现象不那样计较,它就会理解到,我们当时的突出地位是一种权宜之

计。但是，苏联人的不安全感非常之深，以致不能忍受在这些地区出现影响日益下降的情况，而且在诅咒这种不可避免的命运的过程中，不必要地削弱了他们的地位。

我们又花了一些时间思索这些问题，在会谈进行了一个半小时、我感到有些疲劳的时候，我终于提议，“如果总统愿意，也许我们现在可以谈谈脱离接触问题。”

阿萨德同意谈，但只表示，他亲自听取了贾马斯将军关于我访问开罗的情况介绍。不知道他是在进行一场心理战，还是为了要拖延会谈时间给外界以良好印象，他认为他需要给我上一堂关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结构的课，作为对我讲的地缘政治课的报答。他强调指出，以亚西尔·阿拉法特为首的法塔赫并不是唯一的派别，叙利亚控制的“闪电”^{*}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它虽然人数较少，但训练有素，我们应该和它建立联系。谈到这里，我们很自然地回想起一九七〇年的约旦危机。

最后又聊了二十分钟，阿萨德才勉强谈到我这次访问的主题。当然，新闻界和外界的观察家们都不了解这一点。他们从我们长时间的会谈进行推测，认为我们进行了你死我活的斗争，或者是正在取得进展。阿萨德说贾马斯对大马士革的访问是令人不安的，至于这是由于一位埃及官员的在场，还是由于交换意见的实质内容，那就难说了。无论如何，埃及表达的意见显然达到了最低限度的目的，在心理上进行了准备。在那令人担心的时刻，当我告诉阿萨德，我认为以色列的设想是不值得向他转达的，因此我没有带来任何方案的时候，他并没有暴跳如雷。我提出，我们将不提出一个可作谈判基础的方案，但将以一名以色列谈判代表访问华盛顿来

* 一九六八年十月由“人民解放阵线”、“人民解放战争先锋队”和“上加利利人民组织”合并而成。直接受叙利亚复兴党“巴勒斯坦统一组织地区领导”的领导，主要领导成员均在叙复兴党内任职。——译者

开始谈判的进程。我刺激了一下阿萨德，我说，如果他对他委以重任的这个人有足够的信心，叙利亚就应该派特使接踵而来。换句话说，我的意思是，没有方案也比以色列方案好。阿萨德喋喋不休地谈到在美国扶持下的以色列所持的骄横无理的态度。他将为叙利亚领土而战，如果必要就单独干。但是当这篇讲话（没有感情的讲话，显然是为了纪录在案才发表的）发表过之后，他接受了我的建议。对于以色列方案他不必当场表态，为此他感到松了一口气。这将使他能够避免向葛罗米柯介绍情况，从而使他有充足的时间进行舆论准备。

在这之后的一小时里，我们忙于处理阿萨德在每次讨论程序问题时总是增添进来的枝节问题。大部分政治家是为了谋求解决问题而参加谈判的。但是阿萨德在没有开始谈判之前就要求得到对于结局的保证。他要求就以色列武装力量撤退到哪条分界线的问题单独谈一次。我不久前刚了解到以色列不愿谈分界线，我没有那么愚蠢竟会去支持阿萨德的野心勃勃的打算。阿萨德的设想是无法实现的，但是他的态度却是坚决的，这反映了他在国内遇到的风险。在讨论中我不禁惊叹道：“你真是个顽强的谈判者，老和你这样一名对手谈判，我们的神经真受不了。”这次讨论使我有机会向阿萨德表明，连他过去向我提出过的最低限度分界线（要求归还戈兰高地的一半）也是不可能实现的。以色列不会仅仅为了一项脱离接触协议转移任何居民点。可能实现的最大限度的分界线可以划在战前分界线稍后一点的地方，但是不包括居民点在内。当阿萨德同意继续执行我提出的程序时，脱离接触谈判的参数实际上已经确立，但是我理解到，甚至这一变化也必须进行艰苦的谈判方能实现。

剩下的问题只是为公布情况作好准备了。阿萨德要求在公布时说明，是他，而不是我，拒绝了以色列的“设想”，这样说对于我们

两人对付各自的国内情况都有好处。我们决定的新闻发布方针如下：

（一） 国务卿把以色列的设想带往大马士革和阿萨德总统进行商谈。叙利亚没有接受以色列的设想，并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设想。商谈将在华盛顿继续进行下去。

（二） 以色列同意在今后两周内派出一名高级代表前往华盛顿，在那里继续进行商谈。在这以后，如果有必要，叙利亚准备派出一名高级代表前往华盛顿，继续和国务卿进行商谈。

（三） 我们对于我们从事的这一发展过程抱有希望，并将尽一切努力使商谈获得成功。

我们已经实现了我们眼前的目的。叙利亚和以色列已经按照我们决定的程序开始谈判。除非石油禁运得以解除，否则这项程序就不会继续下去。叙利亚同意公开对前景表示“抱有希望”。我通知耶路撒冷和开罗说，我将亲自前往利雅得和安曼介绍情况。

利 雅 得

我在三月二日星期六抵达利雅得时，那里的气氛和我前两次访问时一样轻松。我决定采取的态度是，石油禁运理所当然地会在下一次石油部长会议上得到解除。因此，无需花费很长的时间来谈论这个问题，也没有必要过多讨论在戈兰高地的脱离接触问题。大马士革同意的程序是不会在利雅得遭到反对的。要反对一个激进的阿拉伯国家作出的和平决定，这是完全违背沙特阿拉伯的政策。

至于我们，我们已经决定使美国—沙特对话成为经常的制度，

并使对话从禁运转向积极的目的。（我们也不愿意由于欧洲—阿拉伯对话而被孤立。）几个月来，我组织了专门的力量，负责制订一些合作形式，这些合作形式将能够使沙特阿拉伯和美国的利益实际地联系起来，以及如果禁运得以解除，将能够使沙特从这种联系中得到具体利益。这会使沙特不愿采取损害我们经济的新措施。艾金斯大使和由国务院、财政部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官员组成的研究小组制订了技术援助和经济发展的计划。国防部对于美国—沙特军事合作持有许多长期的打算。我认为在所有这些方面进行协调的最好办法就是在各种领域内设立沙特—美国联合委员会。即使在没有迫切需要的情况下，这些委员会也可以作为经常性的讨论问题的场所。

在六个小时之内，我参加了三次会见。首先，我向奥马尔·萨卡夫介绍了脱离接触问题的情况。不出所料，沙特阿拉伯的主要希望是找到一项能被叙利亚所接受的程序。萨卡夫和所有的阿拉伯国家领导人一样，知道阿萨德对十月六日分界线有过敏性反应。但是他很聪明，不会在谈判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我对他说，我和法赫德亲王以及国王的谈话将主要是关于美国—沙特的长期关系，而不是石油和脱离接触问题。萨卡夫表示高兴。他说，国王喜欢谈这些问题，而且沙特人对经济关系有特殊兴趣。我说，在解除禁运之后，我们准备大规模展开这一活动。

我到达法赫德亲王的王宫时，这位沙特第二号人物已经知道我和萨卡夫的谈话情况了。他的反应证明，我们的战略是正确的。我们的一项战略目标就是向欧洲显示，如果消费者团结一致这一比较理想的路线遭到拒绝，在和阿拉伯人争取双边解决的竞争中，美国完全可以获胜。在会见开始时，法赫德亲王就主动表示，美国是沙特外交的最主要的重点。法赫德指出，许多欧洲国家都提出过长期计划，但是都被沙特拒绝了，因为沙特要和美国发展密切关

系。我扼要地介绍了我们设想的各种合作计划。我说，我们也愿意协调我们对阿拉伯半岛的这个王国的政策，以缓和沙特由于被夹在北面的伊拉克和南面的南也门的这个钳形激进运动中间而感到的不安。我告诉他，我们认为沙特阿拉伯的敌人也就是我们的敌人。只是在会见结束时，我才补充了一句关于禁运的话。我说，这是对我们之间的关系的打击。再拖延下去不解除禁运，就会造成非常严重的信任危机。法赫德说，他的印象是，国王很有兴趣“恢复产油”，这是一种暗示，表明随着禁运的解除，连比较有害的减产也会有所缓和。

国王秉性过于狡诈，未作明确的承诺。他对我表示热诚欢迎，因为我坐在他旁边，他用慈祥的目光侧着脸从头饰旁边斜着看我，并表示愿意为我的使命获得成功而祈祷。要求这个王国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表示正式见解，这并没有什么好处。我向国王介绍了情况，但没有要求他表态。我一次又一次地发现他的友好表示是有具体内容的，而且有种种迹象表明，是支持我们的外交行动的，其中最重要的支持莫过于影响叙利亚遵循脱离接触的程序。

我们的大部分谈话内容是他关于共产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各自的危害性、尤其是两者结合在一起的危害性的老生常谈。费萨尔认为莫斯科对犹太国家表示的敌意不如下列事实来得重要，即：许多以色列领导人是生在俄国的，而且俄国正在允许更多的犹太人移居到以色列。但是，这个神奇的说法，象沙漠里的一朵带着风沙的阴云一样，奇迹般地使所有的界限都变得模糊了。和这场善与恶的具有时代意义的冲突相比，日常的问题算得了什么呢？当阴云过去之后，费萨尔赞扬了我们对叙一以脱离接触的做法。国王没有正面表态，但是他说他要为我们的成功而祈祷，这使我们毫不怀疑沙特会支持我们。为了预示禁运即将结束，国王当着我的面命令他的大臣立即参加进来和我们一起商谈技术、经济和军事合

作问题。国王不会设想，他能够发展密切的关系，而同时又能挥舞石油武器。当我在会谈快结束时明确提出石油问题的时候，他一定觉得我这个人迟钝。费萨尔只是谨慎地表示，他将为解除禁运尽最大的努力。如果这项决定必须代表阿拉伯国家的一致意见，这也许已经是他能够作的最大限度的表态了。但是我信任他。他对于美国—沙特技术与经济合作所持的明显的迫切态度表明，杠杆并不是那么一面倒的。

奥马尔·萨卡夫认为我可能从来不理解沙特人的复杂心理。他在前往机场途中尽量给我作解释，要使我完全放心。他说，从谈话的情况看，很明显，国王会解除禁运的。费萨尔只是费尽心机避免说出这一类的话而已。在极其沉闷的气氛中，萨卡夫有气无力地说：“这是为了使你不至于在机场对报界发表谈话时引用他的话。我们不能在沙特阿拉伯宣布这项决定。”在这个王国，众所周知，我的保守秘密的癖好并没有达到像在美国那样的传奇式的程度。不管怎么说，萨卡夫的预言在两个星期内就实现了。

约旦的选择

在进行这种访问时，我已经习惯于把约旦作为我访问的最后一站了。其部分原因是这是当时最友好的一个地点，是与同伴们在许多危机中可以放松一下的理想地点。但是我认为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在当时，约旦也是卷入我们的外交努力最少的一个国家。我在内心深处感到，这是一次极为不愉快的访问，这种场合使人感到内疚和烦恼，因为事情最后终于发展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从短期的观点来看，包括能干的约旦国王在内，每一个人都认为应该先实现叙—以脱离接触。为了使萨达特的政府有一个即使是临时性的基本支柱，这样做是必要的。约旦宁可跟随在叙利亚之后，

而不愿抢在它的前头，以免再次发生像一九七〇年叙约对抗的情况。

约旦的情况典型地表明，正确的分析并不一定总能带来正确的政策。我素有不谦逊的名声，但我甘冒扩大这一声誉的风险。必须指出，我相当正确地理解形势的动向。我多次警告以色列，它必须在是和侯赛因还是和阿拉法特解决问题之间进行选择。不是前者就必然是后者。举例来说，进行穿梭外交之前的二月八日，我对一批美籍犹太人的领导人说：

我预言，如果以色列不在六个月之内在西岸和侯赛因达成某种协议，阿拉法特就会得到国际承认，而世界就会变成一片混乱……如果我是以色列政府的顾问，我就要告诉以色列总理：“看在上帝的面，趁侯赛因还在参加这场角逐的时候，和他打打交道吧。”

二月九日，我对以色列大使迪尼茨也表明了同样的观点：如果以色列不和侯赛因达成某种协议，“一年之内，阿拉法特就会成为西岸的代言人。”

但是，在这个时期，以色列的国内政治斗争比以前更加不适宜于讨论西岸问题。这时，新的联合政府仍在组成之中，再一次需要全国宗教党作为联合的伙伴。三月一日，在我动身前往大马士革、利雅得和安曼时，果尔达和她的同事要求我不要公开表示曾谈论过西岸问题。

因此，尽管表面上是友好和亲切的，三月二至三日我在安曼的短暂逗留还是笼罩着忧郁的气氛。在这种情况下，和国王侯赛因、王储哈桑以及首相扎伊德·里法伊的会见必然是：在概念上大量的意见是一致的，但是对于执行情况双方都感到沮丧。由于以色列最近拒绝了约旦提出的要求不高的脱离接触方案，情况就更是

如此了。约旦的方案是在西奈脱离接触之后不久(见第十八章)的一月十九日在亚喀巴交给我的。

我敦促侯赛因在以色列组成新政府之后再次提出这一问题。侯赛因听到谣传,说美国像有些别的阿拉伯国家所主张的那样,欢迎成立巴勒斯坦国,或同意由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组成流亡政府。我用强调的语气对这些方案表示反对。(我虽然没有明说,但是并不怀疑,这些观点在国务院机构的各级人员中可能相当盛行。)我表示:

我们全力支持陛下。不论你听到什么谣传,凡未经我们证实,都是没有根据的。如果我们有消息要向你通报,我们就直接告诉你,没有必要用谣传或其他办法……不会背着你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做交易……实际上除非由陛下充当西岸的代言人,否则我们看不出有什么可能接受的解决办法。这就是我们的政策。

但是,不论作出多少保证,也无法解除侯赛因的根本窘境。他把这种窘境概括为,或则继续“担负使以色列撤出西岸的全部责任”,或则告诉他的阿拉伯兄弟,“我们不能按照这些原则达成解决办法,他们必须去找巴勒斯坦人另想别的办法”,要在二者中间进行选择。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把叙利亚放在优先地位。以色列的国内结构使它没有能力一次谈判一个以上的问题。包括侯赛因,人人都认为,我们需要实现叙一以脱离接触,以发动一个导致和平的势头。

这次在中东的穿梭外交,是在我任职期间进行的最轻松的一次,以一场壮观的表演作为结束。那天上午,王室和我以及我的工作人一起应邀观看了约旦军乐队表演的英国的“打退兵鼓”的仪式。就我们自己来说,我们认为此行取得了重要的进展。我们的

成就超出了一开始的预料。叙以谈判已准备就绪。石油禁运即将解除，萨卡夫在几天之后向艾金斯确认了此事。而且我们认为，由以色列和约旦进行谈判来解决西岸问题以及随之而来的所谓巴勒斯坦问题的大门尚未关闭。

三月十八日，阿拉伯石油部长会议无条件地解除了石油禁运，须经六月一日的会议加以复议（这次会议没有采取行动）。沙特阿拉伯宣布，它将每天增产石油一百万桶，这有助于稳定油价（而且在将来真正做到降价）。过去一个月里的频繁的外交活动奏效了。我们的中东外交、能源政策以及和盟国的关系有了回旋的余地。

① 摩西·达扬著：《我的一生》（一九七六年纽约出版），第五九九页。

② 果尔达·梅厄著：《我的一生》（一九七五年纽约出版），第四五五页。

③ 见理查德·瓦莱里亚尼所著《随基辛格出游记》（一九七九年波士顿出版），第二六七——二六九页。

第二十二章

缓和衰落：一个转折点

缓和受到攻击

在走向中东和平方面，我们正在取得进展，尽管这种进展是缓慢的和痛苦的。但是我们不能忘记，我们的最终任务是加强世界和平。美国人民期望他们的领导人这样做；核时代则迫使人们把它作为一种道义的和实际的需要。越南战争的创伤给人们一个深重的教训：美国人民对他们的领导人致力于和平这一点具有信心是一笔珍贵的财富，没有它，任何外交政策都不可能持久。同样地，我们的盟国深信我们外交政策的目标是实现和平，这一点也是我们的联盟得以巩固的前提条件。我们从和平的纲领出发，就可以最好地抵御侵略政策；只有提出一项具有积极理想的政策，才能得到善良和高尚的男人和妇女的支持。

然而领导人的责任不仅限于确认某项目标。最重要的是要赋予这项目标以一个和他们社会的价值相符合的意义。如果和平只是简单地等于没有战争，如果对和平的渴望不和正义感联系在一起，那么它就可能成为可悲的和平主义，从而把世界交给那些最残忍的家伙。在相互克制的基础上去建设和平，以我国对自由所作出的承诺去充实我们的秩序观，争取和平而不放弃自己的权利，争取秩序而无需经历不必要的对抗——这些就是对美国政治家风度的最终考验。

这种进程所需要的纪律和平衡感因水门事件时期的狂热而遭

到破坏。情况证明，争取地区和平比争取全球和平容易，这倒有些出乎预料之外。地区和平的出现，特别是在中东，常常是解决危机的结果。与我原来所预料的相反，在外交政策的各个方面，偏偏只是水门事件对处理危机的影响最小。尼克松直到离职那一天，由于他敢于敏捷和大胆地把美国的力量和声誉作赌注，因而保持了国际声望。在为期很短的危机压力下，敌手们不敢考验尼克松的权威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损害。没有一个国家同我们正面较量，直到中东战争末期，苏联人的行动才促使我们进入戒备状态，当时他们的一个被保护国发现自己处于走投无路的绝境。即使在那时，我们一旦显示了威胁姿态，苏联人也就收敛了。这样，我们终于能够不顾盟国的压力、苏联人的喜好和阿拉伯激进分子的漂亮词藻，成功地利用危机影响事态的发展和改变中东的结盟关系。

但是在东西方关系这一中心政策方面，我们就不是那么幸运了。尽管我们在中东从胜利走向胜利，我们有关东西方关系政策的结构却正在被系统地摧毁。我们好像走钢丝的杂技演员一样，已经走到了中间，才发现安全网已被拿掉，手中的平衡杆上却增加了新的重量；观众们设想，既然他已走了这么远，任务就不可能是很艰巨的，而且可以在不会发生危险的情况下搞得更复杂一些，这就诱使他们在下面高声叫喊，说是本来就有更好的方法到达那里的。

从美国的历史经验来看，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同苏联的关系也是一个难以应付的挑战。美国人在传统上对国际事务的看法历来是摩尼教徒式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要么是和平，要么是战争——没有介乎两者之间的舒适处境。和平时期的要求是善意、谈判、仲裁或者倾向于使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等同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任何其他方法。在战争中的态度则必须是坚持敌对。冲突被

看作是“不自然的”；它是由坏人或者坏的动机造成的，因此只能以消灭违犯者的办法来加以结束。

美国人在传统上历来不大把外交政策看作是天衣无缝的罗网，他们更多地是把它看作一系列插曲式的事件或者互不联系的、自成一套的问题，对每一事件或每个问题都可以使用普通常识和投入物质力量来处理。世界在他们心目中的形象在本质上是善良敦厚的，只是由于一些脱离常轨的危机才偶而打乱它的和谐。这种信念的产生一部分是由于我们在地理上远离世界事务的中心，使我们得以把保持全球均势的担子移交给其他国家。这样，一旦苏联力量的增长结束了我们的无敌性并迫使我们放弃孤立主义的时候，这种看法便难以持续下去了。然而由于战后时期的特点，一件本来可以是缓慢的哲学演变的事情，却变成了一个创伤。

苏联是个一党专政的国家，在意识形态上是我们的敌手，这一情况使我们在善恶之间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的传统形象得到了印证。但是苏联意识形态的敌对状况使之变成以传统的强国方式出现的地缘政治竞争，这个强国不断谋取好处，分开来看每一项可能都是有限的，但累积起来却足以破坏全球均势。我们在感情上总是致力于在一场预示着善良战胜邪恶的对抗中正视全面的道义挑战，因而在面对苏联蚕食均势这一比较不明确的企图时，难免有踉跄失措之虞。同时，战后世界是一个核世界；政治家们现在不仅要拿他们的军队、而且要拿他们的社会和整个人类去冒险。这样，我们的敌手在某种意义上便成为防止核战争的伙伴，而防止核战争无论在道义上、政治上和战略上都是刻不容缓的。

没有一个社会曾经面临过如此复杂的任务；也很少有哪个社会对这项任务更缺乏准备。历史和经验为我们准备的唯一威胁均势的方式是仿效希特勒模式的全面军事进攻，但是在一个充满代理人冲突、游击队颠覆以及政治和意识形态战争的时代，这种威胁

却是最不可能发生的危急情况。现代的挑战按照我们的想法来说是不明确的，我们对这些挑战的抵抗如果有的话也是犹豫不决的——从朝鲜，经越南直到安哥拉——所有这些在我们的社会里都引起了深刻的分歧。那种认为我们需要一面抵抗敌手一面在某种程度上同他合作的主张，是很难找到支持者的；感情上的偏见赞成前一个时代那种比较简单的真理。自由派既反对冲突不可调和的前提，又反对防御的必要性；保守派则不同意核时代的敌对关系可以包含合作的因素。两派都反对为保持全球均势而作持续努力的观点。

因而尼克松政府在第二届任期内最重要的任务是心理方面的：教育美国公众认识我们需要管理的世界的复杂性。美国作为民主国家的领袖有责任保卫全球安全，即使是对不明确的和似乎有限的进攻也要加以反对。在探讨和一个道义上不相容的意识形态共处的限度的同时，我们必须这样做。我们必须懂得不会有最后的答案。那时我就深信，而且现在仍然深信，不管是在一场善良战胜邪恶的摊牌斗争中，或是在最后的和解中，我们都不可能找到自己的目标。相反，我们必须培养坚韧不拔的精神，在一个历史性的时代迎接苏联的挑战，有时是通过抵抗，有时是通过谈判。不可避免地，这意味着无论在任何时候，这一进程都将是不完全的，解决办法也是不完善的，因而容易受到国内的攻击。

尼克松政府努力争取结束美国在过多地承担义务和孤立主义之间、进行十字军式远征和逃跑主义之间的这种传统性摇摆。我们争取实事求是地按照国家利益和均势的需要去落实美国的政策；美国理想主义将为长远的斗争提供必要的持久力量，这个斗争并没有明确的转折点。只有取得公众信任和共同的均衡感，才能最后实行这一政策。当我们在水门事件的炼狱中消耗了国家的大量能量时，这些条件就比任何时候都更为需要，然而也更难以捉摸

了。

历史学家们对这个问题将永远争论下去：如果没有水门事件，尼克松是否能够实现这个目标呢。我所敬重的严肃的男人和妇女认为我们的办法同美国精神是不相容的，正如我认为他们所选择的进行十字军远征死而后已的办法同当代现实不相容一样。^{*}我们确信我们已经规定了一个可以达到的目标；没有别的信念能够支持我们渡过那个时期的动乱。我们深深知道存在着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方面的冲突——不管怎么说，我们不顾自内战以来国内出现了最尖锐的反对，在越南我们坚持了前任所作的承诺，这样做的确切目的在于保持自由人民对我们的可靠信仰。但是我们也承认我们对人类的生存负有责任。同时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我们的社会十年来所经历的痛苦。我们不谋求可以避免的对抗；我们维护了公众对我们致力于和平所寄予的来之不易的信心，认为这种信心对以下两种可能性都是重要的：一是尽管我们作出最大努力，苏联扩张主义仍可能把我们推向对抗；二是沿着这条道路发展到一定地步，双方本来是出于策略原因而开始做的事情可能变成真正的共处。

因此，缓和是建立在两根支柱上的，一根是抵抗苏联扩张主义，另一根是愿意就具体问题进行谈判，所根据的概念是既要有威慑，又准备探讨共处的原则。一九七〇年在约旦和西恩富戈斯，一九七一年在印巴战争中，以及最近在一九七三年十月战争末尾的警戒状态中，尼克松政府都强烈地反对了苏联及其盟国发动的地缘政治挑战。我们不顾国会的尖锐反对，为争取坚强的防御政策进行了斗争。同时，从一九七一年的柏林协定开始，我们也探讨了谈判的前景。到一九七二年莫斯科最高级会谈时，我们的战略已

* 见第七章。

经明显可见；到了一九七三年早春，已经达成了一些关于军备控制和技术合作的协议，其他的也已露出地平线。这些协议都无法使我们想象，同敌手的紧张状态已经结束；那些把这作为考验我们政策的人不是误解了我们政策的谋略，就是曲解了它的目的。我们既没有放松保持军事均势的决心，也没有放松抵抗苏联扩张主义的决心。我们准备做的是减少竞争的风险和阐明共处的标准。我们懂得在一个民主国家，进行有效的长期斗争的前提条件是不断表明愿意结束这一斗争。最后，我们深信长久和平对苏联制度的坚固性所起的腐蚀作用会比对我们的的大得多。

像尼克松这样在第一届任期内因外交政策成就而赢得声望的总统，本来是可以完成这项导师式工作的。通过和公众进行耐心、严肃、公开的对话，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改变了美国孤立主义的那种对话，是可以把核时代的现实和长期竞争的迫切性提出来的。但是在越南问题上的尖锐分歧和对水门事件的可憎的怀疑，造成了一种不利的国内气候，不适于进行任何深入的讨论。

结果，仇恨共产党的保守派和仇恨尼克松的自由派以罕见的会聚结合在一起，好象日蚀一样。保守派对于和一个公开的敌手签定这么多的协议感到不舒服。他们不相信美国可以一面在缓和的庇护下取得表面的“进展”，同时却又保持警惕。他们深信只有在意识形态上保持战斗精神，才能使美国得到锻炼，有所准备。他们要求口诛笔伐，不要妥协；有时候，他们似乎更强调在言词上不让步，而不是实质上的强硬。

自由派的情况比较复杂。尼克松政府正在谋求军备控制、东西方贸易和自由派几十年来不断催促实行的其他一些谈判。但是他们同尼克松的血海深仇太深了。因此，如果尼克松主张缓和的话，下意识的想法似乎就会泛起，感到也许冷战并不坏！同时，许多自由派曾尖锐地反对美国卷入海外的事务，特别是在印度支那。

但他们在中东战争中发现，如果美国不关心对由苏联武装起来的那些国家保持地区均势的话，自由国家会遭到什么灾祸。像许多改变信仰的人一样，他们怀着同早先一样的热情，有时甚至是一样的盲目性，去宣传他们的新见解。

同时，自由派和保守派都感到他们可以安安稳稳地攻击我们的东西方政策，这一部分是因为这项政策取得了明显的成就。如果冷战正在全面进行的话，尼克松肯定要受责骂，人们会大吵大闹，要求实行比较调和的政策。但是随着时间的消逝，面对苏联的前线看来也没有紧迫的危险，因而似乎可以安稳地攻击我们的政策，而且诱人的是可以反转过来攻击当年的那位以“赤色分子”罪名迫害别人的先生，特别是在人权问题上，这样做的有利之处是可以指责尼克松在道义上麻木不仁，而不必冒军事风险或明显的政治风险。

结果是造成了思想上的混乱。多年来，尼克松曾被指责为一个冷战斗士，说他不必要地延长了在印度支那的反共战争。我因为坚持要按照光荣的条件结束越南战争，也受到人们贬责。刹那之间，又出现了一种新的神话，说是我们两人都上了苏联的当。受到影响的人权鼓吹者气势汹汹地说，缓和并没有通过立法上的最后通牒被用来改变苏联的国内结构。奇怪的自由派和保守派联合阵线的一部分人责备我们在军备控制方面的工作走得太远，另一部分人却说还远远不够。教条主义的防务专家们要求军备控制谈判在双方各种战略武器的数量上实现完全对等，而这并不是国防部单方面的计划所要求的，如果提到国会去也会受到抵制。对于紧张局势的缓和，自由派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保守派却进行攻击，他们似乎认为，在一场国难中，一位行将垮台的总统依然能够引诱一个超级大国掀起一场危机。不管他们相互之间的意见分歧如何，这两类批评家结成一气，通过公开攻击和立法限制，在经济和军备

控制领域破坏我们的政策，而他们自己却提不出一套可以代替的连贯战略。

如果不是由于出现了一位令人敬畏的领导人，所有这一切可能依然不过是低级的狙击。这位领导人把两股反对力量团结起来，引导他们注意具体问题，并使之成为立法上对外交政策的干预。华盛顿州的亨利·杰克逊参议员是民主党主流派，他因为在国内政策上持进步观点而得到劳工运动的欢迎。他也受到保守派的鼓励，因为他坚决主张要有强大的国防，而且在越南战争中勇敢地支持两届政府。他还有一个并非自己争取来的有利条件，那就是尼克松政府不把他看作是反对派。我们赞赏他，我们不相信他正在攻击我们的基本论点；我们认为分歧只是策略上的，或者是出于误会，可以通过耐心的解释以及最后通过杰克逊和政府之间的某种谈判来消除。

后来我们开始认识到这种进攻是根本性的。杰克逊要摧毁我们的政策，而不是改进它。杰克逊不易激动，富于思想，顽强坚定，由于他本是斯堪的纳维亚民族的后裔并信奉路德教，这些品质是可以想象得到的。杰克逊处理问题不是凭浮华的言词或高明的手法，而是凭坚持不懈的实践和百折不回的毅力。他仔细地研究过苏联的战略和策略；他深信他们的目的是要破坏自由世界，任何一个协议对苏联人来说只是一种策略行动，以使我们的垮台更为肯定。这种对苏联意图的理解确是够到家的了。我们不同意杰克逊的推论，说什么因此一切谈判都是无益的，也不同意他的暗示，认为同苏联人斗争只有对抗一种方式。

在我看来，我们需要寻找一种适合国际情况和我们国内情况的政策。杰克逊是个绝对主义者；他对问题的看法是非黑即白。我们则是渐进主义者，寻求的是一种可以在一段历史时期内持续下去的政策。凡是给予苏联某些好处的任何协议，杰克逊几乎一

概加以反对。我们则认为，苏联人如果得不到一些有保证的好处，他们便不会签订协议，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的检验标准是，权衡利弊，有协议是否比没有协议对我们好处更大。我们不同意那种悲观失望的论调，说什么我们注定要输；我们在中东和其他地方的经验使我们得出了相反的结论。

杰克逊不欢迎别人同他辩论他所坚持的信念；他的做法是筑起一系列立法障碍，使我们的东西方政策逐渐瘫痪。他的工作班子是我在华盛顿所见到的最能干、也是最冷酷无情的班子之一。他们对政府的动机作出最恶毒的解释，故意缩小政府和这位参议员进行讨论的范围；他们很巧妙地利用新闻界泄露出来的秘闻。由于这种攻击使我们在哲学上和感情上都相当没有准备，它的影响就更大了。尼克松和我都没有预料到，在越南战争结束之后，不惜任何代价争取和平的要求会被主张走另一条道路的叫嚣所代替，那条道路的实际后果就是把对抗升格为一项政策原则，而这时我们正处于百年来最严重的国内危机之中，总统所处的困境也是战后最糟糕的。

在关于缓和的争论中，隐藏着深刻的激情。人们对这些事情的看法是不同的，他们当中包括一些我十分敬重的人，这些人在其他问题上盟友而不是敌手。这就是悲剧的一部分。然而我必须尽力解释，对我们这些在动乱时期负责制订政策的人来说，那场冲突意味着什么。刹那间，我们突然发现自己处在难以回击的攻击之中，因为形式主义压倒了实质，具体的反对意见取代了哲学性的分歧。

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

反对缓和的运动所攻击的一个目标是东西方贸易；导火线是

苏联犹太人移居国外问题。

这件事的变化很奇特。第七章里讲到，当尼克松就职的时候，他不断受到压力，要求扩大东西方贸易，办法是给苏联以最惠国待遇，尽管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还不到六个月。我们拒绝了，理由是苏联应当首先有所表现，保证在国际上采取行动时有所克制，和愿意帮助解决具体问题，包括越南问题和柏林问题。这种称作“联系”的态度受到人们的指责，说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冷战遗物，是一种错误指导下的办法，会把所有冲突都看成是一样的，错过解决具体问题的机会。我们坚持自己的立场。当苏联人在一些重要地区如柏林、中东或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减轻压力时，以及当我们压河内而苏联人站在一边冷眼旁观时，我们就在一九七二年同他们缔结一项贸易协定，其内容包括解决战时租借法案债务，作为对给予苏联以最惠国待遇的条件。那项协定的内容和出发角度当时都没有遭到反对。

我们并没有认为贸易本身能使苏联的行为有所克制，但后来却有人硬说我们是那样想的。我们的基本立足点是抵御苏联的冒险活动，保持全球均势；经济上的刺激并不能代替均衡。但是我们认为，如果积极地加以诱导——包括利用东西方贸易，就更有可能使苏联持克制态度。如同我已经解释过的，最惠国待遇是一个使用不当的名称；它所给予接受国的只不过是已经给予了一百多个国家的东西；取得这种平等地位——不是经济上的好处——才是苏联真正感兴趣的主要原因。

在尼克松的第二届任期中，那些过去贬责联系办法的人突然又以同意这种理论来进行报复。但他们干得比我们更胜一筹。我们把联系办法应用于国际行为，这在外国历史上就是这么合法地做的；而那些批评我们的人则企图利用这种联系办法来使苏联国内制度发生变化，这却是一个更成问题和更敏感的领导。在尼克

松的第一届任期内，杰克逊参议员和主张让苏联犹太人移居国外这一运动的其他领导人没有对这个问题表示任何批评意见。我们在外交上的努力使准许离境的人数增加几乎一百倍，即从一九六八年一年四百人增加到一九七三年的一年近三万五千人。我们深信这一成就是由于进行静悄悄外交的结果；我们从来没有宣传这件事，也没有提出正式要求；我们一直是通过总统的保密渠道进行的。甚至在一九七二年的竞选热潮中，尼克松也不准就此进行评功摆好，他只要政策能继续下去，不求以此来赢得选票。同样，当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表示担心他有生命危险时，我就一再通过总统渠道向多勃雷宁提出这件事，保证说如果允许索尔仁尼琴离开苏联，我们不会为政治目的而利用他移居西方一事。

我已经在第七章里讲到杰克逊参议员在一九七二年如何抓住犹太移民问题要求取消一项对移民征收出境税的新规定，否则就不同意我们已保证给予苏联的最惠国待遇。起初，我们认为他的努力有成绩，实际上证明是十分成功的。一九七三年四月，苏联人同意暂停征收这项出境税；我们认为实行双方同意的计划的道路已经扫清了。不幸的是，杰克逊的成功证实了他对苏联策略的判断是正确的。他认为这证实了他的理论，即最后苏联总是要屈服于压力的。在苏联实际上取消了出境税后，杰克逊又提高了他的要求，企图把策略上的胜利变成要求推翻既定的国策。他继续坚持他的修正案，该修正案不让任何限制移民出境的非市场经济（即共产主义）国家享受最惠国待遇。（该修正案的全文见章末注。）^①

我们认为，杰克逊的行为活象一个赢了一次轮盘赌的人，带着还会赢第二次的希望去安排他的全年预算开支。不可避免，他的这种做法迟早会起反作用。苏联在某一单项行政法令上让步是一回事，允许一个外国在国际法明确规定属于主权国家国内管辖范围的事情上强迫该主权国家实行某些政策，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何

况是公开地这样做，损害就更重了。苏联在移民出境问题上的政策显然取决于美苏关系的全面状况。如果杰克逊把关系搞糟了，几乎可以肯定他将使出境人数减少而不是增加。（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实际上所造成的正是这样。）而且在已经缔结一项协定后又突然提出一系列新的条件，在我们看来，这牵涉到与我们作为一个谈判伙伴的可靠性有关的严重问题，何况这些条件从来不是我们的外交或内政的辩论的一部分。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五日，我在记者招待会上说：

如果每次一方或另一方后来执行的协议的一部分都被搞成并非原来谈判的一部分的额外条件的话，那将使我们履行我方谅解和协议的能力受到严重的怀疑。

但我们并不认为杰克逊要把事情推向这种极端。我们尊敬他，赞赏他的完整人格。我们认为我们可以按照下列条件和他达成解决办法，即既扩大我们对可能事项的定义，又不破坏我们政策的前提。

因此我们就等待杰克逊，深信当他在犹太选民中建立了一定威望后，他最终是会同意妥协的。我一再对犹太人领袖们说，如果苏联在移民出境的手续上作出任何新的松动，我们愿意合作，把主要的功劳归之于杰克逊；我准备承认他的压力是有益的，如果保持在一定限度内的话。我们很晚才认识到，杰克逊搞这一整套讨伐行动所依靠的是要证明我们对能够得到什么东西的想法是错误的；他并不想妥协，至少是从与这一名词相称的角度来说。而一九七三年夏天，当有关水门事件的揭露正像瀑布般地滚滚而来时，要政府就杰克逊从道义上提出的挑战作出回答并不是最好的时刻。

苏联人也犯了一系列特有的笨手笨脚的错误，使我们的问题更加复杂：一九七三年夏天，历史学家安德烈·阿马里克被判处两年徒刑。著名的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被警察传讯，对他进行的政治活动提出警告。对索尔仁尼琴的骚扰增加了。另外两名持不同政见者受到审讯。

在这些事件的影响下，过去赞成缓和、诬蔑杰克逊在越南和防务问题上的观点的自由派人士开始转而支持他的修正案。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协会和美国科学家协会都站出来支持这项修正案。曾在一九六九年说贸易限制是自己害自己的冷战残余的《纽约时报》^②，这时也开始改变方针。该报在一九七三年九月三日冷嘲热讽地指责说，在上述侵犯人权的事实面前，尼克松继续进行贸易谈判看来得到了报答，因为苏联报界对水门事件的报道寥寥无几，造成“实际上的尼克松—勃列日涅夫联盟，反对各自国内的持不同政见者。”九月十八日，《纽约时报》一面说它仍然支持给予苏联最惠国待遇，一面又强调应把这个问题与人权问题联系起来，从而加强了反对给予最惠国待遇的那些人的地位。该报写道：

苏联领导人应该充分认识到，美国人对俄国持不同政见者的命运从道义上感到愤怒，这是一个具有政治后果的事实。我们愿意看到美国政府也公开地在最高一级表示这种关心。与此相反，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长（加斯珀·）温伯格最近访问莫斯科，以及财政部长（乔治·）舒尔茨预定亦将访苏，说明政府对贸易和缓和如此专心致志，以致愿意把同样重要的美国人民对各地人权的关心撇在一边。

那时，美国国会已经收到了萨哈罗夫院士支持杰克逊修正案的一封公开信。^③萨哈罗夫是一九六八年在西方出名的，他写了一篇有说服力的文章，敦促增加东西方之间的经济和科学交流，因

为这些可以改进苏联的制度。④ 萨哈罗夫引人注目地转变立场，这件事有如打开了溢洪道一样。另一位在此之前曾经强烈支持东西方贸易的人小阿瑟·施莱辛格于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七日在《华尔街日报》上写道：“永远信任在火线上的人。”

不幸的是，问题并非如此简单。我非常赞赏萨哈罗夫的英勇历程，他原本是为苏联军事技术服务的一位核科学家，受到精心照顾，享有特殊地位，后来却备遭冷落，与世隔绝，时受骚扰。这些都是苏联国家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处罚。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些朋友曾为萨哈罗夫的孩子争取出境许可证，使他们能到美国来学习，我对此曾给予帮助。一九七三年九月七日，我在确认我任职的听证会上说：

我个人深为萨哈罗夫院士所感动，他在五、六年前写过一篇很长的文章，表明他对人权的看法以及当时他感到苏联为走向这一目标而正在取得的进步。我作为知识界的一员，对这种进步未继续下去感到失望，而且我对萨哈罗夫院士所报告的情况当然感到沮丧。

但是对一个国务卿来说，道义问题就变成了行动问题：就这件事来说，要考虑的是，如果美国明确施加压力，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上述情况。我们同意杰克逊的意见，即有必要改善苏联国内个人的权利和出境手续；我们正在通过从经验中得知的唯一能够成功的办法来为实现这些目的而努力。但是那些持不同政见者一心一意献身为公，他们并没有流露出自私的动机；他们对改善自己的生存条件并不感兴趣。如果他们的目的是那样的话，那么他们根本就不会甘冒当反对派的危险了。他们怀着特殊的勇气和毅力去争取的，是要改变苏联制度的政治和道德特性。那些把他们逼得甘愿承受痛苦和骚扰的严峻规则，使他们痛恨外交方法中所固

有的渐进主义。

这就是为什么“火线上的人”不是设计美国战略的最好参谋的原因。按照克劳塞维兹的话，外交可能是战争通过其他手段的继续，但外交也有自己的适当策略。它承认在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即使是最崇高的目的也只能通过一些不完善的阶段来实现。为了开阔眼界，需要有预言家；但政治家不能总靠预言家的格言来生活。想要改变苏联的制度，如果不通过一个历史性的腐蚀过程——这是我们赞成的手段，而是通过坚持立刻就变的办法，那必然会遭到苏联政治局的强烈抵抗。难道布尔什维克们不正是夺取和掌握权力的专家吗？那样做将不可避免地造成隔岸对抗的局面，如同卡特政府后来所发现的。如果美国那时没有准备好或不愿意坚持既定道路，那么我们势必会以下列两种方式遭到失败：一种是苏联国内人权状况进一步恶化，一种是我们的外交政策的可信性受到削弱。

国会经过歇夏于一九七三年九月复会后，杰克逊就把萨哈罗夫的信塞进《国会记录》。同一天，劳联—产联主席乔治·米尼打了一个电报给众议院岁入委员会，敦促通过杰克逊修正案。

政府仍然继续谋求同杰克逊达成妥协。我们的第一步是通过议会策略争取时间：把当时正在众议院讨论的贸易法案中所有提到最惠国待遇的地方统统抹去，以便把杰克逊修正案也一起抹掉。这个设想是要迫使有可能通过杰克逊修正案的参议院去和众议院举行协商会议；然后我们在协商会议上设法达成妥协。这是我们的议会联络专家们想出来的一条妙计，可惜不可能实现。实际上，它表明我们由于没有能力对这个问题进行正面斗争，只好退而采取兜圈子的办法。政府本来主张给予苏联最惠国待遇，但却走了弯路，采取了荒唐的策略立场，力求推迟实现这种主张；而企图击败政府主张的杰克逊却要求就此进行表决，以便搬出他的修正案

来进行纠缠。

不能期待公众了解这些错综复杂的情况。没有一个国会议员愿意以反对被称作增加苏联移民出境机会被记录在案。犹太人集团或者是支持杰克逊，或者是不知道如何摆脱他。那些仇恨尼克松的人已经下定决心，要反对总统赞成的任何事情。保守派对于投票反对苏联是再高兴不过了。水门事件使总统丧失了道义和政治上的力量。贸易法案连同其中的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于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在众议院岁入委员会获得通过，这对预定在两天后举行的尼克松和苏联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就全球形势进行审议的一年一度的会晤来说，很难算是一个吉祥的序幕。葛罗米柯和尼克松泛泛地谈到这项修正案；苏联人仍然相信尼克松的保证，尼克松说到头来他是能够控制局势的。

中东战争及其后果对国会活动造成了有利于杰克逊一派力量的空隙。能够用于在国会休会前作出决定的时间越短，政府就越难以拼凑到必要的票数。杰克逊并不在乎让贸易法案拖延到下届国会，他正确地估计到最后那些提出这项法案的人不会允许关于给予苏联最惠国待遇的争论阻碍普遍放宽贸易。

关于杰克逊修正案的辩论不久便扩展到我国外交政策的其他方面。在正常情况下，杰克逊本会支持我们的政策，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强硬、有时并且是无情的战略，既帮助我们的盟友以色列，又削弱苏联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实际上，他支持我们保持警惕。）但是为了使他的修正案占上风，他不能赞成这样的主张，即缓和使我们得以在中东限制苏联的压力，有效地抵制这些压力，并最终挫败莫斯科。（中国人很了解这一点，他们是留心观察国际政治的行家。）杰克逊和他的支持者一心一意要把政府描绘成不够坚决的。从提出这个问题的方式来看，政府是不可能得胜的，因为连苏联的克制态度也被用来反对我们。一位为达成妥协而作出了努力并富

于同情心的犹太人领袖在一九七四年四月向我叙述杰克逊的论点时说：“苏联人必须争得点东西才能算是好样的；什么东西呢？已经证明是不符合美国利益的东西。”杰克逊给我们造成了一种好比“第二十二条军规”（指进退维谷——译者）的形势：如果苏联人进行克制，就得给他们一些报酬，而如果这种报酬不明显，就会因为它是秘密的而更有害。如果他们不合作，就必须受到处罚，停止给予已承诺的东西。不管是哪种情况，修正案都将通过，因为杰克逊没有冒任何风险。他依靠互相矛盾的论点，说缓和既是骗人的东西，又不符合他的策略。据当时的一篇报道，杰克逊对他的支持者一再保证说，“如果你们相信缓和能解决问题，那你们就太愚蠢了。”^⑤

当杰克逊在集合他的力量的时候，我正远在中东和中国。最后，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初，尼克松写信给众议院议长卡尔·艾伯特，他把总统的威信押在一项直截了当的选择上面：要么击败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要么从贸易法案里删掉最惠国待遇。但是那时总统已经没有什么威信了。十二月十一日，在我再赴中东的途中，众议院以三一九票对八十票通过了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一项要求把最惠国待遇从贸易法案中删掉的修正案以二九八票对一〇六票被击败了。

关于贸易法案的斗争这时转移到了参议院，这个讲坛对政府来说更为困难。我仍然谋求同杰克逊达成协议。一九七四年二月八日，正是华盛顿能源会议召开前夕，我对一群犹太人领袖说，我很想和杰克逊把一些事情谈妥：

基辛格：我知道我们能够和睦地解决这件事，如果他感兴趣的话，可以以他得到功劳的方式解决。

与会者：让他知道如果他以妥协解决这事就不会被宣传，这样做是否有

帮助？

基辛格：而且，他在犹太人这个圈子里的地位还会提高。我担心，如果时机尚未成熟就去找他，会变成他和我之间的争论……

与会者：杰克逊诚心诚意地认为他的修正案和他的政策都已成功了，他想对了。

一九七四年三月六日，即我为促成叙利亚和以色列开始谈判而作的中东之行回来后两天，我终于和杰克逊进行了谋求解决问题的会晤。这是一场对话的开端，它使我渴望中东能实现相对的安宁。为了准备这次会晤，多勃雷宁根据我的请求，给我一份关于移民出境统计的书面材料。头一年，苏联人曾应允我们，说不会减少移民出境，实际上保证每年约三万五千人。他们遵守了这个诺言，但因为一九七三年最后一季的数字下降了百分之二十八（与一九七二年同期相比），苏联人感到他们需要对我们作一番解释。他们说，由于“中东最近出现的事情”，使苏联公民不愿移居该地，这种说法在战争中间是不合逻辑的。比这个解释本身更重要的是，苏联人自愿对一件从法律上说毕竟是内政的事情提出解释。而且，这个解释暗示着如果不是由于中东战争，本来会有更多的移民出境。另一个突破是，苏联人对美国国会和政府提出的关于“困难户”的热情呼吁第一次作出了正式响应，“困难户”是指被开除工作或坐牢的人。我曾向多勃雷宁提交一份有七百三十八例“困难户”的名单请他注意；现在他们告诉我们说，有二百六十八例已收到或将要得到出境许可证；据说一百七十七例没有提出申请；一百四十九例被拒绝发给签证，但他们的问题正在审查中。对苏联来说，向一个外国政府答复有关具体个人的问题，这是一个没有先例的姿态。是杰克逊的压力还是我们的静悄悄外交造成了这一结果？几乎可以肯定是两者兼而有之。对解救这些良心被囚禁的人的命

运来说，前者提供了推动力，后者提供了方法。我完全准备承认杰克逊所起的作用，我认为我们正在坚实的基础上开始我们的对话。我有许多要学习的。

杰克逊是一个厉害的谈判者。他很快又把我拖入了另一个“第二十二条军规”式的问题：如果苏联人阻挡，那就证明他的修正案是重要的。如果我们警告说他的道路有危险，他就会痛骂政府在人权问题上努力不够。如果苏联人作出让步，那就说明赌注可以任意增加。杰克逊轻松愉快地接受苏联的照会，认为无足轻重。相反，他认为这份照会倒是说明，如果我们坚持他的策略就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绩。

我很快就认识到，我的对手是一个心理战大师。杰克逊和他的助手企图使人觉得，解决办法的障碍似乎在于我不愿意要求苏联人加快移民出境的速度。真正的问题是我深信存在一个限度，超过这个限度苏联人是不会任人摆布的，我的看法后来证明是正确的。达到这个限度后，苏联人就会转变，减少移民出境人数，而且也许要破坏我们外交政策的计划，特别是在微妙的中东谈判中，苏联人至少有一定能力能使之复杂化。

不幸的是，在我和杰克逊第一次会晤后的早上，我到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去作证，履行我许多星期以前作出的承诺，财政委员会当时正在考虑贸易法案问题。我曾向杰克逊提出一项妥协办法，按照这个办法，参议院在给予最惠国待遇后，可以在协议的间隔时间——例如每隔两年——审议苏联移民出境的实际情况，从而对苏联的行动施加一定影响。杰克逊拒绝这个妥协办法；他说苏联必须以书面保证大量增加移民出境人数，任何低于此点的方案都不能接受。如往常一样，我在和杰克逊会晤前几天准备的发言中重复了人所共知的反对杰克逊修正案的论点。他的助手们后来硬把这说成是在施加压力。实际上，我在证词中作了退让，以求调和，

甚至避免使用看来是图谋摊牌的言词。我说：

对于提出妥协建议一事我很犹豫，因为我不愿意把它变成政府的建议和提出这些修正案的人的建议之间的较量，因为我非常希望能搞成大家都同意的某种东西。

盖洛德·纳尔逊参议员把我的话看作是请他提出他自己对妥协的意见。他是威斯康星州的民主党人，并不支持政府。结果发现他提出的意见基本上是杰克逊头一天晚上拒绝了的那些东西。据我所知，纳尔逊并不知道我甚至还会晤过杰克逊，更不要说我对他提出了什么建议。另一方面，我也不能回避一个直接的问题；因此我用同情的口吻谈到了纳尔逊的意见。杰克逊的助手们（据我所知还有杰克逊自己）说有人触犯了他们；他们向报界泄露说，我企图通过财政委员会搞躲躲闪闪的活动。这是一种奇怪的看法，因为国务卿有责任向处理贸易法案的委员会发表他的真实意见。为了不让我有可遁之门，杰克逊在三月八日发表声明，拒绝妥协。我们之间的对话开始像是主权国家之间的谈判了。

一九七四年三月十五日，我仍然抱着缓和紧张气氛的希望，同杰克逊和亚伯拉罕·里比科夫会晤，后者是另一位同犹太人群众接近的参议员，他的高尚和公正的品德堪称典范，后来成为我的一位密友。克杰逊建议说，如要他重新考虑他的修正案，得拿出一份苏联保证发十万张出境签证的书面材料，这个数字等于现有数字的三倍。里比科夫明显地流露出一不愉快的神色。

不管参议员们是否施加压力，要苏联人同意这样的数字是决不可能的。另一方面，我也不愿意同杰克逊结下敌对关系，因此我把他提出的十万张签证的数字看作一种讨价还价的手段。我对这位参议员说，我要用它来“使自己更加强硬，而不是把它看作是你

的最后语言。”接着我便发现，这个数字被泄露出去了，杰克逊为此对我大加攻击。可能这件事是他的助手们干的；因为他们可以从中得到各种好处。显然，看不出国务院有什么兴趣要泄露一个我们知道是不可能实现的数字，而且我们知道这样做将把杰克逊钉死在一个难以后退的地位上，并可能使苏联人深信没有任何可以设想的让步能结束这场僵局。

为了把事情继续挂起来，杰克逊保留他对不大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的立场，硬说苏联人会同意发十万张出境签证这一数字。他暗示说，这是对“考虑”妥协的“可能性”的代价。这场谈判开始使我回忆起我同北越人的接触，他们的策略也包括请我提出建议，然后他们拿去“评定”一番，而评定的标准却从来不告诉我。

杰克逊的策略迫使我提出我自己的妥协主张，同时我完全知道杰克逊很可能拒绝接受。当时我认为葛罗米柯是比较容易对付的对手，就首先把这种妥协的主张向他提出，这却成了敌对关系不断加深的先兆。后来我向参议院财政委员会总结这次妥协时说道：

我将试图要求苏联领导人澄清他们国内的一些做法。然后可以用书信的形式把这些解释转告他们(苏联领导人)，我国政府将支持这些解释。

提出这项建议的理论是要对付苏联，因为它拒绝把它的国内做法交给另一个国家去审议。如果美国政府发表声明说，它理解苏联的国内做法，克里姆林宫有可能心领神会而保持缄默，只要苏联政府不确认这些国内做法是一项正式的国际义务，从而暗示美国有权进行干涉。

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我访问莫斯科，目的是为尼克松同勃列日涅夫预定于六月末开始的第三次最高级会谈作

准备。这是我向葛罗米柯提交这个建议的一个时机，但这个时机并不有利。尼克松的命运一天比一天明显。在同叙利亚举行的脱离接触的谈判中，苏联人被挤到了外边。从一些完全预想不到的角落，涌来了反对美苏贸易的更多障碍。三月八日，属于国会一部份的审计总署提出了一些问题，问政府在给苏联贷款方面是否遵循了规定的程序。据此，进出口银行在三月十一日至二十三日这段时间里停止办理给苏联的贷款申请。（后来总审计长又否决了审计总署的意见。）由于水门事件如火如荼，最惠国待遇问题陷于僵局，缓和及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问题日益引起争论，当时的确不是和苏联领导人进行谈判的有利时机。然而葛罗米柯并没有拒绝我们的建议，他是个迟钝的人。我把这看作是同杰克逊打交道的绿灯信号。

我从莫斯科回来后，在四月初向杰克逊、里比科夫和贾维茨等参议员提出了妥协方案。但是这几位参议员没有让步的意思。如果说他们有什么要求没有实现的话，那都是我的过错。里比科夫从来不喜欢杰克逊的方法，他以先见之明评论说，“我们得到的任何东西都不会使那位参议员满意。”杰克逊再次提到他的十万人数字是个“目标”，这种说法也算是一点微小的改进。贾维茨说，一点也看不出苏联人有任何“松动”的迹象。杰克逊也许认为他给我派的任务太容易了，因而又提出一个新的更苛刻的要求。他说，出境签证应优先发给那些住在各州、因而文化教育水平比莫斯科居民低的犹太人。在杰克逊看来，这等于是捣乱；如果苏联人想得到最惠国待遇，就得改正这种情况。贾维茨总结了他们几位的一致意见说，“意思是说国务卿回去后应该再多说些话。”他们要求我把犹太人从苏联迁出的数字增加三倍（在杰克逊交名单前，我们把人数增加了一百倍，现在还要增加），并具体指明应当从哪些地区吸收移民，而对所有这一切的报酬不过是把一百多个国家已经享有的

贸易待遇给予苏联而已。

眼看着我们的政府创制和培育成功的政策成为一场政治拔河游戏的一部分，简直令人气得发疯，何况这正是我们需要投入全部本钱来稳住苏联以便开始在叙一以之间进行穿梭外交的时候。为了防止苏联人扰乱那场谈判，我于四月二十八日和二十九日在日内瓦与葛罗米柯举行会晤。为了向参议员们表示守信用，我感到有责任再次提出移民问题，尽管其目的很难说是为了稳住葛罗米柯。我发现这时我的处境活像一个斗牛士企图用挥舞斗牛布的复杂手法引开一头公牛一样，但有人却在这个斗牛士的背后挥舞一面红旗，吸引这头野兽把注意力集中到斗牛士身上。我提醒葛罗米柯说，他和勃列日涅夫都曾经对我说，除了那些由于安全原因需要审查的人外，对移民出境没有法律上的限制，也不会有阻挠。既然苏联领导人已经主动说过，我为什么不可以提到这些保证呢？我补充说，如果以正确的精神去实施这些保证，必定能够增加移民出境人数。我是否可以在回国后转告参议员们说有这种保证，而且目标是四万到四万五千人呢（比原来的数字增加近15%到30%）？

葛罗米柯的回答是勉强的，但总的来说还是积极的。他说我可以把移民出境的标准告诉参议员们。至于达到四万五千人的数字，可以转告说“大致上是一种趋势”，但不作为苏联的承诺，因为苏联不可能知道究竟会有多少人提出申请。葛罗米柯板着脸说，苏联领导上不能把自己放在这样的地位，即为了履行对美国的一项道义上的义务而征募公民迁移出境。

我决定试试我的运气，于是提出了移民的地理分布问题。这一下气氛变得冷淡了，但葛罗米柯控制了自己，没有发脾气。他冷冷地说，他将同莫斯科核查一下。我们提出新要求的天才似乎是无穷尽的。

在正常情况下，把移民数字增加到四万五千人应当被看作是

一大让步。而且公正地说，由于杰克逊把事情推进到如此程度，应当给他记一大功。但是前几个月的争论严重地影响了这位参议员和政府之间的相互信任。我不敢把葛罗米柯告诉我的话电告华盛顿，因为我害怕杰克逊会说这还不够，而我当时还在进行穿梭外交，无法回答他，那样会使我们在谋求中东和平方面的努力复杂化，那时这方面的局势已经是千钧一发了。因此我决定在穿梭完毕后亲自去向参议员们汇报，我估计穿梭至多需要十天就够了。谁知道结果竟持续了三十四天，真是令人恼火。杰克逊却在此期间动员了他的力量，反对达成任何妥协。

当我在六月四日回到华盛顿后，多勃雷宁在口头上确认了四万五千人的数字，并交给我一份书面材料说，申请出境许可证的人当中，只有百分之一一点六被拒绝。他提供了一份六个月来按月处理申请情况的材料，这又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姿态。此时不解决问题，更待何时？不幸的是，杰克逊并不想解决问题，而只是想挑起争论。

争论的题目是缓和。在这个问题上，杰克逊同贾维茨和里比科夫的意见有分歧。在我下一次同这三位参议员会晤的时候，他们表示同意考虑我向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建议的一封关于苏联做法的信件草稿。六月八日，杰克逊发表了一项对他来说是调和的声明，他说：“我们并不是要求立刻让每一个人离开苏联。”

不久就看出来，杰克逊要把自己置于提出这种问题的境地。这一只手给予的东西，另一只手又拿走了。因为杰克逊一派的力量进行了两个月的组织工作，要对东西方贸易实行双重抵制。他们的安排是，不管贸易法案中对最惠国待遇如何处理，都可通过停止进出口银行贷款的办法来阻碍美苏贸易。

在一个庞大的政府里，要同时对一切问题给予同等的注意是不可能的。因此，一个技巧熟练的对手有时可以把本来是例行的决定变成一次重大危机。一九七四年六月三十日，总统利用进出

口银行便利条件的权力又一次提交国会请求延长，这是几十年来每两年就要进行一次的事，向来没有争论。但这一回却不同了，政府本来就有事，这下又被反对派抓住，事先毫无准备。反对派却窥见了一个以限制贷款为手段的双重机会：如果杰克逊修正案被击败，就退守这一步；如果成功就以此作为限制东西方贸易的另一种力量。

结果，在重新掌握国会对外交政策执行情况的控制这一名义下，艾德莱·史蒂文森和亨利·杰克逊参议员在其他十八名参议员的支持下提出了一揽子修正案。规定国会有权审议进出口银行超过五千万美元的任何贷款，并限定对苏联的全部贷款不得超过三亿美元。史蒂文森以十分明确的口吻阐述他们的动机说，“这项修正案反映了（杰克逊）对此事的关注，以及他对时间和精力上的巧妙运用。”

尽管国会采取最后行动之前需要几个星期，但其含义马上就一清二楚了。杰克逊一派的力量有这么一种手段，可用以对每一笔贷款——即使是中等数目的——制造障碍，而且可以举出任何理由。这样，即使苏联关于移民出境的保证导致在最惠国待遇问题上达成妥协，杰克逊一派也能够任意提出新的条件。而且在任何情况下，关于贷款最高限额的规定都可以阻止大笔的资助。结果是一场恶性循环：对贷款的限制削弱了苏联给予移民保证的意愿；而不能满足要求更多保证的贪得无厌的胃口又为拖延达成妥协提供了一个借口。

所有这一切活动的背后，暗藏着一种忧虑，尼克松可能利用即将到来的莫斯科最高级会谈逃避水门事件，而这种忧虑有助于这些活动的成功。在正常情况下，最高级会谈的即将召开有助于两党团结。一九七四年夏天，许多人都担忧尼克松可能正在策划到莫斯科搞点什么惊人之举以欺骗那些对他紧追不舍的人。对尼克

松的这种估计是不对的，他那时十分清楚，他在历史上的地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依靠持久的外交政策成就，而不是公众关系方面的小动作。但是对只是通过新闻媒介或社交来认识尼克松的人来说，也存在这方面一定的可能性。杰克逊和反缓和院外集团的其他人决心不让尼克松在莫斯科有什么谈判筹码。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企图——而且是成功地——拖延了关于“妥协”的讨论，直到尼克松从莫斯科回来以后。如果运气好的话，过了那个日期他的命运就将被决定了。六月二十四日，也就是尼克松动身去莫斯科的前两天，杰克逊宣布说，他准备提出新的但尚未具体化的条件，从而扰乱了一切谈判，并且阻止尼克松在莫斯科就移民问题进行有意义的讨论。杰克逊承认取得了某些进展，但他说还不够；在他看来，“如果我们保持坚定”，就有可能取得更多的让步。他问道，“为什么只对他们让步而不要求任何回报？”他没有具体说我们作了哪些让步，也没有解释为什么苏联人在移民问题上的建议只是“空的”。他还说，他对可能危及最高级会谈并不关心，因为他感到首先就不该举行这一会谈。

这时反对缓和的人们已经实现了他们的部分目标。他们已经把我们认为是安全栓的东西变成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既涉及国内，也面对苏联人。我们对苏联的政策是以维持胡萝卜和大棒之间的平衡为基础的。但是我们没有能做到给他们以最惠国待遇；我们甚至不能为已有的贸易额组织资金来源。这一切都是在苏联已在犹太移民问题上作出了让步的情况下发生的，而这种让步在几年前是根本不可思议的。到一九七四年夏天，从一切实际意义来说，胡萝卜已经不存在了。*

* 贸易法案连同杰克逊修正案于一九七四年底通过。一九七五年，苏联移民出境人数降至一万三千二百人，比一九七三年的高峰数字减少两万多人。

国防问题上的矛盾

但是，我们也没有得到一根更粗的大棒。主张对抗的漂亮词藻并没有导致人们愿意支持加强国防的努力。自由派也许赞成在人权问题上同苏联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摊牌；但他们看不到这同加强军事准备有什么关系。的确，关于国防预算问题在国会又连续两年受到攻击。这样，批评我们的人一方面招惹来危机，一方面又使我们得不到对付危机的手段。

有些人企图逃避责任，狡辩说是缓和削弱了我们的国防工作。这完全是颠倒历史。在尼克松的第一届任期内，在还没有听说缓和之前，国会就已经把我们的国防预算削减了四百亿美元，理由是只有这样才能迫使政府采取调和的政策。尼克松不得不在第一届任期中不断地进行拼死斗争，反对国会削减国防预算，反对攻击新式武器，反对从国外甚至是西欧撤回美国驻军。^⑥到了尼克松第二届任期的初期，这些紧缩预算和改变军事技术的积疾，给我们的军事态势带来了令人忧虑的缺陷。

我们从来没有认为缓和能减轻我们的国防负担。相反，一九七二年莫斯科最高级会谈后不久，尼克松就建议增加国防预算四十五亿美元。经过多年徒劳地设法以削减预算来先发制人地对付批评者之后，我们居然能够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达成协议后正式提出增加国防预算，这的确是一个讽刺，但并不是偶然的。尼克松在我的鼓励下，总是从国防部准备的几种预算方案中挑选数字最高的一种。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防部推荐的武器系统，从来没有一种被白宫否决过。实际上，我们是谋求增加我们在军事上可供选择的方案种类，建立一支可靠的力量，以对付可以预见的各种规模的侵略。

结果,受到更多挑战的是防务方向,而不是防务费用。越南战争使国防预算多半花在军事行动费用方面,从而使我们的军事力量结构出现许多漏洞,同时国会几乎拒绝了我们为适应新的军事现实而提出的一切计划。我们所度过的十年是技术革命的十年。我曾经指出,苏联人在经历了一九六二年古巴导弹危机的羞辱后,开始了一个坚持不懈的国防建设计划,要在战略力量方面赶上我们。这注定最终要对我们自一九四五年以来的战略基础提出挑战,那个基础是:依靠美国战略核力量方面的优势,来对付苏联在常规力量和地理上接近重要战略地区例如西欧和中东这些有利条件。到尼克松第二届任期之初,苏联已经在战略运载工具的数量上取得均势,并在投掷量(核弹头的总重量)上取得优势。因此,把战略核战争作为主要的防御手段就变得越来越靠不住了。双方互相使用核武器的代价实在太昂贵了,几天之内就可使伤亡数字增加到一亿人以上,因而既可能抑制人们进行抵抗,也可能使得人们不敢发动侵略。我们进行抵抗的能力将会受到怀疑,特别是在没有结盟保护的重要地区,即所谓灰色地区,例如中东发生危机的时候。而在民主国家,核战争的刻板选择——要么投降,要么接受大灾难——必然培养出和平主义。“宁赤勿死”从一句口号变成了行动计划。

现代军事力量的矛盾在于:大力增加力量因素冲破了力量与政策之间的传统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一个国家的领袖从来不会想到应当对有用的军事力量规定一个最高限额。那时,由于技术上的选择有限,力量的大小主要以数量多寡为标准。今天的问题则是要保证使我们的力量与我们的外交政策目标一致。在目前情况下,不管我们或我们的敌手如何改进战略武器的大小或质量,总存在着一个压倒一切的事实:全面地相互使用战略核武器将把人所共知的文明生活毁于一旦。

如果民主国家集中注意到他们的需要，他们就会从新的情况中得出两点结论。第一，尽量长期地保持制约能力，即足以威胁苏联陆基导弹的能力，这种导弹是苏联战略力量的骨干。这样做符合民主国家的利益。只要苏联人害怕局部侵略会引起反击，他们就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对发动这种冒险。*

第二，也是相反的，甚至是使我们的战略力量现代化的巨大努力，也只能推迟而不是永远防止我们减少对这种力量的依靠。没有任何一种核武器曾在现代战争的情况下使用过，或者用来对付一个具有报复手段的对手。的确，没有哪一方曾一次试验发射超过几枚的导弹；也没有哪一方曾以南北方向发射导弹，如像他们在战时必须做的那样。但是，开始一次全面的突然袭击将取决于相当大的信心，认为在经过精确配合的进攻中发射成千枚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从陆地、海上和空中——能够在对方发射任何先发制人或报复的导弹之前，以预定的准确时间和可靠性把数千英里外的目标全部摧毁，而且收效是如此之大，即使对方报复也不会造成难以忍受的破坏。任何计算错误或技术失误都将造成国家灾难。

由于这些原因，双方的战略武库的主要目的都在于赶上和阻遏对方的力量，并保证让第三国看不出美苏之间存在着力量上的不对等。在战后的历次危机中，没有一位美国总统曾考虑使用战略核武器。简言之，美国国防政策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大量增强局

* 反对的意见说，苏联人将受到诱惑，对我们发动先发制人的袭击。只要我们在各种战略力量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就可以减少上述危险。现状是，我们的陆基导弹占总投掷量的不到40%，而苏联的陆基导弹却占其总投掷量的85%以上，这种不对称的情况对我们是有利的。如果苏联人只有通过同时攻击美国才能袭击或压迫其邻国，那么对他们的威慑能力将会因此大大增加。因为他们如果害怕自己的报复力量被摧毁，那就得再思而后行。如果他们要在袭击一个邻国加上袭击美国与什么事情都不干之间作选择，那他们大概会选择什么事情都不干。

部抵抗的能力。自从六十年代初期以来，美国国防政策便已宣布了这个目标，但是由于越南战争和其后的反战情绪，使常规力量和战术核力量没有得到必要的加强。

到一九七三年，为了重新审查实行新战略的主张、武器系统和开支，需要一位强有力的、当满四年任期的总统。尼克松心里倒想这么干，但他作为总统的权威却正在下降。国会正忙于进一步限制总统的斟酌权，无暇顾及建设美国力量。反对越南战争转变成反对在海外作军事准备。要求增强战略力量受到抵制，理由是它具有挑衅性，而且也没有必要；要求增强常规力量也被指责为危险，因为它会惹起远处的冒险行动。这种逻辑两次帮助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迈克·曼斯菲尔德击败尼克松政府要求建造快速部署后勤船只的建议。几年后，这个主意又被重新提出来用以保护波斯湾。保守派对曼斯菲尔德的思想逻辑是不满意的，但他们知道公众舆论不欢迎大量增加军事开支，而要真正改变我们的力量结构，增加军事开支却是必需的。

越南停火后，我们设法把国防预算增加了约百分之五。大部分计划项目的目的在于对付日益增长的苏联战略力量，这些项目包括：B-1战略轰炸机；三叉戟潜水艇和导弹；巡航导弹；以及一种新的、更重的陆基洲际导弹，名称叫MX。已经开始重新调整地区防务，但只有到国会改变态度后才能迅速开展起来。

然而连这点比较温和的改变也受到越南战争加上水门事件的阻碍。越南战争结束后，一些比较极端的论点，例如说美国好战和天生喜欢干涉别国的事情，已失去了一部分市场；攻击的目标转向比较不令人激动的问题，但同样不赞成增加防务开支。每一种新的战略武器系统都要遭到反对责难，而反对意见也不一定是相互一致的。有的说，新武器不必要，因为我们已经有“超毁灭”的能力；有的说，新武器危险，因为它将迫使苏联也搞对付的东西，从而

加剧军备竞赛；还有人说，搞新武器将破坏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随着时间的推移，又出现了新的说法：即新武器系统将甚至以奇特方式削弱我们自己，因为它会妨碍十来年后更新的和更好的武器的诞生。即使反对者不能破坏掉一种武器系统，他们也会通过进行无休止的调查研究来推迟，例如研究部署的方式，研究对环境的影响，研究对军备控制的影响等。

自从六十年代中期以来，历届政府提出的每一种新的战略武器系统都要受到以上或其中一部分说法的攻击，而被搞掉的武器种类名单——不管是被推迟、缩减或取消——就是对各种反对国防的院外集团的联合影响表示敬意的一份厚礼。名单上包括：B-70 轰炸机、反弹道导弹、B-1轰炸机、MX导弹、三叉戟Ⅱ导弹，它们不是被取消就是推迟多年，有的甚至达十年之久，推迟的办法是不断重新审查。主要目标是针对目前正被考虑中的那种武器。

一九七三年九月三十日，《芝加哥论坛报》准确地评论道：

批评家们攻击重要的新武器计划，不是通过正面地攻击这些计划是完全错误的，而是通过微妙地暗示说，我们走得太快了，或者是太远了，或者是走错路了，或者是花钱太多了。他们想搞一些限制性的改变，不是真正取消一种有用的武器，而是阉割它。

在一九七三年，目标是三叉戟核潜艇和三叉戟导弹以及B-1战略轰炸机。B-1是设计来代替 B-52 轰炸机的，到那时后者已使用二十多年了。三叉戟潜艇将增大我们从潜艇发射的导弹的射程（及其重量），并通过扩大其在海洋活动的面积减低这些导弹的易受攻击性。

反对这些武器的论点是旧论调的翻版。在七十年代初期，设在华盛顿的思想库布鲁金斯学会开始出版一种年度报告，名叫《确

定国家重点》，它倾向于反映国会民主党多数派和某些共和党人的观点。关于三叉戟潜艇，这份年度报告在一九七三年不是说不需要这一武器系统，而是说“在整个七十年代，放慢速度，显著减低费用，”同样可以达到目的，“而不会影响美国的安全。”^⑦ 报告建议放慢计划进度，或者推迟进行，等到八十年代初期搞出一种新的、更准确的导弹——三叉戟Ⅱ。（七十年代后期时，当然，尼克松政府就已经着手搞三叉戟Ⅰ导弹，反对新战略计划的人批评三叉戟Ⅱ导弹是不必要的，并成功地把它进一步推迟了。）

关于B-1轰炸机，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报告表示担心，到一九七五年准备决定购买时，“选择B-1只是因为它是唯一可以得到的东西。”这种看法再次反映了国会里普遍的情绪。报告建议推迟对任何新轰炸机作出决定，直到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对今后的需要看得更清楚时”再说。另一种选择办法是“推迟两三年再作出决定，目前则同时投资于研制一种不同的战略飞机：即能避开敌人的、携带远程巡航导弹的轰炸机。”^⑧（在卡特政府期间，这种意见终于被我们的继任者接受了。）

这些攻击的影响不能用具体表决时的胜负来衡量。造成的结果是一种恶性循环，在这个循环中，五角大楼为了缓和骚扰和保护关键计划，削减了它的研究和计划，企图作为对付国会里批评者的先发制人的手段。一般来说，只搞一种武器，否则国会会从各种项目中挑选那些在五角大楼看来用途最小的武器。例如，我在第七章里谈到，五角大楼不大愿意发展巡航导弹，担心它会被用来作为砍掉B-1轰炸机的借口。这些担心事实上证明是对的。同样，当尼克松在一九七三年批准拨款研制MX洲际导弹后，军方就放弃了增加民兵III导弹弹头数目的计划，他们担心搞后者会减弱发展MX导弹的劲头。结果是在十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既没有改进民兵III，也没有搞出一种新的洲际导弹。

三叉戟导弹命运多舛。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七日，参议院以四十九票对四十七票仅两票之差拒绝了一项要砍掉这整个计划的建议。胜利带来损失。一九七三年秋天，五角大楼在准备于一九七四年一月提出的预算中建议把三叉戟潜艇的采购率从每年三艘减至每年一艘。白宫施加了很大压力才改变这一决定，但也只是部分的。

我自己对引起争议的三叉戟潜艇和 B-1 轰炸机计划的态度深受我们国内辩论的影响。从理想上说，由于苏联大力加强国防带来的变化，我们的战略力量的重要性不断下降，以及常规防御的重要性增长，我本来会赞成对我们的战略政策作出系统的重新审查的。但是我痛苦地认识到，任何重新审查都容易拖延时日，很久才会真相大白；在现有的舆论气氛下也许更会如此。如果每一项新的美国武器系统都要受到破坏，而苏联却在发展四种新的导弹，那么我们迟早要落在后面，不管武器系统分析家们如何空泛地计算。在一个可以预见的时期中，苏联导弹将变得更加准确，而我们的导弹则将更加易受攻击；我们如果拒绝参加这场竞争，就会等于是单方面实行裁军。

MX导弹计划很快就陷入了国防问题辩论的互相矛盾的旋涡之中。支持它的论点说，民兵导弹易受攻击。反对它的论点驳斥说，我们搞陆基导弹、海基导弹和轰炸机上发射的导弹这种三驾马车式的东西，使苏联的第一次打击更加危险，何况对这种大规模袭击一点实际经验也没有。反对苏联第一次打击的人们同样反对搞 MX导弹，因为它会对苏联人带来很大的威胁，诱使他们发动第一次打击（而不管我们是否有上述三驾马车式的东西）。人们很少解释为什么民兵导弹是安全的，而 MX导弹却是易受攻击的；其结果之一是造成方式复杂，费用高昂，必然难以得到国会和公众的支持。我自己的看法是，苏联人比我们更经受不起第一次打击，因为

他们的战略力量大部分是陆基的、固定的。美国拥有反击力量对我们来说是一种保险，对苏联来说则更可以使他们克制自己。但是这并不排除或减少对我们的国防政策作出重大调整使之走向区域防御的需要。

关于三叉戟潜艇，我不大赞成这种设计。我认为，把二十四枚导弹放在一艘大潜艇上，而不是在较小的北极星和海神潜艇上放十六枚导弹，这是错误的。每一艘三叉戟潜艇都比过去的潜艇使我们的海基导弹力量受到更大的危险，而由于反潜技术的某些改进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我认为我们应该向相反方向发展，即多造舰艇，每艘配备较少的导弹。国防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同意这个观点，而且实际上已命令研究一种较小的潜艇。但我也担忧，如果我们每当准备生产之际就去改变设计，那么我们会自己投入那些真正想冻结我们的一切计划的人的罗网；结果什么武器也永远造不成。因此，我在一九七四年初写了一份备忘录给尼克松，呼吁国防部初步作出决定，减低三叉戟潜艇的生产率。我说：

我同意施莱辛格对三叉戟潜艇的体积和费用的关心，并且完全支持他的努力，即既发展一种较小、较便宜的潜艇，又加快三叉戟 I 导弹的部署。但是，我们如果想拥有一支具有实用规模的作战力量，那就得采购至少六艘三叉戟潜艇。鉴于至少需要这六艘潜艇，按每年造三艘的速率投资，再过一年将使我们仍然能部署一种较便宜的、较小的潜艇，用以代替建造更多的三叉戟潜艇。

后来，证明较小的潜艇不实用；一系列的因素又减缓了三叉戟潜艇的生产。三叉戟 I 导弹虽然进行生产，三叉戟 II 导弹却被推迟了。这些推迟的决定都不是白宫作出的。

我支持造 B-1 轰炸机的另一个直接原因是担心可以实现的東西被追求理想所阻碍。B-1 轰炸机的特殊设计是否最合适，让武器

专家们去决定；但那时在我看来，很难说美国可以无限期依靠一种年龄比许多驾驶员都大的飞机（B-52）。我们要冲破那种砍掉新武器的循环，它不是鼓吹一种陈旧过时的系统的好处，就是吹嘘还在绘图板上的设计的妙处。（在我写本书时，又有人以经典的方式提出今后会出现躲避雷达的“偷越”技术的前景，作为不要建造 B-1 轰炸机的又一理由。）

当时在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国防事务的菲利普·奥迪恩在一九七三年八月十日写了一份备忘录提醒我说：

我们正在进入七十年代后期，依靠两种风险很大的现代化计划（三叉戟潜艇和B-1轰炸机）以保证我们从轰炸机和潜艇发射的导弹今后能够生存。由于缺少有屏障的计划，如机动洲际导弹和可行的巡航导弹计划，我们的灵活性受到限制。而且，我们正在使自己进入一种越来越站不住的处境，无法在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失败时作出回答。（楷体是原来有的）

对他的担忧我有同感，因此我不但极力主张发展巡航导弹，而且研究由飞机携带的洲际导弹，以减少我们陆基力量的易受攻击性。从最低限度说，如果要放弃一种武器系统，我主张不要把这作为一种单方面的预算上的决定，而是作为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一部分，从而压苏联作出某些让步。

我选择提出这些意见的机会是在国防计划审议委员会审议新的国防预算的时候。一九七三年十月三日，我以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发出一项指示，要求国防部赶紧研究战略巡航导弹计划。

这项指示使我同厉害的国防部长发生了冲突。施莱辛格是我在政府中遇到的聪敏又善于分析事物的人之一。当时他正从事伟大的工作，要克服我在这里述及的许多棘手问题，不时遇到资源不足的阻挠，但从来不是由于缺乏洞察力而无能为力。我们两人在

战略上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有学问的人从来不愿甘拜下风，也没有哪位国防部长愿意接受国务卿的指示。

而且，施莱辛格的傲气和我一样；他不会容忍一个部门之间的委员会的主席对他认为属于国防部的特权提出挑战。十月二十九日，我间接地得知施莱辛格已经下令把我的指示的副本全部没收。除了管辖权限问题外，施莱辛格无疑地认为他手里已经有三叉戟潜艇和B-1轰炸机，不必再向倔强的国会提出新的武器系统。十月二十九日正是中东危机达到高潮的时候；国务院和国防部携手合作是刻不容缓的。尼克松正忙于对付水门事件。我决定不把这个挑战搞成一个争执，没有把问题提交总统。

我提到这件事，并不是要在事隔八年之后解决一项官僚之间的积怨，而是要说明正当人们敦促我们同苏联对抗的时候，我们的国防政策却受到两股相反的激流的冲蚀。我们要在同一个时刻既维护增强国防的义务，又信守同苏联谈判的承诺；在这个战役中的盟友，到了另一个战役就变成了敌人。军方只是在捍卫他们已有的东西；他们不敢提出修改国防政策，否则就会失去现有的力量。甚至持有类似见解的内阁成员，例如施莱辛格和我，也感到在白宫无力执行纪律的情况下，分歧是难以解决的。

常规武器方面的僵局更为严重，尽管我们增加了国防预算中这一方面的开支，一直存在的差距却继续朝对我们不利的方向扩大。预算削减主要是针对区域防御力量。自越南战争中的高峰数字以来，陆军已经减少了五个师；它迫切需要现代化。空军应付预算削减的空头办法是保持它的力量结构但减低其战备能力。到一九七三年，他们在这方面已经走得够远了。结果，一九七四财政年度的国防部计划把原来计划的战斗机力量削减了五个联队，减少程度略高于百分之二十。海军比空军更逊一筹。它以克扣维修费的办法来偿付现代化的费用。我的助手们估计，百分之五十的海

军舰只最多只能算是勉强作好了战备。

尽管这样，自从一九七一年就曼斯菲尔德修正案进行斗争以来，国会要求减少海外驻军的压力一直没有减弱。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七日，参议院以四十九票对四十六票通过一项修正案，把美国在海外的驻军人数减少百分之四十。经过政府的艰苦努力，这项修正案以五十一票对四十四票被击败了，另外提出了一项修正案，建议把海外驻军人数减少十一万（即减少百分之二十三）。在这项修正案也被推翻后，参议院就表决削减任何驻在国实际上不支付费用的海外驻军人数。我们阻止了这些措施，但是在一九七三年这些起削弱作用的修正案获得通过似乎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要求削弱我们在国外进行干涉的能力的同样倾向使国会禁止建造永久性基地设施，也不准在印度洋的迪戈加西亚新建的基地停放 B-52 轰炸机。

关于年度预算斗争的细节都被淹没在默默无闻之中，这也是由于它们在知识上过于尖端所致。它们的重要性在于，一方面我们被催促在涉及外缘地带的重要问题上抗御苏联，另一方面我们的国防政策却被国会卡住，总统的权力也被水门事件和一系列限制性立法所削弱。主张修正的历史学家倾向于压制这样的事实，即政府在两条战线上作战：反对那些诬告它抗苏不力的人们，和反对那些想剥夺它对付甚至是可预见的挑战的军事手段的人们。批评我们的许多人所持的对抗性立场既不反映公众的情绪，也得不到国会在对国防问题的态度上给予的现实支持。既没有战略思想又没有公众支持的纸上谈兵不能产生政策，只能造成一种畸形状态；这就是我们的国内辩论给我们造成的结局。

再谈限制战略武器会谈

使那场全国性辩论带有噩梦性质的是，每个问题似乎只产生它自己的支持者，同任何其他问题没有明显的关系。支持杰克逊修正案的那些多数派，并不一定支持搞强大的国防。但违反常情的是，那些反对加强国防的多数派，也不会支持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这种会谈比加强国防的努力会引起更多的争论。像杰克逊修正案一样，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日益成为一种象征；反对它的人企图孤立地击败它，而不顾它的一些具体规定的好处，也不顾如果失败了剩给我们的选择是什么。

如果说，苏联的国内政策给我国的自由派提供了一个阻碍东西方贸易的靶子的话，那么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也对保守派起到了同样的作用。杰克逊参议员把两派都集合到一起。一位单枪匹马的参议员再次证明，在总统宝座摇摇欲坠的真空情况下，一个下定决心、意志坚强的能干人能够取得何等的成就。杰克逊影响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前途的能力，比在最惠国待遇问题上更甚。作为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排名第二的民主党人，他对五角大楼来说是需要注意的力量。他可以通过扣住拨款的办法来进行惩罚；他也可以仅仅用退坐一旁的办法来增强反军方院外集团的力量。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防部的高级官员都面临一个无法决定的抉择：究竟是坚持自己的信念或者至少是忠于政府，还是他们必须在关键问题、计划和人事选择上得到杰克逊的支持。

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与东西方贸易的另一个区别是，不能证明一个较为团结的美国有能力使会谈取得更好的结果。苏联人从来没有提出过一项能为参与我们国内辩论的任何一方所接受的建议。从技术上说，我们政府的立场反映了一致的观点。在这个意

义上,我们的国内争论只是一场假想的拳击赛;它们从来没有涉及真正的决定,只是担忧可能发生的事。同时,毫无疑问,我们的统一立场往往代表一种勉强的妥协,而不是概念上的挺进。这一事实在谈判中造成了一个真空。

经验证明,苏联官僚主义由于结构上的原因也许不可能就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提出一种建设性的立场。如果多勃雷宁说的话可信的话,那么苏联的每个部门就只管理其权限范围内的事。因此,外交部无权对战略计划发表看法,因为这属于国防部的权力。而且据说,国防部也不能对外交建议进行评论。我对此简直难以相信,因为国防部部长起先是安德烈·格列奇科,随后是德米特里·乌斯季诺夫,两人都是政治局委员。按照这种看法,全面的目标产生于政治局,或者也许是总书记自己的办公室。多勃雷宁说,答复美国的建议比主动提出苏联的意见要容易,因为苏联官僚机构在一条规律方面显然也不例外,那就是没有人喜欢扮演提出让步的角色。因此,苏联的建议往往是形式主义的,非常片面的。据我所知,没有一项突破不是由于美方采取主动而造成的。而随着缓和的其他因素纷纷烟消云散,苏联人在答复我们为打破僵局而作的日益脆弱的尝试方面的非军事主动性就越来越少了。

我已在第七章里叙述了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议所引起的辩论,在这项协议里,美国两党数届政府在无人反对的情况下十多年中单方面建立起来的力量水平,突然被宣布为“危险的”。实际上,双方的力量水平都反映了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这一名词的简称发明前,或者是就军备控制进行认真的谈判前,就早已作出的精心决策。在战略武器系统的总数上——包括陆基和海基导弹以及轰炸机,美国略逊一筹,如果把苏联一百五十架超龄的战略轰炸机也算作重要武器的话。另一方面,美国导弹的技术、准确性和多弹头的数目都遥遥领先,而这些才是用来打击目标的东西。

因此，趋势的意义取决于所选择的时间。如果双方不加约束地继续他们的现有计划，那么在七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将在可运载的武器即导弹弹头和炸弹的数目、质量和准确性方面领先。另一方面，苏联人将迟早能够把他们的导弹的较重投掷量改变成更多的单独弹头。到八十年代的某个时候，我们的陆基导弹将易受苏联的第一次打击，除非我们加紧建造或者苏联减缓速度。我们仍将保有较多的潜艇发射导弹和轰炸机；这些东西作为报复性武器和摧毁城市的工具是有用处的，但人们认为用它们来对付在地下发射井内的苏联陆基导弹还不够准确或可靠。

辩论涉及到的问题是，在努力克服我们的报复力量易受攻击性方面，限制军备能够起什么作用。这个问题是一场更大的争论的一部分，即：军备控制究竟是有助于我们的安全，还是损害了我们的安全。军备控制在七十年代有一段复杂的历史。在核时代的最早日子里，有些心怀忧虑的科学家曾辩论说，单方面的约束会促使苏联人也跟着效法。例如，在五十年代初期，罗伯特·奥本海默领导下的一个重要舆论机构催促我们放弃研制氢弹，理由是这将促使苏联人也同样地采取克制态度。在辩论反弹道导弹防御问题时，这个想法又重新冒了出来；^⑨它后来成为帮助卡特总统决定取消B-1轰炸机的一个因素。根本没有一点证据表明苏联人是按照上述准则行事的，相反的证据倒是多不胜数。苏联的武器计划并不是受我们的决策所驱使的。后来，哈罗德·布朗国防部长在卡特政府期间曾说过：“我们已经发现，当我们造武器的时候，他们也在造；当我们停造的时候，他们仍然继续造……”^⑩

六十年代又出现了另一种理论。它不主张单方面约束，而是主张共同致力于在战略武器上保持稳定，办法是让双方的战略力量都易受攻击。军备控制谈判的目的应是使任何一方都不能从第一次打击中得到好处，或者在报复时避免灾难性的破坏。随着对

突然袭击的恐惧的消除，作出可能把一场危机升级为大战的一触即发的决定的危险也会消失。

核战略是抽象的和理论性的，因为不存在任何可以吸取的经验——这对人类来说是幸运的。那些研究学术的人很少注意到，即使是相互克制也会产生空前的战略后果。从来没有一个大国认为它的主要对手的力量的无敌性，或者是它自己的人口的易受攻击性，是有助于稳定的因素。这还涉及一个并不是所有的鼓吹者都能接受的推论。如果战略力量的相互易受攻击性是要求达到的目标，或者是技术发展的倾向的话，那么我们的战略力量就不再能够抵销苏联在常规力量方面的优势，或者是苏联在进行地区干涉方面的能力。在战略均势的情况下，不管这种均势是由于军备控制还是技术发展或者两者共同造成的，民主国家如果想避免政治讹诈的话，就必须建立常规力量。

遗憾的是，主张控制军备的人很少准备正视这些后果；一般来说，赞成控制战略武器的人都反对增强其他种类的军事力量。这就造成了反常现象，那就是反对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人一般都试图通过恢复我们传统的核优势来纠正战略武器的平衡，而由于双方都拥有大量弹头，这基本上只是一种幻想。另一方面，鼓吹进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人则不大愿意从他们所主张和加快的战略均势中推论出局部防御的重要性。因此，这两派的主张虽出于不同的原因，却都倾向于忽略加强区域或常规力量的必要。

到尼克松就职的时候，控制军备的主张已经深入舆论界的头面人物之心；而军备控制和裁军署的成立，也是这一主张制度化的体现，该署的任务是研制政策和谈判协议。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曾经就这个问题同苏联开始谈判。肯尼迪缔结了禁止在大气层进行核试验的条约；约翰逊签订了不扩散条约。在约翰逊总统准备同苏联领导人于一九六八年举行的会议议程上，限制战略武器会

谈曾是议题之一，后来因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而取消了这次会议。

尼克松政府起先曾想把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同苏联的地缘政治行为联系起来。它虽然从来没有放弃这个想法，但由于受到日益增长的压力，不得不在实际上无条件地开始控制军备谈判。^①最后，本来从制度上就怀疑这件事的国防部，竟也抓住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来缩小由于国会削减预算而造成的苏美战略力量之间的差距；五角大楼催促我们通过控制军备谈判限制苏联部署进攻性导弹的数量。一九七〇年，国防部副部长戴维·帕卡德提出一项备忘录，催促向我们参加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代表团发出新的指示，“以使我们能够设法在十月中旬或至迟在十一月在维也纳达成一项协议。”他认为，早日达成一项哪怕是有限的协议是重要的，因为即将“紧缩国家预算”“很可能”导致“大量削减国防计划包括战略力量”，从而将“对我们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方面运用策略的时间产生显著的影响。”如果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方面取得进展，预算所要求的削减将在美国得到较多的欢迎，并且成为对苏联“表示善意的象征”。而如果谈判不能取得进展，那么这种削减就将“减少我们讨价还价的资本”。^②

所有这些因素串在一起，促成了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在一九七三年正式准备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时，这些因素也是存在的。但是对将谋求达成的协议的性质有许多争论，这些争论都是理论性的和高度技术性的（见第七章）。但是主要的分歧在于外交政策上的心理学派和神学派之间，这是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的。“心理学家们”认为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是走向缓和紧张局势的一个重要步骤，是一个消除核战争魔影的境界。“神学家们”则对同苏联达成任何协议都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苏联就是邪恶的化身；克里姆林宫愿意签订的任何东西都不可能符合我们的利益。

他们想破坏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不是因为他们反对它的条件，而是因为他们反对进行这项谈判的原则。

我在这场辩论中处境孤独。我在国防问题是鹰派，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方面是鸽派，两方面都有人反对我。我反对那种强调在核战争中有老百姓伤亡的“确保毁灭”理论，我深信我们必须加强常规力量。但是我也认为在一项明确的国家安全政策中，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有重要的作用。我不相信军备控制本身可以缓和紧张局势。的确，如果不把控制战略武器同要求在地缘政治竞争方面有所克制联系起来的话，那么这种控制很可能成为苏联扩张主义阴谋的一个安全阀，成为苏联为掩盖或补偿某项新侵略行为而发动的和平攻势的工具。每一次发生苏联侵略行动的时候，都会有人呼吁说，新的紧张局势使进行军备控制谈判更重要了。这就是我主张联系战略的原因。

但是我与某些保守派的批评家不同之处在于，我深信核武器给战争增加了新的恐怖性，给国家领导人增加了新的责任感。不管怎样，技术的发展总是促进均势；因而军备控制可以使战略武器竞赛稳定下来，并腾出一些财力和物力用以加强我们的常规和区域力量，因为在这两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和事实上的不平衡。

美国和盟国的舆论界中有许多是坚持主张努力制止军备竞赛的。在外力压迫下，身不由己地被拖去进行谈判是一种最糟糕的场面；政治家应当始终设法控制住他所不能避免的事物。我们在战略武器领域也面临一个十分实际的问题：如果苏联人把他们所有的陆基导弹都配上准确的多弹头，我们的陆基导弹到八十年代初期就将受到危险。在我看来，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提供了把这个危险推迟相当时期的机会。

苏联的技术进步表明这项任务具有一定的紧迫性。到一九七三年时，我们已经获悉苏联人正在发展四种新的导弹——他们高

兴地称之为对现有型号的“现代化”。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并不禁止把洲际导弹“现代化”，只要发射井的增大不超过百分之十五。但是，苏联人正在做的显然不能算作军备控制；无论根据任何定义来衡量，这些武器都是新的。它们是在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签字后不久就出现的，使人毫不怀疑苏联人对稳定性的看法与我们的军备控制家们是不同的。一九七三年夏天，发现有两种多弹头的苏联洲际弹道导弹正在试验过程中：一种是SS-17，新式的“轻型”洲际导弹，用以代替SS-11，携带三至四枚弹头；一种是巨大的SS-18，用以代替SS-9，估计携带九枚弹头（结果只携带八枚）。这两种导弹都是以一种称为“冷发射”的新技术发射的——即用一台辅助发动机把导弹从发射井里“弹跳上来”，然后火箭发动机点火，把导弹送到飞行轨道上去。这种技术既节省燃料，又加大了投掷量，因而增加了可携带的弹头数目；还可以重新使用发射井。一九七三年下半年又出现了另一种导弹——SS-19，它使用旧式的“热发射”技术，结果却是新武器中威力最大的。如果同巨型的SS-18相比，SS-19实际上是一种中型导弹。但是如果用任何其他标准来衡量，它的有效性与“重型”导弹差不多。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规定，“重型”导弹的数目不得超过三百零八枚。苏联人利用数量上的冻结来进行质量上的竞赛。现在可以从数学上预计，最迟到八十年代中期，我们的民兵式陆基导弹力量将易受苏联的攻击。

但是对于如何对付这种危险，意见分歧很大。批评我们的人基本上想破坏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过程；他们的具体反对意见并不厉害，但他们的狂热要求却是要破坏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以结束缓和。他们的攻击有具体内容，他们打的旗号是“等量累积”。杰克逊在一九七二年参议院批准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时，又提出了另一项修正案，要求在今后的谈判中坚持对等，从而暗示现有

的协议是不对等的。国防部解释说，这意味着在每一种武器中都要求数量上的对等。这是一个政治激情压倒冷静考虑的有趣例子。即使引起激烈辩论的三叉戟潜艇和B-1轰炸机计划获得国会通过，在运载工具方面我们仍将达不到数量上的对等，而参谋长联席会议坚持说，这是他们支持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先决条件。他们并没有提出建造计划来达到数量上的对等，但他们却要求我们同苏联谈判以达到这个结果。如果这有什么意义的话，我们倒是愿意要求苏联人通过一项协议把他们的数量减少到和我们一样的水平；不幸的是，我们威胁说如果他们拒绝，我们就要给他们惩罚，让他们在没有协议的情况下享有数量上的优势！这样，苏联人在没有军备控制的情况下处境将比有军备控制更好——这真是奇特的逻辑颠倒。

据我判断，问题比较复杂：运载工具方面的数量对等只是一种标准，何况不是最重要的标准。我谋求利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来把我们的陆基战略力量的易受攻击性问题尽量推迟到将来；因为这个问题的解决需要苏联人减缓导弹的多弹头的发展速度。据我看，任何其他的目标都只是玩弄数字而已。没有人反对实现这一目标的必要性。这场辩论涉及我们愿意付出多大的代价。而实际情况是没有人愿意付出大代价。我们在一九七三年五月提出的最近一次正式方案根本回避了这个问题。它建议对等积累和冻结一切陆基导弹的多弹头化（见第七章）。由于我们已经部署了三百五十枚多弹头的民兵III式导弹（总计划部署五百五十枚），而苏联人一枚也没有部署，苏联人不可能让我们在多弹头问题上如此轻易地滑过去。苏联人从一项计划里看不出我们放弃四百枚弹头*，以换取苏联人放弃他们可以达到的七千枚多弹头对他们有什么好

* 我们将放弃六百枚多弹头（两百枚民兵III式导弹，每枚携带三个弹头），代之以二百枚单弹头导弹，故放弃数字是四百枚。

处。尽管令人难以置信，还是提出了这一方案，因为这是一个抑制我们国内辩论的好办法。如果我们要求的运载工具数目超过我们打算建造的数目，同时把苏联人的多弹头数目限制在他们能建造的水平之下，那么就不会有人被指责为软弱的。这简直是一种神话般的外交：一个人只要竭诚向往，就可以实现他的全部目的而不必付出任何代价。

这种数字游戏一旦开始，连对等积累也成为有争议的了，尽管我们离实现这点还很远。我们的导弹较小，因此它们携带的弹头较少。于是五角大楼的分析家们提出了一种新的对等定义：对等的投掷量。（所有这一切都是在美国没有任何赶上差距的计划的状况下搞的。）投掷量也主要是一种理论上的计算方法，其作用完全取决于它的规定限度。如果以我们的水平作为投掷量的限度，苏联人就只好把他们现有的战略武器减少到我们的五分之一左右，或者干脆统统销毁，然后按我们的式样重造，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很难实现这种结果。如果以苏联的、也就是较高的水平为投掷量的限度，那也只有在我们销毁我们的武器并按照苏联式样重造的情况下才会有意义。另一种办法是把我们的民兵导弹的数量增加一倍，以取得大体上是二比一的优势。但是这两种办法都从来没有正式提出过，也不可能国会得到支持。

我对减少苏联投掷量这一目标并没有异议。我不同意的是要求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来承担这个任务，也不同意通过谈判以实现我们单方面的建造计划并未要求达到的东西。有些批评我们的人似乎是这样想的。由于这些设想是由一些绝顶聪明的人提出来的，使人得到的不可避免的印象是，他们更害怕杰克逊参议员的谴责，胜过让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流产。的确，一九七三年时参谋长联席会议对“战略对等”是如此坚持，以致他们宁愿以放弃对多弹头的一切限制作为代价，去换取发射架方面的绝对对等，从而让苏联

人在发展弹头方面得到巨大的潜在优势，以换取多造几百个发射架这样一种并未行使的权利。而且，如果每一方都有自由把它的所有导弹实现多弹头化，那么对运载工具实行数量上的限制——不管是否对等——就几乎是毫无意义的；因为随着弹头的数目大量增加而目标的数目不变，每一方的陆基导弹都将易受攻击。

一九七三年八月十五日，我在核査研究会的会议上以不敢相信的口气询问道：“只要我们有权利成为苏联力量的虚假对称形象的话，你们就愿意放弃一切有关多弹头的限制，搞对等积累，也许还可以有自由搞减少数量，而不管(苏联)多弹头方面的优势？”我本来还可补充说，国防部从来没有表现出有兴趣这么干。

施莱辛格至少和我一样明白，如果苏联人把他们的大部分陆基导弹都多弹头化的话，我们将面临战略上的易受攻击性。但是他既要对付杰克逊，又要笼络参谋长联席会议。在他的催促之下，五角大楼提出了一种新的办法作为一项“妥协”方案——对等地配备了多弹头的投掷量——以补充参谋长联席会议关于把对等积累限制在两千三百五十枚运载工具的建议。这使我们又陷入了早先一些设想的困难境地。由于苏联每枚导弹的投掷量比我们的大得多，这就意味着他们将能够把数量比我们少得多的导弹多弹头化，具体数目将取决于他们选择对哪种导弹实行多弹头化。这是一个聪明的建议，它的唯一缺陷是缺乏现实性；按照这个建议我们什么也不放弃，如果苏联人拒绝接受，我们也没有单方面实现对等的计划。

一九七三年夏天时，对等积累主义已经导致一个先天不一致的情况。各单位都甘愿接受在他们决定建造的发射架数目和投掷量方面居于劣势(这种情况一直保持到以后的历届政府，包括里根政府)。它们不愿意看到协定中载明这些具体数字，尽管这样做我们倒可能取得好处，把苏联的弹头总数限制在一个比我们少得多

的数字上。谈判者在压力下在每方面都制造了一个理论上的对等,但他们却没有得到任何东西去同对方作交易。

必须从这种背景去看我们内部对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辩论。一九七三年七月二十六日,也就是勃列日涅夫访问美国后一个月,我同多勃雷宁讨论了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他说,勃列日涅夫对我们要制止苏联部署陆基导弹的建议非常不高兴;不管怎么说,陆基洲际导弹是苏联战略武库里的“主要武器”。苏联人愿意按照“对等安全”的原则,考虑限制陆基和潜艇发射的多弹头的数目。第二天,苏联人递交了一份“口头照会”,详细说明了这些建议。为了怕我们产生这样的错觉,认为搞缓和是苏方诡谲作风的变种,克里姆林宫要求他们在所有各种数目上都有权享受优势。莫斯科得出这个结论,是把美国的前沿基地核武器都算在我们的总数中了(包括驻在欧洲或载于航空母舰上的飞机)——而欧洲鬼怪害怕我们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掩护下,在他们不在场的时候把他们的安全出卖掉。(这将使苏联的总数中又增加六百个发射架。)苏联人还要求额外的“补偿”,因为除了准备在欧洲打仗外,还要准备同中国人打仗。苏联人在公开的立场上是不讲谦逊的;苏联人由于搞高压和威胁外交,树立了一些敌人,但他们却要求在战略武器的数目上享有优势以作为补偿。

我的工作人员在八月一日的一份备忘录中指出,苏联建议包含着“惯有的破烂文字游戏”。愿意把多弹头的潜艇发射弹道导弹包括在内并没有多少意义,因为苏联至少还需要五年才能部署这种武器,从而可能把允许的多弹头配额全部用在我们最急于限制的陆基导弹系统上。另一方面,苏联的信息明确了这样一个问题:苏联人不会放弃陆基多弹头导弹,至少肯定不会按我们过去所提出的条件(在完成了百分之六十之后才停止部署我们的民兵 III 式导弹)去那么做,而且几乎肯定也不会接受其他条件。因此我们面

临的问题是如何明确规定多弹头的限额，使之具有战略意义并能核查。

八月九日，我会见多勃雷宁讨论苏联七月二十七日的“口头照会”。我说，我不知道苏联人说的适用于多弹头的“对等安全”是什么意思。如果他们要求对等数量的导弹，那么我们就要坚持对等数量的弹头。我补充说，对待这个问题的另一种办法是从对等投掷量的基础出发，这是施莱辛格的主张。（我没有解释说，这意味着苏联能够携带多弹头的导弹要减少许多。）

多勃雷宁的答复是令人吃惊的。他说，美国和苏联不必注意这些技术细节，而应采取“大步骤”，同意在十年内不部署任何新导弹。多勃雷宁在回答我的问题时说，这当然适用于三叉戟导弹。他在得意忘形之际，竟然把苏联的 SS-17 和 SS-19 也计算进去。待到我们第二次会晤时，他又恢复了常态：他说我们的武器都是“新的”，因而应该禁止；苏联的导弹只是“现代化”而已，因而不禁止之列。我在担任公职期间遇到的唯一似乎有点创新精神的苏联有关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建议，就以他这段厚颜无耻的陈述宣告结束。

一九七三年八月十五日，我召集核查研究会为在九月下旬恢复日内瓦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正式会议进行准备。官僚主义作风并未改变。没有一个机构愿意正视这样的根本事实，即在没有任何协议的情况下，苏联人将在八十年代初期在多弹头导弹的数量上超过我们，并将比我们拥有更多的弹头。从当时的气氛来看，三叉戟潜艇和 B-1 轰炸机已经引起争论，为增造其他战略武器要国会进行表决几乎是毫无可能的。公众的强烈反对是可以预见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我们建造超过计划的战略武器，资金也必然要从本拟用于加强地区防御的一般用途方面抽出，而这正是我们最紧急的军事重点项目。

但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仍继续毫不动摇地坚持对等积累（即运载工具全面总数对等）；作为交换条件，他们仍愿意放弃限制多弹头的一切企图，也就是以苏联在弹头上领先换取我们在运载工具方面的优势。参谋长联席会议在整个秋天都坚持这个立场；有一次，他们的代表爱德华·罗尼中将在十一月二十三日辩解说，三军参谋长看不出“他们有任何东西愿意偿付，以换取一项有价值的中远程导弹（重型导弹）多弹头试验协议。”换句话说，对等积累主义——我们没有这方面的计划——已经成为如此神圣不可侵犯，以致我们竟愿意以它的名义允许苏联人把他们的重型导弹多弹头化，尽管这会加快我们整个民兵导弹力量的彻底易受攻击这一日子的到来，把对等积累的实现变成一件战略上荒唐可笑的事情。在那样的世界上，数量上的限制又有什么意义？

说实话，要得出一个有智慧的、令人满意的答复是困难的。对等积累不会减轻我们陆基导弹的易受攻击性。反对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某些保守主义者热烈鼓吹的减少数量办法很可能只会把事情搞得更糟，而不是更好，至少是在暂时阶段，直到实现了非常低水平的多弹头化运载工具之后。此外，既然每一枚导弹顾名思义携带着许多弹头，因此减低数量并不能改变弹头和发射架之间的比例；它只会减少目标的数量，从而使突然袭击更加容易。

这样，一九七三年的秋天就在双方都没有重大创议的情况下过去了。我们坚持我们五月间的立场，禁止苏联发展陆基多弹头，尽管苏联的快速试验计划表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不能实现这一目的。苏联人则正式提出多勃雷宁向我建议的方案，在今后十年禁止发展新武器系统。然而由于它是基于苏联关于新武器的古怪定义——把美国所有的导弹都包括进去，却不包括苏联的导弹——因而并没有提供可以探讨的基础。葛罗米柯来去匆匆，进行他一年一度的秋季访问，除了允诺对问题进行研究以外并没有提出更

多的东西。葛罗米柯使我处于略为不利的境地，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答复苏联的上次建议。双方立场的差距是如此巨大，因此要为修改我们的现有方案而去进行官僚之间的流血斗争是不值得的，不管这个方案是多么不明智。

直到年底，中东战争及其后果一直吸引着双方领导人的注意力。到一九七四年一月，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考虑又再次提上日程。一月二十四日，我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上从纯粹战略的角度向总统提出争执的问题：“我们要实质上的对等。但是我们需要小心，不要因为我们不能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得到我们所认为的对等，而拒绝接受军备竞赛中的实质上的不对等。”后来在这次会议上我又重申同一观点：“许多人都坚持投掷量上的绝对对等。我希望对我们的军事计划给予同样的热情，如同对我们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上的立场那样。”

我自己的意见是，限制苏联的多弹头是最重要的，而且通过协议接受五角大楼在它自己公布的五年计划中确立的并且不准备超过的限制标准（的确，鉴于国会的气氛，能够达到这些标准就算运气不错了），是不可能有什么坏处的。这实际上意味着我主张把一九七二年的临时协定延长几年——连同其在导弹发射架总数上的不对等——倘若苏联人接受陆基多弹头洲际导弹数量上的不对等作为交换条件。这种不对等的情况可使我们得到多拥有三百枚多弹头导弹的好处，当然这取决于如何计算。这样，目前苏联在运载工具总数上的优势，就可以被美国在多弹头洲际导弹这一关键类型上的优势抵销，而且绰绰有余，因为那会使我们在弹头方面领先并减少我们的发射架的易受攻击性。只要你愿意干的话，这可以称作抵销不对称的情况。

问题是如何把理论变成实际行动。这意味着在我们和苏联人谈判之前，先要使它能够为我们的官僚阶层接受。那时我们的各机

构已经从苏联人那里吸取了教训；他们不会让对方在提出单方面的建议上打败。我们出席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代表团的团长亚历克西斯·约翰逊大使提出了二千三百五十个发射架的积累限额（比我们的单方面计划多一百五十个左右，比苏联的计划少二百个），加上对累积投掷量 and 多弹头投掷量规定对等限额。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一日，五角大楼终于明确了它所喜欢的投掷量具体水平。国防部副部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联合发出的一份备忘录非常聪明地允许我们完成一切可能的美国计划，同时要求削减苏联的每一项计划。这份备忘录允许我们把原订的多弹头计划增加四百五十枚，以达到拥有一千枚民兵III式导弹，并实现潜艇发射导弹的整个计划（包括二百四十枚三叉戟导弹）。对苏联人提出了好几种选择方案；每一种都要求他们放弃使他们的三百零八枚重型导弹多弹头化，以及至少放弃一种新式的中程导弹，即 SS-17 或 SS-19。如果苏联人选择部署投掷量比较重的 SS-19，他们就只能把其中的一百枚多弹头化，而需要放弃所有其他陆基多弹头的计划。

如何实现这笔交易留给谈判者去做。由于估计这最终就是由我去做，没有一个部门愿意冒大风险提出一个单方面的建议。如果我不能实现这个方案，就会被责备为缺少谈判技巧或缺少坚定性，这是杰克逊的助手们经常向新闻界暗示的。这也是官僚阶层对我在尼克松第一届任期中搞放手外交的报复。

当然，在我们可以自由增加每一类导弹的情况下，不可能说服苏联人减少他们的每一类导弹。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有些人漫无边际地说，如果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失败，就增强我们的国防。施莱辛格建议说，每年多花二十亿美元，我们就可以进行“重要的新计划”。海军作战部长埃尔莫·朱姆沃尔特海军上将把这句话解释为每年多造两艘潜艇——或者说四十八枚导弹（不考虑到当时海军实际上正在削减计划），朱姆沃尔特这样说是出于海军

的本位主义，这是可以理解的。按照那种速度，假定苏联人不对我们的行动采取反措施——而这是不可能的设想，我们通过单方面的努力也得需要近十年的时间才能实现对等积累。

没有人对提出一个比较现实的办法所涉及的内部分论作好准备。尼克松为水门事件所困扰。我刚从西奈半岛的穿梭外交回来，准备参加华盛顿能源会议。五角大楼对于僵局并不在乎。我也认为我所主张的办法只有经过一场僵局才能引人注目。我们首先需要证明，已经成为普通知识的东西是行不通的，而且并不真正符合我们的利益。

于是我们提出一种使每个人都得到他所需要的东西的办法——这通常是表明一致意见正在代替一贯战略的最好证据。参谋长联席会议得到的是对等积累；约翰逊大使得到了他要求的二千三百五十个发射架限额；施莱辛格的对等多弹头投掷量理论也受到了重视。没有就具体数目达成协议，但是告诉约翰逊说，我们不可能接受比我们整个民兵导弹力量投掷量大的陆基多弹头水平。要把苏联人的投掷量减少到和我们一样的水平意味着把他们的多弹头数量限制在二百枚左右。这时杰克逊参议员已经成功地写了一封信给总统，表示他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之间的联系工作情况良好。他完全支持国防部文件中的概念，并且前进一步，联系到把发射架减少到一千七百六十个和相应地减少多弹头（以对等投掷量为基础）。他认为“一心一意地强调”多弹头限额是“转移目标”。我曾经看到过杰克逊能够阻止不必由他参加的国会委员会讨论的立法，而且我也毫不怀疑，他这样一个在军事委员会拥有很高地位的人能够对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协议做些什么。

当美国和苏联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代表团于一九七四年二月十九日在日内瓦恢复讨论时，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僵局。仅有的一条新的好消息是苏联代表团暗示，在过程末尾当所有其他问题都

解决了之后，苏方可能不再坚持把美国的前沿导弹系统计算在内。这实际上意味着，当我三月底访问莫斯科为六月的最高级会谈进行准备时，将有另一次机会打破僵局。

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概念，而不是新的数学计算。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也许有许多用处，但它不能一面增强我们的力量，一面减少苏联的力量，除非我们有一项巨大的建造计划。因此我提出一项方案，要求把临时协定延长三年，只要苏联人接受在多弹头陆基洲际导弹方面占劣势，其差距数量相当于他们在发射架总数上的优势。这样，苏联人将比我们少二百八十枚陆基多弹头导弹，这个数字是他们在运载工具方面所享有的优势。我们计划中的五百五十枚民兵III式导弹将作为基线。我认为那些坚持要求就对等全面积累缔结一项永久性协定的部门，也会同意先签订一项临时协定。即使从眼前的交易来说，这也可使我们多得到一千四百多枚弹头。*我们还可以使苏联人损失好几千枚弹头，因为按照协定有些导弹是不能多弹头化的。

我并不真正期望苏联人接受我们准备提出的数字。不存在这样的现实前景，即他们会把自己限制在只拥有二百七十枚多弹头的洲际导弹。但是，如果他们接受多弹头不对等积累的原则，我希望形成可以推迟苏联实现第一次打击能力的结果。

三月二十一日下午，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这个问题。我概述了延长临时协定连同限制多弹头的主张。（为了申述我的论点，我假设我们可以把我们所有的一千枚民兵导弹多弹头化，尽管并不存在这样的计划，只是一月十一日国防部的备忘录中提到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对投掷量的限制应允许我们把这些民兵导弹全部多弹头化。）我说：

* 取消苏联携带六个弹头的二百八十枚中程导弹，减去允许他们拥有的二百八十枚单发弹头。

我们需要决定我们是否要在临时协定中有一项关于多弹头的协议，还是积极要求搞一个永久协定；如果我们要后一种协定，我们需要决定要多少时间并为自己规定一个期限。我们可以减缓他们的速度，或者加快我们的速度。鉴于他们的部署状况，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干，将使差距扩大。

如果苏联的方案不能接受，我们的实际选择是规定一个内部的时间期限，着手实行施莱辛格的计划。但是我必须注意我们的非均势——有了民兵III式导弹后我们将有三千枚弹头，或者七千枚弹头，如果我们在每枚导弹上装上七枚弹头的话。他们有一千五百枚弹头，每一支导弹上有六到八个弹头。非均势还将扩大。有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我们将能够降低速度，利用施莱辛格的新系统作为支撑力量；或者我们可以规定一个截断点，等待缔结永久性协定。最坏的可能情况是继续谈判一个永久性的协定，同时继续我们目前的计划。（楷体是作者标的）

必须说，这正是我们的国内辩论迫使我们去做的。

施莱辛格同意这种办法；但是有条件，他说：

如果我们不能得到一个最终导致全面对等的限制战略武器协定，我想那将是可悲的。但是我们赞成搞一个关于多弹头的协定，更多地是把它作为走向规定的实质上对等的永久协定的道路上的一个中途站。在临时协定之外再增加一个多弹头协定也许是重要的。从长期来说，投掷量是重要的，但从短期来说不太重要，因为他们不能利用它。一九八〇年以前，不存在苏联人可以取得可观的优势的危险。

参谋长联席会议不会反对国防部长；我们参加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代表松了一口气，总算有点可以谈判的东西了。于是尼克松在会议结束时批准了这个建议。我把这个建议搞成一项口头照会，以便多勃雷宁可以在我预定到达的三月二十四日以前让苏联人有时间研究我们的方案。尼克松在亲自写给勃列日涅夫的信中

表示，我有权对苏联的反建议作出答复。

把官僚机构的进展同实质性的成就混为一谈的危险总是存在的。这次当我怀着超过现实情况的乐观情绪前往莫斯科的时候，也正是这样。

再访莫斯科

身居高位的人应当把华盛顿公共关系的下列基本原则铭记在心：第一，永远不要预测你没有百分之百把握实现的结果。第二，即使有那样的把握，把可能的结果说得轻一点也对你比较好。新闻界从来不会让你忘掉一次失败的预测。他们一天到晚同最后限期和必然性打交道；他们对细微的差别和可能性没有多少接触。如果制订政策的人没有唤起人们注意不可估量的事情，新闻界很少会自己发现这些事情。而即使制订政策的人提到了这种事，也可能被人忽视，因为报道容易倾向于简单化而不是条件化。在最好的情况下，取得成就的前景永远也不能在现实中如数兑现；作出的预测总会受到挑战，而如果取得成就也会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事先已经有所期望。

三月二十一日，正当我启程去莫斯科之前，我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违犯了所有这些原则。我把我们内部关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立场告诉了这些有社会地位的知识界，我洋洋得意，猜想在莫斯科也可能取得类似成就。我在回答一个问题时，简短地讲述了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历史，内容虽然属实，却缺乏肯定的心理成分。我说：

所有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而且实际上所有的裁军谈判都经历过三个阶段。初步阶段是交换技术情报，通常是在谈判过程陷入僵局时进行；这就是

说，双方并不提出各自的谈判立场，但澄清对问题的技术理解。

然后达成概念上的突破——到目前为止这基本上仍是在日内瓦的作法；这就是说，双方需要就打算实现的目的达成协议。在这之后，就是艰苦的谈判，要使概念上的突破具有具体的内容。

如果是在国际关系讲习会上谈政治理论，这倒是很好的材料。可惜新闻界寻找的是包含一项结果的词句，而不是了解一项过程的词句。他们集中注意的是“概念上的突破”这一口号，而不是口号背后的意思。而为了预测一项“突破”，不管是概念上的还是其他，我创造了一个可以用来衡量我的三天访问的标尺。我忽略了任何谈判立场都不可能如此迅速地被苏联人接受的规律；过去还没有这样的先例，单靠写一封信给勃列日涅夫就可以取得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方面的突破。而这一次苏联人更没有特殊的理由要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妥协，以便维持实际上正在萎缩的其他关系。因此“概念上的突破”也就和我十八个月以前在记者招待会上所说的“和平在望”一起遭到同样的下场。因此，谋求高位的衮衮诸公要记住的最后一条规律是：如果你不能克制作预测的欲望，那么要使用空虚的、无懈可击的言词；如果你擅长于使用警句，那么你就永远无法避免犯错误。

我在莫斯科呆了不久，就认识到事情不会顺利进展。会晤地点从设在扎维多沃的政治局禁猎地（二月间葛罗米柯曾告诉我说，准备在扎维多沃举行会议）这一比较随便的场合，转移到比较讲究礼宾规格的莫斯科，这显然是暗含冷淡之意。这倒不是说苏联的招待不丰盛，接待还是热诚的。勃列日涅夫精神抖擞，兴高采烈。他又得到一些新的玩具。他面前放着一个圆顶型的铜器，盖子一打开，里面露出六个子弹筒似的东西，朝天矗立。我问这是不是苏联多弹头导弹的模型，是否可以报告说每一枚苏联多弹头导弹有

六个弹头(我见过证据不太具体的估计材料)。勃列日涅夫感到非常有趣,他把子弹筒的外罩拿掉,原来里面是六支香烟。另外还有两样新玩具,一样是法国造的手表,全部透明,可以看见所有的机件。还有一样是航海钟,遇到勃列日涅夫认为是重要的时刻,例如当他略微修改他原来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方案时,他便开动机关,让这架钟发出和谐的音律。

勃列日涅夫在会议开始时强调说,尽管有“复杂情况”(他拒绝我所使用的“失望”一词),他对缓和的承诺仍然没有受影响。他说,对美国正在发生的事的“各种细节”不必谈论——他对此听到和读到许多,尼克松总统看来正表现出坚定的决心,要进一步“加深”苏联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他感到有必要指出,为了继续前进,我们需要克服一些“困难和障碍”,它们不但同改善美苏关系有关,而且同改善世界气氛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但是,他确信过去的经验将帮助我们找到正确的解决办法,而不必违犯我们协议一致的原则。

我按照同样的办法回答。但是,对于在意识形态上是敌手的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是不可能靠表明善意来使之持久的。事实是,议程上的每项问题都会引起争论。关于最惠国待遇,我在前面已经讲到,我提出了额外的要求而不是带来进展。我的不值得人们羡慕的任务是告诉一个极权国家的总书记说,我们不但坚持要求增加移民出境人数,而且建议由我们指定这些移民应该从他的国家里的哪些地区挑选。我们避免了在这个问题上发生破裂,而且在后半月苏联的确作了某些让步。但是在国际关系中,免费的午餐是不存在的。我们可能在犹太移民问题上得到的好处,必然要使苏联减少它在其他领域的回报。

我们最困难的会谈是在中东问题上。勃列日涅夫大发脾气。如同六个星期前葛罗米柯在华盛顿那样,勃列日涅夫指责我们违

反在联合主持问题上达成的谅解，起先是关于埃及，现在是关于叙利亚。如同过去一样，我回答说，“适当的主持”目的在于促进双方之间的谈判，而不是阻止他们以最方便的方式会谈。我提出同葛罗米柯或其他苏联代表会晤，以便就中东问题举行定期的讨论。勃列日涅夫咆哮说——他嚷得也对——我讲的是程序问题，而他关心的是实质。我正在提供情况，而他却要求参加。他在聆听葛罗米柯和我之间就磋商的方法争论了半个小时之后，就抓住了问题的中心，他在这一过程中表现了苏联人对现实的适应性。他打破沉默说，他“用心地”聆听了葛罗米柯和我之间的对话，感到这段对话只是证明他原来的抗议是正确的。勃列日涅夫直言不讳地说，他从来没有听到过美国人如此公开地宣布他们的目的是要排除苏联人参加。他阴森森地作结论说，既然双方已经阐述了各自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就可以“根据自己的考虑自由采取行动。”

我以不大相干的语气说，戈兰高地上这边或那边多占五公里，倒不如美苏关系重要。勃列日涅夫也声称他重视美苏关系，意思是他不会让中东问题损害美苏关系。

但是这并没有使他感到有理由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方面加快进展，而讨论这个问题是其他问题的基础。我们在三月二十五日的头两次会议上和在三月二十七日的最后一次会议上讨论了这个问题。勃列日涅夫在第一次会议上提出一项建议，把临时协定延长到一九八〇年底，并且补充规定把每一方的分导式多弹头数目限制在一千枚。美国和苏联将可以自由决定他们的导弹力量的组成情况；具体地说，他们可以“自由搭配”陆基和海上发射的导弹数目。奇怪的是，除了保持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遗留下来的不对等积累数量外，这个建议比我带到莫斯科来的方案更接近于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真正喜好。但是它并没有真正满足我们的需要，我在三月二十五日下午的会议上对勃列日涅夫讲述了下述理

由：

让我解释我们的困难，让我解释这将在美国引起什么反应。你们会记得，当杰克逊参议员攻击第一个协定时，我在公开的听证会上是怎么说的。我们当时辩解说，分导式多弹头弥补了第一阶段中数量上的不平衡。现在，如果我们延长这项协定，并补充规定一千枚分导式多弹头导弹，那么至少会有两种批评意见：一、目前的数量优势将由于弹头的数目而成为有效的。二、由于苏联在每个发射架上的分导式多弹头比我们多，你们将不但在导弹数量上而且在弹头数目上拥有优势。三、由于苏联的弹头比我们的分量重，这意味着苏联的陆基导弹力量将具有针对我们的第一次打击能力。因此，如果没有考虑到每一枚陆基导弹上配备有不同数目弹头这一事实而对这些导弹规定某种限额，那么情况将会变得非常复杂。另外，我们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以一千枚的水平为限的话，不久我们就得停止部署分导式多弹头，而你们却刚开始你们的部署。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你们是否要停止。在这一过程结束的时候，你们将达到一千枚的数字。因此，如果你们部署五百到八百枚陆基导弹——我坦率地向你们陈述这些论点，如同我们会遇到的一样——而且如果我们估计正确，你们每一枚导弹上有六个弹头的话，那么你们就会有三千到五千枚弹头，你们就能够摧毁我们的民兵导弹。

我不想向你们提出概念，但这些都是我们将提出的论点。我只是想把我国人民的理由告诉你们。

当然，勃列日涅夫拼命否认苏联领导会想到攻击我们的民兵导弹力量这样粗暴的事。他还拒绝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是不对等的说法。他拿出一张地图，上面标明可以从我们在欧洲或地中海的前沿基地系统达到的苏联地区。如果假设我们的战斗轰炸机群只是执行单程任务的话，那么这幅图是相当准确的；苏联的设计者在设想他们自己对付“最坏情况”时，必然会布置有去无回的单程任务的。我们提出把苏联的陆基导弹部署限制在二百七十

枚洲际导弹的建议，对苏联人来说是不可能接受的。勃列日涅夫说，“如果我同意这个建议，那么这就会成为我同基辛格博士的最后一次会晤，因为我会被毁掉的。”在审议了各种技术性问题后，我们同意在举行下一次讨论前留些时间作进一步研究。

下次会议在三月二十七日举行，也就是我在莫斯科的最后一天。那次会议上的确发生了一种概念上的突破，虽然满腹狐疑的记者团和我国政府各方面不这么看待。政治局那天开了六个小时的会议，我们同勃列日涅夫的会议只好推迟；我们只是在事后才得到解释，这也是苏方的特点。原定上午举行的会议取消了；我们呆在列宁山上的宾馆里待命，直到下午五时左右才来通知。我讽刺性地对一名礼宾官员说，我一直想在莫斯科度寒假。但后来会议终于举行了——我敢肯定，不是因为我的评论而是因为政治局会议已经结束。寒暄之后，勃列日涅夫宣布说，苏联现已准备接受分导式多弹头不对等积累数量的原则。勃列日涅夫提议让美国拥有一千一百枚携带分导式多弹头的运载工具，让苏联拥有一千枚。

这总算前进了一大步，是以苏方特有的吝啬方式提出的。苏联人总是为讨价还价留有余地；我从来没有见过苏联开始时的立场同最后的结果有任何接近之处。一旦有利于我们的分导式多弹头不对等积累数量的原则被接受后，几乎可以肯定通过谈判差距很容易缩小。

勃列日涅夫相当聪明地提出他的建议。他说，总的积累数字是公平的，因为作为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一部分，苏联人正在销毁二百一十枚导弹，而且他们并不把英国和法国战略力量中的九十枚导弹计算在内。换句话说，克里姆林宫发了善心，放弃了我国声称构成他们优势的那三百枚导弹。（结果错了，即使销毁了二百一十枚导弹，苏联人仍保持数量上的优势。）而现在为了极力表示慷慨，按照勃列日涅夫的办法，他们又提出另外一百枚导弹

的问题来谈判。这使勃列日涅夫得到更简单的计算方法。他可以辩论说，由于同意给我们一百枚携带分导式多弹头的导弹，他多给了我们五百枚弹头，从而弥合了差距。这样就达到了对等积累。

勃列日涅夫只是暗示了这些论点，却从未明确地说出来——也许是因为他的军备控制专家们还没有达到我们的专家的深奥和尖端水平。无论如何，这些论点总不是结论性的。突破仍只是概念性的，数量仍然不充分。由于苏联在投掷量上占优势，让苏联拥有一千枚携带分导式多弹头的导弹这一总数字太高了，而有利于我们的差距太小了。我们怀疑在一九八〇年底之前，当建议中的协定到期时，苏联是否能够部署一千枚以上携带分导式多弹头的导弹；那样我们就等于是比批准每一方的计划略胜一筹而已。（当然，可以假设在临时阶段到期时把限制数量的日期再行延长。）更令人担忧的是，勃列日涅夫的建议同冻结我们的部署的企图是一致的，与此同时，苏联却在分导式多弹头方面追赶上来——特别是因为我们到一九七七年就完成我们的计划了（除三叉戟外），而苏联却还在继续建造。这样，从理论上讲苏联人可以先建造他们得到允许的陆基分导式多弹头导弹，然后到一九八〇年后当协定到期时再转向建造海上发射的分导式多弹头导弹。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坚持任何对分导式多弹头导弹的限制必须包括对陆基导弹的限制的理由。但是勃列日涅夫顽强地拒绝作任何这类承诺。他说，他准备允诺非正式的谅解，每年通知我们计划部署的潜艇发射导弹情况；但他不接受正式的限制。这种通知是毫无意义的。如果没有协议规定的限制，我们就没有提出反对的基础；而年度报告做得太晚，无法影响我们的决定，而且并不比我们自己的情报中得到的情况多多少，即使会多一些的话。

因此，我们的处境同过去的谈判没有什么不同。取得有利于我们的分导式多弹头不对等积累数量这一概念是极为重要的。而

苏方对它的应用却是荒唐的；因此我没有请示华盛顿就拒绝了。我强调说，把勃列日涅夫的“突破”变成一项协定的前景取决于两个因素：双方在分导式多弹头上的差距是否可以扩大，以及苏联是否接受限制携带分导式多弹头的陆基导弹的总数。如果没有这两个条件，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即使达成一项协定也主要只是为了装饰门面而已。最后双方同意将再行研究他们的立场并继续联系。

这一结果公诸于世之后，引起我们的新闻界对莫斯科之行的失败作出了许多悲观的评论，反映他们对苏联的谈判策略相当无知。实际上，在莫斯科谈判的结尾，我们在策略上的处境并不坏：苏联人以十分小气的方式提出了一个新的建议，从而增加了通过艰苦谈判实现最后结果的前景。这种挤牙膏式的过程从前我们也经历过。要证明对携带分导式多弹头的导弹实行不对等限制的办法最后能否成功是不可能的。只能说，我们基本上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达成协议取决于许多因素：对苏联制度的压力，以苏联可能在其他领域谋求好处做交易，美国在谈判立场上坚持如一和团结一致，以及苏联对尼克松是否能继续掌权的判断。

遗憾的是，我们在谈判立场上远远不是明确地坚持如一和团结一致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是总统的权力犹如江河日下急剧地被削弱着。一九七四年四月，众议院的司法委员会显然已在准备提出弹劾。预兆是如此明显，以致葛罗米柯在四月间询问起我国政府在那种紧急情况下会采取什么程序。尼克松的总统职务行将提前结束这种迹象肯定会影响政治局的考虑，他们盘算着在这轮谈判中再给多少让步才是明智的。

过去的经验表明，如果想取得进展，必须就协议的概念坚持施加压力，探讨多种不同的方案和变换办法，直到苏联人自己认为如果想避免破裂就必须让步为止。尼克松在有职有权的时候是可以强迫官僚机构这样做的，这个官僚机构虽然对新方案采取默认态

度,但心里并不乐意。然而在水门事件的情况下,内部分裂会永远继续下去。显然,各单位都主张搞一个规定双方发射架数目对等的协议,尽管这最终将导致苏联得到比我主张的方案(甚至是不能接受的苏联方案)多得多的弹头。造成这种看来是反常的态度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官员们害怕在国会作证时受到诽谤。

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核查讨论会四月二十七日的会议清楚地表明,人们对我们的官方立场没有多少热情。我预定于四月二十八至二十九日在日内瓦同葛罗米柯会晤;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讨论叙利亚问题,但肯定也将审议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我在核查讨论会上主张对苏联提出反建议,到一九八〇年时把苏联携带分导式多弹头的导弹限制在八百五十枚以内。我的工作人员和我根据情报材料估算,苏联将在那段时间内大约部署二百枚从潜艇发射的携带分导式多弹头的导弹;因此实际效果是把苏联携带分导式多弹头的陆基洲际导弹减少到六百枚左右。这时我听到一种令人惊奇的意见说,这个数字虽然使苏联的潜在力量减少了好几千枚弹头,却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即使是六百枚洲际导弹也能够威胁我们的民兵导弹力量。附带的结论就是,超过了一定数字后,不管苏联有多少弹头都没有差别了。当然,在那种情况下,对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所规定的发射架不对等积累数量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喧嚷反对之声,就令人难以理解了,因为苏联仅仅得到三百枚单发弹头的优势,而我们却有轰炸机方面的巨大优势与之抗衡。有人认为,甚至六百枚携带分导式多弹头的导弹也可以威胁我们的民兵导弹力量,这种看法倒是有道理的。不太清楚的是,我们的批评家们怎么会主张以破坏一项协议的办法来改善局势,而减少几千枚弹头又为什么会是没有意义的(这如果是真的话,倒是对我们的防务计划提出了深刻的问题)。

这时我们国内的辩论已经变成做祷告似的。在关于东西方关

系的性质的哲学性争论中，口号已经成为一种武器。我们遇到了一种我们从越南的经验中已经熟悉的困境：哲学上的反对者对谈判的成功比对其失败更为害怕。只要我们看上去取得一点进展，他们就要提出新的反对意见：要求实行我们并没有单方面计划的对等积累；埋怨我们强加于自己而且从不试图改变的投掷量总额；现在则又否认限制分导式多弹头数量的意义。不管怎样，我们可以通过在民兵导弹上安装六、七枚弹头来缩小投掷量上的差距，通过研制巡航导弹来缩小数量上的不对等。何况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提到桌面上来的任何一个方案都没有禁止发展新的导弹。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既被人怨恨，又被赋予不现实的任务。我带着愤怒的情绪，在四月二十七日的会上说：

我所阅读到的关于投掷量问题的这一切是什么？我想知道为什么我们总是追求泡沫似的东西。如果我们想有一种更大的导弹，我们为什么不去建造？谁在阻止我们？自从我到这里来后，可以肯定，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要建造一种新的洲际导弹的建议……

临时协定里没有任何条款阻止你们部署一种新的导弹。也没有人阻止（你们）部署新的导弹；我向你们保证，白宫不会阻止你们。按照临时协定我们现在能拥有的只是三叉戟导弹。如果把临时协定延长，我们可以开始搞一种新的导弹……

从来没有人说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会阻止他们的计划。你们不能为此而责怪临时协定。那些都是他们自己的决定。我们的计划是我们决定的结果。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并不阻止我们的任何计划。

最后我被授权去“探讨”我的计划；但我并不相信如果苏联人接受我的计划，团结一致的官僚阶层会支持我，而一旦杰克逊发动他的意料之中的进攻，他们就更不会支持我了。的确，很可能我的助手中有许多人最终将反对这个计划。在这样的情况下前去和葛

罗米柯会谈是不令人精神振作的。

正如意料所及，在四月二十八日至二十九日我和葛罗米柯会谈时有关限制战略武器部分毫无结果，会议就此告终。双方不肯定的事实在太多了，以致都不可能全力以赴地进行。葛罗米柯还有别的要事；我则没有自由去探讨别的方案。葛罗米柯从苏联的观点提出一个关键问题：“这对我们有什么好处？”的确，当我们在实施自己的计划时是不大可能推动苏联人压缩他们的计划的。我描绘了在没有协议的情况下我们将做什么事的阴暗前景：把我们所有的民兵导弹都安装上多弹头；继续建造三叉戟导弹。但是葛罗米柯知道我们的五年计划，因为我们每年都公布这些计划，帮了他的忙。而且他必然怀疑受到致命打击的总统怎么能够在造他反的国会里通过这些计划。

一个月后我从叙利亚穿梭回来时，我们的官僚机构已经瘫痪了。尼克松的总统职务已经处于结束阶段。许多严肃认真的高级官员都担心，在这种情况下达成一项限制战略武器协定，不管其本身的价值如何，总是会有严重缺陷的；它看来像是尼克松为逃避自己命运而安排的诡计。而且不管这个协定的条款如何，官员们必然要怀疑继任的总统是否要对之进行修改。

施莱辛格必然是出于这种考虑，才决定公开反对我们的官方立场，而一个月之前他对此是赞同的。他推翻了早先对以不对等的分导式多弹头数量抵销不对等的积累这一概念的支持，转而戏剧性地肯定双方对等积累的概念，并在这一过程中进行大幅度的削减。他利用的场合是对杰克逊四月二十二日写给他的信的答复，杰克逊在信中要求国防部长评论他的削减方案，该方案也主张对等积累。施莱辛格暂未答复，但到六月三日他称赞杰克逊的办法说：

一般来说，你的方案符合目前用作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指导方针的大部分标准，而且具有其他内在的诱人特点，如同附在其内的估计所叙述的。

实际上，这意味着我们正在谈判的计划的结束。苏联人既然已看到杰克逊在抵制东西方贸易方面的作为，当然也不会怀疑他在尼克松自己的国防部长的支持下能够取得何种成就。无论如何，一项没有得到五角大楼全心全意支持的协定是不大可能得到批准的，而且也许不应该批准。我国政府在准备最高级会谈时再次审议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而且当我们在苏联时，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曾对此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见第二十四章）。但至少回顾起来，尼克松任总统时期，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真正前景显然已随着施莱辛格的信件而在一九七四年六月初结束了。

结 论

尽管回顾的是将近十年前的事，我仍然认为我们在一九七四年春天提出的限制苏联增加分导式多弹头的办法比后来由于国内压力而强加给我们的任何办法都更有指望。许多反对者联合起来极力主张的对等积累，结果只是形式多于实质。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在海参崴苏联人同意对等积累。但是后来的历届政府（包括里根政府）从来没有作任何努力来把战略武器的力量增强到允许的水平；每届政府都自愿接受在运载工具方面保持数量上的差距，但又不愿把这作为协定的一部分。与此同时，苏联所部署的分导式多弹头已达到远比最高级会谈时所设想的高得多的水平，当时反对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人们还拒绝这种设想，认为太危险了。苏联人比过去多拥有几千枚弹头，而如果在一九七四年的会谈中按我们所主张的计划谈成功的话，他们是不会有这么多弹头的。而

且我们的运载工具也并不比他们多。

人们可以说，我们多拥有几千枚弹头并没有形成什么战略上的差异；但人们不能同时说，政府愿意以三百个单弹头发射架的代价换取弹头上的优势是“软”了。而当我们自己没有建造导弹的计划来刺激对方的时候，要求出席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代表们通过外交手段使苏联的力量减少到没有威胁的水平，显然是没有任何道理的。但是即使有建造计划，也必须回答这样的问题：如果说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取得一千五百枚弹头的优势是没有意义的，那么一项建造计划又能够取得什么具有战略意义的优势呢？换句话说，如同我在莫斯科最高级会谈结束时在一次备受恶意攻击的记者招待会上所说的：“天知道什么叫战略优势？”除非我们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否则军备控制仍将受到宣传煽动的威胁，战略武器的建设仍将因为没有理论方针而受到威胁。

当然，苏联的建议几乎总是荒谬可笑的。但这是进程的常态。我不能证明，如果谈判在正常情况下进行，有一个强有力和行使着职权的总统和团结一致的美国政府，那样会发生什么。我深信在一九七四年春天，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已经成为有关东西方关系的更为根本的哲学争论中的替罪羊。对它的赞助者来说，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本身就变成了目标；对它的反对者来说，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是一个要以任何代价来加以反对的危险。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已经不再是一个更广泛的、首尾一致的安全政策的一部份，也不再是一项全面战略。它在强迫之下成为一个孤儿，一名受害者，因受两面夹攻而被碾得粉碎，一面是与实力概念毫无关系的自由派理想主义，一面是毫不受比例感或战略感影响的保守派教条主义。而最重要的是，它因总统在水门事件的阵痛中无力提供一贯的领导而注定要失败。

不幸的是，失去的机会永远不能再得到证明。使这里叙述过

的时期具有凄惨特色的是，由于国内的争论把诚实的意见分歧变成一种内战，美国抵抗苏联侵略和建设更好的世界的的能力受到了削弱。在果尔达·梅厄提出辞职后不久，我忧郁地对她说：

由于极权国家太官僚主义和民主国家太喜欢搞煽动宣传，世界也许正在走向战争。坦率地说，在今后的六个月里，我也许将不得不考虑作出和你一样的决定。我不能继续不断地反对劳工、国会、自由派、知识分子。这和你问题毫无关系。再搞六个月的冷战，我们就将重喊“不惜任何代价的和平”了。那些多年来在越南问题上使我们精神不振的人应对此负责。如果我详细地解释我在干什么，我将赢得米尼*，但失去俄国人的信任。我正在执行的困难政策是能够长期持续下去的。

这并不是说我们“挑起”苏联人采取随后的侵略行为。一个国家不能因为它得不到最惠国待遇就有权派遣傀儡军队到世界各地去。一个国家也不应该把打破每一个僵局的智力负担全都推给谈判对方，如同苏联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所做的那样。苏联和古巴派遣远征军赴安哥拉和埃塞俄比亚，苏联盘踞南也门和入侵阿富汗，克里姆林宫鼓励北越先后夺取南越、老挝和柬埔寨，以及对波兰施加野蛮的压力，这些都是毫无道理的。其他国家感到失望，但它们并没有以破坏国际秩序作为还击。我们虽然有我们的错误，但对缓和的基本破坏是来自莫斯科，而不是来自华盛顿。

但是，当我回顾美国在一九七三——一九七四年破坏自己团结的那种方式时，心中仍然充满忧郁的感情。人们本会认为，国家被水门事件搞得四分五裂，越南停火处于不稳定状态，中东和能源危机已提到日程上来，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经不起再搞对抗。但

* 指当时劳联—产联主席乔治·米尼。——译者

事与愿违，结果发现我们已经使之平息下来的政策领域——东西方关系——却又成为日益争论不休的问题。我们阻止了莫斯科利用我们的权威危机，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成就，正如我们先前利用缓和来孤立河内和使我们自己从越南脱身一样。我们尚处于大力削弱苏联在中东的影响的过程中。这一切起初未能阻止关于缓和的喧嚣，后来又演变为对缓和的大张挞伐的时期，好像一个受到致命打击的总统对于他可能使国家面临的风险竟有许多选择可取舍似的。

我毫不怀疑，那个时期的损失之一是放弃了对东西方关系采取一种平衡的、审慎的、深思熟虑的对策。一九七三——一九七四年时期的严肃教训是理想主义到头来并没有能够促进在苏联的犹太人的人权（一九七五年的移民出境数字还不及一九七三年的百分之四十）；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被破坏并没有使我们的军事态势得到改善；而在对缓和的讨伐成功的地方，也造成了不良的后果。正在被制订为立法的办法并没有阻挡住苏联的扩张。苏联的扩张加剧，而造成对抗的那些国内分裂因素又阻止了美国作出有效的反应。苏联不愿以比较讲道理的方式行事。美国政府对苏联的目的并不抱有幻想，但国内的争论使全国对我们面临的挑战的复杂性的了解更加糊涂而不是更为清楚，从而削弱了而不是增强了我国抵御苏联冒险行动或探讨共处可能性的能力。

事实上，那些批评我们的人在哲学上比他们在我们政策道路上巧妙地设置障碍更有道理些。美国人民是否能够以道德讨伐以外的理由支撑一项旷日持久的竞赛，这确是一个严肃的问题。我们的政策的确使我们冒这样的风险，即由于不断地谈判而放松了警惕——这正是苏联的战略。另一方面，批评我们的人拒绝正视这样的现实，即他们所主张的办法有使我们同盟国分开和脱离本国人民的危险。我们认为，我们争取突出和平问题的政策可以使我

们对长期斗争有更好的准备,对这项长期的斗争,我们同意批评我们的保守派的那些观点,认为我们是牵连在内的。对战略分析持有相似观点的人竟会在策略问题上进行一场内战,这真是国家的悲剧。

为了我们在核时代的安全和幸福,为了给世界带来希望,我们的外交政策必须具有积极的的目的性和计划性。这反转过来又需要人民团结一致和具有连续性。我们在世界上的目标决不能再屈从于我们内部的分歧;外交政策不能被分割为一系列的内部摩擦。一个分裂的美国会使世界失去一切希望;只有一个团结一致的国家才有助于维护国际安全以及有助于地球上的人民建设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① 如同贸易法即一九七五年一月三日的公法 93—618 号所最后通过的,杰克逊修正案的关键部分内容如下:

第四〇二条 东西方贸易中的移民出境自由

(甲) 为了保证美国继续致力于基本的人权,且无论法律上的任何其他规定如何,自本法实施之日起,来自任何非市场经济国家的产品均没有资格享受非歧视性待遇(最惠国待遇),这种国家不得直接或间接参加美国政府给予贷款或贷款保证或投资保证的任何计划,在总统决定这类国家有下列情况之日起的这段时期内,美国总统不得与任何这类国家缔结任何商业协定:

(1) 不给予其公民移居出境的权利或机会;

(2) 无论为任何目的或出于任何原因,对移民出境或出境所需要的签证或其他文件征收超过正常标准的税捐;或者

(3) 由于任何公民要求移居到他所选择的国家而对这类公民征收超出轻微程度的税、捐、罚款、手续费或其他费用,

直至总统决定这类国家已不再违犯第(1)、(2)或(3)节之日为止。

② 见,例如:一九六九年六月三日《纽约时报》社论《找埃弗莱特澄清》;《白宫岁月》,第一五〇——一五五页。

③ 见安德烈·萨哈罗夫著《萨哈罗夫言论集》(纽约:文特吉书局一九七四年版),第二一一——二一五页。

④ 安德烈·萨哈罗夫著《进步、共处和知识分子的自由》(纽约:纽约时报书局一

九六八年版)。

⑤ 波拉·斯顿著《水的边缘：国内政治和美国外交政策的制订》(康涅狄克州威斯特波特市格林伍德书局一九七九年版)，第九十九页。

⑥ 见《白宫岁月》，第一九九——二一五页；九三八——九四九页。

⑦ 爱德华·弗里德、艾丽斯·里夫林、查尔斯·舒尔茨和南希·蒂特斯著《规定国家重点：一九七四年预算》(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一九七三年版)，第三三九页。乔治·拉恩詹和杰克·鲁伊纳著《三叉戟：一个重要武器的决定》中也有类似的论点，载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二日《华盛顿邮报》。

⑧ 弗里德等人著《规定国家重点：一九七四年预算》，第三四一页。

⑨ 《白宫岁月》，第二〇四——二一〇页。

⑩ 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一九七九年七月九日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发言，载美国第九十六届国会第一次会议《外委会关于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第二阶段条约的听证会》，第一部分，第一一一页。

⑪ 《白宫岁月》，第一三〇——一三八页。

⑫ 同上书，第十三章，注④。

第二十三章

为叙利亚问题进行穿梭外交

在一九七四年春，不论怎样估计形势，都可以看出，应该把关于叙利亚问题的谈判放在优先地位上。它是中东和平进程的顶峰。实现这一目标就可以使萨达特放手去干而不至于被指控为出卖盟友；可以消除要求恢复石油禁运的压力；而且还可以确立我们支配中东外交的地位。但是，世界并非静止不变以等待人们去动脑筋的。虽然外交家通常被人们奉承为有条不紊地从一盘棋局转向另一盘棋局，实际上这种从容不迫地思考问题的机会并不常有。三月四日，我刚结束了为确立叙以脱离接触谈判的程序而进行的访问归来。紧接着，我们就和欧洲盟国闹翻了，双方酝酿这场争吵已经有大半年的时间了。没过两个星期，我到了莫斯科。然后是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重点讨论了经济发展问题，并为华盛顿带来了川流不息的贵宾。

三月三十日，南希·马金尼斯和我结婚了，这是对我的一生影响最大的一件事。

一共等了几乎两个月之后，我才继续我的中东之行。一直到四月底，我才开始为叙利亚问题进行穿梭外交。这是一场令人疲惫的谈判，但终于使戈兰高地上的以色列军队和叙利亚军队脱离了接触。我邀请我的新娘和我同行，并告诉她要轻装上路。我启程时并不知道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努力和角逐。在那仆仆风尘的三十四天里，我穿梭于大马士革和耶路撒冷之间，在以色列遇到反

对我的示威游行，在大马士革街头，人们也对我怒目而视。这两个国家的首都相距只一百五十英里，但完全处于互相隔绝的状态。我奔波于两者之间，连通向机场的道路也都走熟了，也经常望见峻峭的朱迪亚山和大马士革的以积雪覆盖的赫尔蒙山为背景的大平原。我把一方的观点向另一方进行阐述，提出打破一再出现的僵局的方案，常常深夜还在为各种难题而伤透脑筋，这些难题原本都是无足轻重的问题，却被中东所特有的激情和伤感转化为历史性的事件。

而这还不是问题的实质。叙利亚—以色列穿梭外交之所以感人而曲折，是因为在其进程中，各方至少都看到了一点真理，即他们的唯一前途就是共处。而在走这条路的时候，他们所得到的不仅是一纸协议，他们更了解自己了。

降 熊

在开始谈判之前，最重要的一件准备工作就是不让苏联人以一种可能使谈判失败的方式闯入谈判。在这个过程中，缓和起了作用，谈判形式本身也起了作用。但是我们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特别反映出了我们的政策造成的战略现实，即我们是唯一能够有效地和各方商谈问题的国家。

我在二月进行的穿梭外交的一项成果是：以色列和叙利亚都同意派出特使到华盛顿来，分别和我商谈脱离接触问题。制订这样的计划是为了解决一个难题，即以以色列提出的脱离接触方案过于严峻，我不能设想向阿萨德转达这样的方案。与其说这是一个方案，不如说这是一种代用品，用来使以色列能够先解决组阁危机，然后再转入认真的谈判。我把摩西·达扬来华盛顿的时间放在我在三月去莫斯科之后，这样我就用不着向苏联领导人通报达

扬带来的方案，因为我预料这个方案是更不能令人满意的。叙利亚特使来华盛顿的时间安排在阿萨德总统四月中开始访问莫斯科之后。这就使叙利亚人不能借助苏联的压力来加强自己的力量。

如果阿萨德和萨达特不是清楚地看到美国的调解最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的话，这些巧计是都不能奏效的。我对萨达特有相当的把握，但是阿萨德还没有真正经受过考验。不久就出现了一个机会。我在三月二十四至二十八日访问莫斯科时，勃列日涅夫和葛罗米柯都要求在日内瓦，在苏联代表在场的情况下，进行关于叙以脱离接触的谈判。自从我在二月间拒绝这种做法以来，我对这种做法的有效性的看法没有改变。和在二月间一样，我用苏联的阿拉伯朋友做挡箭牌。我从莫斯科拍电报给萨达特和阿萨德，征求他们的意见。

法赫米代表萨达特答复说，即使阿萨德屈服，请我也不要“让步”。我早就料到这一点，因为萨达特甚至比我们更需要表态，而只有美国能够在中东转达他的表态。

虽然萨达特态度强硬，但是我却看不出，如果阿萨德作出另一种选择，我们怎样才能坚持要求由美国独家调解。阿萨德并没作出另一种选择，没有什么别的事情比这件事更能显示出苏联地位的虚弱。阿萨德在收到我的提问之后几小时就答复说，他坚持原来商定的程序。他主张由我先把“这个地区的”协议的主要内容制订出来，再把问题移到日内瓦去。日内瓦会议可以完成细节。他告诉我们，没有发生什么会要求改变三月初所商定的程序的事情。突出的事实是，叙利亚总统宁愿在没有他的主要盟友参加的情况下进行谈判。

当然，苏联并不就此罢休。紧接着就是一个苏联造谣中伤的明显例子。中东盛传，我在莫斯科时曾告诉苏联人说，以色列绝不会从戈兰高地撤退。三月三十日，我致电阿萨德，严词驳斥这一谣

传。阿萨德在四月二日答复说，他接受我的说法，并称这些谣传是恶意的和不真实的。阿萨德特别向我保证，他不相信谣传。

接着是双管齐下施加压力。一方面葛罗米柯在华盛顿对付尼克松，另一方面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试图收买阿萨德。四月十二日，葛罗米柯从在纽约举行的联大特别会议抽出身来，向尼克松提出措词尖刻的意见。他把我们的行动称为“分裂主义的”。他不满足于这种只是向他通报情况的协商形式。苏联希望的是联合行动，虽然葛罗米柯并不理解它的具体含义。在尼克松会见葛罗米柯之前，我曾以备忘录形式提醒过尼克松：

苏联直接参加中东谈判必然会大大减少成功地实现这个地区的和平的可能性。首先，萨达特和阿萨德以及以色列都不愿意让苏联参加。此外，苏联想把所有的问题都归并在一起，放进日内瓦这场大型谈判中去。而我们认为，除非我们能够继续把谈判划分成政治上便于处理的组成部分，否则整个谈判过程就会受到阻碍。因此，我们必须继续把苏联排除在外，但同时公开场合缩小这一事实的影响，并私下向他们保证，我们打算在谈判的每个阶段都向他们通报情况。我们可以和苏联泛泛地商谈叙以脱离接触问题，或者理论性地商谈将来日内瓦会议的作用问题。但是我们不愿商谈细节，以免苏联能对具体建议横加反对。

尼克松以令人钦佩的模棱两可的做法，通过了这座迷宫。他对葛罗米柯说，他思想里对于排除莫斯科这个念头，连想都没有想过。我们整个战略思想是要使苏联人起重要的作用。这种说法连我听着也和葛罗米柯一样感到新鲜。美国只是在处理一部分的问题，因为就这一部分问题而言，美国处于能够取得进展的更有利的地位。如果葛罗米柯想和我们换个位置，想推动以色列人就戈兰高地问题达成协议，欢迎他试试。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乐于充当叙

利亚的保护人。（当然，即使这样安排，苏联人也还是只能呆在外面，因为不存在可以预见到的、他们对以色列有重大影响的问题。）但是，尼克松装出一付对于已经商定的这场谈判应该采取什么形式毫不在乎的样子。就像在二月那样，他把解决这个技术问题的事交给了双方的外交部长，而外交部长的公务却使他们不能像他那样高瞻远瞩。他说：“我希望你和基辛格博士能够达成某些谅解，以便我们能够实现我们为之共同努力的和平解决的目标。我把这件事交给你们两人，多勃雷宁可以当公正人。”

我在和葛罗米柯商谈时，建议在四月末我为叙利亚问题进行穿梭外交途中，在日内瓦和他会面。葛罗米柯建议在大马士革会面。但是，总得两人同意才能会面。而我不愿意在一个中东国家的首都制造美苏共管的印象的。

事情当然取决于阿萨德。他随时都可以中断我们的外交活动。他访问莫斯科时被饷以盛宴，这反映出他举足轻重的地位。勃列日涅夫在克里姆林宫为阿萨德举行的宴会上警告说：这些脱离接触的“替代性方案”意味着“用性质不同的部分协议来代替全面的解决办法”。他如怨如诉地感谢叙利亚承认在任何和平解决办法中“苏联参加的重要性”。这句话的含义不清。它肯定不能引伸为参加现行的谈判。

四月十六日发表的苏叙联合公报确认，脱离接触“必须是”全面的中东和平解决办法的“一部分”。双方“讨论并确定了进一步加强”叙利亚军事力量的“步骤”。苏联人恶毒地把一根火柴丢进一大桶石油里，确认叙利亚拥有“采用一切有效手段解放被占领土的不可剥夺的权利。”^①

阿萨德是一位道地的民族主义者，他收下苏联的武器援助，却并不采纳苏联的纲领。他在四月十八日写信告诉我，他在莫斯科时，曾就有关脱离接触的活动进行了一次“总回顾”。但是，重要的

是，他认为没有达成会与他和我已经商定的程序相矛盾的协议。换句话说，尽管在莫斯科举行了盛宴，阿萨德仍然坚持那个排除苏联人的计划。关于葛罗米柯要在大马士革和我会面一事，阿萨德尽他所能地使自己超脱出来。他指出，苏联人未提此事。只有在这件事代表两个超级大国的“共同愿望”的情况下，叙利亚才能同意。换句话说，阿萨德不会要求举行这次会见，也不会设法打消我的反对态度。但是，他不愿当替罪羊，他把这项荣誉留给了我。后来，叙利亚总统的一位助理唯恐他的领导人没有把话说明白，又逐一向我们的临时代办汤姆·斯科兹作了说明。这位助理明确表示，如果双方都希望举行这次会见，叙利亚可以同意。但是，如果华盛顿不同意，大马士革也不会同意。我理解他的意思。

葛罗米柯和我在日内瓦会面一事远远没有达到苏联本来的要求，但是却超出了埃及所同意的限度。四月十八日是萨达特公开宣布结束埃及完全依靠苏联军事援助的日子，那一天，埃及外长伊斯梅尔·法赫米拜会了尼克松。他来美国是为了参加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关于黎巴嫩问题的会议的。法赫米强调了他已经在开罗向我们表达过的意思，他指出，苏联在中东的任何明显作用都会破坏美国的影响以及萨达特的行动自由。他说，埃及寻求美国在政治上的支持，同时向苏联人“开红灯”。据说有些好心肠的欧洲盟国告诉他，我们同意在中东和苏联采取共同行动。设法使法赫米相信我们的战略是不困难的。但是，我们不像埃及，为了证明它从依靠苏联转向和美国密切合作的行动是正确的，千方百计贬低苏联，竭力说明苏联是无能的；我们用不着那样做。

阿拉伯世界

把苏联排除在外，使美国有了相对的行动自由。因为阿拉伯

国家领导人已经有了一致的意见，认为当前的重点是迅速开始就叙利亚问题进行谈判。激进的阿萨德和布迈丁这样看，温和的费萨尔和侯赛因也这样看。连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亚西尔·阿拉法特也这样看。

一九七四年初，又听到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声音了。我们不愿阿拉法特参加，就像不愿葛罗米柯参加一样，因为我们认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一支潜在的破坏力量。

回想一下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当时的形象是很重要的。它还没有被大多数阿拉伯国家承认为巴勒斯坦人的唯一代言人。在我们看来，它主要是个恐怖主义组织。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纲领仍然主张消灭以色列和在巴勒斯坦建立非宗教国家。在我们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唯一一次高级接触中，它的代表亲自向我们表示，决心要消灭哈希姆约旦王国。

在第十三章里，我描述了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一位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高级领导人和当时的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弗农·沃尔特斯将军会面的情况。这次会见是为了鼓励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微妙的战后时期、在我们正在召开日内瓦会议和为埃以脱离接触进行准备的时候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我们现在正处在比较严重的关头。

由于我们曾经向阿拉伯人（还有以色列人）介绍过情况，后来我们之间接着进行某些商谈，这是并不奇怪的事情。但是，只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不放弃它的恐怖主义目标，不承认以色列，我们不接受它为谈判对手的立场是不会改变的。在一九七四年一月穿梭外交结束的几天之后，萨达特向赫尔曼·艾尔茨大使介绍了阿拉伯国家在脱离接触之后所持的态度。萨达特说，他已经和阿拉法特以及摩洛哥国王哈桑谈过；可以在我选定的任何时间安排我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头头会面。对于这一建议，我避而不答。

二月十日，法赫米建议艾尔茨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驻开罗代表建立联系。我们根本不想把埃及的政策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政策联系起来，也不想使埃及的威信卷入混乱的西岸谈判之中。因此，在二月十二日有人通过摩洛哥向我们提出要再次会见沃尔特斯时，似乎一下子把好几个问题同时解决了。它解除了来自开罗的压力；它将使石油输出国组织中的持骑墙态度的国家在石油禁运问题上采取温和的决定；最重要的是，它可以使计划中的为叙利亚问题而进行的穿梭外交在平静的气氛中进行。因此，在二月十六日，我们同意由沃尔特斯在摩洛哥再次会见一位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

会见实际上是在三月七日举行的。沃尔特斯再一次得到多听少说的指示。按照我们的计划，他的做法是拖延时间。他告诉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人说，要等到叙以脱离接触之后，我们才能进行进一步的接触。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对于他上次所谈的看法也提不出什么补充。他企图向我们施加压力。他强调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可以作出和苏联打交道的抉择，且不说它现在还拥有一大笔石油收入。他把有人企图在我十二月访问贝鲁特时袭击我的座机没有成功一事归功于自己（见第十七章）。沃尔特斯也指出，对于有人二月间在大马士革企图谋杀我一事，我并不感到过分高兴（见第二十一章）。和以往的会见一样，沃尔特斯提出警告，不要对美国采取恐怖主义行动。沃尔特斯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都没有谈到和平解决的问题。

四月二十日，阿拉法特的一位同事要求美国驻贝鲁特大使馆官员澄清美国对于将来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态度。五月一日，在为叙利亚问题而进行的穿梭外交开始之后，我们对上述问题给予了温和的答复。在我任职期间，除了一九七六年黎巴嫩危机中的某些低级技术性接触外，我们没有和巴勒斯坦解

放组织作进一步交往。

但是，有一种趋势是明确的。关于取消以色列对西岸的占领状态的谈判拖得时间越长，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政治地位和力量就越是无节制地增长。西岸的僵局意味着侯赛因国王的耻辱；它使侯赛因国王关于他的温和路线会使巴勒斯坦的土地重归阿拉伯国家控制的说法失去根据。

侯赛因在三月十二日访问华盛顿时，情绪忧郁，这是可以理解的。在我们一月亚喀巴会谈后，国王接受了我的劝告，把他的关于在约旦河沿岸脱离接触的要求不高的方案直接提交以色列人。他提交方案的时机反映出他迫不及待的心情，因为这时以色列正在组成新内阁，正式提出西岸问题显然还为时过早。一点也不奇怪，侯赛因的方案遭到了断然拒绝。以色列人重提他们的老方案，即：让约旦接管西岸的民政管理，同时以色列继续其军事占领。^{*}约旦不能接受这种方案；实际上，以色列一再提出这一方案，反映出它对阿拉伯人的心理是多么惊人地缺少了解。即使是最温和的阿拉伯国家政府首脑也不会同意在以色列占领之下管理西岸。

侯赛因感到沮丧。他认识到，不可能要求以色列内阁同时处理戈兰高地和西岸这两个问题。而且他也同意，由于戈兰高地存在的爆炸性军事态势以及阿拉伯国家的坚决主张，必须优先考虑叙利亚问题。但是，侯赛因也在开始考虑，同一股势力是否会在以后同样地反对他。因此，他正在认真考虑完全退出谈判的可能性。但是，这会使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为以色列的唯一有效的谈判对手。而且侯赛因仍然相信，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对他本人和他的王朝的敌对态度是无法平息的。

我和侯赛因一样感到沮丧。在他三月十二日拜会尼克松时，

^{*} 当时以梅纳希姆·贝京为首的利库德党的反对派连这一点也反对。后来贝京当政时采纳了工党早先的立场，易名为“自治”。

我说：“以色列还没有进行真正的选择。他们要末和侯赛因国王打交道，要末就和阿拉法特打交道。他们不能和谁也不打交道。”但是，我也明白，在优先考虑哪一个问题方面，没有选择余地。我们必须等关于叙利亚问题的谈判完成之后，才能转向西岸。我们不愿意看到阿拉伯国家的激进派把满腔怒火对着约旦，也不愿意看到受到挫折的阿萨德指责萨达特造成叙利亚前线的僵局。由于以色列以及我们自己的国内情况都很微妙，我不能肯定，我们是在实践一种理性学说，还是在执行一项行动计划。我感到自己好象在做一场恶梦，身子被捆在铁轨上，一列快车正隆隆奔驰而来，我在竭力挣脱。至于西岸问题，我们还顾不上。

穿梭外交的序幕

在这个阶段，我们也没有理由对关于叙利亚的谈判抱乐观态度。推动两个互相猜疑很深的国家达成协议，从来就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戈兰高地双方的炮战每天都在继续。但是，还有别的阴云笼罩着这场谈判。

最主要的一块阴云是以色列的旷日持久的内阁危机。关于组成新政府的谈判是艰苦的和议而不决的。包括工党的不可缺少的联盟伙伴全国宗教党在内的各方都提出了极端的要求，作为参加新的梅厄政府的代价。但是，大部分争议是围绕摩西·达扬这个人物进行的。作为国防部长，他仍然承受着主要的指责，因为阿拉伯人在十月间进行的突然袭击获得了成功。正如第二十一章所指出的，二月二十五日，他曾戏剧性地宣布，不参加新内阁。他的同事和门徒西蒙·佩雷斯采取了同样行动。但是，这使果尔达失去了他们这一派的八个席位，并使宗教党更加坚决地不参加政府。三月四日，在果尔达戏剧性地宣布准备辞职之后，达扬改变了主意。

以色列和叙利亚在戈兰高地的炮战更加激烈，这使果尔达能够以战争威胁为理由要求他这样做。三月十日，果尔达宣布组成新政府，达扬和佩雷斯重任旧职。

但是，围绕着梅厄夫人组成新政府而发生的这场风波并未平息。四月二日，为了调查十月情报工作失败的责任于十一月成立的阿格拉纳特委员会，发表了第一篇报告。报告的重点是指出未能预测阿拉伯国家的袭击的个人“直接责任”，它的打击对象包括参谋长戴维·伊拉查将军，使他不得不立即辞职。政治斗争有一个规律，我还从来没有见到过例外，那就是：当一场政治危机超越了一定程度之后，抛出替罪羊只会使对手胃口变得更大，而不是减退。由于伊拉查成了替罪羊，他的上级达扬就更加理所当然地成为攻击目标。国防部长不对参谋长的行为负责，这种说法很难站得住脚。

在达扬之后，这场风波将会吞没果尔达，这只是时间问题。果尔达看到了这一点，她在四月十日告诉党的领导说，她已经吃够苦头了。四月十一日，她正式向议会提出辞职。她立即成为在接任者尚未选定之前的看守政府的首脑。被提名接任的人是我的老朋友伊扎克·拉宾。他是一位早期的战争英雄、参谋长以及驻华盛顿大使。这时轮到拉宾去和以色列的情绪冲动的派系进行磋商，以组成联合政府。因为叙以谈判和以色列组成联合政府的谈判互相交错，使我们已经很困难的前景更为复杂。

在一九七四年三月底，激起以色列对外交政策的热情的不是和叙利亚达成新的脱离接触协议的前景，而是如何实施现有的和埃及脱离接触的协议。在西奈的武装力量脱离接触是在三月五日完成的。不久，联合国和美国侦察机开始对兵力部署进行视察。到了三月十日，发现了三个有能力装备地对空导弹的场地，是埃及在禁止设置导弹的三十公里地区建造的。联合国的视察官员认为，

没有设置发射器或导弹的场地是否算得上是违反协议，是一个可以研究的问题。当然这是违反协议的精神的，因为这些场地使埃及能够在几乎一夜之间部署一个前哨防空阵地。还发现埃及把我们认为在限制军备地区允许装备的一二二毫米榴弹炮的数目翻了一番（即：不是三十六台，而是七十二台）。坦克的数目也比允许范围超出了六辆。

这些违反协议的情况使我们面临一个问题。我可以肯定以色列将会有什么反应。以色列放弃了领土，换来了安全协议，必然对协议的文字十分坚持。如果它对于蚕蚀安全条款的行为熟视无睹，谈判的过程就会成为单方面的无条件撤退。但是，我深信萨达特不会明知故犯地为了区区小利危害他的战略。违反协议的情况很可能是由于对协议条款的误解，或者是在萨达特本人并不了解的情况下下级官员所干的事。而在我们方面，我们需要萨达特对关于叙利亚问题的谈判给予支持。

因此，在我看来，立即就此问题和萨达特进行公开对抗，似乎是不必要的，也是不明智的。如果正式指控埃及违反协议，就可能把埃及的威信卷入一场意志的考验中去，或者可能使萨达特由于被迫公开退让而丢失面子。因此，我派出一位情报专家去向萨达特和以色列人介绍我们在侦察中发现的情况。首先要去见萨达特。我指示介绍情况的官员告诉萨达特说，下次侦察飞行将在一星期后进行。因此，萨达特在这段时间里可以有机会使埃及符合协议要求，而用不着承认自己违反了协议。在我们得到侦察照片之后，花了几天时间作出安排才派出这位专家。这位情报专家在向萨达特介绍情况的两天之后，还将向以色列内阁介绍情况。

向萨达特介绍情况进行得相当顺利。萨达特立即下命令从运河对岸撤出一切坦克，从而履行了他在关于脱离接触问题的谈判中向我作出的承诺。萨达特解释说，炮的数目超出限额是由于技

术原因。协议允许在限制军备地区设置六个榴弹炮连。以色列人（还有我们）认为埃及的每个炮兵连只有六门炮，而实际上有十二门。但是，他还是当着艾尔茨大使的面命令埃及国防部长遵守我们对协议的理解。

但是，人们如果设想以色列的看守政府会心平气和地处理这个问题，那就是把问题看得太容易了。报界透露说，以色列指控埃及“违反协议”，特别提到炮的数目超额，这正是我们力求避免的事情。三月二十一日我对迪尼茨抱怨说，“请把关于埃及的争论控制住。如果你们不断攻击埃及，埃及就不能在叙利亚问题上帮你们的忙。”三月二十二日，我唯恐埃及单方拖延执行萨达特的命令，就警告法赫米说，在一月间，我花了很大的力气才说服以色列政府接受现有的分界线。因此，我“个人负有责任保证炮的总数为三十六门。我希望，这一误解可以不用费更多的周折就得以消除。”

法赫米勉强同意加速撤出装备，但是他指出，要撤出超额的炮就需要对埃及的军事组织作出调整，因此，不能在三月二十五日进行的下一次侦察飞行之前完成。为了保全埃及的面子，我把侦察飞行的日子推后几天。这很快就引起我和果尔达的一场争吵。她当时正苦于受到国内的责难，责怪她在十月战争发生之前的疏忽，甚至指责她（令人惊讶地）态度太软弱。因此，她在三月二十三日我即将动身前往莫斯科的时候，向我发出了最后通牒：如果超额的炮不在三月二十七日之前撤走，达扬将取消他三月二十九日对华盛顿的访问。这次访问是为了开始和叙利亚谈判而进行的。

比起公开和萨达特摊牌来，如果还有什么事是我更不愿意看到的，那就是：在解除石油禁运后一个多星期的时候，关于叙利亚问题的谈判的垮台。阿萨德接受了他明知是一种诡计的安排，给予以色列以渡过国内危机的机会。但是，如果取消达扬的访问，——这是我前次穿梭外交的唯一实际“成就”——将会迫使他

再次进行对抗，并依靠苏联的支持，特别是因为阿萨德即将访问莫斯科。此外，把叙以脱离接触问题和埃及的争议联系起来，就会在我们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试图把中东危机分割成几个组成部分之后又把它合并起来了。而且这一切都只不过是确定一下萨达特已经同意撤除的三十六门榴弹炮的撤除时间。

因此，我向迪尼茨慷慨陈词：“公开和埃及对抗不可能符合你们的利益……看在上帝面上，在我访问莫斯科期间，你不要去强调违反协议的情况。”我警告说，如果达扬不按期来，我就退出谈判。现在回忆起来，我不明白为什么美国退出谈判会加强我们的地位，以及为什么我会认为以色列会为这一前景感到痛心。在通常情况下，发一通脾气是感动不了果尔达的，除非对方的意见正好符合她的心意。由于她已经向反对派表明了她的强硬态度，于是就撤回了最后通牒。四月三日，开罗告诉我们说，令人不快的炮已经撤走。四月六日，侦察飞行的照片确认了这一事实。在后一段微妙的时期里，埃及战线没有再发生别的争端就平静了下来。

达扬重访华盛顿

三月二十九日，也就是我从莫斯科返回的第二天，在我婚礼的前夕，随着盼望已久的达扬对华盛顿访问的实现，关于叙利亚问题的真正谈判终于开始了。在任何情况下，没有一次外交访问像这次访问这样举足轻重。两个月来，我们一直把它作为挡箭牌，一再拖延提出具体方案。但是，达扬并不能推动事态的进展。他显露出正在忍受国内对他的过激的、屈辱的、而且也是极其不公正的攻击。而他又不能比折磨他的人更超脱，因为他是非常敏感的人。他以自我为中心，富有诗意，自命不凡，善于支配他的人民，但是他的感情却是隶属于他们的。在冷静的时候，他的头脑是以色列领导

人当中思路最广阔和最富有创造性的。当他感到受到挫折时，他会退缩和感伤。在目前情况下，即使达扬在政治上和感情上处于顺境，他也很难在戈兰高地问题上实现突破。因为现在要求这个正在为生存而挣扎的以色列内阁所做的事情，是要它撤出曾经以大量的牺牲为代价而从它所憎恨的敌人手中夺取过来的土地，况且这样做不会为它带来相应的好处。

应该记得，我们即将寻求的是，要以色列不仅放弃它在由叙利亚发动的一九七三年十月战争中新得到的土地，而且也放弃它在一九六七年战争中得到的土地中的象征性的一块，哪怕是一小块。要探索在这方面以色列能接受到什么程度，它索取的代价是什么。在一九七三年战争结束时，以色列在叙利亚前线的南端推进不多，但是在北端，以色列占领了从西到东一大块突出的土地，其边缘已经到达离大马士革二十英里的地方，背后是俯视着大马士革平原的赫尔蒙山。脱离接触协议将在以色列和叙利亚之间确立一条新的从南到北的分界线，建立一个由联合国部队巡逻的非军事区，和在中线两侧的限制军备区。在我上次进行穿梭外交时，以色列曾主张，它所撤出的上次战争中征服的土地，均应交给联合国；叙利亚平民不得返回这些地方。

达扬的新方案表现出前进了一大步。这个方案作出让步，规定叙利亚部队可以返回这个突出部分的三分之一地方，这些地方将成为限制军备区。方案也不再反对平民返回联合国控制区，从而同意平民可以重返突出部分的三分之二地方。但是，以色列前线，也就是分界线，仍然划在战前分界线以东更靠近大马士革的地方。这意味着，以色列主张以保存突出部分三分之一土地的条件来结束战争。以色列作出了重大让步，但是所有的阿拉伯国家的领袖，不论是激进的还是温和的，都告诉过我，阿萨德连恢复十月六日线也不能接受。和埃及收复西奈一小块地方一样，叙利亚必

须收复以色列在一九六七年占领的土地中的象征性的可以和埃及相比的一小块。

困难在于，在一九六七年战争之后，在戈兰高地上建立了大约二十个以色列居民点，有的离十月战争前的分界线只有五公里远（见第一一一页地图）。谈判的核心问题是，我们能否以脱离接触协议的名义，在这一狭长地带划定一条分界线，但又不致于触及以色列的居民点。这样，叙利亚就可以显得得到了一些可与埃及相比的东西。我告诉达扬说：

按抽象的逻辑来说，你们是有道理的。让平民回去是通情达理的举动。但是，这些线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只能从可以换一种做法的角度提出我们的建议。……我曾经告诉你们的大使，戈兰高地的一小块，包括库奈特拉镇，必须包括在这项协议之中。我知道，你没有受权在这里讨论这个问题。你用不着谈这个问题。但是，我之所以这样缓慢行事的原因是，要让以色列想想这个问题。

达扬没有说话。我由此而假设，这还不是以色列的最后态度，只是他不想充当表明最后态度的以色列部长而已。

我的下一个任务就是拴住阿萨德。我通常的做法是向所有有关各方通报情况，以便减少受谣传影响而引起猜疑的危险。这一次我只能通报简单的情况了。我已经和阿萨德交换过几次电报。我在三月七日已经拒绝了他的企图，他要想使我事先同意把叙以脱离接触线划在意味着以色列要放弃一些居民点的地方。我曾经一再向所有的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强调指出，以色列不会为了脱离接触而放弃一个居民点。而且我也告诉以色列领导人说，我不会迫使他们这样做。在另一方面，我充分利用了三月十五日在华盛顿顺便访问我的以色列外长阿巴·埃班的一次非正式谈话，以及

他后来关于以色列希望在戈兰高地实现脱离接触的公开谈话。三月三十日，我向阿萨德总统通报了达扬访问的情况，勉强列举了几个积极因素，包括重新划定限制军备区和平民返回的问题。我指出，我曾经告诉达扬：“按照我对阿萨德总统的立场的了解”，最新的以色列方案不大可能是令人满足的。我也详细地向萨达特、侯赛因、法赫米和萨卡夫通报了情况。

四月三日，我写信给梅厄总理说，需要按照我给达扬提出的原则重新起草一个以色列方案。四月九日，她回答说，达扬带来的方案仍然是以色列政府的官方立场。按照以色列的宪法程序，她除了支持内阁的立场以外别无他法。但是她也表现出了某种灵活性，同意在我去以色列时讨论“你想提出的任何设想”。第二天，她向她的党提出辞职，第三天又向议会提出辞职。因此在后来的谈判中，她是一个下了台但还没有被人接替的总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她一旦卸下重担，就免除了日常的政治压力，于是这头母狮振作精神，作出一次果敢的努力，和被她憎恨的叙利亚人达成了一项协议。她并不喜欢这项协议，但是，她认识到，它对于她的国家的安全是必不可少的。

叙 利 亚 特 使

四月十三日，叙利亚谈判代表终于到达华盛顿。这是在二十年中叙利亚首次派出一位高级特使前来华盛顿。他和我们一样，不能肯定果尔达的辞职会发生什么影响。我们唯恐它会使谈判流产或至少推迟。我们决定若无其事地进行工作。

阿萨德总统选派的特使是叙利亚军队负责情报工作的参谋长希克梅特·西哈比准将。他是阿萨德的好朋友，是完成这项使命的合适人选。他似乎真对和美国改善关系有兴趣。他也反映出他

的国家进退维谷的窘境。他刚愎自用，但同时又有点把握不定；说话很冲，但在内心深处又渴望自己的要求被人接受。叙利亚国力不强，因此不能坚持自己的主张。但是，它对自己太没有把握（因而故意自吹自擂），同时也对别人太不信任，因此不能依靠别人的帮助。它不能靠力量取胜，但也不能靠道义的支持使人听从它的意见。但是，叙利亚和以色列一样，正在作出巨大努力，以克服各种偏见。阿萨德在四月一日寄给我一封信，确认西哈比不是带着对抗情绪前来的。人人都在等着，看我能给他们些什么。

西哈比和达扬一样，也带来了一些让步。这些让步在叙利亚看来已经是走得够远的了，但是，我知道，对于以色列来说，还远远不够。在四月十三日上午我们的会谈中，他接受了在分界线两侧规定对等的军备限制的设想，但是在这以前，这一设想一直被斥责为有损于叙利亚的主权。他赞成设立联合国缓冲区，但是由于存在成千的叙利亚平民，他要求监察人员应该是非军事性的。他要求简化有关限制军备区的规定。根据埃及的经验，我猜想这一点是可以做到的。西哈比不想考虑达扬提出的分界线。相反地，他带来一个和阿萨德原来提出的要求以色列撤退到戈兰高地的腹地的设想略有差别的方案。我把对达扬说过的话也对西哈比说了：“我一直告诉你们总统，我认为我不能实现他提出的分界线。但是，我会实现可能争取到的最大限度的分界线。”

我为自己的辩才感到忘乎所以，归纳了一下我们的立场：

因此，组成部分包括……叙利亚军队向前移动；以色列军队后撤；以色列在后撤线后面的军队人数也有所减少；以及叙利亚平民返回以色列撤出的土地。这些是已经取得的积极因素。还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的是那条线……因此，我来中东要做的就是移动这条线。还有商定减少兵力的问题。两边都减。

这就好像是在说，如果有人把阿尔卑斯山搬走，瑞士就会成为一个平原国家。西哈比欣然同意我的做法，因为这样一来，他就用不着把具体方案带回去了。当我理直气壮地告诉他，就剩下两个问题——分界线和限制军备——时，我是由于想起了关于西奈的谈判而感到过度兴奋。

从失败中学习相对地说是容易的。但是，成功带来的不利因素却在于，人们往往认识不到还有需要学习的东西。人们很容易倾向于设法照搬过去成功的经验。但是，虽然历史的规律可能重现，具体的情况却很少能够重演。明智的政治家总是避免机械地重复自己的行动；他总是仔细分析具体情况以及过去获得成功的突出和独特的特点。关于西奈的脱离接触之所以很快实现，是因为双方都渴望达成协议。以色列在苏伊士运河彼岸占领的孤立地区距离本土有一百英里之遥，只能依靠继续保持高度动员状态才能守住。以色列需要减少战祸再起的危险。果尔达急于在她的新议会在一场可以预见的组阁斗争中吞没她之前完成这场谈判。萨达特急于抽出他的第三集团军，尤其是急于使埃及政策的方向来一个大转变。如果继续维持现状，军事行动必然会再次发生，其结果就会损害他精心策划的部署，他不愿冒这样的风险。以色列没有信心但抱有很大希望，埃及抱有很大的信心但只有较少的希望，两国都在摸索着走向和平。而且，萨达特在必要时总是采取戏剧性的行动，帮助把无关紧要的小事和重要的大事区分开来。

在叙利亚战线，既不存在着压力，也不存在着信念。叙利亚和以色列——以色列肯定是这样的——都认为军事局势还过得去。两国都不认为正在开始一项新的进程，更不用说不可逆转的进程了。尽管第三集团军处境不佳，埃及在苏伊士运河对岸仍然保持着五个师的兵力驻扎在实现脱离接触之后的新分界线沿线。但是，在阿萨德要求的深入戈兰高地腹地的那条分界线的沿线，或者

甚至在战前分界线后面的任何一条要求不高的分界线沿线，都没有叙利亚军队存在。阿萨德是要求在谈判桌上得到他在战场上没有得到的东西。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关于戈兰高地的脱离接触协议看起来很象是一场单方面的撤退，其目的是使阿萨德能够声称，叙利亚没有白打这一仗。对于这场偷袭的受害者说来，这并不是它迫切要求达到的目的。

埃以脱离接触协议使以色列仍然占领着西奈的大部分地区，以此作为在今后的和平谈判中讨价还价的筹码。但是，在叙利亚，如果以色列接受下列条件，即：它必须从一九六七年分界线往西作象征性的撤退——即使仅仅为了使叙利亚享受和埃及同等的待遇——那它就只能空着双手去参加日内瓦谈判了（因为几乎不能想象果尔达会放弃在戈兰高地上的以色列居民点）。

但是，对于叙利亚来说，它也必须改变根深蒂固的概念。对于它来说，愿意打破一代人的不承认原则，和自己憎恨的敌人进行谈判，是一件伤心的事情。即使是为了一项临时性的脱离接触协议在戈兰高地划一条分界线，也是几乎不能想象地给予以色列某种在那里呆下去的权利。即使是心照不宣地按照以色列居民点的存在来划定这条线，也是使任何叙利亚领导人都会深感痛苦的令人不安的退让。连限制军备也存在着心理上的问题。由于地理距离的关系，任何兵力限制区都离叙利亚太近，包括离大马士革太近。而且会造成叙利亚军队从某些战前阵地后撤的情况。

简言之，对于以色列和叙利亚来说，谈判都是令人恼火的事情。双方都产生过怀疑、沮丧，而且有时还由于无能为力而大动肝火。有一次在穿梭外交活动中，当我指出战略上的利害关系时，果尔达激动地回答说，她不愿意用以色列的牺牲去换取即使非常重要的美国目标。

正如我一再说明的，我们没有石油，我们也没有捣乱的本事。我们不能对美国说：“你们不为我们做这件事，我们就请葛罗米柯来。”他也不会来。而且我们也没有石油可以停产。我们除了求生存和不让别人杀害我们的人民的决心外一无所有……但是，我唯一不能同意的事情是——这样说可能不好听——以色列必须为所有这些付出代价。

果尔达认为“她所付出的”代价，正是阿萨德认为是“他的”领土。阿萨德过于莽撞，他不像果尔达那样能说那些富于哲理的话。但是在穿梭外交活动的后期，他也表示了类似的看法，认为脱离接触协议可能不符合阿拉伯国家的利益：“从阿拉伯国家的观点看来，脱离接触这一概念本身，就像把气球的气放掉一样，解除了阿拉伯人的戒备、决心和团结。”不幸的是，心理上的压力并不能保证产生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与此相反，任何方案的提出都要求双方具有相当的魄力，以致于双方都认为任何方案都不可能具有实质性内容。

这就使调解人的工作十分困难。调解人既是中保人，又是逢凶化吉的神灵。叙利亚参加谈判，为的是开始一个把以色列赶出戈兰高地的进程。而那些赞成在戈兰高地实现双方脱离接触的以色列人——只占微弱多数——则认为谈判是巩固以色列在那里的地位的办法。在早期的谈判过程中，这一距离是无法弥合的。任何可能达成的妥协必须来自最高层。

但是，人人又都需要使谈判看起来像正在取得进展。温和派的阿拉伯国家需要为解除石油禁运找到论据；叙利亚需要保持收复至少在十月战争中丧失的领土的可能性；以色列需要使它的战俘获释；而美国则需要和平进程中保持它的主导地位并在阿拉伯世界保持它日益增长的影响。动机各不相同，有时甚至是互不相容的，但是在事实上却凑合成一种复杂的自欺欺人的印象，而如

果不存在这种印象，真正的谈判是不可能举行的。

即使在穿梭外交尚未开始的时候，就发生过许多波折。四月二十七日，在我动身的前夕，又出现了另一个征兆。阿萨德突然声称存在着误解。阿萨德曾经授意西哈比对建立联合国缓冲区表示同意，但是现在他通知我，不必要同时建立兵力限制区——这点西哈比也曾表示过同意。但是，不能想象，以色列会容忍叙利亚军队的主力进驻以色列根据协议撤出的领土。这样，我就面临两种肯定会使谈判破裂的情况：如果以色列坚持它关于分界线的位置的观点，大马士革就会使谈判破裂；如果阿萨德坚持他后来对兵力限制区的看法，耶路撒冷就会使穿梭中断。

然而，事态发展并非如此。因为虽然两位领导人都表示存在怀疑，他们又都谨慎地留下了希望的余地。阿萨德和梅厄夫人尽管互不信任，却都在对自己的传统见解和自己同事的传统见解进行不寻常的斗争。在主要的会谈中，梅厄夫人总是由内阁主要成员陪同。阿萨德总是先听我谈，然后让我向他的主要顾问重复讲述相同的论点——也许为了避免让人家说他上当了。他们渐渐地弥合了开始谈判时存在于他们之间的鸿沟。在谈判结束时，这两位互不信任的领导人，尽管感到恼怒，存在着猜疑，却作出了许多微小的让步，共同写下了论述中东信念的历史的又一篇章。

黎巴嫩插曲

就他们自己来说，双方固有的迟疑不决和复杂心理就是个严重的问题。而且周围的环境还在继续威胁着他们所取得的不牢固的进展。四月十一日，从黎巴嫩渗透过来的巴勒斯坦游击队袭击了以色列的北方城镇谢莫纳镇，杀死了十八个居民，这些人全都是老百姓。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的几个村庄进行了空袭，因为他们怀

疑这些村庄里窝藏着恐怖分子。以后所发生的一些事件是现代联合国实践中所遇到的典型事例。激进的游击队员从一个邻国的庇护所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进攻这一事实，似乎正被这个世界性的组织里越来越多的成员国看成是正常的行动，言外之意是，这个被攻击的国家就无缘无故地被排除在国际法的保护之外。受害者的报复行动倒反要受到谴责。当受害者是一个像以色列这样的联合国会员国时，这种双重标准就是一种异乎寻常的伪善。但是这个世界性组织往往对这种情况熟视无睹，表决结果也是带有歧视性的。

现在联合国对这种恐怖主义和报复行动的恶性循环所采取的做法已经确立。黎巴嫩政府被迫（部分是由于受到激进分子的压力）要求安全理事会召开会议，而该理事会的每个成员国都要求通过一项决议，不是对发动进攻者，而是对以色列的报复行动进行谴责。我们对此进行了否决。这一次，安全理事会照老规矩办事，但是周围的环境却发生了变化，因为我们即将进行一次关于叙利亚问题的穿梭外交。我没有必要去招以色列的怨，因为以色列在谈判中得作出较大的让步。与此同时，我需要——或者说我认为我需要——得到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支持，去说服叙利亚放弃它的过分要求。温和派的阿拉伯国家则认为，美国的否决票严重地损害了他们敦请其他阿拉伯国家持克制态度的能力。黎巴嫩的外交部长，是一位持公正态度而又感到苦恼的政府代表，他处于不请而来的游击队和态度坚决的邻国的两面夹攻之中，左右为难，请求我们找到一条途径来确保黎巴嫩的领土完整，以免他的国家任人摆布。

作为一个总的前提，在这样的情况下，最好的办法是不使用花言巧语，而是开门见山，抓住问题的核心。说来也奇怪，在实际过程中，按正常规律办事是最明智的办法。一旦人们在冲突双方的压力下耍花招，实际上就是鼓励双方都走极端，因为每一方都处心

积虑地使“中间立场”尽可能向自己的主张靠拢。在这里，正确的办法是对双方都进行谴责，要不然就对哪一方也不责怪。一旦人们由于玩弄手腕而对这个简单的真理认识不清，他也就会出于一时的需要而丧失基本原则，在联合国的变幻莫测的表决程序中，情况就更是如此。在那里，抚慰性的空话诱使人们看不到下列事实，即：取得进展不在于以蛮横对待荒谬，而一定有其他标准。

这一次我们肯定背离了上述至理名言。会场上散发了一项“不结盟国家”决议草案，共有七段重要的内容，其中五段强烈谴责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进攻，没有一段是谈到恐怖分子袭击谢莫纳镇的。美国散发了一个对应案，对进攻谢莫纳镇以及以色列的报复行动均表示“遗憾”。没有人支持这个对应案。欧洲提出的“折衷方案”谴责“一切暴力行为”，但却挑出以色列对黎巴嫩进行报复性袭击一事特地加以指责。看来这一方案是此时此刻在各种针对我们的压力下的一种稳妥的中间立场，它使得我们能够发表一项单方面的声明，坚持把对谢莫纳镇的进攻，看成是应加以谴责的一项“暴力行为”。

我们非常希望能为即将开始的穿梭外交活动在阿拉伯世界中积累资本，便对这次的决议案投了赞成票。这是一项回避矛盾的决议案。不管这项决议案的措词多么巧妙，它还是对进攻以色列的村庄和以色列的报复行动在道义上加以区别。决议对前者作了空泛的影射，而对后者的指责却十分明确。以色列对此很感恼怒，而他们的恼怒是有道理的。可是决议草案得到的支持压倒了以色列的抗议。实际上他们所看到的是一项不明智的策略性行动，而不是象他们所叫嚷的那样，是我们改变了政策。但是，这一种行动却加深了以色列受包围和不安全的感觉。

穿梭外交开始：分界线

穿梭外交开始时，我怀着一种喜悦的心情。这是南希陪同我一道出国的第一次外交旅行。她的安详和善意使得每个人的生活感到愉快，她的温和作风也对我起了作用。尽管我们的东道主招待殷勤，她还是陪我受了紧张劳累之苦，具体的证明是她得了两处溃疡，这使她在访问结束后住了两个星期的医院。

我是带着我的通常的中东助手班子一道出访的，他们是：乔·西斯科、罗伊·艾瑟顿、哈尔·桑德斯和彼德·罗德曼。罗伯特·麦克洛斯基跟随我作顾问并兼作对新闻界的主要发言人，和他一道来的还有国务院新闻秘书罗伯特·安德森。曾在西贡担任大使的坚强的埃尔斯沃思·邦克，过去自始至终伴随我和越南人进行和平谈判，这次他又以美国出席处于休会状态的日内瓦会议的“常驻代表”的资格，随同我一道来叙利亚进行穿梭外交活动。参加这次活动的还有十四名新闻记者。他们自始至终和我同乘一架飞机，来往于大马士革和耶路撒冷之间，并在中东各地作短途旅行。即使我想避开一下和外界的接触，希望新闻界让一个国务卿能有几天不受监视，也是不可想象的事——这指的是在最后几个星期——更不用说是在水门事件的高潮时期了。

头几站的旅行是成功的。我于四月二十八日至二十九日在日内瓦和葛罗米柯会晤。我们像往常一样，先互相摸摸底。苏联希望参加一次他们不能作出任何贡献的谈判，而会谈的各方又都无意要它参加。葛罗米柯按老办法行事，这在我看来只会使苏联丢脸而不会对它有什么好处。他再一次迫切希望我在大马士革和他举行一次象征性的会晤。他坚决表示，不管我意下如何，他都要出现在大马士革。我回避了他的这个建议。事后，我把葛罗米柯的计

划告诉了阿萨德，而且还加上了一句不言自明的话：对于一位苏联外交部长访问一个友好国家的首都，我不能表示反对——只要他的计划里不包含要我和他会晤的内容。

我的自信到了矜持自大的程度。我对葛罗米柯说，我希望在五月九日或十日达成协议。他对此没有提出质疑。他也没有对我提出的看法表示异议——我的看法是，主要问题是要以色列退回到战前的分界线，或许比一九六七年还要再多退回几公里。看来葛罗米柯对于苏联的利益所在有点儿自相矛盾。因为埃及和我们两方面都坚持要以实现叙利亚以色列脱离接触作为重新召开日内瓦会议的条件。

会谈结束时发表了一项公报，这项公报成功地经受了美苏关于中东问题对话的首次考验：苏联对它感到不满足，以色列和埃及感到已经到了可以容忍的极限（叙利亚没有表态）；

外交部和国务卿就中东问题谈判的现状、以及谈判的下一阶段问题交换了意见。双方同意运用各自的影响以求取得一项积极的结果，并且将继续保持密切的联系，以便同心协力求得这个地区的一项和平解决方案。双方表示赞同尽早恢复召开关于中东问题的日内瓦和平会议。

四月二十九日星期一，我在阿尔及尔住了一夜，谋求布迈丁出面对阿萨德施加影响。我在两个多星期之前当他在华盛顿拜会尼克松时曾见过他。和当时一样，他赞成戈兰高地脱离接触，但同时却坚持他那一贯的论点，认为这只是走向使叙利亚恢复一九六七年以前边界线的第一步。他说，他对于我们的斡旋将给予支持。这就给了我们以希望，他可能促使叙利亚趋于妥协。

尽管布迈丁把自己看成是激进派，但在苏联人看来是不顶用的。他听说葛罗米柯要到中东来。我说我不会在一个阿拉伯国家

的首都和他会晤：“我不想这样做，因为我不想给人以这样的印象，他和我正在支配着阿拉伯国家。”布迈丁同意这种说法，认为这将会留下一个很坏的印象，而且对于叙利亚人也没有什么好处。甚至阿萨德对于葛罗米柯坚持要在大马士革和我会见也感到为难。布迈丁认为，在日内瓦开会就行了。应他的询问，我把我对苏联人的估价坦率地告诉了他。

总统先生，我想坦率地对你说，我首先把我的估价告诉你。你曾经见过他们，你会有自己的看法。他们的目光是短浅的。他们官僚主义严重，受他们国内政争影响很深。他们准备为表面文章而不是为实际问题付出很高的代价。他们依靠恫吓，但又不愿意冒很大的风险。因此，当恫吓失败时，他们就立即退缩。这就是我对他们的总评价……

另一方面，如果发生战争，他们又担心叙利亚会失败，因为这可能迫使他们作出他们原本不打算作的决定，并使他们陷入他们所不希望的冲突中去。因此，他们的政策是自相矛盾的。他们的确不希望我成功，但又害怕我失败。

布迈丁有他自己类似的经验：

苏联人是难以理解的。我们和他们有长期的交往关系，这可以追溯到一九六三年。尽管如此，我的确认为，他们的立场往往具有犹豫不决的特征……

例如，萨达特要求武器，他在十月战争之前就特别强调这一点。他们送了武器给他，但在数量上和品种上都没有满足他的要求。在战争进行期间，他们才被迫把萨达特所要求的武器运交给他。

但是，总的来说，他们有一个界限，我把它称之为红线。他们不会越过这条红线。这条红线是划在他们和美国之间的。

布迈丁的分析反映了苏联在中东进退两难的境地。他们很想

浑水摸鱼，但他们又不愿意冒很大的风险。他们希望不费力气和周折就取得成功的果实。他们的力量并不在于有什么宏谋大略，而是利用他们敌手的混乱状态。他们不希望和美国摊牌。因此，假如我们态度坚决，他们的扩张主义就会有界限；如果我们具有远见卓识，就会有一个和平共处的机会。

访问阿尔及尔之后，我没有直接飞往正在谈判中的两个主要国家的首都。相反地，我到亚历山大去和埃及总统协调我们的战略。萨达特为我们提供一切方便。他把沿海滨的萨法官交给我们使用，还派了服装鲜艳的仪仗队陪伴我们。我们参观了刚发掘出来的罗马时代的竞技场，竞技场四周，手持长矛的埃及骑士形成了一个极富有戏剧性的背景。萨达特和法赫米坚持要我在这次穿梭外交活动中实现叙利亚以色列脱离接触这个任务。如果我没有完成此项任务就返回美国，叙利亚就有可能向安全理事会提出呼吁，使苏联在谈判中重新担任主要角色。这样一来，问题就会转到阿拉伯首脑会议去，我们很快就会失去对局势的控制。我们的埃及东道主是热情的；他们认为没有必要采取上述紧急措施。他们答应支持任何一项和埃以脱离接触方案相类似的方案，即：把一九七三年以色列占领的突出部分和一九六七年以色列占领的几公里土地归还给叙利亚（包括库奈特拉镇）。但是，埃及人没有对我们说明，如何让以色列接受这样的建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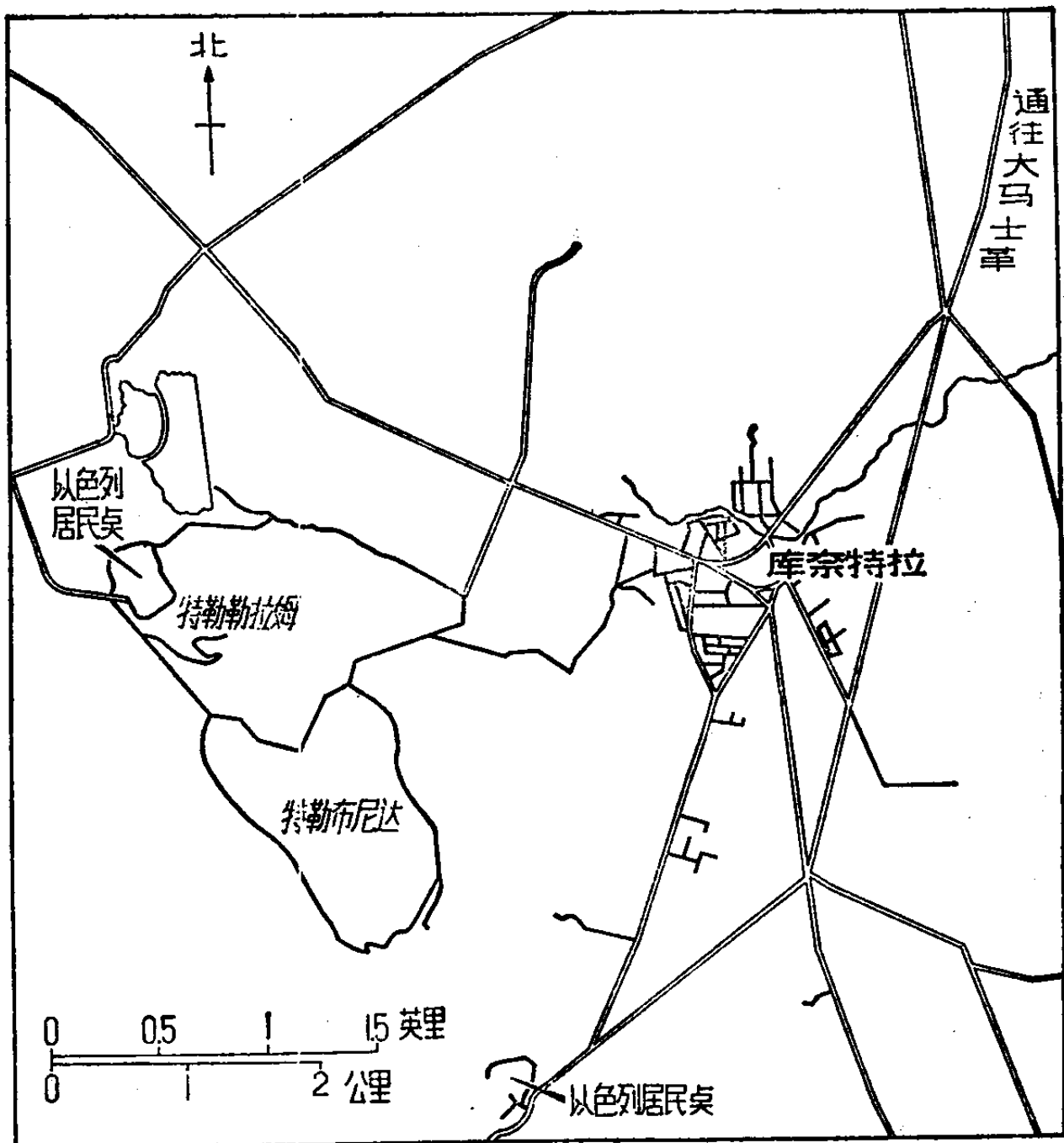
在以后的几个星期里，无论我是醒着还是在梦中（或者在梦魇中），库奈特拉无时无刻不萦绕在我的脑海之中。在一九六七年战争以前，这个城镇是戈兰高地的首府，是一座满是尘埃的小市镇，大约有不到二万名店员、农民和职员聚居在戈兰山脚下。一个月来，它成为中东外交的焦点。它之所以有资格扮演这个角色，是因为它位于一九六七年以色列占领线三公里的地方。在一九六七年战争中，它首次受到严重的破坏。其后在一九七三年战争中再次

遭到破坏。在一九七三年战争以后，以色列毫无道理地进一步用推土机将它夷为平地。

它具备作为双方精神上的象征的一切必要条件。以色列人从来没有在那里定居过；最邻近的以色列定居点是在远处的一个山坡上，另一个定居点离这个市镇的西面还有四公里。然而，附近的以色列定居点的一些农田离这个市镇只有几百公尺远。这个小市镇西面的几个小山丘构成了有利的制高点（和战略位置），这就使得在这块争夺得很激烈的地区划一条分界线的工作变得复杂起来。对于双方来说，库奈特拉并不是一个战略要地，而只是一个奖品、战利品和一个象征，所以彼此益发争得厉害，能否安排好这个市镇的命运，将决定谈判的成败。

在很多情况下，谈判往往取决于谈判者的耐力，这次尤为如此。因为在那个时刻，我的最后靠山——总统——正面临水门事件的高潮。四月三十日，在华盛顿，白宫公布了大量的椭圆形办公室关于水门事件的录音带。这种异乎寻常的卑躬屈膝的姿态是为了说明，总统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东西，录音带表明没有做错什么事。这种做法也是为了对特别检察官或众议院的司法委员会提出的甚至更为广泛的索取录音带的要求来一个先发制人。但结果却适得其反。那些生硬的、无情的、有时是粗俗的对话，其内容和语言上的粗鲁，使公众为之震惊。宾夕法尼亚州参议员、参议院共和党少数派领袖休·斯科特把这些对话称之为“令人作呕的”。新闻界也很少谈其他事。我在谈判中失去了一位有权威的总统为我撑腰。

我于五月二日星期四抵达以色列，这个国家这时正乱成一团。在一月份，我被当作一位和平使者受到热烈欢迎。三个月以后，标语牌上却用阿拉伯文写着我的名字——好象我已成了阿拉伯国家的代表——来欢迎我。贝京的利库德党在大街上组织了示威游



库奈特拉及其郊区

行，他们在果尔达·梅厄住所的大街上设置了路障，所以我们往往只好在总理办公室会谈。辱骂我的是以色列少数派，大部分的以色列人既渴望和平，又渴望自己领土的实际安全，在向往和忧惧之间无所适从。以色列人这种精神上的混乱，在戴维国王饭店（我的代表团下榻之处）的按摩师身上具体表现出来了，他使足了劲猛烈地给我按摩，这种行为与他的善意是不相一致的。他承认，他在为我的成功祈祷，对我寄以深情厚望，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指望着我。

我问他，在戈兰高地可以放弃多少公里而仍然算是安全的呢？这时他停下了手，我算喘了口气。“放弃？多少公里？戈兰高地？你一定是疯了！”这个折腾人的按摩师吼道，接着又以加倍的力气给我按摩起来。

我们在联合国的投票引起了人们极大的怨恨。人们把这看成是美国可能要改变政策的预兆；更为严重的是，人们把这看成是以色列在道义上遭到的孤立。当我们开始谈判时，紧张的气氛更为具体地集中到一点上来。梅厄总理和她的同僚很清楚地知道，在我心目中要取得谈判成功最起码的让步是什么。我于二月二十九日将此事告诉过达扬，又于四月写信给果尔达，我对迪尼茨也说过不知多少遍。尽管如此，这都没有使我的以色列对手的态度有什么显著的软化。他们所关心的是原则，而不是具体条件。叙利亚发动了一场战争，其结果是失去了土地，为什么它反倒应该得到一条比发动战争之前更为有利的分界线呢？果尔达的反应是很强烈的：

不管你怎么逼我，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向我的人民交待和解释，别的就不说了，毕竟发生过一场战争，接着又发生了第二场战争，死了很多人，伤的也不少，但是我们不得不放弃已占领的叙利亚土地。这是为什么？因为阿萨德说，这是他的领土……我永远也不能同意，进攻者和被进攻者之间竟没有区别；我决不能同意……使我们害怕的不是贝京，也不是沙龙，而是我自己。我不能不经常想起，我们在七年中打了两场战争，并为此付出了代价。现在，阿萨德说，他必须收复他的领土。我说这真是厚颜无耻到了极点。这怎么可能呢？如果我们的邻国可以发动战争而不受到任何损失，这不等于是在鼓励它继续打下去吗？

如果阿萨德在场，他会回答说，果尔达不能把这部分领土看成

是叙利亚的领土，这是问题的症结所在。除了继续为领土而战外，他看不出有别的选择。从历史上说，他认为这部分领土是属于叙利亚的。他感到，甚至同意划一条临时停火线，也已作了很大的让步了。

但是，我的任务是充当调解人，而不是去重复双方的分歧点。以色列长期以来的观点实际上是把事情看得过于严重了。它只有一个盟友，没有任何一个别的主权国家象它这样孤单。虽然它是一场准军事进攻的受害者，它还要忍受世界舆论的责骂。它的邻国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向它提出更多的要求，而且，正如果尔达一贯不厌其烦地指出的，导致目前提出让步要求的同一论据将会产生新的压力。几乎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忍受这种精神上的折磨。以色列的态度虽然蛮横，但它的理由还是充足的。这是由于犹太人一直怀有的预感，即：到头来，它将成为恶劣环境的受害者。

我对果尔达的看法深表同情；我理解她的预感。可是我的责任是执行我从清醒的分析中制订的最佳政策，我既不能受制于失望，也不能受制于委曲。我的责任是向以色列指出它的地理政治上的需要。以色列的心情可能是沉重的，但它需要有清醒的头脑和冷静的判断。因此我在以色列的会谈实际上是作了一系列的讲演；与其说是进行外交谈判，还不如说是举行了一次国际关系哲学的讨论会。

我的一向看法是，不管以色列怎么做，它的处境是令人担心的，但并不是没有希望的。依靠纪律和信念，它能够夺回一点主动权。维持现状必然遭致灾难。

后来有人声称，我的谈判策略是，对双方都说些他们乐意听的话。这是对外交的一种肤浅看法；这断然不是我的方法。在谈判中人们只能假设，谈判的对手具有相当的理解力，要想长期欺骗他（或她）是不可能的。最后他（或她）一定会发现事实真像。如果他

上当受骗了，彼此的信任基础将荡然无存。由于在执行外交政策过程中，我们要和同一个人一次又一次地打交道，失去信任就会成为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

这种说法还错误地认为，我犯了一个谈判者可能犯的最严重的错误，即：认为和他打交道的那些国家并不互通情况，在阿拉伯世界中更是如此。即使是彼此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其官员对于对方的公开言论和新闻也是时刻注意的，而且还通过情报手段深入了解对方的决定。要想两面三刀而又保持信任，那是不可能的事。一旦失去信任，那就不可能再挽回了——而如果没有信任，谈判就成了粗暴的实力较量。

作为一个调解人，我尽可能做到了了解两方面的真正目标，因为官方的正式立场往往反映了国内的或官场的需要，而不是信念。我总是在早期阶段以几乎同样的措词将我想追求的目标告诉对方。这既是一个切实可行的决定，同样也是一个符合道德的决定，因为，除此而外，我怎么能把他们带向这些目标呢？当然，这不排除我以不同的论据向每方解释，为什么这个最终目标符合它的利益。但是，这是反映现实的。归根结蒂，如果双方的目的不是各不相同，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互不相容，争吵就不会发生了。只有双方能亲眼看到某些符合他们的利益的好处时，才能达成一项协议，而这些好处又与利益不尽相同。只有外行才会认为，为一方谋取单方面的利益是可以办得到的。即使这是可以办得到的话，这样一种协议也不会维持多久。一个持这种信念办事的调解人很快就会失去其中一方的信任，从而也失去了他能起作用的先决条件。调解的任务就是去发现，为什么一个双方都同意的目标能够在动机不同的情况下成为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

我为什么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向以色列解释国际环境上——特别是在穿梭外交早期的日子里——其道理就在这里；只有理解环

境，具体的解决方案才有意义。下面几段话是我在那个月中在以色列的各种场合讲话中的摘录：

如果这次谈判失败，如果我们不能为实现脱离接触找到一项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我想我们必须承认，美国在和平努力中的主导作用也就告终了……我们对(阿拉伯人)所提出的论点是，我们的承诺不多，但是至少可以取得一点进展，这比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总要略胜一筹。依我看来，最后是会取得成果的。

……我认为，重要的是应该懂得，谈判失败的严重性关系到外交方面所出现的情况，关系到军事方面所出现的情况，以及关系到美国方面所出现的情况。(五月二日)

目前在美国，有一种奇特的混杂情况，反尼克松分子、杰克逊分子、反缓和分子、保守分子，他们全都汇集到一起。因此，在今后大约半年时间里，你在美国可以放心大胆去想象一些事，只要不为这些事付出什么代价，或者不冒什么风险就行。我在美国处理过多次危机，我知道……。而那些莽汉们却不懂得如何去应付危机，他们所知道的一切就是如何装腔作势；而到了光靠言词不起作用时，他们就不那么强硬了。这就是我正在做的恶梦。(五月四日)

现在，下一个问题是：我们正在讨论的方案对于以色列可能会有帮助还是会有损害呢？一项脱离接触协定，甚至包括拉宾和佩雷斯所提到的一切危险，是对以色列有利还是不利呢？我认为，即使他们所提到的每项推断都是正确的，总的来说，对以色列还是有帮助的。因为它使美国站到了外交的最前线，因为它使得事情更容易与日内瓦会议脱钩，因为它会使叙利亚前线平静下来。而且使埃及目前的方针得以继续下去……。

当前形势的实质是，美国能否长期有效地支持以色列的立场？我认为，我们不能支持一种由于美国公民不能理解的问题而遭到破裂的谈判，从而导致石油禁运，导致一系列的经常性危机，而且可能导致战争。如果我们这样

做，将会导致美籍犹太人方面的巨大压力。但是我要提请你们注意处理危机和高谈阔论之间的区别。人们可以高谈阔论，但处理起危机来却又逐渐丢失掉一切。高谈阔论者可以继续大放厥词，甚至态度强硬，而到头来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五月五日）

当我们承担了义务来保卫你们，而你们也下定决心要生存下去时，我们要对下列因素作出估价，这是人们都能理解的事。这些重要因素是：苏联的作用；阿拉伯人的作用；欧洲人的作用；中东地区的军备竞赛问题，以及可以想象到的一个问题，即：美国如何以并不僵硬的方式运用其经济的、政治的和军事力量；还有，如何处理危机。临时凑合地处理这些事情，或等待事态突然爆发，那是完全不负责任的态度。（五月十四日）

五月二日，这是我到达以色列的第二天，我与果尔达以及她的同事们举行了分组会谈，从下午十二点十五分一直谈到凌晨一点三十分，中间只有很短暂的休息。形式上，以色列坚持达扬方案的立场。但是我可以感觉出，他们正在重新审议这个方案。我并没有说服以色列谈判小组同意他们所不熟悉的观点，我只是为他们提供一个借口，以修改出于国内政治考虑而提出的方案。即使以色列谈判小组的许多成员还不准备接受我的意见，他们也已经知道他们的方案是不能实现的。深夜时分，达扬交出了一份“个人”设想：以色列的分界线可以往西推移一点（办法是扩大联合国缓冲地带），以便把库奈特拉的东部交给叙利亚；而以色列将保有库奈特拉的西部。叙利亚决不会同意分割库奈特拉。而且从以色列的观点来说，除了出于国内政治上的考虑外，这样做也是毫无意义的。但重要的不在这些。重要的是达扬的“个人”设想表明，以色列在精神上已经决定破釜沉舟，至少是在考虑撤退到战争以前的分界线。

显然，以色列走向谈判成功的道路是痛苦而漫长的。而尽管

以色列的谈判方式令人恼怒，但是，要求以色列俯首贴耳并不符合我们的利益。因为我曾经说过，一旦事实证明，我们要以色列干什么它就干什么，阿拉伯人的要求就会升级。这时，我们就会为了以色列不能满足阿拉伯人的条件而受到责备，而这种条件却由于容易得到满足而变得越来越苛刻了。我们的战略基础是，我们是唯一能使以色列作出让步的国家，而且我们是在人们都认为这是一个困难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的。毫无疑问，以色列人对于第二项内容比对于第一项内容，具有更强烈的意愿。

因此，我决定重新采取上一次旅行时的手法。我将不带一个肯定的方案到大马士革去，而只是去探讨一些次要问题，以便让以色列有更多的时间重新对问题作出估价。这样，我将会在叙利亚首都一开始就受到一次愉快的接待，但是，我相信，如果我们所采取的办法是强行提出条件，我们就会把一场阿拉伯—以色列冲突，变成一场阿拉伯—美国的冲突。从大马士革出发，我将到亚历山大去，以便动员阿拉伯人作出力所能及的努力，来支持我的战略，然后再返回以色列。我已经进入穿梭外交的第六天。在埃以脱离接触的谈判中，在这个相类似的阶段，我们已经取得了突破，已经澄清了一些技术性的问题。在我这次盼望已久的叙利亚穿梭外交的伊始，我甚至还没有向大马士革提出初步方案。

这是一种很奇特的情况。迄今为止，会谈只是在我与以色列之间进行的。几个星期以来，以色列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全都是不能接受的，不但阿萨德，而且几乎是所有的阿拉伯国家都是这样对我说的。我把这些建议转达给叙利亚，有时是通过其他阿拉伯国家转达的。但是在转达时，不是作为方案，而是作为对以色列设想的“说明”，作为困难问题的举例，作为典型；总之，这不是作为正式方案。因此，阿萨德还没有机会拒绝任何具体方案，也还没有涉及到他的威望。我认为，最好是把这留待双方立场比较接近的时

候再谈。出于同样的原因，在以色列，我也从来没有把叙利亚最初的方针提出来过，而只是对阿萨德的设想作些说明。严格说来，我这次旅行不是充当调解人，而是充当交换行情的一个顾问，一个论述国际秩序结构的哲学家，一个了解邻国情况的政治和心理顾问，这个邻国神秘莫测，犹如外层空间的来客。

阿萨德早在两个多月以前就把以色列战俘的名单交给了我，因为我答应他把以色列的方案带回作为回报。现在，值此穿梭外交开始阶段，我还是避而不谈分界线位置这个关键问题；我希望首先谈一些次要问题，以期叙利亚对这些问题的灵活性会促使以色列更容易地把分界线往后撤。

五月三日星期五，当我在叙利亚开始进行谈判时，我在从机场到大马士革的车子上就深切地感到，双方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如果果尔达认为放弃任何一寸领土就是对以色列安全的威胁，而且是对叙利亚的纵容，那么陪同我进大马士革的叙利亚外交部长哈达姆也以同等的激情认为，叙利亚重新获得它认为应该属于自己的领土并不是一种恩赐，而是一种权利，或者是一种责任。

哈达姆：以色列人民二十五年来遭到围困，而且生活在惶惶不安的灰暗环境中，难道他们不希望和平吗？

基辛格：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是如此。但是，由于他们被围困的时间太长，所以他们很难接受和平思想。特别是他们对叙利亚有一种变态心理，他们的印象是，你们很蛮悍。我对他们说，情况刚好相反——你们非常文雅，很容易相处，好讲话得很。（大笑）

哈达姆：难道他们真的认为，当他们还占领着我们的领土时，我们会对他们宽厚吗？

大马士革没有豪华的设备来款待外宾。因此哈达姆就为我在

东方俱乐部——叙利亚的知名人士经常光顾的餐馆和社交俱乐部——安排了一次午宴，以便和叙利亚的部长们见面；这种姿态并不是没有意义的。生性傲慢的叙利亚人不愿与他们认为注定要失败的冒险行为、或者不得人心的事业发生联系，以免损害他们在国内中的地位。

午宴是在非常亲切的气氛中进行的。但是后来在阿萨德会议室的气氛很快就变得不那么友好了——尽管在当时和以后阿萨德都没有失去他个人的礼仪。幸好葛罗米柯成了我们开始谈话的话题。他已经宣布自五月五日起在大马士革停留两天，对此东道主叙利亚人感到不快，因为他们认为，这将妨碍我的穿梭外交。同时多勃雷宁曾向斯考克罗夫特提出，要在大马士革安排葛罗米柯和我举行一次会谈。我再次拒绝在大马士革会晤，并建议塞浦路斯为会谈地点。我选择了五月七日，为的是能给以色列内阁以更多的时间来考虑问题。当然这也给了我一个借口来放慢事情的进程，因为我不想让葛罗米柯对谈判中双方提出的初步主张施加影响。此时，我通知阿萨德说，我在五月八日之前将不返回大马士革，或者是说，要等葛罗米柯离开这个地区之后才返回——以使叙利亚人缩短他的这次访问。因此，真正的谈判将在穿梭外交的第十一天才开始——这还是假定到那时双方的立场已经靠拢到能把他们的主张当作正式方案提出来的程度。

研究史实记录的历史学家将会得出结论：尽管时间已经拖得比较长，但阿萨德和我在那天下午还是尽了最大的努力来避免进入正题。阿萨德有一种天赋，他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能够连续不停地谈一些无关宏旨的枝节问题。我们取笑葛罗米柯。阿萨德对我谈起关于由《时代》杂志主办的一批企业界领袖访问的事。为了回答他提出的尖锐问题，我便像往常一样给他上辅导课，大谈以色列国内政治。但所有这些闲扯都是为了改善会谈气氛，表达善意，

含有可能取得进展的意思。当我揭开达扬方案的面纱时——不是作为一项建议，而是作为以色列内阁正在考虑过程中的一个方案——他的态度就变得严肃起来。（正如我在后来对萨达特所说的，我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达扬方案距现实目标太远，先把它提了出来可以使以后以色列提出的任何修改意见看来都是可取的。）

我的说明丝毫没有平息阿萨德的气愤。这个方案是“带侮辱性的”，这使他感到“紧张和激动”；这证明以色列所想的不是和平而是征服。为了表明在一场看谁强硬的竞赛中叙利亚人并非生手，阿萨德重申希哈比送交华盛顿的那个方案，要求以色列从战前戈兰高地撤出一半以上的土地：“如果我提出的分界线不能被接受，我们就不能达成一项协议……我们的这条分界线是没有讨价还价余地的……比我们所规定的分界线少一公尺，我们都不打算接受。”正如以色列不会坚持达扬方案一样，叙利亚也不会坚持上述主张。双方都走得太远了，没有作出认真的努力来消除他们的分歧。

出于谨慎的考虑，我决定转而谈次要问题。我们在这方面取得了较为满意的成果。阿萨德同意对以色列占领的孤立地区减少炮击，而且当我还留在这里时，也不作试探性的空袭。他接受了关于在联合国监视下的非军事化缓冲地区的原则，这一原则是参照关于埃及的协议制订的。他同意交换战俘。关于限制武器地区问题，阿萨德没有表态。非军事化问题在戈兰高地比起西奈半岛来说，是更为棘手的问题。因为原先设想叙利亚平民能够回到以色列所撤离的整个地区（包括联合国地区）；而叙利亚并不愿意让这些平民处于没有防卫力量的情况下。五月四日星期二早晨，我在乘车前往机场的途中再次向哈达姆提出了这个问题。那天下午，阿萨德往亚历山大给我送去了一封信，说明叙利亚“不赞成”这个限制武器的设想。“不赞成”这个词显然要比拒绝轻一些，但也

不是表示赞成。

阿萨德的一位助手告诉托姆·斯科特说，我从以色列没有带回“任何东西”，他说得八九不离十。他补充说，叙利亚的领导人都感到“失望、惊异和沮丧”。会谈花了六个小时只达到这个深度。显然，未来的会谈将会是马拉松式的。

我决定去动员其他阿拉伯国家来支持一项妥协方案。这个方案在目前的主要特点是，双方都看不清问题的实质，也不赞同它。五月四日，我回到亚历山大，和萨达特一道重新研究一下埃及所能支持的主张。萨达特尖锐地指出了问题的实质所在：能否让阿萨德收复十月六日分界线以外的几公里来保全面子呢？我让哈尔·桑德斯解释了一下当地的地形——在分界线以西三公里的小山，正好控制着北方和南方的两座小山，所有这些地方都是以色列视为最可宝贵的战略要地。萨达特回答说：

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但是应该从政治方面而不是单纯从军事方面来加以解决。这对他们有利，而且对我们也是有利的。战争应该停下来。双方都有大量的伤亡。与此同时，苏联人也在阴谋煽动双方采取极端立场。以色列存在国内问题，他们需要安定。需要有个喘息的机会来整理一下他们的国内事务。我自己也需要有一个喘息的机会来为下一步作准备。难道他们不懂得这个道理吗？阿萨德正在阿拉伯世界里处处和我为难。他们对此应该有个了解。这对他们是有利的，百分之百的有利。我们不打算去收回他们的居民点，但我们说，从心理角度来看，他们（叙利亚人）必须取得十月六日分界线以外的一些土地。到底取得哪些，我们可以讨论。这必须包括库奈特拉。我可以向整个阿拉伯世界兜售这个方案，并为哈菲兹·阿萨德保全面子。

萨达特又补充说：

让我们首先把整个孤立地区交还给叙利亚，同时要以色列从十月六日分界线以外再让出一些地方，包括库奈特拉。这纯粹是个心理上的问题。像这样的方案我能够百分之百地加以支持，甚至在阿拉伯世界也会得到支持。

当然，麻烦的问题是，以色列全都不同意——甚至从整个孤立地区完全撤退也不会同意。我们是在为了一项尚未出笼而且阿萨德可能会拒绝的以色列方案纠合阿拉伯国家对叙利亚施加压力，以迫使阿萨德同意。萨达特建议，由他的心腹助手阿什夫·马尔万同桑德斯一道，立即去沙特阿拉伯和阿尔及利亚谋求他们的支持。

五月四日下午，在马尔万和桑德斯抵达后的一小时之内，他们就得到费萨尔国王的接见。这从礼宾规格来说是破格的；费萨尔国王甚至还很愿意听取美国和埃及联合采取的主张。我授意桑德斯只向费萨尔国王介绍情况，但不要提任何具体要求。费萨尔国王应该知道怎么办——如果他的确想采取行动的话。费萨尔还是像以往那样模棱两可，谈话谨慎，但奇怪的是，他采取支持的态度。他对于妥协方案并不反对，但也不明确表示赞同。他以模棱两可的态度说，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有必要，我们可以指望他对埃及和叙利亚的支援。

第二天，萨卡夫按照惯例前来阐明了费萨尔国王讲话的含义。由于萨卡夫有拉沙德·法拉翁（他要算是费萨尔国王最亲密的顾问，而且是个叙利亚人）的陪同，这就使得他讲话特别有力量。他可能和大马士革没有联系，虽然我猜想他是有联系的。但是他肯定已灵敏地感觉到了那里所许可的交易。法拉翁说，如果以色列撤离库奈特拉，并由叙利亚人来接管，他认为，沙特阿拉伯和阿尔及利亚将会支持这个良好的协议。这时，我已经懂得了不少阿拉伯人的思想方法，我知道，沙特国王的顾问所“想办”的事情，一定

是他有把握的事情。

桑德斯和马尔万接着便到阿尔及利亚去。布迈丁是个小心谨慎的人。他说，以色列斤斤计较一两公里，这引起人们对它的最终目标的怀疑。然而，他认为，作为一般的原则，阿萨德必须取得像萨达特所取得的类似的好处——换句话说，即超过战前分界线的一小片土地。他祝愿我一切顺利；他不会做任何使得我的任务复杂化的事。马尔万后来又单独访问了科威特，那里的反应也是积极的。

我们已经尽可能多地争取到了阿拉伯国家的支持。事实上，这样多的阿拉伯国家领导人来支持一个尚未得到叙利亚认可的方案，是件了不起的事情。这次阿拉伯之行也有助于使阿萨德了解我的想法。我深信，所有和我商量过的阿拉伯领导人都会向大马士革报信，他们是不会使自己吃亏的。

但是，我们手中仍然没有一个以色列方案。我从埃及回到以色列，这里正被游行示威弄得惶惶不安。我们举行了漫长的会谈（五月四日星期六，从晚上八点十五分开到凌晨一点十五分，第二天星期日从上午十点十五分开到下午一点三十分），一起回顾了我们的处境。我将所有阿拉伯国家的反应，逐一向他们作了汇报，并强调指出，以色列的第一个方案决不会被接受。即使阿萨德愿意这样做，他也不能置其他阿拉伯国家领导人的意见于不顾。达扬的“个人”建议是把库奈特拉分成两部分，由以色列和叙利亚各占一部分，这个建议更加危险。它带有侮辱性，更加伤人。

我重申我们面临下列问题：第一，达成一项协议。第二，如果不能达成一项协议，那也宁愿让谈判为了分界线以外的问题而陷于破裂，即：兵力限制区、联合国紧急部队的地位，以及一些不致于引起原则争论的技术性问题。第三，如果谈判为了分界线问题而陷于破裂，那么破裂的方式也应该能够避免

引起阿拉伯世界、苏联和西欧的一致反对。

果尔达是个坚强不屈的人。她是不赞成从库奈特拉撤退的，她认为叙利亚在战争中被打败之后无权取得土地。“因此，我们（实际上）送交内阁的建议，是不把库奈特拉拱手让给叙利亚”。内阁将采取的正式立场不会超过达扬方案，即：库奈特拉东部的三分之一归叙利亚，西部的三分之二归以色列。我们陷于争论之中。然而，由于以色列同意把这个城镇分割成为两部分，这就突破了战前的分界线。为了库奈特拉几条街道的地盘而争论不休，就会冒使整个循序渐进的进程遭到破坏的危险，这是件毫无意义的事情。果尔达很可能想要试探一下我的本领，以便向她的内阁（也许还向她自己）证明以色列的方案不会落空。因此我便正式要求重新加以考虑。为了让内阁有一个思考的机会，我便离开这里前往安曼。穿梭外交已经进行了一个多星期，这时我只访问过一次大马士革。

我于五月五日在安曼停留了一夜，侯赛因帮了我很大的忙。他没有向我施加压力。和他的阿拉伯兄弟一样，他同意我们总的战略思想。和他们的不同之处是，他认为他对大马士革所起的作用不大。侯赛因认为，到最后，阿萨德肯定会接受我们所冀求的事情，即：实际上对战前的分界线再加上库奈特拉作很小的调整。如果达成了协议，这就有可能使阿萨德改变叙利亚的激进路线。至于约旦以色列脱离接触问题，我答应等到叙利亚以色列实现脱离接触，以及国内的弹劾问题过去之后，再谈西岸问题，我希望就在这年的夏天。

当我于五月六日晚间回到耶路撒冷时，我发现以色列内阁已经作了新的修改。以色列繁琐的程序、没完没了的会议、旁敲侧击地抱怨受胁迫、犹太法典的字斟句酌，以及与我们交谈人员流露出来的明显的恼怒情绪，所有这种种情况造成了一种气氛，使人心中

产生一种无名之火，却又由于目睹一个民族把自己的灵魂暴露无遗而感到难以言状的激动。这种气氛遮盖了下列这样一个事实，即：以色列内阁正在以一种爬行的速度，以对它的声誉毫无好处的方式，努力克服梦魇，从而掌握自己的前途。在新的方案中，以色列从东库奈特拉撤退一点，已成正式政府立场。更为重要的是，以色列的防线将转移到十月六日分界线的后面、库奈特拉以西的地方。但是，以色列的国内政治不允许它作巨大的让步。与这个方案相结合的是一项复杂的建议，根据这个建议，库奈特拉将仍然被分为两部分：叙利亚管辖库奈特拉的东部，一个联合国和以色列的混合小组管辖中部，而以色列的居民则允许在西部的郊区居住。（制订这一方案的理由——除了以色列的国内政治因素外——想必是要防止叙利亚在太靠近以色列农场的这个市镇重新定居下来。）这是一个荒谬的想法，特别是对于这样一个小市镇来说。象柏林这样一个世界性大城市所受到的折磨——在市中心筑了一堵城墙——在一个小小的乡间市镇中一定甚至更难以容忍。另一方面，在我看来，以色列新的立场标志着一个阶段的到来，在这个阶段里，以色列的领袖们已逐渐认识到：时间可能对他们有利，值得用戈兰高地上的几公里去换取。以色列内阁对这个问题有所了解，可以从下列事实看出来：它正在考虑就南部的战前分界线作一些有益的调整。

因此，我认为，事情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但是，我请求以色列再重新考虑一下，因为我于次日要在塞浦路斯会见葛罗米柯，而我希望能对他说，以色列还没有形成正式的立场。我并不认为现在的方案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在外交上，取得初步进展是至关重要的。一旦戴高乐答应给予法属黑非洲的殖民地独立，阿尔及利亚的独立便是一个时间问题。一旦以色列内阁把它的防线移到库奈特拉以西，显然，谈判就不会为了一个较为次要的问题而破裂，

如象以色列有权在一个城市的郊区定居，而当情况容许这样做时，以色列居民却又从未搬去——而且，按照以色列自己提出的方案，以色列军队将不得进驻该地。以色列内阁并不急于把事情进行下去，它很乐于送我空手去见葛罗米柯。

五月七日星期二我和葛罗米柯在尼科西亚举行的会谈是异乎寻常的。会谈是在塞浦路斯总统马卡里奥斯大主教的主持下举行的。显然，这是他一生中最得意的日子。这一次在他的岛国讨论的问题，其规模是和他认为自己具备的才能匹配的。他分别接见了葛罗米柯和我，并参加了招待两个代表团的正式欢迎会。他那镇静而又机警的面部表情使人想起，命运之神是在捉弄他，把一个前途未卜的岛国的地方性纷争问题加在他的身上。他似乎被我们的复杂纠葛吸引住了，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不用多加劝说，他就会乐于参加我们的中东穿梭外交活动。当葛罗米柯和我离开他前往总统府进行单独会谈时，主教阁下是带着遗憾的心情离开我们的；如果他能够参加审议这些问题，他的机智和含蓄将是那些没有受过有几千年历史的拜占庭政务活动传统训练的人们所难以望其项背的。

对于后来的会谈来说，这是一个很合适的开端，葛罗米柯为了制造苏联参与其事的印象，便毛遂自荐到中东来。根据我在日内瓦对他的谈话，他认为这个时候来最好，因为可以赶上谈判的高潮。由于谈判中一再遇到拖延时日的事，他的这次旅行已经变得毫无意义。也许只能说明，对于国家利益的认真考虑并不是政治家采取行动的唯一动机。

苏联之一心想要来到这个它的政策曾一度占统治地位的边缘地区，它的自尊心受到损害这一点无疑是起了作用的。也许葛罗米柯笨拙地坚持要来反映了苏联国内的压力。我们的若干苏联问题专家认为，葛罗米柯由于在中东受到挫败而遭到责难。他企图

通过疯狂的活动——虽然不得要领——来恢复莫斯科的地位。不管是由于什么原因，正如我们一样，他错误地估计了谈判的进展速度。我们在这里所能做到的几乎只是重复上星期在日内瓦所申述过的论点。

葛罗米柯向我们陈述了我们已知道的情况。他明确表示，就大马士革而论，库奈特拉是个关键。他重复申述，莫斯科原则上反对达成局部协议，但是他又退而承认，如果这个局部协议以某种不明确的方式和一项总的解决办法联系起来，而且如果它含有归还大量土地以示诚意的内容，那它就会带来一些好处。这些说法非常一般化，我完全可以含糊其词地表示同意。葛罗米柯经验丰富，而且很精明，他不会不了解事情进展的情况，对于他无能为力的事情也只好自我解嘲了。正如我写给尼克松的报告里所谈到的：

他的论述证实了我们的判断，对于叙利亚来说，主要的问题是库奈特拉，如果他们得到了它，和叙利亚的会谈就有取得成功的机会。我曾多次坚定地表明：如果美国和苏联都竞相支持双方的最高要求，那么就会对局势火上加油。他向我保证说，苏联不希望这个地区处于紧张状态。

总之，尽管我相信我们不能指望苏联对叙利亚会谈会有什么特别帮助，但我们也看不出有什么严重的迹象表明，他们决心——或者能够——在这个时刻破坏谈判。

马卡里奥斯打断了我们的会谈，并为我们准备了一顿德国式的午餐（我猜想是为了款待我）。接着，葛罗米柯和我就各奔东西。实际上，会谈比我预料的要短，因为葛罗米柯要回莫斯科去欢迎一位高级外宾。由于提前离开，有一个人可遭了殃。那就是我们同行中的一位著名的新闻记者、《华盛顿邮报》的马里琳·伯杰，她因在海滩上晒日光浴而被拉下了。当我的飞机快要起飞时——飞机

的扶梯已经移开——有人忽然想起了她的护照，便把它从机门扔给了一位大使馆工作人员，好让马里琳可以自己乘飞机赶上我们。幸好塞浦路斯当时是阿拉伯世界和以色列之间很方便的中转站，经常有对开的飞机。马里琳第二天便在耶路撒冷赶上我们了。

当我于星期二晚间回到以色列时，我得知美国国会表示了值得欢迎的支持态度。参议员迈克·曼斯菲尔德，（他是民主党人，多数党领袖）在当天早晨作了如下声明：

我利用这个机会在这里发言，是为了表明参议院注意到基辛格博士的这次出访，我们完全和毫无保留地支持他为在中东寻求一条通往和平的道路所作的努力，这条道路现在看来是通往大马士革的。

这个声明发表得再适时不过了。以色列内阁刚刚批准了一系列的修改意见，新上任的参谋长莫德凯·古尔将军向我作了简单的介绍。我在头几次和这位参谋长见面时，对他的生硬态度颇感不快，我认为他傲慢无礼和以一种恩赐的态度待人，直到以后我才知道，他这样做是一种和他所认为的政治阴谋划清界限的表现。和其他许多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一样，这种锋芒毕露乃是一种掩护，用来保护一个天生温顺敦厚的民族免遭一个敌对世界凌辱之苦。古尔业余时间是一位写儿童寓言的作家。他很爱交际，有自信心，而且为人正直。^{*}作为一个北方司令员，他对叙利亚前线了如指掌。他显然不愿意让他的国家在谈判中吃亏。但是他也不会欺骗我。他提出了一条经过修改的以色列分界线。他证实，防线已移到库奈特拉以西。此外，以色列还愿意在北方把防线进一步撤回到赫尔蒙山；在南方，从一个名叫拉菲德的小镇和从靠近战前分界线的三

* 一九八一年，他从军队里退伍，被选为国会议员，开始在政治上大展鸿图。

个据点撤出，往后撤退，并把拟议中的缓冲地带扩大到包括几个村子，以便让更多的叙利亚人返回他们的家园。对于库奈特拉的民政管理则不作任何变动。

我给萨达特、布迈丁和费萨尔打了电报，告诉他们，我们正在取得进展。第二天早晨，我对果尔达说，在大马士革，我将只把方案中的关于库奈特拉那一部分抛出去。由于阿萨德几乎肯定会拒绝这一方案，我不打算让以色列的其他让步一道付诸东流。我以后将利用这些让步来打开僵局；或者作为锦上添花，如果出现意外突破的话。记录表明，以色列的领袖们从来没有反对把让步分成最小的片段，一片一片地抛出去。果尔达这次也没有违反这个传统；说实在的，她欣然同意。归根结蒂，如果阿萨德为了库奈特拉民政管理问题使谈判破裂，他就用不着和这位固执的美国佬进行没完没了的夜间会议，这位美国佬认为，安全要靠施展策略，而不是靠对抗顶牛；她也用不着去和内阁举行更为恼人的会议，这个内阁把采取灵活态度的重担交给了它的总理，这种灵活态度是保卫这个国家使其免受周围的敌对的或难以理解的势力的吞噬所必需的。

五月八日星期三，这是穿梭外交进行的第十一天，这次和上次埃及模式的不同已越来越明显了。在阿斯旺，我们是和一位能够把握基本形势的阿拉伯领袖打交道。而在叙利亚，我们只能把大多数阿拉伯世界的国家都卷进去才能取得进展。如果谈判失败，这种情况倒给了我们一个安全网。这种情况也要求我们办事特别严谨，因为它也规定下了一系列用来衡量进展的标准。在西奈问题上，以色列一开始就把它愿意作的最大让步抛了出来，而在戈兰高地问题上，最大让步几乎要通过一系列冗长而令人恼怒的通宵会议一条街道一条街道地来争取。

五月八日那一天，我第二次访问大马士革。（要是我预先知道，

单单这一次穿梭外交就要我不下十三次地访问大马士革，那我的沉着镇静也许会受到动摇。)我知道，不能再回避分界线的问题了。我与往常一样受到了哈达姆的欢迎，他利用从机场乘车进城的机会，表达了叙利亚一贯的善意——这是一个有希望的迹象。因为现在叙利亚人毫无疑问地已经从我们访问过的每一位阿拉伯国家领导人那里知道了我们的想法：“任何时候，不管有没有关于脱离接触的会谈，你都是受欢迎的，”说这句话的人被认为是个给西方带来灾难的人。我说了一句关于以色列心理上障碍的话，哈达姆的回答总结了问题难以处理的症结所在：“如果他们认为从别国人民的土地上撤退是有困难的话，他们怎么能指望别国人民轻易地放弃他们的领土呢？”

阿萨德一上来总得闲扯几句，看来这是怎么也改不了的。这次他谈的是美国 F-111 轰炸机的特点，这种轰炸机使这位前空军司令着了迷。记录上碰巧没有写清楚，不知怎么我们谈论的话题转向阿拉伯首脑会议作出决定的问题。只是在我们彼此开了一阵玩笑之后，才转向即将要谈的正题，令人遗憾的是，在正题上没有什么诙谐幽默可言。由于我知道我带来的信息是令人不快的。所以我开始便解释信息的背景。我在以色列论述了国际环境，以便让以色列内阁懂得，它必须作出更大的让步；在叙利亚，我也作了一次分析，说明为什么阿萨德应该满足于比他所期望的要低的条件：

我对形势的估价是：首先，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和叙利亚的谈判，要比和埃及的谈判困难得多。另外，有一个和平居民的问题，这块土地非常接近两国的安全中心。它在以色列引起了感情上和心理上的反响。

军事形势却迥然不同：以色列在苏伊士运河对岸的被包围的“孤立地区”只有一条宽为十五至二十公里的走廊作为供应线，它受到埃及两个集团军的

夹攻。它是一个平坦地区，处于一条非常长的供应线的末端。以色列有一种易受攻击的不安全感。而在叙利亚的被包围的孤立地区，他们并没有感到有受攻击的危险。我只是在分析形势，而不是为它辩护。以色列的背后有一排山丘，旁边又是赫尔蒙山。他们不想放弃这块地方。

如果你研究一下和埃及所订的协议便可以明白，以色列人没有从没有埃及军队的土地上撤退。在运河对岸有五个师的埃及军队。在埃及，我们在现有的控制线再加上撤出的孤立地区上划定一条分界线，在没有人烟的平坦地区建立一条受联合国控制的地带。

在叙利亚，我们要做的是两件事：第一，恢复叙利亚的民政管理。第二，我们和他们谈判以色列要从新近获得的土地上撤出的问题。而在埃及，他们没有从新获得的土地上撤出。

我还补充说明，最终的问题不是军事上的，而是政治上的和心理上的。

阿萨德从叙利亚的实际情况出发，作了非常有节制的回答，这表明他对所牵涉到的各种难以捉摸的情况是很理解的：

阿萨德：叙利亚的困难是，这里的人民二十六年来是在仇恨中生活过来的，不能由于我们改变了方针就在一夜之间转变过来。除非我们为了人民的利益，否则我们决不会采取任何步骤。我们都是人——我们对事物的反应都有感情冲动的一面。但是我们这些领导人得克制自己，进行分析，并且根据我们自己的利益采取步骤。公正的和平是有利于我们的人民的。

基辛格：也是有利于以色列和这个地区所有人民的。

但是，哲理上的探索不能永远拖延时间，届时我总得拿出以色列的方案，而且要冒引起叙利亚人大发雷霆的风险。我按照我对果尔达说过的那样行事，强调以色列决定把它的防线移到库奈特拉以西，并提了一下古尔的调整方案，以表明防线的总的走向，但却只

字未提关于在北方的赫尔蒙山和在南方的拉菲德的让步。

阿萨德没有光火，也没有高谈阔论。他以冷静的分析批驳了我提出的方案：

因此我提出下列意见：第一，他们没有撤退到十月六日分界线的后面。第二，没有一条直的纬线。这就使得形势复杂化了。第三，他们保持了十月二十二日以后所占领的据点。例如在赫尔蒙山，过去他们在那里并没有设立阵地。他们所拥有的唯一观察站是在十月六日分界线上。第四，他们并没有撤出多少地方。他们没有作任何实质的撤退。

我指出，以色列毕竟放弃了一九七三年所占领的突出部分以及库奈特拉。阿萨德并没有被迷惑。他一定是阅读了以色列的报纸，有时以色列报纸所知道的关于以色列内阁的考虑比美国代表团还要快些。“他们没有放弃库奈特拉，”阿萨德说，“他们只是把库奈特拉分成两半。”

在一场复杂的谈判中，细微差别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阿萨德肯定对我带来的方案不感兴趣，但是他也没有断然拒绝。他似乎暗示，在库奈特拉问题上，使他感到担心的不是以色列撤退的深度，而是在民政管理上把这个城镇分两半。更为重要的是，他不坚持“希哈比方案”中所提出的全面撤退。现在他要求在“靠近”他以前所要求的那条线的地方划一条分界线。在戈兰高地这块小地方，“靠近”是相对而言的。不可思议的是，经过一番剧烈的争论，实际上双方都在不知不觉中互相靠拢了。它终于表现为：阿萨德鼓励我向报界说明，谈判并没有破裂。言外之意是，正在取得进展。

当我在机场向报界发表谈话之后，我们自己的记者团正在登机。这时，希哈比把我拉到一间小型接待室里。他说，他是阿萨德

的老朋友。他可以向我保证，阿萨德和他的最亲密的同僚都希望达成一项协议；但是这项协议必须是可以抵挡得住国内激进派的剧烈反对的。如果收复了库奈特拉而他们的人民又不能在那里定居的话，那么这等于是一句空话。现行的以色列方案使叙利亚人不能定居，一方面因为这个城镇被分成两半，另一方面因为以色列的防线离这里太近了。如果我们能够再作一些调整，例如，以色列从库奈特拉附近的山丘撤退，阿萨德将会作出重大努力来达成一项协议。

因此，我们又重新回到老问题上来了。以色列人认为，他们已作出了重大的让步——从它一开始的立场来看，这是事实。叙利亚人则认为，他们所得无几——从它最终的愿望来看，这同样也是事实。以色列的领袖们感到恼火，因为他们忍受了这么大的痛苦，而对方还是不满意。在大马士革看来，以色列人对一个叙利亚的城市逐条街道地争论个不休，这简直是有意冒犯。这些不可调和的观点、目标、感情、恐惧和历史因素，真是复杂得难以找到解决办法。我的任务就是耐心地向双方说明，如果他们在感到恼火的问题上弄僵了的话，将必然会发生不幸的后果；并且也使双方看到，如果他们都设法克制的话，前途还是有希望的。

五月八日晚，我回到了耶路撒冷。我对果尔达说，应该等我访问了费萨尔和萨达特之后，再来重新审议以色列的立场。不应该在真空中作出决定。这时，我才第一次了解到，妨碍以色列从库奈特拉边缘作进一步撤退的障碍之一，是以色列人所垦殖的三块农场，这些农场距库奈特拉只有几公里。以色列从来没有放弃过一片垦殖好的土地，它不会以此作为军队脱离接触的条件之一。看到中东的和平进程竟维系于这样一个小问题，真令人感到忧心如焚。我向尼克松报告说：

当然，我会全力以赴，去争取阿萨德。如果上述以色列的立场证明是退让得还不够的话，那么以色列人将会面临一个严重的抉择：或是让谈判进入死胡同，从而有可能在戈兰高地面临消耗性战事再起并加剧；或是再放弃几公里的土地，这不会影响以色列的安全，但却要求他们放弃一九六八年在库奈特拉附近建立起来的居民点的一些已垦殖好的农场……与此同时，阿萨德看来想要达成一项脱离接触协议，但也有使他感到担心的国内压力。他一再强调，他需要有这样一个脱离接触协议，使他能够向他的经受过二十六年斗争的人民有个交待，并且不给他的政府的反对派一个颠覆的机会。

五月九日，费萨尔国王的态度仍然模棱两可，但却是有帮助的。他重申希望我们的外交活动取得胜利。他对我说，据他所知，只要以色列人讲道理，叙利亚人是会讲道理的。显然他与大马士革保持了密切的联系。费萨尔国王支持阿萨德的立场：叙利亚希望得到库奈特拉附近的山丘和这个城镇本身，并希望以色列沿着整个前线再作进一步的撤退。但是和昨天阿萨德的谈话一样，他也只字不提阿萨德的早期方案——希哈比方案。萨卡夫在机场对报界发表的谈话中，重申了国王对我取得成功的祝愿。如果谨小慎微的沙特人不同意我们处理问题的方法，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他们所得到的情报不足以使他们相信取得成功是大有希望的，他们是绝不会这样做的。

我于当晚到达开罗。当我在晚上十点与萨达特作了简短的谈话之后，伊斯梅尔·法赫米想起一个主意，说南希如不看看纳格瓦·富阿德的表演，她对中东的了解就是不完全的。纳格瓦·富阿德是一位有名的肚皮舞演员，我在上次穿梭外交旅行时曾看过她的表演。因此，他和我的代表团全体成员再一次返回谢拉顿饭店——唯一的障碍是纳格瓦·富阿德当时在亚历山大，距此约有三小时的路程。这使法赫米感到左右为难。他打了好几个电话，纳格瓦·富阿德亲自开了车子赶回来，换了一身合适的服装，在凌

晨二点为我的代表团全体成员再演了一场。富阿德小姐把她的怨恨升华为惊人的旋转动作，这证明她是个舞蹈行家。法赫米自负地面带微笑，一口口猛喷古巴雪茄烟的烟雾。他一定认为，如果让我们在凌晨三点以前上床睡觉，就象对一个深水潜水员减压一样具有同样的危险。但是，如果说他认为打破夜间搞外交活动的常规是不明智的话，至少他把这次夜间活动安排得比较容易忍受。我们感谢法赫米（以及天才的纳格瓦·富阿德）为我们三十四天的长途旅行安排了一个最轻松的夜晚。

第二天早晨，我和萨达特在他的吉萨公馆里作了四小时的会谈。我们对以色列和叙利亚之间的分界线进行了一个山丘一个山丘的详细分析。我将以色列北部的赫尔蒙山和南部的拉菲德镇的让步告知了萨达特。并告诉他我还没有向大马士革谈过这件事。我说，但是要以色列改变在库奈特拉周围的防线是有困难的。然而根据我的判断，以色列的平民迁移到一个没有定居点的城镇的西郊，这并不是一个严肃认真的方案。

萨达特感到，我们已接近实现我们的目标。阿萨德需要库奈特拉，是为了得到一个有形收获的象征，并与埃及保持同等地位。业已取得的成就已足以找到一项解决的办法。萨达特说，阿萨德过分热中于讨价还价，决不会放弃在谈判中的争执机会，但是从现在起，我应该赶紧采取行动。萨达特再次提到他上星期发出的警告：如果谈判失败，将会召开一次激进分子有很大影响的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并通过一些对所有与会者（包括埃及在内）都有约束力的决议。和平的进程将会受到危害。苏联的作用将会增强。迟早将会出现一次爆炸性的局面。萨达特说，他准备公开支持我们的立场，特别是，如果我们能为库奈特拉问题争取到更多的喘息机会的话。如果有必要，他将派他的国防部长阿哈迈德·伊斯梅尔·阿里元帅，或者他的参谋长贾马斯将军到大马士革去向阿萨

德建议，说现在应该是解决问题的时候了。我应该告诉他，什么时候进行这样的访问收效最大。

能得到沙特人的善意相待和埃及人的大力支持，这是值得宽慰的事。但是，当我于五月十日星期五飞往以色列时，我认识到，如果出现压力，就不能过多地指望他们了。这不是说我们的阿拉伯朋友不可靠。但是，如果最后谈判破裂了的话，争论将会更加意气用事，而不是采取冷静的分析，那时领袖们或许会受到难以预见或难以控制的感情的支配。实际上，几天之后，阿萨德就告诫我，不要把他的阿拉伯兄弟的温和声明看得太认真了。如果他不赞成脱离接触，而是坚持要求收回所有的领土的话，他们之中谁都不能袖手旁观的。

这是我们的难处之一。另一个难处是，以色列不希望这些谈判成为在戈兰高地上进一步提出要求的先例。它害怕慷慨的让步会造成得寸进尺的后果。在这个僵持局面中，我得去劝阻阿萨德不要投入一次圣战，并去劝阻以色列不要把谈判变成为对勇气的一次试验。

我实际上是单枪匹马在作战。尼克松每天都在仔细阅读我的报告；从许多方面来看，这些报告是他保持总统职位的仅有的心理依靠。他从来没有在支持我的工作表现出动摇。但是，公布录音带便宣告了他的总统任期进入最后阶段。一直坚定支持他的《芝加哥论坛报》于五月九日主张弹劾或辞职。众议院少数党领袖约翰·罗兹也作了类似的暗示；副总统杰拉尔德·福特警告说，由于水门事件引起了“一种信任危机”，并表示欢迎来一次维护法律尊严和坚持真理的“清理运动”。

尼克松很想积极参加谈判。他给以色列写了一系列语气强硬、甚至带有威胁语言的信，支持我的各项妥协方案。但是，这些信件只起了有限的作用，因为以色列内阁对他虚弱处境了如指掌，

相信他不敢冒一次摊牌的风险。（在这一点上，他们是看错人了。当尼克松受到伤害时，他是最令人生畏的。）不管怎样，如果在五月十日要求以色列进一步修改立场，这是毫无意义的。这应该等到我五月十二日向阿萨德抛出在赫尔蒙山和拉菲德镇的让步之后，以及在阿萨德有机会对他肯定会收到的来自利雅得和开罗的报告作出反应之后，才有意义。

我甚至还想出一个地中海东部诸国和岛屿的人常用的一个办法。我打算抛出以色列在分界线北部和南部的补充修改方案——这个方案在上次访问时我压着没有拿出来——作为对萨达特和费萨尔的请求的答复。阿萨德也许不会相信这是真的，但在中东我见到过有些更加没有根据的话也有人相信。遗憾的是，以色列的政治是经不起深究的。五月十日，我从开罗回到耶路撒冷，以色列的立场在各大报纸上都刊登出来了；这个消息是从以色列国会外交委员会里透露出来的，达扬曾向该委员会介绍过他的方案。我打算在大马士革作为以色列“新的”让步抛出来的东西，现在看来——正如我向以色列谈判小组抱怨的那样——好像是“萨达特、费萨尔和我共谋向阿萨德兜售的一笔肮脏交易”。因此，我和以色列谈判小组所举行的会议要比预期的不平静些；会议结束时没有作什么修改，结论是：我们将把新的决定推迟到我访问大马士革之后再作。

五月十一日是埃尔斯沃思·邦克的八十寿辰。在越南战争最严峻的岁月里，他曾在西贡豪情满怀和无私无畏地保卫美国的荣誉和利益达五年之久。他在公众的造谣中伤、政府的犹豫不定和盟国的背信弃义面前坚贞不屈地工作，报道他所见到的事实，严格地按照他生平信守的职责和准则生活。邦克进入外交界时年事已较高；他没有显示他自己。他懂得，当我们滥用感情时，就会把国家丢在一边；人们对我们的评价，不是凭我们在当时是如何表达

感情的，而是凭我们是如何坚定地维护美国的原则。他是一个身材瘦长的、沉默寡言的新英格兰人，他对夸大的溢美之词会感到坐立不安。他不需要赞美的话，他已经把这些话都具体化了。我把一些有争议的任务交给了他去办，如巴拿马谈判即为一例。因为他对维护他的信念是无所畏惧的。评论家可以对他作出的结论加以责难，但对他的爱国心和为人正直却是无可非议的。而且，他对基本原则是出自本能的热爱。我任命他作为我们的代表出席日内瓦会议，因为我们需要一位有威望的特使，他不会纠缠于一些不相干的枝节问题，而我们的战略是一贯谴责日内瓦会议纠缠于这些枝节问题的。我对他在这次中东之行中的表现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起了稳定人心的作用；他对事物的观察很敏锐。他和比他年轻五十岁的工作人员一样（如果说他不比他们更好的话），经受住了令人伤透脑筋的三十四天的严峻考验。

当时，我们正处于紧张和沮丧之中；并对穿梭外交开始感到怀疑，他把我们都找在一起，参加基廷大使在戴维国王饭店为他举行的一次意外的宴会。以色列和美国的谈判小组和工作人员在罕见的团结友好气氛中会面，向邦克大使祝寿。我提议为邦克干杯，说他代表了美国最优秀的和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方面。他集中地体现了“我们作为一个民族和社会的精神”。我们国内的形势是如此敏感，以致有些报纸竟把这当作一次对水门事件的评论来加以报道——认为这是含蓄地与尼克松相对照。它不是——至少不是有意识的行动。相反地，它意在给我们以勇气，要我们全力以赴，再接再厉，并提醒我们，尽管遇到挫折，但是我们能够参加一项给人带来希望与和平的使命，这是值得庆幸的事。我们很快又开始了穿梭外交，于五月十二日星期天早晨返回大马士革。

现在，到每个国家的首都去访问，都有一套因袭相沿的格式。我总是带着我的疲惫不堪的助手们和易动肝火的记者团同机到

达。在大马士革，哈达姆会到机场来接我。由于命运注定他经常与美帝国主义的代表进行频繁的接触，这使他脸部略带不自在的表情，说起话来酸溜溜的，可是对我们这番苦心努力，他总是表示赞赏。在从机场开出的车队行进过程中，他总是向我表示，叙利亚迫切需要达成一项协议，并想与美国保持良好的关系。他只是表达一种心情，但没有详加说明。他听我谈对以色列的印象，但并不急于想知道具体细节。这些事情以及有关政策声明，他都留待总统去处理。（或许作为一个忠诚的复兴社会党人，他不希望承担和以色列谈判的责任。）在宾馆稍事停留，我们就到阿萨德的会议室里会集。在我汇报之前，大家善意地逗笑一个小时。报告时，当阿萨德想到以色列对于他认为属于“他的”领土讨价还价时，他那副和蔼可亲的面孔就转而变成冷嘲热讽。他不时地把他的同僚叫进来，让我把整个方案再说一遍。然后，我得向新闻界发表谈话——通常是在大马士革机场表一个态，并在返回以色列的飞机上再补充说明一些背景情况。阿萨德总是要我发表评论时说得乐观一些，他不希望我引起人们的悲观情绪，使他没有回旋余地。

在特拉维夫的本—古利安机场，温文尔雅、机智而又热诚的阿巴·埃班总是在那里等候。好开玩笑而又性急的西姆查·迪尼茨也会到场。他们并不认为有必要让我把情况留着向总理去报告，他们也不愿意用过分赞美的话来增强我的自信心。埃班和迪尼茨总是在从机场到耶路撒冷的途中，利用那一小时的时间要我细谈在大马士革所遇到的情况，可以说是想要来评定一下我在满足他们的要求方面做出多大成绩，而他们的要求往往是不那么简单的。接着我还得向以色列谈判小组复述一遍，其后在关键时刻还得向一个更大的组再谈一遍。以色列人的基本着眼点并不在于个别方案的优劣——从根本上说，他们对整个概念并不感兴趣——而在于担心叙利亚人的不义行为和根本不可信赖，以及几乎肯定要发

生的又一场战争。叙利亚人的反应是他们那压抑着的愤怒情绪，从这种情绪中你可以见到不祥之兆，以色列人则由于意识到自己易受攻击而感到绝望。尽管叙利亚的军队已经撤退到他们的首都周围，但他们的谈判者却流露出一种意识，认为历史是站在他们一边；而军事上占优势的以色列则表现得似乎只要走错一步，就会遭致毁灭。因此，在谈判中，胜利者和失败者之间有一种奇特的颠倒现象，强者要求得到保障，而弱者却提出领土要求。叙利亚人的自我约束博得人们的尊敬，以色列却因预感到凶兆而显得可怜。

五月十二日，大马士革并没有改变初衷。哈达姆用“感谢上帝，你平安回来了”这句话来欢迎我。他说他非常希望能达成一项协议。为了让阿萨德在我在宾馆更衣的半小时里作一番思考，我请哈达姆把我带来的方案仔细研究一下。我请他不要简单地只看到这里划一公里，那里划一公里，而要看到事物的基本实质：

问题是要满足双方的需要，并开始一项进程。在叙利亚前线往后撤退一事，在以色列的心理上说，要比那次从苏伊士运河撤退更为重要。重要的区别在于：叙利亚的军队实际上是向前推进了，而根据上次协议，埃及军队则是往后退了。

我知道，把这与上次埃及协议作比较，对于叙利亚人的自尊心是大有好处的。

然而，要取得阿萨德的同意还差得很远。在从下午一时三十分开始的五个小时的长谈中，先后参加进来的有国防部长穆斯塔法·塔拉斯将军和空军参谋长纳伊德·贾米尔将军以及希哈比和哈达姆。所讨论的问题是几天之前我带来的以色列方案。阿萨德说，只要以色列人占领着库奈特拉附近的山丘，并且在实际上还为联合国保留了这一个城镇的一部分，以便把叙利亚人和在这个城镇

的边缘的田地里工作的以色列人分开，他就不能把叙利亚的老百姓送回到库奈特拉去。他建议以色列往后撤退一公里半，撤退到西部山丘的那一边去，并从此往南划一条直线，以便让这个城镇不感到处于包围之中。关于这个问题，我曾和以色列谈判小组谈过多次。我知道，在以色列人看来，安全问题是与库奈特拉附近的山丘分不开的，但我也相信，作一些调整还是可以办得到的，而那条拟议中的在库奈特拉附近的以色列防线，对于阿拉伯人来说，实际上与其说是一项成就，还不如说是一个耻辱。

我认为，我们作为认真负责的调解人，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了。把美国的信誉押在现在进行的这种零售地毯式的买卖上，是很可笑的。归根结蒂，如果谈判破裂，叙利亚人会在战争中失利，而以色列人也将失去争取和平的机会。我们把以色列从全面孤立状态中挽救出来，并且向叙利亚指出了一条不冒风险就收复被以色列占领的被包围的孤立地区的道路。因此，我认为，下决心解决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了。我将要求双方表明他们关于分界线的最后立场，而且如果这条鸿沟填补不起来，谈判将休会。换句话说，我是在用我所掌握的最严厉的仲裁手段：事实上，双方心里都很明白，他们自己是无法打破因我们调解失败而造成的僵局的。

要以色列重新考虑其立场的建议激起了果尔达的怒火。她于五月十三日星期一大发雷霆说：“他不能想要什么就得到什么。”“他无权得到他所希望的一切。”考虑到阿萨德的出发点，如果他得到接近于他所希望的东西是没有什么危险的。我带着激动的情绪回答说：

应当以某种直接谈判的形式来结束战争，这是我们大家都懂得的，实际上我们也一向认为你们也是这样主张的。我们已经设法减轻这几次谈判对以色列的冲击，而且我们已经把问题缩小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现在经常

处于要为阿萨德辩护的地位，我们谈论的是距旧分界线一公里那条线上的半公里的地盘。此时此刻，你们本来很可能会在一个国际讲坛上每天都因一九六七年的分界线而遭到攻击，而在这个讲坛上美国每天都被要求在一九六七年的分界线问题上表明立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打破了石油禁运，我们使俄国人在中东出了丑。如果你们现在必须面临所有这些问题，而且受到俄国人的压力，石油禁运还在继续，你们就不会侈谈北部德鲁兹村庄的事了。你们要谈的将是许多更为糟糕的事。

正如我在前一天警告阿萨德的那样，我也警告以色列谈判小组，不要斤斤计较分界线上的小变动。真正的问题是

你们是否愿意冒取消整个战略的风险，而这个战略非常有效地使你们在战后免除战争后果的冲击，或者我们是否要采取另外一种不同的战略。

我的这番话对于以色列人和对于阿萨德一样，都没有产生结论性的后果。安全不太可靠的政府缺乏长远考虑。我的一切论点实际上都着眼于未来。如果接受我的忠告，在国内立即会遇到非难，而受益却是想象中的事。经过三次会谈之后，以色列谈判小组最后同意作一点有节制的让步。我估计这是他们保留的最后让步：叙利亚可以接管整个库奈特拉镇的民事管理权，叙利亚的平民可以回到那里去。

然而，以色列内阁却仍旧坚持，库奈特拉附近的三面土地——包括山丘——还是属于以色列的；以色列的军队仍旧要控制这个城镇的边缘地带，以便保护他们的居民耕作他们的土地；而且所有的街道都要用带刺的铁丝网围起来。如果这就是以色列的最后方案，我们就进入了死胡同。

作为最后的孤注一掷，我通知阿萨德说，现在是派遣一位特使

去大马士革的关键时刻，贾马斯立即动身去和阿萨德商谈。

当我于五月十四日星期二去访问时，阿萨德的反应不出我的所料。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认为没有可能让他的老百姓回到库奈特拉去，而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他把库奈特拉拿到手也没有用。他提出一项反建议：把库奈特拉西面的山丘分成两部分，西坡归以色列，东坡归叙利亚，山脊归联合国。令人奇怪的是，阿萨德说，在脱离接触过程中，他无意对以色列居民点的存在加以非难，他所希望的是为他自己的移民争取一个喘息的地盘。考虑到叙利亚人对于戈兰高地的感情，这是一次特大的让步，表明阿萨德是多么急于要拔除大马士革前面那块以色列占领的突出部分——尽管他所发表的声明与此相反。

我原打算在这一轮会谈之后就停止谈判。五月十四日晚——穿梭外交的第十七天——我同果尔达谈判的主题是中止谈判的方式问题。后来，有两件事使我改变了主意。第一，阿萨德要求我再作一次努力。贾马斯从大马士革返回埃及，说到阿萨德郑重地表示希望谈判获得成功，而且叙利亚的新闻界仍旧表现得很乐观。

最后，五月十五日清晨，我们醒来时便听到一桩惊人的消息：巴勒斯坦恐怖分子袭击了以色列北部的小城镇马洛特。游击队一开始就杀害了一家三口。他们接着便占领了马洛特学校，抓了四名教员和九十名小学生作为人质，要求释放关在以色列监牢里的二十名阿拉伯突击队员。他们指定法国和罗马尼亚的大使作为中间人。

耶路撒冷一片沉寂，给人以一种可怕的感觉。以色列本来就预感到，它生活在一个孤立无援的、一心要灭绝它的民族的世界。现在这种凶兆应验了。尽管和谈还在进行，以色列儿童的生命危在旦夕。然而，以色列在这次危机中表现得沉着、镇定。要求以色列由从来不属于巴勒斯坦的领土上作较小的撤退，这种前景曾激

起了大街上近乎歇斯底里的示威游行和在内阁里的极大义愤。但是，现在那个深藏在以色列人脑子里的可怕事物看来将成为现实，而他们却表现得很镇静，有耐心，这就大大有助于说明犹太人如何经受了几千年的考验而生存下来。尾随在我们后面的游行队伍不见了，内阁有条不紊地开会。以色列的领袖们把阿拉伯人的任何行动都曲解成为奸诈，他们这次却在克制，没有利用这一不幸事件作为说明问题的资料。

相反地，果尔达派遣西姆查·迪尼茨到戴维国王饭店里我住的房间来，以抱歉的口气解释说，内阁正在解决马洛特危机，今天不能按约定的时间与我会谈。这本来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是对每次让步都争得很厉害的她，这次却要迪尼茨来重申她坚决致力于使谈判取得成功。她知道我对于犹太人那种没完没了的诡辩感到不快，结果使叙利亚在收复库奈特拉方面只增加了一百公尺的地盘。也许迪尼茨能解释为什么对库奈特拉附近山丘的关心不仅是心理上的反常现象。正当果尔达为孩子们命运深感痛苦时，她仍念念不忘和平；这一姿态对我来说比以前几个星期所有的花言巧语都更有意义。

她所挑选的特使是再合适不过的了。迪尼茨和我一起经历过许多事情，他深得我的信任，而且成了我的莫逆之交。他为维护以色列的立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但他是通情达理的，他不欺骗我。

这时，迪尼茨对我说，以色列从来没有把它真正关心的事提出来过。以色列坚持战前的分界线，并不是出于一种实力感，而是出于一种不安全感。以色列没有足够的人力去守卫一条不断得到加强的防线，如像叙利亚人在他们那边所做的那样。以色列的国防线是以一系列坚固的防守据点为基础的，因此对地形的依赖性非常之大。事实上，戈兰高地上的分界线是一九六七年建立起来的，

正是因为这里是最容易防守的地方——有些是唯一能够防守的地方。以色列内阁为什么如此执拗地不肯将分界线移到库奈特拉以南，其道理就在于此；在那里，简直没有其他可以与之相比拟的阵地。因此，库奈特拉后面的山丘在心理上和军事上都是很重要的。这并不是争论几公尺地盘的问题，而是以色列不能为了达成一项脱离接触协议就放弃防守阵地的的问题。

对此，我回答说，如果有人把这些原委早些解释清楚，我们本来可以避免许多紧张局面的。迪尼茨说，以前没有把这种论点提出来的原因是，因为这样一来就等于暗示以色列不愿意在戈兰高地上作进一步的撤退；以色列内阁对于我会如何反应是很担心的。此外，以色列内阁内部的政治斗争不允许它作概念上的探讨。内阁只能作出一系列个别的决定，对于每一项决定的解释不允许有策略上的自由。通过一项决定的过程是如此艰难，以致不容许有感情上谅解的余地，更不用说去迎合别人心理上的需要了。只有当以色列处于极为苦恼的时刻，它才肯使别人听到它的心声。因此，马洛特的痛心事件便成为最终取得突破的转折点。

我对迪尼茨说，如果在什么时候重新恢复谈判，以色列应更多地照顾叙利亚人的自尊心。必须扩大叙利亚在库奈特拉附近的领土，在安全许可的范围内，以色列应努力做一点照顾体面的事情。我将转而设法打消阿萨德对以色列提出撤离西部山丘的要求。现在，我认识到以色列有必要集中精力来处理马洛特事件。

我不希望一次恐怖行动会导致我这次中东使命的结束，以免今后以此为先例进一步采取类似的恐怖行动。迪尼茨刚刚离开，我便立即给阿萨德、萨达特、侯赛因、萨卡夫和布迈丁打电报，敦促他们为儿童人质进行干预，我打给阿萨德的电报指出：

如果能够采取任何行动，使公众看到叙利亚与这一事件无关，这会比任

何我能想象到的事情更加有助于推动阿拉伯事业和叙美关系的发展。

我也发表了一个公开声明，其中谈到美国要求所有世界各国的负责政府都来谴责这种暴行，并呼吁那些扣压人质的人释放人质：“这样的暴行除了破坏和平的前景外，将无补于事。”

五月十五日上午，以色列内阁举行了紧急会议，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步骤，同意就恐怖分子的要求进行协商。果尔达解释道：“我国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个问题涉及到释放恐怖分子，但是内阁认为，我们不能为了又出现了这次儿童事件而去打一场战争。”

在所有的阿拉伯领导人中，只有萨达特给了我回电。他对这件事表示遗憾；他敦促以色列坚持脱离接触的方针；他表示愿意讨论将来如何防止这类事件再发生。至于叙利亚，阿萨德的助手对托姆·斯科特抱怨说，黎巴嫩和叙利亚的平民在赫尔蒙山附近遭到以色列人的枪杀，美国却没有抗议。但在当天晚些时候，阿萨德的一位助手对斯科特说，不应该让这件事妨碍谈判的进行。就叙利亚而论，它对这件事毫无所知，因此不认为自己对此要负什么责任。奇怪的是，儿童人质问题提醒人们注意起基本问题来了。经过近乎三个星期令人沮丧的争论，在流血牺牲的威胁面前，双方都不打算放弃谈判，尽管在二十四小时前谈判已濒于休会的边缘。

至于华盛顿方面，有一封电报表明，近几个星期来水门事件的紧张状态已经显示出其后果了。尼克松的新闻秘书龙·齐格勒向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抱怨说，我所发表的关于马洛特事件的声明没有提到总统（无论如何他已经公开表示了他对此事的关心和愤慨）。斯考克罗夫特对我说，“我消除了他（齐格勒）的怨气。”但是，连这位一贯沉得住气的斯考克罗夫特也开始被他称为“小题大做”的事件弄得惊恐不安，十分恼火。

那还不过是几句刺耳的难听话。更令人担心的是总统亲自加

以干预。他密切注意我的每日汇报。有几次，我曾请求他代为劝说以色列内阁，敦促它改变立场。这毫无疑问又加深了他要以色列对这个僵局负责的倾向。现在，外交上遭受挫折的前景加剧了他的担心，担心他在水门事件中手里最好的一张牌，也就是他那推行有效外交政策的能力，正在消失。这对他的打击太大了。午夜时分——在他还不知道马洛特事件之前——他给斯考克罗夫特打了两次电话，命令他中断对以色列的一切援助，除非它第二天就改变它的立场。他并没有详细说明他到底要求些什么。

马洛特事件使得上述命令显得特别不合适。我在打给斯考克罗夫特的电报中，以多种理由对这项命令提出反对意见。这种做法会改变我们的战略，并在中东激起一种无法把握的力量。我们已经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因为大家看得很清楚，只有我们才能推动以色列——但这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如果一旦出现我们准备压垮我们的盟友的情况，以后每出现一次僵局，大家都会把它归罪于美国人缺乏决心。以色列可能在绝望中卤莽从事。苏联将这看成是侵略性干涉的畅通无阻的场地。现在不是公开与以色列闹分离的时候。

在尼克松还没有能来得及回电时，以色列已经用暴力结束了马洛特危机。谈判一直在拖延着——或许是有意麻痹恐怖分子的手法。当天傍晚，以色列突击队袭击了马洛特的校舍，打死了三名恐怖分子，但是有十六名小学生死亡，六十八名受伤——都是被巴勒斯坦人的手榴弹杀伤的。^②

以色列为这一损失而感到震惊，但却出奇地表现为恪守纪律。南希和我拜会了果尔达；这时游行队伍也无影无踪了，这使我有可能是到她的私人住宅去。我一向认为，在悲剧事件面前讲慰问的话，对于死者的亲属是一种侮辱。也许在这种场合，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最好的做法，是表达他对这种痛苦心情的理解，而且话不在

多。果尔达说，最终说来，她应该对这件事承担责任，这是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的职责所在。犹太人似乎命中注定是受害者，但是杀害儿童却是太过份了。她说这番话时有条有理，没有一点悲怆的语气，而且像一位科学家对待一件客观事实一样。果尔达几乎是以同样逆来顺受的态度说，我们大家最好还是回过头来谈谈和平问题吧。她将于当天晚上召开一次内阁会议，看是否有可能对方案作一点修改。我们可以在第二天早晨会见谈判小组；也许这是我应该向他们提出美国方案的时候了。

“美国方案”

不管马洛特事件对果尔达的精神上的打击是多么大，它肯定没有增加内阁冒险的意愿。我们在五月十六日星期四上午九点四十五分举行会谈。过去几天的紧张工作显出了后果，果尔达病倒了；副总理阿加尔·阿隆主持会议。我说我打算再作一次努力，但是我们不应该抱什么幻想。休会可能要持续一个月到六个星期，在这段期间内，每一方都将公开陈述自己的主张，专心致志研究对策，而且试图动员别国来支持它。作出让步本来可以打破僵局，使谈判继续下去，但是一旦休会，单凭这些让步要恢复谈判几乎肯定是不够的。很有可能阿拉伯首脑会议会要提出一些要求，约束阿萨德和萨达特。苏联将会变得更加活跃；美国将会失去对事态的控制。

以色列谈判小组对于这些看法一概不加评论。他们既没有信心，政府机构也拿不出一个新的方案来。阿隆说，如果他们可以肯定这是最后一次提出方案了，他们一定集中精力来做这件事。但是他们不能一个劲儿地提出修改意见——尽管在我看来都很有有限——而却遭到大马士革的断然拒绝。我想(但是没有说出口)如

果所有的让步在一开始就合并成为一个方案——如象中国人教给我的那样——那该多么好，而且进展也要大得多。每个人也会少吃些苦头，而且，大家也不用空谈绕圈子，可以得到更多的道义上的慰藉。但是现在已为时太晚了。

阿隆的一席沉闷的谈话是拒绝作任何修改，但却又欢迎一项最后建议。我从中得出结论说，现在是按照果尔达的意见，向双方提出一项“美国方案”的时候了。在一月份的埃及谈判中，我曾经这样做过——但是当时主要是为双方已经谈妥的条件加上一些保留面子的话。这次情况可不同了，从心理上说，如果不是从实质上说，双方的想法仍相去甚远。这就要求我估量一下，什么是公平合理的折衷方案。我所冒的风险是，如果双方都不想向前跃进一步，那么双方都会拒绝我的这个折衷方案。但是我也看到这样做的有利方面。我对谈判小组说：

如果我把它作为一项美国方案向以色列提出，我认为这将取得策略上的好处，（1）因为在他（阿萨德）的心目中好象本来可以由你们提出的。我这样说是个不礼貌的。方案是美国的设想。它将是基于我的判断，而不是以你们的主张作为最后界限。因此不是要他向以色列的要求让步，而是向我所判定的最后界限让步。（楷体是作者标的）

过不久我又说：

你们把你们能告诉我的都说了……我对你们内阁的印象是，你们为争取每一百码土地而斗争，为的是表明你们进行了一次大战，而且也许渐渐地——在证明确实是在寸土必争之后——接受一条象我所描述的那样一条界线，或者也许不能接受。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不是轻易做得到的。他们（此处疑指以色列国会中的议员。——译者）希望看到有人在作出努力，而且他们希望得到证明，有人确实在作出努力……

我最有希望的办法是——我喜欢美国方案这个设想——对你们说，“请看，这就是我认为能够取得的绝对最大限值。你们再多争辩也是没有用的。讨价还价是没有意义的。这就是我们在以色列内阁进行讨论的情况下所能做的事。再多的一点也办不到了。而且这一点也只有当你们说可以时才能办得到。”但是还得让它看起来是很有意义的。我不能允许在美国和以色列到处流传这样的说法，说我背叛了以色列，急于要达成一项协议，因为我想要帮总统的忙；也就是说，由于急于要帮助总统摆脱水门危机，我把意见强加于以色列。让我们彼此以诚相见……

因此我希望你们了解这一点。你们不必再对我说别的什么了，但是如果我们打算照此办法去做，我们彼此得相互体谅。我假定，你们允许我或鼓励我来提出美国方案这件事本身，就表明你们想重新考虑，否则我就不会到这里来了。如果情况不是这样，我可以不提这个方案。

以色列谈判小组接受了这个看法。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对我有足够的信心——他们不会有这种信心——给我一张空白支票。他们对我说，库奈特拉边缘地区的已耕地是不可商榷的。当内阁要参谋长对我提出的方案作出评价时，他对我讲了一通关于他将按照安全标准行事的大道理。我相当了解在当时的情况下所许可做的事。但我希望得到果尔达的确认——或加以完善——如果我能让阿萨德接受这个方案，她还得使它在内阁里获得通过。因此，我就再一次到她的私人住宅去拜访她。

说来也怪，已经决定要在谈判结束时就卸任的果尔达，仍然是会谈的主宰人物。接替她职位的伊扎克·拉宾也参加了会议，但所起的作用不大，这部分是由于他本人的意愿，更重要的是由于果尔达现在不受任何政治考虑的约束，比在座的任何人都更具有优越的地位。她为每一平方码的土地都争得很剧烈，而且顽强得很。但是她也认识到什么时候是解决问题的合适时机。她说她知道她的许多同事的发言都是为了记录在案，讲给人听的。她愿自己负责，

把美国方案提交内阁通过。

我根据早先和内阁会谈的情况以及果尔达的看法，对她说，“美国方案”将包括下列三个组成部分：

◎库奈特拉附近的分界线将往西移二百公尺，在这条分界线和西部山丘之间（大约有一公里半）是在联合国监督下的非军事区。

◎山丘本身由以色列控制，但其军备将受到严格的限制。美国将为此向叙利亚作出双边保证。

◎以色列的控制线将向北和向南各后退一公里，以便消除阿萨德的顾虑，即：叙利亚的平民回到一个三面受以色列军队包围的城镇。这也满足了阿萨德所要求的南北平行的分界线。

这时，果尔达是和我单独会谈的，她认为没有必要作正式发言。她说她非常清楚地懂得，赞同“美国方案”会使她在道义上站得住脚：至少有这样的保证，如果谈判失败，以色列将不会受到谴责。而且她也得到美国的同意，在目前这一轮谈判中，以色列在领土上的让步已到了极限，不能再对它提出要求了。

叙利亚方面的感触也是很深的。如象在以色列那样，谈判失败的危险使人们深切地感到谈判的重要性。以色列死了十六个孩子，其结果是使外交家们在三个星期的令人恼怒的交涉中伤透了脑筋。毕竟和平是可贵的，因为如果没有和平，受害的将是无辜的平民。

五月十六日星期四下午，在从飞机场返回市区的途中，哈达姆谈到这个地区内的某些国家企图把事情拉到与和平背道而驰的方向去。当我猜测说这些国家是苏联、伊拉克和巴勒斯坦时，他没有表示异议。

这是一场序幕。从下午六点到凌晨二点，我和阿萨德开了一次长达八小时的会。讨论的第一部分是马洛特事件，对此，阿萨德

的态度是冷冰冰的，超脱的。他没有为巴勒斯坦人的袭击辩护；他没有象往常那样申辩，说什么巴勒斯坦人所要求的不过是要解放自己的家园而已。相反地，他提出了一个实际问题：“为什么以色列不放弃那二十个俘虏来救他们的孩子呢？”但是，他非常了解，这个问题牵涉到原则问题；他甚至还带有某种赞赏之意。关于黎巴嫩事件，他的态度就不那么温和了。^{*}以色列人在黎巴嫩的报复行动迟早要把叙利亚也拖进去。即使现在，死一个巴勒斯坦人，就会激发五十个人参加游击队。

但是所有的这一切还只是讨论脱离接触问题之前的闲谈。我们再一次看到双方之间的鸿沟，在以色列人看来好象是割肉一般疼痛的让步，在叙利亚人看来几乎是蛮横无礼，毫无妥协之意。

阿萨德说：

以色列究竟还要求些什么呢？我已经同意我们不会去碰任何居民点。我也已经同意，将考虑山丘问题。我要求的只是在距离分界线的某处划一条直线，这是为我们的人民着想。他们可以在紧挨着那段距离的后面任何地方筑起他们所希望的防线。

当然，以色列领导人声称，不允许构筑其他什么防线；阿萨德的建议不过是个花招。也许双方说的都是真话。按照以色列的军事思想，叙利亚等于要求它单方面解除武装。按照叙利亚的国民意识，以色列在戈兰高地上构筑的防线乃是一种有意识的冒犯。以色列人不能理解叙利亚最起码的自尊心；叙利亚人则不懂得，以色列人的过分自信乃是一种恐惧和不安全感的混合物。

也就是为了上述理由，阿萨德的下面一个问题必然注定是不

^{*} 以色列的空军于五月十六日袭击了在黎巴嫩的巴勒斯坦人的目标，作为对马洛特事件的报复。次日又发动了一次有限的地面攻击。

中听的，

以色列人应该懂得的基本事实是，如果我们在脱离接触问题上解决得令人满意，我们就可以在那里作长期打算（原话如此），我们可以留在那里，定居下来，建设家园。如果我们被迫接受一项不能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即使我们接受了，我们仍将坚持向前推进。他们为什么就不懂得这个道理呢？

由于以色列无意在领土问题上再作进一步的让步，阿萨德的思想状况对于以色列的领导人来说就关系不大了。这是令人遗憾的事，因为我认为，在一九七四年夏天，双方至少都看到和平共处的一线希望。

由于在理论上作进一步的探讨已没有什么意义，我便抛出“美国方案”。就在这个时刻，阿萨德叫我暂时不要说下去，他把他的国防部长和参谋长叫来。显然，他不希望单独对所采取的重大步骤负责。他希望弄确实，他的同事（和潜在的政敌）以后不会说他上当受骗。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由他来复述我所说的话是不够的；必须得由我以同样的论据来说服他们。事实说明，不管从哪个角度看，事情已进入决定性的时刻。

在等候将军们到来的时刻，我打趣地说，“你是在吓唬我。”阿萨德的回答是耐人寻味的，他说，要来吓唬我的是外交部长；将军们都是爱好和平的人，而且他们喜欢俄国人的程度和我相仿。事实上，在叙利亚，政治家都是空想家，而军人则懂得和以色列作战所冒的风险和付出的代价。

阿萨德和其他出席者一起听我讲述了美国方案。以色列人控制山丘是谈判的症结所在。阿萨德仍然坚持要以色列撤离山头，只占有西山坡。联合国军应据守山头和东坡，他已不再坚持叙利亚在那里驻扎部队了。如果以色列人占据山头，他们就将能监

视他希望在库奈特拉开始的和平生活了。他请求联合国——或者甚至是美国——在那里控制局面。

我回答说，我们的方案是不容争论的。我无法在耶路撒冷重新开始去谈判一个美国方案，加之，这个方案在那里还没有被接受。我建议草拟一个休会声明。阿萨德是一位头脑冷静的谈判者，他不动声色地同意了 my 建议。我们草拟了一个休会声明，暗示几个星期内再行复会。声明的措词是亲切的，互相表示尊重对方。

当我们完成草稿时，阿萨德说，终止会谈使他感到痛心。我能否再回来跑一趟？我回答说，我不能对我自己提出的方案作进一步的修改了。

我能作出的唯一努力是向以色列提出我的方案。我能够向他们推荐我的方案，而且我也能够向他们转达你的方案，但是事情很清楚，我推荐的只是我的方案，超过这个范围，那就是你的方案了；现在依我看，你那个方案是会遭到拒绝的。

阿萨德坚持说，“不管怎么样，劳你驾再走一趟，然后回到大马士革来；我们再经过一番努力休会也不迟。”

因此，“美国方案”的价值就等于取得了一张另一轮穿梭外交的许可证。我们于五月十七日星期五凌晨二时三十分又回到了以色列。南希由于身体不好，在进行上几轮穿梭外交时一直留在耶路撒冷。她发现，和我结婚之后的乐趣之一是，半夜三更在以色列被叫起来，乘一小时的汽车到机场来接我，接着又陪我坐一小时的汽车返回耶路撒冷的旅馆。同行者有埃班和迪尼茨，他们俩是不会放弃首先听到情况介绍的念头的。

星期五早晨，我在梅厄夫人的寓所和她作了一小时的会谈。星

期五下午又和谈判小组全体成员谈了三个小时。以色列不可能接受阿萨德的建议，把山头控制权交给中立者或第三者。然而，以色列的代表却表现出了灵活性，同意不在那里配置可以向库奈特拉开火的武器。我又把这一点作了发挥，成为在山顶成立一个兵力限制特区。关于这个问题，美国将给阿萨德送去一份正式函件。这都没有经过以色列内阁正式批准；要等阿萨德接受之后，才会提交内阁。

我深信阿萨德不会让步，谈判一定要休会。我按照这一估计和以色列谈判小组共同起草了一个声明，准备与大马士革已经同意了的那个声明同时公布。我非常有把握地认为，阿萨德一定会拒绝这样一个方案。因此我作出下列计划，即：我将从大马士革飞往本—古利安机场，在那里与以色列谈判小组匆匆话别，然后飞往亚历山大。我将于次日返回华盛顿。

因此，五月十八日星期六——这是我中东之行的第二十一天——我再度前往大马士革，满心以为这是我这次穿梭外交活动的最后一站。

阿加尔·阿隆陪同我乘车前往机场——由于这一天是安息日，送行的规格只好是低调的。阿隆是我相识时间最长的一位以色列部长，一九五七年他在哈佛读书时曾是我的学生。我们是好朋友。他是以色列军队的创始人之一，也是独立战争中的一名英雄。他也许是以色列第二代领导人中最热心肠和不善于分析的人之一。当他不住在耶路撒冷时，他便住在戈兰高地山脚下他那心爱的集体农庄里。六十年代初，我曾去过那个农庄。在以色列的温和派人士中，通常他是对戈兰高地最重感情的人。他的许多朋友都死于那里的炮火之中；他的集体农庄需要修建许多掩体来防御叙利亚炮火的攻击；因此，他对这样一种主张是不能同意的，即：由于以色列提出一个宽宏大量的方案，叙以之间就可以建立一种

新关系。他不指望叙利亚人发善心，他寻求的是毫不含糊的保证。可是也正由于他为人热情和正派，他生动地表现出以色列进退两难的窘境。他渴望和平，其感情甚至到了天真幼稚的程度，只有那种从来没有享受过和平的人才可能具备这种感情。我常常指责他说，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在历史的大部分年月里，和平只是一种暂时的不稳定状态，而不是象许多以色列人所想象的那样千年不见兵戎。然而，他还是希望有一种绝对的安全，这在实际上是要把以色列的邻国降低到无能为力的状态，或者是在这些邻国认为是他们领土的地方建立起以色列的安全地带。这是一个难以实现——也许是不可能实现——的局面。

当我们驱车穿过耶路撒冷郊外的朱迪亚山时，阿加尔·阿隆对我说出了他渴望和平的迫切心情。当我们乘车疾驰于通往大马士革的平原上时，刚毅的叙利亚民族主义者哈达姆所表露的心情与这位坚贞的以色列开国元勋是不约而同的。他们俩都不知道如何用行动来满足自己的迫切愿望。他们俩都指望我能拿出神丹妙方来解决这个僵局。这一次，阿隆并不指望有一个新的方案。他参加过所有的讨论。他知道我们已使尽了一切解数。在绝望中，犹太人的办法是求诸有先见之明者的调停。“你会办成这件事的。”他对我说，“我早就知道你今晚会的。”我心中暗想，真可惜，奇迹似乎总是发生在不指望奇迹的人身上。

达扬在飞机上等我。（因为国防部设在特拉维夫，更靠近机场。）他受到了种种责难和冲击，因此在讨论中表现出一会儿板起面孔，一会儿讽刺挖苦。他不会被吸收进下一届内阁了；他觉得他的政治生涯已到了尽头。我深信，就他个人而论，他是支持和平解决的。毕竟他在一九六七年就反对占领戈兰高地。但是他在内阁的审议过程中决心要摆出一付警惕性高的架势。不管提出什么方案，他总是挑毛病，却提不出改进办法。果尔达希望我提出美国方

案。原因之一是要避免和达扬在以色列是否应再次修改其主张这个问题上发生冲突。

一旦作出决定——而且其他人也承担了责任——达扬就变得和往常一样有建设性、富有想象力和肯帮助人。星期五晚上，我突然想起，我们还没有一幅说明“美国方案”的精确地图。我需要得到几位有造诣的以色列军事制图员的协助，但不巧又逢上安息日。凌晨一点左右，我打电话给达扬，他当时在特拉维夫附近的住所里。这时我已疲惫不堪，顾不上讲究礼节了。我把他叫醒，也无心寒暄，开口就问：“请你弄几幅有关‘美国方案’的地图，明天一早就送到飞机上来，怎么样？”我说。“这有什么不行呢？”达扬回答说，随即挂断了电话。星期六早晨他就出现在那里，腋下挟着地图。（我研究了地图，但到大马士革时却把它们留在飞机上；带着以色列的地图进叙利亚总统府会令人把我们的方案看成是以色列的最后通牒，要坏事的。）

这时，我飞机上的所有乘客都处于一种奇怪的精神状态之中，喜悦、疲倦和失望兼而有之。不管他们的任务是什么——外交家、工作人员、新闻记者、机务人员、安全保卫人员、通讯员——他们似乎全都感到自己是一个共同事业的一部分。我曾经提醒那些信奉犹太教的人说，再进行几次穿梭外交，根据《返回家园法》，他们就有资格当以色列公民，而且将让他们应征参加以色列军队。

参加代表团的新闻记者都佩戴印有“解放基辛格的十四名战士”字样的小徽章*。这些“第一修正案”的倡导者、社会福利的监督人，都把自己看成是不偏不倚的、持怀疑态度的无党派人士。值得称赞的是，他们并不是这样的清高之士。他们似乎都逐渐与以色列的希望和恐惧共呼吸，并注视着叙利亚在勉力试验的新方针。他们知道，尽管谈判成功并不能保证和平，但失败却不可避免地要导致战争。当我们登上飞机的时候，我们的心情都很阴郁，因为我

们都认为这是最后一次去访问大马士革了。按正常情况来说，他们都很想去访问埃及，但他们对于在亚历山大的短暂停留并不抱什么希望。因为那是个失败的征兆。马文·卡尔布是一位最敏感而带有学者气味的记者之一，在飞往大马士革的短途旅程中，他走进我的小机舱说，“国务卿先生，在那里逗留一下吧，”他说，“我们相信你，你能把事情办成。”在那伤透脑筋的几个星期里，几乎没有一件事能比得上像这么几句简短的谈话对我的支持。

卡尔布和阿隆一样，对我的评价过高。这个问题已超出我的智谋范围。我在当时所能作的贡献，是保证双方都能清楚地了解对方的立场，说明为什么僵局威胁着双方的利益；而且最为重要的是，应让博爱思想大放光芒，因为当孩子们被作为人质扣押起来时，他们所有的人都本能地有这种感受。

星期六下午，哈达姆到机场来迎接我。按正常情况来说，他不会抱有奢望，想比总统抢先一步来听到我的全部报告。这次他冲破了禁锢，以致探问起以色列是否接受了阿萨德的最后一次建议来。我回答说，他们作了些修改，尽管还达不到总统所建议的那个深度。哈达姆坚持认为，即使会谈破裂，也应该作一次较大的努力，来加强叙利亚和美国之间的关系。我说，这就全看叙利亚是否

* 这次叙利亚穿梭外交中一直坚持到底的坚强人物有：全国广播公司的里查德·瓦莱里安、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马文·卡尔布、美国广播公司的巴里·邓斯穆尔、《华盛顿邮报》的马里琳·伯杰、《纽约时报》的伯纳德·格韦茨曼、美联社的巴里·施韦德、合众国际社的威尔伯·兰德里、W新闻小组的吉姆·安德森、《新闻周刊》的布鲁斯·范·沃尔斯特、《华盛顿明星报》的杰里迈亚·奥利亚、《时代》杂志社的约翰·马利肯、美国新闻署的玛丽·凯尼格、《波士顿环球报》的达里厄斯·贾布瓦拉、《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夏洛特·塞科斯基。《华盛顿邮报》和《华盛顿明星报》之间的敌对情绪——马里琳·伯杰和杰里·奥利里——在叙利亚穿梭外交中达到了一种非常紧张的程度。其结果之一是，他们疯狂地抢夺我在飞机休息室里作背景情况介绍时的听讲座位。在座位的安排上就不得不设计出一种正式的轮流制度，这就是大家所知道的“伯杰—奥利里脱离接触协议”——几乎与叙利亚—以色列脱离接触谈判同样地难于达成协议。

要把休会变成超级大国之间的对抗。哈达姆坚持说叙利亚是独立自主的。他说，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戈兰高地是叙利亚民族利益之所系，不会委托给一个超级大国去处理。但是他和我都心中有数，如果穿梭外交失败了，我们谁也不能用漂亮的词句来控制最后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脱离接触的真正目的在于保持继续决定事物进程的能力。

当人们尽一切力量争取解决问题时，贡献的大小却是从他们装得若无其事的本领来衡量的。在外交上这样的场合并不少见。哈达姆在东方俱乐部为我们举行了另一次午宴，出席者有叙利亚内阁的重要成员。很难说这是阿拉伯人一种好客的表现，或者还是心理战的一种方式，但是可以肯定，一个局外人很难从那个下午愉快的、友善的和谈笑风生的气氛中看出，这是一个关键性的时刻。也看不出任何人急于要了解会作出什么决定。

最后，下午四点零五分，阿萨德总统接见了我们。即使在那个时候，我们也没有背离说一会儿俏皮话这种传统的方式。我对阿萨德说，苏联驻在休会状态的日内瓦会议的使节维诺格拉多夫曾要求我们的代表埃尔斯沃思·邦克——他已经三个月不在日内瓦了——和他举行一次会谈。我打趣地说，维诺格拉多夫不甘心独自一个人无所作为。阿萨德认为，维诺格拉多夫希望有人与他分担这个重任。我们开玩笑地说，我风闻有谣传说，勃列日涅夫可能访问大马士革。阿萨德声称，他只是从报纸上才得知这件事的，并表示对此没有多大的积极性。我给他上了一堂简短的辅导课，谈的是关于南北越南人谈判的方法，也谈到了以色列的国内政治危机。叙利亚人关切的心情不是表现为缺乏耐心，而是表现为把说两小时无关紧要的话的习惯缩减为三十分钟。

于是，我便以一种面对现实的方式提出了最后经过修改的“美国方案”。在这个问题上，它包括下列几点：

⊙整个库奈特拉将置于叙利亚的管辖之下。

⊙从西部公路西面的建筑群线量起，在库奈特拉以西二百公尺处划一条线。设有路障，作为线的标记。

⊙这条线以西的地区将划为非军事区。联合国将保证各方履行规定。可以允许以色列的平民在这个地区从事耕作。

⊙以色列的军事分界线划在两座主要山丘的东坡下，但是在山顶上不允许设置能够直接向库奈特拉开火的武器装备。这种保证将写在尼克松总统致阿萨德总统的函件中。

⊙库奈特拉以北和以南的分界线将为直线，以便使该城镇不处于以色列军事阵地的包围之中。

阿萨德显然已作出了决定。他没有争论，也没有要求作进一步的解释。他接受了我们的建议，这使我大为震惊：

基辛格博士代表美国作了不懈的努力，很多人不希望他的使命取得成功；如果他的使命不能实现，我们将坐失良机。因此，我们得向美国公开表示，我们的态度是比较积极的。我们想要你们知道，谁是反对和平的。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放弃了那些山丘的问题……

我们这样做，不是为了以色列，也不是出于害怕以色列——战争胜利的成果将是属于我们这一方的——而是我们希望为公正的和平留有尽可能广阔的余地。一项公正的和平必须意味着全面彻底的撤军和恢复巴勒斯坦人的权利。我们这样做，是为美国的和平努力创造有利条件。我们也意识到美国国内的情况。我们知道，如果这次使命没有取得成功，这将被人利用来在美国搞垮你。

这是一个值得称赞的声明，不是轻易能够发表的。尽管我非常自负，我从来也没有认为阿萨德是在为了保护我个人的地位而作出让步。在与对手交涉历史上属于叙利亚的领土方面，阿萨德的原先要求只得了部分的满足，但他也接受了，因为一个政治家最

后还必须正视现实。而现实是，尽管叙利亚人有能力使中东陷于混乱，但单靠他们自己的努力，他们无法收复在十月战争中被以色列占领的土地，也不可能取得比我的方案所谈到的略为再多一点的土地。以色列的让步是很勉强的。它的谈判方式往往是令人恼火的，但结果是：叙利亚所得到的好处超过了精确计算现有的实力平衡所能保证的程度。这个差异是美国施加影响的结果，它说服了以色列在和平进程中付出一笔代价——但并没有信心。阿萨德愿意面对事实，而以前的每一位叙利亚领导人都是规避事实的，这是衡量他政治家风度的一把尺子。

在乘车去机场的路上，哈达姆和我都感到松了一口气，避免了我俩一直担心却无法防止的事。哈达姆说：“当我们走进屋子时，我以为决定是相反的。”我回答的也是老实话：“我也是这样想的。”

限制兵力

我们兴高采烈地离开了大马士革。埃及之行延期了，我们通知以色列谈判小组说，我们将回以色列。耶路撒冷的戴维国王饭店得罪了许多旅客，把他们预订的房间腾出来让给这支即将回来的美国队伍。但是，以色列人对我们的殷勤招待和他们对和平的期望不允许有另外的做法。我把已取得的突破电告萨达特、布迈丁、侯赛因和费萨尔，并强调了“美国方案”，而且——由于我能够肯定，我这个电报将回到大马士革——赞扬了阿萨德的政治家风度。

我以为现在来完成最后协议的细节就比较容易些了。阿萨德和我谈到要在五月二十三日星期四完成协议的文本。双方同意的方案是，好像在埃及协议中所规定的那样，在双方的前沿阵地后面划出一个兵力限制区。

我表现得太乐观了。首先，如同分界线问题一样，也存在着西奈半岛和戈兰高地之间的差别。西奈脱离接触协议的实施范围在离埃及首都较远的地方，是一片沙漠。即使在那种情况下，要贾马斯相信是分界线两边设立宽度达三十公里的兵力限制区的好处，那也是很难的；实际上，这是直接奉萨达特之命才这样做的。贾马斯将军的头脑是比较冷静的，看问题比较全面，在对待以色列的问题上，比任何其他叙利亚将军——包括阿萨德——都更少感情用事。但是，如果把地方对换一下，这样大小的兵力限制区将延伸到大马士革的郊区。甚至以色列也建议将兵力限制区的范围压缩到二十五公里。叙利亚提出的相对的方案是小里小气的五公里宽度。而且西奈协议的范围基本上是无烟地区。在叙利亚，有二万以上的平民都希望返回到这块“孤立地区”，要求回到库奈特拉和拉菲德的人数未定。这就势必要有一批叙利亚民政管理机构和警察——从而引起了一个核查的问题，以便防止在内部治安部队的伪装下违反人数和武器限额的规定。

同时，正因为叙利亚平民移居到这个地区，阿萨德极力反对设置联合国武装部队的建议。相反，他建议略为增加联合国观察小组的人数，让这些人驻扎在戈兰高地上，监视一九六七年战争后建立起来的分界线。以色列要求不少于三千人的有组织的联合国部队，阿萨德则仅仅希望数百名观察员。

此外还有一个建立联合国缓冲区来把双方隔开的问题。在西奈半岛上，联合国缓冲区在沙漠中占地六至十公里，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完全座落在以前以色列所占领的土地上。因此，以色列所控制的地区就少了这么多土地。在戈兰高地上，以色列的部队仅在战前分界线的两块地方往后撤退，而且只往后撤退了几公里。因此，建立一个联合国缓冲区，就要求叙利亚从战前的军事部署线往东撤——尽管与此同时叙利亚的民政管理机构却朝相反的方向迁

入联合国缓冲区。为了谈判方便，以色列所撤到的那条西部分界线被命名为“兰线”。在联合国缓冲区的另一边，新的叙利亚军事部署线被命名为“红线”（参见第三三三页地图）。阿萨德逐渐理解到，红线实际上就等于从战前的分界线往后退。它所引起的争论之剧烈和复杂，就同原来的分界线（兰线）一样。以色列企求把红线尽可能往叙利亚境内推进（他们希望这条线撤退到战前分界线以东六至八公里处），结果，实际上叙利亚的军队将比战前还要进一步往后撤。以色列坚持，到现在为止，一直在叙利亚边界线后面的那几个村庄要归并到联合国缓冲区去，在那里，他们将不受叙利亚军队的传统保护。

赫尔蒙山是另一个问题。这条山脉与黎巴嫩的边界线相平行，俯视着叙利亚包括大马士革在内的大平原。自从十月战争爆发以来，以色列占领了其最高峰附近的五个据点。叙利亚起先要求这五个据点归它控制。极而言之，以色列只会把它交给联合国控制。这不是个小问题，因为它和库奈特拉西部的山丘一样，牵涉到大马士革的安全。从这里，以色列能够监视整个大马士革平原。同样，如果落到叙利亚人手里，他们就可以监视以色列所占领的整个戈兰高地。

然而，最难处理的问题是，以色列坚持要阿萨德答应不让巴勒斯坦恐怖分子越过分界线来进行袭击。说起来令人啼笑皆非，这个问题并不是象争议中所说的那样，与其说是个实际问题，还不如说是个理论问题。阿萨德从来没有怂恿或者许可游击队从叙利亚的领土上去进行袭击。叙利亚人的性格不允许别人拉他们一同去进行他们所不能控制的冒险事情。但是，要提供某种保证则又另当别论了。萨达特没有这个问题，因为在埃及不存在巴勒斯坦突击队，而且也因为脱离接触线距离以色列的边界有一百多英里。但是，乘车从机场到大马士革要路过许多巴勒斯坦难民营，使人强烈

地感到这个问题在叙利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尽管叙利亚的领袖们限制巴勒斯坦人对叙利亚政治的影响，而且想通过“闪电”——大马士革所控制的巴勒斯坦分子——来影响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政策。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敢于公开表示不支持巴勒斯坦人的事业。以色列的立场也不是没有矛盾的。拒绝订立协议将制止不了游击队的威胁，却反而使问题复杂化，出现一个军事对抗的前景。

在解决这些各种剩余问题的过程中，我不能指望得到其他阿拉伯领袖的帮助。他们愿意促使双方在分界线问题上妥协，因为他们清楚地认识到，这涉及到以色列军队从那块突出部分的土地上作重大的撤退，用别的办法是办不到的。但是，除了萨达特以外，他们都感到限制兵力的技术问题太复杂，巴勒斯坦的问题太棘手；他们的反应一定是袒护阿萨德。因此，我让那些主要阿拉伯领袖一般性地知道情况，却没有请求他们支持。我也没有足够的时间作一次短暂的旅行——即使是去开罗——以解释各种僵局问题。

华盛顿的情况正在日趋恶化。早在五月十七日，《纽约时报》的詹姆斯·赖斯顿就把我这次漫长的穿梭外交活动，说成是我想躲开国内水门事件的斗争。

基辛格先生是这次内阁问题的关键人物。他现在正置身于水门事件和弹劾斗争之外。人们怀疑，他甚至是在故意拖延穿梭外交的时间，以逃避比这更为复杂和不愉快的华盛顿争吵。

这不是事实，但是，到了五月二十二日，它却被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全国广播公司的电视记者用作议论我穿梭外交的主题了。

如果说某些新闻界人士急于要把我召回美国——或者是要批

评我长期不在国内——白宫却突然决定，要我留在中东当作是它显示其能控制谈判的一种手段。五月十八日，就在分界线谈判有了突破的那天，白宫新闻办公室却发布消息说，总统要我留在中东，需要留多久就留多久。这是一个近乎灾难性的声明。我对以色列和叙利亚两方施加压力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威胁说，我要离开这里返回美国。五月二十一日，我实际上给两方都下了最后通牒，说谈判必须于五月二十四日星期五结束。这之后，尼克松在比斯坎岛的副官无心地又重申原来那个声明。他倒不是存心和我唱反调，这是总统指导谈判最简便的办法。我给斯考克罗夫特打了一个紧急电报，提醒他说：

请你把新闻记者管得严一点。我已在此通知谈判双方，我将于星期五离开，以便为谈判加快进度……依我看，如果总统要给我下指示，办法有的是，比通过新闻界来传达要好得多。

无论如何，由于我相信我在这次旅行中已做到了我所能做的一切，我打算在这个周末离开这里。未来的四十八小时成败将见分晓。

华盛顿感到烦躁不安的另外一个迹象是，它总想要安排一次总统的中东之行。我收到过白宫的无数次指令，要我向东道主探讨一下这种前景的可能性。我做这件事是花了代价的，因为这会使双方相信，美国急于要达成解决办法，这诱使他们为谈判设置障碍。总统的这样一次旅行显然假设要以穿梭外交成功为先决条件。如果失败了的话，那将使总统在这个地区的访问和我们的调解均归于无效，紧张局面将再度出现。随着这次穿梭外交一拖再拖，总统计划中的中东之行也一再延期，其结果是，白宫的指令成倍地增加，要我继续留在中东完成这项工作。

在整个这段时间里，我还得处理国务院的其他一些事务。值

得庆幸的是，这一段时期平安无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法国和英国的新政府正处于交接过程之中，他们欢迎有一个喘息的机会，以便确定他们今后的方向。中国希望我们在外交上取得成功，它不会故意分散我们应付主要困难局面的精力。苏联尽管对我个人的外交独脚戏感到不愉快，也不愿明目张胆地加以阻挠，以免缓和遭受风险——特别是在总统即将再次访问莫斯科的时候。发展中国家刚刚开过四月份的联合国大会第十六次特别会议，会上他们的慷慨陈词暂时满足了他们登上世界舞台中心的要求。

但是，对于一个国务卿来说，风平浪静只是一个相对的词汇。每天都有大量的电报象雪片一样飘落在我的旅行篷车上，要求采取某些行动。我在飞机上和在华盛顿的那些国务院的辛勤的工作人员不断保持公文往来。在许多问题上我都作了重要的决定。大西洋宣言进入最后完成阶段。我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外交部长们举行过两次重要的聚会，开始了我们和西半球的邻国之间一次新的有价值的对话。但是靠着一个公文包来履行我的职务总是有一定限度的。

在这种闹哄哄的情况下，我又重新担负起作为一个巡回精神病医生的任务。达扬根据西奈谈判的经验，建议双方的重武器应安置在打不到对方前线的地方——这在军事上说是有道理的，是无懈可击的。这个建议对叙利亚总统来说却不那么有吸引力，他认为这是用来保护在叙利亚领土上的以色列居民的一种手段，而且他还担心会要求他把他的防空部队撤到大马士革的后面去，阿萨德在为叙利亚的主权和尊严而辩护时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但是他所面临的抉择并不是在大马士革前面驻扎全付武装的叙利亚部队，而是达不成协议，让数量无限的以色列部队驻扎在距他的首都都不远的地方。

因此，敌对双方都带着苦恼和委屈的情绪，开始在苛刻的细节

上进行无情的格斗。我的调解内容是向一方解释另一方的想法，偶而也提出一个打破僵局的方案。

在最后的那些日子里，我们形成了一套日程表。早晨我在耶路撒冷和以色列谈判小组会晤。约莫在中午时分，我的汽车长队开往一小时路程以外的本—古利安机场。在下午早些时候，抵达大马士革。和阿萨德会谈之后——往往长达数小时——我又返回以色列，在这里一般还得和以色列谈判小组会晤。单是从五月二十日到五月二十五日这段时间里，我记了一下，我和以色列人谈了二十个小时，和叙利亚人谈了约三十个小时。我从来没有在午夜三点以前休息过。而我的同事们工作的时间甚至更长。最后到了五月二十五日星期六傍晚，我们又重新接近于达成一项协议——事实上已接近到这种程度，以致我说，“如果谈判现在失败，没有人能够解释是怎么回事。”

由于心理上疲劳的原因，双方都毫不掩饰地讲条件了。他们在距每方前沿阵地十公里的第一条兵力限制区中的武装部队人数和装备类型方面取得了一致意见。由双方签署的“美国方案”将把这个问题讲清楚。阿萨德不愿意与以色列签订协议，限制他在大马士革前面纵深十至二十公里宽的第二条兵力限制区中的地面部队。但是，他愿意我写一封信把他的意图表达出来，假如我们都同意他的意图的话。“美国方案”也要规定这个十至二十公里地带的武器限制问题：射程超过二十公里的大炮不得运进那里，地对空导弹不得部署在军事部署线二十公里以内的地方。

剩下有待解决的问题便是分界线的确切位置，所有的距离都是以此为基线来测定的。阿萨德仍坚决反对从叙利亚军事部署线（红线）往后撤，致使以前受到叙利亚军队保护的村庄暴露在敌人的炮火之下；以色列则不考虑任何其他的可能性。关于联合国部队驻防问题，我们提出了一个设想，把驻埃及的联合国紧急部队的

结构形式和自从一九六七年以来在戈兰高地上使用的传统名称结合起来。阿萨德不希望有一支“部队”，但他愿意接受“观察员”。果尔达反对设观察员，而却坚持要设一支部队。于是就产生一个混血儿，名称叫做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这难道不是合乎情理的吗？这样一来，就没有人能从它的名称推论其职责或特权了。阿萨德仍旧争辩着要把“部队”二字改成为“组织”，但是我想他不会为这个问题使谈判夭折。关于联合国人员的人数仍旧在进行认真的争辩。关于巴勒斯坦人的准军事性行动，叙利亚人还是不愿意提供任何正式的保证。

就在这个当口，苏联又变得活跃起来了。葛罗米柯再次宣布他要访问大马士革，弄不清是因为他认为达成协议的事已经迫近，还是因为他预料谈判会失败，或者也许因为他想要对付这两种可能性。我向阿萨德作了如下的反应：

一，我不愿意在大马士革见到葛罗米柯；二，如果葛罗米柯在大马士革，我就不来大马士革；三，除此以外，你们是一个主权国家，只要我上述两点意见被你们所理解，我就不愿意对你们说应该怎么做了。你怎么对待葛罗米柯，那是你自己的事。

到五月二十六日，事实就变得更明显。我再远离美国在这里呆下去，那就与我的国务卿身份不相容了。事实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务卿曾在外国不间断地逗留这么长的时间。葛罗米柯定于五月二十七日——我的生日——抵达大马士革。我希望得到的是一份更好的生日礼物。此去大马士革，该是最后一趟了。

最后阶段：大马士革，另一次危机

五月二十六日星期日，这是我穿梭外交的第二十九天，双方又一次处于大家都担心但又不知道如何逾越的关口。他们都知道，现在只要作出比较小的让步，就可以把最后协议确定下来。然而，谁迈进一步都从来不是那么痛痛快快的。他们使谈判进行到了这个地步，是因为有人——有时是以色列人，有时是叙利亚人——害怕生活在一个没有协议的可怕的世界中，可是双方都没有能更上一层楼，看到真正的和平前景。美国谈判人员身体已是疲惫不堪，情绪上也是心灰意冷，而双方的领导人却还要求他们作出难以调和的私人保证，以便为作出最后让步找到借口。时间的推移并不能减轻问题的严重性。如果双方在如此接近于达成协议时使谈判失败，重新开始谈判就需要下更大的决心，其困难也要大得多，而整个地区更有可能趋向于决裂，而不是和解。如果一个人要跃过一个深渊，失之一英寸和失之一码一样，肯定要落水。

在我离开以色列前往大马士革之前，果尔达于星期天在戴维国王饭店里一个命名得恰如其分的“蓝厅”里为我安排了一次盛大的午宴。午宴推迟了好几次才开始，因为我和以色列谈判小组的会谈一直没完，最后到下午三点才入席。我们狼吞虎咽地饱餐了一顿，因为所剩的时间不多了，我们还得赶到机场，按预定时间到达大马士革。气氛濒于绝望，因为我们的会谈很有可能功亏一篑。然而也有希望的气氛，因为当成功几乎是举手可及时，作出的所有牺牲一定都不会白费。果尔达发表了一篇非常动人的讲话，谈到我的穿梭外交如何帮助了以色列人了解阿拉伯人，这毕竟是一项主要的无形收获。

我认为他给我们上了一课：事情做对了，而且大家也认为我们是对的，这还不够；这些我们都知道。但是为了做到能够和我们这个地区的人真正坐在一起，我们还必须懂得，不去接受那些错误的东西，但至少还要去理解它们。我认为他是了解我们的；他和我们打交道表现出惊人的耐心——几小时、几小时，又是几小时……不管发生什么事，你和你们所有即将离开这里的人们，你们应该知道，对于每一个以色列人，对于这个国家的每一个男人、妇女和儿童来说，没有哪一件东西比这更需要的了，这件简单的东西便是和平。每天早晨起床，我们都要能确信，没有人因为受到来自边界那边某些人的袭击而死亡。我们不希望他们死去，我们不希望他们去杀人；我们不希望他们去枪杀其他任何人。当我们在这个地区获得平时，基辛格先生，至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认为你在功劳簿上应名列第一，其次才是以色列人。因为你使得和平成为可能，因为你理解和平，因为你希望和平，因为你知道，和平是我们需要的东西。我们希望和平将会来到，我深信，和平有一天将会降临。但是，如果你有可能在我还在职的时候实现和平，那我将加倍地感谢你。

我的答词是：

当我们开始这项艰难尝试时，有时我们认为它会失败，有时取得了一些进展。我们全都下定决心，不管这次特定的努力是成功还是失败，我们所开始的这项事业必定会成功。必须为这个地区带来和平，我们所有的人都将尽最大的努力来实现我们已经着手进行的事业……总理阁下，你代表来到这个国家的这一代人，当时成立国家还只是个梦想，你完成了很少人能完成的事——把一个民族聚集到一块土地上来，把这块土地变成为一个国家，又把这个国家变成一个家园。我们有幸和你在一起工作过的人，都为你那崇高的人格，以及你领导国家的才能感到鼓舞……我们和你一样希望持久和平。在和平的环境里，孩子们将永葆天真无瑕，所有的男人都能从事建设工作。

假如感情能为外交增添力量的话，我们本该于四时三十分离开以色列去大马士革举行肯定会有突破的最后会议。但是，感情

只能增加冲破冗长乏味会谈的持久力，凭着这种持久力，外交上取得了蜗牛爬行一般的进展，并在这个过程中调整一些细微差别。我在以色列给阿萨德发了一封信，说明我到大马士革访问将是最后一次了，绝不再来。

当我抵达时，阿萨德显示出并没有被我吓唬住的样子。他通知我说，由于我宣布第二天早晨要离开这里，他就接受了葛罗米柯在中午开始进行访问。但是他也表明叙利亚和苏联之间的界限。有人对他说，这样做看来是把事情做得太小气了些。他于是交待助手，很冷淡地把他的主要军火制造者的外交部长的到来推迟到晚上十点。即使这样，我们也只有二十四个小时可以用来完成任务。

五月二十六日星期天夜晚，我和阿萨德举行了两次会谈，一次是从晚间九点到午夜，许多顾问都参加了，他们那一方包括国防部长、空军参谋长、希哈比和哈达姆；接着是从十二时十五分到凌晨二时三十分，也就是在我的生日开始的时候，阿萨德和我在只有一位助手的陪同下单独进餐，与此同时，西斯科和哈达姆在审议各种文件的文本。但是，这两项分别举行的会谈的结果都是一样的。阿萨德不肯妥协，无休止地争论叙利亚的军事部署线（红线）、部队人数限额、联合国部队的规模以及巴勒斯坦人的问题。阿萨德还设法要美国提供书面保证，保证美国将要求以色列回到一九六七年的边界线。我除了答应美国继续参加和平进程外，无法作更多的承诺。同时西斯科在同哈达姆的会谈中也遇到了不可逾越的障碍。

我于凌晨三时到四时之间在国宾馆和西斯科以及其他一些同事开会。我们大家都脸色忧郁，精疲力尽，一致得出结论说，这次穿梭外交失败了。我将把第二天早晨和阿萨德的会晤变成一次礼节性的辞行拜会。

我的同事们都非常关心，要使我的生日过得愉快，不像现在这

样凄凉。托姆·斯科特在早晨准备了一大块蛋糕，为我举行了一次使人感到意外热闹的生日庆祝会。记者团模仿一家航空公司的广告，赠送我一条大横幅，上面写着，“我是亨利，送我去大马士革吧！”

这时我的工作从疲劳中略为恢复了过来，有股子热情劲儿，他们也给我带来一份生日礼物。一个月以前，我曾半开玩笑地批评过他们。当时龙·齐格勒声称，当尼克松在巴哈马群岛度周末时，他把一封谈到尼克松的信放在瓶子里冲洗干净了。“你们为什么不能替我做一件类似的事呢？”我问罗伯特·麦克洛斯基说。当时他负责新闻发布、国会联络和一切其他需要明智而又坚定的见解的工作。他把我的感慨记在心里，并找了一些善于磨造古董的以色列人为我做了一块小巧玲珑的棕色岩石，上面用希伯来语刻了一句话：“亨利·A·基辛格到此一游——5683年*——库奈特拉。”他的用意是，我是这个地区一位早期统治者的肉体再生；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我对戈兰高地的这个首府的每条街道、山丘和岩石都有这样深厚的感情。关于赠礼的一篇新闻稿中把这一切都清楚地加以说明。但是，最后麦克洛斯基没有这个勇气把这件礼物拿出来，或者是，他认为这天是我的生日——考虑得很对——气氛不太对头。三天之后，在返回美国的飞机上举行的一次仪式上，他兴高采烈地把这个石块交给了我。

我见到这块生日大蛋糕感到很高兴，但想到我即将离开这里，不免有点儿伤感。因此，在上午不到十时我向阿萨德辞行时，气氛既是温和的也是忧伤的。双方各带了一名助手（我的助手是彼德·罗德曼），由伊萨·萨巴巴夫当翻译。我们漫谈到谈判中的每个转折点，好像我们是作为旁观者在谈一件按自然规律发展而我

* 根据希伯来历书，5683年等于公元1923年。这是我的出生的年份。如果对库奈特拉没有意义，至少对富尔特也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年份。

们又无法加以左右的事情。想起了白宫一再催促，我又把尼克松希望访问这个地区这件事提了出来。阿萨德认为，在美国的穿梭外交失败之后来到中东，这恐怕与美国总统的尊严不相称。如果尼克松不认为如此，也许是由于得到了其他阿拉伯国家领导人的劝告（他说得很圆滑）；那么阿萨德愿意在大马士革接待他。我们还草拟了另外一份宣布休会的文件。我说阿萨德可以派人到华盛顿去继续会谈。对于我这个建议的措词曾发生了一点小争执。阿萨德无可奈何地说，“我们可以说我们为了其他目的派人到华盛顿去。如果我们在这里谈不成，派一个人到华盛顿也不可能谈成。”我们决定宣布派一名叙利亚特使去改善叙利亚和美国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去促进戈兰高地的脱离接触。

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我已经逐渐喜欢阿萨德了。他很自负、强硬、精明，也很热诚。他多次给我难堪。但是我亲眼看到他如何千方百计地去解决阿拉伯—以色列共处问题的艰苦过程。他反对阿—以共处思想，但现在已接近于接受这种思想了。像处在望远镜另一端的果尔达·梅厄一样，他也看到了和平的现实。所有的让步交易部分是出于策略，部分是出于一种精神上的冒险。我带点儿伤感的情绪站起来告别。他也站了起来。当我们开始走向门口的时候，阿萨德突然说：

在我们建立起了这种良好的、合乎人情的个人接触之后，出于忠诚和爱慕之情，同时也考虑到叙利亚—美国关系的必要性，我特别考虑到不应使你受到伤害。在你看来，当叙利亚的红线（叙利亚的军事部署线）是可以推进的时候，它究竟可以向前推进多远？让我们开诚布公地谈谈吧！

这真是一个令人震惊的举动。阿萨德已经使出了浑身的解数。现在又开辟了再一次作决定性的努力以达成一项协议的道

路。我在大马士革曾对他说，他使我想起了一个在悬崖峭壁上进行谈判的人，他为了提高讨价还价的地位，就往深渊里跳，希望在他下落的过程中会有什么东西把他挡住。这个“东西”现在就是我了。显然，没有哪一个叙利亚领导人会出于对一个美国国务卿的爱慕而同以色列签订协议；但是现在最好的办法是将错就错，这个道理只有在阿拉伯世界里才能说得通。在那里，个人关系决非无足轻重，它是解决民族感情的一种手段。

我不想做什么伤害阿萨德总统的事。如果总统接受了对他来说是勉为其难的事，并为他今后造成了复杂的局面，我们美国的重要目的就没有达到。所以我不打算强使——通过说服——总统做任何日后会对他造成伤害的事。因为这样做只是战术上的成功，但却是战略上的失败。

现在阿萨德已渡过了他最困难的阶段。如果他由于对我的不可控制的感情打算作出自我牺牲，像他似乎暗示过的那样，那是他自己的事。真正的情况一定是，叙利亚的领导人在前一天晚上就决定要解决，但是还想弄确实是否已经从石头缝里挤出了最后一滴油。我于是提出——作为我个人的想法——红线再往前移一公里，这是以色列谈判小组允许我提出来的，但是我在前一天晚上压着没有提出来，因为当时提出来只会被淹没在一般的争论之中。我还提出了解决叙利亚村庄问题的方案，作为我个人的建议；这些村庄座落在新的叙利亚分界线以外的中间过渡地带。我建议，红线绕过村庄，成为香肠形状的凸出部。而且如同以色列在库奈特拉西面的山丘那样，叙利亚人应承担同样的限制——即不安置任何能够直接打到以色列地区的武器。

我们在关于阿拉伯反以色列突击队员的问题上争论了好几分钟。阿萨德说，他不同意在禁止巴勒斯坦的行动方面承担任何法

律责任。这是一个很难处理的政治问题，而且是一个原则问题。我建议由美国发表一个声明，说明按照美国的观点，戈兰高地的停火应包括游击队的活动。如果游击队采取任何行动，而以色列进行报复，美国将在政治上支持以色列。阿萨德认为，美国发表声明，那是我们的事。他看不出叙利亚有什么理由要公开加以反对。看来一个解决方案又一次在望了。

但是，我们受过的挫折太多了。因此，我对阿萨德说，如果他向我保证不再扯皮，我准备再作一次努力。我们应草拟一个只是有待以色列认可的文件，我可以把它带回耶路撒冷。我们不再作进一步的谈判，只要开一次草拟文件的会议就够了。阿萨德将和他的同事们商榷一番，而我也将和我的同事复议一下。他和我将在一小时内再次碰头，以决定是否可行。不这样办，我就不再继续管这件事了。我们在上午十一时三十分分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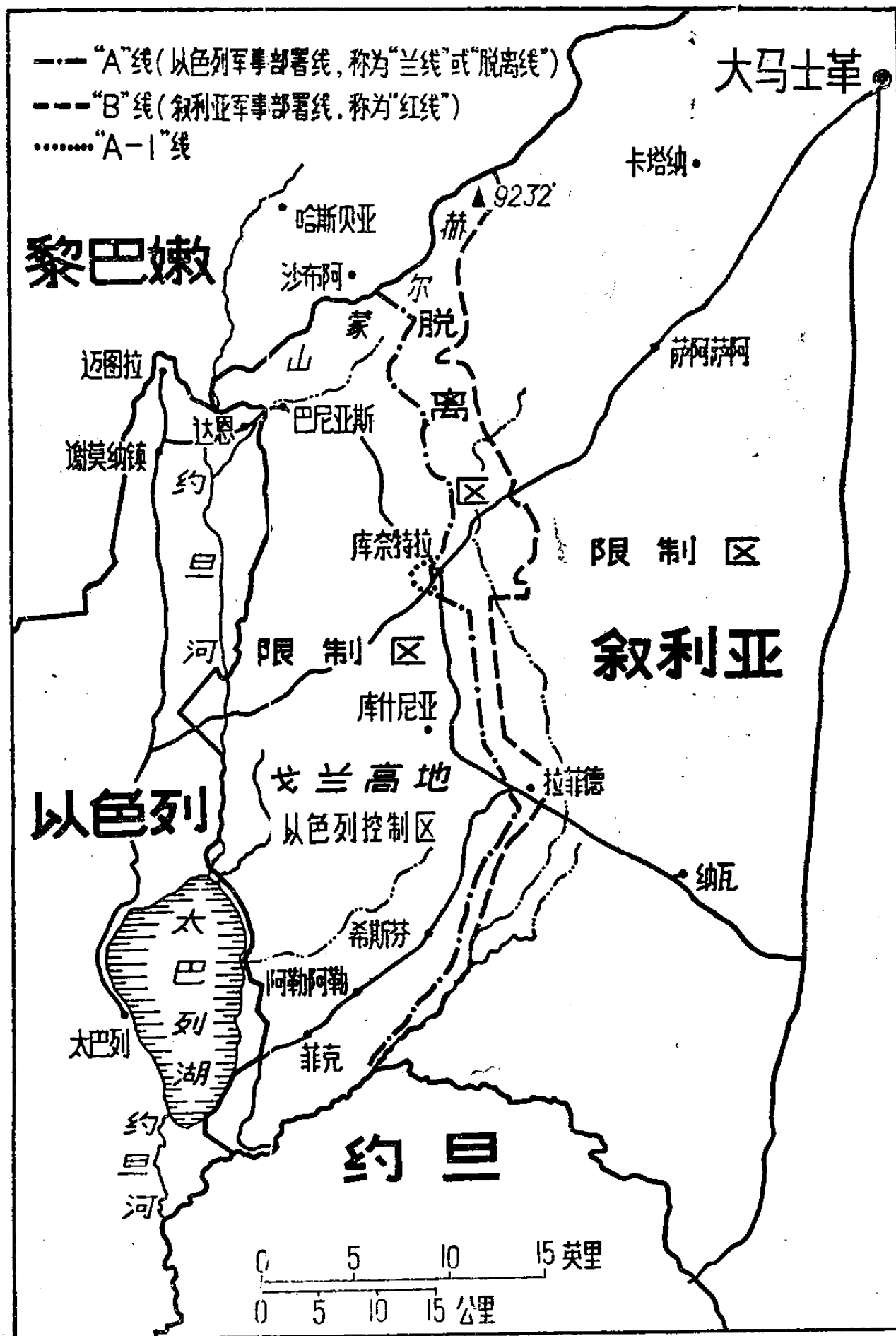
下午十二时三十五分，我们再度会晤，并且相互保证，我们只进行草拟文件的工作，不开讨价还价的会。我们规定时间最多不得超过三小时。我通知以色列内阁，我定于下午六时返回以色列。

阿萨德和我以及顾问们于下午二时二十分会晤。但是要让叙利亚人不扯皮，等于是命令河里的鱼不游水。过不多久，我们就发现我们又陷于可怕的意志考验之中，只是由于阿萨德说了几句挖苦的俏皮话，以及阿拉伯人的细致殷勤的招待（由于这是谈判结束阶段，在兴奋状态中。这种招待并没有包括请我们吃一顿饭），才使紧张的气氛稍为有所缓和。到晚上十时，也就是七个半小时以后，我们工作的结果基本上和阿萨德同我在早晨会谈的结果差不多——不同之处是，阿萨德已经向他自己和他的同事们再一次证实，再进一步讨价还价也不会取得什么进展了。我们把红线划定在——有待以色列认可——阿萨德和我一致同意的地方（参见第三三三页地图）。我们把联合国人员定额规定为一千二百五十人，

并把其名称最后定为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UNDOF)。阿萨德的要求满足了，在大马士革前面，按协议划定的十公里地带以外，他的坦克和部队人数可以不受限制。但他向我担保，他在那里的兵力部署不会超过九个旅，其中装甲旅不超过三个。我将在写给以色列的一封信中将这些限额向他们转达。他同意，在十至二十公里地带，他所部署的大炮，其最高数目为一百六十二门，射程不超过二十公里。射程更远的大炮将部署在二十公里以外。地对空导弹将不部署在叙利亚军事部署线二十五公里以内。所有的部队限额——如像西奈脱离接触协议那样——将是叙利亚和以色列对“美国方案”响应的一部分。我们留待西斯科于第二天中午带回以色列的答复。这就意味着我们将不作进一步的谈判，西斯科将只是受权转达文件的定稿。

剩下来还有葛罗米柯要对付。晚上九时左右，他的飞机到达大马士革上空，当时阿萨德和我仍在进行谈判。我说，为了让以色列赶快接受建议，避免给人以葛罗米柯起决定性作用的印象是很重要的。空军参谋长认为，这没有什么问题；葛罗米柯的飞机可以在空中盘旋。到下午九时四十五分，葛罗米柯飞机的汽油快要用完了。我慨然同意飞机可以着陆，条件是，它不要停靠在我的飞机旁边——我不希望新闻照片暗示我们在采取联合行动。所以他们让葛罗米柯的飞机降落在机场的一个阴暗的角落里，在那里他受到叙利亚外交部副部长的欢迎——因为所有的高级领导人都在和我会谈。为了做得更加周到，阿萨德答应在没有收到西斯科从以色列带回的答复之前，不接见葛罗米柯。

我在希哈比和哈达姆的陪同下驱车前往机场。葛罗米柯的汽车长队与我们的汽车迎面相驶而过。这是意味深长的时刻，它象征着中东最近在外交政策上的彻底改变，这要比我在那个月里所争论的一切问题都更加意义重大。



一九七四年五月三十一日叙利亚—以色列脱离接触协议

我收到了这一生中最好的生日礼物：如果中东不是实现了和平，也至少是争取到了相当长的一段没有战争的时间，以便有机会开展外交活动。

我知道我还没有得到以色列的最后认可，但是我本能地感觉到，事情已接近成功，失败是不可能的。

最后阶段：以色列

在前往机场的路上，我曾提醒哈达姆说，我们在大马士革所达成的每个解决方案：在耶路撒冷都会成问题。我们将和以色列谈判小组作长时间的通宵会谈，也可能一直谈到第二天白天，再和内阁去谈。我将于第二天派西斯科带着答复返回大马士革。我们就不能再举行谈判了。叙利亚要么同意，要么拒绝。

尽管我们已完成了文件的草稿，而且几乎把以色列所有的意见都写进去了，但仍然有一段不愉快的回忆，那件事发生在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当时我很天真地认为，我们已取得一项协议，因为阿萨德对果尔达所提出的每一个问题都表示同意了。于是，我就派西斯科去征得以色列的最后认可——使我感到伤心的是，我竟被指责为在下最后通牒。因此，这一次重要的是，为了以色列的自尊心，不应使谈判的最后阶段看起来好像是由大马士革在支配一切。因此我在大马士革机场以极大的克制对新闻界发表了以下的谈话：

我们已把分歧缩小到最低限度，现在我正准备回以色列，今晚和以色列谈判小组举行会谈，看看他们对于如何消除这些分歧有些什么看法。明天我的小组成员西斯科先生将返回大马士革，把他们的考虑带给阿萨德总统和外交部长。

我加上一句说，这一次我就不回叙利亚来了。

这一次，我飞机上的那些精明强干而又老练的新闻记者们都没有觉察到其中的奥妙。毫无疑问，精疲力尽是主要的原因。但是他们都误解了西斯科回去的重要意义。事实上，两种解释必居其一：要么是已经达成一项协议，只差最后修饰了，要么就是达不成协议。由于近五个星期以来，我们一直濒于失败的边缘，这就使得第二种解释显得更有道理了。结果是，就在协议似乎唾手可得的那一天，许多有分析能力的新闻记者都在推测失败的原因和后果。他们都是抱着惋惜的心情和善意来进行推测的。他们的推测除了使白宫心神不定外，没有造成损失。

五月二十八日星期二凌晨一时，果尔达把她的谈判小组成员召集到一起，她倒没有什么疑虑。她很快就知道已经取得了突破。我们非常细致地从头到尾回顾了一下过去二十四小时的会谈，我们再度审议了叙利亚的军事部署、赫尔蒙山、巴勒斯坦人和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的组成等问题。我说我把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的人数规定为一个说不出什么道理的数字，即一千二百八十六人，这使得以色列内阁惊异不止，不知道这个数字是怎么决定的。

我们谈了两个小时。我的声音都嘶哑了，几乎连话都说不出，人也疲惫不堪。时间已接近凌晨三时。最后，果尔达听够了。她打算在五小时以后，即上午八时召开内阁紧急会议。作出决定的时刻几乎就在眼前。“你们这些年轻人去睡觉吧！”果尔达面带笑容地宣告暂时休会。

我知道，她将和她一直坚持以色列的要求那样强烈地争取内阁同意这项协议。经过几个星期有时激烈而往往是难以理解的争论，我们现在大家又都面临基本问题了；施加压力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便归纳为下列几句话：

你们已经作出很大让步。如果你们决定不同意这项协议，没有一个美国人会认为你们是不讲道理的，因此在考虑协议时不用考虑这一点。应该考虑的是，对比一下达成协议和达不成协议的后果有哪些基本不同点。虽然和你们签订协议的这个国家的基本可靠性并不大，但是如果不签订协议，它的可靠性也就更小了。

美国谈判小组大约是在凌晨三时三十分去休息的，而且一直睡到上午九时左右。那时果尔达已经在召开内阁会议。我盼望决议赶快作出来，并且告诉阿萨德说，西斯科将于中午时分把以色列的最后决定带回给他。他答应在没有见到西斯科之前不接见葛罗米柯，这表明叙利亚是把我们放在优先地位的。

经过好几个星期马不停蹄的奔走，我的同事和我都把事情办完了。我们坐在戴维国王饭店的套间里俯瞰耶路撒冷旧城。岩石寺——伊斯兰最神圣的清真寺之一——的金色圆顶在柔和的春天的阳光下闪闪发亮。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另外几座并不那么秀丽的山丘曾引起多少人大动肝火啊！隔一段时间，迪尼茨打了个电话告诉我说，内阁还在开会。我的不安心情由下列事实可以想见，我曾三次打电话给他。最后，在下午一时十五分，迪尼茨告诉我下列消息：内阁表示同意，但还需要和我再谈一次。下午二时，我和果尔达、达扬、埃班、迪尼茨、古尔和总理办公室主任莫德凯·盖齐特进行了会谈。陪同我参加会谈的有西斯科和罗德曼。

果尔达抓紧时间，开门见山谈问题。“你看，从八时三十分到十五分钟之前——开了一个不愉快的会，因为每一个人都同意，我们必须达成一项协议——但是每一个人又都认为，如果在恐怖分子问题上没有一点具体规定——”

我们又回到这个最难对付的问题上了。在发生马洛特事件之后，对以色列人说，在协议中不谈恐怖主义问题是行不通的。回过

头来说，要求那些脾气暴躁的大马士革民族主义者与巴勒斯坦人公开断绝往来，那也同样是办不到的。同时，事实上，这几年来，在戈兰高地上实际上并没有发生过什么恐怖事件。任何一个熟悉叙利亚政府体制的人都知道，大马士革不会让它所控制不了的准军事组织在它的领土上进行活动。这是阿萨德最不希望出现的事，我说：

根据我所了解的情况，真正的问题在于，你们的国内情况要求你们对此（恐怖主义）加以注意，而他的国内情况则要求他对此予以否认。实际情况正如我们所说的……你越是想要得到正式保证，你越是难以得到这种保证。

但是，以色列人还是希望得到某些保证——什么保证，他们自己也不十分清楚。他们所坚持的一点是，我应该再回大马士革去走一趟，并带回某种保证。这是一件难办的差使。他们心里很明白，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使协议告吹，并不会减轻恐怖主义的危险，而且肯定会使事情更糟。他们正在为了一个政治的和心理的问题要求得到法律的保障。他们特别需要一些保证来提供给国会，因为他们曾轻率地向国会许诺，在签订任何协议之前要先交国会审议。

以色列小组为了减轻我的工作，在对现有的文本作了若干草率的文字上的修改之后便接受了下来。他们一致同意我的建议，把叙利亚的军事部署线向前推进，只在一个地方有保留。大约在下午三时十五分，果尔达把我带进她的小办公室。她说，三天之内她即将下台了，这次协议使她能够为上次的战争划下一条线。从此她可以说，她已完成了任务。她想要我而不是西斯科到大马士革去走一趟，以便万一事情在最后时刻失败了的话，她仍然能够心安理得。我比任何人都更能使阿萨德作出让步。即使我做不到，

她至少也可以知道，我已尽了最大努力了。我勉强同意了她的要求。我告诫她说，在大马士革，我得对葛罗米柯作短暂的礼节性拜会；同住一个城市而拒绝和他见面，那也未免太不讲礼貌了。

因此我便通知大马士革说，我将于下午五时三十分离开以色列，并希望到了之后尽可能快地见到阿萨德——这是我们之间关系改进到什么程度的一个征候。四个月之前，要敏感易怒的叙利亚人让一个美国人来规定和他们的总统会晤的时间，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

就这样，在我宣布最后一次离开大马士革之后不到二十四小时，我又回到叙利亚的首都。星期二那天傍晚，哈达姆出现在机场，继续我们之间的友好对话。“欢迎，”他热情地对我说。“我认为，即使是外交部长也不能破坏这个协议，”我回答说。在前往宾馆的途中，哈达姆对我说，由于西斯科返回大马士革的时间推迟了，阿萨德不能履约不去接见葛罗米柯。那只是一次礼节性的拜会。时间不到半个小时。拜会时，关于谈判的情况，叙利亚人吐露得很少。我对这些守口如瓶和有自尊心的叙利亚谈判者十分了解，因此对他的话深信不疑。

晚上八时十五分，我和阿萨德单独会谈，在场者只有伊萨·萨巴巴夫。现在的问题又归结到人性问题上来了，我的任务是解释动机，而不是去寻找答案。我带着某种感情解释以色列人所具有的不安全感，特别是在马洛特事件发生后的这个星期更是如此。我深信阿萨德对此是理解的，但他有他自己必须履行的职责。他和葛地但却是动感情地谈到一个没有家园、没有国籍而且特别是前途茫茫的民族的身心痛苦。要他表现得站在巴勒斯坦的敌人一边，从而削弱巴勒斯坦人对前途所抱有的微弱的信心，他没有权利这样做。同时，过去游击队不曾进行活动，也并非偶然的事。看来将来的情况也不会有什么变化。戈兰高地将不会成为游击队的地

盘，这是由于叙利亚采取了审慎的政策，而不是由于以色列的威吓，或者叙利亚作的没有约束力的诺言。我对游击队为什么不大可能在戈兰高地出现的道理，作了进一步的了解。在我们花了五个星期的时间推敲每个细节之后，我有责任向以色列内阁阐明我的看法，即：游击队进行活动的可能性是极小的。我认为，以色列应该接受美国人提供的一项保证，即：如果我们的判断被证明是错误的，以色列对于游击队在戈兰高地上的袭击进行报复，它将得到我们的支持，而且不会被认为是违反停火协定。

晚上十时四十五分，我准备——并不急于——离开。我知道果尔达以及实际上全体谈判成员都在等待我。阿萨德根本不理睬这一点，他非得要我和他及他最知己的合作者共进晚餐，否则不得离开。他们是：国防部长塔拉斯将军（他会写诗）、陆军情报部长希哈比将军、空军参谋长贾米尔和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哈达姆。他们是被邀来和葛罗米柯共进晚餐的，这时都等得饥肠辘辘了。我推托说，葛罗米柯在等着见我。阿萨德冷冷地说，“没关系，你吃的是他的晚餐。”

因此我们大伙儿都到阿萨德的小餐厅去，这间房间与其他房间一样，是茧形结构。气氛从来没有这么轻松和亲切。席间，我谈到葛罗米柯曾经告诉过我，他捕到过一种西伯利亚鸟，这种鸟必须要模仿它配偶的叫声才能诱捕得到。我问阿萨德，葛罗米柯是否给过他听模仿这种鸟叫的荣幸。阿萨德嘲弄说，“他只在你面前才叫。”我建议葛罗米柯可以用学鸟叫来代替发表临别声明。

阿萨德揶揄我不敢让西斯科单独到大马士革来。我回敬他说，我怕的不是他的失败而是他的成功。于是我便带讽刺性地称赞他为联合国部队命名而表现出的才华。

基辛格：这是一首史诗（笑声）。他是从国防部长那里学来的。只要这个

小组成员还活着，他们都将知道，他们所做的是有史以来的六千年中从来没有人做过的：人们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组织名叫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笑声）

阿萨德：这也是我昨天的感想。

基辛格：我从来没有听到过国防部长的诗。

希哈比：我听到过，而且有不同的理解。（笑声）

于是国防部长塔拉斯使用胡说八道的阿拉伯语背诵了一首长诗，逗得我们的叙利亚主人们捧腹大笑。

这样闹腾了一小时之后，我们都回到会议室去再一次核对地图。当我们最后一次详细检查五个星期以来费尽了我們心机的所有的山丘和街道时，陆军参谋长和我们一道共同参加了这项工作。最后，我们就公布协议的程序达成一致意见——我们希望在叙利亚时间第二天下午七时公布。签字仪式在星期五（五月十一日）举行。

午夜时分，最后我到一座我不熟悉的国宾馆去拜访葛罗米柯。对于苏联外交部长来说，这是一个降低身份的住所，但他处之泰然。关于脱离接触谈判，我们只谈了不到十分钟，葛罗米柯要么真是一个了不起的演员，要么他真是一无所知。他所模模糊糊了解的唯一问题是，叙利亚正式拒绝承担约束游击队的责任。可以预料，葛罗米柯是支持叙利亚观点的，但并不太热情。他的行动，与其说是象一个超级大国的外交部长，倒不如说是象一个对很久以前的外交事件进行分析的教授。他和我泛泛地交换了一下关于欧洲安全会议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意见，约摸过了半个小时，哈达姆来接我上机场去了。

在汽车里，哈达姆再次向我提出保证，关于美国对游击队袭击的立场的单方面声明，叙利亚将不作任何反应。尽管葛罗米柯已

到了大马士革，哈达姆还是倾向于把关于达成协议的事由华盛顿正式通知莫斯科。对于我来说，这除了说明反常以外，其原因似乎是不可理解的。他希望公布协议的时间最好能提前到下午五时。

五月二十九日星期三凌晨，我回到了以色列，随即开始另一次通宵会议——从半夜二时十分开始。果尔达通知我说，拉宾接替她组阁。她将于六月二日星期天将协议交给国会去讨论。五月三十一日星期五将是她担任总理职务的最后一天。在她结束政治生涯的时刻，她的心情是平静的。我认为我觉察到她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因为她作为总理，将把战争中的最后一批以色列战俘弄回国，而且对于这次战争她一直是感到内疚的；再就是她能够主持戈兰高地的停火。

但是，不管是离职在即也好，或者是希望圆满结束她的政治生涯也好，都没有使她的警惕性有任何减低。在安静的凌晨时刻，我和她单独会谈，回顾了一下我和阿萨德的讨论。我们一致同意果尔达可以向她的国会就游击队袭击问题发表一个声明，这篇声明在数易其稿之后在国会纪录中是这样记载的。

就制止恐怖分子活动来说，美国已把它对协议第一段的立场向我们阐明，那就是：“武装集团或个人越过分界线进行袭击活动，是违反停火协议的。以色列在行使其自卫权时，可以采取一切可利用的手段来制止这样的行动。美国不会认为以色列的这些行动是违反停火协议的，并且将在政治上予以支持。”

我想，如果没有一个坚实基础为依据，美国是不会发表这样的声明的。我公开发表这个声明，是和美国打过招呼的。

叙利亚对于这篇声明没有作出反应。

果尔达·梅厄为了争取每一英寸土地作过艰苦的斗争，还仔

细推敲过每条例外条款。但是，她现在是把她的要求放在信用的基础上了。这标志着，到头来，互相猜疑的双方领导人还得以承认这个把握不定的现实收场。

从半夜二时四十分到四时，我与以色列谈判小组的全体成员进行会谈。不多一会儿，内阁再次开会，批准了协议。

我们连松一口气的时间都没有。我们必须极度紧张地完成所有的文件，并把这些文件送交大马士革（由于还得通过华盛顿这条途径，事情就不那么容易了），而且还得安排公布和签字等各种程序。又出现了最后一分钟的障碍。当时叙利亚人突然要求把协议的公布时间推迟五个小时，并把签字的日期从五月三十一日推迟到六月二日——这样就把这件事推迟到梅厄夫人的总理任期之后，从而需要新内阁来重新加以批准。我怀疑这是葛罗米柯插了一手。结果，经过一系列措词强硬的文电交涉之后，阿萨德同意按原定程序办事。

最后在华盛顿时间五月二十九日星期三下午一时（耶路撒冷时间下午七时，大马士革时间下午八时），尼克松总统在白宫新闻发布室宣读了下列声明：

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博士和叙利亚及以色列所举行的会谈导致了一项关于叙利亚和以色列军队脱离接触的协议。协议将由叙利亚和以色列军事代表于五月三十一日星期五——本星期五——在日内瓦会议的埃及—以色列军事工作小组内签字。*

那天晚上，果尔达在总理府陈设简朴的会议厅举行了一次招待会。所有的内阁成员及国会领袖都出席了。所有出席招待会的

* 协议是按规定时间签字的。其全文和“美国方案”的全文见章末注③。

人都面带倦容，但心情却很宽慰。这些面带倦容的男男女女难道就是那些顽强地进行讨价还价而且不惜作出一切牺牲的人？这种心情宽慰是否表明，他们确实担心过他们表面上似乎并不在乎的紧张局面所招致的后果呢？或许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在八个月近乎无休止的危机之后，以色列的领袖们的精神源泉已消耗殆尽。他们没有在恐惧面前低头，他们又不敢对他们的希望怀有信心。因此，他们就好象螃蟹那样爬行，不敢大模大样地行动，但是毕竟还是毫不含糊地导致了一项协议。

果尔达疲惫得几乎说不出话来，但她的讲话却充满着一个饱经战争风霜的民族的伟大梦想：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不平凡的夜晚。在这样一个夜晚，人们陶醉于以往的伟大成就，进行内心的自我反省，对于以往看来是不可能的事，探讨了它的可能性。

我们希望的这一天，不仅为我们的北方边境立即带来了平静，而且叙利亚的母亲们，以色列的母亲们，叙利亚的年轻妻子们，以色列的年轻妻子们和边界两边的儿童们，他们都可以在夜里无所恐惧地安睡，梦见他们所熟知的人——如果他们的亲人今天还活着，明天会不会还活着呢？这就是我们为我们的人民和为我们的邻国人民所抱的希望，而且我们希望一切都顺利。我们祈祷一切顺利，但愿这是和我们所有的邻国和边境各方实现真正和持久和平的开端。这也是为了边境两方人民的利益。

以色列已经够主动照顾对方的了，它的总理居然能够发自肺腑地说出以色列人民以及叙利亚人民的希望和梦想。

我说了几句应景的话，大意是说，我们永远也忘不了过去几个月的经历，以及工作结束时人们的心情。接着我便吻了一下果尔达的面颊。但是果尔达岂能长久按下心中的伤感不说。她对我与

阿拉伯国家的领袖们拥抱仍记忆犹新——而且还有几分不满，她说，“我还以为你只吻男人呢！”

第二天，阿巴·埃班把我送到机场，而且带着怀旧的感情对我说：

国务卿今晚将不回来了。这是一件理智上能够理解而感情上接受不了的事。每天开会几乎快成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了。

接着他将过去五个星期心理上的重大意义加以总结：我们曾到了绝望的地步，然而由于坚定的意志和对于和平的信念而越过了这一关。

我在开罗作了短暂的停留，拜访了脱离接触之父安瓦尔·萨达特。我们在开罗的吉萨区总统宅邸举行会谈，起初只是两个人的单独会谈，其后顾问们也参加了。萨达特感到非常宽慰。近六个月来，他一直忍受着阿拉伯国家的奚落。因为他在一月单独签订了一项脱离接触协议。但是，如果没有他的这种勇气，在两条战线上肯定都会出现僵持状态。三十四天的叙利亚穿梭外交的严峻考验表明，如果西奈半岛和戈兰高地的谈判同时进行的话，将不知会出现什么情况。僵局一定难以避免，很可能出现另外一次爆炸性局面。不想办法解救第三集团军，它就不能在沙漠里呆下去。阿萨德在争取国内的支持以进行和平努力方面会遇到很大的困难。萨达特使以色列军队第一次撤退成为可能，这其中阿拉伯国家的外交起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他已经在考虑今后的问题了。现在道路业已打通，可以大踏步地走向和平，并把他的外交方向加速转向华盛顿了。他盼望着尼克松的近期访问，作为埃及信任美国的象征。我们决定宣布成立一个经济、科学和文化合作的联合委员会。我们之间已经建

立起了信任和感情。在此基础上我们谈到了下一步在各个阿拉伯国家前线可以采取的步骤。萨达特问起，拉宾这个人是否具有果尔达那样的魄力。我对他提出这样有意义的问题夸奖了他一番。因为他没有只是肤浅地问他是鹰派还是鸽派。萨达特希望拉宾有足够的时间“站稳脚跟”。他很明智，懂得只有耐心才能使以色列克服心理上的障碍，这反而会加速和平的进程。萨达特也需要时间，以便在阿拉伯世界中建立一个“美国的新形象”。他把我叫做“魔术师”；我说是他使我成了魔术师。这是实话。他改变了现实状况；我只是协助叙以双方走向他所打开的道路。

如果这次叙利亚的穿梭外交是一次磨难，也说明了事物趋于成熟的过程。西奈脱离接触协议没有遇到非难：巨大的困难已经得到克服；有一位巨匠在把握事物的本质，很快得出了结论；愿望和成就几乎相等。但现实世界并非如此，至少在感情和原则上都存在着深刻分歧的中东不是如此。萨达特凭借他宽厚的风度，把和平进程变成为崇高的事业，使几十年来取代真正对话的难解难分的争执，看起来成为毫无意义的事情。而在戈兰高地上却没有施展这种宽厚风度的机会。双方都不具备那种开阔的眼界。每一次让步都是从他们的灵魂深处硬挤出来的。谈判是一系列无休止的争论。但是这些争论却是旅途中必然要穿越的精神关卡。在每次紧要关头，双方都濒临预示着冲突将会再起的深渊。然后他们又退回几步，他们不能让自己放弃这第一次争取和平的机会。因此这次长时间的穿梭外交就取得一项协议——尽管有其内在的复杂性、脆弱性和不信任——这项协议几乎有十年没有面临重大的挑战。没有提出过严重违反协议的指控；尽管黎巴嫩发生过几次危机，但没有出现过戈兰高地协议可能垮台的情况。自从协议签字以来的八年中，没有出现过一件与我的判断相左的事——那天

晚上深夜时分，我在阿萨德的气氛忧郁的起居室里作过关于游击队活动的判断。因此，根据那个判断忠实地行事证明是正确的。*

戈兰高地的脱离接触，其重大意义并不完全是心理上的，或者甚至也不主要是心理上的。在政治方面，它标志着一次重大的突破。如果激进的叙利亚能够同以色列签订一项协议，那么和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举行会谈，就不会有什么思想上的障碍。那年夏季，中东国家的外交部长们一个接一个地来到华盛顿，试探我们的政策，这表明——并非偶然的——苏联在这个地区的作用正在缩小。在试图达到更为全面的目标之前，我们计划至少再采取两个局部步骤；我们将把约旦和叙利亚撮合在一起，对西岸问题作一次认真的谈判。我们认为，在西奈半岛问题上还可以采取进一步的步骤，让以色列再作进一步的撤退，以换取政治上走向和平。在叙利亚穿梭外交行将结束之际，我们还没有决定首先采取哪一种方针，但对于两者来说，叙利亚以色列脱离接触则是一项先决条件。沿着这条路线前进，我们就能够同时在几条战线上取得进展。甚至叙利亚也希望我们继续谈判下去。在对约旦采取了步骤和达成另一个埃及协议之后，我们打算探索一下在所有各条战线上结束交战状态的可能性。

因此，对于我们来说，这次叙利亚穿梭外交似乎是十月战争所引起的世界性危机和我们努力争取的世界和平之间的分水岭。一个遭到宪法危机折腾的美国究竟能有多少作为和成就还不得而知；但是我们并没有感到我们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恰恰相反，我们计划继续朝前走——而我们的确是这样做了。我们热切地希望，在这个过程中，这样的时刻将会到来，即：所有这个地区的国家将采取步骤走向和解，很久以来他们所遭受的牺牲赋予他们以权

* 本文写于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以色列并吞戈兰高地之前。

利来这样做。

① 参见《纽约时报》，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二日和十七日。

② 摩西·达扬：《我的一生》（纽约：威廉·莫罗出版社，一九七六年），第五八三——五八九页。

③ 于一九七四年五月三十一日在日内瓦签字的以色列和叙利亚武装力量脱离接触协议，以及关于兵力限制的《美国方案》这两个文件的全文如下：

一、从签署这项文件之日起，以色列和叙利亚将严格遵守陆、海、空军的停火规定，并停止一切互相攻击的军事行动，以贯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二日第三三八号决议。

二、以色列和叙利亚的军队将按照下列原则予以隔离：

1. 所有以色列的军队将驻扎在所附地图上表明为分界线 A 以西的地区，库奈特拉地区例外，在这里，他们将驻扎在分界线 A 以西的地区。（参见第三三三页地图）

2. 分界线 A 以东的一切领土将归叙利亚管辖，叙利亚的平民将返回到这里居住。

3. 分界线 A 和在附图上标明为分界线 B 之间的地区将是一块隔离区。根据所附议定书建立起来的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将驻扎在这一地区。

4. 所有叙利亚军队将驻扎在附图所标明的分界线 B 以东。

5. 经同意，将建立限制军备和兵力的两个对等地区，一个在分界线 A 以西，一个在分界线 B 以东，

6. 双方的空军将可以在各自的分界线内活动，而不受另一方的干涉。

三、在附图的分界线 A 和分界线 A-1 之间的地区内将不驻扎军队。

四、本协议和所附地图将在联合国主持下的日内瓦和平会议埃及—以色列军事工作小组中，在一位叙利亚军事代表加入该小组之后，并在美国和苏联的代表参加的情况下，由以色列和叙利亚军事代表在一九七四年五月三十一日之前在日内瓦签字。详细地图的精确绘制和部队脱离接触的实施计划，将由叙利亚和以色列军事代表作出，他们还将议定这个进程的各个阶段。上述军事工作小组将在联合国的主持下于本协议签字的二十四小时之内在日内瓦为此目的开始他们的工作。他们将在五天之内完成这项工作。脱离接触将从军事工作小组完成任务之后的二十四小时内开始。脱离接触过程将在其开始之后的二十天内完成。

五、一、二、三各项条款将受到包括根据本协议组成的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在内的联合国人员的监督。

六、本协议在日内瓦签字后的二十四小时内，经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核实的一方扣押另一方的受伤战俘将受到遣返。军事工作小组完成工作的次日早晨，所有余留下来的战俘都将予以遣返。

七、本协议签字之后的十天内，双方所保存的对方阵亡士兵的尸体将被运回他们各自的国家予以埋葬。

八、本协议不是和平协议。它是走向以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二日所通过的安全理事会第三三八号决议为基础的公正和永久和平的一个步骤。

以色列：陆军少将

赫茨耳·谢菲尔

(签字)

叙利亚：陆军准将

赫克马特·阿尔-希哈比

(签字)

联合国连署人：恩西奥·西拉斯伏

(签字)

美国方案

为了促进叙利亚和以色列之间的协议，实施该协议并协助维护认真地遵守陆海空方面的停火，美国特建议下列规定：

(1)分界线 A 以西和分界线 B 以东之间限制军备和兵力的地区将为十公里宽。在每个地区，各方可以允许驻扎：(a) 两个旅的武装部队，包括七十五辆坦克和三十六门短射程 122 毫米大炮；(b) 每方的全部武装力量不得超过六千人。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将在这十公里地区内监督这些规定的实施。

(2)在分界线 A 以西和分界线 B 以东十至二十公里之间的地区内：(a) 不得装备射程超过二十公里的大炮；(b) 允许设置的大炮为一百六十二门，其射程不得超过二十公里；(c) 地对空导弹将不得装置在近于分界线 A 以西和分界线 B 以东二十五公里的地方。

(3)对上述第二条各项规定的监督将由美国空军侦察机执行，并将侦察结果提交双方。

(4)分界线 A 和分界线 B 之间的隔离地区将不驻扎任何军队。在该地区的城市和村庄所驻扎的警察部队，其规模和性质与驻扎在叙利亚同样大小城市和村庄的警察部队相同。

(5)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将接管赫尔蒙山的隔离地区的阵地。在该地区不得进行任何性质的军事观察。

第二十四章

最后的骚动

萨尔茨堡记者招待会

在叙利亚的穿梭外交不断进行的时候，我们靠回家的美梦支撑着自己，好像沙漠流浪者心中盼望着绿洲。工作时间越长，神经越紧张，穿梭外交结束之日就越是像田园牧歌，情趣盎然。我们本不会相信，这个前景竟成了海市蜃楼。

后来证明，叙利亚—以色列脱离接触成了尼克松政府最后的主要成就。当时好像全国都默认我们需要活下去，所以我们对外政策的核心居然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受到水门事件在国内造成的无穷后患的冲击。但是，好景不常。当一个社会的结构已到了分崩离析时，无论怎样克制迟早总是会坚持不下去的。叙利亚协议刚一签订，外交政策就受到了直接的责难。似乎使我免遭人身攻击的那层保护膜也突然被撕得粉碎。

五月三十一日上午一时五十分，我结束了三十四天的穿梭外交之后返抵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受到了可能是迄今给予国务卿的最热情的欢迎。《新闻周刊》的封面上刊登了我穿着超人服的照片。《时代》的封面虽然不那么引人入胜，赞誉之词也同样是近乎过份的。评论家们把穿梭外交描述成历史上最伟大的外交成就之一；没有记录说我抵制过那些夸饰溢美之辞。有一个（来历不明的？）故事到处流传，说有人在一次宴会上感谢我拯救了全世界，而我却志得意满地回了一句：“没什么！”

实际上，我的心境要复杂得多。我已经是身心交瘁了。我体会到在全力以赴之后总要出现的那种松劲之感。而且我比很多人都更懂得了成功与失败之间的界限是多么难以区分。前几天（我生日那天），当我将要走出阿萨德的房间时，如果他不把我叫回去，整个协定也许就流产了。那样，很多现在鼓掌叫好的人也许就会不断谴责说，大不该在一次旷日持久的个人谈判中投入那么高的威望。协定签字前三天，当谈判似乎陷于僵局时，就已经有人预先提出了这种忧伤的论调，例如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持论公允的记者马尔文·考尔柏在五月二十八日的报道中说：

今天是基辛格设法促成叙利亚以色列脱离接触协定之行的第三十一天了。十六次访问以色列。十二次访问大马士革，远离华盛顿并奔走耶路撒冷和大马士革之间一万八千二百英里——国务卿可算是亲自出马，仆仆风尘，殚思竭虑了。他是希望促成协定的。至于未能如愿以偿，其咎似乎不在未尽人事，或未守诺言。

错误已经铸成，判断亦有失误。也许基辛格根本就不该到这里来。也许他本应该先派西斯科来做辛苦的外交准备工作，等到分歧已经充分缩小，他再来施加影响，突破僵局。也许呆了两个星期之后，他就应该回去，而无需在此地伫候达成最后协议的机会。

他付出的代价如此之大，却并未达到目的。今后他未必再会对一次谈判付出同样的代价了。他很可能明天就回华盛顿，然后不得不答复就谈判本身、他的判断以及中东前途提出的许多问题。基辛格对谈判一向抱宿命论的态度——有些事情做得到，有些事情做不到。对他说来最坏的事情并不在于他曾试图去做。他将不会为此感到内疚。

但是，虽然我的穿梭外交成功了，我也知道那只是一个开端，正像登山的人在一片高峻的草地上暂时停下来喘喘气，眺望远处群峰还依然那么遥远。我们赢得了可以纵横捭阖的地位，但我也

懂得了为之付出的代价。出现明显奇迹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在两个协议的基础上缔造中东的持久和平，是我们的坚定决心，这项工作的错综复杂将使脱离接触显得相形见绌，而脱离接触本已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正如阿巴·埃班在我离开时所说的，一些单纯而又强烈的感情以前曾使我们大家都多次感到极端绝望，而在缔造和平过程中激起的种种感情必将更加单纯、强烈得多。

刚回到华盛顿的那些天，我真奇怪我们处在因水门事件而日益分裂的风雨飘摇局面下怎么居然还能干起那样一桩事业。到这时，我认为弹劾尼克松已是势在必行了。尼克松本人关于椭圆形办公室录音谈话的说法一经公布，就打破了最后的禁忌。几乎已经没有任何头面人物还想替尼克松说话。支持他的人已经减少，只剩百分之二十五的骨干。看到总统任期内那种分崩离析的局面，真令人痛心。尼克松的自我克制力还是很强的，但那只能掩饰他的脆弱，而且他现在已经分不出轻重缓急。尼克松以前总是鼓舞我们的斗志，而现在他却意气消沉了，像我这样同他共事五年多的人看到这种变化，是不能无动于衷的。

我当时心中忧惧，力求在阿谀奉承和分崩离析中恢复平静，正是在这种心境下，却突然目瞪口呆，发现自己也被拖进了陷阱。

到这时，猎取新奇材料的欲望一直在按照它本身的逻辑发展着。有些作法起初本来只是为了揭破官方对罪行的掩饰，后来却变成无尽无休地追查“真相”，而那些“真相”本身往往又是误传。人们对待每项调查都似乎把它当作一个完全独立的案件；把每份官方文件都看作似乎是新发现的真相，好像以前从来没有人听说过为自身考虑而遮掩文饰档案文件的勾当，和为掩盖本人行动而写的备忘录。毫无疑问，关于水门事件的调查强调了一项绝对必要的原则：国内即使最高级的官员也不容逍遥法外。但是，到一九七四年夏天，水门事件已经变成了一种全国性的自我虐待狂，这种病

症很可能使我们因自己的失误悔恨交加而缠绵不起，结果耗尽元气。突然之间，事情轮到了我头上。

这是旧话重提。指窃听电话和“管子工”这两个孪生问题。当我在叙利亚搞穿梭外交时，第一次发出的不满之声本已清晰可闻。约翰·埃利希曼定于夏末受审，他的违法行为与“管子工”的活动有关，包括在丹尼尔·艾尔斯伯格的精神病医生诊所的盗窃行为。埃利希曼企图以国家安全利益为理由来替自己的行为辩解，就在五月一日提出法庭誓词，宣称：“管子工”小组是在一九七一年的三次会议上成立的，其中一次会议有我参加。查理·柯尔森被控犯有另外一些违法行为，他在四月二十九日为对埃利希曼的审讯提出了一份誓词，证实了上述说法。^{*}这两件事都成了头条消息。言外之意是说，我一直都知道“管子工”及其非法活动，我的几次辟谣都是假的。这仍是旧话重提，一九七三年九月在确认我任职的听证会上已经有人提出过这些问题，一九七四年一月对偷我公事皮包的海军文书官(参阅第十及十八章)进行调查时又改头换面地提出过。重复并没有使这些指控变得更有力量。

一九七一年七月我秘密访华时，埃利希曼拉我当时的一位助手戴维·扬去参加他的班子。七月十三日我回国后向埃利希曼提了抗议，说他不该趁我不在时做这种事。两天以后，尼克松邀请包括埃利希曼和我在内的一些高级助手去洛杉矶赴宴，祝贺他在电视上露面宣布我的秘密访华之行。那是少有的在舆论一片赞扬声中心旷神怡的时刻之一，同尼克松共进晚餐以后，埃利希曼和我一

^{*} 柯尔森的说法同他一九七三年六月十一日主动写给我的一封信正好矛盾，信中说：

在(同美国律师)会见时我从未暗示过，是你使得“管子工”组合起来，虽然我确实说过，在那个时期所有的人都非常忧虑。

我特别对起诉人说：我并未参预“管子工”计划，决定组成“管子工”的几次会议我都没有参加。

起乘了四十分钟直升飞机，回到圣克利门蒂，我们为戴维·扬的事又吵了一次。埃利希曼自诩他比我更善于用才，他能吸引扬去，就是一例，而我认为那是因为访华一举引人注目，使他感到忌妒。即使埃利希曼提到过“管子工”，或打算让扬参加这个小组，也没有引起我的注意。我感觉扬已被分派去搞一项与撤销文件机密有关的计划。正如我以前曾经说过的，如果在埃利希曼办公室内有一个小组负责调查安全漏洞，我当时不会认为这有什么问题。而且从来没有人说过，我知道“管子工”后来的非法行为。

尽管如此，一九七四年五月，埃利希曼和柯尔森提出誓词以后，我们又回到了可怕的臆测：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一位海军上将报告了一次危害安全的事件，从同这位上将的会见中，我是否本应推断出扬的其他一些职责呢？或者，我怎么会回忆起一九七一年七月，在完全沉缅于对华突破的那个情绪激动的日子结束时，曾有一次乘坐直升飞机的旅行呢？前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莫顿·霍尔珀林的电话曾被窃听，他正借助于在法庭和宣传工具上同我纠缠而向上爬，五月十一日他在波士顿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我犯了伪证罪。五月十二日《波士顿环球报》报道了这条消息，当时我在中东。

一周以后，奈特报系的各家报纸公布了一些揭发材料，涉及众议院司法委员会透露的白宫磁带录音。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在椭圆形办公室中同约翰·迪恩谈话时一段经过删节的录音磁带上，尼克松讲了一些话，听来好像是说，他回忆起我曾要求对我以前的助手安东·雷克进行窃听，当时雷克已经去为总统候选人埃德蒙·马斯基工作了。^①如果我真提出过上述要求，那是与我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上所做的证词相矛盾的，我在证词中曾说，在提出应受调查的人名时我只根据尼克松所规定的安全标准。参加一个总统候选人的班子，显然不属于那些标准之列。而且这件事并不

真实。事过三年以后总统在录音里的回忆显然是错误的。（对雷克进行窃听是早在一九七〇年五月就已经开始了的，当时他还在政府中任职，是在他去为马斯基工作以前很久的事——而且大约在那时，根据尼克松的命令，联邦调查局的电话窃听报告已经不再送给我看。）尼克松的那些被断章取义地引用的评论究竟是什么意思，从来也没有搞清楚。实际上，很多关键的话是听不见的。尼克松的真意是什么——以及他向迪恩说这个故事究竟想干什么——恐怕主要应该看上下文。任何熟悉尼克松的人都不会认为一个孤立的句子与一项计划无关。

但是，各种宣传工具却为水门事件推波助澜，有意公布秘密文件，而无心进行缜密评断。五月二十一日——还在搞穿梭外交时——我收到一篇登在左翼杂志《新时代》上的文章，颇能显示出在一些新闻记者中滋长的情绪：

基辛格的蜜月时期已经过去了。种种迹象表明，宣传工具破天荒第一次正在（原文如此）盯住他不放……有一位华盛顿的编辑告诉我：“一种令人信服的意见认为，基辛格可能被指控犯了伪证罪，因为他对参议院说，他不知道那些窃听电话的事。我们如果不抢在大陪审团之前采取行动，就会显得太沉默了。”

当我结束了穿梭外交以后返回国内时，种种不满之声已经大有雪崩之势。六月上旬，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开始审查联邦调查局关于窃听电话事件的卷宗，作为弹劾手续的一部分。这些材料也被透露出去了。

不论司法委员会（或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中是谁把这些材料透露给新闻界的，他并不知道正是这些同样的材料在一九七三年九月已经由参议员约翰·斯帕克曼和克利福德·凯斯审查过，当时

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责成他们两个人审查在确认我职位的听证会秘密会议期间有关我的案件卷宗中的这个方面。正如在前面几章谈过的，我对一些事件的回忆与联邦调查局内部档案中的有些备忘录相矛盾；J·埃德加·胡佛一直把联邦调查局官员圈外的一些官员列为“需要”对他们的每次电话进行窃听的人，有些人甚至有时是我听见胡佛亲自向尼克松提出的。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调查此事时，前国务卿迪安·腊斯克曾到该委员会作证，他说胡佛是一位非常机敏、富有经验的官员，懂得必须保卫住自己的侧翼和后方。②

一九七三年我同参议员斯帕克曼和凯斯一起审查了每一次窃听电话行动和联邦调查局的文件，并解释了我的回忆。当时的司法部长埃利奥特·理查森和当时的司法部副部长兼联邦调查局代理局长威廉·拉克尔肖斯支持了我的证词。以后，在参议院委员会开秘密会议期间，我又陈述了自己了解的每一个案件。其中没有一件是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开始审查案件卷宗时已经知道的。一些急于求成的报社编辑们感到将有一个新的牺牲者，于是透露出他们心目中的“新证据”，说我以前的公开证词是假的。关于我犯伪证罪的旁敲侧击大有黑云压城之势。《华盛顿邮报》对于揪坏人颇不甘居人后，它把以前的一些故事改头换面重编一番，就登到了六月六日的报上。

那一天——在我中东穿梭外交之后刚刚六天——我举行了回国后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将近五周以来，无论在地理上还是精神上我都一直和华盛顿的炽热气氛离得很远。我一直是每天一睁开眼心里就牵挂着很多事情，但都是与五年前由谁“创始”或“要求”窃听电话这种诠释语义、剖析入微的问题迥然不同的。万万没有想到我居然也会因水门事件而将受到盘问。不久我就被带回到现实中来了。

奇怪得很，最初提到的六个问题中没有一个是涉及戈兰高地脱

离接触。第一个问题是关于签署大西洋关系宣言的紧迫性；第二个问题是，我们是否像大约四年前我在圣克利门蒂曾暗示过的那样，仍然谋求把苏联“赶出”中东。在那以后，就是随意提问了。一位记者问到“管子工”以及埃利希曼和柯尔森的证词。然后，一个问题问到在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提出的“证据”，即我是窃听电话行动的“创始”人之一。此外还提了几个关于中东的更加漫不经心的问题，在这之后，记者们又转回到原来的指责。他们再一次要求我使以下两点一致起来：一方面我声称不知道“管子工”，另一方面却又说知道扬调查了海军文书官。下一个问题已经不再是要解释问题，而变成了几乎是公开的指控：我是否已聘请律师来应付可能被指控的伪证罪？我从来没有想到过那种前景。这时我激动了，暴躁地回答说：

我没有聘请律师，而且我执行职务时并不是像搞阴谋似的。我还是坚持我说过的话，关于这方面如果再提问题我就不回答了。

干脆拒绝回答某一方面的问题，这是记者招待会上最咄咄逼人的架势。这说明我失去常态已到何等地步。我那种缺乏自信的神态对在场的记者们所起的作用正像让一条鲨鱼看见一条受伤的鱼在猛烈地扭动。克拉克·莫伦豪夫在爱用遁词的官员们的心目中是一个久已知名的剋星，这时他跳起来扯着嗓子喊：

国务卿先生，关于那个问题——你在这中间搞了些什么名堂，你总是闪烁其词，想不起来，再就是要些别的花样，整个水门事件期间，几个星期以来，我们已经领教过这一套了。我想知道，你为什么不能回答这样一个直截了当的问题：你在创始窃听你部下的电话的行动上到底起过什么作用没有。

当我提到我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所作的证词时，他大声连提四个问题，盖住了我的声音，每个问题都使我越来越深地陷入一个难题：人们给“创始”下了什么定义。最后我相当忧悒地说：“我想这是一个记者招待会，不是一个盘问会。”

我开始懂得，在水门事件的气氛中，一个官员对自己四、五年前只关心过几分钟而现在必须回答的事项如果不是全都了如指掌，就会受到怀疑。而且稍一迟疑——即使因为大吃一惊——就已招惹来另外一些新闻记者，这些人唯恐不穷追受伤的猎物就会有损自己在本行的令名。

六月六日的记者招待会冲破了防洪闸门。关于对外政策问答的报道已经寥若晨星。尔后三天之内，《纽约时报》为窃听电话问题登了四条新闻，标题是：《基辛格再次否认创始电话窃听》（六月七日）；《有关政治家们出于“安全”原因被窃听电话的材料》（六月七日）；《基辛格就窃听电话事件反驳尼克松》（六月八日）；《基辛格与命令联邦调查局结束窃听电话行动的命令有牵连》（六月九日）。

《华盛顿邮报》和其他几家大报也几乎都如法炮制——互相撷拾故事，这样（虽然基本上陈陈相因），却也维持了一种方兴未艾之感。《华盛顿邮报》继续指控，六月七日主要社论问：《基辛格怎么样？》，建议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重新调查。《纽约时报》六月十一日社论说“隐瞒情报”，暗示需要追查：

我们很遗憾地说，就隐瞒自己在这桩肮脏案件中的作用这项罪名而言，基辛格国务卿似乎难以自解。如果还应有更严重的罪名，那就要由国会和法院决定了。

一些周刊杂志也群起效尤。《时代》的报道标题是：《基辛格有牵连？》《新闻周刊》的标题是：《清白先生身上有污点吗？》

俯仰之间我已经名声扫地了。我曾为在中东的突破而志得意满，但一周之间竟栽进了水门事件的泥潭。我挺过了越南战争的艰辛年代和水门事件的苦难，所凭借的是一种信念：这个国家曾从暴政之下拯救过我的家庭，而我正在报答她，在一个危机时期维护她的荣誉和价值。我曾被卷入了很多困难的决策，那些决策导致采取强烈的、往往带有强制性的行动。但我坚持过来了，深信——也许是狂妄地——到最后总清算时，曾经帮助过美国在一个动乱时代维持其世界地位和创造性的安排，也就等于为世界各地的自由作出了贡献。政治家们毕竟无权要求只在风平浪静的时期服务。如果我的服务失去道义基础，政治生涯对我就失去意义了。我知道，高级官员们往往觉得公共福利与他们自己的作用是很难区分开的，但我关心的不完全是个人虚荣。简直像是一桩奇迹，我们的国家虽然遭逢使总统权威四分五裂的冲击，却还能生存下去而没有受到致命的外来挑战。如果一位有被弹劾之虞的总统再背上一位蒙玷污之耻的国务卿，我们的风险就会更大了。

到六月十一日，星期二，美国的主要宣传工具——《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时代》、《新闻周刊》、《华盛顿明星新闻》、《芝加哥太阳时报》，以及其他许多报刊——都已表态，说严重的新证据已经使人们怀疑有人犯伪证罪，需要进行新的调查。鉴于国会与报刊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和新闻界的通常作法，我断定如果自己袖手静观，下一步就会是国会议员们出来抓同样的题目了。在正常情况下——特别是因为除我以外无人能出来反驳——众议员和参议员们都会不得不在电视上露面，支持重新调查的要求。议员们的指控又会进一步成为新闻报道和评论的题目，造成一种揭发材料汹涌逼来的印象。这股浪潮会对我不利；到陪同尼克松去访问中东期间，我将被迫处于守势，无法进行持续的答辩。

当时必须赶快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或是还我清白名声，或是

把我的职位交给一位争议较少的人。我当然情绪十分消沉。但我也对形势做了冷静的分析。我了解众议院司法委员会要审查的联邦调查局材料，因为前一年九月我曾同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审查过那些材料。我估计，如果那些材料每次透露出去一份，就会出现无尽无休的问题和否认，而且都是关于基本上相同的事实。等到尼克松和我从中东回来时，我会已经声名狼藉，也许那时究竟是留任还是去职都无关宏旨了。我不听所有亲密伙伴（拉里·伊格尔伯格除外）的忠告，决定开一次孤注一掷的记者招待会。我要把反对我的一切论点集中起来，汇成一份前后连贯的材料，然后去反驳那些指控。我将坚决要求肯定我是无辜的，否则就提出辞职。这是以毒攻毒。但这会逼出一个迅速摊牌，结束过去几周以来的慢出血。我的同事们——包括亚历山大·黑格——认为，召开一次记者招待会会使一个我们本想让它自生自灭的谎言反而引起人们注意。我却深信，这个谎言是不会逐渐冷寂下去的，除非我们发起攻势。

以上就是一九七四年六月十一日星期二我在萨尔茨堡召开的非常记者招待会的背景情况。尼克松当时正在赴中东途中，到萨尔茨堡停留两夜一天，以习惯一下时差，然后继续飞往开罗。这同时也是为了发怀旧之幽情。一九七二年五月他在北越布雷和轰炸之后将对莫斯科进行胜利访问时也曾在本地停留。当时他遭到批评者和一些顾问的反对，却力排众议，以前程作赌注，面临北越对南越的无耻进犯，捍卫过他的国家的荣誉观念。而现在，一九七四年六月，他却四面楚歌，还苦于静脉炎的折磨。恼人心绪的是，他本想借以显示自己外交成就的这次访问却似乎即将被一件牵连我的丑闻所葬送。他最不愿意报纸上的大标题使人们的注意力离开他的中东之行。我在飞机上没有同他讨论我的这项苦差事。他也没有提到——这本身已经是对我们之间关系的一条耐人寻味的注

释。但黑格却表示得相当明确：我也应该像他一样耐心顶住攻击，直到流言自行消失；这也许是总统心目中的上策，也许是他的办公厅主任的献策。

我认为不能采取这种作法。消极被动会使我们的外交政策连同我自己都毁在每天出现的耸人听闻的消息之中。人们不会允许尼克松享有一次只谈胜利的中东之行本身的报道。对我的攻击一旦打响，就不会自动停火；的确，新闻界会觉得欲罢不能，只好打下去，以证明他们先下手是做对了。我认为，我们的出路有两条，或者是逼他们摊牌，或者是被咄咄逼人的新闻界一年半以来操练娴熟的种种伎俩耍得精疲力尽。

在去萨尔茨堡的飞机上，黑格、伊格尔伯格、斯考克罗夫特和我讨论了这个问题，详尽得使人心烦意乱。为了争取重新赢得主动，六月十日我曾写信给外交委员会主席富布赖特，要求他的委员会重新审查各种指控：

您会记得，我关于根据总统命令、经司法部长允准、由联邦调查局经办的国防安全电话窃听案件所做的证词，共分三个部分：公开作证，扩大的秘密会议，以及与参议员斯帕克曼和凯斯一起审查联邦调查局有关文件的会议。同参议员斯帕克曼和凯斯开的会议有当时的司法部长理查森和当时的司法部副部长拉克尔肖斯参加。

我强调上述情况，因为自从我作证以后没有出现过新材料，只有一小段节选的总统录音磁带，据说其中大部分是听不清楚的。就我所知，现正被透露出去的各种文件是我作证以前能够得到的；在我同参议员斯帕克曼和凯斯开会以前，这些文件已经交给了他们。我的回忆有几次在强调重点上与这些文件不同；那几次我都指出了明显的差异，当时还做了说明。种种旁敲侧击的说法暗示，出现了与我的证词相矛盾的新证据，那是没有根据的。就我所知，在确认我职位以前召开的公开和秘密的听证会上已经包括了所有可以得到的证据。

促成一次正式记者招待会的，是上文已引过的六月十一日《纽约时报》社论，它暗示可能要对我起诉。飞机抵达奥地利时，我已经决定不听同事们的意见；黑格也只好勉强默认了。我不知道他是否同总统商量过。反正我没有去商量过。

就这样，六月十一日，在莫扎特的故乡，风光明媚的萨尔茨堡，克列斯海姆古堡，国宾馆庭园中的骑士馆，我走到了仓卒聚齐的白宫记者团前面。骑士馆是一个“培训性的旅馆”，供留宿克列斯海姆的来宾的工作人员用，一般说来还用于按奥地利的高标准培训旅馆服务人员。开记者招待会的那个房间很宽敞，墙壁上有一些精美的挂毯。电视的灯光很热，气氛亢奋。

一开场我就朗读了写给参议员富布赖特的信，信里要求重新调查，以便一劳永逸地使所有的旁敲侧击都声销迹灭。我回顾了窃听电话事件开始的情况，我起的作用，联邦调查局的备忘录，外交委员会对上述所有情况的了解，以及报刊上提出的种种特殊问题。然后，我提到了“管子工”和我与戴维·扬的关系。我为自己的声誉做了辩护，并保证向国会有关的委员会宣誓重申同样的说明：

我们全国性的辩论现在达到了这样一个程度，有些已经交给一个委员会的文件可以被另一个委员会不加任何解释就有选择地泄露出去；国家官员被责成把他们的绝密文件交出来公开审查，但匿名的消息来源却能够攻击政府高级官员的忠诚和荣誉而无须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

我在开场白结束时暗示说——而且是针对一些我直截了当地陈述的问题——如果不肯定我是无辜的，我就不能继续执行职务。

问：国务卿先生，您在这里似乎暗示，如果这场运动不刹车，您就要辞职。从您的话里是不是可以作出这种估计？

基辛格：我不关心运动。我关心真相。我不相信在对国务卿的品格和忠诚还有争论的情况下能够执行美国对外政策。如果得不到澄清，我是要辞职的。

白宫的反应是不礼貌的。尼克松不愿意同我谈话。甚至龙·齐格勒也不愿意同我谈话。黑格对记者们发表背景评论时暗示说，我因旷日持久的中东谈判操劳过度，变得阴阳怪气了。当天晚上，齐格勒以尼克松的名义发表了一个措辞得体的声明，承认我为自己荣誉辩护的“愿望”，但又表示，“在美国和世界上那些要求和平并熟悉基辛格国务卿为国际信任和了解所做的贡献的人们都会同意他（总统）的看法，即国务卿的荣誉是无需辩护的。”（换句话说，我召开的记者招待会本来就多此一举。）

在华盛顿，萨尔茨堡记者招待会是一个晴天霹雳。国会的评论对我非常有利，而且两党一致。马斯基、曼斯菲尔德、富布赖特、汉弗莱、克兰斯顿、贾维茨和珀西等参议员发表了大力支持的声明。罗伯特·德里南众议员在司法委员会工作，时常辛辣地批评政府，他说，如果他能宣布我与窃听电话计划直接有关，将感到高兴，但是他做不到这一点。到六月十三日星期四晚上，由阿拉巴马州的保守派参议员詹姆士·B·艾伦提交参议院的支持我的决议已经有了五十一位共同提案人。那个决议并没有直接涉及窃听电话事件；它的主要目的是赞扬我的外交成就，同时还表示了参议院的“完全信任”，相信我的“正直和诚恳”是无可指摘的。提案人竟包括了从保守派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和亨利·杰克逊——以及萨姆·欧文——到自由派约翰·坦尼和托马斯·伊格尔顿。威廉·拉克尔肖斯是上次调查时联邦调查局代局长，现在成了“星期六

晚上大屠杀”的英雄人物之一，他在一九七四年六月十六日“面向全国”节目中说：“在我所能判定的范围内，我想他的作用很像就是他所说的那样。”

在那种反攻之下，新闻界很快就开始退却了。主要的调子是说我小题大作了；我过于劳瘁，过于敏感，脸皮太薄，禁受不起政治上的风波和坎坷。我的老朋友休伯特·汉弗莱唱的就是这种调子：

我们显然不愿意基辛格博士辞职。作为朋友，我想对他说：“继续留任，安之若素”。我想他是累了。他工作太辛勤了。他不是选出来的官员。对我们有些人在政治生活中已经司空见惯的一些挫折，他还不习惯。冷静对待就行了。

另外一种论点又出现了，说别的一些国务卿也都蒙受过讥议，却并未以辞职相要挟。主要的批评很快就从断言我犯伪证罪转为硬说我爱发脾气。

这种情况最令人信服地证明，我逼他们摊牌是做对了，除了开记者招待会之外别无选择。在萨尔茨堡开会前四天之间，险象环生，危机四伏；尔后，弦外之音却怪我对一些指责过于敏感，那些指责都是光明磊落的政治调侃，初无深意。以前逐日高涨、汹涌逼来的指控浪潮责怪我对一个参议院委员会宣誓后又撒了谎，后来忽然一变，又同我开种种玩笑，笑我敏感娇气；相比之下，当个开玩笑的对象就好得多了。有些提出批评的人争辩说，迪安·艾奇逊国务卿曾忍受过许多诬蔑不实之词，并未以辞职相要挟；这也许是真的。但是，在政策和判断问题上受攻击是一回事，而正当宪法陷于危机之时被控犯有伪证罪却不可同日而语。在我看来，我非得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不可。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以辞职相要挟；任

何其他作法都会显得过于柔弱哀伤。我认为，一个国家在副总统已忍辱辞职，总统将受到弹劾的情况下，不能再赔上一位品德可疑的国务卿。我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以下这段话时是准备兑现的：

我一直相信，自己应该竭尽全力结束我国的分裂状态。我相信我应该竭尽全力维护美国社会准则的尊严，并使美国人在进行他们的工作时感到一些自豪。

只有在我的品德不受怀疑，公众理当信任我时，我才能做这些工作。如果这种状态不能维持下去，我就不能再履行我一向执行的职务，那时我将立即把职务交给一些不像我这样容易受到公众攻击的人。

如果我得到的是另一种反应，我也许早已经真按我的想法做了。

实际上，我为那次记者招待会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谁都免不了受到新闻界的攻击。我着重批评的是新闻界利用匿名的消息来源。到现在我还认为，匿名指控的人使记者们拥有一种任何政府机关都没有的力量，并使一些动机和诚实性都可以逃避审查的人对官员们进行下流的谩骂。但记者招待会毕竟不是去提出这些看法的理想地方，即使迫于形势我已别无选择。我同新闻界之间以后就再也没有言归于好。尔后，我虽然没有遇到过突然袭击，但受到的批评远比以前多了。而且，既然曾以辞职相要挟，我开始走下坡路也是合乎情理的。

这次记者招待会对我同尼克松关系的影响就更严重了，虽然形格势禁，影响持续的时间并不太长。他从来没有直接对我说什么，但从他对我的疏远神态中显然可以看出，他是非常不愉快的。很难理解他为什么竟会那样心烦意乱。当然，我窃取了——如果用这个字恰当的话——在水银灯下显赫一天的机会。但是，如果

不那样做，就会出现不断泄露内幕的局面；总统如果冷静一些，本来应该而且也会权衡两者之间的利害得失。或者，是不是因为我用彻底揭露的办法把已有的流言蜚语一举廓清，而他回想起来知道也应该那样做，但现在已经失去时机了呢？如果水门事件没有很快压垮了他，我怀疑我是否还能在他的政府中保持自己的地位。

萨尔茨堡记者招待会达到了它眼前的目的；它阻遏住了匿名指控的浪潮，迫使人们考虑文件证据。当然，有些憎恨尼克松的人之所以放松了我，是因为他们得出结论：再发动一场新的调查可能会妨碍或拖延他们追捕主要目标的活动。七月十日，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召开了另外一些听证会。七月十二日，尼克松总统给富布赖特参议员写了一封信，叙述他关于各种事件的说法。富布赖特原曾就尼克松一九七三年五月二十二日声明特别询问过他，在那个声明中总统曾承担起窃听电话事件的责任：“整个计划是我批准的。进行每次窃听都是依循当时合法的程序和长期以来的先例。”尼克松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二日的信重申他以前的声明和他的看法，即窃听电话是正当合法的。他说我关于他所起作用的叙述是“完全正确的”，他（尼克松）承担全部责任。^③司法部长威廉·萨克斯比、联邦调查局长克拉伦斯·凯利以及联邦调查局其他官员都提供证明，支持我关于事件的说法，并指出有趣的一点：出于国家安全而窃听电话的平均次数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和尼克松历届政府中并无显著变化。正如上文所说，迪安·腊斯克出面描述了J·埃德加·胡佛的官僚主义方法和骄横跋扈作风，他说：给胡佛下命令简直就象给戴高乐将军下命令。七月二十三日我去作证，重复了和以前同样的论据，并评论了我熟悉的每一次窃听电话行动。所有的听证会都是秘密的，但是后来公布了听证会记录，只有些微的删节。^④

八月六日，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公布了它的报告。该委员会一

致认为，记录“应该了结就基辛格国务卿作用所提的一些主要问题”。这场争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关于词义的；“新得到的情报与基辛格博士在去年确认其职位的听证会期间向委员会所做的证词并无重大的出入。”因此，外交委员会重申了它在前一年得出的结论：我在窃听电话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并未构成阻碍确认他为国务卿的理由”。八月六日的报告为我尚未届满的任期有效地结束了关于我在窃听电话事件中所起作用的争论。任期的这一段时间很快就被三天之后尼克松辞职这个巨大的变化吞噬掉了。

尼克松的中东之行

尼克松的中东之行是一个胜利，也是一场噩梦；是顶峰，又是结局的预兆。几个月以来，尼克松越来越热中于这次旅行，在五月间他更进一步对我施加压力，要我设法安排此行。我相信，到那时他已不指望这次旅行能使批评他的人的注意力偏离水门事件了。他内心深处肯定已经认识到，局面已不可收拾，他的政治生命只能取决于意外事件或别人的行动了。尼克松筹划他的中东之行时我正在叙利亚搞穿梭外交，所以摸不透他内心的想法。我自己认为，总统进行访问对于表现美国在中东的新作用和我们和平进程的承诺是重要的——前提是我们赢得在戈兰高地脱离接触。

一位国家元首出访，目的是多重的。相当重要的是为开辟一个新局面提供形象的表现。在这种意义上，尼克松一九七二年访华那场戏甚至比他在中国进行的谈判更加重要，虽然谈判也是有好处的。在北京的尼克松向全世界显示，中美敌对时期已成过去——两个大国确实正在对外政策原则的基础上走向合作。一九七四年尼克松的中东之行也一样。在这些国家的首都，尼克松都是第一位前去访问的美国总统，只有开罗是弗兰克林·罗斯福一

九四三年为参加一次战时会议曾到过的地方。

如果是在前一年，只有疯子才会预言：一位美国总统从开罗到亚历山大，包括沿途每个村庄，会受到几百万狂热的埃及人的欢呼致意；或者，激进的叙利亚会邀请并热烈欢迎一位美国总统去大马士革；或者，在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这样不共戴天的国家，领导人们会盛赞美国总统所起的主要作用，尽管他已深受挫伤；或者说，这一切竟会在中东战争后八个月就出现，在那场战争中，美国为以色列提供武器，阿拉伯人对我们强制实行石油禁运，苏联人以干涉相威胁，欧洲人则不惜一切力争离美国越远越好。

回溯我个人经历的这些文字显然会给人一种印象，似乎这场外交活动的缰绳是听任我一个人操纵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我当然运用了策略。但是，任何国务卿，尽管名高权重，也不能独自制订战略。只有总统才能制订这样一种复杂和强硬的政策，使我们走了这么远，并且顶住犹疑逡巡的官僚，摇摆不定的盟国，疑神疑鬼的苏联和那些斗志高昂的中东战士，把这项政策坚持下来。尼克松赢得的一片喝彩声反映了中东人民对美国的信任，这个美国表现了坚定、力量和对更加灿烂的未来的憧憬。喝彩声也是向他个人表示的敬意。

即使在水门事件时期，新闻界似乎也看到了这一点。写社论的人们看到尼克松中东之行得人心，值得写，总的说来都表示了同情的态度。有些人实际上开始担心，而且并非杞忧：总统的旅行可能十分成功，以致使美苏关系恶化。（这是六月十日《纽约时报》、六月十一日《巴尔的摩太阳报》和同一天专栏作家约瑟夫·克拉夫特所写社论的调子。）但是其他报纸——《洛杉矶时报》（五月三十一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六月五日）、《华尔街日报》（六月十日）、《芝加哥论坛报》（六月十一日）——都发表了支持中东之行的社论。

即使最了解情况的社论作者都未能看透的，是这次中东之行的个人悲剧。尼克松正在受到款待，但是人声鼎沸的庆祝活动和精心安排的国事访问却使他忽而振奋，忽而忧伤。正象忘却未来荣枯、自觉如释重负的那些领导人一样，尼克松一心谈判时候的那种舒畅心情谁都不难察觉。那是他感兴趣的题目，事先经过深思熟虑的。但是，心情舒畅会在转瞬之间一变而为意气消沉。谈判显示了尼克松政策的成效，谈判也让他面对一个僵冷的事实：在自己一手缔造的那个未来里，他将不会占有一席之地。他的访问正在庆祝一项成就，但这项成就还不过是一个心向往之的机缘。访问进行下去，他的脸色也就随之而越加经常地显得苍白，目光迷茫凝滞，像一个正要离开自己真正的——也许是仅有的——职业的人；看起来真是令人痛心。在华盛顿，他一直被水门事件那些肮脏下流的细节和你死我活的斗争包围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本人的临头大祸的深重程度竟是在意气扬扬的中东之行时才真正感受到：天赐良缘，使他往那极乐世界里瞥了一眼，但他自己却进不去了。后来，果尔达·梅厄对我说了一句鞭辟入里的评语：“我们还从来没有接待过一位美国总统的访问。尼克松到过这里，可是他的心思在遥远的地方。”

而且整个这段期间他都苦于静脉炎。他常常疼得很厉害；他亲近的同事们最初都还不知道这件事。实际上，当他不听医生劝阻而出访时，如果腿部血块流向心脏，他就会有严重的生命危险。

我们为在开罗受到的接待而心花怒放，他的剧痛也因此缓和了几天。我们是六月十二日星期三抵达的。从尼克松踏上埃及国土那一瞬间起就看得很清楚，一切早已安排好，要欢呼他在和平进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我在以前几次访问中所受到的曲意逢迎和殷勤接待把我宠坏了，所以觉得——说来惭愧——这次被贬为辅助角色有些困窘，甚至难过，其实在总统出访的场面下本应如此。

记者们因我举行过萨尔茨堡记者招待会，已不再像以前那样克制，居然兴高采烈地报道我受到了“怠慢”，还说我似乎“悒悒不乐”。至于尼克松，他却被萨达特在欢迎词中推崇备至，欢迎词颂扬了美国“在尼克松总统领导下”为促进和平所做的极其重要的贡献。

这些话真算是出自肺腑了，但是，比起尼克松从开罗机场去库巴宫宾馆那一路上的凯歌行进场面来，就又显得黯然失色。当尼克松和萨达特乘敞篷车驶过时（真难为了财政部特务处的人，他们自从肯尼迪被暗杀后更希望总统乘普通轿车），约有一百万埃及人夹道欢呼。这些场面显然都是精心组织的；在埃及与美国没有外交关系的那些年里，成千上万埃及人不见得会一直在抽屉里保存着尼克松的照片。用英语高呼“尼克松万岁，萨达特万岁”口号的广播车和写着“和平之国要和平”、“我们信任尼克松”的标语牌，也都同样很难说是偶然出现的。在车队最后边的一些白宫职员也说，他们看见两国总统的车一过去，一些卡车就把许多人送往前面还在等待着的欢迎行列里去，这样来加倍制造狂热的声势。

但是，不论欢迎群众是自动出来的，还是组织了一部分，总之肯定是表现了热情和友谊，那是无法组织的。这至少说明萨达特正在利用尼克松之行来强调他已经开始执行的政策是不会变回去了——这本身就是一件意味深长的事。但是，他之所以选择了这样大张旗鼓的作法，原因之一肯定是埃及人民群众欢迎那项即将结束战争、开始和平的新方针。群众好像是在欢度假日。很多人拿着红花；也有些人摇着小旗。狂热的群众好像马上就会突破警戒线了，他们把一些阳台挤得似乎就要从胀裂的大楼上塌下来，两位总统好像被群众的呼声推到了库巴宫。

库巴宫是十九世纪一位埃及国王为向英国皇家传统致敬而兴建的一座雄伟富丽的大厦。它有数不清的房间，不过大厦内部给人总的印象倒象是东欧共产党国家的一座稍欠修葺的豪华旅馆。

正式欢迎仪式是在游廊上举行的，大厦壮丽的正面被秀美的花园环绕，成了欢迎仪式的雄伟背景。萨达特盛赞尼克松是一位“爱好和平的人”。尼克松认为他的访问是一次机会，能“巩固两个伟大民族之间友谊的基础，这两个民族将来要为伟大的事业尽力合作。”在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上讲话，唯独这次倒真还反映了一个现实情况：两国领导人都决心缔造和平，而且埃及人民一想到这一点就心花怒放。

当天晚些时候，萨达特和尼克松在塔赫拉宫会晤，并进行了谈判。我以前第一次见到这位埃及总统，就是在塔赫拉宫。萨达特利用这个机会直接向尼克松分析了中东形势，谈了他对超级大国关系的看法，以及他对下一步的想法。其中很多都是我熟悉的，不过由尼克松来听萨达特本人慷慨陈词，也还是有意义的；或者说，假如尼克松当时的处境还能使他推行他引人注目地确定下来的政策，那末他听萨达特本人谈谈，本来也会是有意义的。萨达特提出了标准的阿拉伯纲领：以色列全部撤退到一九六七年边界，并满足巴勒斯坦要求的各项权利。他特别强调关于埃及一九六七年边界的要求。至于召开日内瓦会议问题，萨达特主张拖；他不愿让苏联人回来混在一起捞便宜。他的拖延手法就是把有关方面之间事先的双边谈判搞起来——这一招儿我们在“欧洲年”已经领教过了，它是精心安排的，能不断活动而毫无进展。

尼克松的反应还是按照他的标准模式。他自己对国际形势的分析是敏锐的。他很注意中东。萨达特对付日内瓦会议的作法相当复杂，很能投合尼克松的精微的策略感，对此很容易就达成了协议。但是，他在开罗也仍像在华盛顿一样，不准备为一项他不赞成的具体建议进行争论。关于以色列撤退问题，我在写给他的汇报材料中的献策曾由于需要而提得尽量隐晦：既然一九六七年边界是一个有待谈判的问题，他对此就应该避免表示赞成或不赞成。

我们的立场要故意表现得模棱两可，这种要求即使在尼克松不为水门事件烦忧、身心健康时，对他的坚毅气质也会是一次考验。从这个问题的隐晦性质所能允许的程度衡量，尼克松当时处理得恰到好处。他施展了他那套随处可用的招数，暗示说，谈判对方的目标他是同意的，但策略问题则应该由旁人去处理。他暗示说，他正是沿着萨达特所要求的方向前进，但是要用比较缓慢、迂回的方式。萨达特这个人表面上还和气，可并不那么容易对付。他彬彬有礼，但寸步不让。尼克松逐渐顶不住了，说了一些意在言外的话，萨达特却满可以解释成尼克松完全同意了埃及观点。深知尼克松的那些人会看出来，尼克松说的那些话是为了闪开那种露骨到咄咄逼人的压力的手段，是为了结束一个棘手问题的方式，而不是让美国承担责任。至于萨达特当时的想法，那已经无案可查了；他似乎很高兴。他当时很可能并不想要得到一句肯定的话，让他能对尼克松提出法律要求；力争一九六七年边界，借以看看尼克松的反应，这就算达到目的了。

当天晚上萨达特在库巴宫主持了一次盛大宴会。美国人事先已经听同事们谈过开罗的奢侈生活；为了让这些美国人开开眼界，那次宴会上安排了纳格瓦·富阿德的引人注目的表演。萨达特发表了动人的祝酒词，向巴勒斯坦人致意：

总统先生，我对您要坦率，以免将来对我们这个地区的事件变化产生错误的理解或解释。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愿望要得到政治解决，要受到尊重，这是整个问题的要害……巴勒斯坦问题如果得不到政治解决，也就没有任何其他的解决办法，没有走向持久和平的其他道路。

他没有提出达到这一目的的具体建议。

第二天，萨达特和尼克松乘火车穿过尼罗河三角洲的许多村

庄去亚历山大，沿路的欢呼可又使开罗的盛况黯然失色了。两位领导人是乘一节两侧敞开的维多利亚式豪华游览车去的。经过村庄时，他们总是紧紧抓住头上的扶手，同欢迎群众见面。如果火车突然一颠，两国就很可能失去一位或两位领导人。赞扬和平的英文标语随处可见；群众几乎肯定看不懂自己手里拿着的那些标语牌，但这却丝毫没有挫伤他们的狂热情绪。他们知道，他们希望和平；如果群众不是深切企盼和平，不是衷心爱戴萨达特，任何政府指示也不能激发起那样广泛而强烈的热情。两位领导人在火车上召开过一次简短的记者招待会，这又造成了危险局面：你推我挤的记者们很可能把两位领导人从火车敞开的一侧推出去，那样就会解决当晚的头条新闻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尼克松重申了逐步解决的办法：“不是因为我们希望慢步前进，而是因为我们希望达到目的”。尼克松同时还顺便建议说，我们将一国一国地访问，——“先从埃及开始”——阿拉伯兄弟们之间是互相猜疑的，尼克松的这些话在叙利亚、约旦的统治者听来很难说是如闻仙乐。萨达特则带着慈祥的赞许神态从旁观察，并让人们注意一些小旗子，上面写着：“我们信任尼克松”。萨达特声称：

从十月六日以来，从美国政策发生变化以来，这个地区已经是和平在望了，尼克松总统从来没说过一句不兑现的话……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兑现了。因此，如果这个势头继续保持下去，我想我们是能赢得和平的。

当萨达特说这些话时，尼克松一定正在心中暗想，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里埃及人没有代表真是时运不济。

而且萨达特还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恐怕是那一天两位领导人的言论中最意味深长的。涉及拟在日内瓦会议重开之前进行的双边谈判时，有一位记者问，埃及是不是将要同以色列谈判。萨

达特喷着烟斗的烟回答说：“还没谈。”

在埃及的每次接待似乎都是后来居上的。亚历山大市欢声雷动。从火车站起沿海岸直到美如仙境的拉色丁宫，一百多万埃及人向车队夹道欢呼致意——拉色丁宫是法鲁克的父亲在亚历山大港一个半岛上仿照凡尔赛宫营建的，雄奇瑰丽，别具意匠。我算了一下，从正门到为我指定的房间即使快走也要十分钟——中途还别迷路。

两位领导人在拉色丁宫审阅了为次日在开罗签署而拟好的各项文件。一项文件是标题气势雄浑的《埃及与美国间合作关系的各项原则》，要求按美国与沙特阿拉伯间已确立的方式在科学、技术、经济和文化方面全面合作。我们当时正在同阿拉伯各国创设一些新的双边合作制度，以巩固政治联系。要使所有这些项目都能高速进行，还得经过一段时间。但它们已经形成了一个相互关连的格局，使一些阿拉伯国家同我们的安危息息相关，并防止在政治上滥用石油武器。（这些项目还使我们能抵御住欧洲的双边主义。）

这个文件中还载入了一项关于中东的声明，声明提到了巴勒斯坦人，实际上与一九七三年尼克松—勃列日涅夫最高级会谈公报中的提法一样。声明说，一项公正的解决办法“必须适当地考虑到包括巴勒斯坦人民在内的中东各民族人民的合法利益，以及该地区所有国家的生存权。”耶路撒冷对第一部分不会是热情的，对第二部分则会感到满意。由于某种消逝在时间迷雾中的原因，我们还答应重建几十年前烧毁的开罗歌剧院。一个西方国家为讨好一个中东国家而答应支持一种在中东地区毫无根基的艺术形式，这还是第一次。将来有一天也许会为了埃塞俄比亚总统的国事访问，在那里再次听到歌剧《阿伊达》里的歌声。

引起争论最多的是一个并没想迅速落实的协定。两国保证，

要谈判如何在双方同意的安全装置下进行核领域的合作。我们的动机是先发制人，防止一些欧洲国家师法国在伊拉克的故智，即设法利用原子能作为敲门砖。我们还认为，我们会有更好的安全装置防止核能转为军用，而且我们比任何其他潜在的供应国都更希望这样做。所有这一切本来都是合情合理的；哪知道核问题的爆炸性在政治上——如果不是在字面上的话——实在太大了。以色列提出了抗议，表面上抱怨说没有同它商量（我们也向以色列建议缔结一个类似的协定，但在监督条款上有分歧），实际上是忧心忡忡。美国国会对这个协定疑神疑鬼，那位哪儿都有他的亨利·杰克逊带头提出了指责。直到七年以后才同埃及签订了一个实施协定。^⑤

尼克松在拉色丁宫举行了一个答谢宴会，气氛愉快，可惜被国事访问时每顿饭都只能坐在同样几个人旁边那些礼宾方面的清规戒律压抑住了。到第二天晚间，一切适当的话题必然都已谈完，只能谈超现实主义的和日常茶饭事了。

我们乘直升飞机到俯瞰金字塔的萨达特别墅去了一次，还从吉萨再一次兴高采烈地进入开罗，这样就结束了对埃及的访问。据估计，至少有总共七百万埃及人出来欢迎尼克松。两位领导人之间的情谊到这时已经相当深挚，当萨达特称赞总统的直升飞机时，尼克松当场作为礼物送给了他。

七月十四日，星期五晚间，我们离开热情洋溢、充满国际情调的开罗，去访问沙特阿拉伯的行政中心吉达，那里的气氛是清心寡欲，冷漠无情，神秘深沉。沙特阿拉伯不鼓励任何形式的奔放不羁；不相信在热情洋溢时能制订政策。面色阴沉、举止庄重的费萨尔国王陛下从机场陪同尼克松去雄伟的国宾馆。车队的情况反映了沙特阿拉伯人心目中对应该如何处理事务的看法；街上没有欢

迎群众，这也许显得不礼貌；但如果鼓励上街游行的情绪，那会是行为不检，完全违反沙特阿拉伯传统。因此，当领导人的轿车驶过时，只听见群众齐声鼓掌，起落一致，新闻界也许会称他们为“庄敬有节”的人群。

在宾馆会客厅，费萨尔国王、尼克松和一些助手们天南海北地闲谈着，这时费萨尔肯定是在思考：平日无懈可击的沙特礼宾司怎么会出了纰漏，竟听任尼克松夫人在他面前露了面。通常情况下，妇女在沙特阿拉伯是要严格隔离的。（我以前几次访问，南希通常都是在机场就失踪匿迹了，直到出发前才能再见到，她在飞机上与我重逢，畅谈王国的夫人们如何盛情招待她，而那些夫人我却从来没见过。）或者，这一切都是细致入微的国王一手安排的，借以向我国的习俗和第一夫人本人表示尊重。不论原因何在，费萨尔的严肃脸色在这种场合下更显得是一个使人情绪消沉的阴影。后来，沙特的风俗占了上风。尼克松夫人是到机场才与我们重逢的，在那以前，除尼克松总统外，美国方面任何男人都再没有看见过她。

这个王国还是坚持它的习惯模式。在一次只有男人参加的宴会上，国王发表了动人的祝酒词，称赞我们在中东谈判中所起的作用，同时补充了一些必不可少的说教，即需要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尼克松在答词中回顾了他的外交成就，当时乘兴之所至还大谈他对中国和苏联的突破——第二天，费萨尔则详细论述了这两个国家的、特别是苏联的卑劣计划。

沙特阿拉伯并不是直接参加中东谈判的一方，因此它主要关心的是美国政策的方向，而不在于各种策略细节。费萨尔还是坚持他的作法，即不说过分露骨的话，以免暴露自己。尼克松主张不应急于去日内瓦，费萨尔接受这种主张；他欢迎我们事先向他打招呼：我们访问叙利亚时将声明恢复美、叙外交关系；当尼克松指出一个强大的沙特阿拉伯对于海湾地区安全很重要时，他似乎很高

兴。尼克松认为，如果不是由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而是由约旦去同以色列对话，关于约旦河西岸的谈判就会进展得更快些；对于这种看法，费萨尔没有作出反应。关于石油，费萨尔表示如果其他产油国重视他的劝告（这种偶然事件不大可能出现），他总的倾向是降低油价。

从会谈中得出了以下两点印象：在运用迂回手法上，尼克松算是棋逢对手了；我现在看出来，费萨尔国王很可能实干，而不大肯把话说死。不过，费萨尔衷心敬佩尼克松，这倒是可以肯定的。而且，国王在欢送词中一反常态，除了答应在中东推行共同政策之外，还明确地提到了美国的国内政治：

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在美国的朋友们自己应该有充分的明智，支持您，团结在您，总统先生的周围，支持您在进行的崇高事业，人类史上几乎空前的、目的在于赢得世界和平与正义的事业……

在美国国内或在美国国外反对您总统先生的任何人，或者在世界这一地区反对我们，也就是反对您的朋友的任何人，他们心中都显然有一个目标，那就是要使世界四分五裂，使世界陷于错误的两极分化，制造灾难，这一切都不会给世界带来安宁与和平。

国家元首通常是不到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去访问的，理由很简单，没有使馆就显然表明了政治关系的状况。这条规律对尼克松来说似乎是不适用的。他曾两次打破常规，安排国事访问不是为了去祝贺，而是为了去建立友好关系。一九七二年他访问了北京，虽然当时台北还被我们承认为全中国的合法政府。他访问大马士革的矛盾程度只是比访华略微少一些，因为我们之间有来往才刚刚六个月。但是在五月穿梭期间，阿萨德已经明确表示希望尼克松来访；他不愿意在同一个他认为对争取和平举足轻重的国

家的关系中处于二等地位。但是，他肯定曾经有过一些严重的国内障碍需要排除。在阿拉伯世界有些地方我曾得到确切情报，说叙利亚内部对脱离接触协定有强烈的反对意见。我深信尼克松会受到友好的接待；阿萨德不会是为了侮辱尼克松才邀请他去访问的。没有人会无缘无故地让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成为自己的敌人。

当六月十五日我们接近大马士革时，叙利亚人虽然一片好心，却似乎正准备无缘无故地这样做，甚至还更严重。叙利亚的外交礼节规定，外国国家元首在叙利亚领空时应由一些类似仪仗队的叙利亚军用飞机护航。美国外交礼节不接受这种规定；我们的保卫人员非常担心操不同语言的驾驶员之间会发生碰撞事件。我们的要求本已通知了叙利亚人，但或者是遭到了拒绝，或者是没有逐级传达到下边去。

总统专机的优秀驾驶员拉尔夫·艾伯特齐上校刚刚使“空军一号”下降到一万五千英尺高度，就看到四架苏制米格飞机飞近前来，专机两侧各有两架。一个人对自己的飞行本领没有相当把握，是当不上“空军一号”驾驶员的。他决定不去深究那是一支仪仗队，还是一支凶猛的激进派的空军小队。他猛然使沉重的飞机倾斜，想设法甩掉追随的飞机——一架波音707对一些现代的歼击机搞这种动作是极罕见的。不幸的是，这个动作也使“空军一号”上的乘客们晃了一下。不过飞机上的文官们平日深信“空军一号”万无一失，所以并没有太注意。但我看了一眼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一位美国空军中将——，才意识到情况严重。他显然感到震惊；可见我们确实是有危险了。拉里·伊格尔伯格却表现了外交人员那种喜怒不形于色的沉着。他那时本来正在给我写一张关于外交礼宾细节的便条，斯考克罗夫特的苍白脸色使他又添上了要加小心的语句。他本来已写好的是：“您紧跟在尼克松夫人后面

下飞机”。这时他又简单地加上“但愿能够”几个字，就默默地把便条交给了我。

结果，那些叙利亚驾驶员们一定判断，“空军一号”的飞行特技表演是以美国的疯狂方式表示的一种还礼。于是他们就紧跟不放。从来还没有一个美国代表团像这次一样感受到飞抵大马士革的幸福。

阿萨德安排下了一个完全军事化的、严肃、冷漠的欢迎仪式。机场上没有群众；离城市那么远，也根本不可能搞群众场面。但是，当尼克松和阿萨德乘车穿过大马士革街道时，却有很多友好的群众；汽车速度很快，以防暗杀和示威者袭击。另有一项安全措施，就是事先不公布车队行经的路线；但我猜想，群众也知道可供选择的路线没有几条。把这些限制因素考虑进去，叙利亚的群众反应也就算是相当热烈的了。两国疏远的漫长时期已经过去。外交部长哈达姆和我乘一辆车，闲谈搞穿梭外交时我们经历的一些事件。他开玩笑说：“您走以后，我们的生活变成了真空，因为好像无事可做了！”埃班在两周以前我离开以色列时也开过几乎相同的玩笑，不过哈达姆也许不爱听我做这样的比较。

阿萨德事先已经做好了准备。上一期《新闻周刊》上登载了一篇阿萨德接见阿诺德·德博什格拉夫的访问记。^⑥按叙利亚的标准看，那是一篇和解性的东西。他称赞了我为脱离接触谈判所作的贡献（“没有他，那是做不到的”）。它表示叙利亚要求为中东“每个国家”的利益，在叙利亚刚刚承认的联合国安理会第二四二号和三三八号决议的基础上争取“中东的真正和平”。阿萨德暗示，叙利亚同美国之间关于这两项决议的意义还有意见分歧，但他似乎承认美国在争取和平问题上能起主要作用；他既没有提葛罗米柯，也没有提苏联，这是耐人寻味的。关于成立巴勒斯坦国的设想，他没有说什么肯定的话，而是说这要留给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去

决定。德博什格拉夫这时看到了将阿萨德一军的机会，他问：“如果做出的决定甚至是要拆散以色列国呢？”阿萨德的回答意味深长：“我设想，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做出的决定不会超出联合国决议的精神。而联合国决议并不要求拆散以色列国。”叙利亚就是以这种巧妙的方式宣布接受以色列国，并让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知道，后者提出的消灭以色列国的要求不仅违反叙利亚最近接受的联合国决议，而且违反谈判进程。

表这种态可需要相当的勇气。叙利亚广大群众几十年来耳濡目染，听惯了决不妥协的豪言壮语，许多政治团体，从复兴党左翼到激进的巴勒斯坦人，也都强烈反对同以色列进行谈判，同美国言归于好，而叙利亚政府却似乎已经决定要探索和平进程。穿梭外交期间得到的经验使我深信，假以时日，阿萨德一定能迫使那些领导人员，特别是文官们接受他的比较和解的路线。人们似乎普遍担心，叙利亚最后会被那些另搞协议的阿拉伯盟国所出卖，或者被已对出力活动感到厌烦的超级大国所出卖。

由于上述原因，阿萨德在六月十六日星期日上午同尼克松会谈时就不像萨达特那样满足于一般的哲学式讨论，也不像费萨尔那样满足于私交融洽的气氛。为了对付他的激进的批评者们，阿萨德需要美国的再次保证；关于他的阿拉伯盟国的态度，他也需要再次保证。他是一位地道的叙利亚人，所以不能接受陈词滥调；他非常聪明，不会听不出来别人的遁词。因此，他同尼克松的会晤竟变成了一场盘问，问我们如何解释联合国的有关决议；他同时还刺探我国政策的确切目标——而这项政策之所以能维持下去，恰恰是由于它对最后目标不做明确的规定。

在五月间进行穿梭外交时，阿萨德一再要我拿出一份书面保证，说我们支持叙利亚收复全部戈兰高地的要求。我采取了回避的态度。现在阿萨德又向尼克松提出了同样的要求，而尼克松从

感情上一向不喜欢那种在思想上不留退路的作风。

尼克松还是用他通常那种模棱两可的口气开始会谈，暗示说他同意阿萨德的目标，但如果把它们公开说破了，那会是自我败露。同时，他肯定地说要保证让以色列存在下去。他还使用了一个不恰当的隐喻：

如果我玩弄词藻，侈谈未来的成果，也许会使人心旷神怡。但那将在国际上挑起一场关于最后步骤的争论，也就不可能再采取重要步骤了。举例来说，如果您想把一个人推下悬崖，您要对他只说只退后一步，然后说再退一步，再退一步。如果他知道会退到哪里去，他就一步也不肯动了……

如果我把内心的想法和盘托出，就会毁掉大好机会，结果又要回过头去靠军事解决，而军事解决在过去二十五年来一直是行不通的。正是由于这条唯一的理由，我们才希望我们发表的声明要泛泛而谈。

在正常情况下，一个人以满怀信心的神气发表这番空泛议论，是能够成功的。同尼克松会谈的人或者要尴尬地承认，他没有完全听懂尼克松说的是什么，特别是因为他正在被诱请与闻一项深远的密谋；或者他会觉得不宜对这位美国政府首脑刨根问底。有些政治家可能深知这场玩得很高明的把戏的个中奥妙，从而决心采取“真勇士不轻易冒险”的态度来应付。阿萨德可归不进上述任何一类人物中去。他在国内的处境岌岌可危，已经讲不起什么礼貌客气；他同美国言归于好也才几天，根本拘束不住他。

在开始时，情况还颇为正常。阿萨德对一些彬彬有礼的玄虚的闲谈都表示同意；原来这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一种姿态，目的是保持融洽的气氛，好让两位总统在下午十二点四十五分向一群聚集在总统府台阶上的记者们宣布恢复叙美关系。

但是，宣布了这个消息以后，两位总统回到阿萨德的书斋，阿

萨德才竭尽全力要在尼克松的空泛议论中增添实质内容。在会见记者之前，他曾对我们的缓和政策表示满意，但同时又透露说，这个问题在不结盟国家中间引起了一些矛盾的感情，尽管它们的公开表态恰恰相反。阿萨德说，缓和政策确实可以减少对抗的危险，但是不应该靠牺牲一些小国的利益来推行这种政策。关于今后还是要逐步前进的作法，他也没有提出异议。他希望比较确切地知道的是，这种作法将在什么阶段、以什么方式把叙利亚也包括进去。这就使他对我们今后的谈判策略提出了一系列尖锐的问题：即使马上实行妥协的步骤还有困难，但美国是否准备让三三八号决议全部实现呢？美国是否反对叙利亚要求实现三三八号决议的全部内容？我们的逐步前进作法是不是指一段时期内只求达到一个目标？我们是否同时集中注意于所有的边界，还是一段时期内只注意一段边界？美国是否预见到，以色列撤出西奈时也将撤出戈兰高地？最后，——对此可不能支吾其词了——美国如何看待以色列将来最后的边界问题？

尼克松最讨厌的就是这种盘问。我努力为他争取了一些时间——幸好我们需要在两点半以前离开叙利亚，按预定时间抵达以色列——我的办法就是针对使阿萨德烦恼的问题进行解释：“阿萨德总统估计我们同埃及已经达成了（关于最后边界的）协议。这是不对的。……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只是同萨达特一般地谈了谈。”但从根本上说，尼克松在这种他深恶痛绝的面对面较量中是匹马单枪上阵的。尼克松挖空心思，闪烁其词；他尽量以策略为借口，把他的拒绝详谈的态度表示出来。但是到最后，他已经逐渐接近于赞同阿萨德在边界问题上的立场了。阿萨德尽管不熟悉我这位首长的手法，但如果他能从谈话内容中去粗取精，得出结论说，尼克松正在隐晦地同意让以色列完全撤出戈兰高地，那末阿萨德就会是接近于抓住实质内容了。

我认为，留下一些对协议事项的幻想是对任何人都不利的。哈达姆在去机场的路上认为，谈判是太顺利了。于是我就给他泼冷水说：

您是饱经世故的人。您该不会做太彻底的结论。外长先生，我跟您说正经话。今天，我们许什么愿都可以。我可不想答应您我们交不出来的东西。到最后阶段，如果分歧不太大，我们才能现实地谈最后边界能划成什么样子。

在去机场的余下一段路上，锋芒毕露的民族主义者哈达姆和我们都沉默地想着我们之间建立起来的私人联系和我们领导人之间培养起来的互相信任的感情。

从那以后又发生了很多事件，使我们两国变得敌对了，叙利亚在某些人心中似乎再一次成为苏联的卫星国。我自己对这一点是有疑问的。当我几乎每天都同叙利亚人打交道时，我并没有得到这样的印象。只有在实际谈判中才能看出是否可以为叙利亚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找到一种解决办法。现在，当我写本书时，这似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在一九七三年脱离接触的进程刚开始时，也没有人认为能进行谈判。我希望美国与那些骄傲的、很难说服的、民族意识强烈的人们之间，有一天会重新打通来往的渠道。

六月十六日下午在以色列受到的欢迎，滋味与我们在所有其他国家停留时都不同。以色列是我们的朋友和盟国，我们曾一起度过多次严重危机。但是，一位美国总统前去访问，却还是第一次。以色列深为自己被摒弃而感到苦恼，而又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这次访问对双方来说，在感情上都深有触动。因为，在不厌其烦地强调两国之间历史的和永恒的友谊时，总使人明显地感觉到有一股不安的潜流。在别处，领导人都希望让美国承诺维持和平

的进程，如果可能，甚至加速这个进程。而在以色列，一个新政府首先争取的却是暂停一下喘口气。它忧心忡忡，不知目前这股潮流会流往何处，和约会如何规定，也许更担心的是政府在中途会碰到种种国内的争论。以色列的领导人对于把尼克松首先引到中东来的那种外交革命感到很不放心。如果注射坦白麻醉药，让以色列的那伙名公巨卿暴露他们的潜在意识，他们也许会说：只要能把促成尼克松访问的那一连串事件一笔勾销，他们就巴不得干脆取消这次总统访问。尼克松则下定决心要使谈判继续下去，他发现在访问期间来到了唯一似乎还需要为和平进程辩解的国家。潜在的紧张气氛——双方都不肯承认，更谈不到挺身而出设法消除——表现在对我们的接待上，尼克松在他的自传中说得很确切：“我们在以色列受到的接待虽然按一般标准来看也很热烈，但却是一次最受拘束的旅行。”^⑦

同中东之行的任何其他地方相比，在以色列的正式祝酒辞总带有更多的弦外之音，会谈时也更为言之有物。在国事活动中，代表内阁讲话的艾芙莱姆·卡吉尔总统一直都肯定了以色列与美国之间牢不可破的团结，表示了东道国对尼克松为安排援助以色列所起的作用怀有衷心的感激之情。言外之意是说，传统的模式本身就足以说明它尽善尽美，无需改变。尼克松则恰恰反其道而行之。他强调自己愿意继续提供长期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但是，他又用和缓的口气打了招呼，说他希望以色列在会议桌上表现出灵活性。他在欢迎仪式上感谢以色列人民对于他去访问他们的传统敌国的目的所表示的谅解——这好像是专拣人家不爱听的说个没完。在国宴上——也是不按稿子——他又就以色列需要外交灵活性问题补充了一些话。

伊扎克·拉宾刚刚接管工作，担任政府首脑。从在华盛顿当大使时尼克松就认识他，并且很赞赏他。现在，尼克松大谈新总理

的种种品德，颂扬他作为军事领导人的经历，然后提出忠告，说摆在他面前有两条路：或者是四平八稳的政客的道路；或者是为求和平甘冒风险的政治家的道路。尼克松很显然是在怂恿他走第二条道路。尼克松说：

这条道路就是认识到，在这个地区搞连续的战斗并不是使以色列生存下去的解决办法，而且它首先是不对的——为了我们今天在耶路撒冷大街上看到的成千上万孩子们的前途，我们应该探索避免那种战争的任何可能的道路。

尼克松在会晤拉宾及其主要同僚外交部长阿加尔·阿隆、国防部长西蒙·佩雷斯、大使西姆查·迪尼茨时更加着重强调了同样的主张：

有一个时期以色列同美国维持着融洽的关系，当时我们曾支持以色列，并且真地感到我们要做以色列最好的朋友，而你们的直接的、好战的邻国叙利亚和埃及则被看做是美国的敌人；那些日子啊——以色列的某些人也许会这样说，而美国犹太人圈子中我们的许多很好的朋友现在也在说：让我们还是回到以前那个时期去吧。只要给我们武器，我们就能打败我们所有的敌人和所有其他的人。

我不认为那算是一项政策。我认为那是没有前途的。……剩下的时间不会太多了。

从根本上说，关于以和为贵这一点是没有争论的。但是，两项脱离接触协议才刚刚达成，我们这么快就强调要乘胜前进，而以色列却担心对谈判进程失去控制，那个进程很可能变成它本身的目的。拉宾概括地说明了以色列的态度：和平必须与安全联系起来；

和平进程需要时间，因为要使它有意义，就必须包括态度上的转变；和平进程不能单纯是以色列一连串的撤退；必须礼尚往来；以色列不能容忍恐怖主义的攻击；最重要的是保持住以色列的实力；他希望美国以“中等”速度来加强同阿拉伯人的联系，并强调经济援助，而不是军事援助。

这一点原是无可非议的，但实际上却暴露出这场外交活动的基本事实，即对于阿萨德在大马士革已经提给我们的那类问题，如应该采取什么具体步骤，应该如何完成这些步骤等，我们还缺乏一个美以双方都已同意的答案。

当时有四个可供选择的战略方案：我们可以维持两项脱离接触协议后形成的现状；我们可以回日内瓦去寻求一个全面解决办法；我们可以同埃及采取另一个步骤；我们可以同约旦就西岸地区采取一个创始的步骤。

原地不动这个选择方案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如果照此办理，就会破坏美国在所有阿拉伯国家中的处境，而且迟早会酿成另一次爆发。全面的解决办法在我们看来时机还不成熟。那样做，就会把苏联又招引回这个地区；会出现成堆的问题，而解决办法连初步的都还没想好；会冒发生爆炸性事件的风险，而当时尼克松正面临着弹劾，在以色列上台的是一个仅靠一票之差的新政府，埃及又不大愿意去日内瓦开会。不管怎样，那将会导致一个过早的僵局，使外交进程即使不发生逆转，也会出现停顿。

现实的选择方案是，或者在西奈半岛采取另一个步骤，或者同约旦谋求达成脱离接触的协定。萨达特已经怂恿过我们把埃及前线摆在首位。他迫切希望尽快缔结和约，在参加这一过程的人们中间只有他一个人认为和约是可能缔结的。

我自己的看法是，我们应该同约旦采取下一个步骤。一九七四年夏天曾决定要把约旦和西岸问题拖延到我们的国内危机解决

以后，这个决定终于成了关键性的了；它深刻地影响了整个地区的进展。它是美国、以色列和阿拉伯的国内政治和阻力的一种混合物，每一方都由于不同的原因选择了阻力最小的道路，却造成了最坏的后果。

我本来曾认为，尽快让约旦在西岸地区出现，就能最好地照顾到每个人的利益。这样就会使温和的约旦成为和平进程中讨论巴勒斯坦问题阶段的谈判者。越来越多的旁观者——欧洲各国政府、美国的知识分子——正在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推出来，认为它是开启西岸地区的一把最时髦的钥匙。我知道它肯定会把解决的大门关上。要干脆把以色列带进会议室，让它面对一个立誓消灭它、十年来对它进行恐怖活动的集团，这可真是一道消耗精力、刺激感情、耗费时日的大难题，而在这段期间内所有将来的进展都会被冻结住。我认为，要完成这项任务，就只有横下一条心粗暴地告诉以色列，它是完全依赖美国扶持的。在我看来，这就等于从精神上打断了以色列的脊梁骨，损伤它的元气。这对美国也是不利的——相当重要的原因是，如果以色列意气消沉，就会同时更需要美国的保护，而且更听不进去我们的忠告。我们将在任何一个小小的边境冲突中都被卷进去充当保证人，到头来等于把我们同这一地区每个国家的关系都抵押出去。而且，即使我估计错了，即使一个心理上并没有受到创伤的以色列被带进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一起开会的房间里去，那也只会是一场谈判噩梦的开端，而不是结束。

一九七四年那个决定命运的夏天，我曾在许多场合反复讲过这个道理。五月三十一日我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秘密会议上说：

我对这个委员会坦白地说，下一个敏感的步骤将是约旦。理由有两条：

第一，因为约旦是阿拉伯各国政府中最温和的。它一直对美国友好。

第二，因为处理巴勒斯坦问题最好的办法可能是把约旦人拉进西岸地区，这样一来关于巴勒斯坦人的争论就转移到约旦人与巴勒斯坦人之间，而不是在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人之间了。

另一方面，以色列的国内政治不允许马上在约旦河脱离接触，因为它需要全国宗教党支持政府。

六月五日我对美国的一些犹太人领袖说：“我已经告诉他们（以色列领导人），下一步应该把约旦提出来，但是以色列的国内形势不允许这样做。”六月八日我告诉几天前辞去政府职务后正在访美的摩西·达扬说：“有两个可能的策略——或是把约旦人带进西岸地区，或是对约旦采取拖延回避态度，这迟早会使巴勒斯坦人成为脱缰野马而不可收拾。”六月十七日，当尼克松访问以色列时，我对拉宾总理表示了同样的看法，当天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又重复了一次：

当然，让巴勒斯坦人参与这个进程的最有效的办法是通过进行约旦问题的谈判，这种谈判有历史背景，而且以色列一直表示原则上同意谈判。

但是，要采取这样的步骤还缺乏一些条件。以色列内阁面临着两个无法克服的困难。这届政府在国会中只占一票多数，表明它根基太浅，支撑不住象在西岸地区脱离接触这样一种容易引起分歧的谈判。以色列舆论界大多反对在西岸地区重新建立任何阿拉伯的政治自治机构；另外一些人反对交出一寸土地，他们认为这块土地按照《旧约》是赋予犹太人的。全国宗教党只要看到西岸地区谈判一有苗头，肯定就会把政府搞垮。上述种种情况使果尔达·梅厄——这是第二个障碍——答应，在关于处理西岸地区的协定

签订以前，就会有一次新的选举。拉宾和他的同僚们不大愿意在上台几个星期之内就要求举行大选，这也可以理解。

我们的阻力也很大。如果我们坚持要搞关于约旦问题的谈判，就必须估计到以色列的选举，那通常要从开始之日起经过六个月之久才能产生新政府。我们就会在正当戈兰高地脱离接触使我们的声威登峰造极时陷于僵持的困境。何况，几乎可以肯定，以色列会抵制这种谈判，那样就会增加总统在国内的反对者；一位面临弹劾的总统处境并不美妙，难以坚持进行这样的谈判。

然后就是埃及问题。我们赞赏萨达特；我们认为他是促进中东和平的不可缺少的动力。如果没有他的合作，中东肯定会再次陷于不知所措的绝望境地。而萨达特反对那个后来所谓的约旦选择方案；整个以色列选举过程会占去将近一年，谈判又不知要占去多少个月，萨达特无论如何也不想为此而拖延自己对西奈半岛上另一长条土地的要求。萨达特本能地不信任侯赛因，这就使他更冷静地估计到，约旦脱离接触的过程中危机四伏，实在不能为它而把自己惨淡经营才搞到这种程度的中东和平进程孤注一掷。他一定是经过推论后认为，约旦脱离接触决不会是孤立的行动。它会使巴勒斯坦这场戏开演，按照一种不服从别人时间表的逻辑在整个地区都不断地引起反响。

叙利亚对于在约旦采取措施也缺乏热情。我进行穿梭外交时曾向阿萨德谈过，最好让侯赛因对有关西岸地区的谈判负主要责任。他没有表示拒绝；他模棱两可地回答说，需要深思熟虑才能找到一个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办法。但这至少说明，叙利亚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态度也一直是冷淡的。叙利亚坚决维护它所谓的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同时，它力争控制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以实现那个视巴勒斯坦为大叙利亚一部分的夙愿。几年以后，叙利亚抵制了由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接管黎巴嫩，它暂时同被人痛恨的天

主教徒们结成同盟，来阻止巴勒斯坦人控制一个邻国。一九七四年叙利亚没有为巴勒斯坦问题提出过任何具体计划；它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似乎颇为审慎；它知道约旦选择方案可能成功，但更了解这个方案的错综复杂因素。任何叙利亚高级官员都没有说过西岸地区脱离接触是一项真有前途的方案，不管同谁脱离接触。

在我们的分析与种种客观情况之间斟酌来考虑去，我故意拖延时间，让埃及和约旦这两个选择方案都挂着——哪一个都不最后选定，指望着客观形势能使我们从犹豫不决的窘境中解脱出来。这种作法我从来都很少用，而且通常在思想上是反对的。客观形势是中立的；它本身围人时多，助人时少。不能造时势的政治家将很快就被时势所淹没；他将被迫处于守势，穷于策略上的应付，而提不出自己的目标。

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情况正是这样。当拉巴特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于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八日指定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为约旦河西岸地区唯一的阿拉伯代表和发言人，并把约旦逐出外交舞台时，我曾预言的——而没有防止的——以色列的困境和巴勒斯坦谈判僵局二者都已成定局。直到今天这种局面还没有改变。

当尼克松访问以色列时，所有上述情况都还属未来之事。拉宾和尼克松只是一般地、甚至漫谈式地议论了以后应采取的一些步骤。拉宾希望以后的外交活动能联系到对以色列的一揽子武器供应，而尼克松则希望能联系到承担同意进行谈判的一般责任。双方都得到了自己希望的东西。会晤的结果对决定我们面临的选择并没起到什么作用。但它适合于双方当时都想把谋略问题藏到协商过程中去的需要。当时商定，新外长阿加尔·阿隆将在夏末访美，不久以后，拉宾也去。同时，我们也将邀请埃及和叙利亚的外长以及约旦国王和首相。我们希望到秋初能从这些访问中定出一个谋略来。

看来这还是一个合理的作法。叙利亚脱离接触协议才签订了两个星期，以色列的新政府也才上台，因此，留出一段协商和思考的时间对任何人都有好处。我们曾告诉所有的阿拉伯国家，这就是我们的要求。我们没有预料到的是在拉巴特作出的决定，但即使没有那个决定，大势所趋也很可能是反对约旦选择方案的。

约旦的费力不讨好的局势可以用以下两个事实作为象征：约旦是尼克松访问中的最后一站，而且我还不能陪他去。在以前的每次穿梭访问中，我们的哈希姆朋友们总是被排到几乎最后，这次也一样，原因都是：不需要在安曼作出任何决定；我们知道需要做什么事；而做成那些事得要看别处的情况。安曼是一个在友好气氛下进行总结、探索前景的好地方。我未能去，是因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渥太华召开每半年一次的外长会议，开会的第二天我已经错过了。这次会议预定要最后通过我十四个月以前亲自倡议的“大西洋关系宣言”，因此，当我们自己的大业告成之际如果不到场参加，对我的北约组织的同事们将是无情的侮辱。此外，中东之行是在莫斯科最高级会谈之前非硬安排进去不可的，而人们又不能安息日到达以色列，所以在那里也没有变通的余地。

但是上述情况都很难使约旦人感到安慰，他们一定感觉尼克松的主要谈判者不来象征着他们已被贬为二等角色。从斯考克罗夫特给我的报告看，我认为尼克松六月十七、十八两天的访问在当时当地情况下是最圆满的了。尼克松重复了他当时的标准话题，即用来打开对华关系并已抚慰了苏联的那套方法在中东也用得上。他在一次祝酒词中使用了这次访问中每逢致词都试用过的相当见效的说法：“我不想对你们说这次访问将在什么地方结束。我也不能对你们说它将在什么时候结束。重要的是，这次访问已经开始了。”对约旦来说，它的麻烦却不幸在于访问甚至还并未开始。

尽管如此，侯赛因还是以盛大的“打退兵鼓”的检阅仪式热烈地送走了他的贵宾，这种仪式我以前亲眼目睹过，是由英国人训练的四队贝督因人十分准确地齐步前进。

尼克松对中东的突袭就这样结束了。对他的同行者来说，这是一番痛苦的经历。我们从东道主们过分殷勤的接待中感觉到了怜悯，唯独这种感情是任何国家元首都从来无法使人产生的。他们正接待一位现任总统，这种假象之所以能出现，对某些领导人来说，只是因为他们不太熟悉美国内情；对其他一些领导人来说，因为他们不知道有任何别的接待国家元首的方式；对另外一些领导人，则因为他们全部政策的基础就在于相信美国能控制局势。但是，尼克松一行的成员们却早已不抱幻想，他们知道得太多了。本来满可能有的局面与我们内心深处都看到现在必定会有的局面，把这二者之间的差别一比较，令人肝肠寸断。当然，我们还不能预料总统职务的最后结局如何，因为在中东，车队每天出动，宴会接连不断，还都在颂扬着总统的重大成就之一。

绝望情绪表现在不少琐屑的争吵上。龙·齐格勒像警犬一样凶狠地保护他关于总统在新闻报道中应占首要地位的信念。关于从开罗到亚历山大的列车上车厢、席位的安排问题也发生过争论。但这些都是我们大家因这次访问时心照不宣的阴暗背景而陷入的失意心境的表露。

我们有些惊异地参加了在几个首都举行的嘈杂的招待会，同这些国家只是在最近几个月内才建立起关系的。我们很自豪，因为我们的国家正在为缔造和平发挥着关键作用，这不仅是为了我们国家本身，而且在某些国家之间，如果没有我们，它们就会既找不到和解的语言，也找不到和解的方法。所有的国家元首都希望从我们这里得到一张走向未来的路线图。尼克松虽然忍受着身心

交病的折磨，却表现出色。他提出了妥善的评论意见；他对谈判对方的需求表示了坚定、敏锐的反应。他唯一不能提供的却是十分需要的：为美国对外政策的长远目标提供可靠的指导。因为不要很久，他就会变成自己协助形成的那些力量的旁观者了。

更多的指控

到这时，我们的国内斗争已经像疟疾一样。热度变化表时常上升，患者在几天之内说的几乎是胡话。突然之间烧又退下去了，除被害者更加虚弱之外，了无痕迹。唯一的区别在于，患疟疾的人一般都是会好的。

我在叙利亚搞完穿梭外交后回国时受到了关于窃听电话行动的攻击；我们在尼克松中东之行结束后回国时，又受到了另一种指控，荒诞琐细到使人不知从何驳起：参议员亨利·杰克逊指控尼克松和我同苏联人搞了秘密交易，使他们能比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限额超出了一百二十四枚导弹之多。关于窃听电话行动的一片鼓噪之声还多少反映了一些假装的糊涂，而指控我们搞秘密交易则纯属政治内讧。

到一九七四年夏天，尼克松似乎已经摇摇欲坠，以前人们还尽量克制，不在国内大事攻击我们的国际政策，到这时却克制不住了。确实，总统地位如大厦将倾，这助长了而不是压抑住了不同意见；慢慢出现了一派意见，认为给受了致命打击的尼克松戴上手铐是有利于国家的，免得总统在同勃列日涅夫即将举行的最高级会谈时做出一些不顾后果的让步。

尼克松按计划应在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七日去莫斯科，同苏联领导人举行第三次最高级会谈。甚至在他总统任期这个临近结束的阶段，他也不大在乎伤苏联人的感情，这从以下事实可以看出

来：为了赢得中东之行的机会，他把莫斯科之行推迟了三天，而且赴莫斯科途中还在布鲁塞尔停留，签署刚完成的“大西洋关系宣言”——其中无论哪个举动都不是想要讨莫斯科喜欢。尽管如此，杰克逊还认为，由自己来败坏政府的信誉，以限制政治谈判的自由，是在为国家做好事。据我所知，他的幕僚们所谈的荒诞离奇的秘密交易，他也许真相信了。

不论杰克逊提出的指控是否属实，这个人还是要认真对待的。他对国防很熟悉，能讲内行话。作为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第二号人物，杰克逊在五角大楼有很多朋友，这些朋友向他提供他们所收集到的内部情报。我在杰克逊面前作证时，常常发现自己的处境不正常：碰上一些来自参谋长联席会议而在白宫从未见过的秘密文件。杰克逊还有许多支持他的另外一些事业（如犹太人从苏联出境问题）的集团作为同盟者。这些集团对我虽无特殊恶感，可也不愿意杰克逊的信誉受到毁坏——这实际上是在道义上支持他。

在正常时期，他提出的指控会因荒诞不经而自生自灭。一位总统和他的主要助手怎么居然会无端地秘密允许苏联超出协议的规定之外多拥有一百二十四枚导弹呢？即使不深悉内情，这也是难以置信的。但是，在尼克松当政的最后几个星期内，任何荒谬绝伦的指控都会有人侧耳细听；而且说句公道话，很多好像无法相信的指责到头来却是真有其事。杰克逊提出的种种指控之所以能比其真正价值更显得若有其事，娓娓动听，是因为它们涉及限制战略武器协议中许多高度技术性的条款，那是外行人几乎无法理解的。确实，要想反驳那些指控，势必涉及许多复杂的情况，因此门外汉很可能估计，既然需要那么多解释，就肯定有点问题。我在以下几页所做的说明也许对这种印象有所帮助。

根据一九七二年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临时协定，允许苏联在六十二艘核潜艇上拥有九百五十枚现代化的弹道导弹。为

了达到那个数字并保持在双方协议的全部最高限额之内，苏联不得不拆除二百一十枚比较老式的洲际弹道导弹。在一九七二年莫斯科最高级会谈时，美、苏谈判者之间的争论涉及苏联人应该替换的是哪些比较老式的导弹。^⑧对苏联人有利的作法是，把他们最老式、最过时的武器拿来“搭配抵偿”，最好能包括他们反正本来也要撤掉的那些不够洲际射程的导弹。我们的目标则恰恰相反：要设法争取拆掉那些对我们极危险的导弹。在莫斯科最后几次谈判过程中，我的助手们和我在与参谋长联席会议协商的基础上拟订了可供撤除的苏联导弹的下列次序。我们最希望搞掉的导弹是名叫SS-7型的陆基洲际弹道导弹。这种导弹的射程达六千多英里，有一个六百万吨级的弹头；这些大投掷量的武器中有七十枚是安装在加固的地下发射井中的，相当不易被破坏。再往下排的是安装在易受攻击的地面发射台的一百三十四枚SS-7型和SS-8型（SS-7型的变种）洲际导弹；这种导弹可以用来进行第一次打击，或者在美国核攻击没有触动苏联战略力量时进行报复。我们第三个优先考虑的，是在一艘较老式的苏联核潜艇上的三十枚导弹，我们称之为H级。这些导弹都只有九百英里射程，弹头也比较小，但那艘潜艇能持续航行。排到最后的是安装在一些更老式的潜艇上的六十或七十枚导弹，我们称之为G级。这些潜艇用柴油机作动力，噪音大，续航时间有限。它们的导弹射程是三百到七百英里；这些潜艇中有九艘（携带二十七枚短程导弹）在发射前必须浮出水面。

我们认为G级潜艇不是一种战略威胁。这样的潜艇一九六六年以来没有一艘曾来我国大西洋水域航行，一九六九年以来没有一艘曾来我国太平洋水域航行。确实，苏联已经有了一千多枚洲际导弹，并在继续制造，要使洲际弹道导弹达到一千五百枚，使以潜艇为基地、射程一千五百英里或以上的导弹达到九百五十枚；在这种

情况下，大可不必还想象苏联会以逐渐被废弃的潜艇运载七十枚威力较低的武器进入距我海岸几百英里以内的水域。因此，我们不愿意苏联人用这些过时的武器来“搭配抵偿”。

后来果然，限制战略武器协定准确地反映了我们的排列次序：H级的核潜艇被规定为“现代化的”；如果苏联政府要制造九百五十枚最新的海基导弹，则H级潜艇必须撤掉；否则其三十枚导弹就要计算在总数之内。二百一十枚SS-7型和SS-8型导弹必须拆除。我们认为，我们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即防止苏联人把一件反正必须撤掉的武器拿来“搭配抵偿”，换取一件现代化的武器。为了堵死一切漏洞，我们还坚持，如果苏联居心叵测地把一些现代化的导弹放在逐渐被废弃的G级潜艇上，那些导弹就也应算在九百五十枚的总数之内。我们为通过谈判取得的成就相当自豪。

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六日，协定签署后当天午夜以后，我在莫斯科的一个由夜总会改成的新闻中心向记者们简短地介绍了情况。有人问到G级潜艇，我回答说：

如果那些潜艇被现代化了，就要算在九百五十枚之内……他们不必撤换那些潜艇。如果他们想达到九百五十枚，就必须撤换掉H级潜艇。他们不必撤换掉G级潜艇，但如果他们使之现代化，就必须算在九百五十枚之内。

因此，有关替换的条款很难说是秘密的。六月五日我们回国后就把同样的意思告诉了有关的部和署，并发出指示，让他们“在准备证词和答复问题时”援用这种解释。

六月十四日苏联送给我们一份口头照会，完全改变了它以前在莫斯科所持的立场，这包含着苏联经过深思熟虑后要弄的计谋。我们最初曾坚持把G级潜艇上的导弹包括在被允许的九百五十枚总数之内。苏联政府坚决不干，理由是那些导弹和潜艇无论从任

何合理的定义看都算不上是“现代化的”。我们同意了替换的条款，实际上，与我们原先的建议相比，这对我们更有利了。苏联六月十四日的照会其实是对“妥协”又打了退堂鼓；它接受了我们最初的建议。实际的后果会是，苏联政府能把 G 级潜艇上的七十枚导弹拿来搭配抵偿；当替换过程完成时，苏联政府将能留存有安装在加固地下发射井内的七十枚 SS-7 型洲际导弹——这恰恰是我们最希望搞掉的武器。

毫不奇怪，我们在六月中旬提出的复照中坚持了我们知道在谈判记录中明确承认了的东西。苏联政府在骗局被识破后，采取了试试也无妨的态度。他们接受了我们的解释。我按照这个精神向一次有两党国会领袖参加的会议做了简单的汇报。七月间，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主要谈判人杰勒德·史密斯向国会作证时谈到了苏联未表示异议的我方解释。

如果我不下决心清理所有未了的细节，事情本来就会无声无息了。即使在因缓和而兴高采烈时，我也不打算依靠同苏联人达成的口头协议；我要他们签署一份文件，把双方同意的解释写进去。苏联人一反常态，欣然同意。一九七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多勃雷宁和我签署了一份只有一页的文件，标题颇有学究气味：“关于对临时协定的纪录所作的解释的澄清”。这个文件重申了我们对替换条款及其他一些零星杂项的理解。由于过分仔细，我们给一个“现代化的”导弹下定义为“安装到一九六五年以后在苏联编入现役的核动力潜艇上的那种类型的导弹”。通过“总统渠道”的来往文件在一般情况下是不分发给各政府机关的。我和多勃雷宁签署的那份文件也就按惯例处理，存在白宫了。这是以例行手续压倒实际内容的做法。我们当时认为这无所谓，因为没有出现任何改动。关于严格按照已签文件的精神所作的官方解释早在五个多星期以前就已经通知到政府有关各部了。

这终于成了一个错误，尽管并没有造成什么损失。苏联官员们想不到这份文件会有什么机密性，就在一九七三年六月日内瓦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会议上提到了它。白宫在追问之下才把那份文件分发给一些有关部门。官员们感到自己受到了不予理睬的待遇，当然怒气冲天；他们的战术是争论说，如果早同他们商量，他们本可以干得好得多；他们还回过头来吹毛求疵，挑剔一些难以逃过他们鹰一样的眼睛的毛病。具体到这件事情上，有一位监狱律师揪住了我们关于现代化的导弹的定义，吹毛求疵地争论说：“安装到一九六五年以后在苏联编入现役的核动力潜艇上的那种类型的导弹”这个提法让苏联官员们能够把一枚完全新式的导弹安装到以柴油机为动力的 G 级潜艇上，只要这种新导弹不在核动力潜艇上出现就行了。

想出这种解释的那位天才人物却没有说明，苏联官方究竟为什么要给一艘五年来没有在我们沿岸水域、也没有在任何别处出现过的过时的潜艇制造一枚完全新式的导弹。那位天才人物悍然不顾下列事实：这样一种想入非非的小动作将会往苏联导弹总枚数上整整增加七十枚。苏联官员们——从来都是有便宜就占的——却并没有提出这种要求。我们也不会允许这样来歪曲谈判纪录。正如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四日我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所说：

虽然也许能作这样吹毛求疵的解释，但这是与谈判纪录完全矛盾的——与以前历次意见交锋的情况完全矛盾的。那会被美国完全拒绝。

当然，苏联人当时并没有、而且从来也没有制造任何这样的新式导弹。

不管我对促使官员们发牢骚的动机判断得是否正确，我觉得

为慎重起见还是要弄清楚这个假想的漏洞是否已经堵死。我向在美苏监督限制战略武器协定常设协商委员会中的美方代表发去指示，要他提出另一项澄清。苏联人发现我们查出来他们从未想利用的那些漏洞而大吃一惊，经过一些来往周折后同意了新的澄清。在关于澄清的文件已经得到双方同意时，杰克逊出来亮相了；这个文件要等尼克松访苏时同许多辅助性协定一起签署。杰克逊应该已经知道这个情况——或者象他那样耳目灵通，应该不难知道这个情况。

杰克逊抛出了他所谓的“相当惊人”的新消息，即苏联人被允许超出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所规定的最高限额，当时，他确实还没有掌握实际内容。但是，他使问题更混乱了，他提出了另一个指控，这个指控的道理比前一个指控更少了——如果还能更少的话。这另一个指控是关于以从海上发射的导弹来替换较老式的洲际弹道导弹。当苏联人得到替换他们的较老式的洲际弹道导弹的权利时，我们也坚持要得到类似的权利。我们唯一可供做替换交易的，是五十四枚大力神Ⅱ式洲际弹道导弹。五角大楼为了削减开支，原曾几次企图单方拆除这种导弹（一九八一年它终于决定这样做了），而当时它们之所以还能留下来，是由于白宫在我的怂恿下驳回了五角大楼的要求。唯一的困难在于，直到临时协定期满以后，我们即使想以拆除这五十四枚导弹作为替换条件，也还没有新的替换对象；新式的三叉戟潜艇和导弹按计划要到一九七八年才投入现役（从那以后又无形中往后拖了下来）。在一九七二年最高级会谈结束时，尼克松似乎变了一个时常用来结束谈判的戏法：他给勃列日涅夫写了一封信，申明他无论如何要做的一件事：在临时协定期满以前我们将不行使用大力神导弹去替换的权利。的确，我们是不能行使那项权利的，因为还不会有新的潜艇。虽然那封信本身是保密的，但这种想法并不是秘密。一九七二年六月

十五日我向两党的国会领袖作简单汇报时说：

临时协定……将不禁止美国继续其目前执行的或打算执行的进攻性战略武器计划，因为多弹头改装和 B-1 都不属冻结范围之内，而且现在并没有计划、或者说从未计划过在一九七七年以前就部署水下远程导弹（即现在所谓的三叉戟）潜艇系统。

国防部的形势声明公布了一个五年计划，其中数字与尼克松致勃列日涅夫信中的数字相同。换句话说，关于这种理解也没有什么秘密可言。

由此可见，杰克逊指控我们的“秘密”协定使苏联人额外多得了一百二十四枚导弹，是荒唐的捏造，他的手法是把我们自己的五十四枚较老式的大力神导弹（我们已经“答应”过，在一九七七年以前不用这种导弹去替换更先进的三叉戟潜艇导弹）和苏联过时的 G 级潜艇上的七十枚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如果这些潜艇成为现代化的，这些导弹就要算进允许他们拥有的总数之内）加在一起。

苏联人从来没有打算把 G 级潜艇上的导弹“现代化”，到我写这本书时（一九八一年），G 级潜艇已经长达十二年以上没有来过我国沿岸水域。无论如何，他们只有不惜违反谈判纪录，不惜危及整个东西方关系，才能这样干；如果他们真想冒这个风险，他们肯定早已用更厉害得多的方式破坏了协定。至于替换条款，它从那时以来已经变成有争议的了。但是，即使在一九七四年六月，在杰克逊提出这个问题时，也并没有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限额之外多让给苏联人任何一枚导弹，这是事实。没有搞过秘密交易，苏联人也没有得到新的权利，没有占到什么便宜。

但是，在一九七四年六月那个时候，水门事件的气氛保证使任何指控，无论怎样荒诞无稽，都能得到一个顺利的开端。因此，在

我随同尼克松访问中东回国后四十八小时之内，国内那场噩梦就重新开始了。所有的电视网都煞有介事地报道说：搞过一些秘密协定，让苏联占了便宜。一些大报都以头号大标题登了这条消息。作为永久的丑闻，这倒是一份引人入胜的政治形态病历。六月二十日星期四，当第一条消息出现时，我真不知道杰克逊指的是什么。我接着花了两天时间弄清楚指控的内容，而杰克逊则在每天傍晚的电视新闻节目中露面，逼真地扮演了一个揭露神秘事件的农村诚实孩子的角色。他不提出具体的指控，但是强烈地暗示，有件危险事情正在酝酿之中。到处出现而又隐姓埋名的一些消息来源使这些指控继续流传，杰克逊则闪烁其词地说他的调查可能会揭发出什么事情，从而使那些指控显得可信。由我发表一个简短的声明是说不清楚问题的，而且我毕竟还需要研究卷宗，其中不少事情在我思想中是模糊的。所以我宣布要在周末后的星期一开记者招待会，这又留下一个印象：烟这么多的地方肯定有火。*

整个周末，人们到处都在揣测是不是已经又挖出了另一件“丑闻”。六月二十四日星期一——我同尼克松预定去布鲁塞尔和莫斯科的前一天，我在记者招待会上总结事实如下：

* 以下是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六月二十二日傍晚消息中摘录的，从中可以嗅出这种味道（我要强调指出，记者丹·拉泽尔是公正的；他误信了新闻界给他编造的东西）：

拉泽尔：华盛顿人士说，国会已批准的一九七二年限制战略武器协定规定，苏联可以有九百五十枚导弹，但是后来的一个协定，显然是秘密协定，把苏联的总数提高到了二千零二十枚。这些人士说，美国海基导弹原先是七百一十枚，后来被削减成六百五十六枚……

杰克逊：他星期一作证以后，我会回答得更好。我不知道这些协定、谅解和解释是不是涉及基辛格博士和俄国人，或者它们只涉及总统和俄国人。这我们还要调查……

拉泽尔：但是在华盛顿，国务院否认同俄国人有任何关于导弹总数的秘密协定。有一位发言人说，基辛格要在星期一的记者招待会上详细谈这件事，同一天基辛格将出席杰克逊的委员会。

、已经提交给国会并公开发表过的允许苏联方面拥有的总枚数没有因任何——公开或私下的——协定、谅解或澄清而有所改变。已经提交给国会并公开发表过的允许美国拥有的总枚数没有因任何——公开或私下的——协定或谅解而有所变动。那些数字仍然完全和已经发表过的一样——完全是经过同意的那些，全部争论都是产生于有关替换条款中一些内行人才懂的方面，而不涉及协定的实质。

杰克逊还死咬住他的指控不放，硬说他掌握了关于秘密协定的证据——如果对“协定”和“秘密”这些术语采取小说家笔下的破格用法，杰克逊的话也可以算是对的。这个问题复杂难懂，反驳时千头万绪，而指控却只有三言两语，因此新闻界在搞平衡时很花了一些力气。（不过总起来说它们还是抱同情态度，特别是那些研究过这个问题的记者。）

当天下午我到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杰克逊的小组委员会作证。杰克逊要我宣誓说老实话——这就是暗示，只有靠伪证罪的威胁才能从国务卿嘴里掏出真话来。从技术上说这是一次秘密会议，不许记者们参加。杰克逊克服了这个困难，他一会儿出去一次，离开听证会，把从我这里捞到的“揭发”向守候在外面的记者们吹风。有一次他与我的负责同国会联系的助理国务卿、前弗吉尼亚州长林伍德·赫尔顿发生了激烈口角，因为赫尔顿正确地对杰克逊这种作法提了意见。

奖赏是够高的。六月二十五日《华盛顿邮报》社论为我的清白撰文，它评论说：“基辛格国务卿的信誉在窃听电话事件上也正在受到挑战，如果他关于导弹所说的话已被证明是假话，那他早就干不下去了。”

但我不过是一个偶然的靶子；我的个人前途算不上什么。由于这次攻击而受到破坏的，是在即将到来的莫斯科最高级会谈上

关于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谈判灵活性。所有来自政府机构的代表团成员们对军事委员会上可能等待着他们的那场盘问都已心中有数了；他们最保险的作法是生硬地死守住一些争论最少的选择方案。苏联人知道，已经受到严重打击的总统提出的任何建议都会在他一回国就受到粗暴的审查。苏联人原先可能还有一点有限的积极性，准备对突出的问题、特别是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问题，进行认真的谈判，到这时这一积极性就被弄得更微乎其微了。

对我的荒谬指控不久就烟消云散了。我们启程后，六月二十六日我在布鲁塞尔还不得不在又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答复只有内行人才懂的那一点，即总算已被新的澄清所取代的“那种类型的导弹”指的是什么。从那以后，就没有人再提这个问题了；我们从莫斯科回国后，它也没有重新出现。我公布了事实以后，报刊上曾相当报道了一番，尔后新闻界就很快转移到别的更有味道的话题上去了。但是，这个事件在东西方关系这口棺材上又敲进了一颗钉子。很可能从来还没有过一位总统在去同苏联人谈判时处境如此艰难困窘，外交上发挥主动性的余地如此狭小。我希望今后也不要再有。

一九七四年莫斯科最高级会谈

在莫斯科会谈日程上，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并不是被卷进我国国内动乱的唯一议题。人们一直在助长一种印象，似乎尼克松准备在莫斯科最高级会谈上为挽救自己而变出惊人的戏法来，因此，反对他的人也就力图有计划地堵死所有谈判途径。我在第二十二章中已经叙述过，六月二十四日，即尼克松出发去莫斯科的前一天，杰克逊宣称，他打算就贸易和移民出境问题提出一些新的未加

说明的条件，实际上就是把这个问题从最高级会谈的议程上抹掉了。同时，在提交参议院的贸易法案中，除对贸易的限制之外，又加上了对贷款的限制。虽然我们已经向苏联人保证要抵制这些，但是就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所做的诺言却没有能够兑现。苏联人在别的地方也看不到有多大希望开展联合行动，而如果能这样做，他们本来会在一些我们感兴趣的题目上作出让步的。显然，在中东不大可能做出共同的努力。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种种可供选择的方案也正不断遇到障碍。

从自由派立场和保守派立场反对尼克松的人们能够在这样一个建议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决不让尼克松用在莫斯科所做的交易来挽救他的总统职位。至于人们猜测尼克松究竟打算做什么“让步”，到现在也还弄不清楚。这反而使那些含沙射影的话更能令人惴惴不安。一些政府部门（特别是五角大楼）与白宫之间互相猜疑，同时，政府官员们担心，如果他们触犯了进逼总统的广泛联盟，就将在国会里得到报应，政府官员的这种担心加重了政府部门与白宫之间的猜疑，而我们为最高级会谈所做的国内准备工作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

六月十四日，当保罗·尼采辞去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代表团中国防部代表的职务时，影射就变成了真人真事。（他显然早在五月二十八日已经想这么干，但是被施莱辛格劝住了。）尼采是我国极著名的公职人员之一，在国防问题上是一位非常卓越的理论家。他在杜鲁门和艾奇逊任职时期曾担任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主任；肯尼迪政府时期担任海军部长；约翰逊政府时期担任国防部副部长。从成年以来，他一直都在研究国防战略问题；我国有少数忠诚而又深思熟虑的男人和妇女，他们得到两党的支持，有时也受到批评，因而在战后时期使美国的对外政策得以沿着平稳的航线前进，尼采就是其中之一。他和我偶而也有意见分歧，这在对事认真的人

们之间是必然的，但我一直到现在都非常尊重他。一九六九年经我推荐，尼克松本来已经要任命尼采当驻波恩大使。但是，当尼克松的国会事务专家们告诉他，任命尼采会遭到参议院保守派反对时，尼克松又改变了主意。

我一直不明白保守派为什么不信任尼采；他一定是在四十年代后期或五十年代初期做过什么得罪人的事，因为他曾被共和党参议员罗伯特·A·塔夫特否决而未能担任艾森豪威尔政府中国防部部长助理的职务。不论原因何在，这总说明保守派是死抱住一些清规戒律不放的。从那以后二十年来尼采的表现几乎在任何问题上都是坚定不移的。一九七〇年梅尔文·莱尔德在白宫的大力支持下任命他担任出席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代表团中国防部的代表。一九七四年三月，詹姆斯·施莱辛格再一次建议让他担任一个需要参议院批准的职位：还是那个二十年前流产的国防部部长助理空缺。尼采同意在尼克松政府中工作，而且担任一个比他在约翰逊政府时还低的职位，这等于是表扬他的爱国热情。我支持这项任命，而且在一位不大热情的参议员、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约翰·斯坦尼斯面前为尼采说了好话。由于保守派（这次是由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带头）反对，这项计划又流产了；白宫一直没有提出这项任命。尼采一直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代表团中工作，直到六月十四日他突然提出了辞职，并同时向尼克松发动了猛烈攻击：

目前在我国首都发生的一些造成精神创伤的事件，以及这些事件在国际上的影响，都是令人意气消沉的现实，我认为如果想忽视或摆脱这些现实都是幻想。

我认为，在总统职务能恢复其主要职能以前，即在能维护宪法，使各种法律得到公正的执行，从而在国内外能有效地行使职能以前，不存在一个使目

前发展的形势中某些不幸的潮流发生逆转的现实前景。

换句话讲，尼采的意思是说，他已经不能再为一位总统——三个月以前他还愿意接受这位总统委任他担任高级职务——工作了，因为在他看来与水门事件有牵连的尼克松的种种弱点已经使对外政策今后不可能得到有效的执行。他在实质问题上也还有一些不同意见。当时离尼克松访问莫斯科已经很近，这确实是一次惊人的攻击。但它生动地表明，要在莫斯科签订任何重要的协定，不论内容如何，尼克松都缺乏国内基础。

苏联人几乎肯定是这样判断的。几个月来已经看得出，苏联人甚至在同尼克松会晤时，也越来越多地对水门事件旁敲侧击。四月十一日葛罗米柯访问华盛顿时曾对尼克松说：

尽管遇到了一些众所周知的困难——我不想细说那些困难——您还是坚持以前的政策，我们苏联领导人对此感到非常满意，并从个人的立场向您表示敬佩。

凑巧，我们驻莫斯科大使沃尔特·斯托塞尔就在同一天受到了勃列日涅夫的接见。总书记想了解美国的“国内问题”会不会妨碍事件的进程，以及妨碍到什么程度。勃列日涅夫自问自答，他说在最近的将来就会看得清楚的——这表明他正密切注视着水门事件。但他还是没有理解立宪政体的一些精微之处。用斯托塞尔的话说，勃列日涅夫表示“惊异，因为美国已经发展到了总统也居然因自己的税款问题而受到困扰的程度……他对总统起来还击表示尊敬。”四月二十八日葛罗米柯在日内瓦向我详细询问了弹劾的手续。多勃雷宁这时肯定正在详细地报告华盛顿的种种事件，因此，葛罗米柯之所以一反常态详细询问，目的之一也许是要让我们明

白，苏联人对我们讨价还价的地位越来越感到怀疑。

莫斯科之所以在一九七四年春天使东西方谈判改为低速前进，是由于水门事件呢，还是由于我们国内辩论的总的趋势呢，或者二者都被利用作为借口，来掩盖莫斯科由于自己国内原因而做出的决定呢，这些问题不能只靠美国的文件来证明。事实是，在一九七四年四月间，苏联的态度变了。在通常情况下，举行最高级会谈也象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一样，事先的准备工作都要套用一个司空见惯的模式：苏联先漫天要价，接着是一段旷日持久的讨价还价时期。等苏联人认为再死硬也捞不到更多油水时，就会出现一个突破。虽然在突破时最初的措辞也还是让人无法接受，但总算为先天带来的讨价还价提供了某种具体的基础。如果到这时我们还坚持自己的基本观念，距离就会逐渐缩小，直到由某种外部事件——通常是靠一次最高级会谈——来最后推动一下。

一九七四年春天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似乎就是这样。一年多以来，双方一直都在提一些仅为载入纪录用的建议。然后到三月间，我国所有政府部门都终于同意了“抵消不对等”方案：苏联在运载工具总数上的优势（反映双方现有的计划）被美国在分导式多弹头导弹的数额上的优势所抵消——在我们看来还不仅是抵消。我三月间访问莫斯科时，勃列日涅夫似乎愿意接受这项原则。他建议延长一九七二年临时协定的有效期，这样就能继续维持苏联人在运载工具方面现有的优势，但是他允许我们在该协定延长期内可以享有一百枚分导式多弹头导弹的优势。由于我在第二十二章中已经解释过的一些原因，我们认为一百枚导弹这样一个对我们有利的差距还不够，甚至是可笑的。不过如果以前的实践多少可以作为借鉴的话，葛罗米柯和我即将举行的谈判也许会很快就得出一些更现实的数字来。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恰恰相反，谈判陷入了僵局。苏联人

拒绝了各种各样的降低他们分导式多弹头导弹最高限额的计划；他们拒绝为陆基洲际弹道导弹规定单独的限额，而这却是我们最关心的。我们国内争论的一个奇怪的方面是，政府中没有任何人赞成接受苏联人所提出的建议。人们常表示担心尼克松会为保持总统职位而进行吃亏的交易，这是毫无根据的。白宫争取要做的是对所有政府机关都已经同意的我们三月间提出的各项建议进行现实的推敲斟酌；如果突破的大门敞开了，什么样的抵消不对等能有利于美国，对这个问题要得出一个共同的意见。为得出这种共同意见，曾经过了极其审慎的手续——远不象以前各个时期那样不受拘束。

但是突然之间战线就拉开了，我现在回想起来也还说不清楚为什么。在政府内部带头闹事的是尼克松自己的国防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我已经说过，我非常佩服施莱辛格的分析技巧和全面能力。虽然国会很不以为然，他还是为加强我们的军事力量做了很多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他针对战略力量和战术力量两方面修正了我们的国防理论，使之转到了关系重大的健康的方向上来。在这方面，施莱辛格最坚定的盟友之一是杰克逊。开始时他们之间可能只是一种政治婚姻，但很快就变成了一种共生关系。两个人成了莫逆之交，看法相近。这就使施莱辛格渐渐地公开反对起他的总统来了。

当然，其中也还有个人竞争的因素。我已经说过，施莱辛格看不出来为什么要从聪明才智上承认我就应该当上总统顾问，出人头地。他对我办事——往轻处说——不总是那么八面玲珑的作法感到恼火。例如，直到我任职的末期，在进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时我总是使用自己的班子而撇开国防部的代表。这种作法既不周到，又不明智；对国防部代表来说，参加会谈是能从中得到教益的；他就能用谈判的实际情况来衡量五角大楼那些豪语雄谈了（当限

制战略武器会谈的专家詹姆士·P·韦德参加了我在福特政府中的班子时，情况正是如此)；这样做，也会更容易赢得国防部对国家安全委员会各种想法的支持。另一方面，施莱辛格也不是温良恭让的好好先生；他也讲礼尚往来。不久，他几乎一遇机会就证明我错他对，虽然我们两个人的战略估计实质上是相似的。他认为，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问题上最好是扮演一个比我更加战战兢兢、临深履薄的角色——那样才象一位国防部长。另一方面，对于我认为是地缘政治侵占的任何行动我通常却总是比他更愿意起来抵抗。总之，虽然部分地是由于两人所主管的部门有不同的看法和任务，但是施莱辛格与我之间的种种分歧更多地是由于个人意气而并非理智的判断。这真令人遗憾；因为他是我们最干练的官员之一，国家需要我们合作。在比较正常的时期我们合作共事时困难很可能要少得多。(当然，在正常情况下首先是我们两个人谁都不会在政府里任职。)

不管怎样，施莱辛格到六月初似乎已经得出了基本上与尼采相同的结论。他已经不再希望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取得任何进展；他认为美国政府的精神资本已经所余无几，禁不起为一个喷有烦言的协定进行辩论。因此，他开始公开地对外交进行阻难。如果说他在智力方面至少同我旗鼓相当的话，我却在专横跋扈方面对他甘拜下风。任何正常的政府都会为此而立即撤他的职——被水门事件鬼影惊扰的尼克松却对这种作法连想都不敢想。

去年十二月杰克逊提出了一个关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公开建议，要求削减并使双方总数对等，并且说对分导式多弹头导弹限额的关心——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我们所持立场的核心——是“太过分了”。四月间，杰克逊给施莱辛格写信，请他评论。一九七四年六月三日，肯定事先早有安排，施莱辛格回信赞扬了杰克逊的建议——换句话说，就是使他自己摆脱美国目前对苏联人谈判的

立场(参阅第二十二章)。这种作法的实际后果就是阉割了还在谈判桌上的各种计划，所有那些计划都要力争能把不对等的状态拉平，也就是说，用一组不对等的总数去抵消另一组不对等的总数。施莱辛格的信使杰克逊能说国防部支持他的立场，实际上也就是说国防部反对它的总司令。

施莱辛格六月三日的信与保罗·尼采写给总统的信同时，尼采是在大约十天以后才辞职的；施莱辛格争论说，允许苏联人拥有超过二百到三百枚以上分导式多弹头洲际弹道导弹的任何协定都是在战略上不能容忍的，因为如果数目再大，就会威胁到美国的陆基战略力量。反对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许多人有一种错误的想法，就是要求控制武器的谈判不仅要把军备竞赛稳定住，而且还要解决我们的一切战略难题。如果没有一个限制战略武器协定，就不会使苏联的分导式多弹头导弹维持在三百枚以下，也不会减低我们陆基力量潜在的容易遭受打击的程度。根据种种预测，那将会使苏联有更强大的分导式多弹头力量，而且对我们的陆基洲际弹道导弹会形成更严重的或者至少是更早的威胁。有用处的辩论本来应该是：这些预测是否合理；如果不签署一个协定，会不会减少苏联的威胁；一个限制战略武器协定能不能减低我们易受打击的程度。说到底，国会在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时期是不大愿意承担一个真正大规模的建造计划的，甚至连施莱辛格所说的每年二十亿美元这个比较微不足道的数额也不愿意承担。

必须再说一次，所有这些都是政府官员没有进行任何特殊挑拨的情况下发生的。我是刚刚从叙利亚搞穿梭外交后回到国内。而施莱辛格抛出他的炸弹时，还一直没有就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问题对苏联人采取任何新的步骤。这是要计谋的先下手对付不要计谋的，因为尼克松并没打算到莫斯科去搞什么新奇的策略。

尼克松对施莱辛格给杰克逊的信作出了反应，六月六日他把

国防部长叫到了椭圆形办公室；他显然怀疑那封信是事先同杰克逊串通好了的。确实，在一个正常的政府中，任何珍惜自己职位的政府成员都不会公开地背离总统的政策。这是一个象征，说明他的总统宝座已经分崩离析到何等程度，因此尼克松竟不得不听任自己的国防部长似乎与自己分庭抗礼；他虽然怕双方当面顶撞起来，但还是鼓起勇气，设法很好地分析了基本问题，这表现了他的坚毅气质。他说：

让我告诉你我对参与其事的人们的看法。有趣的是，现在国防部、国务院和每个人都认为共产主义不好，你也不信任苏联，这两个情况我都是早就知道的。尼采认为，我们应该在任何事情上——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分导式多弹头导弹、级限禁试*、反弹道导弹，都要对苏联采取拖延回避态度。我懂他的意思。在政府官员内部，对目标是有不同看法的。国务院倒愿意让这件事告吹拉倒，因为不是他们臆造出来的——中央情报局也一样。在国防部——不是指你——，人们希望采取拖延回避态度，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较多的预算——多造些船，等等。那不完全是自私自利。他们真的相信任何协定都不会对我们有利的。正象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第一阶段那样——虽然我们并没有放弃任何东西。说老实话，你作为部长就应该引导国防部。你要拿出自己的看法。近来有些部长的作法是用发出信件来表明立此存照——信中所谈的是我既不能接受又不能拒绝的，就是说可以这样做，也可以那样做。看到你也采用这种办法，我感到失望。

施莱辛格表现得隐晦而坚定。他坚持说，他赞成分导式多弹头导弹的限额，但是同意如果苏联的分导式多弹头洲际弹道导弹超过了三百六十到四百五十枚，限制就失去了意义；他也和尼采一样并没有说明，如果不签署协定又怎样能使苏联人停留在那个限

* 级限禁试在本章内将谈到。

额之内。他暗示说，他赞成一个对等的总额上限为大约二千五百个运载工具——这个数额恰恰比美国已有的任何计划都至少超过三百五十个，而比苏联的总数差一百个。困难在于，尼克松没有可供选择的计划。他希望从施莱辛格那里得到的是一般的灵活性和精神支持；而不是对某一项新计划的支持，因为这样的计划并不存在。处于那种局面下，尼克松在一片空虚之中说出了近于哀伤的恳求的话：

我们需要你帮助。请你帮基辛格想出一个解决办法。我来对付勃列日涅夫。我说过，美国不比任何人差。美国人民单纯质朴，并不热中于不惜一切地争取和平，但他们是希望和平的。我的朋友中有很多人甚至一看到我们要去同苏联谈判就毛骨悚然。但是，难道我们就听任这个世界把军备竞赛搞下去吗？我们想个办法来控制它好不好呢？

苏联人拖延回避，僚属们啧有烦言，在这种离奇的局面下，六月二十日，出发去莫斯科前五天，尼克松召开了国家安全会议。这次会议并不是要作什么决定；它是要研究一下我们到莫斯科后万一发生苏联人提出建议那种意外时该怎么办。我应尼克松的要求简括地叙述了我们的处境：

如果美国不加强力量，苏联将在八十年代以前，可能在一九八〇年以前，也许在一九八二年以前，在分导式多弹头导弹的数量上超过美国。这要取决于制造的速度。如果按他们以前的最高速度计算，美苏之间的差距将会变得相当惊人。我们现实的抉择是，或者抑制他们的计划，或者加强我们自己的计划。最坏的局面就是既不抑制他们的，又不加强我们自己的。

尼克松插话说，这正是可能出现的局面：“如果不加以抑制，我们可

以大喊大叫，再三争取国会支持，而那种局面还是可能出现的。但我主要关心的是那种局面也可能不出现。”

我接着概括了战略问题：

谈判的状况如下。我们谈论的目前计划是把临时协定规定的数字延长到也许是一九七九年，或者是一九八〇年——这里这个日期很重要，因为到一九七七——七八年期间三叉戟潜艇就能用上了。为了补偿这一点，我们希望能限制分导式多弹头导弹的总数。他们提议让我们有一千一百枚，他们有一千枚。我们告诉他们那还不够。那样将在下一年度左右大大限制住我们，而让苏联能继续加强。据我所知，政府中没有任何人建议接受这种办法。但是他们可能提出一个更大的差额……现在，总统先生，你不需要作什么决定。我们收到了一个建议，但只是一个不太满意的建议。但是假如他们扩大了差距——那时我们是不是准备把临时协定延长到一九七九年或一九八〇年，并开始部署一些更大的导弹呢？……你也许要考虑作这样一些决定。我没有根据说你会这样做，而且实际上我的预言是你不必考虑这样做，因为他们是不会建议扩大差额的。

必须指出，我提出的只是一个要求，即探讨我们自己的建议的上下限。三月间我们已经提出过建议，那是这次会议上派有代表出席的所有政府机关都同意的了；我们正在研究的是，万一苏联人出乎我们意料之外，对我们所提建议做出了更加灵活的反应，我们应该如何应付这种意外情况。施莱辛格的回答是把他六月六日对尼克松说过的话重加斟酌，提出了一个崭新的计划，这项计划在预定要召开的最高级会谈之前一个星期提出，等于干脆抹杀了六个月来的谈判纪录，而且认定目前正讨论中的唯一的建议是风马牛不相及而把它搁置一旁。他建议对等的总额应该是二千五百个；分导式多弹头洲际弹道导弹的限额允许我们有六百六十枚民兵式导弹，允许苏联有三百六十枚；对从潜艇发射的分导式多弹头导弹

不加任何限制；临时协定延长到一九七九年。

困难在于，这个建议实质上在三月间已经被苏联拒绝了，原因是不难理解的：它没有抑制美国的计划；它将削减苏联唯一重要的分导式多弹头导弹计划。美国国防部长的年度形势声明中曾发表过未来五年之内的兵力计划，而民兵式导弹的最高限额比该声明已作为计划发表的数字还要高。另一方面，苏联人——根据我们自己的估计——在协定有效期内除五角大楼计划允许他们拥有的分导式多弹头洲际弹道导弹限额之外还有能力多部署至少五百枚。我们仅有的提出来对抗的东西是制造一百五十枚民兵Ⅲ式导弹，每枚有三个弹头，而苏联最好的导弹上每枚有六个弹头。这就是说，我们想以制造自己的四百五十枚弹头相威胁，来制止苏联可能拥有的三千枚弹头。任何人，不论他的反共高调如何响彻云霄，也不能靠虚声恫吓就使苏联人慑于声威，俯首听命。三月间，当我第一次提出来时，勃列日涅夫已经告诉过我，如果他接受我们的建议，他就干不长了。

施莱辛格听不进这些道理。苏联人已经拒绝了他的建议这个事实还不能让他死心；苏联人一直只是和我打交道；到最高级会谈上他们要直接面对第一把手：

勃列日涅夫非常尊重你，总统先生。你能做到很有说服力——你称得上辩才无碍。我相信如果你能说服他们把速度减到每年八十五对每年二百，那你就算赢得了一个重大的突破。

“重大的突破”这个说法可是轻描淡写了。这种突破靠辩才是赢不来的。这项任务等于是要把德摩斯梯尼或者丹尼尔·威伯斯特*辩论倒。那简直需要出现一个奇迹。

* 尽管丹尼尔·威伯斯特曾经两度担任国务卿。

只有在深信尼克松行将完蛋时，一位内阁官员才敢对他的总统说出这番降尊纡贵的劝勉的话。尼克松在日记里写道，这番话“实际上是对任何人的才智，特别是对我的才智的一种侮辱。”^⑨如果是在比较平静的时期，本来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的国内政敌们攻击东西方政策时那种自以为是的教条主义是毫无道理的。因为这个问题原很容易得到合理的分析。施莱辛格和我都同意，给苏联的分导式多弹头导弹规定一千枚的上限是太高了；实际上那根本不是什么上限。我们都同意，最好能给苏联的导弹规定一个三百六十枚的限额；我们的分歧只在于那是否办得到。假如我判断正确，假如尼克松尽管口若悬河，而苏联人还是拒绝那个方案，问题就要简单地归结为：对苏联的分导式多弹头导弹究竟有没有一个多于三百六十枚但少于一千枚并能改善我们处境的限额？根据常识可以认为，必须有这样一个限额。

施莱辛格表示过，如果我们在那年夏天不能取得一致意见，他的反建议将是要求使我们的民兵式Ⅲ型导弹计划再增加一百五十枚（或者四百五十个弹头）。我认为（也许看错了），让苏联人把他们的分导式多弹头导弹限制在八百到八百五十枚水平上是办得到的，如果这样做了，本来能够不让苏联人比勃列日涅夫的建议还更多拥有九百到一千二百枚弹头，比当时的水平还更多拥有三千枚弹头。如果认为这些数字还微不足道，那就很难理解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第一阶段何必要因为苏联拥有三百枚单一弹头导弹的优势而大喊大叫。

后来的实际情况是，我们一直没有制造民兵式Ⅲ型导弹，主要是因为五角大楼一直没有提出这样一项计划。由于没有协定，原来建议的允许苏联拥有三百六十枚分导式多弹头洲际弹道导弹的限额很快就变成了镜花水月。从那以后，苏联人已经超过了我们在一九七四年曾认为不能容忍的一千枚限额。目前限制战略武器

会谈第二阶段的上限是一千二百枚，比勃列日涅夫的建议还多出二百枚。经过三届政府以后，我们的战略力量的总和略低于一九七四年的五年计划的设想。继尼克松之后的任何一届政府也没有提出过一九七四年五角大楼曾要求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去制造的那个总额。它们甚至在没有协定的情况下也甘愿维持我们现有的计划。关于我们目前面临的战略困境应由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负责的说法，我就只谈以上这些。

在其他任何时期，如果把一九七二年的“战争贩子”描绘成一九七四年的“不惜代价姑息求和的人”，那简直是荒唐可笑的。而在尼克松任职最后几周的狂热气氛下，那种指责竟被认为是天公地道的。在那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召开后的第二天，就来了上文说过的关于导弹秘密交易的指责。

当时恐怕不大有希望按照符合我们国家荣誉的条件达成协议，而尼克松又不愿意缔结另一种协议，这就使得整个争论更加徒劳无益。妨碍达成协议的倒并不是我们的政府有关部门；而是因为苏联事先早已定下了政策，在尼克松政府明显分裂的那个夏天——不论由于什么原因——决不前进。不过，为鸡毛蒜皮而不断争吵也确实使尼克松作为总统最后出访时威信扫地。

最高级会谈是在美国国内发生不幸情况时举行的，这次会谈的国际背景也并不有利。一九七二年时，虽然在越南有封锁和轰炸，苏联人还是照常开最高级会谈；这最清楚地说明，苏联人希望做一笔重要的交易；他们确实是想举行会谈。苏联人不愿意落在迅速进展的中美关系的步伐后面。一九七三年苏联人希望缔结防止核战争协定，而且勃列日涅夫很想讨论中东问题。但是到一九七四年六月下旬，除了想孤立中国之外，上述因素中没有一个能压倒这个现实情况：尼克松政权已经摇摇欲坠，大限在即了。

苏联人的处境也并不特别美妙。一般说来，缓和的年代对我

们比对我们的敌人更好过——尽管批评我们的人声嘶力竭地唱反调。正如我在为最高级会谈写给尼克松的一份简单汇报中所说：

苏联领导人对力量对比的变化是敏感的，他们不会看不到，从你上次会晤勃列日涅夫以后美国的外交地位实际上并未削弱，而苏联的地位在某些方面却衰落了：在中东，一定程度上在欧洲，还有在远东。确实，苏联的挫折和失望也许在莫斯科已经使他们有些怀疑同西方、同美国搞缓和是否妥当。不过勃列日涅夫已经参与了这项总方针，如果他轻易反悔，肯定会危及他本人的权力地位。

这个判断后来证明是对的。勃列日涅夫非常不愿意放弃为缓和东西方关系所做的努力。他所放弃的——当我们国内浩劫的全部深重程度已经被人们了解后——只是为扩大现有格局承担任何重大责任。要承担那种责任，他就需要一位法国人所谓的有资格的谈判对手——一位说话能兑现的旗鼓相当的人物。而这恰恰是尼克松越来越不能胜任的。第二届任期内的总统总是会遇到严重的障碍；他一个月一个月地接近退职，接近在政治上无所作为。具体到尼克松，水门事件大大地增加了这种工作岗位的风险。在几乎所有观察家的心目中，他在第二次当选后的第二年就已经逐渐接近任期的结束了。

一位政治家的工具是洞察力和权威。任何才干都不能代替直觉，要能直觉地认识到哪些事件是相互联系的、根本的，哪些是表面现象，哪些事件是有关的，哪些是声东击西。尼克松直到辛酸的收场时都还保持了她的洞察力，甚至磨炼得更敏锐了。但是，如果一位政治家不能使对手相信自己能实行自己的主张，他的工作就会变成纸上谈兵。干外交这一行就是用今后实行的诺言来做交易；而尼克松正在以惊人的速度丧失这种能力。作为一位谈判对手，

他肯定是越来越引不起苏联人的兴趣了。他们对他始终以礼相待，甚至必恭必敬。但是在一九七四年夏天，他们已经不再想对尼克松承担什么长期的义务，或者为讨好他而付出代价了。一九七四年最高级会谈的麻烦不在于有进行对美国国家利益不利的交易的危险，而是恰恰相反——这次会谈注定是谈不出什么名堂来的。

尼克松首先在布鲁塞尔停留，同北大西洋联盟各国政府首脑会晤，庆祝拖了一年多才实现的大西洋关系宣言的签订。当时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二十五周年，但情绪并不愉快。主要盟国——德、法、英、意——的首脑和前一年激烈辩论的参加者都已易人。该宣言的措词实质上是我们为一个新的大西洋宪章所追求的。但是，仅仅重申团结而不采取具体行动就已需要谈上十四个月，这很难说是精神上准备重新献身的迹象。

尼克松在欧洲名声显赫；很多欧洲人喜欢把水门事件看做是反对他的人从政治上对他的打击，而不是美国政府目无法纪。西方领导人以对尼克松本人的敬意和对垂危病人的关心来接待他。当尼克松启程去参加正变成每年一度的同苏联领导人的最高级会谈时，重申团结一致以反对苏联的潜在侵略等等，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看作是一种迹象，表明我们的东西方政策中遏制和共处这两根并行不悖的支柱都还在起作用。不过，从同样的迹象中也可以看出，这套形式主义做法已经失去了咄咄逼人的效果，因为这次会晤更多地带有从此告别的味道，而不大象一次政治活动。

正是由于上述局限性，我们的苏联东道主才一反常态，表现得颇能体贴尼克松个人的窘境。与尼克松上次来访时不同，六月二十七日勃列日涅夫到莫斯科伏努科沃二号机场去迎接他。勃列日涅夫当时唯一的头衔是共产党总书记，他很少去机场迎接外宾，除

非来访者也是共产党的高级官员。他陪同尼克松进入克里姆林宫中尼克松曾于一九七二年五月住过的沙皇遗留的豪华居室。不久，两位领导人就举行了私下会谈，只有苏方译员维克托·苏科德烈夫在场，这次会谈使欢迎宴会推迟了半小时才开始，当然也使未能参加会谈的人们感到不安。尼克松没有告诉我讨论的内容；苏联人也一直没有提到过。尼克松很快就辞职了，所以那次会谈没有留下实际的结果。它正象在北极的一声孤独的呐喊，象一种消逝在空虚之中的无声的噪音。

但搞个人友好是有限度的，苏联人不允许越雷池一步。尼克松在回答勃列日涅夫的祝酒词时把一种心情推衍成了一项原则，他在即席讲话时常常这样。尼克松赞扬过去两年内美苏关系的成就说：

能够取得这些成就，是由于总书记和美国总统之间建立了个人关系。而且这种个人关系正在扩展到两国政府的高级官员之间。

有句老话说，任何协定都只能看缔约双方愿不愿意执行。由于我们的个人关系，我们愿意履行这些协定是不成问题的，而且在互利情况下我们还将缔结更多的协定。

说苏联领导人的政策是基于个人关系，这种提法即使在最美妙的时期也是他们难以接受的。说到底，共产主义的哲学只能是唯物的。苏联领导人甚至在私下谈话时也说他们的政策根据是客观因素，而不是偶然事件或感情，他们为这种信念感到自豪。但是，具体到几乎肯定要垮台的尼克松身上，勃列日涅夫就不仅需要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正确，还需要使自己的政策与尼克松的命运脱离关系。因此，塔斯社向苏联人民报道的是稍加意译的尼克松讲话。它删去了“个人的”这个字，改动了尼克松的话，使那些话看起

来象是在形容两国关系，而不是两个人的关系。苏联人对尼克松表示的关怀显然并没有扩展到把克里姆林宫与缓和取决于尼克松个人这种提法拉扯在一起。

我们的记者们马上注意到了调子不一样。塔斯社社长列奥尼德·M·札米亚京同龙·齐格勒一起参加了对新闻界的每日简报会，札米亚京侃侃而谈，解释说塔斯社的译文是准确无误的，一些相反的新闻报道都只反映记者们不懂俄文。苏科德列夫告诉我们，省略是由于粗枝大叶——情况很快就证明，这个说法不太确切，但相当策略。齐格勒因为必须强调缺了尼克松这个人就不行，任务在身，头脑发热，竟把整个这次事件归咎于党报《真理报》是在早晨出版的，必须在很短的规定时间内付印。齐格勒说：“我希望在今天晚间的《消息报》上看到‘个人关系’这几个字”，他指的是傍晚出版的政府日报。他很快就发觉，苏联人对准确的新闻工作是忠心耿耿的，而需要在规定时间内出版的苏联新闻报道仍然还是无所透露。《消息报》重复了《真理报》的说法。塔斯社还对祝酒词做了另外一处改动。尼克松提到勃列日涅夫回访美国时说计划安排在“下一年”——依照每年一度最高级会谈的模式。苏联人则不愿意说定一个明确日期；塔斯社报道了尼克松提到过回访，但是省略了预定日期。未加任何解释。不需要任何解释。苏联人想及时抽身，亏本买卖不做下去了。

可见，一九七四年的莫斯科最高级会谈也象中东之行一样，与周围的情况很不协调。拥戴尼克松的人——到这时实际上已经只剩下齐格勒——强调他的个人作用。但苏联人需要的是不把一项重大政策与某个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这实际上也是美国的国家利益所在，而且是我们从水门事件中挽救我们国际地位的唯一方法：要表明一些根基稳固的政策是能够历经我们国内的浩劫而持续下去的，因为这些政策反映了国家的长期目标。

在这种紧张、痛苦、忧心忡忡的精神状态中，出访代表团内部那些曾使中东之行受到损害的鸡毛蒜皮的争吵又以更尖锐、有时更可笑的形式出现了。艾尔·黑格同我为了在克里姆林宫中谁住的套间更靠近尼克松的套间——那在当时情况下是一个价值大小颇可怀疑的地位象征——而发生了一场大可不必的争吵。黑格占了上风。那真象是“大力神号”邮船已经撞了冰山以后还有人在争船长餐桌上的席位次序一样。

这时，我同尼克松的个人关系已异常疏远。我搞不清楚，他是我的萨尔茨堡记者招待会仍然耿耿于怀呢，还是象专栏作家威廉·萨菲尔——人们认为他很接近尼克松的一些同僚——所暗示的，尼克松在利用我自己的种种困难来重新树立他的权威。^⑩如果是由于后一种情况，那可真是枉费心机；要贬损我的地位，尼克松还是有足够权力的；要恢复他自己的地位，他已经无能为力了。最合乎逻辑的解释是，他数了数为挫败弹劾而在参议院需要的三十四票，发现其中大部分属于保守派一边。既然我正因缓和政策而受到责难，在这个题目上萨菲尔的专栏就是尼克松与我划清界限的尝试之一，而且他也想争取借此重新取信于他以前的选民。

不论原因何在，总统与我的关系变得比以前生硬多了。新闻界并没有因为萨尔茨堡记者招待会就宽恕了我。他们一直没有让我忘记辞职的威胁。他们苦心搜寻蛛丝马迹，来证明似乎我与尼克松的关系不好，我的威信下降，我心神不定。在勃列日涅夫的克里米亚海滨别墅公园里漫步时，葛罗米柯和我走在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后面，离他们两人有十英尺远，这个事实竟成了头条新闻：我或是心怀愠怒，或是已被贬为二流角色，或是二者兼而有之。

真相却要简单一些。确实，由于两个多月的不断出访，我已经精疲力竭了。但是，尼克松本来已为静脉炎而感到剧痛，他正在忍受的创伤比把僚属甩在身后要深重得多。尼克松是认真研究外交

和政治的人，他不会看不到，使谈判难以认真进行的最大障碍在于，苏联人认定，即使他在政治上能把这一关挺过去，也没有权威了，何况他很可能是挺不过去的。我——尽管面临着重重困难——肯定能把这场浩劫挺过去，而尼克松却不能使自己接受它，但又一定已经发现躲不开它，这种情况当然是他觉得难以忍受的。何况长期以来新闻界早就在强调我的角色是和平谈判者，而他几乎是“搞轰炸的歹徒”。

不难理解，为了维持正常功能而迫使身体尽量坚持，这似乎消耗着尼克松越来越多的精力。他显然精神恍惚，若有所思——这只是间或由于同我搞得不愉快，主要原因还是他正在逐渐同那些一向借以安身立命的东西告别，他正在丧失曾使他借以忍人所不能忍的那种热中执着精神，他不久就不再是场面上的人物了，那本来就同他基本上拘谨温和的性格不协调。趁着还享有总统的种种待遇时，他必须淬砺自己，为今后的流放时期做好准备，到那时乐队就不再演奏了，他一生的好梦也就将成为泡影。

这次的程序还是和一九七二年莫斯科最高级会谈一样。^①在大克里姆林宫那个十五世纪的富丽堂皇的多棱宫里举行了欢迎宴会，穹窿形天花板四周有一些宗教题材绘画。通常每天要在金碧辉煌的圣·卡捷琳娜宫开两次全体会议。在不召开正式会议的空闲时，葛罗米柯和我碰头，谈判各种待签署文件中那些突出的问题。从六月二十九日星期六下午到七月一日星期一上午，勃列日涅夫把我们全体人员都带到克里米亚去了。

在苏联方面，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和波德戈尔内三驾马车还是很显眼的，不过勃列日涅夫已经不太像两年前那样拘泥于集体领导的形式了。现在他谈话时占有凌驾别人的地位，很了解情况，思路敏捷，特别是在军事问题上。这次最高级会谈令人痛心的特点之一是，典礼的庄严隆重与尼克松的处境所允许取得的成果之间

不大相称。事先已经看得清楚，不会出现重大突破，所以紧张程度缓和了，表面上一团和气成了会谈本身的目标。会谈气氛是融洽的。奇妙的是会谈都按时开始。前两次最高级会谈中，一九七二年关于越南，一九七三年关于中东，都曾以声色俱厉为其特点，而到这次却从未发生过。原因可并不那么对我们有利。恰恰因为苏联领导人不愿意在尼克松继续留任上投下太多的赌注，他们才减少了对会谈的期望。他们一再重复他们的目标，但按他们的标准用的却是一种低调。会上讨论过欧洲安全会议；到那时有许多西欧领导人已经同意欧洲安全会议最后要开成一次最高级会议，所以美国在这一点上再继续坚持已经毫无用处。（这就成为后来召开的一九七五年赫尔辛基会议，杰拉尔德·福特因参加这个会议而在国内受到了攻击。）在后来列入“赫尔辛基最后文件”中的其他问题都是十分晦涩费解的——其中大多是起草一份集体文件时咬文嚼字的问题——本来不宜于拿到最高一级去解决，不过那些问题还是讨论了，相当详尽，议而不决。

关于中东问题，在会上曾交过锋。勃列日涅夫询问了我们的政策目标，并强调美苏需要采取联合行动，但是并没有表现出他三月间同我会晤时的那种激情。苏联人从最近的经验中学乖了。一位外交家给人以印象，似乎必然发生的事情原是因为受了他的政策决定的影响，这种印象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有坏处，因此，勃列日涅夫总是说，采取单方努力能见效时，也无妨采取单方行动。葛罗米柯在一次同我单独会晤时承认说，我们的中东政策比初次见到时要复杂得多。他说这话时并没有怨恨之意。苏联人似乎终于从他们春天的窘境中得出了正确的结论。为了扮演一个正式角色而去一再求人，这只会突出苏联人的无能；他们必须等待我们犯错误，或者我们的现行战略隳于一旦。

苏联人还为在一些有争论的问题上要花样而给领导人们巧妙

地穿插上许多次会议，议题都是在正常情况下本来应该留给外交部长们的；就一些已经拟好、须由最高级会议签署的协定进行晦涩的技术性的讨论。其中有三件是稍微重要的：关于探讨禁止环境战的可能性的协定；关于放弃一九七二年限制防御性武器条约所允许的选择反弹道导弹第二发射场的协定以及关于禁止爆炸力超过一定“限量”的地下核试验的条约草案。

关于谈判禁止环境战的协定——例如为军事目的而改变气候——是一些会出点子的官员们看到需要让他们的领导人显得体面而不得不出来的那种多少有点用处的协定。这是一种顺乎人情的表示；这是不会引起争论的，因为不大容易知道它指的是什么，而且因为很少人敢站出来公开支持环境战。后来，一九七七年五月，美国、苏联和其他三十个国家在日内瓦签署了关于这个问题的完备的国际协定。

关于反弹道导弹系统的议定书是来源于一九七二年签订的条约，该条约限定每国的反弹道导弹防御场地只能有两处，相距至少一千三百公里。每国都被授权防御其首都和一处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场。后来情况表明，没有任何国家充分利用了根据该条约享有的权利。苏联在莫斯科附近已经有一个反弹道导弹系统；我们在北达科他州的格兰德福克斯附近修建了一处保卫一个导弹发射场的防御场地。两国都没有进一步搞第二个场地。一九七四年的最高级会谈同意把实际情况固定下来，限定每国只有一处反导弹防御场地。这个协议对我们比对苏联稍微有利，因为美国国会不可能有朝一日同意拨款修建被允许的第二个场地，而苏联人是不会遇到这种阻难的。

这个修改使原来反弹道导弹协定所根据的推理达到了逻辑的结论。既然靠维持每国居民易受攻击的状态就能提高威慑力，那末有一个防御场地反而比有两个场地更好些；实际上，有没有场地

都关系不大。在所有这些想法中没有受到审议的首先是，促成那个协定的推理是否妥当，对这方面略而不论恰恰是有趣地反映了老生常谈所发挥的威力。一九七二年以后，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中所允许的进攻性武器的数额曾引起争论，但实际上那些数额几乎不过是批准了双方反正正在计划中的数额。而几乎没有引起人们注意的，倒是那种出乎常情的理论，即一个国家安全的基础在于其居民及其导弹发射场易受攻击的状态。特别是在出现了分导式多弹头导弹的威胁以后，为什么保卫导弹发射场就不会促进战略安全呢？对于这个问题，我回想起来，当时自己附和着舆论似乎是懂了，现在反而觉得并不那么清楚。让洲际弹道导弹的固定发射井毫不设防，这就使对发射井的攻击归结为一个单纯的工程设计问题；由于精确度越来越高，攻击性弹头越来越多，所以如果掌握了必要的技术，也不妨认为对导弹发射场进行反弹道导弹的防御是一种可能的保护。但尽管以上看法言之成理，一九七四年的反弹道导弹协定还是在一条没有异议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小步。

最有趣的协定是关于禁止“级限”核试验。苏联裁军方案的主题一直就是关于完全禁止核试验的建议。（由美、英、苏谈判的一九六三年核禁试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或水下的核试验，但允许继续进行地下试验。）按照苏联通常的说法，所有的试验都应该禁止，而且其他国家也将被邀请加入。如果其他国家不加入，则缔约各国将有权不再受条约约束。苏联的这项建议一直遭到美国两党历届政府的拒绝。美国国防部及其科学顾问们令人信服地论证说，如果不试验，我们的武器库就不能得到改进，而且秘密的地下核试验是很难侦察的。国务院则反对在退出条款中暗示的对其他核大国——如中国和法国——施加的压力。多勃雷宁信守着一条苏联的格言：你只有试推一下，才能知道门是否没上锁；所以他在

一九七四年二月初拿出了苏联那时令人肃然起敬的关于全面核禁试的方案。我们拒绝了。二月四日，葛罗米柯想了解一下，我们不注意听多勃雷宁的前奏曲是否因为他官阶不高；于是他，政治局委员，再一次向总统提出了那个方案。答复还是否定的。苏联又退而求其次，提出了禁止限额的主意——指的是把双方每年的试验限制在相互同意的次数之内。这个主意不像全面禁试那样危险，但却包含着相当严重的核查问题。

我在三月间访问莫斯科时提出了核查问题，并反对任何对第三国施加——甚至暗示的——压力的协定。勃列日涅夫提出的对案是“级限”禁试——指的是超过一定当量以上的核武器的地下试验。这个方案是我准备讨论的。苏联的战略比我们更依赖于大当量的武器；因此，把试验限于较低水平，总起来看还是会对我们有利。而且主要的核查问题是在较小当量的爆炸上。这样一个协定在法国这样的同盟国家和中国这样的友好国家中将引起较少的反感；它没有对这些国家施加暗含的压力，因为它不牵涉这些国家的行动。在一九七四年最高级会谈举行前的几个月内，我们在本国政府中和同苏联人谈判时都进一步推敲了级限禁试的概念。原来的想法是用爆炸的地震冲击来确定级限，后来改为一个比较简单的主意，即规定上限为十五万吨梯恩梯当量。

级限禁试虽然在控制军备上用处有限，但它使我们能开始讨论核查，这是一大进步。如果我要核查核试验是否低于十五万吨当量，苏联就必须把他们的试验场地公开出来，同意不在任何别的地方搞试验，提供每个场地的地质结构，使我们能校准自己的仪器。出乎意料之外，苏联竟同意这样做。这时出现了“和平的核爆炸”问题——指的是理论上利用核装置来修运河或改河道。任何一方都不想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苏联特别不愿意留下空子，让人能把一个军事装置伪装成和平的炸药。既然在国际协定上不可能

确切说定和平爆炸的地点，我们就要求现场视察。经过几番争吵之后，苏联破天荒第一次同意了这项原则。根据该协定所附议定书，应在一九七六年度限禁试实施之前拟定有关细节。

所有关心核查问题的人——所有认真研究军备控制的人一定是关心的——本来应该欢迎级限禁试，把它作为一个有潜在意义的试验计划。苏联人以前从来没有同意过现场视察；他们以前从来没有表示过愿意提供那么多关于一个军事试验计划的情报。既然甚至那些对苏联动机最疑神疑鬼的人也不认为级限禁试会在军事上对我们不利，可见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的和解姿态肯定是想要在日渐消逝的缓和中维持住某种势头。

但是，美国的不断争论和莫斯科越来越多的猜疑到这时已经把缓和吞没了。因此，级限禁试几乎没有能为最高级会谈增添生气，或者提高谈判的水平。它涉及的内容技术性太强，无法吸引领导人的注意，或者无法使他们把心思集中到讨论的问题上来。六月二十八日星期五，这个问题提上来时，柯西金一定是忘记了他的讲话稿，或是由于积重难返，总还去照搬那些人所熟知的滥调，实质上是攻击级限禁试不如全面禁试。葛罗米柯和我本来应该报告谈判的进展情况。但是柯西金却另有打算。他一听到要谈的是什么问题，就马上跳出来拚命鼓吹应该全面终止核试验。他对任何相反的论据，甚至尼克松说的，都不屑一听，而尼克松似乎也忘记了，我们聚到一起是为了赞扬一个已经达成的协议，而不是要继续讨论一个已经被搁置的协议。尼克松又祭起了他反驳别人时惯用的法宝，说他的看法实际上与柯西金一样，只是想要殊途同归，这对我来说可是一条新闻。柯西金正在批驳一个他的政府即将签署的协定，而尼克松则把四个月前自己拒绝的东西再接受下来作为争取的目标。搅了一个钟头，闹得思想混乱以后，几项原则总算才又恢复了原状，此案交回到外交部长们手里。

在美国国内，级限禁试之所以归于失败，倒不像限制战略武器协定那样，是由于人们深恶痛绝，而是由于漠不关心。也许除了专门搞军备控制问题、对现场视察原则感兴趣的少数人之外，简直没有什么人支持这个方案。多数自由派宁愿要一个全面禁试；因此他们对十五万吨当量的上限冷嘲热讽，反对这个协定，从而扼杀了走向现场视察的第一次突破。这是一个绝好的案例，说明过于求全反而一事无成。保守派倒并不反对级限禁试。但是他们也绝不肯为自由派始倡之而终弃之的事业奔走鼓吹。要求更高的人们同不肯力争的人们结成了同盟。卡特政府放弃了它。这个条约签订了近八年之后，还在等待着参议院的批准。当苏联人看到这个条约在美国显然已经没有前途之后，就立即转而争取全面禁试。这件事是一个很好的象征，说明缓和政策和军备控制正在失去美国的国内基础。

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仍然是最困难的问题。出现的问题中一部份是我们自己招惹的。说到底，那时还只是一九七二年签订、一九七七年到期的五年临时协定的第二年。急于签订一个新协定，原因在于内部。以前每次开最高级会谈时，尼克松政府总要来一个惊人之举：一九七二年是最高级会谈本身，再加上迅速缔结限制战略武器协定和国际行为各项原则；一九七三年是防止核战争协定。到一九七四年时，如果最高级会谈以后年年举行，就不大可能每次都发表重大消息，把这一点主动表明一下，本来会是对我们有利的。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不可能按照重大电视节目的需要来安排的；两个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的敌国之间的关系就更不能。根本不可能有那么多需要每年解决的争端。东西方最高级会议一旦形成制度以后，它的用处就在于使每位领导人有机会设法摸到对方的心思，不仅了解协议的可能，也要知道压力的限度。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九七四年的最高级会谈是一次“正常的”最高级会谈，而

其他各次倒是不正常的。

但是，在一九七四年骚乱的夏天，看得这么深的人还不太多。广大群众，新闻界，一定程度上还包括美国政府，像吸毒成瘾的人需要毒品似的，都热中于耸人听闻的消息。美国总统或国务卿一级人物同苏联人的任何会晤如果没有赢得突破，就要被新闻界贬为失败，尽管这次会晤的其他成就是不可忽视的。任何一次高级会晤都要在美国政府官员中间引起一番激烈争论。即使在所有的机关本来已经应该知道不可能有重大突破时，它们也还怀疑会不会有什么幕后活动，并且力图防止出现它们所不同意的结果。

到一九七四年夏天，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已经变得带有过多的政治色彩；正如我说过的，在一场围绕着美苏关系整个性质和甚至尼克松是否宜于当权的更深一层的斗争中，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是一个代人受过的牺牲品。回想起来，更聪明的作法本来应该是提前——当然是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六月二十日那次造成灾难的会议之后——宣布，不存在取得突破的基础，领导人们将把他们对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考虑推延到在较低一级取得更多进展以后。之所以没有考虑过这样一种明智的作法，一部份是因为我全神贯注于中东；一部份是因为这会使人们归罪于水门事件，更要把尼克松搞下台；一部份是因为这会被反对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人们用来显示，尼克松的东西方政策的基本推动力正在消失。

于是我们终于得到了最坏的结果。国内一场激烈的争吵使我们无法执行一个前后连贯的战略，而缺乏了这一点，同苏联人进行任何谈判都是不会成功的。当苏联人三月间同意了分导式多弹头导弹不对等原则以后，多勃雷宁私下告诉我说，还有可能按照我们的要求扩大分导式多弹头导弹的差额。但是，美国一直没有设法提出一项前后一贯的政策，并坚持下去；尼克松和我不得不经常提防着两侧有人打冷枪，那些人的专长就是把任何主张都同一个理

想世界相比较，从而指出那种主张的弱点，但是他们却感觉不到有同样的迫切性去分析一下，在没有协定的局面下会出现什么情况。

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六月二十日会议上作为国防部的主张提出的那些要求是注定要使谈判陷于僵局的。即使口若悬河，雄辩滔滔，也搞不成一个协定，能既提高我们的总额，又同时毫无补偿地削减苏联分导式多弹头导弹计划。

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甚至背景环境也象征着我们的困难。六月三十日我们在克里米亚会晤时最靠近的主要城市是雅尔塔。尼克松不愿意让人再想起关于一九四五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同斯大林在雅尔塔开会的争论，那是保守派长期以来批判的靶子。因此，白宫坚持要说尼克松开会的地点在奥列安达郊区，实际上那里是政治局别墅所在地，也是开会地点。偏偏新闻中心却设在雅尔塔商业区的一家旅馆里，所有发往美国的新闻报道也就终于都用上了“雅尔塔”这个可怕的电头。

我们在勃列日涅夫官邸的花园里开会，官邸是一套精美的海滨综合建筑，盖在陡峭的插入黑海的小山里。勃列日涅夫把尼克松带进了人们恰当地称之为洞穴的房子，它像山洞一样凹进峭壁下的石灰石中，带有十九世纪的浪漫色彩，别具一格，对标榜唯物史观的国家的领导人来说似乎不大相称。他们两位单独谈话时，葛罗米柯和我带着助手们坐在具有奥林匹克运动会规模的大游泳池附近，四周是电动开关的玻璃墙。这时，游泳池一带都敞开着，外面风和日丽，天朗气清。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关门谈了三个多小时。像在莫斯科时一样，我没有马上知道他们的谈话内容，苏联人也从未提起过这次谈话，或者说尼克松承担了什么责任。最后，我们被请进去谈各项原则。

他们原来谈的显然不是限制战略武器问题。两位领导人显然

一直在等葛罗米柯和我到场后再进入这个话题。尼克松并不对所有的数字都了如指掌，所以让我代表我方进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勃列日涅夫赞成尼克松的建议，他说：

我对总统先生说，我们感谢他派基辛格博士到莫斯科来。三月间他对我们采取了强硬方针，我们把自己的看法坦率地告诉了他。我们告诉了他我们的界限。底算是已经都有了，所以他应该告诉我们从哪里下手来达成协议。

这番话是想请我们提出一个折衷方案，按苏联标准看话说得还有商量余地，暗示他不想坚持苏联原来的立场。我把稍加修改的国防部计划提了出来；这没有得到苏联人赞同，实际上使我们陷入了一场徒劳无功的激烈争辩。勃列日涅夫对那个计划的任何方面都不予考虑。他指出，我们的建议会使我们比苏联多四千枚弹头，这大致上是符合实际的。他几乎肯定已经从公开材料中发现，我们为自己规定的限额基本上符合我们的计划：“达成一个协议是重要的，但那应该是一个抑制竞赛、使它减速的协定。从基辛格博士提出的建议看，美国要做的比起它不签协定也要做的并没有减少许多。”我回答说，根据我们的计划，我们发展分导式多弹头导弹要比苏联缓慢。但勃列日涅夫懂得，这是因为我们的计划已经接近完成了。他说他不认为那能算什么让步；我们遥遥领先，不应该假装并非如此。

尽管有这些交锋，在克里米亚时还是心情舒畅的。苏联人并不很想让尼克松为难。确实，所有参加谈判的美国人都相信，苏联人并不愿意看到僵局。勃列日涅夫及其同僚们不断地让我们在抵消不对称这个框框里提出新建议。但是，我们的国内形势却使我们没有灵活余地，这也就无法刺激苏联人表现出慷慨——即使在最好的局面下，慷慨也从来不是他们的优点。勃列日涅夫在两位

将军支持下拿出了一些地图，表明苏联人如何把我们的海外基地考虑在内，来计算我们自己的第一次打击潜力——三月间也给我看了同样的东西。当然，勃列日涅夫的分析并没有错；同时，论据也不荒谬；那是军事计划的典型的最坏局面应付概要，是战略家的恐怖的预感，认为任何环节都会同时出毛病。准备应付那种局面是必要的，但那种局面却不大会出现。困难在于，当两份最坏局面应付概要碰到一起时，如何来谈判克制的办法。

洞穴会议议而不决就结束了。但是任何一方都不愿意承认失败。决定在第二天不让我陪尼克松去明斯克进行礼节性访问，而同勃列日涅夫回莫斯科，看看能否取得一些进展。但勃列日涅夫也不肯留下一一种他在同美国国务卿面对面会晤时能被说服的印象。我们在飞机上几乎没有谈论限制战略武器问题。在机场上，我们受到德米特里·乌斯季诺夫的欢迎，他现在是苏联国防部长，当时是负责国防工业的政治局委员。在机场贵宾休息室里，勃列日涅夫让我重申我关于抵消不对称原则的基本看法以及我在克里米亚提出的一些数字。他当着我的面命令在当天下午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然后葛罗米柯和我要再碰头研究一次。

当天晚上葛罗米柯和我又讨论了一次限制战略武器问题。葛罗米柯说，美方的数额没有提供解决问题的基础；限制太严，时期（到一九七九年）太短。我暗示说，问题是要使时间同质量和数量挂上钩。我们以前谈的一直都是一些极端的情况：或者是谈判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永久性协定，让每个人都要提防任何偶然事件，或者是谈判延期两、三年，结果使人为一段太短的时期而无尽无休地争论是否公允对等。也许我们应该争取缔结一个代替临时协定的新协定，时间较长，例如说十年，从一九七五年到一九八五年。我出这个主意是为了使我们自己有选择余地，在与军事计划相关联的时限内或者搞“对等的总额”，或者搞“抵消不对等”。这样就能让苏

联人改变临时协定中的数额而又不丢面子。这使我们有另一次机会研究分导式多弹头导弹的问题。葛罗米柯接受了这个主意，谈判也就纳入了另外一个范围。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同意在冬天会晤，落实新的作法。这也给苏联人一个机会，在不停止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进程的情况下来估计尼克松能否幸存的前景。

为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所划定的新范围是一项不小的成就，人们对它本来也许有一个如实的看法，但热中于大型电视节目的新闻界和政府官员们却另有看法。它为海参崴协定和关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第二阶段的认真谈判开辟了道路。尽管如此，国内对它所抱的态度却又是一个明显的迹象，说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已经失去了概念形成的基础。我们国内的辩论不是对不同的战略进行深思熟虑的分析，而是继续热衷于用传统的符号来说明事物。有些反对缓和的人认为，要想推行他们主张的政策，关键在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失败——好象（在没有别的办法时）一个条约的失败就会改善美国的战略地位。一些拥护缓和政策的人则开始把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几乎当成了目的本身——似乎苏美关系并非还需要取决于军事力量对比和苏联在地缘政治上慎重负责的行为表现。正当多弹头已经使运载工具的数额成为在衡量战略均势上越来越不可靠的标准时，对等总额的概念却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占据着统治地位。很难想象会有任何一项计划在经历它必然遭受的意识形态的和精密技术的无情冲击之后还能继续维持下来。我们正在使自己陷入一种最坏的境地：要去限制苏联的武器，已经没有限制战略武器协定，而要对我们自己的战略计划进行必要的扩展，又还没得到国会的支持。

我们在克里米亚本来是有可能达成协议的，这从不到五个月以后的情况就得到了证实，十一月下旬，另外一位总统在海参崴签订了一个协定，它既落实了一九七四年最高级会谈所定的范围，又

执行了一九七三年最高级会谈所做的安排。海参崴协定把对等总额原则视若神明。而我们以前赞成的抵消不对等的作法到那时已被事实证明得不到政府官员们或国内的支持。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几乎没有认识到,为了在纸上赢得总额的对等,我们已经让苏联人多有了二千四百枚弹头,甚至还多,而这些是他们本来不能有的。^{*}这说明神学战胜了分析。

勃列日涅夫也许本来并没想同一位已经受了致命打击的总统冒险签订一个限制战略武器协定。但是,由于一心同中国纠缠下去,任何希望渺茫的机会他都认为不妨一试。我以前的一位同事威廉·G·海兰德后来说,勃列日涅夫搞缓和政策的根本动机就是要孤立中国;因此才那样多次找上门来,企图诱引我们做出一些安排,使我们不得不默认他们去搞垮中国。在他们看到我们显然不肯支持这一套以后,勃列日涅夫可能就对缓和越来越不感兴趣了。^⑫在勃列日涅夫对中国打各种主意时,真正期望、或者能够期望从我们得到多少合作,这是不清楚的,海兰德和我当时也都不清楚。但是,肯定有足够的迹象证明,那一直是勃列日涅夫朝思暮想的事。一九七〇年,在缓和真正开始以前,苏联曾向我们一位参加限制武器会谈的成员试探过,想让美国在苏联对中国采取先发制人行动时予以默认。^⑬一九七二年在我四月访苏和参加最高级会谈时,他们虽无明确的建议,却做了许多暗示。在一九七三年,莫斯科毫不隐讳,防止核战争协定苏方草案的目的就在于禁止美国在苏联攻击中国时对此做出核反应。一九七三年勃列日涅夫在

^{*} 苏联人在一九七四年最高级会谈中向我们提出了一千枚分导式多弹头导弹的最高限额,我相信如果力争,本来能够减少到八百枚。一九七九年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允许双方各有一千二百枚分导式多弹头洲际弹道导弹和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如果估计每一枚苏联导弹有六枚弹头,就会得出苏联多有二千四百枚弹头的数字。

扎维多沃也想摸我的底，他还在圣克利门蒂警告尼克松说，我们武装中国就意味着战争。一九七四年四月波德戈尔内在巴黎参加蓬皮杜葬礼，同尼克松会晤时说，中国如果不主动参加裁军进程，就应该迫使它参加。我们对所有上述建议或是硬顶回去，或是不予理睬。

现在，苏联人又旧话重提。勃列日涅夫同尼克松两人在洞穴中单独会晤时谈的原来是美苏无条件互不侵犯条约。尼克松在奥列安达把这件事神秘地告诉了我，并且说我们应该研究这个建议。他说也许可以把这个建议连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一起摆到同年靠近年底时召开的小型最高级会议的议程中去。在七月二日晚间总统为苏联领导人举行的答谢宴会上，葛罗米柯闲谈时显然警告过尼克松说，中国是对和平的威胁。^④尼克松把我叫了过去，在苏联译员苏科德列夫听得见的距离内概括地说了勃列日涅夫的建议，并指示我通过“渠道”继续研讨互不侵犯这个主意，以便把它包括到小型最高级会议的议程中去——基本上同他在克里米亚私下告诉过我的一样。

如果是在一年以前，我本来不会对这次谈话再用心思考一番。我会估计，尼克松又在耍弄他那赢得时间的复杂计谋，利用互不侵犯的前景来诱使勃列日涅夫在更直接的问题上做出让步。根据防止核战争协定的不愉快的经验，我很可能认为这个策略风险太大，但我会自信能说服尼克松，让他也认识到这样轻浮地耍弄两国共管是太危险了：这显然是在暗示美国听任苏联放手去进攻中国。

现在，当我看着这位身心交病的总统用尽全身精力但求熬过这一个星期时，我已经不那么相信他还能驾驭得住他正在纵容的那股势力。我觉得他似乎在为一个微不足道的策略上的成功而弄险，不惜听任或是苏联、或是中国、或是两国同时为所欲为。我对斯考克罗夫特说，我不执行这个命令，如果尼克松还坚持下去，我

就辞职。尼克松后来没有再提这件事，苏联人也没有，因为我告诉了多勃雷宁，那是一种劳而无功的作法。

我不是说尼克松真想按这个计划一意孤行到底；从他的一贯表现、睿智和信念看，即使他曾逢场作戏地谈过这个计划，也一定会及时戛然而止。但是，我同尼克松尽管个性不同，毕竟是在五年半动乱的时期内合作共事的，制订了并在一定程度上执行了我国对外政策中的一个新计划，其关键因素说到底就是同中国的联系；而在这样的两个人之间居然猜疑到这种程度，这倒颇能说明尼克松政府已经分裂到了何等地步。

七月三日我在莫斯科会见记者时的气氛就是这样。两年前我曾向新闻界介绍过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第一阶段的情况，当时真认为外交棋局上出现了一片不寻常的、甚至具有历史意义的前景，现在可与那个天真单纯的时期大不相同了。现在的气氛中弥漫着怀疑和猜忌。两个多月以来，除两次短暂的间歇外，我一直都在国外：先在叙利亚搞穿梭外交，接着是尼克松的中东之行，最后是在苏联的最高级会谈。在华盛顿度过的两次间歇（第一次十天，第二次六天）都比出国访问还累人。第一次间歇消磨在就电话窃听事件为自己辩护，第二次是对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搞“秘密交易”的指控为自己辩护，而两次间歇中还都要为总统出访进行极度紧张的准备。在访苏之前和访苏期间，我们一直遭到不少含沙射影的攻击——杰克逊参议员、保罗·尼采、即将退役的海军作战部长艾尔摩·朱姆沃尔特发表的声明和暗示，以及报刊上的评论——警告我们不要做过多的让步。我还觉得，在我们的各种机构和制度正处于动乱状态时，东西方关系的脆弱的结构正在受到破坏，可能发生一些我们克服不了的国际危机。这就使我在记者招待会上讲了两段话，那可能被认为是失言，但确实是出自肺腑，表现了我对冲击一个惨淡经营起来的结构的那种潮流所感到的绝望心情，特别

是对我们国内交换意见时的那种虚无主义所感到的绝望心情。有人问，为什么各种武器限额不更放宽一些，我回答这个问题时说：

双方都必须设法使他们的军方相信克制的好处，这种想法在双方的军人中间可不会自然产生。

后来在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我，如果我们在一九七七年以前不能缔结一个新的限制战略武器协定，到一九八五年时会出现什么局面。我激动地回答说：

如果我们不能在大大早于一九七七年以前达成一个协定，我相信你们就会看到技术突飞猛进，数额高速增长，最后，我们能有现在的安定状态就算万幸了，到那时将无法说明战略优势的意义。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必须对自己提出的问题之一是：战略优势究竟是什么？当数额达到这种水平时，战略优势在政治上、军事上和作战上有什么意义呢？你用它干什么呢？

第一段话说的是事实，提法可能不太策略，但是是以丰富的经验为依据的。不可能期待军人们对抑制军备竞赛问题进行创造性的思考；也不希望他们那样做。他们的职责是保持国家强大；他们的任务是，即使别的都垮了，也还要赢得胜利。变成军备控制论者的那些军人很可能忽视了自己的首要任务。军备控制可能要根据敌我力量对比，而清算其间的利弊得失则是要由政治领导人去做的。我讲的虽然是大实话，不过到苏联首都去讲却极不慎重。

至于我谈优势的那段话，则是对后来发生的情况做了相当准确的预言。不过说战略优势已经毫无意义，那是太简单化了，并不真正反映我的观点。^⑤ 将近二十年来，我一直忧心忡忡，生怕失去我们的战略优势。我既作为学者，又作为制订政策的人，一直大声

疾呼，说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时代，必须更加注意区域性的防御手段，特别是常规手段。我一直强烈呼吁，要有一些为保持战略均势所需要的建造计划，从反弹道导弹、分导式多弹头导弹到新式的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但是，在现在的时代，更令人忧虑的倒是双方的弹头数额，而且任何分析都表明，没有一项建造计划能避免造成会使政治家不便表态、吓得老百姓搞和平主义的那种伤亡；到这样的时代居然还存在着按运载工具数额去衡量战略优势的狃于旧习的倾向，我对此开始感到绝望。我们无论怎样努力，也赢不回到六十年代初期为止享有过的那种压倒优势了，技术已经使那个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还怀恋过去，就完全是逃避现实。

关于优势的意义问题比我们在国内辩论时所涉及的要复杂得多。我们经历了几个阶段：到五十年代初期为止我们享有原子垄断地位，这使我们能用战略力量来代替常规力量的劣势而不必担心报复。到六十年代为止，我们还处于一种优势地位，如果先动手，我们很可能打得苏联没有还手之力，而苏联人当时还没有同样的能力。苏联人考虑到最坏的情况后，无论如何是不会铤而走险的。到七十年代初期，苏联人对最坏情况的分析肯定曾相当有效地抑制了冒险主义。从那以后，即使苏联人没有赢得他们自己的优势，我们却已失去了战略优势，这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大变局，因为这在一定程度上使苏联人可以腾出力量来搞区域性的干涉。苏联人还是不愿意对美国轻启战端的，因为他们怕我们潜在的动员能力，他们一直不能完全肯定我们不会不顾一切地使用战略核武器。但是，正如我在上文已经指出，到一九七四年最高级会谈时，我们已经终于不能不从战略上进行根本性的重新估计了。

而这种重新估计却正是我们的国内辩论所反对的。我觉得似乎有两派头脑简单的意见使任何合理的讨论都无法进行。一派企图把战略建筑在核战争的恐怖上，并计算出为对平民进行残酷屠

杀所需要的核武器的最低数额。另一派则认为，不论情况或危险如何，任何数量上的优势在战略上都是有意义的。我一直主张要维持一支强大的抗衡力量作为保证，使苏联的决策不得不陷于对最坏情况的估计之中。但是，那在我心中只是治标的办法；还必须用更大的力量搞好区域性防务和常规防务，那是不能回避的。我一直担心的是，我们内部不断的争吵都集中在一些象征性的问题上。我呼吁人们要分析战略优势的构成因素，这才深中我们安全问题的肯綮，虽然我表述得过于简练，未能说明我的全部意思，但却相当警策，可供我们在国内辩论时进一步发挥。我在谈战略优势的那段话后面紧跟着说的几句已经把我的真正忧虑表达得很清楚：

我们将生活在一个异常复杂的世界里，存在着爆发核战争的种种机会，那是十五年前在核时代开始时无法想象的，使我们忧虑的是那种局面，而不是人们看到的一些只顾眼前的争论。

但是，一九七四年七月的华盛顿听不进去这样的看法。当我们还在莫斯科时，国防部长施莱辛格在五角大楼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表示他相信军方全力支持军备控制，并怀疑我对战略优势的看法，但他并没有对我的看法做确切的说明。除了总统的班子四分五裂之外，又加上了国务卿同国防部长之间的公开分歧。

奇怪的是，按任何标准看，这次最高级会谈却都是成功的。签订了一些有意义的协定——不是象前几次会谈中那样震惊世界的协定，但表明这两个超级大国在相互关系中取得了重要的进展。甚至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方面，我们也比一般人所认识到的更加了解对方的立场；否则一位新总统不可能在上台后四个月内就结束谈判，象福特在海参崴所做的那样。正如我以前说过，今后还

希望能做到的是，最高级会谈不要再热中于搞耸人听闻的签字仪式，而要转为认真地研究国际形势。这正是尼克松同他的对手们在一九七四年六月所做的，当时的紧张气氛比以往任何一次会议都少。在那样概观全局时，尼克松的表现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设法克服了那越来越压倒他的剧痛，最后一次显示出他非凡的认识能力。

苏联人对这位已受致命打击的总统给予殷勤接待，这确实是对他的政策威力的最好颂扬之一。在苏联制度下，不管由于什么原因而失去政治权力的人是无处归类的。让尼克松——这个反共老手——感到自己日薄西山，这当然是很有诱惑力的。政治局本来可以用他们擅长的那种方式困扰尼克松。相反，他却受到了尊重和有礼貌的接待，这是对他的预见能力表示敬意，苏联领导人赞赏预见能力甚于多愁善感；这也是对他的坚定性和冷静盘算表示敬意，克里姆林宫重视这种品格甚于友好表示。

在我们新闻界的心目中，情况却并非如此。《纽约时报》慨叹“缓和的脆弱性”。《华盛顿邮报》说这次最高级会谈“令人大失所望”。《新闻周刊》谈论一次“从未出现高潮的最高级会谈”。总起来看，一九七四年最高级会谈的结束使我痛感这个方针也结束了。如果不能很快恢复权威，一场浩劫是躲不开了——不是因为最高级会谈遭到失败，而是因为准备这次会谈时发现，总统对他的政府正在失去控制。

到七月中旬我已深信，水门事件必须结束，而这几乎肯定要求尼克松辞职。在这以前，我曾力图抛开这个无法接受的想法。我知道尼克松的权力正在日渐衰歇。最晚到五月，录音带公布后，他的败局就已经无可挽回了。但是我认为自己的职责是尽量延长对权威性和持续性的幻想，以防止危机，甚至不让自己考虑一下会怎样收场。我居然狂妄到相信，不论总统如何创巨痛深，我照样能让

外交政策持续下去。

围绕着尼克松出访的种种事件使那个幻想破灭了。这些事件证明，国务卿自己处理不了我国的对外政策。总统权威的低落在政府、国会和新闻界中助长了一种暗中蔓延的玩忽职守的情绪，这会最终危及我们的安全。在华盛顿政府官员内部一时甚嚣尘上的种种争论中，谁是谁非是无足轻重的。由于那些争论无法解决，却迟早会使我们的政策丧失力量和方向，使我们的战略不能取信于人。以前象一场噩梦，现在看来已经是在劫难逃了；结束尼克松的总统任期也许实际上会对国家更有利。我仍然相信对他罚不当罪；折磨他的人们动机中既有正义，也有伪善。我钦佩他的坚毅和克制；尽管我们有很多分歧意见，但我对这位气数已尽的长官却比以前任何时候更感到亲近。我也没有做任何事情来贯彻我的意见。不论发生了什么事情，不论别人有谁背弃了他，我还是下定决心继续支持这位任命我担任高级职位的总统，以证明政府的连续性。但是在灵魂深处，我开始体会到了那种据说幸存的人有时对病入膏肓的人所抱的态度。我希望，既然结束已经不可避免，就要——为了我们的国家——尽快结束，既然非如此不可，就要——对总统——表现出宽恕精神。

① 参见一九七四年五月十八日《巴尔的摩太阳报》；一九七四年五月十九日《迈阿密先驱报》；一九七四年五月十九日《底特律自由新闻报》；作者是詹姆士·麦克卡尔特尼和索尔·弗里德曼。

② 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出版的《关于亨利·A·基辛格博士在窃听某些政府官员和新闻记者事件中所起作用的听证会》，第九十三届国会，第二次会议，一九七四年（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三日秘密会议，一九七四年九月二十九日公布），第二二七页。

③ 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二日尼克松给富布赖特的信如下：

“亲爱的主席先生：

我已注意到你六月二十五日的信，欢迎有这个机会重申我一九七三年五月二十二日发表、在你信中引用过的公开声明，并增加以下一些话。

我相信你会赞成，在同外国谈判时保密是极端重要的。如果没有秘密谈判和高度机密性，美国也许就不能在南越实现停火，不能打开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不能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方面取得美苏关系的进展。

一九六九年促使我决定创始一个调查计划的那些情况已在五月二十二日声明中详细叙述过了。我命令使用最有效的调查方法，包括电话窃听，来处理某些极重要的国家安全问题。在有正面证据时，我亲自指示对某些特定的人进行监视，包括窃听电话。

基辛格国务卿在你的委员会中作证说，他曾应我的要求执行过一种针对那些符合我所规定的调查种类之内的人员提供情报的职能，以便在每一具体情况下进行适当有效的调查；我知道他的那份证词。那份证词是完全正确的；我明确地重申，基辛格国务卿和与这种调查的各个方面有牵连的其他人员是根据我特有的职权而行动的，他们是在执行我明确发出的命令。

诚恳的

理查德·尼克松(签字)

④ 见本章注②。

⑤ 《美国与埃及关于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合作的协定》于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九日在华盛顿签订，并提交了国会。参见巴尔巴拉·克劳塞特：《美国同埃及的核协定有好处》，见一九八一年九月十三日《纽约时报》。

⑥ 阿萨德接见阿诺德·德博什格拉夫的访问记，见一九七四年六月十日《新闻周刊》。

⑦ 理查德·尼克松：《理查德·尼克松回忆录》（纽约：格罗塞和丹拉普书店，一九七八年），第一〇一五页。

⑧ 《白宫岁月》，第一二一六——一二二二页，第一二二九——一二四二页。

⑨ 尼克松：《回忆录》，第一〇二四页。

⑩ 威廉·萨菲尔：《最高级会谈幕后》，见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七日《纽约时报》。

⑪ 《白宫岁月》，第二十八章。

⑫ 威廉·G·海兰德：《苏美关系：一次新的冷战吗？》（圣莫尼卡市：兰德公司，国际安全和军备控制丛书，R-2763-FF/RC，一九八一年五月），第二十六——二十八页。

⑬ 《白宫岁月》，第五四八页。

⑭ 尼克松：《回忆录》，第一〇三〇页。

⑮ 参见一九七九年七月三十一日我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就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第二阶段条约所做的证词，见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关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第二阶段条约的听证会》，第九十六届国会，第一次会议，第三部分，第一六九页。

第二十五章

尼克松政府的终结

漫长的归程

一九七四年七月三日，总统参加莫斯科最高级会谈归来，在缅因州的洛林空军基地举行了欢迎仪式，有电视转播。仪式之所以在尽可能远离华盛顿的空军基地举行，是因为在首都组织一次具有代表性的欢迎会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在会上，福特副总统赞扬尼克松又一次为世界和平结构作出了贡献，并执行了“我们一生中，也许是我国有史以来”最好的外交政策。在空军基地人员和当地一些居民的协助下，安排了一次典型的热烈欢迎总统归来的仪式；只是举行仪式的地点表明了尼克松所经受的严峻考验。

我留在欧洲履行我们根据大西洋宣言应尽的义务，向盟国通报我们同勃列日涅夫会谈的情况。我先在布鲁塞尔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司令部停留，然后前往巴黎、慕尼黑、伦敦和马德里。德国领导人都在慕尼黑观看四年一度的世界杯足球锦标赛，我能在那里会见他们完全不是偶然的。在机场上我曾对新闻界说，重要的体育比赛不会妨碍我履行对盟国的义务。德国政府知道我是一个十足的足球迷，因此它保证作好安排，使情况通报会不致耽误我去奥林匹克体育场观看决赛。那是一个轻松的周末。赫尔穆特·施密特联合内阁中的新任外交部长是迪特里希·根舍，他在七月六日星期六下午用直升飞机把我送到阿尔卑斯山的丘陵地带。我们在那里长时间地交换了意见。晚上，他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招待

会，参加招待会的还有政界、新闻界以及文艺界的知名人士。次日，德国人在决赛中取得了胜利。这场比赛证实了我早就有的一个观点，即踢球的风格与民族性格和传统有关。德国队采用了施利芬计划*的打法。这种打法的部署周密，战术多变。如果一切都能按计划进行，再加上友好的观众所起的心理影响，就能所向披靡、势不可挡。但一旦他们的精心策划遭到了挫折而需要随机应变时，他们怎么打就难说了。尽管荷兰人踢球的风格甚至更为细腻，看起来很漂亮，但他们缺乏最后取胜的决心，结果还是输了。（其他队也是如此。英国队曾一度称雄，现在凭借条件和名声仍保持它有点死板、过时的踢法，因此该队早已从世界锦标赛中被淘汰。巴西队技术熟练、勇猛无比，但当时究竟应该依靠自己传统的灵活战术，还是遵循较为有条不紊的欧洲踢法，犹豫不决。一九七四年，巴西队得了第四名，这在巴西人看来简直是一场民族灾难。）

华盛顿平静无事。斯考克罗夫特报告说，“根据我的判断，这里没有什么活动。似乎人人都在尽情地休息。与艾尔（黑格）谈话时，他的情绪看来是稳定的。”

这是决定性的激变前夜的平静。七月九日，我回到了华盛顿，回到了一个正在等待解脱水门事件困扰的城市。谁都不知道高潮何时到来；但谁也不再怀疑它必然到来并已迫在眉睫。关于水门事件大陪审团是否有权把尼克松总统定为掩盖闯入水门公寓事件的未被起诉的同谋者一事，最高法院于六月十五日同意进行复审。大约两周之前，最高法院已同意就特别检察官利昂·贾沃斯基能否传票调用六十四盘白宫谈话录音带作出裁决。六月二十一日，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结束了为期六周的关于弹劾证据的秘密听证会。六月二十六日，前白宫助手约翰·埃利希曼因与闯入丹尼尔·

* 德国元帅施利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制定的战略计划。大战爆发后，由于德国对自身的力量估计过高，计划遭到破产。——译者

艾尔斯伯格的精神病医生办公室一事有牵连并作伪证而受审。

一年前，参议院水门事件听证会的时间刚好是在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举行最高级会谈结束的那一天。在一九七四年，七月四日那周的周末是个间歇。但此后，水门事件的进展在国家生活中占了主导地位。

七月八日，最高法院辩论了是否应迫使尼克松交出在椭圆形办公室内谈话的六十四盘录音带问题。七月十二日，埃利希曼等人被判了罪。次日，参议院水门事件委员会发表了关于掩盖水门事件以及尼克松一九七二年竞选中经费来历不明的报告，这是参议院一致通过的三本长达二千页的报告。参议员们避而不谈总统是否参与了掩盖，但是七月十九日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多数党和少数党的法律顾问共同要求参议院对五项主要弹劾案，审讯一项或几项，其中包括阻挠司法调查、在处理与政府各部门的关系时滥用总统职权、藐视国会和法庭等。他们坚称，“通情达理、行事公道的人都会认为总统有罪。”

这些都是通向总统毁灭道路上的中途站。我怀着忧郁的心情注视着这一切。那时，尼克松一直在圣克利门蒂等待事态的发展，他对此再也控制不住，甚至施加不了多大影响。我在华盛顿期间两次飞往加利福尼亚和总统一起呆了几天——七月十九日至二十日及七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六日。他很少谈水门事件；即使谈起，也不谈事情的实质，只是计算众议院和参议院先后就弹劾案付诸表决时的票数。他是一位身处恶梦之中犹能保持清醒头脑的人。他自诩善于律己，但这并未使他避免灾祸，甚至可能因此而酿成大祸。因为他抑制了在正常情况下能使他警觉到危险的一切本能；在这决定命运的过程中，他得到了同事们的支持，但他们只知道使政策从属于程序；而一旦程序出了差错，他们就不知所措。

我们这些人和尼克松共事已五年半，不可能去参与席卷新闻

界的怒潮。我们对于水门事件暴露出来的不光采的勾当，并不表示宽恕，我们同其他人一样也感到震惊。我们对揭发出来的遁词和谎言也不抱幻想。这样的倾向我们原来已亲自看到一些，但是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我们能够看到这些倾向如何使一个严重错误变成一场国家灾难。我们比大多数人更明了，与其说尼克松撒谎，不如说他自信这是一种权宜之计的解释。我们曾多次因受总统操纵而互相对立起来。我们都深知尼克松生来不会完全信任别人。就连他最亲密的同事都极少了解他思想的细微末节，因而也就无从帮助他。

尼克松没有真正的密友。连他的心腹都感到，他为了达到某种难以窥测的目的，他们这些人也可能被他甩掉或抛弃。我曾用一句话对一位已故的非常聪明的专栏作家、为《新共和》周刊主编《白宫观察哨》的记者约翰·奥斯本概括我的上述看法。一九七一年，我秘密访华之行使我成了知名人物之后不久，约翰问我对担任这出戏的导演有何感受。我如实地回答说：“约翰，我不知道我究竟是这出戏的导演呢，还是在另一出没有把剧情告诉我的戏里充当一名演员。”

当代没有一个总统比尼克松更缺乏从事政治生涯的素质。他十分腼腆，害怕会见陌生人；只有不知名而支持他的广大公众才能使他放心。他生怕遭到反对，所以在他同别人的关系中出现冷淡的时候，似乎往往是由他自己引起的。他极端清高孤傲，既不愿承认自己的情绪会因别人对待他的态度而受影响，又不能真正做到超然。他经常惶惶不安，先是表现出似乎残酷的命运专门作弄于他，然后又想方设法一定要使自己的预感得以实现。不言而喻，我们谁也不能真正了解他的内心世界。更能说明问题的是，追随尼克松周围的人对尼克松的认识不很相同，这些认识是与总统对其助手们的判断，和对其交谈者背景情况的估价微妙地联系在一起的。

在椭圆形办公室进行的有关水门事件的谈话记录第一次公诸于世时，尼克松那种慷慨激昂，有时近乎做作的言词使我大为吃惊。除非他那些冠冕堂皇的话很适应当时的情景，因而我并未感到反常——我现在对此仍有怀疑——尼克松当时同我谈论外交政策时颇带几分他在公开场合装腔作势、卖弄学问的姿态。而且，我多次说过，那些最接近他的人都学会了对他的许多话打些折扣，并把他在压力之下说的许多话加以过滤。我们相信，总统并不指望我们即刻去执行那些有点华而不实的指示，从而使他有机会打消其想入非非的念头，并通过我们，按他本人的另一种形象所要求，深谋远虑地行事。

尼克松同肯尼迪家族又爱又恨的关系是沃尔特·米蒂式性格的一个方面，我相信，也是造成水门事件的一个原因。他在一九六〇年竞选期间以及其后一直同约翰·肯尼迪和罗伯特·肯尼迪是死对头。人们认为，尼克松在政治上是站在他那被杀害的竞争者的对立面。实际上，肯尼迪兄弟很可能比他们的许多追随者更保守或更持怀疑态度（至少起初如此），而尼克松则比他那一批保守的选民温和和世故得多。

尼克松很象他的前任林登·约翰逊，会不惜一切去赢得人们过去对约翰·肯尼迪那样的恭维。尼克松把肯尼迪家族的成就归诸于手腕，而不是信念。他认为，使肯尼迪兄弟变得这样厉害的是冷酷无情的政治策略和处世诀窍，对此他每周都用许多时间去琢磨。尼克松相信，一九六〇年竞选期间，肯尼迪武器库中最主要的武器是窃听。他周围的人无疑也都同意这看法。他从未为此提供过任何证据。虽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尼克松曾下令窃听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的电话，但是这件事可能就渊源于这个萦回脑际的看法。如果有人寻思，为什么尼克松班子在一九七二年竞选已获胜的情况下还要冒险去窃听对手的谈话，那么答案可能是：除非

能赛过他们所嫉恨、畏惧同时又钦佩的肯尼迪兄弟，否则这种胜利就不够彻底。这是对也许是臆想出来的创伤采取的报复行动，并不是为达到某个具体目的而采取的步骤。（尼克松往往隐晦地暗示，在一九六八年竞选中，有人在他和阿格纽的飞机里都安装了窃听设备——不过他并没有说清楚，即使果有其事，又为何归罪于肯尼迪兄弟。）①

大多数人都是围绕一个主要核心成熟起来的；尼克松则有好几个核心。这使他心中总是不得安宁。若将其复杂的性格概括为一句话，必然会使人误解。诽谤者认为尼克松是邪恶的化身，但他的狂热的崇拜者却对他赞扬备至。上述这两种看法都是错误的。对他进一步了解以后，人们看到，尼克松这种情随事迁的品质是他身上各种不同性格剧烈斗争的结果。这一斗争永不休止；在他的性格中，既有阴暗的一面，也有敏感的一面，时而这种性格占上风，时而那种性格占上风，给人总的印象则是咄咄逼人、好折磨人、反复无常，总之，是一个性格极其脆弱的人。

正因为如此，我们这些与尼克松密切共事的人现在回过头来看，尽管曾看到过他大发雷霆，说话拐弯抹角，性情古怪，仍然情不自禁地对他怀有一种敬意和近乎温情的包庇的感情。我们亲眼见到他那发狂的变态心理是怎样从各种不调和因素的激烈冲突中发展起来的，因此他确实是他自己不协调性格的第一个受害者。我们看到过和蔼可亲、体贴关怀的尼克松；固然他有些最不正当的作法，那是为了避免当面伤人感情而耍的手段。他善于分析，能够敏锐地抓住问题的实质，特别是在外交政策方面。他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他坚信美国负有维护世界安全和自由的使命。他没有把越南战争归咎于前几任民主党总统，虽然他可以那样做；他认为他应对战死在越南的军人家属明确表示死者的事业是正义的。他也确实相信这个事业是正义的。虽然他常装出强硬的样子，但他真

正想让人们铭记在心的是他的理想主义。他当总统的第一天，就提出要伍德罗·威尔逊的办公桌，他在椭圆形办公室使用的就是这张桌子。内阁办公室还挂了一幅威尔逊的肖像。尼克松常谈起他的母亲；关于她的品德，他说得最多的是她的慈爱。当尼克松还很年幼时，她就离开他去照顾一位患结核病生命垂危的哥哥，他似乎那时就万分想念她。

当然，对于尼克松缺乏分寸感这一点，他的亲密伙伴比其他大多数人了解得更清楚。他出于宿命思想，总认为任何事情最终都是不会如愿以偿的。他在危机中自以为很冷静的形象，被他处理问题时那种蛮干一气的劲头歪曲了。他的胆略并不是基于戴高乐、丘吉尔和罗斯福等杰出领袖所具有的最后必胜的信念，因而更为突出。

我自己对尼克松的感情是相当复杂的。他的一些粗鲁言行使我退避三舍。我因经常受摆布而感到忿恨。如果他的话不那么模棱两可，或是他的作法比较直截了当，我会感到舒服些。然而我十分感激他给了我为国家效劳的机会，我起初担任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后来又担任了国务卿。当局外人看到尼克松咆哮如雷时，我认为他是怕遭到抵制。他说话似乎经常隐晦曲折，而按我的理解，这是他对自已的判断心存怀疑，为保留回旋余地而采用的手段。很少有人像他那样如此渴望得到人们的钟爱，但对爱的基本原理又如此存有戒心。复杂的心理使他常怀戒备，他自感能力不足而在内心深处觉得羞愧。这种心理状态终于成了他的第二性格，并使他变得最为怕事。我看到过他孤寂地决策的过程：同自我怀疑作斗争，往往得出大胆的结论。我在《白宫岁月》一书中概括了我在尼克松宣布越南停火的当晚对他的看法。而十八个月之后，当尼克松总统任期临近结束之时，我对这些话的感受就更为深切：

命运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选择了多么奇怪的手段！这位成功时如此孤

寂、在有些事情上动机又如此偏狭的人，领导我们国家度过了历史上一个最令人痛苦的时刻。他生性并不勇敢，但是他硬逼着自己表现出卓越而罕见的英勇行为。他通常并不外向，但他强迫自己把人民团结起来对付挑战。他努力变革美国的外交政策，使其免于在过多承担义务和孤立主义之间灾难性地摇摆。他被权势集团所鄙视，他对人的看法暧昧模糊，然而他却牢固地怀有一种国家荣誉和责任感，决心证明美国这个最强大的自由国家无权放弃自己的领导地位。如果他既爱又恨的权势集团对他表示一些爱戴的话，事情会是怎样呢？他会在自己怨恨的荒野里越躲越深，还是会来一道大赦令把他解放出来呢？事到如今，这已经无所谓了。他现在已陷于难以排解的孤独之中，又处在国内严重分裂的末期，但他仍然看到了展现在他面前的光明前景，政治家中很少人能有福分如此企望。他能够设想一种减少积怨、加强友谊并给新兴国家带来希望的新型的国际秩序。这对美国和整个人类都是一个有意义的目标。在胜利的时刻，他孤独地站在峰巅，而这个峰巅很快就要变成峭壁。但是，尽管他心猿意马，并且有许多瑕疵，他却以巨大的毅力给我们带来了使理想和可能性相结合的非凡的时代②。

在尼克松最后受折磨的几个月中，我常常想到一九七〇年夏他和我一路上重温他青年时代的那次旅行。对柬埔寨的入侵已成过去，但它留下的创伤尚未愈合。当时尼克松正在圣克利门蒂，为了维护自己所作的决定，他刚经受了一场严峻的考验。他认为，如果美国打算体面地从印度支那脱身，就有必要作出决定顶住国内爆发的不寻常的暴乱和辱骂。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在旅途中正停留在拉古纳海滩一家充作新闻中心用的旅馆里，无所不在的白宫电话总机接线员找到了我，问我想不想同总统和贝比·雷博佐一起开车去洛杉矶。我们可以在查森饭店就餐。接线员知道还没有一个总统助手谢绝过总统这类邀请。她告诉我，总统已经出发，一会就来接我，我应该在旅馆对过的商店和饭店前面人行道上等候。

原来总统并不想直接去洛杉矶。他一心想让雷博佐和我去看

看他在约巴林达镇的出生地。我们坐上一辆没有标志的浅棕色林肯牌汽车，司机是一个特工人员。我们就出发前往那所并不引人注目的尼克松故居。一路上我们百感交集，很像在平日旅行时一样。对于尼克松的旅伴来说，这次旅行的意义在于有幸受到了邀请；我们不可能有他那样显然十分激动的情绪。当我们在他故居周围走动时，尼克松突然注意到有两辆汽车接踵而至。一辆坐满了特工人员，另一辆坐着执行任务的记者联营组成员。

这一整套——特工和新闻——是总统任何时候外出活动的标准安排；这确实是总统最低限度的随行队伍。但尼克松却沉不住气了，在此以前和以后我都没有见过他发这样大的火。他执意要跟来的汽车立即离开；他的车队里要是特工人员和记者，他就不走了。他不要别人陪同。他是总统，他要为自己图个清静的环境。他放大嗓门下达命令——这本身就是一件没有先例的事，结果特工人员的汽车违反了一切明文规定开走了，记者联营组也随之离去。

这时尼克松在总统府之外单独同一位朋友、一位同事和唯一的一名特工人员兼司机在一起，这是他在担任总统期内一个绝无仅有的时刻。我相信，如果恐怖分子知道那个星期六下午在他们面前出现了那么容易击中的目标，一定会垂涎三尺。美国总统和他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正在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四处游荡。他们掌握着几乎全部有价值的国家安全机密，但只带了一名兼任司机的随身警卫。

那些人离开以后，尼克松变得很悠然自得，过去我还从来没有看到他这样轻松过。我们驱车前往惠蒂尔城时，尼克松和我坐在汽车的后座上，雷博佐坐在前面。他向我们指点了他家经营过的加油站。他家把加油站刚刚卖掉不久，就在那块土地上发现了石油。他还指给我们看了一家旅馆，士气不振的共和党曾经在那里动员大家志愿参加美国国会竞选，以反对被视为所向无敌的本区

在任的民主党人——这种做法本身几乎是无先例的。尼克松提出了申请，因为他没有更称心的事可干。出乎他意外的是，他竟被选中了，而且在这次连他的伙伴都认为会输给对手的选举中获得了胜利。

我们驱车在惠蒂尔学院校园内转了一圈，在那里他回忆起曾经激励过他的教师们。就是在这一次，我相信他没有什么难言之隐。坐在后车座上的尼克松不再是我从椭圆形办公室里认识到的那个头脑复杂、存有戒心、身不由己的政客，而是一个比较和蔼可亲、言谈豪爽、态度热情的人。

自从我们相识以来，这是他头一次同我如此温和坦率地谈话，这时，我突然意识到他所谈的这个中心思想完全是偶然的。他谈这些事除了说明他非常可能成为另一个人之外，别无其他寓意——这一中心思想对尼克松比对我更显而易见。因为我从所听到的话里得到的启迪是，只有具有非凡修养和坚韧不拔精神的人，才能有那段从毫无希望的国会候选人走上担任美国总统这一道路的经历。显然，尼克松不是这么看问题的。那天下午他在惠蒂尔的表现似乎想说明他本人出身低贱，这是他任总统期间在任何场合都从未有过的。

我总是把这次在加利福尼亚南部的汽车旅行看作是揭破尼克松之谜的一个线索。阿基米德说过，“给我一个立足之地，我就可以搬动地球。”尼克松企图搬动全世界，但他缺乏稳固的立足点。我想，这就是他为何始终有些糊涂的原因。他那近乎伤感的真正温和的性格有沦为感情脆弱的危险。人们称他崇拜硬汉，这不仅过于夸大，而且是风马牛不相及，要找出这一品质，无异要从石头中榨出油来。尼克松取得了许多成就，但他自己从来没有肯定是否确已获得这些成就。

我们驱车前往洛杉矶途中，尼克松突然有个想法，认为雷博佐

和我不仅应该看他的出生地，而且应该看看他有怎样的一段经历。他要车子拐一下去看一幢住宅。一九六〇年他竞选总统失败之后曾在那里住过两年并且就在那里重新找到了自己的努力方向。他给司机指路，以为离开大路不消几分钟功夫就能到达。

但很快就看出来，尼克松对那幢住宅的确切位置并不很清楚。他记得这所住宅位于贝弗利希尔斯旅馆附近一条峡谷中一片规模很大的新开辟地区。我们寻遍了每一条峡谷以及周围街道，足足找了一个多小时。尽管我们作了最大的努力也未找到那幢房子。在寻找过程中，这位怡然自得、几乎和蔼可亲的尼克松又变成了我所熟悉的神情紧张、焦躁不安的尼克松。他对自己的青年时代感到宽慰，他可以追述他所经历的斗争，但他找不到他获得成就的轨迹。

尼克松给自己确定的目标是超出凡人的能力所及的：彻底改造自己，创造一个新人，仿佛全人类中唯独他可以战胜自己的命运。但是，神迫使他为这种狂妄付出了惊人的代价。尼克松首先付出了生来心神不定的代价。最后，他终于学到了希腊人早已懂得的东西：最严厉的惩罚可能是使一个人的愿望过分圆满地付诸实现。尼克松有三个目标：在大选中赢得历史上最大的压倒多数的胜利；让人们记得他是一位和平的缔造者；作为一个平等的人为“权势集团”所接受。在一九七二年底和一九七三年初，这三个目标他全部达到了。但是两个月以后，他却丧失殆尽——部分原因是他的理想已成为他思想上摆脱不了的烦恼。在通往成功的征途中，他历尽千山万水，但没有找到立足之地和安身之处，得不到慰藉和安宁。他从不知道何处是他的归宿。

又一个危机

到七月份，我们都在等待法庭的诉讼、调查以及弹劾的程序；而这些法律程序各自顺着自己的势头发展，似乎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指引它们同时到达一个危急的关头。连国际关系的变化也放慢了。在国内，我们不得不驳斥一些人的批评，这些人认为我们没有达成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协议，因而最高级会谈已经失败，已经危及缓和。但是，倘若达成了协议，我们也会被指责说为了挽救总统，协议是在不利条件下达成的。这会使一年多来已经把我们搞得精疲力尽的局面更加恶化。既然互不让步不可能达成什么协议，认为可以在协议中争取到更好条件的一方在辩论中总会占上风的。尤其是在一个信誉已经扫地的总统的任职期间，谁不会说本来是可以取得更大的成果的呢？到一九七四年七月，只有百分之十三的公众认为尼克松还能够胜任总统职务。这是开始举行民意测验以来最低的数字。

在限制战略武器谈判问题上的争论表现为施莱辛格同我之间的所谓矛盾。我们俩都否认我们之间有重大实质性的意见分歧，这是事实；但是要说这意味着我们没有争执，却不是事实。这是一种老式的地盘之争。在总统不能正常行使职权的情况下这个问题无法解决。目前没有必要再重述这场辩论，问题是这场辩论根本就不该发生。但是，它表明了一九七四年夏季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岌岌可危。我们的制度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总统来把大家拧成一股劲；总统的权威既已解体，他便无力去排解纠纷。如果在已有的困扰之外再加上弹劾程序，政府的前途将不堪设想。

其他国家正怀着困惑不安的心情眼看国际体系中一个主要支柱越来越陷于瘫痪。他们对正在发生的一切难以置信；除了少数

几个特别老谋深算的领导人以外，大家都以为尼克松遇到的麻烦随时可能会平息下去。甚至在七月份，当以往认为不可思议的事情日益明朗化时，我们的对手们却表现了极大的克制——这也许是对尼克松政府的对外政策的最大恭维。

多年来，我们，特别是尼克松，一直在谈论“和平的结构”，甚至已经到了使批评者奚落这个词的地步。尽管尼克松越来越走投无路，他无疑并未收敛他习以为常的煞有介事的作风。然而，在尼克松已无所作为，美国官僚机构中的任何无名小卒都肆无忌惮地攻击他的时候，外国领导人却几乎无例外地保持沉默并很有礼貌。有些人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期望他恢复元气。但对大多数人来说，是因为他们已经被纳入我们设计的轨道。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生活在现有的国际制度下要比他们设想的任何其他制度更好些。苏联人要保持缓和这个选择方案，把它作为对付中国的筹码；中国人需要我们充当他们对付苏联人的筹码。各个工业民主国家在平安无事时不断折磨我们，但其新领导人却依靠我们来获得安全和进步。中东国家除了在我们庇护下向和平行进之外别无选择。我们的建树也许超过我们自己所知道的。尼克松受到的最大的尊重是，当他遭受致命打击时，世界各国都保持沉默。

只是在爱琴海，当希腊人和土耳其人世代怨仇的怒火又在塞浦路斯问题上燃烧起来的时候，我们无奈何只得在尼克松执政的最后几周再次忍受一场国际危机。这并不是他们乘尼克松之危，也不是蓄意预谋。这是由于过去受了挫折和压迫才爆发的，但却暴露了一个分裂的美国政府的脆弱性，总统已无力把大家团结在一起。我将留待别处来全面论述塞浦路斯这段插曲，因为它一直持续到福特总统的任期内，而且遗留的问题至今仍未得到解决。我在这里提上一笔，只是说明我们的决策过程如何脆弱，还因为它表明，即使在我们振作精神以应付尼克松悲剧的最后一幕时，对外政

策仍然花费了我们许多精力。

希腊人和土耳其人首次接触时，土耳其人已冲出亚洲，逐步征服拜占庭帝国，并终于在一四五三年占领了康士坦丁堡。其后，在一五七一年开始统治塞浦路斯。此后，两国人民的命运便交织在一起，由于无法摆脱互相依存的关系，他们变本加厉地互相残杀，从而结下了冤仇。有一段时间，奥托曼帝国的主要官职都由教育程度较高、有更多经验的希腊人担任；他们的征服者不断用大屠杀的手段出气，到本世纪二十年代初，在土耳其的希腊人几乎已被赶尽杀绝。这两个国家继续“共处”（如果用这个词恰当的话），希腊人牢记土耳其所占的军事优势，土耳其人则时刻畏惧希腊人的深智睿智。双方都相信对方最终要剥夺自己的生存权利，双方都把自己看作是受害者，准备向对方报复，抢先决定自己的命运。希土冲突是世代相传的血海深仇。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希腊与土耳其两个宿敌都成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的盟国。东地中海的安全对它们有共同的利害关系。但它们的世代冤仇都集中在塞浦路斯。这个岛离土耳其本土四十四海里，居民中百分之八十是希腊人，百分之二十是土耳其人——这是一种掺和起来的毒性酒。

就象多民族杂居的其他许多国家一样，当塞浦路斯处在外国统治之下时，有可能保持国内的脆弱的和平。但是，一九六〇年英国人同意该岛独立，由英、希、土保证其内部安排。城府很深的希腊正教大主教、希腊裔塞浦路斯人、反英统治运动的领袖马卡里奥斯第三，不得不违反自己关于政府和民族的全部概念，给予占少数的土族以某种程度的自治。但是，马卡里奥斯并不真心诚意地这样做。在独立以后，他有计划地违背诺言，试图建立一个实际上的单一国家，使占少数的土族在选举中永远处于被压制的地位。因此，独立的塞浦路斯史是一部民族纷争为患的历史。一九六七年，

土耳其扬言要进行军事干涉，只是由于约翰逊总统在最后时刻提出了强烈警告才未实现。此后，土耳其在政治上遵循一项信条：顺从美国的喜好是不明智的，决不可重蹈覆辙。我一向认为，塞浦路斯下次社会危机必将引起土耳其的干涉。

然而，马卡里奥斯继续玩火。一九七二年，他把捷克军火引入这个岛国，目的显然是要建立一支私人的准军事部队来抗衡根据宪法成立的部队。一九七四年，他又插手以希腊人为主的国民警卫队，企图加以控制。当时，希腊由政变后上台的军政府执政。这个军政府强烈反共，因马卡里奥斯与激进的第三世界国家调情，对他深怀疑虑，认为这是他同情共产党的一个标记。因此，希腊军政府鼓励这样的计划：推翻马卡里奥斯，并在塞浦路斯建立一个较为同情希腊的政权，却忘记了推翻对塞浦路斯的宪法安排必然会解除其原来对土耳其的制约。不用说，安卡拉至少与雅典一样对马卡里奥斯的政策倾向感到不安，但土耳其人属意的解决方案是建立一个实际上分治的联邦国家。在土耳其人看来，塞浦路斯与希腊联合必将置土耳其族人于死地，并危及土耳其在岛上的安全利益。没有什么办法能让土耳其人放心。他们毕竟没有忘记，在五十年前他们是如何处理类似问题的，他们把少数民族的居民统统消灭干净了。

七月十五日，即我从苏联和欧洲回国六天之后，马卡里奥斯刚从山间度周末回来，就在一场政变中被推翻；他几乎遭到暗杀。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名声不佳的冒险家尼柯斯·桑普森，他是一个强烈支持与希腊联盟的人。于是，一场危机已不可避免。

我们最忌讳的是危机——尤其是一场涉及两个北大西洋公约成员国的危机。无论我们支持谁，无论结果如何，地中海的东翼将受到威胁。而我们的政府既不够团结，总统又没有足够的权威，无法忍受长时期的紧张局面。

这个问题很快与美国国内政治纠缠在一起。希腊是一个军事独裁国家，因此，所有批评我们对待人权问题的态度的集团都要求我们谴责希腊挑起了这场动乱；他们希望，可恨的希腊上校们会因塞浦路斯的失败而被打倒。不仅是一贯反对尼克松的人极力持这种看法，而且这也是国务院里占统治地位的意见。随着一周事态的发展，国防部长越来越倾向于这种观点。

依我看，问题更复杂些。我认为土耳其极不可能容忍塞浦路斯与希腊联合。土耳其正在步步走向摊牌，这至少在我看来是显而易见的。看一个国家是否在寻找借口采取军事行动或寻找根据进行妥协，就看其对自己的建议是否抱有诚意。如果它提出的建议与其真正利益及原来立场不一致，那就可以相当肯定，它正在策划事件，作为宣战的理由。这就是土耳其在马卡里奥斯被推翻后一周的立场。在土耳其，很难想象有比马卡里奥斯更不得人心的外国领导人。人们相当公正地指责马卡里奥斯，说他使塞浦路斯的占少数的土族陷入了悲惨的境地。在以前几次危机中，土耳其曾坚持要撤换他。但后来，安卡拉突然提出要马卡里奥斯复职，这样做的动机必定是：安卡拉推测雅典更不愿意让马卡里奥斯复职。安卡拉大概指望利用希腊拒绝这一建议作为出兵塞浦路斯的借口。（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细节问题，即大约有一天的功夫，无人知晓马卡里奥斯是否还活着，若还活着，又不知在何处。）

土耳其的要求使人毫不怀疑它正在策划干涉。美国公然谴责希腊军政府会使可能发生的事成为事实。依我看，希腊很可能要垮台；只有脱离现实的政府才会在塞浦路斯问题上同时开罪马卡里奥斯和土耳其。正如我后来在七月二十一日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会议上所述，我的看法是：希腊政府干了蠢事，多半过不了关。更有必要的是，希腊不要认为是美国使它蒙受了屈辱。同时，我们不可能不付出代价就制止土耳其的侵略，因为那会被认为客观上

支持了希腊军政府。无论如何，只有美国扬言要采取军事行动，才能防止土耳其人在该岛登陆；而这又是不可能做的事。我同国会领袖磋商后得出一致的意见：我们根本不应卷入。我们无法避免在外交上参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场危机，但是在尼克松总统任期最后三周中，我们无法使用这类外交手段，即进行威胁而真能镇得住人或作出承诺而又令人可信。

因此，在七月十五日开始的那一周，我派乔·西斯科去伦敦、安卡拉和雅典。英国作为保证国之一，正试图在双方之间进行斡旋。西斯科的使命是去协助英国推动谈判，通过谈判可能推迟土耳其的入侵，并使桑普森领导的机构在塞浦路斯自行倒台。但是，土耳其对协商解决的办法不感兴趣，决心要算老账。七月十九日，土耳其侵入塞浦路斯，出乎意外地遭到顽强的抵抗。

我们在战略上处于进退两难。我们希望希腊和土耳其都留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我们要防止不可弥合的裂痕。官僚机构七月二十一日在特别行动小组会议上发表了它在第一周内的主要看法。土耳其入侵塞浦路斯两天之后，施莱辛格要求我国与希腊政府完全脱离关系，从希腊撤出美国核武器，并终止美国第六舰队在希腊中途停靠的安排。为了迫使我采取行动，这个建议透露给了《华盛顿邮报》。这很有帮助。就我来说，我相信雅典军政府拖不过这一周，但我能肯定如果我们被看成是使希腊崩溃的罪魁祸首，将来在若干年内我们会付出代价的。不论人们对于我们原先对希腊军政府的政策明智与否持何看法，希土在交战，不是我们脱身的时机。我们当前的任务是制止战争。我们在土耳其入侵塞浦路斯时从希腊撤出核武器，将会解除对土耳其军事行动的一切制约。我还担心，一旦我们撤出核武器，我们就再也不能重新设置，这就开了一个危险的先例。

尼克松正在圣克利门蒂。虽然我经常向他报告情况，但他无

法集中思想,尤其在瞬息多变的形势下,无法在我和施莱辛格的基本主张之间作出决断。全神贯注地应付水门事件已到了这样的程度:我们甚至无力在总统和白宫之间迅速地传递重要的对外政策文件。通过电路输送到圣克利门蒂去的有关水门事件的文件十分繁多,以致七月十九日我不得不要求把有关塞浦路斯危机的电报特别优先处理。

在七月二十一日夜间,我们威胁土耳其说,我们将把核武器撤出前沿阵地,特别是从可能卷入对希战争的地方撤出,从而迫使停火得以实现。这一步骤制止了土耳其的军事行动,当时它只在岛上占领了一小块飞地。这就为预定在两天后开始的新的谈判创造了条件,占少数的土族显然取得了较好的讨价还价余地,有希望在内部进行比较公平合理的安排。

七月二十二日,雅典的军政府被推翻,由著名的保守党领袖康斯坦丁·卡拉曼利斯领导的民主政府接替。几天之内,美国的情绪发生了变化。以前因我们不愿攻击希腊而严厉批评我们的集团,现在又要我们全力反对土耳其。他们要求我们在一场由希腊挑起的危机中转而反对土耳其;要我们不论塞浦路斯争端的起因,不论是非,使我们的政策适应雅典政府和安卡拉政府的内部结构;要我们不顾缓和东地中海两个战略盟国的冲突对我们有利的问题,采取一边倒的立场,并且要求我们在美国政府濒临垮台的几周内做到这一切。我们保持这种走钢丝的姿态达两周之久,但是在尼克松辞职后的那个周末,危机再次爆发,最后发展为土耳其第二次入侵塞浦路斯。其后几个月,正当福特竭力恢复行政权力之时,随心所欲的国会破坏了我们在双方之间一直勉强维持的平衡。国会通过立法对土耳其严格实行武器禁运,从而堵截了美国进行斡旋的一切可能。这个代价我们至今尚未偿付。

但到七月的第三周,我们已经明显地失去了对事态的控制。我

已一再说过，对外政策意味着精确地掌握分寸；它要求把各不相干的因素连贯一气。这种凝聚力目前正在急速瓦解。

我们的内部分歧已不再具有实质内容，成了一场争强逞能的斗争。施莱辛格和我不断争地盘；无论是限制战略武器谈判还是人权问题，或者塞浦路斯问题，每个问题都成了我们之间关系紧张的渊源。官僚机构内部之争限制我起主导作用，结果只能形成一种僵局，因为它不能依靠远在三千英里外的一位即将“寿终正寝”的总统来解决。我们在各自岗位上的功过是非目前已不相干。我在七月二十一日上午向黑格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按我们目前遵循的程序是无法渡过危机的，迟早要出纰漏。弦外之音是，倘若国家要避免灾难，必须结束宪法危机。

道路的尽头

高潮终于自行来临。美国最高法院是先导。七月二十四日，它以八票对零票裁决：尽管行政特权是美国宪政史上确立为有效的论据，但它不能超越公正的司法裁判。总统必须向约翰·赛里卡法官交出因掩盖案审讯六名前白宫助手而传票调用的六十四盘录音带。尼克松的律师立即宣布照办。但在我们这些知道尼克松说话方式的人看来，这项裁决意味着末日的来临；这些录音带即使在法律上不是致命的，在政治上也将是致命的。

尼克松仍然呆在圣克利门蒂。我们之间日常谈话很频繁，但他不愿讨论水门事件，或者至少不提问题的实质。我们照常审议当天的外交政策大事。他不时提到，注意这一位或那一位国会议员——往往是保守的南部民主党人——将裨益不浅；预期众议院在弹劾问题上的投票结果将十分接近。

我开始缜密地研究弹劾程序。按照宪法的规定，众议院根据

多数票可以对总统某项罪行进行弹劾或控告——其行事方式很象美国司法制度中的大陪审团。然后，参议院作为审讯法官和陪审团举行会议，由美国首席大法官主持。需要有三分之二的票才能定罪，才能罢免总统的职务。

因此，尼克松的命运已成为一道算术题：在众议院赞成弹劾的是否占多数，在参议院是否可动员三分之一加一票的参议员予以反对。雅各布·贾维茨参议员告诉我，他预计参议院的审讯在十一月份以前不会开始；明年一月下旬以前不会见分晓。前景十分可怕。根据我们刚经历的情况，再过五个月，行政权力会进一步削弱，那将是不堪设想的。更糟糕的是，贾维茨预计在审讯的大部分时间里尼克松将被迫“出庭”。

因此，我打算要求尼克松设立一个小组，在他不在的时候由他授权该小组代行总统职务，并随时受他检查。我心目中这个小组的成员包括福特、施莱辛格、西蒙（现任财政部长）、黑格和我。我打算提议，每周约请两党国会领袖——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迈克·曼斯菲尔德和共和党领袖休·斯科特，众议院议长卡尔·艾伯特和众议院共和党领袖约翰·罗兹同该小组会晤两次，听取关于重大政策问题的情况介绍。建立这样一项制度至多也只不过能做到维持局面，要通过它来处理危机或认真进行规划是很不恰当的。幸好，这个制度始终没有建立起来。

与此同时，对外政策的日常工作仍在进行。我在这里叙述它各个方面的情况，因为事实上它们占用我的时间比我为尼克松总统任期的结尾阶段所花的时间还多。最高法院作出裁决的第二天，西德外交部长汉斯-迪特里希·根舍第一次正式访问美国。他自然要求会见总统。根舍同我初次见面是在六月十一日，那天我在奥地利的萨尔茨堡举行记者招待会。他邀我到靠近那里在德国领土上的巴特赖兴哈尔去，为改善德美两国关系的进程开个头。德

美关系由于欧洲年以及勃兰特时代末期的摇摆不定而受到了损害。当时根舍在外交政策方面还初出茅庐，他过去既无经验又未进行过独立的研究。然而，他的坚强、自信的态度以及提出的富有洞察力的问题给我留下了印象。那天不是平心静气进行讨论的理想日子。他没有提到我举行的记者招待会；我也没有提。只是当我要离开的时候，我说我得把疖子捅破；我并不认为我要求进行新的调查会终于使我辞职；如果我那么看问题，当初就不值得留任。正如我已述及，七月初，我在莫斯科参加最高级会谈后回国途中，也曾向他介绍过有关情况。

根舍是一位难得的人才。他很晚才从事外交工作，却表现出非凡的外交才能。他懂得由于德国的地理位置易受攻击不允许他采用复杂的迂回手法。他以稳重、判断力强、精明正派、易取信于人而著称。在我本人以及我的后继者的任期内，他成为一位有名的需要极其认真对待的领导人。当他支持我们的时候，他的见解是令人宽慰的；在我们意见不一致——这是很少有的——的情况下，他的见解也是一种受欢迎的警告。我同他的私人友谊是我担任公职的一种报酬。

这次是在七月二十五日，我引他到圣克利门蒂去会见尼克松。西行途中，我们在北达科他州停留，视察一个民兵式导弹场和留下的一处反弹道导弹设施（其后由于预算的原因关闭了）。我也是第一次参观这个地方。（我去那里的主要原因是想帮助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少数党首席委员、北达科他州参议员米尔顿·扬，他正在争取再次当选，他一向坚定地支持政府。）

一想起核战略，总使人有抽象而奥秘之感。通过这次访问，令人感到它较为切实，但同时又更加抽象。这是个可怕的情景。根据一个通常难免不犯错误的个人的决定而发射导弹就可以毁灭全人类。在这样的导弹场地上空飞行，不论有什么安全保障，使人对

人类的境况感到潜在的不安。这里放置的武器处于史无前例的战备状态，而其使用和后果又不可能有实际经验可借鉴。核武器的战略取决于决策者与武器之间的抽象关系，而这种关系可以从他们对待核武器试验的态度上看出来。我们从未从导弹发射井里试射过即使是不带弹头的民兵式导弹，没有哪一位国防部长愿意冒哪怕一点点风险让一枚点火的火箭因某处失灵而落在美国国土上；所有的发射试验都是从太平洋沿岸范登堡空军基地的一座特别发射井内射出的。每次最多试射一枚民兵式导弹，尽管在最严重的情况下我们的战略是建立在多次发射上（当然，苏联人必定有同样的问题）。这一切都说明，所谓一触即发的反应，或依靠全面核战争等时髦理论，本来就是脆弱的。

此外，这些武器的抽象性还表现在另一方面：它们易受攻击，必须保持高度的、而且是最高级的战备状态，因此，在外交上几乎毫无用处。在一场危机中，人们不能提高其战备等级（例如，象轰炸机那样）以警告事态已发展到严重的程度。在一九七三年十月中东戒备中，我们有一支部队没有提高战备等级，因而奇怪地没有在施加外交压力方面起作用。这支部队正是美国军事力量的骨干——我国武器库中的一千零五十四枚洲际弹道导弹。

老一辈的政治家从来不需要在阿马吉顿*边缘地带这一种莫不可测的环境下执行政策。最高领导人（尼克松是个明显的例外）很少会象专家们一样花许多年的时间去研究核战略问题。他们有可能会被那些使问题简单化的人们坑害的危险。这类观点，左的方面表现为不假思索的和平主义，右的方面表现为同样不假思索地坚持把新技术当作常规武器来看待。我思量，我们是否会永远掌握分寸感，而不把人类的命运押在一种判断上，是否有这种勇气去祛

* 圣经典故，指善与恶的势力进行决战的地方。——译者

除和平主义者的诱惑，以免将世界丢给最冷酷无情的人。根舍和我参观了那里的设施。工作人员的业务知识和献身精神，以及武器和警报装置的技术奇迹，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这并没有消除我们的不安情绪，因为我们的文明能否持续下去必须依赖一种技术，而这种技术却与我们的经验及掌握其含义的能力如此不相称。

七月二十六日，即最高法院作出决定后两天，我把根舍介绍给尼克松。我十分吃惊的是，仅仅一周的时间使尼克松的外表遭到如此摧残。他的脸色苍白。他看来虽然安详，但进行一次认真的谈话显然要消耗他的全部精力。他在办公室里坐在一张沙发上，从他的办公室可以俯视太平洋。他的目光和思想集中在某个遥远的目标上，而不在我们向他提出的问题上。他矢口不谈他的困难处境。他讲得合乎理性，死板乏味，几乎陷入沉思。他的话相当理智，然而说来似乎这些问题已无关紧要；他只是机械地说话，而不是振振有词地议论。前一天夜晚，他向全国作了关于通货膨胀问题的电视讲话——这是在最高法院发表灾难性的决定二十四小时以后企图保持正常形象的又一反常事例。根舍对尼克松的谈话恭维了几句；总统以感激而忧郁的目光看着根舍，那时他与其说象一位即将实施一项计划的政府首脑，不如说象一位正在聆听别人称赞其学术论文的教授。

根舍和我会见记者（对于总统是否可能出访德国的提问，他作了未置可否的回答）以后，我们沿着太平洋畔的峭壁走去。根舍突然发问：这种情况能持续多久？这是个关键问题。根舍要求知道：如果总统职务仍然处于瘫痪状态，我们的盟国会怎么样呢？说起来如此平淡无奇，实际上却与命运如此攸关的和平的结构会怎么样呢？我说了些宽慰的话，表示问题一定会很快得到解决，就象我们在十月戒备中那样，我们准备采取果断的行动。这些话都是

搪塞之词。问题一经提出，就悬在半空中，以某种方式自行作了解答。

那天下午，我打破了黑格与我之间默守的信规。我们俩以前都避而不提尼克松辞职的可能性；甚至彼此表示怀疑这一问题也是不允许的，这已成为我们心照不宣的默契。我们的责任是使政府工作继续运转下去。但事态发展得过快，大祸显然已经临头。因此，在黑格那个紧挨着总统办公室、可以俯视太平洋的小办公室里，我向他提出了根舍提过的问题：“这种情况能持续多久？”黑格看来十分疲劳。他说，他不知道事情将如何了结。他不了解正在交出的录音带的情况，这些录音带正在检查中。但是，他和我一样深信，迟早会出现一支“冒烟的枪”，不是从这一批，便是从另一批录音带中出现。尼克松东拉西扯说了许多，经不起追究。难道我不知道黑格的责任是什么吗？我与黑格共事已久，完全相信他已深思熟虑，早已决定如何行动。我提出这个问题主要是为了摸底，而不是寻求指点。

我说，既然尼克松现在已不可避免地要结束其担任总统的职务，那么使它尽快地结束将是符合国家利益的。如果黑格和我力所能及，我们将负有特殊的职责来结束这种痛苦，并且使之顺利地渡过。然而，我们的处境很难。要几乎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一场弹劾总统的审讯。但是，不应由尼克松最亲密的同僚来把他推下台。如有可能，他应当辞职，因为他自己已从国家利益判断出应该辞职。否则，应由选任的官员促使他认识到应当辞职。我们从尼克松手中获得了政府职位，有责任在他经受严峻考验的时刻支持他；或许，这会给他力量去做应做的事——毕竟他在决定性的时刻从未失败过。我们不应与那些能够影响他命运的人谈论总统的困境，也不应使人们感到他最亲密的助手们正在动摇。我们的公务要包括对总统的忠诚。为了有利于大家对美国的看法，事情的结

局不能让受总统委任的人使总统身败名裂。

黑格说他完全同意，他自己必定已经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还说，究竟什么时候是关键时刻，他几乎肯定会比我先知道。到那时，他会与我联系的。他指望我一如既往同他并肩站在一起。

只有经历过那几个月的紧张气氛的人才能充分认识到艾尔·黑格对国家的功绩。黑格是凭借他的毅力以及积极献身和严于律己的精神把政府维持下来的。他比任何人都更成功地给人以白宫仍在正常工作的印象。他注意每项决定都通过正常的程序。他忠诚地为总统服务，但他从不忘记为国家尽义务。无疑，只有充满自信心的人才能担任这样的角色。他的工作方法有时有些简单化，他坚持名正言顺的行事方式可能很伤人。但是，黑格的角色不是毛头小伙子们可以充当的。他必须保存美国的力量，使美国能履行其必不可少的使命，成为爱好自由者最后的支柱和被压迫者的希望，成为一个生意盎然、可以指望其走仁爱道路的国家。在危急的时刻，美国的代表不必亲自体现所有这些品质，只要他们能够使美国做到这一点即可。

黑格在尼克松任期内决定命运的最后一个月的前后建立了殊勋。他对共和国最大的功绩是在那悲剧性的狂乱时期辅助了尼克松总统，同时推动他辞职。尼克松十分害怕并抵制辞职，然而他日益明了辞职是不可避免的。黑格保持了对总统的信心，也保持了对美国政体的信心。如若没有他，我怀疑是否能避免一场灾难。

至此对尼克松的冲击已势不可遏。第二天，七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以二十七票对十一票通过了弹劾案的第一款，六名共和党议员与全体民主党议员一起投了票。指控的罪名是阻挠司法调查。有关这次投票的经过情形，我在电视上看了几分钟。我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与之共事达五年半之久的总统受

到的惊骇感到难过。我不能忍受评论者严正的说教和一些国会议员损人利己的评论，尽管我意识到——或许正因为此——我倘若是司法委员会的成员，我有责任与多数人一起投票。七月二十九日，司法委员会通过了弹劾案的第二款，以二十八票对十票指控总统滥用职权。那天，一个名为“保守派主张罢免总统”的委员会宣告成立。老堡垒都在纷纷崩溃。参议院正在为弹劾审讯作准备，要求其规则委员会审议有关规则和先例。七月三十日，众议院的委员会以二十一票对十七票表决了弹劾案的第三款，指控总统违反宪法抗拒传讯。七月三十一日，约翰·埃利希曼因犯共谋罪和伪证罪被判处二十个月至五年的徒刑。个人的悲剧有增无已。尼克松在毁了他自己的同时，也毁了几乎所有与他发生过联系的人的一生。

七月二十八日，总统回到华盛顿。七月三十一日，黑格给我打电话，要求紧急会面。他极少来国务院，这是其中的一次。通常我是在情况室参加各部联席会议以后，在他白宫的办公室与他会面的。他没有浪费时间。“冒烟的枪”已经发现了；一天前交给特别检察官的一盘录音带——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在闯入水门公寓后不到一周，尼克松与霍尔德曼在椭圆形办公室的一次谈话——使人毫不怀疑尼克松对掩盖水门事件是知情的；事实上可能是他下令这样做的。现在，弹劾已在所必行，十分可能要定罪。我们需要协调我们的力量。他是否应当告诉那些为尼克松辩护的人在危险的处境中不要走得太远呢？我说，录音带必然会公布于世。或者是特别检察官，或者是众议院司法委员会，肯定会透露录音带的内容。白宫可以考虑先发制人，自己公布录音带内容，并且附上任何可能作出的解释。我出主意说，找任何为尼克松辩护的人，不是黑格份内的事；从长远来看，这样做会使他充当坏人。黑格目前应起的作用——在可能的范围内也是我应起的作用——是促

使尼克松下决心辞职。他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也是别人无法执行的）是在心理上支持尼克松，使他做必要做的事。

此后，黑格每天都和我保持联系。通常我在白宫与他一起参加碰头会，从而开始一天的工作。八月一日，星期四，他说，事态正朝总统辞职的方向发展，尽管尼克松全家激烈地反对。八月二日，星期五，他告诉我，尼克松岿然不动；也许有必要派第八十二空降师在白宫周围保护总统。我说，这样做荒唐；一位总统不可能在刺刀包围下的白宫行使职权。黑格说他完全同意；作为一个军人，想到军队要充当这样的角色使他心里十分难受；他只是要让我感受一下正在酝酿的各种意见。周末，在戴维营开了一次包括尼克松最接近的亲信（显然不包括我）在内的大型会议，以制定行动方针。不论作出什么决定，这害人误事的录音带将在八月五日星期一公布于世，使白宫有机会从全局的角度说明此事。尼克松在能够判明公众的反应之前是不会作出最后决定的。所以，我怀疑这录音带是否没有黑格原先认为的那么关键？黑格没有给我看录音记录稿，他说正在整理中。我有些惘然，不知连续几个月的困扰是否已使黑格神经过敏，或者我们确实已到了穷途末路。

我们正在走向某种净化的境界，却漠然不知其性质。我知道，那些整天为水门事件忙碌的人现在对公众的反应已司空见惯了；他们已见过这么多次高潮，不再相信哪一次会是最后的一次揭露。而权力与总统职务都具有自己的发展势头，因而要正视任期已临近结束这个事实——即使在理智上明白——也是件难事。例行的发号施令造成一种假象，似乎权力并没有削减，尽管它已几乎化为泡影。对于个人权力的终结在感情上接受不了，这在正常情况下，总统任期即将告终时就十分明显，在尼克松的总统职位垮台之时尤其如此。

我想黑格对录音带的反响所作出的判断恐怕还是正确的。我

在办公室里度周末，不是为准备移交权力，而是准备下星期四（八月八日）在参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上就缓和问题作证。委员会的主席富布赖特参议员在几周前已决定举行听证会，以便对东西方关系进行不偏不倚的、哲学上的探讨。从两个极端反对我们的人抓住机会要攻击尼克松的对外政策。原来几届自由派政府的公仆以及主张强硬路线的人都列队伺机作证——想来不是为了维护政府的做法。

八月四日星期日下午，罗恩·齐格勒的助手黛安·索耶在我那里逗留了片刻，核对某些公共关系的事项，以便到戴维营去同齐格勒商量。我问她，鉴于录音带的内容即将公诸于众，这些事项中是否有哪一项具有什么意义。聪明美丽的黛安感到为难。她没有阅读过录音记录稿，但她认为永远不会出现高潮，只是无休止地对此怒气冲冲而已。她说：“很可能录音带的事将淹没在一片政治鼓噪声中。”

我们迄今生活在一个超现实的世界中。其受害者与噩梦共处，久而久之，噩梦看来似乎已成常态。他们对危险已司空见惯，因此不相信它会发展到顶峰。八月五日星期一上午，我同尼克松进行了一次谈话。尼克松赞扬我每月与众议院领袖安排会见。可是，他告诫我要记住大多数民主党人是敌人。值得培养的是南部的民主党人；我应该邀请他们参加情况介绍会。他相信，福特副总统将乐于作此安排。他对水门事件或即将公布录音带之事只字未提。

我遵总统之命去拜访福特。我没有问福特，他以为我去干什么——他很可能认为，权力移交在即，我想要博得他的青睐。但他很直截了当。是的，他将乐于安排一次与众议院老朋友们的会见，但他并不认为这会有多大好处。他认为在众议院里的战斗，虽然胜负未决，但是会输掉的。是的，我们应当保持联系；也许不久我就该来这里进行一次我经常作的情况介绍了。

午后不久，齐格勒来访。他认为我应该过目一下将于下午四时左右公布的录音带部分内容。但是，齐格勒要我提前看的录音记录稿与水门事件无关。这是尼克松和霍尔德曼在交换意见，究竟让罗杰斯参加我从中国归来后向尼克松的汇报会呢，还是让他与尼克松合一次影就够了。齐格勒以为我会兴趣盎然。可是，我看了大吃一惊；录音带的内容一定比这要多。要是不比这多，黑格当已失去了分寸感；要是比这多，齐格勒必定已失去了现实感。

我不得不象其他人一样等到下午四时，等白宫公布录音记录稿。事实证明，黑格的分寸感颇佳。记录稿中包括闯入水门公寓事件发生一周以后，总统与霍尔德曼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三日的三次谈话。在这些谈话中，总统命令停止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其部分原因至少是要保护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中有关的人员。发表记录稿的同时，还发表了总统的一项竭力进行辩解的声明，承认掩盖水门事件的做法具有政治及国家安全的含义，并承认总统对其律师隐瞒这次谈话是疏忽，是一种严重的行为。但是，总统接着说，尽管犯了这些错误，基本真相仍然是，在他了解到全部事实之后，他曾坚持要向有罪的人进行全面调查并起诉：“我坚信，全部记录不足以使弹劾和罢免总统的极端做法合法化。我相信，随着宪法程序的演进，这种看法将占上风。”

说这些话已为时太晚。录音带一事使他再也支持不住而终于垮台。它为一切动摇分子提供了投票赞成弹劾的借口；它给其他人提供了抛弃尼克松的借口。至此，令人震惊的事层出不穷，大家都希望了结完事。

电话潮涌而来，人们都要我发表评论。我拒绝了。有些人暗示我应该谴责尼克松，从而迫使他辞职。我不同意。我已成竹在胸。我不愿站出来反对尼克松。如果可能的话，我愿意私下里温和地开导他辞职。

在水门事件漫长的过程中，几乎在每一个关键性的转折时刻，驻华盛顿的中国联络处似乎事有蹊跷，总要为我举行一次宴会。一九七三年四月三十日，中国人为尼克松罢免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使水门事件从此结束而干杯。十月十九日，即“星期六夜晚大屠杀”^{*}前一天的晚上，他们高兴地以为斯坦尼斯的妥协^{**}意味着这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已全部了结。而在八月五日星期一晚上，华盛顿权势集团里的许多要人都聚集在中国联络处，我是主宾。水门事件——或者至少是有关尼克松的部分，显然已临近结束。宴会上没有欢庆的情绪。出席宴会的许多客人都曾为尼克松的倒台出过力；有几个人一边虔诚地佯称他们对事情的急转直下表示惊愕，一边却在幸灾乐祸。但是，占主流的是凛然生畏的感觉——超越了正义感，超越了平生的仇恨。一瞬间，令人觉得我们大家都可能处于危险之中，象总统身败名裂这样众目睽睽的事是不该要求整个社会来经受的。

我们的中国主人问，如果尼克松去职，政策是否会发生什么变化——这是他们在同我谈话中第一次表示了尼克松去职的可能性。他们问，我是否会留任；连续性显然对他们很重要。我在祝酒时向他们保证，我们两国的关系是建立在持久因素的基础之上的，但是我用词谨慎，免得被在场的记者理解为总统因辞职或弹劾而去职已势在必行。

* 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日（星期六）白宫新闻发布官齐格勒宣布：一、解除考克斯（与肯尼迪家族有关，极力反对尼克松）特别检察官职务；二、司法部长理查森、副部长拉克尔肖斯辞职；三、撤销水门事件特别检察官办公室。新闻界报导此消息时称之为“星期六夜晚大屠杀”。——译者

** 尼克松因考克斯坚决要他交出录音带，非常不满，要求司法部长将考克斯撤职，但司法部长认为考克斯无特别不正当行为，宁可自己辞职，不同意把考克斯撤职。后来尼克松提出妥协方案，交出录音带，而由被认为公正不阿的斯坦尼斯负责核实，所以称斯坦尼斯妥协。——译者

及至宴会结束时，黑格告诉我总统将根据人们的反应作出决定，而各种反应已人所共见了。四名原来在司法委员会投票反对弹劾的共和党人说，他们将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投赞成票。参议院共和党督导罗伯特·格里芬参议员要求尼克松辞职。福特副总统在一次讲话中表示划清界限，他说：

我以前曾表示过，根据我以及美国人民所知道的一切证据，总统未犯应受弹劾之罪，再重申这一看法已不再符合公众的利益。

此时，许多有关人士来找我，怂恿我扬言，除非尼克松辞职，否则我就要辞职，以便捅破这个问题。有几个人甚至建议我援引宪法第二十五项修正案，宣布总统已无力继续工作。这是不可思议的事。不仅是一个受总统委任的人在道义上没有权利迫使总统辞职，而且这对一个在外国出生的人将是一个无法承受的历史重担。虽然黑格告诉我尼克松仍在犹豫，我相信他最终会作出正确的决定，而对国家来说，重要的是他应被认为是自行得出这个结论的。

第二天，八月六日，星期二上午，原定在十时召开的内阁会议改在十一时举行，因为总统到达椭圆形办公室的时间晚了。我走进内阁会议室时，感到内阁显然认为尼克松就要去职。福特站在副总统座位的后面，同簇拥在他周围的内阁成员们亲切交谈——说得温和些，当总统有效地履行职务时，内阁会议上这种情景并不常见。在那种场合，大家对副总统以礼相待，然而却把他视作冗员。我坐在总统座位右边我自己的座位上，这时尼克松走了进来，引起了一阵椅子挪动声。谁都不能不为这位受尽折磨的人感到难过。我同他曾一起度过无数时日，怎能不感觉到他内心的慌乱；我知道他故作镇静的姿态仅仅是表面的。

尼克松开头说，他要谈谈我们国家当前最重要的问题。但十分离奇，那竟是通货膨胀问题。他说明了水门事件期间他如何否决了三百五十亿美元拨款，以及此后一个时期，情况将更加困难。

突然，尼克松把话锋转至使大家牵肠挂肚的问题。他感谢内阁支持他渡过了一切困难。他知道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三日的录音带对他的案子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他不要求内阁官员做任何可能使他们个人为难或违背他们信念的事。在今后困难重重的岁月里，他们可以通过搞好本部门的工作来为国家和总统服务。至于他自己，他意识到有一种要他辞职的情绪。他以前曾经历过困难的时刻，也曾做出过一些功绩。他必须考虑的，不仅是他个人的爱恶，而且是总统的职责。倘若他在压力下辞职，他便会把美国的总统制变成议会制，即总统只有在立法机构投信任票的情况下才能保持职位。

这当然不是那么回事。弹劾总统不同于在议会里投不信任票。我相信尼克松不是在上政治课。他是想拐弯抹角地取得内阁的信任票，让内阁对他的困境表示某种同情，想表明他愿意继续斗争下去，并声明为保持总统职位而战斗是符合国家利益的。

但是，他遇到的却是一片令人难堪的沉寂。人们烦躁地不断翻阅文件，最后福特结束了这个僵局。他说：“总统先生，请允许我说几句话。”尼克松点点头，于是福特接着说：

在座的每一位都看到我的困难处境。没有人比我对这整个悲惨的插曲更感到遗憾。总统先生，我个人对你以及你美好的家庭深表同情。但，我要强调，如果我早知道过去二十四小时内公布的关于水门事件的内容，我就不会以少数党领袖或副总统的身份多次发表声明了。我昨天决定，而且你或许知道，我已告诉报界，由于我对国会和公众负有义务，我对这个问题将不再发表评论，因为我是属于有利害关系的一方。我确信众议院将进行弹劾。我不

能预言参议院的结果。对此，我不予置评。你已经为我们美国制定了历来最好的对外政策。你做了卓越的工作，人民对此表示赞赏。让我向你保证，我准备继续支持政府的对外政策和反通货膨胀的斗争。⑨

尼克松似乎只听到关于通货膨胀的话。他向福特说他的立场是对的，但他是否指水门事件而言，并不十分清楚。因为，他提到福特几天以前公开发起的一项建议，要召开一次商界和劳工领袖的最高级经济会议，以解决通货膨胀问题。有人对这个问题以及农业拨款新法案随便扯了几句。司法部长威廉·萨克斯比插话说：“总统先生，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召开最高级会议。我们应当确定你有能力主持工作。”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乔治·布什拣起了话题。他说，共和党乱成一团，即将举行的国会选举势将大败。水门事件必须尽快结束。他没有明说，但在座的每一位都懂得，当然的推理是：迅速结束水门事件的唯一办法是尼克松立即辞职。

这些话是无情的，然而又十分必要。由尼克松自己任命的人来使他倒台，不是结束总统职务的良策。但尼克松使他们别无选择。如果他诚心征求内阁的意见，他应该约见少数几位高级内阁成员到椭圆形办公室去，或采取单独约见的方式。这样来衡量阁僚们的情绪要比迫使大家无可奈何地在同事们面前表态以记录在案要好得多，因为在那种场合，人们不清楚到底要求他们支持什么。这是尼克松典型的做法。由于害怕遭到一个个的拒绝，他召集了这次大型座谈会，希望大家集体投他的信任票。他想把既成事实摆在大家面前，因而触发了近乎造反的行动。

没有人比总统的内阁更不会造反。所有内阁成员都由总统委任，并从总统那里获得了权力。从约翰·肯尼迪时期以来，我看到过历届总统与高级内阁顾问们举行的会议；他们照例是唯命是听，有时近乎谄媚奉承。如果尼克松的内阁官员感到不得不出他们

刚才所说的话，他们必定是感到在水门事件上受了骗；如果他们感到可以直言不讳，他们必定是估计到尼克松的日子已屈指可数。但是，如果让事情这样发展下去，对尼克松来讲未免太无情了，而且将使他的辞职失去传递一个重要信息的机会，即我们的制度仍然是具有生命力的，我们的程序是民主的，我们的未来充满着水门事件几乎要夺去的民族乐观精神。话已说得够多了。内阁对总统负有义务，不应当使他丧失自尊，或者失去几乎肯定会丢失的尊严。因而，我作为内阁高级官员发了言：

我们到这里来不是为我们做不到的事进行辩解。我们是来替国家办事。现在我们的国家正处在十分困难的时刻。我们的责任是显示我们有信心。我们一定要表明美国可以完成宪法程序。为了有利于对外政策，我们要坚定地、团结一致地采取行动。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一点，就能够维护和平的结构。④

后来，我走到白宫西翼前面的车道旁。有几名内阁成员正边走边谈。我站在电视摄影机前，想让美国公众宽心，并使我国政府感到我国是稳定的，我说：

我们一贯地、并将继续在两党的基础上，本着国家的利益和世界和平的利益，执行我国的对外政策。考虑和平与战争的时候，任何外国政府都无需怀疑美国将如何执行对外政策。⑤

晚上十二时三刻左右，我未经通报，又去了椭圆形办公室。当时只有总统同我两人，我把我对舆论界发表的评论告诉了他。我说，这些评论以及我对内阁讲的话还都不是事情的全貌。我与总统亲密共事已达五年之久，我理应对他说，这时他报效国家最好的

方式就是辞职。我接着说，遭到政治攻击尚能一如既往，表现很刚强，固然不错。但是，如果进行弹劾审讯，会占用他好几个月的时间，会困扰全国，还会使我们的外交政策陷于瘫痪。这对国家太危险，对总统的职位也太不体面。我认为，他的辞职应使人看来似乎是他自己作出的抉择。我最后说明，不论他作出什么决定，我决不会到椭圆形办公室外面再谈论这些看法。

近一周来，尼克松沉溺于痛苦的思考，但他从未征求过我的意见，目前也不征求。对于我向他说的话，他表示感激，他说他要认真考虑，并将同我保持联系。

其后，这件事便无声无息。那天晚些时候，黑格告诉我说，尼克松又倾向于辞职，想在本周晚些时候提出，并已交待撰稿人雷·普赖斯着手起草辞职讲话稿。但这是危急关头的脱身之计；一到晚上他家里的人可能又会使他变卦。整个下午，我遇到很多机会可以公开同总统划清界限，从而触发一场危机。但我没有这样做。

当天晚上七时左右，我接到尼克松的电话，他没有提起白天发生的正在使全国沸沸扬扬的事。他以吹嘘他处理官僚机构例行公事的口吻对我说：他接到了以色列希望取得长期军援的请求。他说他不同意给。事实上，他将中断给以色列运送一切军用物资，除非以色列同意实现全面和平。他后悔没有及早采取这个行动；现在他想弥补这一点。对此，他的继任者会感激他的。我应该准备必要的文件。

据尼克松看来，在对以色列施加压力的问题上，我的信念使我异常敏感。那么，这是否是对我们数小时前所进行的谈话的报复呢？还是说，这是他长期以来所持观点的反映呢？几乎肯定是两者兼有。我把同尼克松谈话的情况告诉了黑格。尼克松没有再谈起这个问题；有关的文件都已准备就绪，但始终没有签署。

翌日，八月七日星期三，我先在白宫办公室工作了两个小时，这

是为了便于同黑格和总统谈话。尼克松没有召见我，但我从黑格那里了解到他(黑格)正在取得“进展”。他正在怂恿那些总统过去的患难之交坦率地向总统说明在国会中的前景。当天下午，总统将同国会中共和党主要领导人一起开会。他们是：参议员休·斯科特、众议员约翰·罗兹以及受人尊敬的保守派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那次会议可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虽然形势愈益紧张，但这一天我还在处理外交工作。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为了维持正常的局面。我请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和拉里·伊格尔伯格——完全作为私人关系——准备一份官场用语称之为“方案”的材料，以备总统一旦辞职时用。方案中包括如何通知各国政府；按什么程序通知；给谁写信，信中写什么内容；新总统如果需要接见外国使节，则应接见哪些国家的使节。一旦作出辞职的决定，我就要将此方案送请福特批准。

我与国务院工作人员见了面，他们正在拟写我将在参院外交委员会上作的缓和问题上的讲话稿。我参加讨论了关于塞浦路斯危机的会议；同副国务卿罗伯特·英格索尔共进午餐；还会见了约旦首相里法伊和摩洛哥外交大臣艾哈迈德·拉腊基博士。关于中东问题的下一步做法，正是在这种忙得不可开交的情况下商定的。

下午五时五十八分黑格来电话找我，于是中断了我同西斯科、桑德斯和艾瑟顿共同研究中东问题的工作人员会议。黑格问我能否立即到白宫去。他没有告诉要我去白宫的原因。这看来并无必要，因为辞职的决定显然已经作出。我走进椭圆形办公室时，看到尼克松独自一人背向办公室，凝望着圆弧形窗外的玫瑰园。我在童年时代离开我生长的地方移居外国时，曾有过一种感受：在同自己所熟悉、心爱的景物告别时，想将此一切可谓尽收眼底，从此永世不忘。可悲的是，在后来的过程中，这些景物已在不知不觉中消逝，因为这种自觉的努力泯灭了人们只能自然而然获得的东西。

我感受到，当时的每一分钟现在看来都无限珍贵，却又如此无情而又短促。我体会到尼克松的痛楚，他既企图凭借自己的意志来延长这个时刻，又想尽快结束了事。我尤其明白，我的任何言行都绝不能减轻他正在独自忍受的痛苦。

尼克松听到我进办公室的声音后就回过头来。他显得十分沉着，几乎若无其事。他说，他已经决定辞职。共和党领袖们的态度加深了他的直觉：从国会对他支持的情况看，他感到已不值得继续斗争下去。国家需要休养生息。他只有避免一场宪法危机才能挽救美国的对外政策。他将在次日，即八月八日星期四的晚上向全国发表演说；他的辞职将于八月九日星期五中午生效。他希望我能留任，协助新总统继续执行他引以自豪的对外政策。

这番努力看来已使他精疲力竭，我对他冷漠的态度感到担忧。我说“历史将比你的同代人更为仁慈。”我记得当时我伸过手臂去拥抱他，终于弥合了这些年来我们之间在感情上的隔阂。尼克松在他的回忆录里并没有记述这一情景，因此，也许未曾出现过上述情况，只是我当时曾经想这么做罢了。也可能是，尼克松在写书时不愿意承认他需要得到安慰；他认为这是感情脆弱的表现，其实这是最合乎人情的反应。说感情脆弱的表现也好，合乎人情的反应也罢，并没有实质的区别。尼克松下台时，我对他满怀惻隐之心，为的是他这个具有复杂性格的人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为的是他的极度痛苦，为的是他遭受的攻击，为的是他的雄心壮志终因性格上的种种弱点而未能实现，而且这些弱点由于他从未努力去克服而招致了他的毁灭。如果当时我确实并没有拥抱他，那么我的感情好象已经拥抱了他一样。

当晚，我同南希、孩子们和我亲密的朋友、专栏作家约瑟夫·艾尔索普在家里一起吃晚饭。将近九点钟，电话铃响了。这是尼克松打来的电话，他独自一人在林肯休息室。他问我能否立刻去一趟。

以前遇到高兴的场所，象这样的电话是很多的。例如，一九七一年有一个傍晚，当我们获悉在中国问题上的突破已成为现实时，他就给我来过电话。然而这一回是一场冒险的终结，而不是开端。使尼克松最为辛酸的是，在他结束政治生涯的时刻，身边剩下的一个同事竟是他十分喜爱也十分憎恨的人。这个人即使在他指望能继承自己的成就的时刻，仍然使他难以宽心。

我看到尼克松以习惯的姿态，没精打采地躺坐在一张棕色的安乐椅上，两条腿搁在脚凳上，膝盖上放着一本黄色的便条本——这是他绝望时刻的最后支撑。台灯暗淡的灯光照射在他的椅子上；室内其它地方显得一片暗淡，只有白宫院子里远处的灯光射进一些光影。一件件往事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当成千上万慷慨激昂、大声疾呼地反对越战的抗议者包围白宫的时候，我就在这里见过总统。过去，我常在这间休息室里明显感受到由于权力集中而出现的那种气氛，而现在却只是孤独和寂静。

关于我们那天晚上会面的情况，有好几篇报道。有的说尼克松把我从办公室召去进行了一小时较为严肃认真的谈话。还有一篇迄今尚存的内容刻薄的报导，说这位总统失去了自制力，边敲打着自己的拳头，边思考着，抱怨自己的厄运。^⑥上述两种报道都同我的回忆不符。那次见面无疑持续了将近三个小时。尼克松既不镇静、严肃，也并未失去自制力。他被整得晕头转向了，要不然也就不值得作进一步的反省。当时，他还是有自制力的；无疑，他的心情异常混乱，我感到他流露出来的痛苦比我所熟知的那种几乎非人所能忍受的自我抑制要更自然些。历尽艰苦奋斗，从一个无名之辈到成为一位社会名人；做出了超越凡人的努力，到头来却落得将自身的弱点暴露无遗，所有种种错误汇集起来导致了最终的垮台——这是只有在圣经上才能见到的厄运。显然，上帝不能容忍那种以为自己能摆布一切的狂妄臆想。他要用实际的事例来告

诫人们：凡事必须有个限度。

尼克松在白宫度过最后一个孤独的夜晚，这时他想从他这些年来的辛勤努力中寻找出某些积极的意义，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很自然的。历史将如何对他作出评论呢？说他使世界发生变化了吗？使世界更安全了吗？我们能否回顾一下我们曾一起做过的事情呢？他接二连三地提出问题，想在孤寂中得到一些东西，但他既不愿相信别人的话，也不敢断然否定。

政治生活的意义何在？人们如何评价国际政治中的趋向？即使在最美好的年代，最微妙的判断莫过于评价一位政治家所采取的行动的意义。与人的一生相比，历史的长河是无穷无尽的，何况人的视野更为有限。人的才智常与历史的必然相违背，在大动荡的时期尤其如此。政治家如能看清事情发展的趋势，并使之为他的目标服务，就能真正有所建树。就这一任务来说，政治家的活动范围不是无限的。倘若他仅限于顺应潮流，他将变得无足轻重；倘若他的所作所为超出了本国人民的能力，就会遭到覆舟之祸。如果说政治是一门掌握可能性的艺术，那么政治家功绩的大小取决于他是否能利用一切可能。伟大的政治家为自己确定崇高的目标，然而又冷静地估量他必须用以进行工作的人力和物力的质量；平凡的领导人满足于消除磨擦，摆脱窘境。政治家致力于创造，而平凡的领导人只是消耗。平凡的领导人满足于改善环境，并不去改造它；政治家必须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人物和教育者。如果能敢于毫不畏缩地正视命运、但又不企图充当上帝的人来领导人民，人民是应该为之庆幸的。

在外交政策方面，尼克松以他自己的方式经受了命运的考验。他知道世界上的什么正濒于危险。他怀着无法抑制的激情，坚持一个真理，即美国的信誉不能随便丢失，特别是不能被身为领袖的人随便丢失。他前任的几位总统曾调派部队到遥远的丛林去打

仗，而他却曾亲自在那里为美国的荣誉战斗过。他深信我们没有权利抛弃那些依靠我们的人，深信千百万人会因我们放弃权力而诅咒我们，然而这正是批评尼克松的人所希望的。他一反平生的言论，并勇敢地断言：不可能把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排除在国际秩序之外。与前一个时期比较简单化地划分范畴相反，他看到，为了反对共产主义的侵略，需要在心理上建立一个基础，那就是只要我们的对手能放弃野心而服从于共处的话，甚至他们也可以取得美国享有的和平结构捍卫者的身份。他认识到，工业民主国家需要在道义上重新献身于共同的目标。他突破了中东地区的宿仇之网，并在他最痛苦的时刻，在一切都遭到挫败的情况下，指出了走向和平的道路。而且他正在开始教育美国人民：美国应以负责态度卷入世界事务。这是一次永久性的挑战，这样美国人民就可能避免出现历史上那种在出征讨伐与放弃权力这两个极端在鲁莽与天真之间摇摆不定的状况。

诚然，尼克松没有完成作为教育者的任务。他太缺乏自信，因而不能用崇高的目标而是光靠精湛的技巧来鼓舞全社会。他未能应付道德方面对他的挑战，目前他至少因为忽视了这一方面对他的信任而正在付出代价。

不管怎样，尼克松毕竟还是引起了一场变革。一九七二年，他在美国一场最近似意识形态的斗争中，以压倒多数票当选连任。说得婉转一些，无论是尼克松或是乔治·麦戈文都不是具有魅力的领袖人物。美国人民在那一次破例地从哲学的角度，而不是从人品上进行选择。他们绝大多数人选择了温和保守派的路线，而没有选激进自由派的路线。由于同竞选问题无关以及投票支持尼克松主张的人无法预见的原因，这一选择正在失效，其后果目前尚难预测。

所以，历史的定论将是有褒有贬的。但那天晚上我并没有向

他细说我上述的这些看法；这类话在以后孤寂的岁月里尼克松会听到很多的，最生动有力的还将是他自己的论证。当时我谈的不如现在写的那样富于哲理，更多地联系了过去的往事，但意思是一样的。尼克松偶而打断我的话，要我同他一起喝一点白兰地。我们过去在做出点成绩后，感到兴奋时，也象这样在一起喝酒。要使一位前总统接受屈辱的刑事审讯，显然使他难以忍受。说实在的，我也忍受不了。我对他说，如果真要审讯，我就要辞职。我相信我一定会做到的。

我不断重复提到历史对他的定论不会那么严厉，历史将会记住他所作出的重大功绩。但是要使尼克松感到宽慰并非易事。他连连说“这要看谁写历史了。”在绝望的时刻，他没有公正地对待自己。他的建树比他自己意识到的要重大得多。将近十年之后，我们公开论述的国际事务的基本范畴——中国、中东、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以及战略平衡、能源政策、对盟国采取新的主动行动——都是在动荡的岁月里确立的，动荡岁月眼下即将结束。

对于憎恨尼克松的行家来说，这一切似乎是感情脆弱的表现，尼克松是自作自受，结局完全是公正的。我因身历其境，无法这样看问题。不管怎么说，八月七日那天晚上，总统在寻求任何人都无力给予的慰藉。这场人间悲剧几乎使我感到心胆俱裂。

大约两个小时之后，将近子夜时分，当我准备离开林肯休息室时，尼克松陪我通过把总统宅邸分隔成两半的长廊前往电梯口。他在林肯卧室门口停了下来，建议我同他一起去祈祷。没有什么好办法来结束那个夜晚，或者中止如此动荡不安的政治生涯。很难说这种方式不如其它方式有意义，或比其它许多方式更合适。

根据尼克松的回忆，他请我同他一起跪下，我也照办了。但当时我究竟是否确实跪下，我自己也记不太清了。这事关系不大。不管是什么姿势，我当时充满了敬畏的心情，仿佛这就是意义之所

在，因而我并不知道倒底要祈祷什么。埃斯库罗*的一节诗一直在我脑际萦回——这首诗恰好也是尼克松耿耿于怀的罗伯特·肯尼迪所喜爱的：

难以忘怀的痛苦
点点滴滴
坠入心头
直至无比仁慈的
上帝给我们绝望的心灵
带来智慧。

大概在林肯卧室呆了半小时之后，子夜刚过，我回到了白宫办公室。斯考克罗夫特和伊格尔伯格在等候我；伊格尔伯格从国务院来，准备我需要他时听候差遣。几分钟后，尼克松又来电话。他嘱咐我千万不能把我们当晚的会面当作他软弱的表现而记在心头。他希望我记得他坚强时的情景。非常奇怪的是，人们居然靠妄想来支撑自己。尼克松多次表示自己坚强，我听了都很不舒服。那天晚上，他暴露了内心深处的想法，使我看到他是一个坚韧的人。因此我对这位深受折磨的总统说，我以后要是谈到今晚的事，也将怀着敬意。承蒙他允许我同他一起度过在白宫最后一个闲暇的夜晚，使我感到荣幸；白宫有许多往事把我们联系在一起。他表现得合乎人情，令人起敬。

翌日，八月八日星期四上午，辞职一事已从悲剧转化为例行公事。当我逗留在白宫办公室时，黑格告诉我说，尼克松将在上午十

* 古希腊悲剧诗人，著有《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等剧。——译者

一时会见福特，正式宣布他计划于次日辞职。我为新总统起草了致各主要政府首脑的函件，我还检查了新总统按地区分批会见驻华盛顿各国使节的计划。重要的是要表明一个坚强有力的人正在接管工作。我的工作多次被打断。有的内阁部长来电话询问是否要公开宣布他们愿意继续任职。我劝他们不必这样做；他们不应该表现出似乎不让新总统有挑选人的权力。朋友们替我出主意，教我如何同政府更迭后侵犯我职位的行为作斗争。我没有心思理会这个问题。我已看到过两任总统就职伊始的情况。我知道不论新总统现在作出什么正式任命的决定，也决定不了最后的组织体系。角逐名位的事将持续好几个月。我没有兴趣再次经历这一过程。然而，又无可选择，这一切很快就会到来。如今我们总得按基本的规定行事。

中午十二时半，副总统福特来电话。他沉着而稳重。他说他刚从总统那里来，为的是要争取时间来劝我留任，“同我一起度过这一困难的时刻”。这种场合似乎总是使我笨嘴塞舌。也许是伟大的时刻与语言的力量太不相称了。我表示他可以指望得到我的支持，并说，“你知道，全世界都有赖于你，副总统先生。”

尼克松当时还是总统。我有责任将我同福特谈话的情况向他汇报。我同尼克松一起研究我应出什么主意使福特掌好舵，并使各国政府放心。尼克松对我去电话表示感激，但是语气冷淡。他没有提出实质性的意见。

下午三时，我前往行政办公大楼总统办公室，去拜访那位即将上任的总统。我认识杰拉尔德·福特已经多年。十多年以前他是我在哈佛大学主持的国家安全政策讲座的客座讲师。到华盛顿以后，我经常向他介绍情况，他起初是众议院的共和党领袖，近九个月来又是副总统。后来我们成了亲密的朋友，眼下要我改变感情是困难的。我非常喜欢他。在当时我就认为他是一个善良、正派

的人。我不知道他担任总统以后会怎么样，几乎可以肯定他自己也不知道。看来他很处之泰然，既不过分紧张，也不故作姿态、夸夸其谈。他再次敦促我留任，并且提到我们一直相处得很好。我指出，不是他应同我搞好关系，而是我应该同他搞好关系。我们共同审议了如何通知各国政府并表明新总统已稳操大权的方案。福特同意在就职二十四小时之内接见所有的外国使节。他修改了几封致各国领导人的信件，使信中的语气更像是出之于他本人。

一个半小时以后，当我离开福特的办公室时，我感到心情一点也不紧张，这是我多年来会见总统之后从未有过的情况。每次同尼克松谈话，事后总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是些什么药。有一点可以肯定：尼克松谈话时，从来不透露他全部的意图。同他谈话固然令人高兴，但也让人伤透脑筋，甚至觉得他有点咄咄逼人。与福特相处，你知道他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企图，没有病态的猜疑，也没有反常的心理。这里我又想到了上帝的智慧。尼克松最中意的继承人显然不是杰拉尔德·福特，而是约翰·康纳利。但是，福特是个典型的美国人，无疑是品德高尚、心平气和的人。他善于思考，并充分了解国内事务和国际义务，处事冷静，且无所畏惧。我想在这个几乎绝望的时刻，能领导我们重振国家的公众领袖再没有比福特更好的了。

当天晚上，尼克松在一篇简短的演说中宣布辞职，话讲得很好，没有流露伤感情绪。演说中没有说犯了罪，但承认有错误。一个如此高傲的人能做到这点并非易事。我在椭圆形办公室里，在电视摄影机后面观看了尼克松发表演说的最后瞬间。当他讲完后，还站着整理了一会儿讲稿，然后他把手搁在威尔逊总统用过的那张办公桌上，接着转过身来，最后一次步出椭圆形办公室。我在玫瑰园旁边的过道上赶上了他。我说，“总统先生，过去你在这个办公室作重要演说后，我们多半是一起走回你的住所的。如果今晚

我能再次同你一起走，我将感到荣幸。”

就这样，我们最后一次顺着走廊走向总统宅邸，至此我们已经意至言尽。我重复了历史将会善待他的话，他也重复说这要取决于谁写历史。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尔在住所门前等他。她默默地拥抱了她的父亲，陪伴他一起走进了住所。

我回去后见到尼克松的律师詹姆斯·圣克莱尔在我的办公室里。我不知道他来有什么事。在前几个月里，他同我只说过几句话。显然这时他需要找个人谈谈。他以平淡无奇的口吻回顾了他所经历的几个阶段：尼克松甚至不愿把面临的问题告诉自己的律师，这样圣克莱尔被委托的任务就类似特别检察官的任务了。他显然感到苦恼，不知自己是否本来可以把工作做得好一些，不知是否有些事疏忽了。我对他说：“这不是法律案件，这是一出希腊悲剧。尼克松是顺着他的本性行事的。一旦开了头，就不可能有别的结局。”

次日早晨，尼克松的内阁成员和白宫工作人员最后一次聚会时，把白宫东厅挤得满满的。我们中间很多人还记得尼克松两次就职庆典的盛况以及对在那里宣誓就职所寄予的崇高希望。九时半，军事侍从官宣布尼克松总统及夫人来到，接着演奏“向总统致敬”的乐曲。当时强烈的伤感气氛几乎令人难以忍受。接着尼克松发表演说。他的讲话漫无边际，情绪激动，不像头天晚上那样感情有所克制，说话那么有条有理。他讲得太多了，似乎这些年来他一直抑制着自己，这时非得把那些驱使他落到这般地步的魑魅魍魉和梦想全都展示出来。他甚至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戴上了眼镜，这象征着他与事业上的虚名浮华断然决裂。这种情景是可怕的，也令人伤心，但又是不可避免的。尼克松作为政界要人不可能自动离职。对于这种情景，我一方面感动得热泪盈眶，另一方面也为再次承受这种煎熬而感到恼火。这是尼克松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他对他周围的人还表现出他那爱憎交错的矛盾心理。当尼克松赞扬他母亲的时候，我觉得不合情理而纳闷的是他为什么没有提起他的夫人帕特。帕特不象尼克松那么善于伪装，因而一定比谁都感到伤心。

后来那种情绪也消失了。台上极度痛苦的气氛弥漫于我们所有人的周围。尼克松终于沉溺在失败和羞辱之中。他揭示了我们隐蔽的感情；我们的自然感情赤裸裸地流露出来了。我们毕竟还是同情这位不肯显露出自己已经失败、超然于绝境的人。

几分钟之后，我站在白宫的南门廊一边，尼克松以往经常在这里同外宾一起向前来参加欢迎仪式的人群挥手示意。南门廊下面的南草坪上，色彩很不协调的一条红地毯一直铺到停放在那里的直升飞机旁边。在福特夫妇陪同下，仪仗队最后一次持枪向尼克松总统夫妇致敬。即将上任的总统在直升飞机的舷梯旁同尼克松总统和夫人低声说了几句话。尼克松临上飞机以前，转过身来，最后一次向他的同事们挥手，他想显出高兴的样子，实际上却是心力交瘁，感情上濒于崩溃。

片刻之后，只见直升飞机犹如一个小黑点般出现在华盛顿纪念碑上空，接着便消失在飞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的途中。九十分钟以后即将就任总统的福特转过身来，一个胳膊搭着他妻子的肩膀，迈着坚定的步伐走向白宫。他们实际上只是单独在一起；那时身边还没有随从副官或显眼的保卫人员。福特看来情绪抑郁，但却充满信心。

我感到如释重负。我们经历了一场宪法危机，但没有出现灾难。以后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不会像这次行政权力崩溃时期那样危险。我们总算在大动乱中维护了至关重要的外交政策。然而我还想到，人们不能毫无顾忌地迎合虚无主义。从来还没有人在比这更艰巨的情况下接任总统；今后肯定会发生大的危机。当我目

送杰拉尔德·福特进入白宫时，我懂得了两天前还不太明白的祷文：为了我们大家，愿这位善良的人福星高照，愿他意志坚定，愿美国在他的领导下重获信心。

① 关于肯尼迪兄弟在一九六〇年竞选运动中可能进行窃听的说法。参见维克托·拉斯基著：《并非从水门事件开始》（纽约：戴尔出版社，一九七七年版），第三十八——四十五页及第四一八页上引述的来源。关于一九六八年在尼克松的竞选飞机上可能被窃听事，参见一九七四年五月十六日《华盛顿明星新闻》刊登的尼克松向詹姆斯·基尔帕特里克发表的谈话。第二一五页（原文）引语，出处同上。此处显然是 J·埃德加·胡佛告诉尼克松的。

② 《白宫岁月》，第一四七五——一四七六页。

③ 杰拉尔德·福特著：《是治愈创伤的时候了》（纽约：哈泼和罗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第二十一页。

④ 其他参加者关于这项声明的回忆略有出入，但实质内容一样。见福特著：《是治愈创伤的时候了》第二十一——二十二页。理查德·尼克松著：《尼克松回忆录》（纽约：格罗赛特和邓拉普出版社，一九七八年版），第一〇六六页。

⑤ 卡罗尔·基尔帕特里克撰写的《尼克松说他不辞职》，载一九七四年八月七日《华盛顿邮报》。

⑥ 《尼克松回忆录》，第一〇七六——一〇七七页；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合著：《最后的日子》（纽约：西蒙和舒斯特出版社，一九七六年版），第四二二——四二四页。